

編主冰寒孫 軒南吳

種一第書叢社摘文

幕內洲歐

上

譯楷學蔣 著室根

本原版一十四第年八三九一自譯

行發館書印務商



MG
D750.6
18
21

Inside
Europe

歐
洲
內
幕
上

文摘社叢書第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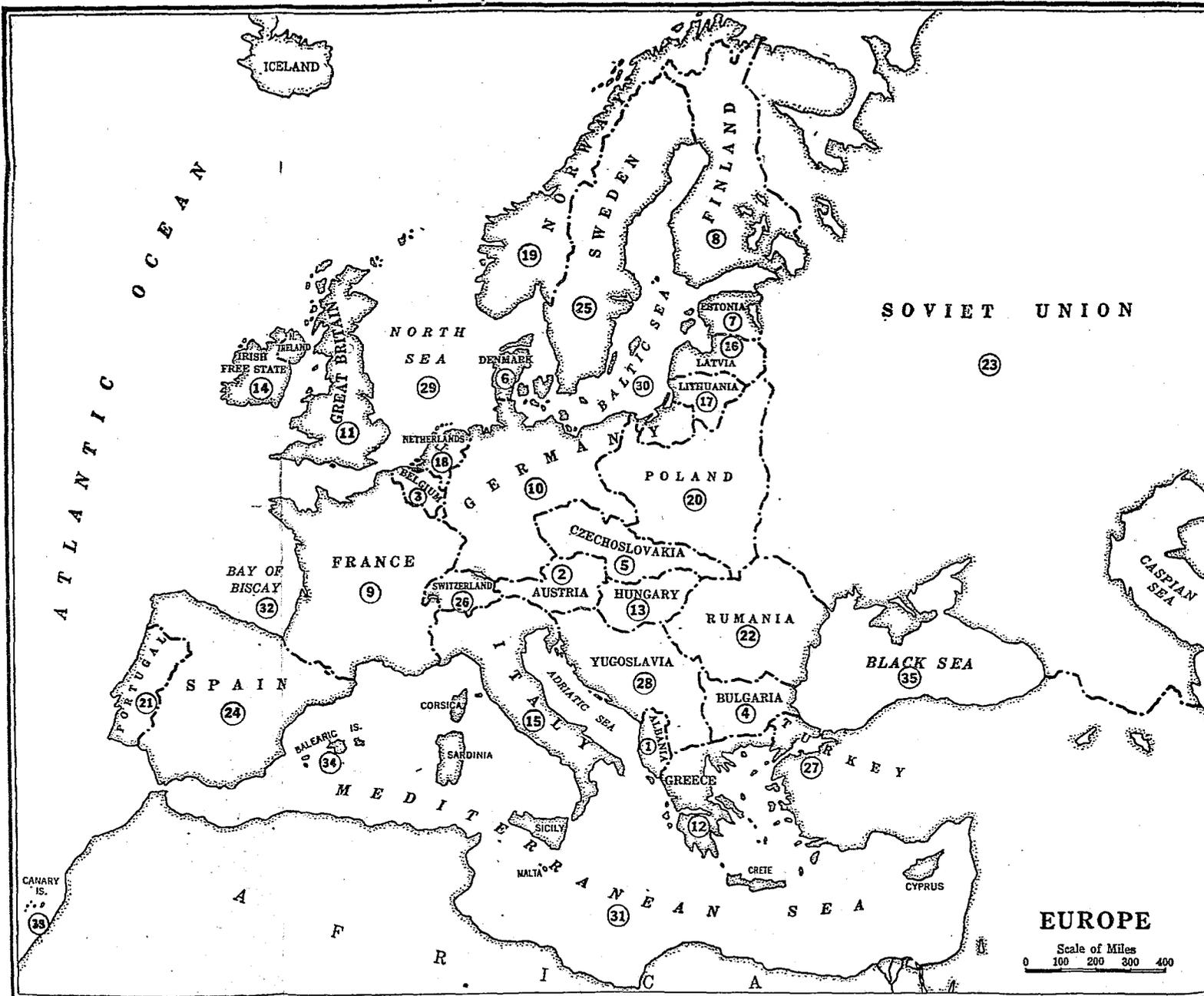
吳南軒
孫寒冰 主編

John Gunther 著
蔣學楷 譯



3 2167 9102 4

本書係根據一九三八年第四十一版
本所譯曾得許天虹顧高揚董瓊南三
兄幫助不少謹此誌謝
——譯者



歐洲地圖新解

(1) 阿爾巴尼亞 (Albania) 這個傀儡王國，把亞得利亞海助成爲意大利的內湖。是封建領主的老家。
(2) 奧地利 (Austria) 歐洲最瀟灑的國家，陶爾斐斯被害後，舒斯尼格繼任總理，六個私人軍隊在他領導之下團結成國防軍。人民頗注意音樂、散步、喝啤酒。現在地圖上是找不到了，應該改正爲德國的一邦。

(3) 比利時 (Belgium) 又恢復一九一四年前的中立國地位。可是中立對比利時在一九一四年並無幫助。歐洲人口最稠密的國家當推她。

(4) 保加利亞 (Bulgaria) 玫瑰花，貧窮，馬其登人，有一個好好國王，他不要回答「獨裁者能否爲國王」的問題。

(5) 捷克 (Czechoslovakia) 「波希米亞的主人便是歐洲的主人。」這裏有一位偉人馬薩里克建立了
一個自由共和國，這裏有一位偉人貝奈斯賢明地統治着。

(6) 丹麥 (Denmark) 靠牛油和雞蛋爲生，生活過得還不差，謝謝你。

(7) 愛沙尼亞 (Estonia) 總統叫做巴茲先生。

(8) 芬蘭 (Finland) 依然對美國付戰債，信仰合作主義，產木材。

(9) 法國 (France) 是世界上文明的國家，不管人家怎樣說。是名酒產地，補習學校最出名。自由和合理精神的老本家。農業和工業平分國民經濟的秋色。一個漂亮的國家，但常常碰壁。金準備達六四·一五%，但已廢除金本位。外交政策是權德。

(10) 德國 (Germany) 這裏由空前絕後的獨裁者希特勒統治着。國防軍參謀監督着鉅大的軍事機構；沙赫特博士玩弄着經濟把戲。每一個鄰國都感到她武力和積極主義的威脅。她在大戰時打敗仗，這是她一切悲歎的泉源；希特勒洗雪了人民的奇恥大辱。金準備只有一·六%，但仍採用金本位。

(11) 英國 (Great Britain) 「全世界最穩固的君主政體，最強硬的寡頭政體，最自由的民主政策。」地球表面五分之一的統治者。靠商業爲生。二%的產業，主擁有六四%的國富。受大陸危機的困擾和空戰威脅的憂慮，亟亟以七十五萬萬金元重整軍備。治國者爲一「國民」政府，但同時又「中途停頓。」游息游息，倒是一個頗爲出色的地方。

(12) 希臘 (Greece) 國王喬治二世在前面，曼泰克撤將軍在後面，兩人合演着雙簧。

(13) 匈牙利 (Hungary) 從不關心政治；匈京在休假。

(14) 愛爾蘭自由邦 (Irish Free State) 愛爾蘭內部的分裂，像英格蘭人分裂一樣，這話可不要讓行政院主席凡勒拉聽到。

(16) 意大利 (Italy) 勇敢而又兇猛，墨索里尼自一九二二年起就統治這個並不很富的國家。多數意大利

利人像他一樣。一九三七年九月，他到德國訪問希特勒，從此德意軸心的力量大增。

(16) 拉的維亞 (Latvia) 他們會告訴你兩婦之間難爲夫。

(17) 立陶宛 (Lithuania) 這個波羅的海國，很擔心她虎視眈眈的鄰人，尤其是波蘭。

(18) 荷蘭 (Netherlands) 身體康健，生意興隆，荷蘭人很愛他們的女皇，鬱金香和運河。本國人口八百五

十萬，不以嚴格的殖民政策而以商業政策治理六千萬人口的帝國。

(19) 挪威 (Norway) 這裏由社會民主黨統治着，加上一位賢明的國王，一種敏感的合夥精神。

(20) 波蘭 (Poland) 畢蘇斯基助成了兩百年復活的「波蘭奇蹟」。這裏是歐洲民族主義精神最強烈的地方，治國者是一班佩虎符坐臯皮的將軍，日夜擔心着德蘇兩國的侵略。

(21) 葡萄牙 (Portugal) 盛產葡萄酒，軟木塞是教授獨裁者薩拉查總理的領域。

(22) 羅馬尼亞 (Romania) 是法國的朋友，但又向德國頻送秋波。

(23) 蘇聯 (U. S. S. R.) 暴君伊凡的影子望着馬克斯的影子，馬克斯的影子望着暴君伊凡的影子，史

丹林站在中央。托洛斯基從側面監視着。五年計劃把一個十八世紀的國家一變而爲一個二十世紀的國家。接二連三的叛國大獄把旁觀者都弄得目迷心眩。在那裏，共產主義比許多人所想像的要成功得多，在那裏，民族主義氣焰高漲。

(24) 西班牙 (Spain) 這裏，法西斯政變把整個國家拖入內戰的血污池中。左翼共和政府想把二千五百

萬人民登於衽席之上。教會、封建貴族、和失意軍閥又想把時針扳回來。德意兩國幫助弗朗哥將軍的人馬幾達十萬名。「不干涉」國卻按兵不動。

(25) 瑞典 (Sweden) 和丹麥一樣，是歐洲生活程度最高的國家。人民快樂，愛好民主政治，信仰社會進步。

(26) 瑞士 (Switzerland) 是個說三種語言的邦聯。國際聯盟的家。

(27) 土耳其 (Turkey) 由最驚人的獨裁者凱末爾統治着。對內對外政策是土耳其人治土耳其。

(28) 南斯拉夫 (Yugoslavia) 是孩子皇帝的老家，農民階級勢力頗強，陸軍在歐洲可列入優等。

(29) 北海 (North Sea) 德國人稱之為「德國洋」頗值得注意。

(30) 波羅的海 (Baltic Sea) 北歐諸國擔心着英德海軍公約會把這個海成爲德國的內湖。

(31) 地中海 (Mediterranean Sea) 是英法意三國的生命線。一九三七年九月，海盜潛艇會在這裏炸沉

中立國的商船。地中海已取奧國、波蘭走廊，和萊茵邊疆的地位而爲歐洲最熱辣的區域。

(32) 比斯開灣 (Bay of Biscay) 這裏弗朗哥將軍得德意之助非法封鎖了海岸。

(33) 金絲雀羣島 (Canary Islands) 德國人想在這裏建築海軍根據地，以之截斷英國取道好望角以達

遠東的另一條航線。

(34) 巴勒利克羣島 (The Balearics) 西班牙內戰中被意佔領。

(35) 黑海 (Black Sea) 土耳其人和俄國人都想多少作爲他們自己的。

原序

本書是從一個確定的見解做出發點而作的。作者認為「人」的因素在歷史上佔着重大的地位。正如英儒羅素所說，如果沒有列寧，俄國革命也許不會發生；如果俾斯麥在童年夭折，近代歐洲的發展容或爲之改觀。馬克斯本人，對於經濟史觀便有強烈的影響。不過作者相信本書對於重要政治、宗教、人口、民族主義，及經濟的因素，並未加以忽略。但是本書主要的旨趣則在「人」的一方面。

墨索里尼所手創的法西斯主義，業已產生第一次戰爭。其次產生西班牙的內戰。更其次是什麼呢？

在歐洲各政客的生活，中，如果人的傾軋不解決，或將招致我們的文明的崩潰，這個事實雖然不免說得太過火，可是我們的確不能加以否認。目前的時代是各大獨裁領袖的時代：千百萬人的生死，全視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史丹林的意志而定。歷史上的政治，其尖銳與動亂，從未過於今日，對於非政治事情影響的重大，亦未過於今日。政客的活動，越出了他們的範圍而侵入其他方面。那一種虛構的戲劇，可與墨索里尼一生事業之演戲似的實現。比擬藝術界的著作，那一部的銷路和影響可與希特勒的「我的奮鬥」相抗衡？那一個寫書匠的寫歷史，可與托洛斯基之著述與製造歷史相對壘？那一個偉大的工程師，可與史丹林相並稱？

這些大人物和當代的次大人物——「白領」政客如拉伐爾，殘暴冒險家如戈林，國家主義軍官如弗朗哥

將軍、政客軍人如波蘭將軍黎滋·斯密格萊 (Rydz-Śmigły) 未成獨裁者如舒斯尼格，以及巴爾幹國王曹格 (Zog) 和卡洛爾 (Carol) ——在歐洲目前與將來大戰的戲劇中，都扮演著決定的角色。把這些人物的私生活抉發出來，似乎沒有什麼用處。本書並非透視鏡。內容不是為閑談而閑談。作者企圖敘述這些人物的祕聞，他們之所以得勢的「人」一方面的由來，以及他們與歷史相衝突的原因。支配我們生活的這批人究竟是誰呢？

本書以希特勒開始，然後敘述他周圍的人物。作者企圖繚陳與希特勒德國相抗衡的每一個歐洲國家，並分析每一件歐洲大事。我們在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兜一個圈子；折回稱霸全球的英倫三島；經過中歐及巴爾幹諸國的逐鹿地；在波蘭為止，把圍繞德國的圈子告一段落；略述北歐及中立諸國；在日瓦看看西歐的所見；最後在蘇聯作個大圍圓。我希望這樣布置有其自己的邏輯。

目錄

歐洲地圖新解

原序

第一章 希特勒.....一

- 一 他的個性.....一
- 二 他的嗜好.....五
- 三 他的朋友.....七
- 四 他對女人的態度.....八
- 五 他對金錢的態度.....九
- 六 他對宗教的態度.....一一
- 七 他的保鏢.....一三

目錄

八 他握權的手段·····	一五
九 他的口才·····	一八
十 他的恐怖手段·····	一九
十一 他的領袖主義·····	二〇
十二 他的反對份子·····	二一
十三 他的繼承人·····	二三

第二章 獨裁者的精神病理····· 二五

一 領袖的降生·····	二五
二 他的家譜·····	二六
三 他的父母·····	二九
四 威權結晶·····	三〇
五 獨裁者的統治手段·····	三二
六 國社黨的胚胎·····	三四
七 取得國籍的奇蹟·····	三六

第三章 殺死德意志共和國的是誰……………三二七

一 希特勒得權的原因……………三二七

二 老朽昏庸的興登堡……………四〇

三 白魯寧巴本施萊轍……………四三

四 希特勒的上台……………四九

第四章 國會縱火與清黨流血……………五二一

一 國會大火……………五二

二 縱火案的內幕……………五四

三 縱火案的開審……………五六

四 神祕……………五八

五 解釋……………六〇

六 血浴……………六一

七 清黨的背景……………六五

八 羅姆及其他諸人的遇害.....	六八
九 虎口餘生者.....	七二
十 興登堡的下場.....	七三

第五章 亨哈二將.....七五

一 馭人手腕.....	七五
二 第一號大混蛋戈林.....	七七
三 蹺脚博士哥培爾.....	八二

第六章 小型希特勒.....九〇

一 十足官僚弗力克.....	九〇
二 私人代表奚斯.....	九一
三 黑衫軍首領辛穆勒.....	九三
四 侍從長伯魯克納.....	九四
五 猶太人的閻王斯德婁.....	九四

六	兩位次等角色·····	九六
七	兩個激進分子·····	九六
八	兩位戰士·····	九八
九	希特勒與國防軍·····	一〇〇

第七章 戰爭和平政策及金錢·····一〇二

一	洛加諾條約的撕碎·····	一〇二
二	德意軸心與法西國際·····	一〇五
三	希特勒與戰爭·····	一〇六
四	三位外交家·····	一一一
五	哲學家羅森培·····	一一七
六	現款和信用·····	一一九
七	錢袋沙赫特·····	一二三

第八章 萊翁白魯姆·····一二八

一 第一個印象	一二八
二 思想的轉變	一三一
三 個人生活	一三六
四 性格	一三九
五 人民陣線	一四一
六 旭丹	一四六

第九章 法國的政策及其淵源 一四九

一 法蘭西銀行	一四九
二 冶煉業公會	一五六
三 自由平等博愛和人口稀少	一六一
四 口頭禪——安全	一六三
五 賄賂的盛行	一六九
六 法蘭西精神	一七〇

第十章 再論法國人 一七二

一	政局的不安	一七二
二	賴伐爾	一七四
三	赫里歐	一八一
四	達拉第及其「銑手」	一八四
五	加伊猶	一八六
六	彭古	一八七
七	秦狄歐	一八八
八	蒙德爾與萊諾	一九一
九	中央派佛蘭亭	一九二
十	基督將軍魏岡特	一九三
十一	總統勒白倫	一九五
第十一章 法西斯與人民陣線		
		一九六
一	斯達維斯基案	一九六
二	二六事變	一九九

三 未來希特勒洛克	二〇一
四 其他法西斯之花	二〇五
五 姬亞伯	二〇六
六 新社會黨	二〇七
七 背黨的道里奧	二〇八
八 農民法西斯	二〇九
九 左派的戰士	二一〇

第十二章 西班牙內戰

二一四

一 幾件基本事實	二一四
二 君主專制的推翻	二一六
三 共和與反動	二一八
四 幾個人物	二二二
五 戰事的爆發及其過程	二二四
六 弗朗哥將軍	二三〇

七 恐怖	二三四
八 左派	二三五
九 不干涉	二三九
十 葡萄牙	二四二
第十三章 墨索里尼	二四四
一 首相的出身	二四四
二 大言不慚	二四六
三 思想轉變	二五二
四 他的爲人	二五三
五 他的性格	二六〇
六 暴力	二六四
七 心理分析	二六五
八 法西斯主義是什麼	二六七
第十四章 意大利要人一斑	二七二

三 未來希特勒洛克	二〇一
四 其他法西斯之花	二〇五
五 姬亞伯	二〇六
六 新社會黨	二〇七
七 背黨的道里奧	二〇八
八 農民法西斯	二〇九
九 左派的戰士	二一〇

第十二章 西班牙內戰 二一四

一 幾件基本事實	二一四
二 君主專制的推翻	二一六
三 共和與反動	二一八
四 幾個人物	二二二
五 戰事的爆發及其過程	二二四
六 弗朗哥將軍	二三〇

七 恐怖	二三四
八 左派	二三五
九 不干涉	二三九
十 葡萄牙	二四二
第十三章 墨索里尼	二四四
一 首相的出身	二四四
二 大言不慚	二四六
三 思想轉變	二五二
四 他的爲人	二五三
五 他的性格	二六〇
六 暴力	二六四
七 心理分析	二六五
八 法西斯主義是什麼	二六七
第十四章 意大利要人一斑	二七二

一 誰是繼承者.....	二七二
二 意皇愛麥虞威.....	二七三
三 一等爪牙.....	二七四
四 巴爾蒲.....	二七七
五 其他戰士.....	二七九
六 外交人物.....	二八〇
七 幾個笑話.....	二八二

第十五章 意阿之戰..... 二八四

一 背景分析.....	二八四
二 「戰爭之美」.....	二八七
三 戰端的近因.....	二八八
四 一鼻孔出氣.....	二九一
五 經濟制裁.....	二九五
六 英法兩外交家的妙計.....	二九八

七 閉幕.....三〇一

第十六章 英國的統治階級.....三〇三

一 摸不着邊際的國家.....三〇三

二 「雜拌兒」.....三一四

三 政治裏面.....三一四

四 皇室.....三一五

五 外交政策.....三一七

第十七章 退位問題.....三二一

一 愛德華素描.....三二一

二 辛溥森夫人.....三二三

三 不愛江山愛美人.....三二六

四 追思.....三三三

五 新皇喬治六世.....三三七

第十八章 張伯倫與鮑爾溫……………三三九

- 一 一門三相的張氏……………三三九
- 二 就任的經過……………三四三
- 三 鮑爾溫……………三四五
- 四 個性特寫……………三五—
- 五 三任首相……………三五五

第十九章 白邸要人……………三五七

- 一 沒落了的麥唐納……………三五七
- 二 新內相霍爾……………三六四
- 三 國聯砥柱艾登……………三六六
- 四 新外相哈里法克斯……………三六九
- 五 保守黨的其餘諸子……………三六九
- 六 自由黨首領西門……………三七三

七	風中之燭的勞合喬治輩	三七五
八	無線電大王李滋	三七六
九	英蘭銀行總裁挪曼	三七七
十	奧斯頓與邱吉爾	三八〇
十一	報閥斐佛布羅克	三八一

第二十章 左翼與右翼……………二八二

一	左翼鳥瞰	三八三
二	工黨倫敦市黨部首領莫理遜	三八五
三	工黨碩學克利布斯	三八七
四	工會派要人	三八九
五	工黨首領亞德里	三九〇
六	共產黨與獨立工黨	三九一
七	極右派	三九二
八	法西斯運動領袖穆思萊	三九三

第二十一章 凡勒拉……………三九八

- 一 愛爾蘭之父的國籍和綽號……………三九八
- 二 工作和嗜好……………四〇〇
- 三 凡勒拉夫人……………四〇一
- 四 性格素描……………四〇二
- 五 革命經歷……………四〇四
- 六 愛爾蘭獨立戰……………四〇七
- 七 凡氏訪問記……………四〇八
- 八 上台後的凡勒拉……………四一〇

第二十二章 多瑙河的憂鬱……………四一三

- 一 戰後的奧地利……………四一三
- 二 「十二開」的迭克推多……………四一七
- 三 北方的劫掠者……………四二一

四 南方的保護人……………四二四

第二十三章 二月慘劇……………四二七

一 事前的準備……………四二七

二 序幕初開……………四三〇

三 社會黨的內幕……………四三二

四 變本加厲的混亂……………四三五

五 隱憂消滅了嗎？……………四三八

第二十四章 陶爾斐斯之死……………四四一

一 後臺與前臺……………四四一

二 無線電叛亂……………四四六

三 謀殺政策……………四四九

四 在陽臺上……………四五三

五 死……………四五五

六 失蹤的首領.....四六〇

第二十五章 奧地利的災殃.....四六五

一 舒斯尼格小史.....四六五

二 離開了政界的親王.....四六八

三 蹺脚的獨裁制.....四七〇

四 德奧協定.....四七一

五 哈布斯堡叫喧聲.....四七三

第二十六章 匈牙利與哈布斯堡博士.....四七四

一 奧都與復辟問題.....四七四

二 「貴族有義務」？.....四七八

三 暴躁的海軍上將.....四八一

四 貢博斯.....四八二

五 收回失地.....四八五

第二十七章 馬薩里克與貝奈斯……………四八七

一 捷克開國元勳……………四八七

二 貝奈斯……………四九二

三 捷克的錯綜……………四九四

四 霍德柴及其問題……………四九七

五 多瑙河流域公約……………四九八

六 巴爾幹諸國……………四九九

第二十八章 陰氣籠罩宮廷的羅馬尼亞……………五〇一

一 一個混混噩噩的國家……………五〇一

二 國王卡羅爾……………五〇三

三 魯貝絲叩女士……………五〇五

四 皇家浪子……………五〇九

五 太后曼麗……………五一二

六 法西斯的活動.....	五二三
七 馬尼伍的自述.....	五二五
八 漂亮的外交官.....	五二〇
九 親德還是親蘇.....	五二〇

第二十九章 亞歷山大被刺後的南斯拉夫.....五二三

一 幼主彼得.....	五二三
二 殉難的國王.....	五二五
三 幾位攝政王.....	五二九
四 暗殺的心理.....	五三一
五 南斯拉夫的內部衝突.....	五三五
六 巴爾幹何以不發生革命.....	五三八
七 黑手與白手.....	五三九
八 克羅特人的救主.....	五四二
九 外交問題.....	五四二

第三十章 巴爾幹諸王.....五四六

- 一 阿爾巴尼亞的曹格.....五四六
- 二 保加利亞的鮑利斯.....五五一
- 三 希臘與米他沙斯.....五五六

第三十一章 土耳其的巨人.....五五九

- 一 凱末爾的姓名.....五五九
- 二 倒戈將軍.....五六一
- 三 家世與政績.....五六四

第三十二章 畢蘇斯基逝世後的波蘭.....五六八

- 一 波蘭的要人.....五六八
- 二 全國的祖父.....五七一
- 三 上校團.....五七四

四 波蘭的復國.....	五七七
五 北方的小國.....	五七九
六 兩個危險地點.....	五八一

第三十三章 卓越的中立國.....五八三

一 斯堪送納維亞諸國.....	五八三
二 瑞典挪威丹麥三國王.....	五八四
三 瑞典首相韓森.....	五八八
四 丹麥首相斯陶寧.....	五九〇
五 挪威首相尼加得斯弗德.....	五九二
六 齊蘭與比利時.....	五九二
七 荷蘭.....	五九五
八 瑞士.....	五九七

第三十四章 半部國聯的動態.....五九八

一 國聯小史.....	五九八
二 和平之宮.....	六〇二
三 條約該撕毀嗎？.....	六〇三
四 戰爭抑和平.....	六〇五
五 其他的趨勢.....	六〇七

第三十五章 史丹林..... 六一〇

一 世界偉人.....	六一〇
二 得權的由來.....	六一一
三 他所充任的職務.....	六一七
四 少年時代.....	六一八
五 與托洛斯基的鬭爭.....	六二二
六 鐵一般的意志.....	六二六
七 史丹林的爲人.....	六二九
八 他的私生活.....	六三二

九 金錢·態度·朋友·····六三五

第三十六章 史丹林周圍的人物·····六三九

一 無名英雄·····六三九

二 嘉加諾維支·····六四四

三 紅軍總司令·····六四六

四 漂亮的外交家李維諾夫·····六四九

五 女性羣像·····六五三

六 全蘇名義元首加里寧·····六五五

七 內閣總理莫洛托夫·····六五五

八 其他領袖·····六五六

九 格柏烏——政治警察·····六五九

十 繼任史丹林問題·····六六三

第三十七章 蘇聯叛國案·····六六四

一 叛國真相	六六四
二 第一案	六六八
三 第二案	六七〇
四 第三案	六七七
五 叛國案的反響	六七九
第三十八章 蘇聯現狀	六八〇
一 俄羅斯特徵	六八〇
二 五年計劃	六八三
三 矛盾的現象	六八五
四 向「常情」邁進	六八八
五 黨魁的見解	六八九
六 民主主義	六九一
七 外交路線	六九二



希 特 勒

歐洲內幕

第一章 希特勒

「以一人而兼理論家、組織家和領袖，那是世界上少有的現象，其偉大即在於此。」

——亞道爾夫希特勒

一 他的個性

缺乏理性自相矛盾，錯綜複雜的亞道爾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是個難以形容的人物；他的權力和威脅亦在於此。在數百萬忠實的德國人看來，他是一個莊嚴卓越受人崇拜的偶像，他賦與他們愛戴、敬畏和愛國的狂熱。在許多其他德國人看來，他是一個羸弱、可笑的騙子，一個幸運的神經病患者，一個說謊的政治煽動家。這種似是而非之論的原因是什麼？他的非常力量是從何而來的？

這位大腹便便，有卓別麟鬚子，慣於失眠和感情用事的人，就是國社黨的黨魁德國海陸空軍大元帥，第三帝國的創造者，總統兼總理。他於一八八九年生在奧國。他不是一個德國人出身。這對於引起他早年國家主義是個



很重要的事實。他是一個住在邊疆上的人，被逐出國境的人，所以發展了他那種不可解釋的愛國主義。只有一個奧國人才會這樣懇切地接受日耳曼主義。

希特勒的祕聞，含有許多拍案叫絕，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討論他的出身，兒童時代，和事業概要以前，這裏不妨先來說一說他的為人，他的日常生活，他的態度和習慣，以及他的個性和嗜好等詳細情形。

他的想像力是純粹政治的。我會見過他少年時代所繪的圖畫，就是他送到維也納美術學校中的。這些圖畫很平凡，完全沒有節奏、色彩、情感，或精神上的想像力。那等於建築師的速寫：雖然畫得很用功夫，很精密，但此外也就沒有什麼了。無怪乎維也納美術學校的教師叫他入建築學校，放棄純粹藝術，因為他對於純粹藝術完全沒有希望。

他受教育的時間很短，無論我們的態度怎樣寬大，他是不能稱為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不如墨索里尼那樣有學問，那樣對知識發生興趣。他幾乎不讀書。對他一生唯一發生具體影響者，大概要算凡爾賽條約，但是即使凡爾賽條約他有否讀完全文，也是一個疑問。他不喜歡知識分子。自從少年時代曾居於奧國以來，他的足跡未出德國一步——如果你除去歐戰時他在法蘭特作戰的經驗和一九三四年在威尼斯與墨索里尼的匆匆會面——並且除能說幾個法國字以外，他不懂得外國語。

在許多見過他的人看來，希特勒似乎是個舉措古怪，局促不安的人。這因為來訪問他的人，即使是他的屬僚，都不知道他的脾氣。他沒有一定的態度。他覺得當機立斷是件困難的事，因為他先天缺乏當機立斷的能力。他不

是一個「沉驚的人物。」

外國人，尤其是英美的新聞記者，也許覺得他是誠懇的，甚至坦白的，但是他們沒有機會問他問題，和他作問答式的談話。他老是口若懸河地滔滔發表自己的議論。他是極端感情用事的，很少回答他人的問題。他對你說話就好像你是一個民衆大會，沒有東西可以阻止他一瀉千里的議論。

不久以前，當德波友好公約未簽訂的時候，他接待一位著名美國出版家兼編輯。他發出這樣一個問題：「假使，例如說，墨西哥是波蘭，美國的德士古州被墨西哥的「走廊」所割斷，那麼美國人會作何感想？」美國人回答：「這問題很簡單，因為加拿大不是法國。」希特勒原是有意發這個問題，並且說得很婉轉，豈知這個插話弄得他大為驚奇而手足無措，經過許多時間才重振唇槍舌劍來談另一個問題。

有一個時期，大家都說希特勒最好的特性是盡忠。人家常和他開玩笑，說他永遠不肯放棄三件事：猶太人，朋友們，和奧國。現在開玩笑的人是沒有了，因為能開這種玩笑的羅姆上尉（Captain Roehm）業已去世。即使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三十日以前，也沒有一個有識之士敢這樣嘗試，因為對希特勒不效忠的朋友，都一個個成爲歷史人物。

雷克斯勒（Drexler）、費特（Fater）、施德拉薩（Gregor Strasser）輩會助他成事業的朋友，他逐一翦除了他們。他對於有些同僚，那些從來不反對他，絕對服從他的人，他的確是忠實的。這種忠心並不是一種不純粹的德性，因為像牛蘭、猶太空想家 斯特拉赫（Stracher，the Nuremberg Jew-fancier）那樣不合他胃口的人，他也對

之忠實。沒有東西可以使希特勒放棄斯德婁及其他同志的友誼。僅僅不合胃口，還不足引起這位執政者的忘恩負義。

他體力上的勇敢頗令人懷疑。當他的手下在一九二三年莫尼哈暴動 (Munich Putsch) 中被鎗擊時，他自己也衝到街上，因為用力太猛，以致肩部脫了節。國社黨對於這件事有兩種解釋：(一) 他與另一個人攜手偕行，這人在他的右邊，被子彈擊死，他出於意料之外的被拉到地上，以致肩部脫節。(二) 他的舉動是前線老兵士的反射作用，即當子彈飛來時，有心臥倒，因之肩部脫節。

希特勒會把他榮膺鐵十字勳章的一件神祕故事告訴他的一個熟識人。當時他是一個傳信兵。他帶着信件經過兩陣之間的無人地帶，他以為那裏不至於有敵軍，但居然聽到了法國兵的聲音。他只有一個人，而且只有一支手鎗，所以他情急智生，對那些看不見的士兵假發口令。法國兵一共有七個人，都舉起手爬出隱蔽的地方。希特勒一個人把他們七人都虜到德軍防線。他對這個朋友私人談這件故事時說，要是法國人換了美國人或英國人，這把戲便不會成功。

諸如此類自欺欺人的誇大話，多得不勝枚舉。「國社主義史」的著者海登 (Hayden) 曾經提到了有幾則更秘密的不實之談，其餘比較普通的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會向巴威 (Baran) 當局允許不作暴動，而他突然暴動起來。他允許容忍巴本 (Baben) 內閣而後又攻擊牠。他允許不改變第一任內閣的閣員，而後又加以改換。他允許莫尼哈政變如遭失敗，他要自殺，但是政變失敗了，而他依舊活着。

二 他的嗜好

希特勒現年四十八歲，身體並不一等好。他在過去一年間，體重增加了十二磅，這可從他的頭頸和橫隔膜上看出來。他的體格從來不被人關心，例如他行禮時的傾斜就很顯著的。他常常將前臂舉到肘子以上。他在少年時肺部就發生毛病，大戰時目光爲毒氣所害。

一九三五年八月，突然宣佈領袖於數月以前，施行小手術割去聲帶上的一個肉瘤，這病癥他已患了許多年。手術的經過很好。九月間他卻使紐蘭堡(Nürnberg)他的左右大吃一驚，用富於感情和婉轉的聲調暗示他行將作古。他說：「我不知道何時最後合上我的眼睛，但我知道黨將繼續統治。領袖會產生，領袖會死去，而德國將長存。……軍隊應保持給與德國的權力，好好地加以維護。」這話引起許多謠言（但未證實），說希特勒的咽喉長壞了，他生了毒瘤。

他不作體操，他唯一重要的娛樂是音樂——雖然近來他開始愛乘軍艦，巡游波羅的海或北海。他深愛音樂。華格納(Wagner)是給他一生極重要影響的一人，他沉醉在他的樂譜裏。只要有時間，他總要到歌劇院去。當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國社黨暴動分子暗殺與總理陶爾斐斯(Dollfus)的時候，他便在歌劇院中參加俾羅斯慶祝節(Boyruth Festiva)。德國議會的開會，常在克羅爾歌劇院(Kroll Opera House)中舉行，議會閉幕時，常常演奏華格納的樂曲使不愛好音樂的議員很討厭。從前到晚間疲乏了，他便召他的朋友漢夫斯丹格

(Hanssaeng) 來奏樂催他入睡，有時奏叔曼 (Schumann)，有時奏味第 (Verdi)，但以奏悲多芬 (Beethoven) 和華格納的樂曲時爲多。希特勒之需要音樂，正如服一種不可缺少的藥一樣。

希特勒不關心書籍，不關心衣着（他平常只穿褐衫制服或雙鈕扣的藏青呢呢西服，此外便是雨衣和雨帽）不關心朋友，不關心飲食。他既不吸煙，又不喝酒，他不許人在他的旁邊吸煙。他事實上是個素食者。當墨索里尼設宴款待他的時候，他只吃了兩份煮蛋。他有時喝咖啡，但不常喝，每星期有一兩次從總理官邸到皇家別墅旅館 (Kaiserhof Hotel) 國社黨未上台時的總部，坐在那裏吃巧格力。

這樣，於是使許多人說希特勒奉行「禁慾主義」，但這個名詞形容得不見切貼。他的興趣限於愛美方面，但他既非虔徒又非隱士。希特勒的內心之中是很少嚴肅性的。他雖然素食，可是對於烹調方法卻很講究。他雖然生活「簡單」，可是莫尼哈的私邸卻極盡華麗。

希特勒的柏林辦公處，在威廉街總理府 (Reichskanzlerin am Wilhelmstrasse)。同街百碼外的總統府，他不常去，因爲在興登堡 (Hindenburg) 死了以後，他就竭力使人民忘掉對總統制的回憶。總理府是座新建築，全用最新式的玻璃鋼窗，希特勒本人還幫同設計。壁畫繪着北歐神道、武敦一生的故事。府前面街有一座洋台，遇有大典時，領袖便在那裏檢閱。據說客廳下面還築有一個避炸彈的地窖。

希特勒不喜歡柏林。一有機會他便離開京城，到莫尼哈或巴威南部的一個小鎮貝樞特斯加登，在那裏他有一所阿爾波斯山式的小屋，名爲「鄉居廬」 (Haus Wachenfeld)。別墅立於山邊，離奧國邊疆不遠，這在他的

心理上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從前面的走廊他可以望見他的家鄉，雖然遺棄他但他卻思念不止的家鄉。

三 他的朋友

只要觀察一個人所結交的朋友，便可知他的爲人。但希特勒卻沒有朋友。

以前與希特勒最接近的人是褐衫挺進隊（Sturm Abteilung，簡稱 S. A.）的創立人羅姆上尉（Cap. Roehm），自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羅姆在清黨中被殺後，現在當推他的侍從長伯魯克納副官（Lieut. Bruckner）。在德國要人之中，不必預先約定就可以去見希特勒的，只有兩個：一是他的外交顧問里賓特羅甫（Ribbentrop），一是經濟獨裁者沙赫特（Schacht）。其他常任官吏如他的情報秘書狄屈德（Dietrich）和國社黨副首領埃斯（Hess）也每天可以見到他，但即使埃斯也不能算是最親近的人。至於航空部部長戈林（Goering）和宣傳部長哥培爾（Goebbels），要想見他，卻非預約不可。

他幾乎不作普通的私人交際。我有一位同行，在一九三二年選舉運動時，每天和他同乘飛機有兩個月之久。在空中長時間的旅行中，希特勒從不對人談天，甚至他的祕書們也都不睬他，老是不動不笑。我的朋友記得很清楚，當飛機停下來想抽一支香烟的時候，他不得不離開四面包圍着的人，偷偷兒去抽。他說他在旅行期間，每天見到希特勒有五、六小時，但是他很相信，要是離開飛機，希特勒偶然遇見他，決不會認識他的名字或面孔。

他常把感情強壓住，一到爆發點時便猝然發作。當他與人競爭失敗的時候，他就要像女人一樣禁不住流淚。

例如有一次他向變心的領袖奧士施德拉薩(Otto Brüning)力勸其不要離黨，一夜之間便哭了三次。從前每遇無法解決時，他也常常暗泣。這種習慣史丹林也有。

希特勒爲避免暴露他這種弱點起見，因此常與屬員不大接近。他們崇拜他，但不熟知他。他們也許一年到頭每天看見他，但永遠不敢與他親暱。有位和他很接近的人對我說，他和希氏雖然終年見面，但是總稱呼他「希特勒先生」（他上台後改稱總理先生），而希氏對他也只稱姓或官銜。國社黨幹部之中會有這樣嚴冷的態度，是外間所不能想像的。

國社黨的老黨員現在稱希特勒爲「我的領袖」(Mein Führer)，其餘的人稱他爲「總理先生」(Herr Reichkanzler)。在演說時，領袖對他的信徒稱爲「我的」德意志人民。在公民投票的標語上，他常這樣問：「德意志的男子，您盡了責任嗎？德意志的女人，您盡了責任嗎？」——等等。好像他覺得對於德國全體人民，比對任何德國個人，都接近一些，而這的確是實情。德國人民是他人生之主要的感情表現的對象。現在且讓我們來檢討一下希特勒與支配着多數人生活的各種私慾的關係。

四 他對女人的態度

從性的觀點上看來，希特勒對於女人完全不感興趣。他認婦女是賢妻良母，是製造戰場上男兒——人家的男兒——的機器。

他在自傳「我的奮鬥」(Mein Kampf)中說：「我人的生活，必須屏絕現代色情狂中使人窒息的脂粉氣。」他的私生活，就能充分做到這一句的格言。但他並不厭惡女人，而只是躲開女人。他對女人的態度，是一個中世紀武士的態度，只對她們吻一下手，此外便沒有了。許多女人在性一方面雖能引動他，但無法追求他。從前哥培爾夫人常開夜會，邀請美貌的名媛淑女和他見面，但她做不成媒人。曾有一時，轟傳這位含羞的領袖會與華格納的孫女訂婚，這是無稽之談。希特勒一生也許還沒有與女子發生過關係，那是很可能的。

年輕的英美女子——當然是熱心的阿里安人(Aryans)——偶然來訪問他，也有被接見的。但希特勒只對她們大談其政治，而即使在這種時候也並不是頭對頭的談話。此外，希特勒倒是很愛哥培爾的小女孩，而且愛得幾乎發狂，所以她常在他的房間裏，有時還坐在領袖的膝上。

許多人相信他是同性戀愛者，這也是不對的。有幾個德國新聞記者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偵察這回事，凡是希特勒從前在莫尼哈住過的地方，他們都查對過；他們訪問酒館的主人，咖啡店的招待，女房東，和門房，找不到任何證據足以證明他在任何時間會與任何男女親暱過。他的性能力，在他事業之始，便用在演說方面了。他的母親和他兒童時代的環境，對於這種不愛女人的習慣，有很大的影響。大半數的德國著作家和觀察者，都相信希特勒還是一個童貞。

五 他對金錢的態度

希特勒對於金錢並無個人的用途，所以除了作政治之用外，對之不感興趣。他對於金融和經濟的知識，簡直是一竅不通。

現在他要錢做什麼呢？國家供給他僕人，住宅，和汽車。最近他私人所購的一件東西，便是一九三四年六月會晤墨索里尼時新置的一件雨衣。提起這件事，會使他的隨員大感不安，因為當時他們只爲希特勒帶一套便服，當他下飛機的時候，看見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所有的歡迎者，都穿着制服，窘得他無地自容，甚至疑心隨員們故意和他搗蛋。

希特勒不受國家的俸給，他把這一筆錢作爲贍養因公受傷的工人之用；但是他如果肯居積，那他的私產一定是很可觀了。他在一九三五年時宣稱，在各國政治家家中，惟沒有他沒有銀行存款或股票。在此以前，大家以爲他是莫尼哈弗朗茲印刷公司 (Franz Eher & Co.) 的股東之一。該公司爲歐洲一個有數的印刷業鉅擘，國社黨機關報如「人民觀察報」(Völkische Beobachter) 和「進攻報」(Angriff) 皆由其出版。公司經理愛曼 (Max Amann) 爲歐戰時希特勒的曹長，後來又做他的業務經理多年。

希特勒如果不置私產的話，則他從「我的奮鬥」這部自傳所得的收入，一定貢獻給黨了。此書爲德國人人所必讀，而且價錢很貴，每冊要賣七·二〇馬克，約合英金十二先令，自一九三五年出版以來，已經賣了一百九十萬冊。少說一些，以百分之一五的版稅估計，則這筆收入，截至一九三五年底止，已有英金十六萬鎊了。

在歐洲，要想打聽要人的私產，是件最困難的事。無論那個國家，對於這個問題，往往得不到確切的回答。難道

希特勒、墨索里巴或史丹林，這種獨裁者，會把現金放在袋裏，用現金買賣東西嗎？不見得吧。

六 他對宗教的態度

希特勒從小就是一個天主教徒。但他很早便不信教，而且也不參加任何宗教儀式。天主教義對他毫無意義。他不想用懺悔來慰藉。他組織政府以後，就立刻對天主教、基督教和猶太教作猛烈的宗教戰爭。

爲什麼呢？根本原因大概不在於宗教而在於政治。在希特勒看來，國社黨革命的第一件事，是「統一」德意志。他熱烈主張取消德國境內任何形式的競爭。他以為天主教和猶太教一樣，都是根深蒂固的國際組織，不是德意志的組織，因此就該打倒。

希特勒主義狂的基礎，即在於竭力肅清非德意志分子，而予百分之百的德意志人造成一個百分之百的德國。據湯布森女士說，他之所以不喜歡銀行家和百貨公司，因爲他們代表非德意志的、國際的、金融的和商業的勢力。他之所以懼惡社會黨和共產黨，因爲他們屬於世界團體，而以勞工國際化爲目的。他尤其痛恨和平主義者，因爲和平主義者反對戰爭，而主張大同。

他認爲天主教是一個特別危險的競爭勢力，因爲天主教要求人們有兩重的忠心，而兩重忠心是希特勒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國社黨有打倒「黑老鼠」——他們對教士的稱呼——之舉。有幾次德國與教皇的關係幾類於破裂。在理論上，基督教應付比較簡單，因爲馬丁路得派教會被他們當做屬於德意志的和國家主義的。希特勒

以爲把一位隨軍牧師——一個叫做穆勒(Müller)的凶暴的國社黨員——做德國的主教，就可把德國的福音會結合起來，使之爲他所利用。統一基督教會的觀念，在他純潔的，建築師的頭腦中盤旋着。其實他完全錯誤。教會問題自古就極難解決的。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中，便鬧得很大。

基督教國社黨化失敗後，希特勒的有些信徒，自然而然轉向異教方面。古代北歐神話，成爲第一等國家主義的代替物。國社主義到了極端，就要創立一種新國家主義的宗教，那是很合邏輯的。希特勒在一九三五年於紐蘭堡所作的演說上，也提出這個意見。他說：「有一時期，耶穌教得以統一了往日的條頓民族，而宗教改革卻破壞了這種統一。德意志現在是個統一的國家。耶穌教所失敗者，國家社會主義卻成功了。」海登也會引用希特勒的話：「除了德國本身以外，我們不需要任何其他上帝。」這是重要的一點。德意志便是希特勒的宗教。

希特勒之所以不信上帝，至少一個原因是爲了耶穌是個猶太人。他自己也許可以成爲一個上帝。神聖是由艱難之中產生的。上帝得顯靈。

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把他第一次遇到猶太人的故事，描寫得活龍活現。那時他只有十七歲，單身住在維也納，他以前沒有見過一個猶太人。那人是從波蘭或烏克蘭而來的，身上穿着猶太人原來的服裝。年青的希特勒一見就大爲不快。「這家伙是個猶太人嗎？」他自己問自己。接着他又問：「他可以算是一個日耳曼人嗎？」

這個初期經驗對他影響極深，構成了他反猶主義的感情基礎。他深痛惡絕這種家伙可以和他處於平等的地位，有享受條頓籍的資格。後來他又把這個憤怒，根據經濟的和政治的立場「合理化」了。他說，猶太人搶了

「日耳曼人」的飯碗，猶太人支配了柏林的輿論、戲劇和藝術；猶太律師、醫生和教授太多了，猶太人是一種「瘟疫，較之黑熱病更厲害。」

沒有細心讀過「我的奮鬥」者，不能正確理解希特勒反猶情緒的基礎。此書著於一二年以前，每次再版的時候，在小節上他總有修正，他不允許未刪節的版本在外國出版。最近有家法國書店出版了一本未經刪節的譯本，他便對該書店提起訴訟。這本書雖經修改多次，但是反猶偏見始終存在。

希特勒反猶的事例，在這本書以外，還有許多可以提及。例如一九三四年——三五年冬季，他去看「同志」(Tovarish)一劇，就有四次之多，該劇同情白俄亡命貴族的苦境，指斥布爾希維克黨。據說在他第一次去看的時候，他的秘書曾特電巴黎，詢問該劇編者特伐爾(Jacques Derval)由祖父起是否都屬亞利安人。如果編劇者的血統中有一部分猶太人的成分，希特勒便絕對不會去看他的戲。

遠在他任總理以前，希特勒甚至在電話中就不和猶太人交談。著名政論家如李普曼(Walter Lippmann)，顯要政治家如李定爵士(Lords Reading)都不能在褐宮中受到接待。這裏便發生了一個有趣味的問題。難道從小到大，希特勒就從來不會和猶太人在一起或談過話嗎？也許是沒有。

七 他的保鏢

希特勒的侍從長伯魯克納副官，有兩個名字取得很古怪的助手，一個叫做叔白(Schand)，一個叫做叔蘭克

(Colreick) 叔蘭克最近已經去世了。叔白掌管希氏一切旅行事宜，照料他的汽車和飛機。希特勒像美國的林白上校 (Colonel Lindbergh) 一樣，永遠不乘火車。此外還有一個不知姓名的人，據「每日電聞」(Daily Telegraph) 載稱，他的薪水在德國最高，他是希特勒的「副本」，面貌生得和希氏一般無二，必要時可以代替希氏出席公共集會。但這不過是一個流言。

希特勒防範暗殺的布置，當然極其嚴密。據說伯魯克納、叔白和叔蘭克曾經立過一個自殺公約，如果希特勒在他們的監護之下竟遇着不幸，他們也跟着自殺。最近有個英國政界要人和希特勒在總理府聚餐，一不小心，碰倒一個大花瓶。四面轉動的後面，立時跳出幾個黑衫衛士 (S. S. man)。

希特勒在柏林出外的時候，乘的汽車是曼賽台本土牌 (Mercedes-Benz)，大得像火車頭一樣。伯魯克納通常坐在他的身邊。黑衫衛士立在車旁的踏腳板上。遇有大典民衆齊集的時候，沿路有黑衫軍放哨，一個面向裏，一個面向外地站着崗。

伯魯克納在政治上很有勢力，因為他不讓希特勒和常人接觸。所以人們常有怨言，說希特勒不大得悉極重要的事，因為伯魯克納把他和外界相隔絕，甚至最想見他的顧問也沒有機會見到他。

不久以前，希特勒破了他的社交新例，非正式拜會一對早先認識的外交家夫婦。這位外交家與希特勒談話很坦白，並且講了一些實話。希特勒聽了極爲驚異。後來據說伯魯克納便蒞臨那位外交家的家裏，警告他以後無論在何種情況之下，不得與希特勒坦白談話。

倫敦有人曾對希特勒的壽險作過估計。德國如果發生恐怖或革命，因而把希特勒暗殺，那麼他的保險公司就要破產了，因為他的保險率很高，每保二百鎊的壽險，每月就要付十鎊十先令的保費。（墨索里尼的保險率是每保一百鎊每季納保費四鎊。）但是截至一九三六年中為止，他的生命並未受到過威脅。

八 他握權的手段

現在我們且來略談一下希特勒積極的性格。

先來談他堅定的意志。他的策略也許會變，他的戰術也許會換，他的目的卻永遠不移。他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強盛的民族主義的德意志，由他本人高居在上。他的方法和手段，無論怎樣變化莫測，他的目的和志向卻始終如一。

與他堅定的意志以俱來的是毅力的特性。一切獨裁者原都有毅力，都需要毅力。希特勒雖然缺乏有力的姿勢和剛強的舉動，但是身體的持久力卻很大。我認識許多曾在大選舉前夜與他談過話的訪員，他們發現他一星期以來，每天在全國各處作了好幾次演說，依然精神飽滿，好像若無其事的樣子。他說：「我有一個使命要完成的時候，總有力量來完成。」

不像多數獨裁者那樣，他沒有耐勞工作勤奮從事的能方，他不是一匹拚命吃苦的馬，如史丹林一樣，他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辦公者，他的公事桌上往往堆滿待批的文件，而他卻忽略遺忘。他不高與當機立斷，他的命令常

落空泛而自相矛盾。

但他卻有許多工作要做。一個獨裁者或國家元首的所謂「勤奮」通常即謂閱聽兩者。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一大部份工作，化費在批閱專家和屬僚的報告，聽取他們的意見，他們的一半工作時間用於接取情報。因此一個獨裁者需要（一）善於用人——希特勒手下最能幹的人是從前由文官考試出身的人物，（二）將自己的信心灌輸於他們。這兩件事希特勒都辦到了。當他的手下背叛了他的時候，他就消滅他們。

希特勒的政治感覺很發達、很敏銳。他的計謀周密得無微不至。例如他對外交政策的三個重要決定——德國退出國聯，重整軍備，佔領萊因地帶（Rhinland）——都經過嚴密的考慮，於星期六下午宣佈，以免震撼外國的輿論。當他有不快的專件需要解釋時，例如六卅事件，他往往在下午八點鐘以後談話，所以外國報紙只能匆促記下來，甚至只摘錄個要點。

他的反猶手段很切實用。對猶太人施行恐怖，的確是選舉運動的一個好策略。國社黨之所以能在一九三三年三月躍上政治舞台，便是因為對選民作了一連串不兌現的誓言。他們允許剷除失業，廢止凡爾賽條約，恢復波蘭走廊，同化奧國，取締百貨商店，沒收大產業，消滅資本利息，給人民土地。這些目的都是言易行難。只有一件事國社黨是做到了，一種誓言是實現了，那便是打倒猶太人。

希特勒常以直覺決事。這種辦法在兩個緊要關頭上都做得很好。第一件是發生於一九三二年春，在羅姆上校，他最有勢力的擁護者領導之下，迫他舉行暴動。但希特勒卻加以拒絕，他覺得絕對可以用合法手段來奪取政

樞第二件是在一九三二年秋當時國社黨於十一月選舉中大敗以後黨內有力分子在施德拉薩領導之下迫他承認失敗，以不利條件參加聯立內閣。希特勒也根據他獨有的聰明加以拒絕。而在三個月以內他就握了政權，即使他最瘋狂的信徒也不會預料得到。

希特勒握權的另一種手段在於不愛出風頭。他固然虛榮心很大，但不是爲了個人。他不像一隻孔雀那樣愛好炫耀自己。墨索里尼自一九二二年以來，親筆簽名的照片，至少已經送了幾千張，而希特勒送給朋友的親筆簽名照，卻是用兩隻手的手指可以數得清的。他的虛榮心之所以更有力量，因爲這種虛榮並不是代表他個人的。他是實現德國人民意志的工具，或者他伴爲這樣。所以在六卅暗殺案之後，他有一句名言，即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他做了德國的最高法院。

海登說，希特勒的握權靠聰明，他的聰明又靠邏輯。這樣解說似乎是重複的，因爲希特勒的頭腦不含一些推理：他的爲人是情感的，本能的，卻不是理性的。他的「聰明」是一條變色龍的聰明，知道應時變色，他的「邏輯」是一隻豹的邏輯，餓了便找尋食物。他自己也很驕傲地說他是一個「夢遊者」。

希特勒的頭腦很窄狹，很空虛，很多疑。但在腦子裏面卻隱藏着一盞熱情的明燈，如像沙中的鑽石一樣耀目。他的興趣沒有多大起伏，無論那種刺激都發生同一反應：音樂、宗教和經濟，除了激發他國家主義的思想以外便一無作用。

前英國外相艾登 (Anthony Eden) 於一九三五年春訪問柏林時，曾和希特勒傾談七小時之久，聲稱他

表示出「完全精通」外交事件。這當然是瞎說。事實上希特勒所懂得的外交事件，還不及克涅克布克 (H. B. Knickerbocker)、伏德 (F. A. Voigt)、西蒙 (Frank H. Simonds)、湯布森 (Dorothy Thompson)、或艾登自己的十分之一。艾登稱希氏精通外交事件者，是精通他自己眼光中的外交事件。

九 他的口才

現在我們再來談他的口才。這也許是希特勒興起的一個主要外因。他由演說而取得政權。然而奇怪的是希特勒並不是一個高明的演說家。他常大聲疾呼，姿勢極難看；每段完畢時聲音便低下去，並且不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停止。哥培爾在演說方面要比他高明得多。然而希特勒雖然不能吸引桌對面的人，卻能感動一羣聽眾，尤其是一大羣聽眾，發狂。

他自然知道各種技巧。在某一時期，他老是儘量地說「我們德國人」有的是什麼，沒有的是什麼，要做的是什麼，不能做的是什麼。「我們」這句話會引聽眾入狂。說到那裏他就會突然停止。然後他又說那便是癥結所在。在德國，「我們」這句話並無意義，因為國家並未統一，「我們」從何而來？

最近希特勒會把他的一件從前演說技巧和勝利告訴一位法國訪員。那是十五年前的事，地點在巴威共產黨團體中。他大遭他們的攻擊。「隨時隨刻他們會把我擲出窗外，尤其是當他們舉出一位因戰受傷的瞎子來反對我認爲神聖的戰爭時。幸而我在大戰的結果也瞎了眼。所以我就對他們說：『這個人的感覺我都知道。有一時

期，我甚至比他還要狼狽，但我已經恢復我的視覺了！」

希特勒的第一批信徒，都是改了本來的信仰而信仰他的。他大概可算麥斐孫 (Ainias Sengle MacPherson) 或聖德 (Billy Sunday) 第二。人們只要一次聽過他的話，就終身成爲他的信徒了——例如哥培爾、伯魯克納、戈林、奚斯。

十 他的恐怖手段

希特勒用起恐怖手段來，一些也不顧慮。恐怖手段在國社黨國家的創立中，佔着一個有力的因素。他自開始的時候便鼓勵恐怖手段。「我的奮鬥」中，最有趣味的一段，是關於希特勒第一次參加民衆大會時以新組織的挺進隊把反對分子打得流血的描寫。挺進隊的任務原在於搗亂：第一是搗亂會場來維持「秩序」，第二是搗亂社會來威脅、恐嚇和暗殺共產黨。

他對自認爲恐怖分子和暗殺者如海涅 (Haines) 給予很高的位置。在西里西亞 (Silesia) 的波特巴 (Potempa) 當一個共產黨員慘遭殺害時，他公開宣布與暗殺者有精神上的連絡。一九三二年八月，當他相信與登堡會任他爲總理時，他要求讓挺進隊在街上自由行動三天以便向敵人報復。

關於一九三四年六卅事件，後面我們再來說。

十一 他的領袖主義

領袖主義 (Führer Prinzip) 是希特勒對政治學上一個大貢獻。說得簡單一些，所謂領袖主義者，便是權威應從上而下，服從應自下而上，民主政體的理論應掉一個頭。正如海登說，這是一個特別成功的發明，因為無論何人，不問其目的如何不同，只要覺得受領袖人格的感應，便可參加運動。國社運動之所以能拉攏性情與願望不同的人，即在於此。

此外，德國人的確也愛受統治。我有一位朋友在柏林說：「德國人以為最幸福的事是被治。」莫勒 (E. Moller) 曾經記下國社黨青年在街上所叫的口號：「我們唾棄自由。」一個德國人如果不穿制服，就好像沒有穿衣服一樣。領袖主義不但利用這種感覺，把德國人柔順服從的被动性格，變為自動美德，並且表示出服從有兩極的特性，就是說，大多數人——甚至德國人——都有一種願望，一方面想治於人，一方面又想治人。領袖主義造成了千百個次領袖、小領袖，直至挺進隊最低級的領袖。這種主義把高貴的服從心和領袖慾聯繫在一起了。

「我的奮鬥」雖然並不是爲了出風頭而著作，但其中一再露出希特勒對「領袖」的信仰，他的主要成見，除了種族和國家以外，其次便要算人格。我們很容易看出來，領袖主義不過是把他自己的野心合理化；他之所以宣佈這種學說，的確想得很周到，即默認「領袖」爲希特勒本人。他說「多數人決不能代替一個領袖。」

十二 他的反對份子

從大體上說來，希特勒主義是「統一」德意志的一種方法。但是，國社黨卻打擊基督教、天主教和猶太教，猛烈對付勞工階級；他們的經濟改革計劃實行時，又得與大工業家發生嚴重的衝突；他們更用野蠻恐怖的手段排斥共和黨、民主黨、社會黨和共產黨。

截至一九三七年秋為止，希特勒舉行過三次公民投票：第一次爲退出國聯，他得到百分之九二·三的信任票。第二次是與登堡死後決定總統和總理兩職的合併，在所投四三、五二九、七一〇票中，他得到三八、三六一、七六〇的贊助票。第三次是在一九三六年三月萊茵地帶危機以後，他所得的票數不下百分之九八。這三次投票，在英美人看來，當然是不公正的。薩爾流域 (Saar) 的公民投票，給了他百分之九〇，但即使在別個總理之下，恐怕也會得到同一的結果。最近一次總投票在但澤 (Danzig) 舉行，希特勒差不多費了所有的力量，而且比薩爾投票之直截了當的贊否方式更能表示民意，在此次所投二三四、九五六票中，贊成他的只有一三九、〇四三票，這成績已經算很好，雖然沒有照他希望達到三分之二的多數。（按：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又舉行一次德奧合併的公民投票，結果得贊成票九九%。）

德國最後一次公平合理的選舉，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舉行，雖然當時國會中已有國社黨的火影，而希特勒所得的票數只佔百分之三七。我相信現在如果舉行選舉，他的票數一定要多得多。但即使在一九三三年的時

候，馬克斯主義者（共產黨和社會黨合計）所得的票數共有一一、八四五、〇〇〇票。現在這個數目大概減退了，但是德國潛伏着的反對黨，仍不在小。究竟這幾百萬深自隱晦的選民，到那裏去了呢？

他們受到了恐嚇。他們有警察和偵探跟着。他們在公民投票時投贊成票，爲的恐怕被迫戴上紅色的高帽子。有些因避免色彩之故，甚至加入了挺進隊。多數人把他們的意見、情感和良心暫時吞下肚皮裏，以待機會的到來。但他們是否爲一積極的政治力，恐怕不見得。

原因是在警察佈滿的國家像德國、蘇聯和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革命是件深感困難的事。在今日，除非革命的軍械和軍火等於或超過政府黨，則革命就不會成功。而軍械和軍火要想超過，那是不容易辦到的。

國社黨覺得一九三四年七月與奧國內戰時，軍械的確絕對需要，這次因爲缺乏軍械，於他們自己大爲不利。他們爲了不會想到或者爲了過於信任，所以沒有把軍械供給奧國的國社黨；他們以爲叛變的號聲一響，奧國軍隊和警察便會兵變而附和國社黨，而事實並沒有這樣。陶爾斐斯的軍警，全體都是忠心的。所以我們看到千萬潛伏着的國社黨革命分子住在那裏因沒有軍械而不會有決斷的或直接的行動。這個教訓很重大。你不能用口叫「撲撲撲」來與機關鎗作戰。

德國的人民如果叛變，希特勒就可開鎗打死他們。他有常備軍擔任這種工作，褐衫挺進隊和黑衫黨禁衛隊還不算在內。常備軍——士兵多爲農民——對於農村中的鬧事也許不肯放鎗，但農民在希特勒的帝國內是最容易欺騙的人民。都市裏的人民叛變，立時可以處決。但有人會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即使希特勒自己，能夠夠殺



戈 林

幾萬沒有武裝或武裝粗率的叛民。其實事情很簡單，要不了鎗殺幾萬人，只要鎗殺幾百人就夠了。

比公開叛變易於發生的，是因生活日見困難而致民衆不滿、怨恨、怠工和消極抵抗的壓力之逐漸增高，直至政府的威信墮地而採取愚笨之舉。不滿也許會從下而上，使國家的領導權解體，使次級領袖之間發生新的對立，使左派的哥培爾和右派的沙赫特發生分裂，這種現象深得不可彌補，以致希特勒也無力調和其衝突。

那時候政府也許會來一次老套但又危險的改變方針——戰爭。

十三 他的繼承人

如果希特勒明天就死去，最有希望的繼承人大概要算戈林，雖然國社黨中怕他和恨他的人很多。照希特勒自己的意思，也許贊成副黨魁奚斯爲其繼承人，但在他死後的逐鹿時期中，奚斯顯然不是像戈林那樣剛猛人物的對手。照邏輯上講，掌軍權者比較容易當選。

戈林有武力，有風采，兼有大志，並爲民衆所愛戴。他的軍隊的質量，大受德國人的歡迎，他的結婚也許會產生另一個朝代。尤有進者，軍隊之所以歡喜他，因爲他的立場與軍隊的立場相同；造成一個強盛的德國。復次，在挺進隊中和禁衛隊的一部份，戈林有很大的武力作後盾。最後，他有方法奪取這個地位；如果需要奪取的話。

哥培爾沒有繼承希特勒的希望；在這一班人當中，他固然最聰明，但大家都厭惡他。弗力克（Frick）雖然重要，但太缺乏風采；奚斯太無大志，黎氏（Loeb）和達雷（Darré）以急進出名，當然沒有希望，沙赫特在經濟和金融

方面是一位要人，但不是一位能孚衆望的領袖。事實上要不是戈林來做領袖，其他辦法就只有軍人實行政變，組織一個軍人內閣，如像施萊赫（Schleicher）所領導的那樣。或者另外出一個「冷門」。

近來謠言很盛，說戈林現在積極活動，意圖推翻希特勒。其實這是無稽之談。戈林固然缺乏許多美德，但忠心却不在其內——至少現在不至如此。何況希特勒現在要消滅戈林，正像他消滅羅姆一樣容易。希特勒是萬能的主宰。沒有人能和他對抗。誠如克涅克布克所說，戈林、哥培爾以及餘子，只不過是拱衛希特勒這個太陽的月球。他們誠然有光，但是要有太陽照臨，才能發出光采來呵。

第二章 獨裁者的精神病理

「德國人只要拉住民衆，即使把人民領到錯誤的路上去也就不管。」

——希特勒

一 領袖的降生

在現代各國的領袖之中，降生於祖國邊境或國外者，不只是希特勒一人，例如土耳其的總統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生於希臘的沙羅尼加（Salonica），雖然你不能稱他爲希臘人，波蘭的創國者畢蘇斯基（Piłsudski）生於立陶宛，前奧國總理舒斯尼格（Schuschnigg）生於意大利，至於史丹林不是一個俄羅斯人而是喬其亞人（Georgian），也是大家都知道。

作者曾經到過奧國的白勞諾（Braunau），親訪希特勒降生的住宅。那所住宅有種種傳說，樣子和英美人的鄉下房子差不多，領袖便在這種莊嚴而村野的環境之中第一次見天日。房子是座三層樓的建築，位於白勞諾的市中心，二十年來由一位叫做朴默爾（Josef Pommer）的土財主開設一家酒館。現在那個地方掛着一塊瑛瑯牌子，寫上「請喝啤酒」幾個大字，將來總會有一天用銅牌來標明領袖的降生地。

這所房子現在漆着鮮明的褐色，正與褐衫軍的制服顏色一樣。那裏曾經做過國社黨的支部，所以一九三三年七月，一度被奧國當局所查封。房子並非爲希特勒的父母所有，他們只向房東租了幾間有家具的房間。不過他的父親並非是個窮人，傳說希特勒在兒童時代常餓肚子，那是無稽之談。

白勞諾附近的區域，全爲希特勒所熟悉。村中還活着的人，有許多尙能記起他少年時代的情形。在維特拉（Weitra）附近的司比徒爾小村（Schönbach）中，作者曾見過希氏的姨母和她的兩個子女，並在林茲（Limburg）附近的里翁汀（Leonding）晤談希氏的教父，和他老師的兒子（和希氏在校同級）希氏父親去世之地的酒館的主人，以及爲希氏接生的產科女醫，一個有趣味的老太婆！

二 他的家譜

希氏一族，原先住於奧國一個叫做瓦爾特維德（Waldviertel）的地方，地臨多瑙河岸，現爲捷克的邊疆。住在那裏的農民，都是一些飢寒交迫的人民，誠實、不識字、虔信宗教、混混噩噩。這一方的人，在習俗上互相婚娶，所以全村的人多少帶些親族關係。他們多半靠耕田、磨麵爲生，或操水木兩作等職業。

在瓦爾特維爾的司比徒爾小村中，有位名叫約翰·喬治·希德勒（Johann Georg Hiedler）的人，生於一七九二年二月。這就是亞道爾夫希特勒的祖父。他是一個流浪的磨麵司務。他娶了一位女子，姓雪克爾哥伯名瑪麗安娜（Maria Anna Schickgruber），於一八三十七年在附近史特隆斯（Strons）地方生了一個男孩。他們

到了五年以後才正式結婚，但是孩子仍襲用母姓，稱雪克爾哥伯，直到一八七七年他四十歲時始恢復父姓，稱路易·希特勒 (Alois Hitler)，這便是希特勒的父親。

由希德勒 (Hiedler) 這個姓改爲希特勒 (Hitler)，理由很容易明白。原來鄉下人能寫讀的就像鳳毛麟角，除了生死兩關以外用不到寫姓名。作者在小村教堂裏還發現了一個記錄，希氏的祖父自稱爲胡特勒 (Hittler)。到現在希氏的妹妹寶拉 (Paula) 還用着希德勒作簽名式呢。

希氏的父親亞路易·希特勒是個鞋匠。他結婚過三次。他的元配安娜·格拉斯·霍勒 (Anna Gliss-Horer) 一八二三年生於瓦爾特維爾的瑞蘭沁費 (Theresienfeld) 小鎮，一八八三年死於白勞諾。這位安娜是有些資產的婦人，她對當時尚姓雪克爾哥伯的青年鞋匠，同時以妻母兩重資格自居。她送他去進學校，後來又替他出資在奧國捐了一個小官。她比他要大十四歲。由於她的提攜，亞路易居然成爲一個上等公民，並且後來得以教育後妻所生的兒子希特勒。

安娜亡於一八八三年，亞路易只居喪六星期便續絃，這次娶的是法蘭齊斯加·馬扎爾斯培 (Franziska Matzelsberger)。他們的結婚生活只過了一年，她便於一八八四年去世。鼓盆三個月，亞路易又續娶了一位遠房中表，克萊拉·波士爾 (Klaral Poelzl)，那便是希特勒的生母。婚禮舉行於一八八五年一月七日，四年以後，第三帝國的創造者亞道爾夫希特勒，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降生於白勞諾。那時他的父親已經五十二歲，母親只有二十九歲。

希氏的母親克萊拉，是個能幹有勇氣的女人。她的父親是司比徒爾村中的一個農夫，她的母親約翰娜胡特勒（Johanna Hutterer）是希氏祖父的堂姊妹。克萊拉十歲時（一八七〇年）便得到一個職業，在亞路易元配安娜家當使女。亞路易第一次見這位遠親小姑娘便在那裏，十五年後他就娶了這個前妻的使女。

克萊拉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突然出走，沒有人知道其中理由。我曾經問過她的姊妹（現尚健在），她也說不出所以然來，的膽力。究竟她爲什麼要出走，沒有人知道其中理由。我曾經問過她的姊妹（現尚健在），她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克萊拉在維也納住了十年之久，她這一時期的生活大家都不明瞭。後來在一八八五年，她又回到本村司比徒爾。當時她已經是個碩長，有神經質的女子，不像普通鄉下女子那般強健。她和父母同居在亞路易兩位太太去世的房子隔壁，那兩所房子我都見過。他記起這個女子曾經當過他前妻的使女，因此便娶了她。

亞路易的元配安娜生了兩個孩子。男孩名爲小亞路易（Alois Junior）——希氏的半邊哥哥——當過侍者，最近在柏林開設一家酒館。女孩名爲安琪拉（Angela），到維也納嫁給一個叫做魯貝爾（Rampel）的廚師，靠着維也納的一家學生飯堂燒飯爲生。數年前希特勒把她帶到德國，派他在他的貝姆特（Beimert）登別墅裏當管家。克萊拉除了希特勒以外，還養了兩個孩子。女孩寶拉生於一八九七年，尙未嫁人，這個神經病家庭中的老處女，現居於維也納，並無藉藉名，幾乎是被人遺忘了。當地國社黨員，曾經想推她出來做女主角，但她力辭不就。希特勒顯然和這位胞妹沒有往來。第三個男孩名爲愛德華（Edward），襁褓時就夭折。

亞路易是個稅關的稽查，帶着妻兒住於奧國重要邊鎮白勞諾，希特勒就在那裏養大的——直到一八九六

年亞路易年高退休時才搬到林茲附近的里翁汀，在那裏置了一所房產，與妻兒一直住到一九〇三年時為止。

三 他的父母

我曾經看到過希特勒父親的墓碑，上面這樣寫着：

歿於一九〇三年六月三日享壽六十五歲

亞路易先生

希特勒

繼配克萊拉夫人

之墓

歿於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享壽四十七歲

按照奧國的風俗，先人墓碑上總有一張小照。我在那裏看到了亞路易的遺像，生就一個碩大圓滑脫頂的頭，好像一隻大西瓜，雙眼很小，而顯出銳利的目光，鬚鬚式樣，就像腳踏車上一對彎柄，下頰豐滿，猶如暴君。後來作者又在希氏親戚家裏看到希特勒母親的相片。她是一個碩長的女子，面孔瘦削，富於表情，顴骨下陷，雙眼彎曲，秀髮垂肩——從前大概金黃色，現在變為灰白色——目光炯炯。

希特勒的父親殘暴而又專制，是在酒館店裏喝酒時發中風死的。他把希特勒看做一個沒出息的孩子，罵他爲「瘋子」，時常拳腳交加的責打他。

所以希特勒從小就親暱母親而反對父親。他對父親的嫉惡，產生了一種極端違拗的性格。老希特勒是一個

酒鬼，小希特勒酒不沾唇；老希特勒一生三娶，小希特勒從未談過戀愛；老希特勒縱慾無度，小希特勒生平謹飭。

希特勒極孝順他的母親。在他六歲上，她長了一個惡瘤，一直綿延到將近十年才去世。他從她那裏傳得了胸懷大志的衝動，心抱歷史使命的意識；因為她也希望他成功一個與父親不同的人。她鼓勵他做一個藝術家。希特勒的一生，總算符合他母親——他唯一所愛的女人——的願望，自立、成功、有權、有勢。

從里翁汀到司比徒爾，只要走一小時的路程，我在那裏會見了幾個現存的希氏家族，如他的姨母德麗蓉 (Therese Schmidt)，克萊拉的姊妹，一個好作大言的老婦人，和她兩個兒子愛德華和安東 (Edward and Anton)。希氏最初的表兄弟愛德華是個說話斷續的駝子，一個可憐的傢伙。他們都很窮。

這些人可總希特勒的血親。他們所住的泥房，與希特勒所統治的威廉街上高大的洋房比起來，相差不知有幾百萬里。希特勒自兒童時代離開那裏以後，就從來不曾回去過。他對這些表兄弟既不通訊又不送錢，好像完全不知道他們還活着一樣。

四 威權結晶

一切獨裁者都是變態的。這話簡直成爲定理。沒有一個完全常態的人，可以用獨裁方法來統治一個國家，因爲常態男子的自負，不足擔當至高無上的責任。此外，多數獨裁者又患着很深的神經病。凱末爾的私生活雜亂無章；陶爾斐斯是矮子肚腸齷齪多；墨蘇斯基喜怒無常；墨索里尼帶些誇大狂。在這一班人之中，史丹林大概可算最

接近於常人，不過我們不能忘記他在青年時代犯過罪——一個擲炸彈者。

維也納有一位神經病科專家，名字叫做斯丹克爾（Wilhelm Stekel），他有一種學說，專門研究獨裁者的神經病和多數人願受獨裁者統治的傾向。他稱之為威權結晶。

這種結晶始於兒童時代。他說在每個兒童的內心之中，常於自己的本能與外界所得的教訓之間，起着強烈的衝突。例如兒童愛羅蘭。但外界的教育教他們要清潔。教育是一種磨練兒童使其違反自己原來本能的力量。教育受權力的影響，權力於是成為兒童的仇敵，因為這無異教兒童放棄自己的本能。

最初的權力是父母的權力。父母如果太弱，兒童便要膽大妄為起來，於是其他權力，就插進來，如年長兒童的權力，教員的權力，法律的權力，尤其是宗教的權力。成人以權力教訓兒童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最後武器便是一句「神要罰你」的話。

自從大戰以來，威權結晶是日見墮落了。家庭顯然不再成為從前那樣一個神聖的社會單位。斯丹克爾說：「父母對兒童的道德標準不再負責。」兒童對於這種不公當然大起反感。父母自己不會做到的道德行為，卻強迫兒童一定要去做，因此使兒童不得不以父母的禁令來報復。

父母如此，教員也是如此。學校和大學，對於德育一些些不注重起來。世界大戰傾覆了各國的威權，破壞了各國的法律和秩序，犯罪流行於世界，尤其是美國。而宗教這個重要的威權因素也為現代科學所代替。終於青年男女都發生了疑問，他們怎能相信一個允許戰爭，允許數千萬人被屠殺的上帝呢？所以威權主義失卻了信仰，昔日

威權結晶也就崩潰了。

結果大批獨裁者便乘機而起。希特勒們和墨索里尼們成爲嚴父的替代。人們容或慄惡威權，但他們若無某種形式的威權，就不能生活得很容易；兒童反抗他們的父親，於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畢蘇斯基、亞歷山大（Alexandru）、南斯拉夫的獨裁者，陶爾斐斯、凱末爾、史丹林代做了父親。現在兒童以爲他的父親是不值得尊敬的，因此他要尋一個外面的領袖。威權的範圍於是從家庭移到外界了。

五 獨裁者的統治手段

一切政府根本是畏懼力和愛戴力的精密混合物。而獨裁者又增加了這種動作的動力。亞歷山大要想贏得南斯拉夫克羅特人（Croats）叛黨的心，同時又要壓服他們。小陶爾斐斯用砲火殺死了社會黨人，然後又要求他們原諒他。希特勒爲他許多信徒所愛戴，但六卅慘案又認爲必要。

爲什麼個人對獨裁者或領袖的威權不起反感，就好像他對他父母的威權發生反感一樣呢？這原因據斯丹克爾說是在於羣衆對獨裁者的信仰和崇拜愈增，則個人對他舉動乖張的懷疑愈減。信徒的人數愈多，則懷疑的必要愈少。崇拜就好像一種傳染病，當牠流行到全國的時候，全國便軟化於獨裁者的腳下了。

又有進者，斯丹克爾說，人民與領袖聯合愈多，則他們暴露出來的弱點，便成了優點。於是人民就與領袖合而爲一。他們分潤了領袖威權的肉。他們成爲他的靈魂和肉體，他成爲他們的靈魂和肉體。他們分受他的威權結晶。

例如德國人說：「寧可希特勒負我們，不可我們負希特勒。」許多意大利人相信墨索里尼並不爲他自己要權，而是爲意大利的緣故要權，所謂意大利者，就是其他意大利人，也就是他們自己。斯丹克爾說：「順與逆，愛與恨終於混合起來了，而獨裁者也就成爲救世主了。」

在古代，新領袖往往是新宗教的創立者。在今日新領袖是新政治的創立者。許多現代的領袖，嫉惡宗教；他們畏懼神權的死敵。因此他們常有破壞人民宗教信仰的方法，來殺死宗教這個最強的競爭者，如凱末爾之打倒猶太教，史丹林之推翻正宗教。

獨裁者之所以通常爲神經病患者，因爲他們也痛感威權結晶鐵一樣的限制；他們也在兒童時代反抗威權。不過他們的精神和意志往往比常人爲堅強，所以兒童時代吃了苦，反抗常能成功，成功了以後他們便把威權加於他人之上，藉以對其父母報復。他們不成爲一個家庭之父，而成爲一個國家之父。

除了亞歷山大以外，幾乎一切的現代獨裁者，都是出身貧窮的。墨索里尼和史丹林，出身特別窮苦。還有幾個獨裁者如希特勒，兒童時代的經歷，慘不勝言，又如陶爾斐斯，出身也極卑賤。獨裁者以追求日後的權勢和光榮來補償他們少年時代的苦境。即使得了權勢和光榮以後，還是感到不滿足。於是希特勒遁跡於音樂，墨索里尼遁跡於演說，凱末爾遁跡於逸樂。

斯丹克爾以爲獨裁者之所以得權這樣容易，因爲我們這班普通人對於每一危機老是歸咎於他物，而最近最大，最容易歸咎的東西便是我們的制度。制度崩潰時，獨裁便起來。至於獨裁者維持權力之所以這樣容易，因爲

他們用武力而我們這班普通人卻怕武力。

六 國社黨的胚胎

希特勒之進身政治生活，以偵探開始。這事實說起來有些令人不快。海登曾把此事敘得很詳細。當德國軍隊剛改組爲國防軍的時候，希特勒是個士佐階級的小軍官，一九一九年初，他被任爲情報員，專門參加勞工集會，混在工人隊裏採取他們的輿論，報告給上級機關。在某次集會時，他聽到一個名爲費特的演說。他聽了費特激烈的經濟理論，大受感動。費特以爲榨取資本 (Tatfunders) 和創造資本 (Schaftunders) 大有區別，前者是屬於猶太人的，後者是屬於亞利安人的。後來希特勒又繼續去聽費特的演講，並在散會以後熱烈參加討論，評擊反對費特主張的演說者。

費特有一個從前做過鎖匠的密友，名叫克雷斯科，他曾糾集一班閑人，組織了一個德意志勞工黨 (German Workers Party)。希特勒也被邀入黨。他在答覆以前，曾經費了兩晝夜功夫來「沈思和自詰」。當時該黨約有黨員六十人，他在理事中卻不是在黨員中列入第七位。那是一九一九年七月間的事。但他對於情報員的職務，直到翌年六月才辭卻。

勞工黨在希特勒領導之下的興起，是件有歷史價值的事。他將黨名改爲「德意志國家社會勞工黨」 (N. S. D. A. P. 卽 National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 Partei) 簡稱「國社黨」 (Nazi)。最初聽他演

說的人只有二十個，後來增加到二萬，他組織了他的親信軍，即褐衫挺進隊。一九二三年他誤聽了勸告，企圖在莫尼哈革命，但遭失敗，被判為叛國罪而入獄。等他出獄的時候，他竟一變而為德意志的「救主」了。

這裏有兩個枝節但很重要之點，應該大書特書。第一是希特勒自抓住黨權之時起便對主義的解釋支吾其辭。國社主義當初原是一種左傾的社會主義運動，費特所草希特勒宣佈為永久不變的黨綱，便是一種竭力反對資本主義的文件。等到希特勒走上當權之路以後，他竟把黨綱中關於社會主義的部份，一件件丟掉。因此我們不免要得到一個結論，以為希特勒從來不管他對社會主義的諾言；他只把這種諾言當做弋取人民投票和政治煽動的幌子。

第二點是，希特勒幾乎自始即與軍隊方面勢力發生密切的關係。他像任何人一樣，知道國防軍總有一天會在德國成爲一種決定的力量。因此他審慎聰明的方法，培養國防軍。一般人似乎還不大知道他會拿了國防軍的款子，去收買「人民觀察報」，作爲國社黨的主要喉舌。

希特勒從雷克斯勒和費特的手中，把黨接收過來，然而締造或功，卻是他一手的力量。他籠絡黨、培養黨、扶育黨、控制黨。黨成了他自己的心血。他雖然頗得實業家、流氓、官僚和組織者的幫助，但是培養精神和推動脈息，卻全是希特勒之力。即使細枝末節，也多出於他的擘畫。例如卍字黨徽，便是他設計的，宣傳方法，也是他手定的，這在德國或任何地方，都前無其匹。黨是希特勒的一切。黨是他的妻子、母親、情婦和子女——這批子女現在已經達到一千三百萬人了。

七 取得國籍的奇蹟

希特勒取得德國公民的資格，其方法之巧妙，實無以復加。因為在法理上，他還是一個奧國人，所以不能與奧登堡爭奪總統。而當時德國政府，又不願將國籍給予一個主要的政敵。所以國社黨不得不出出一套巧妙的把戲。

希特勒派有位資格最老的分子弗力克博士，也是國社黨員中被選為德國國會議員的第一人，他在那時正做着德國的教育部長兼吐林格邦（Thuringia）內政部長。他想如果希特勒能在德國當一個官吏，當然就可以自動取得國籍，因此弗力克決定任命希特勒做希爾特伯霍森（Hildburghausen）小村的憲兵隊長。不幸這個消息被洩漏出去了，全國人士都把希特勒做了一名警察當作了話柄。於是弗力克只好臨時取消計畫。

後來另外有一個官居政府要職的國社黨員，名字叫克拉吉斯（Dietrich Klages）是白倫斯威克邦（Brunswick）的司法部長，他任命希特勒為該邦駐柏林使節的法律顧問。德國是否有這個職位，只有天知道。但是希特勒卻居然宣誓效忠憲法——這憲法後來他又公開揚言要破壞——就職，於是奧國的一個村童，終於成為一個德國人了。

第三章 殺死德意志共和國的是誰

「一切事情都有一個原因，明白了原因即明白了事情。」

——部勒 W. J. Turner

一 希特勒得權的原因

只靠個人的性格，不會使希特勒取得政權。但是在使希特勒當權的許多主要因素之中，個人的性格卻是頗有貢獻的一個，而他的行為的確與一大部份德國人相符合。他成爲一個半仙，一個先知，因爲他能用催眠術的方法，把德國人都迷醉，使他們相信他，只有他，代表德意志主義的復興。人民愛希特勒，因爲他們愛德國。在國社黨看來，希特勒和德意志是二而一。

德國原是一個許多互相競爭之邦寬鬆的結合，直到近代名義上才算統一起來。像現在這樣容易讀的德文，在十七世紀並不存在。英法兩國早至中世紀時代就統一起來，組成了同種的民族國家；而德國則即使俾斯麥 (Bismarck) 亦未嘗使之成爲五百年來英法那樣的民族國家。

國社黨的辯護人說，德國現在終於長成了。人自兒童以至於成人，必須經過一個痛苦的青春期，國家也是一

樣，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夠不受痛苦而底於長成。所以對國社黨恐怖的畏懼，人事和政治的擾攘，外交政策的虛偽和陰險，挑撥人民的感情——這一切都是春機發動期所必不可免的。

德國在世界大戰中是被打敗了。這是一個光榮的敗仗，事實上德國在千鈞一髮之間幾近於打敗全世界；然而德國人卻覺得「受辱」，覺得降級，覺得羞恥。國社黨發明了一種無稽之談，說是德國之所以戰敗，為的是有猶太人，社會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撫其背。希特勒從歪曲這些事實之中，漁利自肥，而他更進一步得到一個推論，說德國事實上在大戰中並無所失——其荒謬絕倫，正與他說德國在大戰中損失一切相同。

他的手段是這樣：先暗示德國人說，他們生了病，然後再說唯有他可醫治。他的辯詞很簡直了當：「你們受了辱。你們降了級。德國是一個病國。承認這句話，認清你所受痛苦的程度。人家想說服你們滿意這個窮困的共和國。」

「那批撫你們背的傢伙，猶太人和馬克斯主義者，現在正統治着你們。他們阻止你們恢復你們的自尊心。他們宣告了你們國家精神上的死亡。同時宣告了你們自己精神上的死亡。因為你們是德國人。我們是德國人。做個血性男兒，肅清賣國賊，猶太人，和平主義者，與共和黨……」——諸如此類的演說，在他參加政治生活的初期，往往會說上兩個半鐘頭。

這些演說在情緒上發生了極大的效果。尤其是女人深被這些話所感動。如果聽衆充滿着女人，希特勒就會說：「在我活着一天，你們是我的，我是你們的。」這樣，希特勒便代表了德國人，那批理想主義者，自我主義者，貌似

不關心政治者因爲失卻「自尊心」而過着潦倒生活者的德國人犧牲自由便是服從領袖所付的代價。

同一手段在「我的奮鬥」一書中也表得很明白。把這部書與托洛斯基 (Trotsky) 和亨利·亞當 (Henry Adams) 的自傳一比較，就可知道希特勒的自傳是誇大的、空虛的、華而不實的、語無倫次的、冗長可厭的。但這也是一部有力的、動人的著作，可以聳動讀者的熱情。書中的本旨，重述了不下二十餘次，紆迴曲折地說德國是被和約解體、摧殘、蹂躪了，將來應該並且必然會興起一個強盛的、統一的、更生的新民族國家。

我們很可以想像得到：數十萬誠實的德國人，從小商店老闆到白倫培將軍 (General Blomberg)，會從這部書中有意識地、負責任地擇途而行，等到走不通時再回過頭來。但是讀了書中一再申述的辯辭，心中不免存着堅強的期望，日漸滋長蔓延開來。

希特勒之所以能夠成功偉業，除了他自己的個性以外，當然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從白魯寧 (Braming)到巴本，到施萊轍，到希特勒，究竟有那一支箭來加以貫通呢？請看下面五條項目：

(一) 德國的通貨膨脹，這種膨脹是被動抵抗法國侵入魯爾區域 (Ruhr)的結果，牠促成了下級中產階級即小資產階級的破產，因而希特勒得以抓住機會作誇大的諾言。

(二) 白魯寧的通貨緊縮政策，這種政策助長那批已受世界不景氣壓迫的上級中產階級的崩潰。經濟困難培養了希特勒的激烈及其政敵的冷淡。國社黨得以靠着他人的飢餓謀取自己政權。

(三) 大實業家的支持，尤其是鋼鐵工業家帝森 (Fritz Thyssen)，他自一九三〇年起就在財政上幫助國

社黨。這種支持是很重要的，但並不是決定的。在大實業家認清了道路——這是幾年以後的事——跳上匪車加入以前，希特勒主義早已成爲傳遍全國的運動。正如斯溫（Raymond Gran Swire）說，所謂帝森在暗室裏給希特勒無數張一千馬克支票來製造國社運動的說法，是聳人聽聞的。大實業家直到後來發現希特勒主義是個可資利用的工具時——因爲國社黨放棄了早先的左傾特性——他們才拿出錢來。也許他們希望把希特勒做成他們的傀儡。但他們是錯誤了。

（四）共和政府文武官吏的怠工，再加上威馬憲法之極端的民主性，兩者交相衝突，使希特勒有機可乘。

（五）人事的關係。許多人事上的不相稱，助成希特勒的上台。第一個不相稱的人物是奧登堡大元帥這位老總統。他的老邁思想和個性，再加上身畔所施的陰謀，造成了德國政治的一個大漏洞。

要瞭解希特勒的攫取德國和樹立政權的確實情形，我們必須先來講三件大事的內幕，即巴本、施萊轍、奧登堡陰謀，國會縱火案，和六卅清黨案。我們先以奧登堡開始。說得刻薄一些，要不是奧登堡這樣老邁龍鍾，希特勒恐怕永遠做不到總理。

二 老朽昏庸的奧登堡

在一九三二年這個危機一髮的年頭，奧登堡已臻八十五歲的高齡，他失卻了他的天稟。人們說，大概在早晨，他的政躬很「康健」，其實少數能與他共早餐的人，很能爲他料理一切。例如巴本便是其中的一個。他一度做過

與登堡的內閣總理。

當老頭子——與登堡的綽號——的政躬成爲柏林人士街談巷議的題目，並且造出種種謠言來挖苦他的時候，人家對於他是否適宜仍做總統這個問題，大起懷疑。事實上這倒並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總統這個人物，是德國立憲政體中一個最有勢力的力量。不過因爲沒有人敢公開談論這樣莊嚴的一件事，所以謠言就蓬起了。

有一個講到與登堡記憶力的故事，說他某次會問他的令郎奧斯卡（Oskar）：「那個戴眼鏡的小伙子（指白魯寧）會到那裏去過？」還有一個聯帶的故事，說他在施萊轍總理職時，把白魯寧誤當施萊轍。又有一次，他接見國防軍總司令哈默斯坦上將（General von Hammerstein）；哈氏正有要事在心裏要和他談，他就大喊「上將先生，我不滿你那次秋操」，因而談話尙未開始就結束了。

當希特勒最後任爲總理時，老頭子看了國社黨挺進隊慶祝大遊行，小心地放下他的老膝蓋坐下來對奧斯卡說：「好兒子，我不知道我們曾經捉住了多少俄國犯人。」

與登堡還健在時，有個說到他死的故事。他跪在天堂的門口，受聖彼得的延見，聖彼得用驚奇的目光注視他，問他的姓名。「我叫與登堡。」大元帥回答。「但你爲什麼到這裏來？」聖彼得續問。「因爲我死了，」與登堡答。聖彼得搖了他的頭說：「弄錯了：你沒有死，你還活着。」與登堡莫明其妙的退回來說：「豈有此理！我又上了曼斯南這個壞蛋的大當。」

曼斯南（Maisner）是總統的國務祕書，他對老頭子的影響很大，因爲除了奧斯卡以外，他是最接近總統的

人。曼斯南是一個鬼計多端的政客，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他是三朝元老：社會黨愛培德（Egge），大元帥與登堡，和國社黨希特勒，這三位總統的國務秘書都是他，這個職位並不能算小。據說與登堡自知心身不濟的時曾經託孤於曼斯南，請他做一隻警犬，保護與登堡宣誓效忠的威馬憲法。可是據說引國社黨入與登堡之門的也是他。

曼斯南的勢力，原是無空不入的，但到後來就日見減低，因為老頭子在德國民族呼聲和輿論的高潮之中飄流着，不能明白四周進行的陰謀，所以漸漸覺得沒有一個人可靠，能夠靠得住的唯一一人，只有他的肉中肉——令郎奧斯卡。

奧斯卡已經不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他是一個老資格的軍官。他對於政治並無嗜好。但是種政治手段包圍着他。施萊轍將軍——後來做過總理——是第三步擊隊（Third Potsdamer Foot Guards）中與他同事的軍官，由於施氏的暗中牽線，一個「君側私黨」（Palace Camarilla）逐漸興起，奧斯卡便是朋黨之一。「君側私黨」的主要任務為「保護」年高德劭的總統。從此以後，總統事實上便與外界相隔絕了。

每個政客欲見與登堡這座最高的權庫，便得先走進茶花宮之門。於是茶花宮的勢力日漸膨脹。國社黨竭力設法，想把他們的主義上達於與登堡被隔絕的耳朵。但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奧斯卡和施萊轍和他們的羣衆——貴族與政客——不信任希特勒，只把他當做一個暴發戶，一個排長，把他關出門外。一九二八年，一班普魯士貴族把紐特克地方（Neudeck）一塊大莊園送給與登堡，滿足了老頭子最殷切的夢想：成爲一個地主，一個鄉紳。希特勒任總理以後，普魯士政府又立即加贈給他五千英畝土地。爲避免繳納遺產稅起見，地契上寫着奧斯卡的戶名。

因爲與登堡顯然是活不長久的了。

當希特勒政府開始上台的時候，贈送紐特克莊園之舉，立刻成了取笑的話柄。問者說：「德國最新最小的集中營是什麼？」答者說：「紐特克。」

「君側私黨」之所以能夠行使極大的權力，因爲德國國會開會的時候，議員往往打瞌睡，而且會期很短——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兩足年之間，就並未通過一條法律——又因爲總統，只有總統有權任命總理，授權總理解散國會，陰謀達到了最高點。政府機關中，軍隊中，和國社黨幹部中，佈滿了間諜網。白魯寧還常常和他親信的客人開玩笑，指着他的壁爐架給他們看，他想像中置着音機——大概是施萊轍的——的地方。

三 白魯寧巴本施萊轍

白魯寧博士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至一九三二年五月之間，曾爲內閣總理。他是現代德國之中最開明的政治家。大戰期中，他做過機關鎗手。他之參加政治生活，以天主教勞工黨的執行委員開始。甚至老政客如奧登堡·耶諾（Odenburg-Januschan）輩也得稱他爲「俾斯麥以來第一人」。他竭力擁護威馬憲法；與登堡之再度當選爲總統，多半出於他的擘畫。他採取大膽的手段制裁褐衫軍，一時壓服了他們在街上橫行。他又建議德奧關係合併，爲德國取得外交政策的勝利。他把賠款問題幾底於解決。他又像狗一樣被登堡逐出去。

白魯寧在私人方面和政治方面都厭惡希特勒，但是有了白魯寧才產生了希特勒。在白魯寧兩年的當權之中，共和政體得從希特勒的手中保全。可是白魯寧就任為總理以後，國社黨領袖第一次獲得選舉大勝利，計得六、四〇〇、〇〇〇票，一〇七席。一九三〇年以前，希特勒被人當做笑柄，一九三〇年以後人家就對他側目而視。說白魯寧在可怕的環境壓力之下為希特勒鋪路，這實在是現代小諷刺中最悽慘的挖苦話。這因為白魯寧的懦弱無能，所以破壞了德國的憲法。

一九三〇年，白魯寧只爲了要想治國，不得不解散國會，用命令來施政。這個先例並不是他開的。愛培德任總統時便以命令治國。但白魯寧卻整個兒以命令代替法律。這樣，他建立了兩重政府的制度，因為國會允許他即使在開會時也可發令。國會無異用刀自刎。這因為在國會議席中仍佔最多數的社會民主黨要他受難而不能公開支持他的緊縮政策，以致工資大減，勞工階級日頹飢餓。白魯寧既失東隅，不得不收之桑榆，他變爲不對國會意志負責，而對總統幻想負責。一旦與登堡不信任他，他就只好被迫辭職，因為他破壞了應負責任的國會機構。這爲未來的總理造下了先例。從此以後總理只成爲與登堡亦即茶花宮的走狗。「總統制」的德國開始了。

迨至一九三二年，白魯寧在包圍與登堡的集團看來已失其用途。他的權位日削，他大膽解散挺進隊，因而得罪了國社黨；他減削社會救濟的經費，因而得罪了社會黨；更重要的是他宣佈墾殖破產貴族領地的政綱（目的在於減低失業），因而得罪了茶花宮。此舉予紐特克闊闢一致命的打擊。一九三二年五月底，與登堡靜悄悄地被送到他的莊園，在那裏他與任何人相隔絕，甚至連總理也不通消息。他方面，施萊轍依然滯留在柏林，並與住在紐

特克的奧斯卡私通消息。他派了一隊說客到奧登堡那裏，告訴他白魯寧是個「土地革命的布爾希維克」。白魯寧跑到紐特克再要求信任，但奧登堡不給他，於是他就只好像喪家之犬一樣溜出來。

現在大家都明白隱在幕後的人是國防部部长施萊轍將軍。他施出欲擒故縱的手段來爭奪政權。他之所以能這樣做者，因為在他後面有國防軍作後盾，而國防軍在當時仍為德國一個最重要的勢力。大戰期內，他是大本營裏的一個參謀。他在四年之中，大部份的時間不化在前線而化在柏林。你不要說他不乖巧。

從一九二三年起，施萊轍的勢力日盛。一九二四年，他成為當時國防軍總司令西克特（Scheidt）的行政官，後來他又與西克特鬧翻。他把他的老前輩格羅納（Gronow）捧上台，做了國防部部长，然後又和格羅納鬧翻。他發現了白魯寧，抬舉其為總理，結果又將其打倒。到了一九三〇年，施萊轍成為國防軍中的政治專家，一個軍隊生活與政治生活不可或少的連鎖。他的權力一半靠賴他天賦的個性，一半因為德國政治愈黑暗，軍部勢力愈膨脹。

然而當奧登堡把白魯寧撤職的時候，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繼任德國總理的卻不是施萊轍而是巴本。這其中並沒有什麼神祕，雖然巴本確實為一個無名小卒。巴本是由施萊轍特別選來做總理的。正如柏林人士說，巴本是施萊轍的「傀儡」，他的幕後另有牽線人在。所奇怪的是從前幾乎不知巴本為何人的老奧登堡居然看中了。他一位溫文儒雅、大方、而有急智的公子軍官、紳士和俱樂部會員，成了宮廷的寵兒。他到紐特克還不到幾個星期，就完全贏得了老頭子的信任。他和他共進早餐，就好像家屬的一員。他可以隨意出入於宮門。

不幸巴本的內閣是短命的。他雖然很得宮廷的歡心，卻不能得到全國狂熱的歡心，因此不得不去職。在理論上，德國依然是個由威馬民主憲法所治理的共和國，所以巴本要做總理，便得舉行一次選舉。他等待着，直到最後一天的到來，終於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大大地被打敗了。這次選舉揭曉的結果，國社黨佔了最多數，計達一三、七〇〇、〇〇〇票。

希特勒現在熱切地想當權。因為是個最大黨的領袖，他得被奧登堡所延見。當時巴本也在座。希特勒的舉止很失態，他開始咆哮起來，要求按照他自己的條件就任總理，並要求給他像墨索里尼於進軍羅馬以後所得一樣的權力，卻被奧登堡毫不客氣的拒絕。老頭子對巴本說：「讓希特勒自己去彌補他的禮貌，否則我要任他為鄉村郵政局長。」希特勒一怒而欲在國會中推翻巴本，巴本也用立即解散正在開會的國會來對付他。（這是戈林被選為議長的第一任國會。巴本總算在千鈞一髮之間倖免。本來他是很小心的，所以身邊常常帶着預先簽字好的總統緊急令，授權他解散國會，這次他因一時疏忽，忘記了帶來，幸而在議長提出異議以前，他及時取到。）

當時德國最大的一邦普魯士，仍為社會民主黨所統治，巴本決定想消滅他們。一些也沒有合法權力的根據，他把社會黨兩個領袖白隆（Braun）和塞佛林（Seydewitz）撤職。他們雖然可以用武力或召集總罷工來回報，但社會黨終於順柔地被屈服。這件事情是宣告共和政體死亡的預兆。這無異對巴本、施萊赫——和國社黨——說，共和政體的精神和肉體已經是消滅了，而為後來戈林在普魯士施行同樣無法之舉樹下先例。

巴本既解散了國會，他就得召集新選舉。此次舉行於十一月六日，他又大吃敗仗。他的第一任國會只成立七

天，第二任只三天。但是這種選舉了又解散，解散了又選舉的玩意兒，即使在德國也不能無限制舉行。人民已疲於投票。在十二月選舉中，國社黨的票數較之前一次減少二百萬票，所以他們加入共產黨在柏林的交通工人罷工，並且威脅着要聯合行動總罷工。這個威脅使軍部和宮廷大為膽寒。誰也想不出辦法應該怎樣做。茶花宮猶疑着與登堡置諸不聞；巴本偷偷溜走。

擾攘了一個時期以後，施萊轍親自出馬，做了總理。他兩星期奔走商談以後，才上台。他很想隱在幕後或以頗不破的國防部長地位來行使統治，但他找不到做傀儡的人。茶花宮的人才日頹枯竭。他祇好親自出馬，但是做不到兩個月的總理。這也許會引人驚異，不過他的確作過盡力治國的諾言。施萊轍輕視希特勒，心想不引他入閣，他同情於勞工；他想把德國造成一個強硬而又穩健的國家，他用了強硬而又穩健的政策。於是他也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他自以為得計：頻向工會送秋波，自稱既非資本主義者亦非社會主義者；姑容實現社會救濟政策的流言；甚至採取白魯寧的計畫，把農民移植於破產貴族的領地。此外，他又太自信，太野心，太聰明，因此人民不信任他。據說奧登堡也對他大發雷霆，問他「上將先生，你幾時率軍來反對我？」

施萊轍被打倒的最重要原因，與白魯寧和巴本如出一轍，即不能拉攏希特勒，不能解決國社黨問題。國社黨雖然失了二百萬票，並因格里高·施德拉薩（Gregor Strasser）當時在國社黨中佔第二把交椅的背黨而暫時分裂，但國社黨運動，却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壓力。

施德拉薩是希特勒政治組織的首領，他支配着三四十個議席，他的背叛頗有使國社黨分裂的危險。施萊轍

對他大施陰謀，想把他拉入聯立內閣中。希特勒打破了他的迷夢。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希特勒狡滑的政治感覺和戰略。遇到這樣可怕的背叛，希特勒用什麼手段來對付呢？如在史丹林或墨索里尼，一定要把背叛分子開除黨籍，但希特勒卻並不這樣做。他召集所有國社黨議員開了一次會。施德拉薩也出席。希特勒把他當做沒有出席一樣，開始作下面這樣的演說：

「在每個人類團體之中，都容易會有一個出賣耶穌的猶大。但是猶大本本人，卻以為尚有其他許多猶大。在我們的團體裏面，正有一個猶大。我們的這個猶大，曾經散佈離反的流言。他是對的嗎？他人會趨附他的無恥共謀不軌嗎？」希特勒停一會兒。大家的目光集中於施德拉薩。於是希特勒從袋中取出一張紙，那當然是黨內暗探爲他預備的。他繼續說：

「事情很明白，我們的其他猶大確實存在，不但存在，而且我還有他們的名單。諸位要我把這些破壞我們團結、分崩我們政黨的其他猶大名字讀出來嗎？」大家狼狽起來。於是希特勒開始讀名單：議員甲、議員乙、……都是那批他知道同情施德拉薩的議員名字。他每讀到一個名字，便用銳利的目光注視那個人，說：「有錯嗎？你是否真是一個猶大？」當然大家都跳起來指罵施德拉薩，而效忠於希特勒。只要讀出幾個名字就夠了，會場便大亂起來，爭相表示忠心。（幾天以後，希特勒從莫尼哈回到柏林。他的主要副官都來車站歡迎他。深自痛悔的施德拉薩也在其中。希特勒緩緩地接受每個人的歡迎，和他們握手，對施德拉薩都不睬。等人家都從月台上走光的時候，施德拉薩還是目瞪口呆的站在那裏。他於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被殺，付清了叛黨的代價。）

施德拉薩事件過去了。第二件是什麼呢？國社黨運動依然是一千二百萬選民的巨波，在民主制度之中，沒有一隻警犬可以受得住這樣一種風波的壓力。要壓制國社黨既無可能，當時以爲給他們一張空白委任狀又不可能。國社黨總得被羅致於政府之內，否則他們會迫得掀起內戰，破壞德國。可是希特勒在八月間依然痛遭排斥，他自己也嚴拒參加任何聯立內閣，除非答應他的條件。總有一些東西要給他——但給他什麼呢？

四 希特勒的上台

希特勒也許會掀起內戰，但他的整個政策，卻建築在用合法手段奪取政權的基礎之上。一時人家帶着輕視的態度，給他取了一個「亞道爾夫合法子」的綽號。也許他怕作戰是出於愛國，也許他的懦弱出於一九二三年莫尼哈暴動失敗的教訓。他的妄想甚至鑽到牛角尖裏，想在歷史上造成一個獨裁制的新典型，一種由人民自動投票捧上台的獨裁制。但他的票數還不足。他是太謹慎用武力了。於是就用陰謀。

當時德國政治舞台，充滿了錯綜複雜的攻擊計和反間計。

最初是巴本，施萊徹的傀儡，溜到弗蘭克斯坦（Frankenstein）嚐到了光榮的滋味，他要求更多的光榮。他原是沒有黨派的，雖然一度加入中央黨（Centre），不久就被該黨開除。他渴於求得權位，於是聯絡了胡根堡（Hugenberg）的國權黨（Nationalists）。胡根堡是一個實業家，大出版家，又兼大資本家反動派的領袖。

後來巴本又掉轉頭來偷偷地與希特勒在加羅涅（Cologne）一位銀行家許羅特（Schroeder）的家裏會

面。他終於勸成功希特勒參加聯立內閣。

希特勒派加添了新勢力。他把施萊赫目爲他與政權之間最後一個障礙物，這是絕對的。大爲煩惱的施萊赫在國防部中召集了一個秘密會議。據說裏面討論着創立軍事獨裁制度，逮捕巴本和胡根堡。施萊赫拜見了老頭子，謹慎地告訴他局勢極爲嚴重。國防軍得衝入街上與國社黨作戰。施萊赫的惘嚇也許是虛張聲勢。他想嚇退巴本和胡根堡。但這種惘嚇是完全錯誤了。

聽到施萊赫打算召集國防軍，巴本和希特勒又聯合起來。這個局面的發展，對於巴本是有利的。他現在處着這樣一個地位，儘可對希特勒說：「如果你現在不按照我們的條件加入我們，那麼我們就要兩敗俱傷。施萊赫將用兵於我們倆。我們必須組織聯立內閣。」希特勒同意並接收他的條件：即在內閣中取得三席，而巴本和胡根堡則佔八席。這個條件後來他終於不能忍受。

哭喪着臉的施萊赫，正是自食其報，做了自己陰謀的犧牲，因爲希特勒和胡根堡提出了巴本國社國權聯立政府的計劃，而爲老頭子所接受。老頭子任希特勒爲總理，巴本爲副總理。然後他卷起名單睡着了。這件事情發生於施萊赫總理的辭職以前，那真是有趣得極。第二天早上這位將軍好像攢入五里霧中一樣，發現他已經撤職了。當他聽得這個消息時，不禁低着頭喃喃自語地在房中蹣跚了好久。

（白魯寧說：「你待我這樣壞，但是可憐的施萊赫，你比我壞五倍呢！」）

奧登堡自以爲拔去了希特勒這個眼中釘，就可以完全安全了。據說當時成立了這樣一個默契：除非有巴本

在坐，老頭子永不接見希特勒。民主政治便這樣在德國死亡了。一年以前才取得德國公民資格的希特勒，自己成爲德國的總理了。

在下一次大奇案的發展中，巴本、奧登堡或其他的人，都成爲不重要的角色。

第四章 國會縱火與清黨流血

「戈林洩露了一個消息，說一九三三年叛國的陰謀，是故施萊徹主謀的。我們知道德國社黨終有一天會把鎖鑰他的理由宣布出來。」

——白魯塔克 (Howard Brubaker)

一 國會大火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正在三月五日確定希特勒受任總理的大選舉前數天，德國國會大廈遭了火災。這次大火焚盡了德意志共和國遺留下來的最後痕跡。火舌不但吞沒了公共建築，並且燒光了德國的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天主教社會黨和國權黨。此次大火發現於嚴冬深夜的九點十五分，但其餘燼到現在還在燃燒着。國會火災燬滅了價值兩百萬馬克的建築物，同時又燬滅了數千人的生活。這火當然產生了三月五日選舉國社黨的大勝利，褐色恐怖的施虐，猶太人的屠殺，對奧地利的進攻，以及後來幾年轟動全國的強迫同化政策的進行。

大火把一座莊麗的巨廈化為灰塵，又把千萬和平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以及各階級有正義感人士的畢生事業化為灰塵。沒有此次大火，國社黨永遠不會得到這樣掃盪一切的勝利。在國會火災的

火舌之中，俾斯麥、威廉二世和威馬憲法的舊德意志完全消滅了。在火舌的餘烟之中，興起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國。
黎特 (Douglas Reed) 在其著作中說：「當德國覺醒的時候，人的家就不再成爲他的堡壘了。他可以被私人逮捕，被當局宣告警察不加保護，被無期限拘留而不說明理由；他的財產可以被沒收，他的口述和筆述通訊可以被竊聽和檢閱；他不再有與同胞集會結社的權利，他的報紙會不再自由發表其意見。」

二月二十七夜事變的真相，立即宣佈出來。國會大廈，位於柏林市中心近林登街 (Unter den Linden) 的末端，是夜九點十五分，火烟發現於窗中。救火車在九點二十五分到場。大廳已在怒吼着的火海之中。風火牆雖得保全，但內部已經燒光。大家立刻疑心那是故意縱火的。火花同時於數處開始——據後來官方報告，約有二十三十處之多。戈林和希特勒在一小時之內趕到，立刻說放火的是共產黨。當希特勒調查殘蹟的時候，他說「這是天意」。

這件事情的背景，也可以約略說一說。我們已經知道當時希特勒是總理。他在內閣裏面，只有三個閣員是屬國社黨的，而屬於巴本胡根堡的閣員卻有八個，但他卻不甘居人後。爲取得最高權計，國社黨必須在三月五日選舉中，大增其票數。希特勒迫切需要前此所未得的國會中絕大多數的議席。巴本和胡根堡也同樣決心破壞此舉。在希特勒和國權黨之間，感情弄得很惡劣。他們雖結成聯合戰線，但是實際上互相鬭爭得很厲害，因爲雙方都想在政府中佔優勢。

局勢的發展，於希特勒並不順利。奧登堡依然不信任他。當時盛傳希特勒將用武力廢黜他。國社黨恐怕他們會失去票數。只有一樣東西可以救他們，便是取得絕對多數的議席。據估計所得，新國會大概可有六百個議席，共

產黨約可得一百席。在國社黨的計算中，二百五十席是可以穩到手的，但是二百五十並不佔絕對多數，而只佔五百席的半數。所以壓制共產黨是必須的，把這一百席趕跑以後，便可完全得勝了。

最初國社黨決心想搗亂柏林共產黨幹部，以圖引起該黨反叛，因此獲得壓制他們的藉口。搗亂工作是做了，但結果卻失敗。總選舉的日期一天天近攏來。希特勒與巴本胡根堡之間的緊張愈增。國社黨得另外想種方法，而且要立刻。他們做了。

國會火災所產生的結果，正合國社黨的希望。這在上文已經說過。

一百個共產黨議員被逮捕。當局宣佈戒嚴令，包圍並封閉共產黨幹部。保障個人自由的憲法規定受壓制。共產黨暴動的計劃被「披露」。德國怒吼了起來。人民的感情大興奮。國社黨波瀾掀遍於全國，希特勒得以自昇四年獨裁權。

二 縱火案的內幕

縱火案的內幕，大家都都不大明瞭。國社黨對於這件玩意兒做得很專門，即使消息靈通的人士，初時會懷疑到出於他們的密謀，終於會覺得有許多細節，非常撲朔迷離。甚至到現在，還有好些枝節，神祕得莫明其妙。下面我們且來說個大概。

火災發生之夜，有個叫做魯培(Marinus van der Lubbe)的荷蘭白癡，在火燒場中被警察逮捕。他被逮捕

的情形，除了警察以外，無人目擊。戈林所發表的逮捕該荷蘭人的第一聲明，完全出於子虛。據說在他身上，搜出一張共產黨的黨員證，一張要求社會黨與共產黨共同行動的傳單，幾張他本人的照片，和一張護照。這傢伙真想得週到！他居然還帶着護照，可是照後來審問時證明，此外並無其他文件。

警察當局嚴密追究他的事業和行動。他在國會火案以前，曾經放過三次小火。一九二九年，他參加了一個大概叫做「荷蘭共產黨青年團」的組織。兩年以後，因為行爲不檢，被驅逐出境。他從未隸屬共產黨。他在火案發生前數天的行程如下：二月十七晚上到十八的早上，他睡在波茨坦（Potsdam）附近的格林諾（Glinow），在十九或二十日以前，決計不能在柏林，但在一星期以內，這個無名流浪者不是爲了討好共產黨而冒險放火，便是爲了受人雇用作此險舉。

對於魯培縱火案的解釋，顯然不能自圓其說，即使德國人士，也覺得如此，所以疑雲更加深起來。警察當局，以爲魯培必有同黨。但是要帶着足夠的引火物，溜入柏林市中心國會的高牆、門道、或窗而不被人看見，怎樣可能呢？

這顯然是德國當局自己把貓——一隻驚人的貓——從袋中放出來。據他們宣稱：縱火者大概從地道中走進來，事畢後又從原路逃出去。這條地道，從國會地下室直通對街議長的官邸，而當時議長卻是國社黨的要人戈林。本來地道是國會裝設熱氣管的一部份，在官場未曾宣佈有這樣一個地道以前，柏林知道的人就不到十二個。所以疑雲的一面是解決了。無論縱火者爲誰，進出國會大廈是取道戈林的後花園的。這資料真是難於令人相信！一隻駝鳥受人追擊的時候，往往把頭埋在沙中，自作聰明的以爲身體不會被人發現了。國會縱火案的情形

正與駝鳥埋頭一樣。一個人也許會顧預得大聲引起他人注意他想逃避的東西，希望人家減少對其注意。這無異一隻松鼠把栗子隱藏在樹下，伏在地上眼巴巴望着栗子，告訴人隱藏的地方。一個陰險的人也許會故意洩露他所煩惱的事，希望因此減少煩惱的程度。

縱火案未曾開審以前，全世界早知道國會是由國社黨自己放火的，倫敦會經舉行一次假審。德國亡命徒曾經出版了一冊「褐皮書」(Brown Book)，講起其中一部份的故事，雖然並不正確，銷路卻極廣。此外，一冊國權黨著名議員奧培福倫(Oberfohren)授意所著的秘密備忘錄，也流行得家傳戶誦。奧培福倫是個國權黨貴族，也是巴本的爪牙之一。他斷言縱火者是國社黨。是年六月，國社黨密探搜查他的房間，一時大家都不知道奧培福倫在那裏。後來當局宣佈他「自殺」了。

當時被捕的，不只白癡魯培一人。國會中共產黨集團的主席吐格勒(Ernst Thälmer)，聽到當局稱他是同謀的時候，就很憤感的去自首；接着有三個保加利亞的共產黨員第米洛甫(Dimitrov)、樸波夫(Popov)和塔納夫(Tanay)在柏林咖啡館裏吃咖啡的時候，被侍者報告警察，說他們行跡「可疑」而遭逮捕。根據所在地的確鑿證明，火災發生之夜第米洛甫不在柏林而在莫尼哈，但他也受了五個月的無妄之災，直到開審時才因沒有絲毫不利於他的證據而釋放。

三 縱火案的開審

縱火案最初六星期在里浦齊 (Lerpzig) 開審時，我都在場。法庭開了五十七天，真像一幕空前絕後的戲劇。審判極其認真。在開審以前，警察和司法當局的舉止很激昂。但一旦審判程序移到法庭裏的時候，情形就爲之一變。法院弄得很進退兩難：一方面要把莫須有的罪名往被告身上加，一方面又得裝出公平的樣子，竭力做好像同情他們。事實上受了外國輿論的壓力，法院不得不網開一面，稍稍公平一些。

我想這件案開庭的時候，法官像德國許多人一樣，必定以爲魯培是個共產黨，而共產黨則必爲殺人放火的罪犯。檢察官也會作這樣想，以爲案件很快可以了結，不必費極大的力量當作一件重案辦。的確當口供一件件招出來的時候，甚至法官也以爲根本就沒有什麼案件可審。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都是一大堆自相矛盾的謊話。但是案子既經開審，就不能中途停止。於是法院便帶着堅持到底的態度，帶着真正條頓民族澈底查究的脾氣，耐心地按步進行，可是案子一天天審下去，真相一點點明白，本來想證明被告有罪的證據，都證明了被告的無罪。神經不安的檢察官，開始製造難以使人置信的歪曲證據，甚至連法官也敢加以相信。當第米洛甫提出尖刻的問題時，法官只好叫他退庭，這樣的事情就常常發生。

當然沒有一個人重視第米洛甫浩氣磅礴的辯詞。這位保加利亞的革命家，的確有精密的頭腦。他正確地摺住了歪曲證據的每個破綻，他正確地提出了最使檢察官頭痛的問題。他把案件訴之於輿論的審判。審問開始的時候，原想把國會縱火的罪名推到被告的身上，但是第米洛甫終於把結果翻了一個向，使大家明白國社黨也有干係。

在有記錄的歷史上，第米洛甫是在公衆面前出戈林的醜的第一人，但即使不是爲了這個緣故，第米洛甫對於人生的幽默，也深有貢獻。當法院找不到證人的時候，他就問：「你在集中營裏有找過沒有？」當法官責他在作共產黨的宣傳時，他指着立在證人欄裏的戈林，以魯莽和極端有禮的狡猾態度說：「但他也在作國社黨的宣傳呀！凡是旁聽的人，都不會忘記第米洛甫用純粹巴爾幹德語指着魯培高叫：「這位可憐的浮士德！誰是他的惡魔呢？」但這還不能算他最後演詞的頂點，當他以不動聲色的態度，對付劊子手的斧頭或戈林的私仇而要求法院「賠償他浪費時間」的時候，那才達到了頂點！

一旦法院不得不傳審每個有關係的證人如國會門警和工役時，洪水的門大開了。重要的小線索都一個個找出來。魯培以遲鈍冷淡的語氣供稱（在他清醒的時候）：「火災發生的前夜，他與國社黨員在一起。」一個門警供稱：「一位國社黨議員亞爾白萊德博士（Dr. Albrocht）在當夜十點鐘很慌張的離開着火的大廈。戈林官邸的一個僕人亞爾特曼（Aldermann）供稱：他在着火前數夜，聽到地道裏有莫明其妙的聲音。火便是像這樣燒熱起來了。」

四 神祕

法院除了釋放吐格勒、第米洛甫、樸波夫和塔納夫以外，便沒有辦法；魯培卻被判處死刑，並且立刻斫了頭。（這裏還得提一筆，法院雖然宣告吐格勒無罪，但在審判以後又於「保護所」中拘留了兩年才釋放。）這位荷

關人死了以後，他的嘴就封牢了，而究竟他和縱火者如何動手的一個秘密，也跟着他到墳墓裏去了。

他不能獨個人放火，那是很明白的。他只帶着廚房裏所用的引火物；而據專家證明：國會中央大廳的火種，除了大量煤油以外，又用磷和硫磺等自動着火化學物，這種東西又是魯培所不克攜帶的。他是半瞎子，他走路又是蹣跚；國會是座石頭和硬木所造成的又黑暗又生疏的建築物；可是在他走進建築物二分五秒鐘以後（覆審時證明）中央大廳火就着得旺了。

魯培非爲國社黨所僱的間諜，這也是很明白的。此說曾經風行一時，但以魯培的立場而論，應該立刻加以放棄。國社黨不會精密地揀出這樣一個不靈活的間諜。他顯然是個心理失常神經變態的白癡。他沒有做間諜的能力。說他被麻醉也是不通。他並不引國社黨爲友，每次當他開口的時候，法院就恐嚇起來。

所以這實在是件神密莫測的事。如果魯培與國社黨沒有關係而獨立行事，火怎樣會放得成功呢？如果他與國社黨同謀行事，爲什麼法院只判他的罪而不及國社黨呢？

理由在於第一，按照唯一適合事實的說法，魯培不是一個間諜而是一個被欺者；第二，按照專家在審判時所提無可辯駁的證據，是夜國會大廈的火災不止一處而有二處。

魯培，真是一個現代文明不幸副產品的典型；他不但腦筋虛弱，並且對社會和威權深痛惡絕，這種情感在他虛弱的腦筋裏想來以爲只有放火可以補救。他原本是一個放火者，一個無家可歸的漂泊者，在柏林的貧民窟裏流浪着，他放過好幾次火，且以鄭重的態度對人吹牛皮。而國社黨聽了他，這都是事實。

走進國會大廈，魯培以他的襯衫做引火物，點着檯布和窗簾。正像前幾天他所放的火一樣，這次並沒有燒起來；除了一些輕烟和火星以外，什麼也沒有。他依舊進行，並且必定看見在他前面一大團猛烈的火焰爆發起來！那是另外一個火，是國社黨員用化學品所放的，他們帶着引火材料從戈林的地道裏走進來，一燃着便從原道跑出去。但魯培以爲這是他放的火，他帶着滿肚子的驕傲和勝利退出，就被警察捉住。

這正是國社黨所計劃的。他們需要一個代人受過的人——無論那種代人受過的人都可以——這樣便好歸咎於共產黨。魯培和國社黨之間的關聯不難明白。他在柏林的貧民窟裏曾經說過要燒國會的話。這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柏林原是個處處佈滿着間諜偵探和工具，所以這個消息立刻傳到高級幹部的耳朵裏。

國社黨知道魯培將在那裏。他們不會告訴他說他們也將在那裏。他以為他只有一個人。他從來不知道國社黨也幹着他同樣的事。這就是他在法院中那種古怪舉止的由來。他把他所放的火引以自傲；當他人要分他的光榮時他就大起反感。他以無可理喻的固執態度，力言他沒有同黨，只是他一個人放的火，並且真的這樣相信。唯有這個說法，才能與此次國會火案的前後情形的事實相印合。當一九三五年六月我在莫斯科遇見第米洛甫的時候，他也以爲這個說法最足解釋事實。

五 解釋

恩斯德 (Karl Ernst) 在國社黨革命的混亂之中由微賤而一飛升天的特異人物之一，被殺於一九三四年

六月三十日。他當過柏林西端一家夜總會侍者。他是羅姆的主要食客，所以昇遷得很快。只有二十七歲的時候，他便做了柏林白蘭登堡挺進隊（Berlin-Brandenburg S. A.）的師團長（等於少將階級），控制六萬五千名隊員。六卅以前，他就聽到黨中不滿於他的風聲。他寫了一封信——日期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三日——寄到國外，告訴收信人說如果他的恐懼實現，便把這封信發表。

恩斯德這封信把國會縱火案的陰謀敘述得很明白，其中對於國社黨領袖在放火前後的態度和舉動尤其描寫得活龍活現。他們（希特勒除外，因為信說到希特勒的時候以「他」一字代之）都是下流的、貪婪的、殘暴的、大膽的，並且有個不可思議的機會。他們在玩弄政治手段的時候，叫囂得好像一羣鬧雞。而此次縱火的陰謀，幾乎打算得像神出鬼沒。

恩斯德說，火是由他點着的。他的同志是兩個挺進隊員，費特勒（Fiedler）和墨倫斯啓（Mohrenschildt）。這三人在六卅清黨案中都破鎗決。滅了口以後當然不會再透漏消息。

恩斯德的信也許並不是原信。但是即使如此，恩斯德若不放火，也有像這樣的人會放。

六 血浴

一九三四年的六卅事件，是歷史上必不可免的。這真是一着必要的棋子。在兩支互相排斥的軍隊之間，希特勒是一個平衡力，一為國防軍，即正規軍，一為挺進隊，即他自己私人的武力褐衫軍，由羅姆領導。局勢的發展，成為

兩者不可兼得的狀態，使他只能取其一。他擇了國防軍。於是挺進隊必須算一下。這就是六卅祕密的真相。

第二件要考慮的是國社黨本身的性質，其重要亦不下於前者。正如海澄說，國社黨不是以目的而是以手段相結合的，其基礎並非建築於堅固的主義之上，其分子極其複雜。「領袖主義」是黨的唯一結構基礎，一旦級領袖互相妒忌因而陰損黨基時，則即使希特勒本身不受攻擊，亦除用武力消滅他們以外無他法。

第三，我們應該記得，趨附羅姆的一批人，最初以恐怖手段執行紀律，到現在已流於無法節制的地位而成爲聲勢洶洶的局面，這種局面各領袖攔住了當做一個解決積鬱的黨恨或私怨的無價機會。採取恐怖爲主義，正如希特勒一樣：我們真不知道恐怖將伊於胡底呢？

此次殺戮多數發生於六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據希氏在解釋行刑的演說中承認，一共誅滅七十七人。這個數目當然估計過低，全數也許永遠不能知道：大概會有二百五十或到三百。

被殺者可分數類。第一是挺進隊：

羅姆上尉 (Captain Ernst Roehm)，德國不管部副員，挺進隊參謀長希特勒至友及其私人軍隊的組織者。

恩斯德，柏林及白蘭登堡挺進隊的師團長。

三名其他挺進隊師團長，國社黨西里西亞邦領袖海涅 (Edmund Heines, boss of Silesia)，許南霍伯 (August Schneidhuber)，莫尼哈警察總監及克羅塞 (Fritz von Krausser)。

海斯亨，駐撒克遜邦挺進隊旅團長(Hans Hayn, S. A. Gruppenführer for Saxony)及其他三旅團長。

烏爾上校，挺進隊營長(Colonel Uhl. S. A. Standortführer)，此人為希特勒指名所殺，因彼有行刺希氏企圖。

第二是天主教社會黨，大半為副總理巴本的人：

克羅斯納博士(Dr. Erich Klausener)，「天主教行動」魁首，著名政治領袖。

潑羅李斯德(Adelbert Probst)，天主教青年運動領袖。

蒲斯(Fritz von Bose)，巴本政務秘書。

瓊格(Edgar Jung)，巴本私人秘書。

白克博士(Dr. Beek)，國際學生互遣機關委員。

第三是私仇或半私仇的犧牲者：

施德拉薩(Gregor Strasser)，國社黨出色的理論家，從前希特勒之下的第一人，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起即

不問政事。

凱爾將軍(Gen. von Kahr)，一九三三年巴威獨裁者，國社黨指為第一次希特勒暴動的「漢奸」。

第四是特定人物：

施萊轍將軍 (Gen. Kurt von Schleicher) 國防部部长，前內閣總理。

伊麗沙白 (Elisabeth) 施萊轍夫人。

白里陀將軍 (Gen. von Bredow) 施氏任國防部長時之次長。

最後還有一批純粹冤枉死的，例如莫尼哈音樂批評家威廉許密德 (Willi Schmidt) 被黨衛隊 (S. S. Guard) 硬當做一個與他同姓同名的莫尼哈挺進隊員，他雖然竭力抗議，但依然被殺。原來的威廉許密德在後來被捕殺卻。

前總理巴本於其祕書被殺後，僅以身免，前總理白魯寧如不在二十七天前違反他自己的意志和朋友的力勸逃出國外，必定也要被殺。他喬裝混入荷蘭教士隊裏偷偷溜到荷蘭的邊疆。

施萊轍爲什麼被殺呢？這批以前的總理爲什麼不逃也要被害呢？因爲（一）他們是從前的總理，白魯寧和施萊轍是德國能夠勝過希特勒的僅有的二個人，如果他們也抄襲希特勒同樣的手段來對付他；（二）巴本在總統週圍仍佔極大的勢力，他在六月十七日瑪堡 (Marburg) 演詞中竭力攻擊國社黨的極端分子，因此爲他們所深恨；（三）白魯寧膽敢壓制國社黨挺進隊在街上橫行，他們永遠不能原諒他這次舉動。

此外，施萊轍之所以被害，因爲許多國社黨要人認爲他是危險分子。所謂施萊轍與某國勾結的說法，完全出於無稽。他是羅姆的朋友，但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他與羅姆確有這種陰謀。施萊轍好結交英豪，他會有「社交將軍」之稱，並且在外國大使館中有許多朋友，不過如此而已。

國防軍的同僚對於施萊轍之慘遭暗殺，極爲憤慨，他們要求宣布暗殺者的名字。國社黨潛藏起來。此次事變的文件，保管在黨衛隊總司令辛穆勒（Himmler）的手中。國防軍不知道用什麼手段偷了去。辛穆勒想把文件奪回來，但是失敗了。有四百名國防軍的軍官舉行一次半公開的追悼會，擁護大元帥麥金遜（Feld-Marschal von Mackensen）爲主席，追悼故領袖施萊轍的被害，並將他和白里陀的名字鑄於紀念碑上。此舉使國社黨大爲驚駭。戈林立刻召集緊急會議，國社黨的幾個要人和上校以上國防軍全體軍官都出席。據說在這次會議中，戈林承認施萊轍的遇害，正如威廉許密德一樣，是出於「誤會」的。

說有一種「陰謀」把羅姆、施德拉薩、施萊轍、凱爾、威廉許密德、蒲斯、克羅塞聯合起來，這種觀念當然是想入非非的。說叛變行動完全出於挺進隊總司令羅姆一人之手，當時在柏林的大多數人士也並不作這樣想。但也許有這樣的可能。（德國的辯護家對於殺戮黨政要人和希氏的解釋，不能說明白一個所以然。我所聽到的一句最新奇的推諉話，出之於一位德國熱心國家主義者之口。他說，羅姆及其他諸人之被殺，因爲凡爾賽和約瑟奪了德國的殖民地。別的國家也許可以把不得人心或失敗的英雄放逐到遠處；例如墨索里尼或巴爾蒲（Balbo）於利比亞（Lybia）去冷一冷他的熱暈。但德國卻沒有可資應用的殖民地。羅姆容或可到唐加尼加（Tanganika）去做總督。然而唐加尼加已非德國所有，因此除了把羅姆鎗斃以外，便無法處置他。）

七 清黨的背景

在一九三四年五、六兩月之中，柏林的局面很緊張，經濟危機又極尖銳。革命是發生了，即國社黨得權了。但是勝利的報酬在那裏？爲什麼國社黨的經濟綱領不會實現？國社黨的激進分子如軍人和馬路工作人員，都以爲是戈林、國防軍和實業家把持權勢的緣故。他們的不滿情緒很緊張，訴之於希特勒，卻一無效果。領袖宣稱「第二次革命」不得發生。

於是國社黨內部的不滿集中於挺進隊身上。挺進隊自以爲是黨的主要武器。牠是擁希特勒上台的馬路軍。希特勒始終是一個褐衫軍人，挺進隊是國社運動的台柱，是國社黨潛伏的民衆，是人力的後備軍；裏面包含許多忠實的左派分子，他們急於要實現經濟改革的天堂。

挺進隊吸收了二百五十萬人這個大數目，而革命完成以後，他們無事可做了。他們穿着漂亮的褐衫制服，卻無處可走。希特勒只知道創立一支私軍，卻不知道如何處置他們。他們對於黨的財政是個沉重的負擔；至於保衛的任務，已有黨衛軍替代他們，所以他們無異一片汪洋大海，一種沒有約束的動力。

挺進隊的領袖是羅姆。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有戈林的慧力，哥培爾的敏銳，和德國無人能及的組織天才。一位粗線條的人物，一位想像力有限的人物，恨和平而愛搗亂，羅姆受挺進隊的愛戴，僅次於希特勒。希特勒靠羅姆甚於任何人。希特勒創立挺進隊，羅姆訓練並節制挺進隊。所以希特勒很倚重羅姆。

羅姆對於挺進隊問題的解決很簡單。他懷着大志，想把挺進隊參入國防軍之中，把國防軍造成一個龐大的國軍，執德國武裝勢力的牛耳。因此他成爲兩種趨勢的人格：（一）是極左派趨勢的領袖，因爲挺進隊自國社黨

得權以來，在德國並無收獲；（二）是與國防軍爭奪國家基本權力的競爭者。

國防軍當然竭力反對他。第一，軍官不願將兵權交於羅姆；第二他們已經把國防軍十萬健兒訓練得紀律嚴明，軍械精良，寧願自殺而不願見其自貶身價，投入二百五十萬無賴漢、小職員、半訓練的孩子，和街頭流氓無產階級。與挺進隊合併，那等於宣告國防軍的死亡。參謀這樣告訴希特勒——以肯定的言詞。

領袖很謹慎的注意他。他不願放棄羅姆；但是他方面，十萬國防軍對於他比二百五十萬差不多沒有武裝的挺進隊要有價值得多。他罷免培植國防軍高級軍官，特別是國防部長白倫培將軍。舉足輕重的白倫培，於是成爲深切地效忠於希特勒。六月二十九日，正在清黨前一天，白倫培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說，表示滿意國社政權。這於希特勒已經夠了。如果他對德國最強的勢力國防軍能有絕對把握，則挺進隊已失其存在的理由。

希特勒召見了羅姆。他們密談了五小時。羅姆又要求他擴大國防軍，加入挺進隊。希特勒告訴他，如果採取徵兵制度的時候，國防軍參謀主張以經過挑選的新兵擴充軍隊。羅姆碰了一鼻子的灰走開。他帶着愠意跑到莫尼哈。當時宣布自七月一日起，挺進隊停止兩個月活動，在此期內，不穿褐衫制服。挺進隊離開街頭了！革命出賣了！

這裏還得提起另一個分子。我們還不會討論到黨衛隊（Schutzstaffel 即 S. S.）所謂黨衛隊者，就是黑衫軍，人數共約三十萬。他們本來是希特勒和其他領袖的衛隊，後來成爲國社黨戰鬥力的精華。挺進隊是烏合之衆。黨衛隊是羽林軍，服裝鮮明，武器精良，俸給優厚。挺進隊效忠於羅姆。黨衛隊無羅姆插足的餘地，故效忠於希特勒。黨衛隊的領袖辛穆勒是個恨羅姆的人。所以希特勒可以絕對信託黨衛隊。

國防軍對於此次危機，早已得到警告，所以預先防備很周密。清黨前十天，柏林國防軍參謀官都帶着有盒子破隊，甚至在公事房裏也不離開。一聯隊的國防軍調到柏林附近的杜不里茲（Doehritz），接着謠言纔起——顯然毫無根據——說是羅姆最忠心的信徒恩斯德意圖反抗解散挺進隊的命令，而佔領柏林。甚至說他想謀殺參謀！

國防軍防備的結果，並無事故發生，由此足證並無陰謀。反之，國防軍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起見，倒或者發明一種陰謀來剷除羅姆。年青的恩斯德，當然沒有任何政治意圖，所以不管叛變。他新近才結婚，原定在白里門（Berlmann）乘船到馬地拉（Madaira）度蜜月，後因事延期，卻不料在到白里門的路上便被捕。不到六星期以前，當他結婚的時候，希特勒還做過他的男儕相呢。

八 羅姆及其他諸人的遇害

希特勒為消弭羅姆的疑心起見，特地到德國南部去檢閱某勞動營。他帶着哥培爾和魯士（Lutz）同行——魯士在羅姆死後即被任命為挺進隊參謀長。戈林負柏林方面的清黨責任。這就是希特勒帶哥培爾的原因。戈林一身是膽，可以獨當一面。六月二十九日午夜，希特勒在無線電話中聽到性質很嚴重的消息，於是他不得不趕緊動手。

哥培爾把這件事情敘述得很生動：

「我依然看見領袖立在哥德斯堡旅館的甬道中。領袖嚴肅地望着黑暗的天空。當時誰也不知道有什麼恐怖。領袖忠於他自己的主義。領袖對於陷國家於無限紊亂的反動分子完全下了決心。

「柏林和莫尼哈都有報告給他。只經過幾分鐘的會商，決定不等到翌晨就動手。我們在當夜兩點鐘出發。四點鐘時我們到了莫尼哈。

「領袖在飛行場上接到報告。於是他決心親入虎穴。他乘汽車趕到威賽。未受阻礙即入羅姆住宅。希特勒以空前的勇敢執行逮捕。羅姆受捕後不久，他的部下即從莫尼哈到來。希特勒對着他只說一句話，命令他們回莫尼哈。他們服從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曼斯德導報。

羅姆如果打算三十日在莫尼哈暴動，為什麼當天早上六點鐘說是開始動作的時候，還睡在二十英里外威賽的床上？如果莫尼哈有叛變起來，為什麼希特勒同時浸晨到那裏的時候平靜無事？

國社黨官報敘述闖入威賽的情形更詳細：

「領袖進門親身逮捕參謀長羅姆，他靜悄悄睡在床上一些不抵抗。在對面海涅的房裏，領袖遇到「一種可恥的情形。」海涅和一個青年同睡在床上，隨着他們被捕同時發生的惹厭情景，無法描述。由此無情地暴露了前參謀長四周流行的情形。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泰晤士報。

據非正式的消息說，希特勒並不是單身進去，而伴着一中隊黨衛隊，羅姆也並不是靜悄悄受擒，而大聲侮辱領袖，指他爲革命叛徒，希特勒還暴跳如雷，直到黨衛隊把羅姆帶去。

羅姆被帶至莫尼哈。海涅和他的幾童當場被處決。希特勒不知道應如何處置羅姆。他把這位參謀長下了獄，教他自盡。他拒絕，並說殺他的無論是誰，等於「亞道爾夫本人」。他直到被捕後三十六小時即翌日下午五時才遇害。究竟遇害情形怎樣，沒有人知道。大概監獄官總屢屢到希特勒那裏，說「他不願自盡……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希特勒最後憤怒的命令，除滅他唯一的朋友，拔去他的眼中釘，射死他……

其他諸人對於希特勒個人並無多大關係。他們的人數很多。他肅清了莫尼哈及其附近有貳心嫌疑的挺進隊領袖。然後他於凌晨明令戈林在柏林動手。戈林直等到上午十一時左右才開始行動，據他後來承認，「擴大了他原來所指示的範圍。」

究竟戈林會否與希氏講過他要殺的人，至今尙成爲疑問。大概是不會。希特勒的「執行」令，往往是極端含糊的。（據說數月後有個外國人問起希特勒的一個朋友。一位國社黨員在席間吞吞吐吐的說：「他於六月三十日失蹤。」希特勒面孔立時慘白起來，他不知道這個人已死了。）無論如何劊子手隊出動了。辛穆勒監視着他們。迅速恐怖的殲滅開始了。

施萊轍在家裏遇害。他事前完全不知道危機迫在眉睫。當黨衛隊到來時，他正在與朋友打電話。他在電話中說：「對不起，等一等，有人進來了。」他回轉頭來看到了劊子手。他們開鎗了。施夫人聽到鎗聲奔進房裏來。她也被

殺，這樣她丈夫之死就沒有見證了。

黨衛隊分爲兩班。一班當場動手的，是希特勒的私人衛隊，他們對於這套玩意兒都是十足的斷輪老手。另一班不冠冕堂皇行刺的，駐在立宋德斐營房 (Tieftrietel) 中行刑。犯人在綁赴刑場以前，有一分鐘的「審問」。大多數案子的程序很簡單，只有監斬官一句話：「你被控告叛逆，應受死刑。」當每個人被帶到刑場的時候，就有一道眩目的探照燈光射到他的眼簾裏。鼓聲一響，便是一排鎗。

有幾個被處分的挺進隊領袖，例如恩斯德的參謀長沙特 (Sander)，被鎗斃時口中還不絕叫「希特勒萬歲」。他們還以爲一班作亂的黨衛隊背叛希特勒，還以爲他們是爲效忠希特勒和國社運動而殉難的，真是「叛徒」。從七月一日到七月十三日，整整費了十三天的功夫，希特勒才恢復他震盪的神經。最初布告出來，說是只有幾個挺進隊高級領袖和施萊轍夫婦被殺。宣傳部恐怕人家不相信陰謀的說數，還竭力引人注意羅姆、海涅及其至友的溺男癖。爲了溺男癖問題，黨中常常鬧意見。希特勒在七月十三日演說時，宣讀了七十七個他承認已死的名單。他演辭的第一部份幾乎完全在靜默中過去，雖然聽衆只是一些國社黨議員——有三十席是空了。

按照向例，演說很冗長，他先約述國社黨的革命史。然後說及羅姆和他政見的衝突。關於「陰謀」的詳情，他說得並不精細。至於所謂施萊轍與某國外交家的會晤，他發表了警人的聲明，說是如果「德國的叛徒與外國政治家會晤，而隱瞞了我，則雖其所談論者僅爲天氣、古幣等事，我必致之死地而後已。」然後他以緊張的情緒下結論說：二十四小時以來他做了德國人民的最高法院——而聽衆報之以狂烈的鼓掌。

以整個的黨而論，六卅事件產生了善果又產生了惡果。剷除了像海涅這樣自認爲殺人犯的不快人物的流傳，這對黨是一件功蹟。他方面，撇開恐怖不談，六卅事件「破壞了將來未必能夠完全恢復的元氣，顛撲不破的愛國團結的幻想，以及國社黨領袖時常昭告的永遠互相效忠的幻想。」最後，此舉又消滅了黨中的「過激主義。」

九 虎口餘生者

天下的事情往往無奇不有：在六卅事件中，有幾個不應該死的人慘遭非命，有幾個應該死的人卻脫離虎口。姑舉第維拉虞（Gottfried Trevinius）爲例。他在歐戰時當過潛水艇的司令官，又因爲在白魯寧任內做過閣員，所以對於國權黨主張的信仰，頑固得和他們對於國社黨主張的信仰一樣。國社黨之所以要殺他，有好幾個原因：第一，他是白魯寧的至友；第二，他在軍隊中有強大的勢力；第三，他無時不輕視希特勒，而且大言不慚。

六月三十日正當吃過中飯以後，第維拉虞在他的後花園中打着網球。有十二個黨衛隊員乘着一輛大汽車停在他的屋旁，都拔出盒子礮。他的一個孩子遇到他們，他們高叫「第維拉虞在那裏？」聽到下面的紛擾，樓上有一個聲音說：「我在這裏。」但這是第維拉虞的父親。黨衛隊員奔到樓上看見他，知道弄錯了，問他的兒子在那裏。同時孩子跑出來把遇到的事情告訴網球場上的第維拉虞。他立即躍出圍牆，跳入停在外面的汽車裏，這時黨衛隊員已在樓下，看見他駕車逃去，便對他放鎗，但沒有命中。

第維拉虞很聰明的不向鄉下駛而向城裏駛；黨衛隊員也駕着原來的大汽車向他追，可是因爲車子載滿了

人分量過於重，卻追不上他，一會兒不知他的去向了。第維拉虞在朋友家裏停下來，借了一襲平常出門穿的衣服，然後到施萊轍家裏探聽情形。門外擁滿着人。他走出汽車，問一個黨衛隊員究竟發生什麼事故。聽到施萊轍已被刺，第維拉虞以極其矯捷但外表鎮定的身手跳進汽車，向鄉下開去，把車子撞碎在路邊，使人以為已向前逃入田中。他又乘着一輛出租汽車回到柏林市內，躲在一個朋友的家裏，讀麥考萊的「英國史」(Macaulay's History of England)——這一細節不大可靠——靜待風聲的冷淡。

有幾個反對國社黨的英僑，對於六卅事件大抱不平。其中有一個冒着受罰的危險，改竄他的護照，帶着二個孩子——另一清黨運動中犧牲者的兒子和女兒——混出了德國。

十 興登堡的下場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興登堡去世。六卅大流血對他風燭之年容或是個打擊；可是他方面，老頭子似乎又很滿意希特勒和戈林，因為他曾向他們各致賀電。

甚至在他去世前一天，柏林最有能力的新聞記者和外交家，還在考慮這件事情對於希特勒一定是種最嚴重的危機。誰可做總統？他能自任為總統嗎？如果他這麼幹，誰來做總理？尤其是國防軍將取如何態度？

現在如果從好的一方面來看，希特勒在六月三十日早已把國防軍收買了。他的聰明和大膽，即使在事後我們也可看出來。當時沒有一個人想到希氏肚皮裏簡單狡猾的計劃，即將總統和總理兩個職位合而為一。

至於國防軍，由白倫培統帶着。當興登堡歸天那一早晨，全國國防軍戍守所舉行一次新宣誓，這在軍事史上是種破天荒的舉動。通常軍隊只宣誓效忠皇帝或國家的元首。這些效忠誓辭，澈底的誓辭，卻只對希特勒個人而發：

「余在上帝之前，立此神聖誓言：余願無條件服從德意志國家及人民領袖、海陸空軍總司令、亞道爾夫希特勒；余並願隨時隨地，準備犧牲余之生命履行此誓，以符合勇士之精神。此誓！」

司令官舉手讀一遍誓言，士兵和小軍官隨着唸一遍。有些恨希特勒的軍官，在那一天上託病告假。但是參謀總長並不因此而煩惱，因為缺席的軍官在銷假回職的時候，不得不個別舉行宣誓……宣誓完畢以後，全體不但高唱德國國歌，並且須唱國社黨歌。

興登堡在世的時候，也許有些可能：他會撤去希特勒的總理職，雖然這種可能性是很渺茫的。他一死之後，這種危險過去了。現在希特勒做了國家元首。只有他自己可以撤他職。他的迷路達到了自然的盡頭。現在惟有上帝可以除去他。而他聲言上帝是站在他一方面的。

第五章 亨哈二將

「做我的弟兄，否則我要換下你的腦袋。」

——德國俗語

一 馭人手腕

在希特勒周圍，包圍着一班古怪的小型希特勒。早年我在柏林聽到一位最愛開玩笑的德國時事觀察家說：「國社黨的領袖，沒有一個是常態的、完全誠實的。他們不是顛預自得，即是貪名圖利或神經反常。」每次掀翻一個大國根底的民族革命，往往會產生幾個特異的人物。我並不是說千萬正直的德國人——其中做高官大爵的也不在少數——都不是誠實有禮的人。

有幾個特別可厭的人物，已在六卅事件中消滅了。有許多依然留着。他們不但留着，並且還幹着與他們弱點和缺點非常切合的勾當。誰應該做第三帝國「啓發民智」的領導者？哥培爾博士的啓智力是一個跛子、矮子、和殘廢者的啓智力，但舍他以外尚有何人？誰應該有六千五百萬德國人的最高警權？戈林將軍是一個最暴躁、最不穩的人物，但舍他以外尚有何人？

希特勒某次告訴一位新聞訪員，說他不喜歡唯唯諾諾的人。所以他擢拔的人才，全是豪放不羈的，在自己隊中常常互相齟齬。他有一種一貫政策，好以一個下屬去抵制另一個；使他們對他永遠有莫測高深之感，而他卻採用各人的長處。大家又相信他對屬下有制服他們的方法。這班小領袖雖然互相嫉妒，但都知道希特勒是他們命運的支配者，所以大家爭先恐後去邀他的寵眷。

希特勒也很注意，不讓下級領袖的權位超過於他。當戈林權位太盛的時候，他把戈林管理祕密警察的職權交給辛穆勒。戈林到現在還沒有做到國社黨的中委。

國社黨的職位和政府的職位，多少由一人兼任。例如哥培爾是國社黨的宣傳主任，同時又是政府的宣傳部長；達雷是國社黨的農業主任，同時又是農業部長。如果黨國完全一體，像蘇聯那樣，則兩種職位也就完全合而為一了。但德國卻並不完全如此，例如經濟獨裁者沙赫特博士，在黨內就沒有什麼地位。又如羅森培（Rosenberg）是黨內的外交主任，卻不是政府的外交部長。

國社黨將全國分成十九個黨區（Geb.），奧國在他們的計劃之中是第二十區。（柏林區主任是哥培爾。希特勒竭力設法把黨區主任和該區挺進隊領袖的職位分開，但是一旦兩職由一人兼任的時候，則他就成爲握有當地大權的人物。海涅是西里西亞黨區主任，又是該區挺進隊司令。反猶最激烈的斯德婁（Julius Streicher）是巴威黨區主任，又是該區挺進隊司令。

這一班人的暗鬪，很爲激烈。戈林和哥培爾的對立便是大家所週知的。我們要把黨內各領袖的鈎心鬪角情

形畫出一張圖表來，那是一件很複雜的事。哥培爾與沙赫特、戈林與巴本、哥培爾與辛穆勒，都是互相嫉視的仇敵。羅森培尤爲人人所厭惡。比較能與大家合得來的，只有兩個人，即奚斯和弗力克，他們倆都沒有野心，都有很好的人緣。

領袖們之互相嫉忌，產生了分裂不睦，和減低效能。此外，這種現象又足見希特勒主義嚴重的弱點所在。國社黨的基礎，建築在情感之上，而非建築在穩固的意識形態之上，其唯一聯繫爲領袖主義，像這樣一種政黨，並不是一個不容易解體的政府和社會機構。這一點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完全不同。希特勒的三個主要顧問沙赫特、紐拉特（Neurath）和白倫培，都不是國社黨員。如以蘇維埃政府爲例，要是經濟部長、外交部長，和軍政部長都非共產黨員，那將成爲怎樣一種情形！

德國有許多小型希特勒，讓我們先來講戈林將軍罷。

二 第一號大混蛋戈林

戈林現在雖然居於普魯士邦全體人民之上，但他卻是一個巴威人，一八九三年一月十二日生於巴威羅森哈姆（Rosenheim, Bavaria）。他出身於閥閱之家，父親做過德屬西南非的總督，所以從小受過很好的教育。他在放假日子，常常攀登奧屬阿爾卑斯山。他像希特勒一樣，對於奧國有強烈的情感，這大概是國社黨於一九三三及一九三四兩年脅迫奧國的原因之一。希特勒的姊妹現在仍住在維也納，戈林的兄弟也住在那裏。戈林的兩個

姊妹還嫁給奧國人呢。

戈林在二十一歲的時候，便投身德國空軍。迨至一九一五年秋，他升任空軍第五驅逐隊長。他曾經獲得最高勳章（Pour le Mérite），一九一八年又升任著名雷治多芬隊（Richthofen squadron）隊長。大戰期內，他一共擊落二十三架敵機，比他更多的有雷治多芬，計擊落八十餘架；德國第二名駕駛員烏特（Udet）計擊落五十四架。

戈林一生所受到的最大影響，有兩件事，全發生於一八一八年休戰不久以後。第一件是拒絕解散他的機隊向敵人投降。德國參謀總長命令他這樣辦，但他堅決加以拒絕，到最後不得被迫降落在達姆斯丹（Darmstadt）。他黯然與同事軍官告別，並且預祝將來有一天德國的空軍稱雄於世界。他的機隊就在那時被毀。

這件事是他一輩子不能忘懷的。他寶貴的飛機，竟然被那班遠較他為低劣的敵人所毀壞，這在他的心理上，給予一個永不復元的打擊；他現在之熱心建立德國空軍，也就是爲了補償那種心理上的損失。

第二件事發生於他回到柏林以後。當時有一羣社會主義者看見他穿着軍服，就把他的軍官徽章從胸襟上強扯下來。戈林對此非常氣憤，誓必報復。他之瘋狂地憎恨社會主義者，便是由那天起的。說大部份褐色恐怖的原因由此而起，倒也並不完全是奇談。

一九一九年，戈林到瑞典當了一名商業飛行員。他在那裏愛上了一個女子，她對他的一生影響極深，那便是福克男爵夫人（Baroness Karin Fock），他的第一位太太。他們認識的開始是很有詩意的。有一次他在瑞典北

部飛行，忽然被迫降落於她的勞克爾斯丹 (Lockelsdorf) 的莊園上，於是他們便認識了當希特勒在莫尼哈舉事的時候，戈林受了重傷。他在先一年，已經成了希氏的信徒。他先逃到意大利，後又回到瑞典。他的健康大損。

戈林第一位太太死於一九三二年，正在他第一次就任大位當德會議長以前。自施德拉薩 (Gregor Strasser) 失寵後，戈林日漸取得希特勒和黨的眷信，代替了施氏的位置。這時候悼亡的情緒強烈地佔據在戈林的心頭。他的太太死在瑞典，他特意把她的遺體運到德國。他在柏林的邸第裏，立了一個靈壇，懸着她的遺容，壇上點一對長明臘燭，並且在牆壁上開了一扇嵌着有色玻璃的窗戶，當陽光照臨的時候，儼然像是有靈爽憑式一樣。他日常跪在壇下祝禱，直到他遇見朱妮曼女士 (Frau Emmy Sonnemann) 為止。

這位頂碩的女子是一個女優，極得戈林的歡心。一九三五年四月，他們在柏林舉行盛大的婚禮。典禮之隆重，直可比作羅馬的大舖而無愧。希特勒做男債相，收到的賀禮足值八萬金鎊。同時用斧頭斬決了兩個共產黨員，一個叫做艾斯坦 (Eipstein)，一個叫做齊格勒 (Ziegler)，這兩人據說與暗殺國社黨英雄威塞爾 (Horst Wessel) 有關。許多國社黨員稱道這件事是一個佳兆，因為流血犧牲可以預卜新夫婦的多男。

戈林兼任的要職，多得指不勝屈。他是議會議長、國防軍大將、空軍大將、警察總監、航空部長、普魯士總理、狩獵長、森林監督、和電視 (Television) 主任——最後這項任命因為無線電傳影對於將來空戰很有用處。一九三六年，他又被任為德國「四年計劃」總監，因而成爲名義上的經濟獨裁者。

戈林所穿各色制服之多，向爲人所豔稱，不過說起來總向多的一方面講，事實上他常穿的制服也只有十套。

左右。他常愛在腰間佩一柄長劍，猶如十字軍一樣。在他邸第中的書桌後面，絲絨帷幔上，懸着一把野人用的大刀，刀鋒下垂。他不但喜歡在服裝上炫異矜奇，並且還喜歡在居室中裝璜耀飾。

他多半住在里城廣場 (Leipzigplatz) 一所巨廈中。室中有個大壁爐，上面用磁磚砌成一個極大的卍字。據說有一間房裏，壁紙是腥紅色的，地毯是深黑色的；架上置着一座希特勒的半身石像，用反射燈照着。另外還有一個大廳，地位寬大，裝飾華貴，可以改作電影院；只要按一下壁上的電鈕，帷幔便自動捲起，露出一方光潔的銀幕。

戈林在巴威有一所別業，與希特勒的莊子相距不遠，佔地五千英畝，是地方政府贈送給他的。他最熱心觀成的計劃是戈林航空部的新廈，計有房間二千五百間之多，屋頂的面積，非常廣大，可供飛機的升降。

他的野心和他的虛榮心一樣大。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正在希特勒競選勝利的後一日，他請人畫一張肖像，膝上放着一本書，題為「拿破崙傳」。他愛畜乳獅，無論雌雄一概名之為「凱撒」(Caesar)。

戈林之嗜肉食，正如希特勒之嗜素食一樣，所以他是暴躁的、殘酷的、感情衝動的。據「萬歲」(Hitler)一書第十九頁所說：一九三三年莫尼哈暴動以後的證件上，曾經紀錄他的命令，「用步鎗柄」打他反對黨的「腦袋」。一九三三年二月他對警察廳下不問情由鎗斃「敵人」的著名命令，實為國社黨恐怖的先聲。他發起殘忍性來，四肢痠熱血沸騰，完全不加思索。他不像哥培爾那樣善於暗施鬼計的陰謀家。他有很大的執行才能，所以他這個人格外來得凶狠。

自戈林掌握第三帝國的警權以來，有一二、八六三人被殺戮，其中有些是用強殺戮的。猶太人逃出國外的達九萬左右。在一九三三年六月至一九三四年六月之間，受死刑宣告的男女計二一四人，執行的計二一二人，其中大部份都是政治犯，這在他國不會受死刑的處分。至於被判有期徒刑的人數，計二八〇、三〇八人，如果把他們的監禁年限加起來，總數達一二九、四二一年。此外「因意圖越獄」而被鎗斃的，計一八四人，褫奪公權的計一三、〇〇〇人，送入集中營的計四九、〇〇〇人。

戈林純粹是位亞利安人。例如一九三五年六月英德海軍協定簽字時，他稱之為「種族律的勝利。」但他是國社黨高級首領中不公開抨擊猶太人的唯一人物。

他在黨中屬於右派。他不管希特勒政綱中「社會主義的」部份。他之所以加入國社黨，因為國社主義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個有強大陸軍和強大空軍的強大德國。

關於戈林的笑話，當然出於傳聞。大多數笑話不是說到他時時更換的制服，便是說到他魁梧的身材。他不但只發胖，在他胖胖的皮脂底層還含着豐富的筋肉。他動作的敏捷，和那些比他身輕百磅的人一樣；他並不遲鈍，他有驚人的體力。但是有人講，他的肚子非常大，坐下來的時候幾乎可以「坐着自己的肚子。」他和他的太太只好睡在天幕中；又說「他的兩腰縛着女人用的緊身肚兜。」

有人說：戈林每次沐浴，總穿着海軍上將的制服，所有勳章都用樹膠複製。德國新立一種重量標準的單位，叫做「戈林」，所謂一戈林者，就是等於他所有勳章重量之和。有一次，戈林視察某鋼廠，他的雙腳突然離開了地

面，直挺挺升到天花板下面，當時同去的隨員都大驚失色。後來仔細調查一下，方才知道因為他身上所掛許多勳章，被磁鐵吸引住了。

還有一個小故事說，某次戈林約會一個來訪問他的英國名人在柏林某餐館吃中飯。他遲到了，因此對英國人道歉，並說他剛纔出去射擊。「射野獸罷，我想？」英國人高聲說，當時戈林很得意洋洋，雖然他射擊的並不是野獸而是圓顛方趾的人類。據說戈林對於這些構他的故事很愛聽。

又有一個故事講，某次希特勒到戲院裏去看一齣叫做「天鵝武士」(Tobengrün)的戲。他因為精神疲乏，在那裏打起瞌睡來。臚臚之間他猛然睜開眼睛，看見戲台上有一個穿着燦爛輝煌鎧甲的武士。希特勒誤認那個伶人是戈林，高聲嚷起來：「海曼(Hermann) 戈林名，你跑得太遠了！」

如果目前的局勢繼續下去，則戈林這位人物的重要，倒不在於他的嗜殺，也不在於他在普魯士的地位，更不在於他握有普魯士的警權，而在於他與空軍的關係。下次大戰將在空中決勝，以戈林這樣猛鷲殘酷的人來負起發展德國空軍的最高責任，真是一個惡兆。

因為他的性情魯莽，所以這位將軍有時會說粗鄙的話。他曾謂：「凡是著文反德的人，他的頭腦裏必定充滿大糞。」

三 蹺脚博士哥培爾

哥培爾博士(Dr. Joseph Paul Geobels)一八九七年生於萊因蘭。他生下來就有一隻腳蹠。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由此我們可以解釋他的人格和事業。正如海登說，他是一個跛子，「一羣長人中的侏儒。」所以他不得不用手段、機智和陰謀來彌補他的缺點。因為跛腳，他的野心愈加大起來，對康健的人也愈加恨起來。他在黨中是最陰險最惡毒的人，但也是最有教育的人。他在海德堡大學(Heldelberg)得到哲學博士的學位。有人說他的博士學位是冒牌的，但實際上的確貨真價實。

哥培爾的家庭，篤信羅馬天主教，但他本人卻猛力反對宗教。他的父親是一個教員，祖父是一個農夫，他的母親出身於手藝工人之家；他們全是很窮。他曾進過好幾個學校，後來靠着一筆獎學金，才得進海德堡大學。他在青年時代，很想將來成爲一位文人，現在他的著作確實不少，已出版的就有十四部。

他的夫人是個離婚婦，但對他的事業卻有很大的影響。有些仇敵說她的第一個丈夫是猶太人；這話並不確實，他是一位道地的亞利安人，業律師，名匡特(Quandt)。希特勒對哥培爾夫人很要好，在他初任總理幾年中，到她家裏參加音樂會。這對於哥培爾的政治計劃很有利。一時她成爲德國時裝部(Deutsche Moden-Art)的部長，據說目的想爲德國婦女創造種種純粹亞利安式的服裝，可惜只有曇花一現。

矮博士——因爲哥培爾身長不及五英尺五英寸——於一九二二年踏進了莫尼哈的會場；當時演說者是希特勒。哥培爾說他到那裏完全出於偶然。他聽了國社主義，立刻發生信仰，於是跑到萊因蘭去組織黨支部。由於他言詞的鋒利和尖刻，不久便得到希特勒的契重；並且成爲希氏以下國社運動中最雄辯的演說家。一九二六年，

希特勒派他到柏林去主持黨務，因為他以為那裏的活動進步很慢。哥培爾辦了一個「進攻報」，在四年之中，靠着新聞和組織手腕，他居然成爲一個有強大勢力的機關的領袖；除莫尼哈外，柏林變做國社黨最堅固的堡壘了。在演說和論著方面，哥培爾的強暴，爲德國任何人所不及。他完全是無顧忌，無思索，無情面的，某一時期，控告他毀謗名譽的訟案，有一百二十六起之多。很早以前，有一次他在「進攻報」上登着「與登堡尙在人世乎？」這樣一個標題。總統對他提起毀謗的訴訟，結果罰鍰八百馬克。但爲報復起見，他又著文說與登堡被猶太人和馬克（斯主義者所包圍）（見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日泰晤士報。）

一九三五年年底，哥培爾被任爲德國文化宣傳部長。於是他做了德國輿論界的最高統治者，同時——這也是很重要的——也是無線電廣播的統治者。他又統制了戲院、電影院，以及音樂、美術、文化，甚至科學等一切活動。他爲六千五百萬德國人把國家造成一個文化監獄，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真空管，一個精神受桎梏的國家。

哥培爾又可稱爲國社黨的舞台經理。他發明了召集民衆大會的手段，幫助希特勒獲得鉅額的選票。他的策略很簡單。他說：「宣傳只有一個目的，即征服民衆。凡能達到這個目的的任何方法，全都是好的，凡不能達到這個目的的任何方法，全都是壞的。」他想出一種不斷的，不留餘地的攻擊的戰術。於是他利用雄辯的會場裝飾、揚聲器、準備希特勒出現的仔細佈置、大遊行和制服等等。

當希特勒初任總理時，哥培爾最先煽動民衆示威，竭力提高國社黨的地位。他發起焚燒書籍；制定五月節和秋收節，並主持冬賑（Winterhilfe）運動。他最大的成功是捏造國社黨歌「威塞爾」的故事。



哥培爾及其家屬

國社黨黨歌「威塞爾」由一個叫做威塞爾（Horst Wessel）的青年無賴而得名。這個家伙原來是路得派教會牧師的兒子，一個浪人，這一類人在希特勒未上台以前，可在柏林街道上隨處碰見。他做了挺進隊的一個司令，專門在共產黨員人多的區域裏活動，因此共產黨員非常憎恨他。有三個惡棍因為個人和政治動機，乘他睡在床上時候，闖入他的臥室中把他暗殺了。他拒絕受請來的一個猶太醫生的診治，終至因傷致命。

哥培爾認為威塞爾的葬儀，是個可作大規模宣傳的絕好機會。但是警廳方面不許國社黨作盛大的示威運動（這事的發生尚在一九三〇年）。因此哥培爾不得不另想他法。威塞爾生前曾經根據巴威一隻舊曲的調子——這調子是國社黨和共產黨都唱的——譜了一首街歌。這首歌原很激昂動聽，所以哥培爾決心利用一下。在喪事前一月，威塞爾曲還是一首非正式的國社黨歌。不久便成為正式黨歌了。而威塞爾本人也就成為國社黨第一名殉難烈士了。

哥培爾與戈林在外表上雖然相處無間，但是暗中卻一有機會便互相攻訐。戈林以普魯士總理的資格，管理着柏林的國立歌劇院（Staatoper）。哥培爾心有不甘，於是在柏林收買了另一家歌劇院以與之對抗。戈林的新夫人抱着很大的野心，想爭取哥培爾夫人的地位而為第三帝國的國母（Third Lady）。哥培爾對於他自己的職權，不容人有所侵犯。一九三三年，漢夫斯丹格擔任攝製一張描述威塞爾一生的影片。該片雖屬宣傳國社主義性質，但哥培爾卻最初禁止上映，直至修改內容更換片名以後，始准公映。

哥培爾有許多傲造的話：

「我以為不再戰爭一次，對於我們是種犧牲。」

「我們的褐衫軍救法國於布爾希維主義的大禍之中，可是現在巴黎街上史丹維斯基（Stavisky）派暴徒橫行，因此弄得毫無秩序。」

「希特勒之攻擊民主精神，僅為一種發展的序幕，這種發展的目的，將為一個國社主義的歐洲。」

「戰爭是人生最簡單的肯定。壓制戰爭無異企圖壓制自然的進展。」

控制了一國的輿論，則獨裁制度的工作即已成功一半，哥培爾以全副精力運用這句格言。他是第三帝國文字的最高獨裁者，所以未得他的核准，德國無法刊行任何著作。甚至閣員的言論他也隨意檢查。一九三四年六月，他禁止各報發表巴本的瑪堡演詞全文；一九三五年八月，他又檢查沙赫特博士在王堡（Königsberg）警告極端派的演詞；同時他又禁止斯德婁在柏林廣播關於猶太人的演說。未得哥培爾所簽發的證書，沒有人可做德國的新聞記者；未得他的核准，沒有一家報紙可以發表任何新聞。結果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德國報館關門的達一千四百家，計占全國報館總數三分之一。

國社黨統制新聞的政策，是直接抄襲蘇聯的故技，雖然這句話哥培爾不願意聽。國社黨聲言他們之所以要革命，目的在於撲滅德國的共產主義，但是他們對於共產黨的方法，卻整個兒採用過來。德國的正義，全以國家福利為前提；蘇聯也是如此。蘇聯奉行是集體政治的國家，德國也抱着同樣的志願。蘇聯有秘密警察，有集中營，有一黨制，嚴厲排斥反對思想，國社黨對此一切，全加倣效。

哥培爾之所以能夠站得住的原因，一半由於希特勒需要他，一半由於他個人的機警。他的嗅覺很敏尖，所以自全的本能很大。他對那班他以為於他有用的拍馬屁，他從來不攻擊那班正在得權的人物。每當危機醞釀的時候，例如六卅事件，他總是隱身在希特勒的背後。

哥培爾博士是近代世界所少見的無理取鬧祖師，在他的精神病之下，乃有種種喪心病狂的理論出現。請看「人種研究新猷」的著者郭許教授 (Prof. Herman Gauch) 的納粹宏論：

「非北歐人種的牙齒，上頰突出，像豬一樣，角度比動物更傾斜。北歐人嚼物的動作很文雅，是閉着嘴嚼的；而其他人種則大聲咀嚼，像動物一樣……。」

「北歐人的嘴，還有種種優點。因為紅色有激動感情的作用，所以北歐人光亮鮮紅的嘴唇，可以引動人接吻。北歐人的嘴是善於接吻的嘴。他方面，非北歐人闊大的口腔和粗厚的嘴唇，再加上一股觸鼻的臭氣，卻令人望而生畏，完全表現出一種淫蕩自瀆的樣子。」

「非北歐人說話的時候，往往動手動脚，而北歐人卻立得很鎮定，常把雙手插入口袋裏。」

「一般言之，只有北歐人種的發音，清脆動聽，而非北歐人的發音卻不清楚，每個字的音調很混雜，像動物所發的噪音一樣，如吠，如歎，如駭，如鳴。」

「與其將非北歐人歸入北歐人一類，無寧將他們歸入猿猴一類更切貼一些，但是既然如此，為什麼非北歐人不能與猿猴通婚而能與北歐人通婚呢？理由是：現在還不會證明非北歐人不能與猿類通婚。」

請再看國社黨半官機關報 Judenkammer 的話：

「德意志全國同志，你們可會知道猶太人。

婬瀆 你們的子女，

強姦 你們的妻室，

強姦 你們的姊妹，

強姦 你們的未婚妻，

暗殺 你們的父母，

盜竊 你們的財產，

毀謗 你們的名譽，

咒罵 你們的道德，

破壞 你們的宗教，

敗壞 你們的文化，

沾污 你們的種族。」

——引自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日「星報」(Star)

像哥培爾博士這一類的人，正是數不勝計。例如他們的攻擊外國檸檬：

「再會罷，檸檬，我們不需要你！我們的德國大黃可以完全替代你。他是這樣的謙遜，使我們過去忽視他，輕視他，沉溺於外國東西。在我們各省各縣一年到頭都有許多的他。我們幾乎用不到費錢就可得着他，他的酸味可以增進我們蔬菜的滋味。只要放一些些糖，他就可以給我們一種很好可口的味道；不但如此，他又含着醫藥上的功用，可以使我們德意志的血更加純潔。讓我們把德國大黃的好處，來洗刷我們過去沉溺外國檸檬的罪孽罷。」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泰晤士報。

哥培爾雖然不是猶太人，但至少他的相貌不像亞利安人。和他反對的國社黨人往往用尖酸而又隱約的話來諷刺他，說跛子或殘廢的人在種族上是很危險的，尤其是雙腳都蹺的人。哥培爾的答覆很巧妙。他特地收買一位人種學家，請其在亞利安人種的分類上，發明一種只適用於他的類別，叫做「Nachgedunkelter Schumpfermann」。這個術語很難譯。大意是指「一個變態色的侏儒型的日耳曼人」。

第六章 小型希特勒

「我要求每個挺進隊領袖，以及每個政治領袖，都應該明白他的行為應做標準……我希望每一個母親，把她的兒子貢獻給黨，不要怕墮落他的道德……挺進隊領袖只有在公眾面前行為不端者，當不留情面，加以撤職查辦。」

——希特勒

一 十足官僚弗力克

戈林和哥培爾之外，最有權勢的國社黨領袖，當推弗力克博士(Dr. Wilhelm Frick)，雖然他沒有像他們倆那樣的出風頭。他在希特勒第一任內閣中，就任為內政部長，一直到現在。因此德國的文官都為他一手統制，而在學校、機關和警察方面，佔有強大的勢力。

弗力克在一八七七年生於巴拉汀奈(Palatinate)，最初習法律，後入政界。他是一個十足的官僚。希特勒並不親近他，但卻敬重他。他之所以被任為內長，因為他是國社黨中唯一受過文官訓練的角色。精明、馴服、隱晦，他的確是一個忠實的行政官；他曾被稱為「唯一誠實的國社黨員。」

可是你不要以為這位乾癟典型的德國官僚，不會說國社黨的大話，創國社黨的大事。追溯猶太血統直到三代的亞利安律就是他起草的。以吐林格邦閣員資格下令各校學生強迫舉行打到凡爾賽和約的禱告，就是他幹

的。他又以國社黨議員資格在議會中提出一個法案，凡是有弱男癖的人犯，應受宮刑處分。（見「萬歲」一書第六九頁。）此事大觸海涅和羅姆之忌。弗力克和戈林一樣，在黨中永遠站在保守派一方面。

其次，國社黨領袖因爭奪文化事業管理權發生了猛烈的鬪牆。哥培爾說，一切藝術都是宣傳，所以應歸他管。羅森培以爲藝術是帶國際性的，所以應劃入他的範圍。戈林以普魯士總理的資格，認爲藝術應該隸屬於行政範圍，所以該歸他管。教育部長魯斯特（Rust）當然高興把文化劃入他的勢力中，不過他自諒本人只是一隻二等獅子，所以當其他獅子在怒吼時，只得保持沉默。此時弗力克也只好竭其所能自持。

弗力克所定青年教育的七條戒律，充滿着民族主義的思想。而以德國學校教科書來鼓吹武力，宣傳大日耳曼主義，這對將來不免要發生重大的影響。

二 私人代表奚斯

奚斯（Randolf Hess）一八九六年生於埃及亞歷山大港，是希特勒的私人代表，國社黨副首領，德國不管部開員。當施萊轍被殺之後，戈林大爲國防軍所不滿的短促期內，奚斯如果有足夠的勇氣和魄力，很可取戈林的地位而代之。但是奚斯才幹屬於另一方面。他是一位理想的私人代表，一頭馴良的走狗，一個忠實的僕人，此外便一無所長。像許多其他黨徒一樣，奚斯也是第一次聽了領袖演說便信仰希特勒主義的；他同戈林和黎氏（Ley）同爲歐戰中的空軍軍官。他是加入國社黨的第一位「紳士」，一九二三年起希特勒的私人秘書。

奚斯的得勢，在於他與希特勒的接近。他雖然沒有做部長，但因本人也是一個閣員，得於其他閣員之間奔走運絡。希特勒曾經吩咐他幹過幾件爲難的任務，例如六卅血案發生後，叫他草擬第一份向公眾謝罪的宣言。一般人對於黨政各事，除非經由奚斯，就很難得見到希特勒，所以許多運動職位的人，都走他的門路，人家說他的公事房是第三帝國的「靈門」(Kloppentuer)，倒是很切貼的。

據奚斯本人說，他在亞歷山大港時是個國家主義者，大戰時期是個社會主義者，戰後在莫尼哈是個反猶主義者。所以他的靈魂可下希特勒的種子。他的反猶情緒是很激烈很極端的。

奚斯的性格恬退而又謙抑，因此頗得人望。每屆國社黨在紐倫堡開會時，他所得的鼓掌聲，僅次於希特勒，而過於戈林、哥培爾、羅森培或弗力克之上。他的整個生命獻給了希特勒。他唯一外表的嗜好是信奉精神病治療；他曾任特蘭斯登 (Dresden) 設立一所醫院，凡是科學藥醫不易奏效的病症，都可到那裏去試一試精神治療。

當一九三二年秋施德拉薩失寵以後，希特勒任他爲國社黨政治部主任。在此以前，除了希特勒的親信外，很少人知道奚斯其人。請他擔任這個職任是很聰明的。希特勒平素有知人之明，所以特地選這位沒有更大雄心的人，來做他的代表。

在一九三七年一月莫斯科叛國案之中，奚斯也被牽累在內，說是與托洛斯基同謀推翻蘇聯的德國官吏，雖然這件事似乎不能令人相信。奚斯的姓名被提及不下六次。

三．黑衫軍首領辛穆勒

辛穆勒 (Heinrich Himmler) 戴着一副夾鼻眼鏡，樣子很像老學究。他是新德意志最被人厭惡的人物之一。他擔任兩種職務，一是黨衛隊的總司令，一是全國警察長，秘密警察 (Gestapo) 也歸他管轄。他曾非正式告訴全世界，如果希特勒遇刺，則即使不會成功，德國將成大亂，殺盡一切猶太人。

他在一九〇〇年生於莫尼哈，正像許多同僚一樣，也是國家主義派的游擊隊員。他與伯魯克納、戈林、斯德婁、奚斯及其他著名領袖同參加一九二三年莫尼哈暴動。希特勒為對抗羅姆的挺進隊，特地組織一個黨衛隊，他於一九二七年任辛穆勒為該隊副首領。一九二九年辛氏晉升黨衛隊正首領，一九三三年任莫尼哈警察長，一九三四年任政治警察長。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黨衛隊是國社黨的精銳。辛穆勒曾說：「挺進隊是戰鬪線，黨衛隊是防禦線。」每一黨衛隊員，必須嚴格服從紀律；必須合乎一定的身長和相貌標準，必須得辛穆勒的優生局證明為純粹亞利安血統且能生育健康子女，始能與其未婚妻結婚。

辛穆勒一身兼任警察和黨衛隊兩首領，所以負着雙重的職務。秘密警察和黨衛隊是所向無敵的。警察逮捕人，黨衛隊把他們拘囚於集中營中。辛氏總攬兩機關的大權。此外，他在黨內又是一個民政方面的適當工具，因為他能服從秘密命令，予以執行，而政府可以把他所做的事公然諉為不知。

四 侍從長伯魯克納

伯魯克納副官 (Lieut. Bruckner)，希特勒的侍從長，名義上是領首的衛隊長官。他是德國最驍勇的人之一，所以做這個職司很稱職。他至少有六英尺四英寸高，簡直是一個鋼皮鐵骨的標本。伯魯克納從不遠離希特勒。他晚上睡在希特勒臥室的外面。他在一八八四年生於巴登 (Baden-Baden)，像辛穆勒一樣，在戰後加入義勇隊。他和希特勒是不能分離的；當希氏逮捕羅姆的時候，伯魯克納便站在希特勒一邊。他是挺進隊員，不是黨衛隊員，官階是旅團長。

五 猶太人的閻王斯德婁

斯德婁 (Julius Streicher) 是國社黨領袖中最可厭的家伙。這位反猶健將聯邦政府駐弗蘭可尼亞邦 (Franconia) 專員，現年五十一歲，挺胸，突眼，光頭，一望而知是個殺人不怕血腥臭的屠伯。據「萬歲」一書所載，一九三三年七月，他命令二百五十名被捕的猶太人，用牙齒去拔田裏的野草。

一九三三年四月，正當國社黨上台以後，斯德婁在柏林主持反猶大運動。這次運動是哥培爾博士所未會打算到的。斯德婁發行一種週刊，名為「挺進隊」(Der Stürmer)，竭力主張暴動，鼓吹反猶。其次他還發行一個「殺人典禮」專號。此舉大遭外界——例如英國大主教——的紛紛抗議，要求將該報封閉。

英國泰晤士雜誌 (Time Magazine) 一九三五年四月八日曾引斯德婁的話說。

「我把囚犯從暴民的手中救出來，關在監獄裏，有時請他們吃我的馬鞭。請看那位教員史丹洛克博士 (Dr. Steinrock)，他這樣愛嚙嚙我和幾個黨員同到他的牢房裏去看他。他開始帶着哭聲嚙嚙起來，動作像一個小學生一樣。嚙嚙一會以後，他的動作並不像我想像中那樣的一個人，所以我請他好好兒吃一頓鞭子。」

當他五十歲生辰的時候，地方當局送他一件奇特的禮物，那便是紐蘭堡警廳的犯罪檔案，這些檔案「本來要做他犯罪的物證的。」斯德婁一生最快意的事，是肅清弗蘭可尼亞邦赫司布魯克縣 (Hensbruck) 的所有猶太人，這一縣本來有三十六村，二萬二千人。現在連一個猶太人都不剩留。在弗蘭可尼亞邦無論那一處地方，攻擊猶太人的恐怖，都以極端殘忍方法出之。斯德婁對猶太人問題最後解決手段是殺盡一切猶太人。

他的教育並不怎樣出色。當一九三五年八月他到柏林在體育場 (Sportplatz) 上對民衆大會演說的時候，他說：「第斯拉里 (Benjamin Disraeli) 這位住在英國的大猶太人，做了首相。後來他又化名為格蘭斯東爵士 (Lord Gladstone) 被選為上議院議員。」

有幾位同情他的人說，希特勒個人對於斯德婁的嗜殺，「深覺惋惜，」其實這是用不到的。希特勒並不惋惜他這種性格。希特勒的左右屢次進言剷除他。希氏都加以拒絕。斯德婁是希特勒最早的一個擁護者。早至一九二三年第一次組織「勞工」黨的時候，他就加入他。希特勒常在公衆面前贊揚他。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只提起兩個國社黨員的名字，那就是奚斯和斯德婁。當希氏五十歲生辰時，希特勒特地從柏林乘飛機到紐倫堡向他祝

毒。

六 兩位次等角色

海爾道夫伯爵 (Count Wolf von Helldorf) 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國社黨舉行第二次除猶恐怖時，被任爲柏林警長。他任這個職位，有個特別的資格，因爲他在一九三一年會因領導反猶大示威而被捕，當時示威運動發生於 Kurfürstendamm 街，這次他受命「清除」新暴動的，就在同一街上。

席拉赫 (Balduur von Schirach) 是青年運動的領袖。他生於一九〇七年。他狂熱地崇拜希特勒，甚至作詩歌頌他。他虔信宗教。最近他說：「國社黨對天主的關係，要比現在已經消滅的各基督教政黨對天主的關係好得多。」可是席拉赫正像其他幾個國社黨員一樣，把宗教與國家主義打成一片，所以他實際上已經成爲一個異教徒了。

七 兩個激進分子

黎博士 (Dr. Robert Ley) 和達雷 (R. Walfer Darré) 兩人，在德國以外，雖然並不十分有名，但在國社黨中，確實也是重要分子。黎博士是總工會會長，又是德國勞工陣線的領袖；達雷是「農民領袖」，又是農業部長。但是他們的權勢，也許就要失卻，因爲自六卅事件以後，國社黨的經濟政策是保守的，而他們卻以「激進」聞名。

達雷在一八九五年生於南美巴西首都（正像希特勒、突斯和羅森培一樣，都不是德產）儼然像一位學者。他之所以得入國社黨的高級幹部，並不因為在莫尼哈共過患難，而是後來以農業問題專家的資格，被羅致入官僚政治的。他在農業部中，當過一名文官。自胡根堡被排擠後，他始升擢。他倚馬立特地擬出一連串農業改革的遠大計畫，國社政府所實行的一切「社會主義」方案，幾乎都出於他的手筆。他想出的一種農產價格規定法，又制定一種農地繼承法，按照該法，農民一向所有的農地，不得出售或抵押，而只許過戶遺傳給業主的繼承人。

達雷的上司，覺得他稍為過於前進一些。他的自負和傲慢行為，尤其引起許多非議。當他就職後不滿數月，他就在威司巴登（Wiesbaden）替自己立了一個紀念碑，上面鐫着「血與大地」幾個字，並且在立碑那一天親自演說。黨中對於他的熱心，當然無話可說。因為他手創一種可讚的計畫，把德國婦女像牲畜一樣，按照優生學的方法，分成幾個等級，以謀改進人種。

至於工會領袖黎博士，性格好像一隻脫繮的馬。當德國尚未退出國聯的時候，他到日內瓦出席國際勞工局會議，竟然當南美各國代表的面前，發表驚人的演說，痛斥南美某幾個共和國的居民是未開化的「白癡」。他在大戰時當過駕駛員，很早就加入黨。當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施德拉薩失寵的時候，黎氏和突斯就繼任他的職位。黎任國社黨的組織部主任，地位十分重要。他對希特勒異常忠心，所以希氏到如今還用他。

黎博士的誇大大家聞名。請聽他說：「我們對於兒童，從三歲起就要注意。當他一有了思想，我們就拿一面小國旗放到他的手裏，以後送他進學校，入希特勒青年團，入挺進隊，受軍事訓練。我們不要放鬆他；等到他的壯年過

去後，叫他參加勞工戰線（Arbeitsfront），仍然要他工作，直到老死爲止，不管他是否情願。」

八 兩位戰士

德國在精神和物質上備戰的積極，已經不是一種新聞了。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德國退出國聯以前，整軍還是秘密的；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希特勒撕碎凡爾賽和約軍事條款並採取徵兵制度以前，整軍是公開的；自一九三五年三月以來，德國已成一個廣大的軍營，而無所隱晦。一九三六年三月，萊因蘭非武裝區域也被佔領。

這裏可以來講一則小笑話，以見祕密整軍時期情形的一斑。某夫人請她的丈夫給她造一輛兒童車，因爲他原是一家兒童製造廠的工人。他答應把材料一件件從廠裏偷出來。幾個月以後，材料都偷完全了，於是某先生便一件件配合攏來。最後他失望地對他的太太說：「我把這些材料配合了三次，每次都配成一架機關鎗。」

這個時代現在早成過去了。德國的整軍的確有不少困難，這一點是不能忽略的。空軍據說已有三千架飛機，但尙未「準備完妥」。她的重砲並不多，重坦克也很少。但是儘方面，精選的徵兵制度業已實行，國防軍平時已達八十五萬人。一九三六年八月，軍役年限自一年延長到兩年。據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說，德國每年軍備預算達八萬萬磅。

德國的國防部長是白倫培特級上將（Col.-General Werner Eduard Fritz von Blomberg），一八七七年生於波末拉尼亞邦史達加特（Stargard, Pomerania），出身於將門。自入伍以後，他升擢很慢。他在一八九七

年才任少尉，一九〇七年升中尉，一九一一年升上尉，一九二五年也只是一名上校。一九二八年以後，他就飛黃騰達起來。是年他升少將，一九二九年升中將，一九三〇年升上將，一九三三年任國防部長，一九三四年晉升特級上將，在德國是大元帥以下最高級的軍官。

他並不是一個典型的普魯士軍官，他是和易安詳的人物，絕非那班飛揚跋扈的糾糾武夫可比。他能說幾國語言，且會到過許多地方。一九三〇年他乘休假去美遊歷。他的頭髮蓄得很長，朝後梳，不像多數陸軍軍官那樣鬪成平頂。

白倫培得意的原因是在於他深切熱烈擁護希特勒。他是一個忠實的國社黨員，不像那班軍官，只把趨附希特勒當做進身之階，既做了官又反對他的狂妄，一到機會來時他們可以統治德國，則又翻臉不認人。白倫培是個虔誠的、忠實的、私淑的希特勒派。

不過他結識希特勒，還是一九三三年以後的事。他之任爲國防部長，際遇極巧。當施萊轍與國社黨經交以後，一時很難物色一位適當的人物。希特勒有一位至友穆勒，當時正在白倫培所統率的師中，做隨軍牧師。他推薦白倫培於希特勒，經過他一番傳教式的介紹，白倫培居然獲得了部長。穆勒因此也得到一個報酬，任爲德國耶穌教會的大主教。

在白倫培之下的是弗立希上將 (General Werner Freiherr von Fritsch)，陸軍總監，他與白倫培完全屬於兩種不同的典型。他是十足的軍人。軍隊而外，他不知何物。他的見解純粹代表軍隊的見解。德國有人說，白倫

培「對希特勒效忠」，弗立希卻「對祖國效忠」。白倫培多少帶些感情主義的色彩，弗立希則是鐵石無私。白倫培可受希特勒的感化，弗立希則不能。

弗立希在一八八〇年生於萊因，出身貴族，且為將門之子。他的事業非出於機會。他在後來才受知於奧登堡。最初他為東普魯士（奧登堡莊園附近）第一師參謀長，嗣又升任柏林軍區總司令。他的升遷是按步就班的，並且完全靠功績。

弗立希並不要把國防軍增加到八十五萬人，他以為這個數目是太多了。他堅信西克特（Sieckert）主義，以為軍隊應該像一把經過千錘百鍊的青鋒劍，數量不在於過大，但須教導有方，訓練完善，然後能運用自如，調度迅速，勝負可操。

九 希特勒與國防軍

希特勒依賴國防軍擁護嗎？是的。國防軍效忠於希特勒嗎？也是的。但是德國的首領究竟是希特勒還是國防軍，這問題可說是不得要領。事實上是希特勒和國防軍聯合統治着德國。只要他們的目的始終一致，那就不會發生衝突。

希特勒需要國防軍，國防軍也需要希特勒。兩者互相需要，就好像狼與狼一樣。國防軍需要一個強盛的統一的德國，而希特勒又比較是國內最強的人物。如果沒有希特勒，德國不陷於武力獨裁制，即陷於混亂局面。國防軍

無需乎武力獨裁，因為在希特勒握權期內，武力獨裁將不得人心。而國防軍當然更不願國家陷於混亂局面。

不但如此，我們不要忘記國防軍的每個軍官和士兵，曾有效忠於希特勒個人的誓言。而普魯士軍人是不肯輕易背信的。

只要白倫培長此任國防部長，國防軍不會有叛變的些微可能。（譯者按：白倫培已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在第二次清黨時被捕，現由希特勒自任為國防部長。）如果繼任白倫培的人與希特勒有隙，則情形也許大變。希特勒放棄了挺進隊而以孤注一擲信賴國防軍。如果國防軍背叛了他，那他就要大倒其霉了。

最後可不要忘記國防軍自始就贊助希特勒。他第一次組黨的錢就是國防軍的，國社黨早年喉舌「人民觀察報」之能出版，也靠國防軍的津貼。而希特勒又是以國防軍的偵探開始政治生涯的。

第七章 戰爭和平政策及金錢

「德國人不要戰爭，他們所要者是勝利的報國。」

——甘勞 (Julius Cambon)

一 洛加諾條約的撕碎

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希特勒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駐軍於萊因蘭，引起了一九一九年以來歐洲最大危機的感覺。根據和約規定，萊因地帶永遠是個不設防的區域。德國人竭力反對他們與列強之間這種「不平等」這種反感確也情有可原。但是希特勒所侵犯的，不僅是萊因蘭；同時又自動撕破了一九二五年來成爲歐洲和平砥柱的洛加諾條約，按照該項條約，法比德三國邊疆，由英意兩國保障其安全。萊因地帶的不設防，是洛加諾條約的一部份。而希特勒之破壞這個條約，等於把歐洲像西瓜一樣的破裂了。

當時有一部份法國人，也主張出兵，但沒有實行的勇氣。大多數英國人講求調停，他們這樣做了。意大利因爲侵阿被國聯施行經濟制裁，當然拒絕與英法比站在洛加諾聯合戰線上。於是爲爭與國久經分離的德意，必然又言歸於好了。經濟制裁的失敗，促成了德意的攜手。比利時，由一位突受全歐重視的人物齊蘭 (Paul van Zeel-

Field) 領導着，尤其受這個危機的干怒。當時比國不但仍像一九一四年那樣無法抵抗德國強大的軍力，而且希特勒還藉口行將於巴黎簽字的法蘇互助公約，謂為破壞洛加諾條約，作為萊茵進兵的掩護。但是比國所受新局面的危害，並不亞於法國，而對法蘇公約，卻置諸不聞不問。

倫敦一時冠蓋雲集，各國政治家都來此討論這件事。他們當然難於解決賊出關門的老問題。他們談了十天之久，還得不到一個解決的方式。英國的意見最初完全親德，但後來轉變態度，覺得希特勒之恣意破壞條約實足招致未來的不幸。結果德國代表里賓羅甫 (Herr von Ribbentrop) 抱着希特勒所宣佈的「和平計畫」而來，要求加以考慮，卻受到國聯會議一個重大的打擊而去。但是希特勒這個莫測高深的家伙，同時昭告全世界他的真面目——一個夢遊者！——而舉行德國公民投票，結果得到了九八·八一%的信任票。

希特勒和平計畫的內容，包括下列六點：(一) 德法比締結二十五年不侵犯公約；(二) 締結西歐空軍公約；(三) 「精神」裁軍；(四) 締結東歐和平保障公約，立陶宛在內，蘇聯除外；(五) 上述及其他條件履行後德國重入國聯；(六) 廢除重坦克及重砲。此外還有一個驚人的希特勒作風的提議：即不但德國，就是法國，也應舉行公民投票來解決上述問題。其中又包括一個備供參考的提議，即於最近將來召開解決殖民地平等問題的會議。

仔細一研究這個計畫，就可知道表面價值雖高，而實底價值甚可疑惑。自大戰以來，不侵犯公約已經締結了二百個左右，而無一證明有效。希特勒之迴避互助公約，因為這種公約容或會發生效力。至於他所提議的公約，大

致會有兩種結果：其一是他得對敵人各個擊破，其二是封鎖了西線以後，他得放膽伸手於東線。希特勒對蘇聯的仇恨，是露骨的，不能抹殺的。所謂「精神裁軍」的提議——包括取締挑撥法德感情的出版物和教科書——居然發自一個出版「挺進報」的國家，一個每天以軍國主義灌注於青年頭腦中的國家，能不令人驚奇。所謂限制空軍數量的公約，據專家看來，以為在技術上是辦不到的，而希特勒的建議，不過是裝腔作勢而已。至於坦克車和重砲，正是德國武器中的弱點所在，所以讓其廢止罷！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這個問題的關鍵，全在於希特勒守信與否。事實上他所提議的用意所在，就是他已撕碎了一個條約以後，允諾不再撕碎接着所訂的條約，而同時又否認他以前會撕碎條約過。

外交家在那裏唇槍舌戰，討價還價，空費了許多時日，而希特勒卻完全得到了他所要求的東西——武裝萊茵地帶。最使他感覺頭痛的是羅加諾這張白紙的簽字國告訴他，如果德國開始侵犯，則英法比必須立即締結防禦同盟加以對抗，而三國的參謀本部也在討論起來了。英國外相艾登（Eden），當時對柏林提出一個重要的詢問書，語氣雖然很客氣，意思卻是很堅決，他探問希特勒是否準備邀請蘇聯參加東歐公約，並探問將來各項條約批准後，他將以何物作保證。當這個詢問書送達希特勒的時候，歐洲正被另一個打擊驚駭得魂飛魄散——即阿皇的出亡國外與意大利佔領阿京。因此希特勒接到詢問書以後便置諸不覆。

同時，他在三月十四日演詞中的一句話，就很耐人尋味，他說：「我不相信國際間會有和平，除非各國的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是一律。這就是我為什麼希望德國社會主義將來有一天會推及全世界的原因。這並不是一個妄想，而

是一個可以達到的目的。」而他就在紐蘭堡大發野吼，抨擊蘇聯。

二 德意軸心與法西國際

一九三六年九月，英國試想召開新洛加諾會議；德國卻給予一個不置可否的答覆。一九三七年一月，艾登又圖召開談判；德國仍游移其詞，加以延宕。

這時有兩件極重要的事件同時發生，使希特勒得向他方面推進。這兩事對世界民主國家給予一個嚴重的警告：

第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德國突然宣布締結一種類似同盟的協定。協定的目的為「防禦共產國際」，有效期間為五年；規定德日兩國應共同商議共同行動，並創立一防共常設委員會，其性質為「研究防禦」；代表德國簽字的里賓羅甫大使稱之為「劃時代之舉，全世界愛好秩序與文明各國為防禦戰之轉變點。」

第二，可以稱之為「德意軸心」(Rome-Berlin axis)。這不是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之間的一種正式條約，而係兩人政策逐漸接近的一種表示。從此德意兩國進入密切合作的時期；他們攜手干涉西班牙內戰，同日以同一通牒弗朗哥「政府」；戈林、白倫培、紐拉特聯袂訪問羅馬；墨索里尼也宣布他要報聘德國的意思。墨氏令情齊亞諾伯爵於遊歷柏林之後，對新聞記者發表德意目的一致的言論。

羅馬並未正式參加德日新約，但羅馬當局對之都表歡迎；齊亞諾聲言「意大利在太平洋並無若何利益，故

對共產主義問題，除建立與日取一致見解以外，不必多所舉動。」這一個世界三大積極發展領土的國家——德、意、日——驚憾了全世界；「法西國際」於焉確立了。

德國人的瘋癲，德國人的壞脾氣在一九三七年之中大增。紐約市長戈恬亞 (Mayor La Guardia) 稍稍挖着希特勒的痛瘡疤，並不挖得重，德國報紙就紛紛罵戈恬亞爲「一隻猶太貓頭鷹，一個口出不遜、頭腦下賤、毫無教養的猶太惡棍，一個毒人者，一個老搗，一個卑鄙齷齪的猶太種。」是年八月，德國把泰晤士報著名柏林訪員愛浦德 (Norman Tubbitt) 驅逐出境，因爲有三個國社黨的間諜也被英國所放逐。希特勒乘機遊歷各處，稱現代藝術是「喪心病狂的。」九月，外長紐拉特又驚憾世界，聲言全世界的日耳曼人，無論他住在什麼地方，應保存日耳曼人的特性，並稱德國的「文化參贊」，即宣傳員，應與外交代表處於同等地位。

可是希特勒在慶祝執政四年典禮的演詞中，卻宣稱德國外交政策中的「奇襲時代」是過去了。

三 希特勒與戰爭

對於希特勒不會發動戰爭，有好幾種說法。分述於下：

第一，有人說德國並無充分的戰費。但貧窮不會阻止衝突。經濟不足固可使戰爭進行困難，但是窮極無聊的國家，對於戰爭所受的損失，要比反對戰爭的富國少得多。意大利的經濟危機，阻止不了墨索里尼之進攻阿比西尼亞。

第二，有人說德國並無充分的戰爭原料。回答是：她現在的戰爭原料像一九一四年那樣光景，大概是有的，而當時四境雖受封鎖，尙能支持作戰至四年之久。

第三，有人說國內對希特勒的反對，相當熱烈，工人不會動員，即使動員，也許會鎗口朝裏。但是單元政治的教訓告訴我們：只要單元政權存在一年，反對勢力就減削一年。請看蘇聯。請看墨索里尼之奪取阿比西尼亞。根善（Frances Gruber）說：「只要宣傳得法，無論什麼事情都可得人心，即使去送死人家也願意。」

此外還有一些戰略上的困難。希特勒的主要目的在於掠取奧國和默麥爾（Memel）按：戰前屬德，與俄交界，現歸立陶宛。這目的將來總有一天要達到（譯者按：掠取奧國已於一九三八年二月達到了。黑衣首相是奧國的保護人，意大利如果陳兵於伯倫尼要隘（Chamber Pass）按：戰前原為奧匈帝國舊境，現歸意國，由此入奧至德境，相距僅數十英里。）則希特勒即無法入奧。希特勒曾與波蘭有諒解，他不能在默麥爾舉行暴動，波蘭不願有人干涉默麥爾。默麥爾是立陶宛的領土。波蘭人有個敏感的觀念，除了他們自己以外，不許任何人觸動立陶宛。（按：自希特勒合併奧國以後，波蘭亦效法國、陳兵邊疆，迫立陶宛投降。）希特勒只有犧牲與波蘭所結的同盟，始能在默麥爾（和但澤）發動政變，而此舉又是他所不敢貿然出之的。

希特勒與蘇聯的仇恨，深得不共戴天。最近他對一個訪員說：「我們不會簽訂東歐多角互助公約，因為無論在任何環境之下，德國人不願意為共黨作戰。如果從事這種戰爭，那麼我們的國家就要停止前進了。要我簽訂這一種公約，我毋寧自己上吊。」這些話當然說得過甚其詞。沒有人會要希特勒為共黨作戰，也不容易使他與他們作

戰。希特勒慣於玩一套把戲，他放棄不會得到的東西，他恫嚇不能攻擊的國家。德蘇兩國並不接壤；德國只有借道波蘭始能侵入蘇聯，而波蘭又不許他國軍隊侵其領土。

他方面，德國的蓄意戰爭，卻可由種種原因看出來。第一是德國的創建新陸軍和新空軍。第二是德國要想擴張領土到中歐或東歐，只有靠賴戰爭始克達到這個雄圖。歐洲能夠長此忍受德國向外的壓迫而不抵抗嗎？暗底侵略奧國，威嚇立陶宛，煽動並勾結瑞士、荷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北歐、及波羅的海岸各國等處的日耳曼人，便可表現出國社革命潛伏着的爆炸力。德國的四面邊疆，都呈着從內向外發展的緊張。

復次，國社主義根本是種黷武的信仰，所以在德國產生了一種好戰主義的復興，不管希特勒願與不願，總有一天會向外爆發。如果德國的經濟破產，則爆發得尤其快。意阿戰爭的教訓就告訴我們：獨裁制度達到崩潰的危險時，戰爭就爆發出來了。五年以後，誰能料得到立陶宛不會成希特勒的阿比西尼亞？當沙赫特博士買不到原料的時候，情形將成怎樣呢？

戰後的德國是「無得國」(Have-Not)之一，因為她打了敗仗。但是她現在的政策，不但要收復從前的所失——以此而止，當然不能說不公平——並且要有更大的收獲。與德國接壤的一切條頓民族，都歸入第三帝國之內，這是國社主義的第一信條。換言之，先把奧國收入版圖，然後推及捷克、瑞士、丹麥、荷蘭，也許——終有一天——意屬帝洛爾、但澤、和波蘭走廊的日耳曼人。在國社主義看來，不是復興大日耳曼主義，便是一無建樹。

德國向外發展的意志，只能用「精神」因素來解釋，不能用生殖率的增加來解釋。所謂精神因素者，就是德

國應有享受日光照臨權，德國燃燒着的儲能應有一個出路。說到生殖率，如果從長期趨勢來觀察，卻只有減低而沒有增高。按照目前的估計，假定疆界維持現狀，則今日有六千五百萬人口，到一九七五年就只有四千九百萬人口。至於向海外發展領土的必要，那我們最好追溯到一九一四年時的情形：當時德屬殖民地中所有德國人的總數，只有二萬五千人，要比德國在巴黎的僑民還要少。

希特勒既敢與世界為敵，他就得小心考察他的目的物。我們應該記着：德國之不滿於凡爾賽條約遠在希特勒執政以前。外人控制德國軍權，廢除於威馬憲法公布，共和政體確立之初。萊因蘭外國駐屯軍，撤退於施德蘭斯曼（Stresmann）內閣時代。賠款付償，停止於白魯寧及巴本內閣時代。協約國在理論上承認德國軍力平等權，開始於巴本及施萊赫內閣時代。

希特勒緊步前輩的後塵，採取徵兵制度，收復薩爾區域（Saar），駐軍萊因蘭，廢除凡爾賽和約軍事條款。其間他又退出國際聯盟，放棄十年來對波蘭走廊的要求（此舉為使波蘭就範所必要）。他的進展使他付了很大的代價。一時他在各國人士眼中成爲「天花」一樣的可怕。終於他暫時與他的難友墨索里尼相分手，他嚇壞了丹麥、荷蘭和瑞士；他迫成法國的統一，因爲「法國的右派恨德國，左派恨希特勒」；他失去了正要到手的奧國；他驅使蘇聯法國和小協約諸國結成同盟來反對他，尤其是他把蘇聯拉入了國際聯盟。

有一件事情是他常常記在心頭的，那就是和英國必須結好，這是第一要着。如果英國不保持友誼或保持中立，則德國的積極政策就永遠不會成功。英國必須爲德國的後陣作掩護。

希特勒自己曾經說過：

「我們應該明白總而言之，德國的意志，不應長此限於僅僅消極的防禦，而應與法國作一次最後的積極的解決，以死爭取德國目的之實現。」

「只有殲滅法國，德國才能為我們的民族獲得向另一方面充分發展的方法。只有當二萬五千萬日耳曼人不像苦力那樣擁擠於一個工廠中而為自由的農民和工人時，我們的外交政策才是對的。」

「萬能的上帝呀，請降福於我們的武器！請你判斷我們是否應享受自由。主呀，降福於我們的戰爭！」

——「我的奮鬥」未刪本。

世界各國顯然處於進退兩難之中，而現在的進退兩難，正像一切進退兩難一樣，是極端錯綜複雜的。有一條路是可以走的，那便是讓德國強盛起來，但不要太強盛。德國顯然應該使其恢復她的自尊心。但是如果德國太強盛了，竟然要求再來一次戰爭，以作上次戰敗的代價，那麼怎樣辦呢？有兩件事是很明白的：一為德國是能把歐洲拖入一次大混戰的唯一國家，一為沒有人能肯定地說希特勒所抱的意向是什麼。

過去德國被待得「不公平」。我們承認，協約國以德先啓釁之罪的迷霧掩蓋天下耳目，侵犯魯爾區域，自己不遵守和約條文解除武裝而同時強欲德國履行，凡此種種，德國人的反對完全不錯。但是當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德國可不能抱怨他國待她「不公平」，而她現在的好戰，正像一九一四年時的好戰一樣，所以這一點是頗堪尋味的。

一九一四年夏的國際形勢，的確與一九三五年秋極其相像。當時包圍威廉二世的左右，猶如今日包圍希特勒一樣。威廉二世顯耀他的「甲冑鮮明」，希特勒顯耀他的「種族復興」。威廉二世以海軍向英國挑戰，戈林以空軍向英國挑戰。一九一二年哈頓爵士（Lord Halsane）報聘柏林的使命，可以比之於一九三五年西門爵士（Sir John Simon）欲知亞迦地（Aragidi），請看陶爾斐斯（Dollfus）；欲知薩拉弱伏（Sarajewo），看誰呢？

希特勒自己激烈地甚至熱烈地否認他要戰爭。請聽他對法國新聞記者的談話：

「目前歐洲的爭端，尚未達到非要訴諸戰爭不可的地步。……我非瘋子，戰爭不會解決任何爭端，戰爭反而使事態更趨惡化，戰端一閃，我們的種族，亦即人類的精華，就要滅亡，那時候亞細亞和布爾希維主義就要統治歐洲。……我在國內有一大批工作要做。我已恢復德國人的榮譽意識，我要更進而恢復其人生樂趣。我將需要好多年才能恢復德國的繁榮。你真以為我肯爲了再來一次戰爭而把我的工作放棄嗎？」

——「國際新聞公報」十卷十七期。

如果他不用戰爭而達到他的目的，他當然不要戰爭，而他現在對於戰爭的準備，當然尚未完畢。

四 三位外交家

外交部長紐拉特男爵（Baron Constantine von Neurath）本人並非爲國社黨員。當希特勒就任內閣總理的時候，奧登堡總統力持紐拉特仍留任外長，藉以防止國社黨外交政策的過趨極端。希特勒後來對於紐氏的

感情，日漸融洽，尤其佩服他對於國際關係判斷力的正確，所以直到一九三七年底為止，紐氏還是任着外長（按現由里賓羅甫替代）。他之所以能得希特勒的信任，多半由於他們倆的基本政策，完全相同，即對英修好。

紐拉特對於國社主義太過火的地方，雖則時常腹誹，然而在精神上，他卻和領袖一致。他生於一八七三年，登堡（Würtemberg）望族出身。最初他習法律，後入外交界，一步步按規矩升擢上去。在前總理巴本升他為外長以前，他任德國駐英大使。在德國要人之中，很少有人致力於政治以外的問題，但他卻是一個例外，他是一個很有修養的礦物學家。

紐拉特小心翼翼地保衛着威廉街冠蓋往來的客廳——外交部——不讓燥切野心的國社黨員插足。他以為外交職務應該由專門外交家擔任，國社黨外交主任羅森培，雖有德國「非正式」外交部長之稱，但想在紐拉特組織嚴密的外交部中安插幾個親信，卻始終沒有做到。

比紐拉特更接近希特勒的，是駐英大使少壯派里賓羅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他是領袖裁軍問題的主要顧問，一九三五年六月曾充任德國總代表簽訂英德海軍協定。因為這件功勳，他博得領袖的逾格的信任，除沙赫特而外，他是德國最接近希特勒的一人。他代表希特勒參加洛加諾談判，後來便立即升任駐英大使。

英德海軍協定之所以重要，有好幾個原因：（一）使德國重整海軍得到法律上的地位，並允許德國建立英國三分之一的艦隊，實際上就等於與法國平分秋色。（二）分化英法意三國在斯脫萊（Stresa）所宣佈的

「聯合陣線」(按即所謂「斯脫萊撤陣線」)(三)英國一方責備德國非法建設陸軍,一方面立即允許她合法建立海軍,此在德國人看來爲英國終於站在德國一方的表示。

里賓羅甫一八九三年生於萊因蘭,性情活潑,面貌動人,父親是個上校。他受過很好的教育,一半在英國受,一半在瑞士受,他的英語和法語說得一無瑕疵。這也是他受希特勒贊揚幫助他接近希特勒的一個原因,因爲希氏左右,能說外國話的人很少。里賓羅甫在十八歲時移居於加拿大。他決心在美洲創一番事業。據說他一度做過某鋼廠的體力工人,一度又做過蒙得爾銀行(Montreal Bank)的行員。

大戰發生時,里賓羅甫爲避免幽囚,逃出加拿大,他恐怕被捕,匿在一艘荷蘭船上的煤艙裏,回到歐洲;一到德國他便加入陸軍。最初他任東線的軍官,後來任軍部職員。戰事告終,他隨德國代表團當一名次要隨員到巴黎,後來離脫政界經營酒業。一九二〇年,他與安娜·韓克爾(Anna Henkel)結婚,她是德國香檳酒大王的繼承人。里賓羅甫的助號「von」得來很奇怪,是由過繼獲得的;他結婚後數年,有一位本族遠房伯母福祿倫(Frau Rein von Ribbentrop)因爲沒有繼承人,就把他嗣繼過來。

他在政界露頭角,開始於一九三〇年間。他雖非國社黨員,卻是一個熱烈的國家主義派;他遇到希特勒,希氏就看中他。這位有錢漂亮的小伙子,遊歷過許多地方,具有豐富的世界智識,他總有一天可資利用。他終於被利用了。原來一九三三年一月,布置希特勒與巴本在大銀行家許羅特的加羅涅別墅中會面,因而使希特勒得以成爲總理的,正是里賓羅甫。所以希特勒爲感謝他起見,就與他親近起來。

一九三四年，希特勒始重用他擔任外交使命，代表希氏在外國發表意見。於是「里賓羅甫派」便逐漸形成，在紐拉特正式外交部的後面或前面，成爲一種非正式外交部。他最初任裁軍問題專員，後來任全權大使。他在一九三六年來之出任爲駐英大使，的確很感棘手。他得對英國解釋德國在西班牙的行動，也許因爲過於熱心的緣故，竟會犯了奇特的冒失，例如對英王喬治六世行國社黨敬禮。他之過於直截引起殖民地問題，也大遭回擊。多數人並不以爲他在倫敦的第一年是成功的。

里賓羅甫有四個子女。他在公餘之暇常以奏小提琴自遣。

巴本 (Braun von Papen) 常喜於晨餐時批閱公文，故有「晨餐總理」之稱，他是希特勒的駐奧特使，現時仍有相當勢力。有一時期，他曾大爲失勢。這是無足爲怪的。他的基本政策，便是一個大錯，因爲他以爲他和國權黨可以控制希特勒，使其就範。他兩個最親近的助手瓊格 (Jung) 和蒲斯 (von Poso) 便是在他自己的辦公處裏被殺的。希特勒爲排除巴本計，於一九三四年七月與總理陶爾斐斯遇刺後派他使奧。一九三六年七月因談判德奧協定他一度回國。

瓊格原爲莫尼哈的一個律師，巴本極其依畀他。巴本自己很少有主見。他的演說都出自瓊格的手筆，最著名的便是瑪堡演詞。這篇演詞不但警告國社黨勿過趨極端，並且還說：「凡以斷頭威嚇他人者，往往是第一個被開刀。」這當然引起國社黨的老羞成怒，於是兩星期後，瓊格便被暗殺了。

一個人能坐視兩位至友爲了對他服務被暗殺，而自己還腆然接受暗殺他們的政府所賜予的新職祿，此人心肝尙得而問乎？

巴本手段之拙劣，不僅是瑪堡演詞一舉。只有最糊塗的人，才會像巴本那樣任命戈林爲他的助手，而希望把戈林玩於掌股之上。

巴本以寧靜、文雅、溫和聞於世。然而他的溫和，卻居然達到這樣一種程度，甚至抹殺一切理智，一切防閑，而尙妄自得計，妄自確信。

他在一八七九年生於威斯德里省維爾地方（Weri, Westphalia），曾任騎兵聯隊副官。他娶了一株搖錢樹，薩爾陶陶破廠主白嘉浩（Boch-Galhan）的女兒，婚後不久調任另一較好的聯隊。一九一三年，他任德國駐美大使館軍事參贊。由於他的職司的要求，他立刻幹起諜報工作來，可是像他那樣一個著名糊塗蟲和慣鬧風流過失的人，不配做這種工作。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美國尙未參戰以前，他和他的同僚鮑翼德上尉（Cap. Boy-Ed）終於被勒令離美。

巴本自己因疏忽而被累，已經是夠瞧的了，他還連累旁人也被一網打盡。德國間諜林德倫上尉（Rintelen）在其所著「暗敵」（The Dark Invader）一書中，對於巴本的疏忽，描寫得淋漓盡緻。德國的密碼，竟然會被美國間諜在他書記的寫字檯抽屜裏偷了去。因此美國得以偵悉德國外交部所拍發的電報，例如齊穆曼（Zimmerman）提議德國與墨西哥締結同盟一事，就是當時所洩漏的。

巴本不得不乘船回德。可是船到福爾摩斯港 (Falmouth) 時，他的祕密文件被英國當局所搜出，他以為帶着一張外交官的通行證總不至於會受搜查的。這位孟浪的德國軍事參贊，細心地保留着他的支票簿。美國境內一百二十六個德國間諜的名字，全用黑墨水寫在上面。原來巴本是專管付錢給間諜的。凡是積極活動分子和消極活動分子都可從他的支票簿上找到線索。

能夠從一個人身上而查出其他許多人，巴本而外從未捉到這樣一個人。他把他所經手中的賬目，詳詳細細記載下來，保留下來。他不但保存着支票的存根，並且連廢票也聚集在一起，所以支票背書的簽名人也成了可資尋跡的線索。此外，又查出幾十封半官信件，都好好兒按照號碼放在他的行李中。世界上竟然會有這樣一個不怕搜查的大膽漢，那真令人有些不可思議。

吃一次虧，學一次乖。這句格言對於普通人也許用得着，可是像巴本那樣糊塗自信的老爺官，卻不能適用。他回到柏林時，被派到土耳其軍中當聯絡員。英軍佔領了耶路撒冷，巴本上尉是逃走了——但他的行李車卻落在後面。這裏又發現了一堆祕密文件，其中還有一些關於德國駐美間諜的記錄，是巴本依然捨不得毀掉的。

但是從德國國家的立場觀察，巴本確有一件不可磨滅的功績：這比引進希特勒上台還要重要。當他初任總理的時候，德國重工業支柱亦即世界最強工業勢力之一的德意志鋼鐵托辣斯 (Vereinigte Stahlwerke A. G.)，金融大感周轉不靈。該廠最大股東弗力克 (Friedrich Flick) 把他所有股票都傾銷於市場上。最初大家以為法國鋼鐵資本家似乎會吸收得去。這件事激起了德國人對工業的愛國心。於是巴本政府便出來收買了弗

力克的股票至今德政府是全國最大工業機關的最大股東。

五 哲學家羅森培

從事實上講，遐邇聞名的羅森培，滿腹經綸的哲學家，也許比紐拉特、里賓羅甫、或巴本還重要。羅森培是國社黨的外務專家。他是希特勒最接近最親信的助手之一，一身而兼希氏喉舌「人民觀察報」主筆，國社黨國社政治部主任，「德國哲學觀察指導員」（全銜是 *Beauftragter des Führers Zur Überwachung der weltanschaulichen Erziehung der nationalsoz. Bewegung*）。

羅森培是德國最被厭惡的一個人。他的人緣很壞。他是一個避重就輕，鬼計多端，萬事懷疑，三思後行的人，正像希特勒一樣。他也是一個獨身漢，一位「以智勝人者」。領袖的意識形態，大概有一半出於他的頭腦，所以他的主張，值得重視。希特勒會允許他昇以外長一席，但後來又食言，這也是他時刻發牢騷的原因。

羅森培一八九三年一月十二日生於勒佛爾（*Reval*），當時屬俄國，現為蘇聯鄰國愛沙尼亞的首都。因此他是一個波羅的海沿岸人。正如海登說，「他的出身雖屬德國人，他的心理卻屬俄國人。」但這種心理是屬白俄的，不屬赤俄的。羅氏全部的哲學，意識形態，和事業，在精神病理學上分析起來，可說都是從恨極蘇聯的心理做出發點的。他曾習建築，正像希特勒所要學習的一樣，而且一度做過打樣教師；他最初在里加（*Riga*）現為拉的維亞首都）入學，後又遊學莫斯科。俄國革命發生時，他的一段生活就神祕莫測；有些人說他加入俄軍，有些人說他逃過

戰線加入德軍，且在東普幾場大戰中都參加。

一九一九年，他到了莫尼哈，當時那裏聚集許多營棍子。這時他像德國人之處少而像俄國人之處多；事實上他正像一個白俄的亡命者。他遇到國社運動的第一位「詩人」艾卡特（Dieterich Eckhardt），後來又遇到希特勒。他立刻以他的夢想，即在東歐建立一個德意志帝國，來迷醉希特勒的想像力，他成爲德意志領土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大預言家。

羅森培是國社主義的夢想家。但是在他想把幻夢化爲真實的時候，他就大大失敗了。他對實際政治唯一的冒險，發生於一九三三年五月，當時他自告奮勇，到英國作善意的訪問。他抵英後的第一樁舉動是獻卍字旗於無名英雄墓。英國人最講究這種細節，此舉竟然引起社會的嘩噪，於是他只得躡回柏林，從此就不會出過國門一步。羅森培有一部大作，書名爲「二十世紀的神話」（Der Mythos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這部巨著的內容，對於種族、政治和日耳曼主義，無所不談，無所不論。可是從第一頁翻到末頁，就沒有了一頁可以引人入勝的。

所謂「羅森培計畫」，就是德國東進的計畫。希特勒對於這個計畫，一直是不肯放鬆的。根據這個計畫，德國和波蘭應該聯合進攻蘇聯。結果德國將占領波羅的海各國，波蘭可分得烏克蘭，將來德國再從波蘭手中拿過來。戈林對於羅森培是深痛惡絕的。一九三五年國社黨在漢堡開會的時候，戈林會對施德拉薩說：「羅森培這個混蛋，讓他把大戰時在巴黎幹的一些頑意見告訴我們吧。」羅森培在一九三五年決定要建立一座紀念碑，紀

念四千個被查理曼大帝所殺的撒克遜人。他要爲每個撒克遜人獻上一塊花崗石，這種特別的花崗石，只有北普魯士才有出產，因爲照地理學上講起來，惟有那裏的花崗石才是古色古香，純粹屬於亞利安的（這就是亞利安主義應用於礦物學方面）。戈林一聽到這個計畫，便立刻下令禁止開採那種石頭。

羅森培又曾著過一本書，叫做「十一月罪犯」，其中對於沙赫特博士，曾有惡意的描寫。他責罵沙赫特貪污，並且膽敢向他挑戰，叫他不妨提起謾謗名譽的訴訟。但是這本書還是一九二七年著的，當時沙赫特尚未在希特勒那裏得勢。據「萬歲」一書第一九九頁說，現在羅氏書中關於沙赫特的部份已經刪去了。

正像其他許多國社黨人一樣，羅森培的精力，完全傾注於單純的意志上，專門從事一種確定的意志。例如戈林傾全力於建立空軍，斯德裏傾全力於消滅猶太人，羅森培傾全力於反對蘇維埃。

除了希特勒以外，羅森培的人緣是太壞了，但他的勢力卻很大。他是國社黨裏第一個大勢力。例如當與登堡行將逝世的時候，希特勒特地挑選他的私人衛隊褐衫軍——大半由白俄禁衛隊組成——擔任禁衛，以示隆重。他之所以得勢，完全靠希特勒的對他愛護，和領袖仰賴他的「主意」。

六 現款和信用

從表面上講，截至一九三七年底爲止，國社黨政府已經把經濟復興做到相當的程度。這大半是由軍備工業所促成的。失業人數已減到一、八七〇、〇〇〇人，僅較戰後最好的一年即一九二九年多六〇〇、〇〇〇人；而

工業生產量也幾乎回復到一九二九——三〇年的水準。但是這種繁榮，並非出諸天然，而是費了極大成本換得的。至於國家的經濟機構，早已千瘡百孔了。

一九二九年德國的出口貿易，總值約計一三、〇〇〇百萬德國馬克 (Reichsmark)，一九三三年跌至五、〇〇〇百萬，一九三四年更跌至四、一八七百萬。近數年來，一九三四年第一次有逆超，計達四〇〇百萬德國馬克。本來德國的工業，全靠國際貿易才能生存。但是因為德國馬克的金價上漲，各國的關稅壁壘高築，以及國際抵制德貨的結果，德國的國際貿易便減退下來。

但是德國對於進口貨，不得不付錢。德國需要原料極殷。她得輸入大量的生絲、樹膠、鎳、錳、鋼精、錫、紡織原料、錫、銅和汽油。德國以每一分現金和信用，大量買進這些貨物屯積起來。例如「德意志鋼鐵托辣斯向瑞典購入的鐵礦砂，從一九三三年八月的二四九、〇〇〇噸增至一九三四年八月的四七八、〇〇〇噸。德國進口的生鏢——一種主要軍需原料——較之一九三二年與一九三五年之間增三倍。此外，為求經濟封鎖時有充足的糧食起見，又講求種種方法努力使農業自給。

代用原料的搜求，研究不遺餘力。從鋸屑取砂糖，從馬鈴薯取澱粉，從木材和煤取汽油，從化學纖維取衣料，從回淘樹膠取車胎，從煤取人造牛油——這些不過是不幸的，但是愛國的德國人幾種代用品而已。

工資因為要強迫提出一部份付救濟費、勞工運動費、防空費等等，就無情地減少。例如銀行行員的月薪，本來有二九〇·二五德國馬克，但因種種「自動」捐款的結果，只有二四一·九〇德國馬克。據克涅克布克調查，發

現一個熟練工人，例如專門做裝配的，每週可得工資三九德國馬克——這在德國已算很高——但他所付的奇捐雜稅卻不下一〇·九五德國馬克。

即使如此，沙赫特博士從那裏得錢呢？他得付出進口貨的價值，投資於公共工程以救濟失業，應付整軍費，維持經常政府預算。他幾乎把最後一分錢也從德國納稅人那裏榨出來了。但他依然需要錢、錢、錢。據國外估計，每年軍備費就得要六〇〇百萬金鎊。他怎樣來付這這麼驚人的賬單？

大體說來，沙赫特似乎採取兩種開源的辦法。第一是向國內籌，即從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關募集內國公債，雖然這些金融機關幾乎被吸收得一無庫存了。內國公債實際上是強迫性質的。他拿了現金，付給你一張政府債券，價值不多不少，只以政府允付的數目為限。這些強迫公債——再加上次要項目，例如以較低利率收回從前共和政府所發行的債券而換發新券——其數當然不會少於德國全體人民的全部流動財產。德國人民把儲蓄換取公債以後，可以得什麼報酬呢？繁榮與和平。然而錢卻用到投資於鉅大的戰爭機構上。

第二是向國外籌，沙赫特博士的理財手腕可算空前的。他是現代捉住這樣一個主意的第一位財政專家；以為大債務國的地位，遠勝於大債權國。他從德國欠債這個事實弄到一大筆資本。毫無疑義的，沙赫特是當代最有能力的一位財政專家。他真正懂得錢。他所幹的玩意兒，也許是沒有遠慮的，但的確幹得很出色。他使德國成為「世界史上最成功的假破產者。」

他之所以能夠辦得到這一點，因為他想出一種付債進口貨的方法，使債權國自己來收回賬單。德國行家當

然欠英、法、美及北歐諸國的錢。這些國家的出口商，仍與德國做生意。沙博士對他們說：「向我們買東西，我們才能付欠債。如果你們不買我們就不付。」他一次次片面宣布延付欠債，同時又以全部停付相恫嚇，除非他多做生意。他說着：「向我買，否則你什麼也得不到，因為我付不出債，除非你再多借些給我。」

世界上往往有人願將好錢去換壞錢，因此德國就成爲這樣一個局面：用新的外債來發展她的軍械工業。下次戰爭德國可能的敵人是法、英、蘇和戰後新小國，他們一方面恐懼德國將來會擊毀他們，一方面又在那裏對德投資。這種過程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達到了最高點。當時大英銀行（Bank of England）「爲便利流通德國商業信用起見」核准對德放款七五〇、〇〇〇鎊，這就說使德國有方法（新借款）來付舊債——並建造能於七分鐘之內飛越英吉利海峽的飛機。

沙赫特博士在物物交換方面又玩弄了一套神祕莫測的戲法。例如他需要巴爾幹諸國的原料，但是他的錢袋裏最後一個金馬克已經用光了，這並不使沙博士喪氣。他親訪巴爾幹諸國的首都，並在那裏談判妥當，以貨物來付烟草、棉花和鐵物。巴爾幹諸國出口商——其他許多國家的出口商也是如此，南美即其一例——在柏林有大筆不兌現馬克的信用；沙博士建議以德國製造品，尤其是軍火作價，來清理這些馬克。因此，例如希臘便以烟草換取了鎊砲。當然這使德國對巴爾幹半島增加政治的和經濟的勢力。在這套驚人的把戲之上，沙赫特又加上一套壓軸戲。他「購買」原料是套空頭，並不裝到德國而以復出口的方式裝到他國，例如荷蘭，再在那裏「出售」而獲取現金或外匯。用這種外匯他可以向不願物物交換的國家買入原料。

七 錢袋沙赫特

希特勒費了很長的時間才找到沙赫特。他試用了好幾位經濟專家，而又把他們解僱。最初手頭能夠得到的人，例如羅森培，財政非其所长；戈林，經濟非其所能。希特勒的第一位經濟顧問是某退職軍官，名字大概叫做華格納（Wagner），此人被拘在集中營裏已有三年了。華格納以後，一位第二流工業家凱浦勒（Wilhelm Koppen）得了決定的勢力。凱浦勒倒後，由一位新野心經濟學家畢熙（Albert Piesch）莫尼哈商會會長繼任；他是先做希氏代表艾斯的「經濟顧問」然後升上来的。但同時沙赫特上台的時機已經成熟。

沙赫特一八七七年一月生於希萊斯維格邦的丁格立夫（Thingeliff, Schleswig）。他的父親非常醉心於美國民主政治的傳統，所以給兒子取個美國總統的名字，叫做 Hjalmar Horvoo Greeley Schacht。他的母親姓 Hjalmar，是個丹麥人。沙氏很以他的祖先含有海賊（Viking）的血統而自傲，所以給自己的子女都取上丹麥名字。

他曾在德國好幾個大學中念過書，並且得到了博士學位，後來在特蘭斯登（Dresdener）銀行裏屈就一個最低的職位，當管卷生。因為他又聰明又有大志，所以升遷得很快。他有一件工作是草擬每日商情報告，因為成績特別優異，竟被銀行董事用作決定營業方針的根據。所以到一九〇八年，他成爲副董事長。一九一六年他又入另一家與他們對敵的達姆斯泰國民銀行（Darmstädter and National Bank）任董事長。

一九二三年，馬克慘跌，他被任爲德國幣制改革專員；他發明用金馬克（Rentenmark）的方法，得救德國幣制，重趨穩定，未遭全部崩潰。爲報酬他的功績起見，政府任他爲德國銀行（Reichsbank）總裁；他已經拒絕過充任財長，因爲他認爲那個職位不夠大。他充任該行總裁，直到一九三〇年爲止。當時他爲抗議成立楊格計畫的海牙協定，提出辭職。一九三三年三月，希特勒又任命他爲德國銀行總裁。

沙赫特的爲人，抱着無限野心。在他決定輔助希特勒以前，他會有競選德國總統的心願。他是一個十足的投機分子。他是一九一九年民主黨的創立人之一，社會黨爲了他，是救馬克的人，所以也贊助他。當時競選運動有這樣一句口號：「救馬克的是誰？民主黨沙赫特博士！」但是早至一九三〇年，沙赫特已經看明白德國的經濟應走那一條路，於是他轉變態度傾向希特勒。他之接近希特勒是靠戈林作進身之階的。

名女記者湯布森於一九三一年春訪問沙赫特。他告訴她說，他要加入國社黨。她問他爲什麼緣故。他答：「因爲我信仰鼓勵德國民族主義的一切。」湯布森女士說：「但是希特勒一握權，國社黨可不能把國社黨的財政和經濟管理得好好的。誰會管理呢？」沙博士回答：「我會管理。」

他任德國銀行的總裁，年俸是三十萬馬克。這在德國可算一種最高的收入。他把十分之九的收入，儲蓄起來。如果他要的話，他很可能可以做經濟部長，可是部長的年俸只有三萬八千馬克，所以他情願做銀行總裁。

正像許多希特勒派一樣，他並無特別的私生活可資敘述。他在鄉間有一座大莊園，但他住在銀行裏。他的硬領很別緻，高得和下頰相齊。他喜作漂亮的談話。他是一個冷靜機智而幽默的人。他的權勢，第一是靠他驚人的才

幹，第二是靠他對政治經濟採取絕對冷酷的投機主義。沙赫特在兒童時代，便懷着將來要做一個詩人的志願，他有一首配上曲譜的歌詞，到現在還流行着。歌詞如下：

「我是一個著名音樂家，

全國人人都愛戴。

當我到了小鎮裏，

男女老幼盡開顏。

我輕撫慢挑小提琴，

先奏舞曲後歌情，

當那人們歡聚時，

到處我都受歡迎。」

沙赫特不但是希特勒的錢囊保管人，並且使自己成爲希特勒與德國整個經濟生活之間一個不能分離的連鎖。例如新設立的德國經濟會議便是由沙赫特所控制的。在理論上這個會議包括勞工陣線，會員達一千五百萬人，每年會費收入達一萬萬德國馬克。

沙赫特當然不爲哥培爾及「左派」極端分子所悅。他完全知道排斥猶太人的無理舉動，足以損害德國的出口貿易。一九三五年八月，他在王堡痛斥排猶的瘋狂行爲，故被哥培爾扣留了演詞，不許在報上發表。他告訴他

的朋友說：他的前程，不是引他得到一座紀念碑，便是引他上斷頭台，但他不知道將來究竟是那一樣。（按：一九三八年二月，他走上後面一條路了。）這種衝突，正像黨內的紛爭一樣，永無底境，因為國社運的本性，原是一個大矛盾。一九三六年沙氏就任經濟部長，還是由戈林做擋箭牌的。

大資本家的包圍沙赫特，正如他們包圍希特勒一樣，但沙氏並不受他們的支配。他從來不受任何人的支配。我們也許可以說：希特勒「保護」資本主義，為他的大資本家朋友而拯救資本主義。但這與實情相去頗遠。希特勒並不是金融資本的嫡系朋黨。正如湯布森女士說，如果私人利潤干涉國家的安全，則私人利潤應被一脚踢出去。大資本家並不贊成希特勒的欺詐手段，他們知道國社主義雖然延長資本主義的生命，但又要求資本家的重大犧牲。

截至目前為止，希特勒和沙赫特只做到一個法西斯國家的皮毛。大家都說得唇焦舌爛了：國社主義「是一種信仰，不是一種主義」，是一種國家主義的復活，是一種「抗議與絕望的廣大民衆運動」。牠就是資本主義這隻老狗，從國家主義的圈套裏奪圍出來的。牠為「希特勒國」的緣故，開發德意志全國的寶藏。

希特勒對經濟不感興趣——那就是沙赫特得勢的一個原因——但他也許毀在經濟上面。德國經濟危急的實況，不容等待希特勒輩、沙赫特輩和希森輩。沙赫特如果失敗了，希特勒可以另外找一個沙赫特（一九三七年九月沙氏行將失勢，而由他人代之的謠傳甚盛）。但根本難關仍然未去。德國必須供給六千五百萬人民的糧食；必須借得足夠的錢或輸出足夠的貨來支付進口貨；她是靠着製造原料為生的，但是金融上的把戲無論你怎

樣變來變去，終改變不了購貨必須付款的鐵則。

希特勒的清算日行將到來——或用黃金來清算，或用鎗砲來清算。

第八章 萊翁白魯姆

一、第一個印象

萊翁白魯姆 (Leon Blum) 住在塞茵河畔堅路易州的社會黨巨子，在今日全世界法西斯與民主主義鬭爭中，已成爲舉足輕重人物了。這位清秀的好講究的文人，週圍時常放着些美觀的書籍和精選的藝術品，他在目前歐洲，對於抵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黑衫軍，民衆宣傳，以及排除異己的清一色政治，無異爲一中堅份子。他思想，去對抗行動。他以智慧與學術的銀刀，去抵抗那武夫的鐵拳。他以微弱而動人的聲調，去對抗那獨裁者的狂吼。他處在象牙之塔中，設法去抵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這兩個販夫走卒。

萊翁白魯姆，不消說也是一黨的領袖；並且不止於此，他同時也是人民陣線的領袖。所謂人民陣線，乃是包含幾個政黨的一種自然而生產的民衆運動。左翼各黨，在某一時期和某一場合，會聯合起來，這可說是歷史上必不免的。左翼的合作，或竟合併，對於右翼的連合，乃是唯一可能的答覆。人民陣線的觀念，因爲陶爾斐斯的獨裁而首先發生於奧地利，接着便傳播到了薩爾和西班牙；最後則在民主思想與理性思想之本流的法國，得到了初步的成熟，這件事是巧合的；更適巧的，就是做領袖的萊翁白魯姆；在他的性格和知識等各方面，處處皆與希特勒及

墨索里尼正相反對。

白魯姆既爲羣衆運動的領袖，而本身卻不是羣衆中的一員；其弱點在此，其優點亦在此。

多年以來，他又不是一个慣會弄政的人。有一个駐法大使，在他第一次謁見白魯姆以後，出來對人說道：「感謝上帝，新總理並不是一個政客！」

在白魯姆剛任國會議長以前，英國外相艾登去訪問他。他們把政治及國際形勢的談話告一段落之後，接着改變了談鋒。這位老社會黨員和青年的英國外交家閒話了一小時之久，又討論普魯斯（*Pruss*）的著作。

白魯姆掌政一個星期之後，他有一个政敵嘆着說道：「萊翁到底是一個貴族的紳士。」他好像對於白魯姆的上台，表示寬宥一般。

一九三六年七月，白魯姆赴倫敦，和洛加諾條約的簽字國代表討論重要問題；在討論結束之際，他便一溜烟跑到大英博物院去。原來他伴同女友比拜斯科郡主（*Princess Elizabeth Bilsco*），去再度欣賞那永久美觀的雅典時代的大理石雕像。

作者有一位住在巴黎的朋友，他曾參加白魯姆受任總理時的慶祝大會，我想最好把他來信中一段摘在下面，以見白魯姆和他所領導的政黨之間的關係。

「大廳裏面擠滿了羣衆，他們差不多都祇穿着短衫。空氣是混濁而嘈雜，這班聽衆，很少不是粗魯的。一時「國際歌」和「革命歌」齊發。忽然起來了一陣奇怪的吼聲，在叫囂的，擁擠的，汗臭的，開路先鋒的包圍之中，走

進一對夫婦來。女人身材短小，服飾整潔；男的身材瘦長，服裝樸素，頭髮已經灰白了。兩人都戴着夾鼻眼鏡；在這種叫吼之中，他們倆都像很生疏的樣子。這便是白魯姆和時常跟着他的白魯姆夫人。

「一位上年紀的法國社會黨老前輩白拉克（Balca），站在講台上面，白魯姆忙去擁抱他，和他親過左頰再親右頰，好像學生遇見崇愛的老師一般。白拉克在準備演說，而白魯姆卻聚精會神的，去問候朋友，帶着笑容向各處打招呼；他談話的聲音很快很低，態度溫和而慈祥，他心中好像沒有什麼事體，他似乎沒有準備要發表一種劃時代的重要的政治演說。他好像在客廳中招待賓客一般。

「白拉克開始講演了，白魯姆便沈默了下來，他頹然的坐到椅子上，他用一隻枯瘦的手遮住了面部，好像要避開那反射燈的光線似的，在他左邊的白魯姆夫人態度表現得堅決、生動、愉快、和無限的保護的情緒。接着白拉克演講的是畢加摩斯夫人（Mme. Gormaine Picard Mouch）。她用了若干玄妙的譬喻，弄得一般羣衆莫明其妙。白魯姆自己很明瞭，於是躺在椅子上，很高興的鼓掌表示讚美。羣衆本來聽不懂，所以沒有鼓掌，但在白魯姆的領導之下——當然是非出自動的——一齊鼓掌了。掌聲先從講台上發出，接着才充滿了全堂。歡呼遲遲開始，到後來才喊得震天價響。

「摩斯夫人演說的意思，是呼籲婦女參政；當她講完時，講台上的座位都給人家坐滿了。白魯姆首先發覺了這件事，便很快站起身來，把自己的座位讓給摩斯夫人，並在讓位之際，去吻那位太太的手。對於勇猛的、喧嘩的、頑強的、動態的人民陣線，這樣的領袖確乎很奇怪……他是一個貴族式的人物，然而因為他有忠厚的良心，和淵博

的學識，羣衆接受了牠……

白魯姆不是慣會煽動的政治家，又不是糾糾武夫。他絕端的缺乏個人的野心；他不是投機分子，也不是冒險分子。他的青春已經過去，然而歷史卻要他至少充任一種任務，乃至於兩種任務。法國自歐戰以來，是世界上一個很重要的資產階級的國家；他在這個國家中，做了左派聯合政府的第一個領袖。在今日這種狂暴無理性的時代中，法西斯像容易傳染的黃水瘡一般，擴展到德國及意大利的國境以外，而他卻代表過去時代的氣息，學者精神，智識超脫和人文主義。

二 思想的轉變

白魯姆一八七二年四月九日生於巴黎。法國的政治家，從巴黎出生的爲數很少，白魯姆和他的那位執拗的政敵泰狄歐 (André Tardieu)，可算是例外。白魯姆的家庭，原從亞爾薩斯 (Alsace) 移來，他的父親是一個有名的絲帶商人，在九四路上 (Rue du Quatre Septembre) 的營業，過去曾經享有盛名，並且至今還未收歇。不過因爲裝飾品時尚的變遷，已經不像往日那樣繁盛了。萊翁共有兄弟五人，他父親去世之日，即將店務交與五人共同管理。惟萊翁及其另一幼弟拉南 (René) 旋即擺脫店務，留交其他兄弟三人。拉南現爲蒙特加羅 (Monte Carlo) 歌劇團的藝術導演。大家都知道他出身於猶太人的家庭，白魯姆一族的家庭觀念很深。萊翁並不是一個正統的猶太教徒，但是朋友們俱稱他爲「善良的猶太人」。他們五個兄弟，每年在他父親的死忌，很虔敬的會面一次。

萊翁的外祖母，當年是一個有名的婦人，——一個批評家。她失明已經多年，可是仍在巴黎「市島」(Ile de la Cité)開一家書店。她的激進思想很深，一有機會便滔滔不休的表白出來，每星期得舉行兩次政治談話會。白魯姆少時對於外祖母非常愛敬。雷那特戲劇家(Jules Renard)曾在自己所辦的雜誌中，記載白魯姆侍奉祖母的情形。他說：「萊翁真像孝子一樣的侍奉她，告訴她有什麼好吃，爲她預備伙食。她失明了三十六年，而萊翁則爲她說明各種情形，彌補她的缺陷。……」一九〇一年萊翁還會在假期中帶她到意大利去旅行，他用透切的說明，使她能領略沿途的景象。

白魯姆的母親，對於猶太家庭之團結，忠順及親睦等傳統的道德非常重視；她的丈夫是個商人，她卻是個智識分子，她極端信仰正義，博愛等美德。據傳當白魯姆五兄弟幼時，她把蘋果分給他們，每人各得兩個半隻，而這兩個半隻的蘋果，又是從不同的蘋果上分下來的，牠認爲這樣才可以達到公平的原則。白魯姆時常以崇拜的情緒去回憶她，有時以生動的言詞敘述她的往事。不過白魯姆對於家庭的生活不大願意向外發表，假如誰去詢問他關於這方面的事件，他多半被他婉詞謝絕。

白魯姆在青年時代，大家知道他的美貌，聰明和博學，例如雷那特的雜誌上，曾有下列兩條記事。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一日，萊翁白魯姆，一個額骨平平，聲似女郎的青年，他能連續兩小時背誦巴斯加(Pascal)白魯葉(La Bruyère)聖愛弗蒙(St. Evremont)等古典作品……」

「一八九八年，(在法梭達 Tashoda 事件發生之際)萊翁白魯姆以正確流暢的言詞解說英法戰爭之

悻悻。像他這樣一個年青美貌討人歡喜的小白臉，正應該花天酒地的遊蕩，可是他卻很通達的討論着這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白魯姆對於古典文學和人道主義的智識，皆曾受過高深的教育。他先進查理曼公立中學（Lycée Charlemagne），接着又進亨利四世公立中學（Lycée Henri IV），在那裏從柏格森（Henri Bergson）研究哲學，最後則進高等師範學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這個師範學校，在法國各學校中是最著名最嚴格的一個。惟有著名學者經過嚴格的考試以後，才能入學。赫里歐（Edouard Herriot）就是在那裏與白魯姆同學的。他在這裏，後來得了哲學和法學兩個學位。他當時又是一個有名的決鬥家，想和他爭勝的人雖然不少，可是在一位敵手被他擊傷以後，便沒有人再云向他挑戰了。最近有一張影片描寫白魯姆一生的事業，其中有一段關於他在當年決鬥時的景象；他的體格看來柔弱而溫和，然而具有敏捷的鋼鐵般的拳頭。

他的事業，是從多方面發展的。他一方面做律師，一方面做文人，就有許多年。他早年對於政治即感興趣，可是直到歐戰白熱化時，才參加實際政治。因為是律師，他得做法國樞密院（Conseil d'État）的審查官。樞密院是法國司法上的最高機關，等於法蘭西的最高法院。牠對於國會所通過的法律，雖然不能宣佈其為非法，但在法律實施的時候，卻有調整法律不公的權力。白魯姆從這裏一直升到了副審查長（Maître de Requêtes），負責經辦有關國家的案件。這已經是他所能達到的文官系統中最高的位置了。

同時，他對於文學和新聞事業方面，依然很努力。他常在報紙上和雜誌上發表論文，在他筆下還產生許多整

本的書。他是巴黎城中著名的文士，當時蜚聲文壇的伐勒里 (Paul Valéry)、馬拉梅 (Mallarmé)、基特 (André Gide)、裴那特 (Tristan Bernard)、雷那特 (Jules Renard)、勒邁特 (Jules Lemaître)、白里歐 (Brieux)、居德 (里父子) (The Guirys)、普魯斯 (Proust)、加布士 (Gauts)、法朗士 (Anatole France)、貝斯丹 (Benstein) 等都是他的朋友。他非常愛好戲劇，最初任「白色評論」(Revue Blanche) 一份前鋒的文學刊物) 的劇評人，接着做晨報 (Matin) 的劇評人，最後則做官辦劇報「喜劇報」(Comœdia) 的劇評人，他出版的著作有六部：一部是論婚姻——在這裏他發表了他對兩性平等的信仰——一部論史丹哈爾 (Stenhal)，一部評論愛寇曼 (Eckermann)。

白魯姆青年時代是一個律師，一個審美家，一個哲學家，在他過去的生活上面，現在籠罩着一塊馬克斯的大黑影，在他舊時的朋友中間，馬拉梅離開了莊康大道走進象徵派，法朗士退隱於諷刺派，而白魯姆則變為社會主義者。他的血液之中的，確是流着社會主義。他之所以改變思想，成爲一個後天的和先天的社會主義者，是由兩個人和一件可怕的事實，結合起來造成的。那兩個人物之中，一個是高等師範中信仰社會主義的圖書館館長海爾 (Lucien Herr)，一個是法國現代社會主義創建人喬萊 (Jean Jaures)。至於可怕的事實，則爲德雷福案 (Dreyfus Case) 按德氏原爲猶太血統的法國軍人，一八九三年因出賣國防機密文書於德國的嫌疑被捕，此事曾在國內掀起政治上的一個大風波。(據白魯姆自稱，他受了海爾「莫測高深和空前絕後的力量」的感應。一於是成爲德雷福派的一員。他又經海爾的介紹，認識了喬萊。那時白魯姆仍然是個花花公子，由身上直到指尖上都

裝飾得很講究，喬萊則一向不修邊幅，以一天到晚睡疲於手帕著名。在德雷福案的過程中，他們兩人始終結爲堅強的同志。白魯姆發現自己不單對於戲劇有熱烈的感情，同時也崇愛社會的正義。他不再寫批評戲劇的文字，而閱讀索勒爾 (Sorel)、蒲魯東 (Proudhon) 和馬克斯的著作。喬萊把他帶到十字街頭，使他看到市民的實際生活狀況。他這才第一次觸到無產階級的巴黎。而喬萊那種如火如荼般的熱情，對於他的影響更大。於是在一九〇六年，白魯姆便和喬萊兩人，共同創設一份社會主義的日報——「人道報」(L'Humanité)。

白魯姆的政治生涯，便從此開始。他在人道報上，天天發表一篇社論。喬萊憑他一張利嘴，白魯姆憑他一支利筆，兩人就這樣一唱一和合夥起來。最初，白魯姆仍留戀着文學，祇願意作純文藝的參與。喬萊要求他爲議會發言，他沒有答應。據他的朋友表示，就在那個時候，白魯姆如果肯爲某一候選人鼓吹，則該員一定可有當選的希望，猶如美國籃球啦啦隊爲球員打氣一樣。剛在歐戰爆發之前，喬萊遭人暗殺。一個月之後，白魯姆終於變爲政治運動者了。他穿起了喬萊的外套。不過他之繼承喬萊的衣鉢，並不像一個副領袖繼續正領袖的事業那樣，而是以一個朋友的立場，繼續了故交的舊業以資紀念似的。白魯姆既非好事，又非懷着野心。可是喬萊已經死了，喬萊曾經勸他參加政治，如今他終於參加了。他參加政治不久之後，就被任爲工務部的政務次長，當時該部部长爲桑巴特 (Marcel Sembat)，也是一個社會黨員。這就是白魯姆於二十二年以後——一九三六年——就任總理以前唯一的實際行政的經驗。

歐戰以後，他以塞茵 (Seine) 區代表，當選爲議員；在那個時候，社會黨被選爲議員的，爲數比較還很稀少。此次

競選，正像差不多在同時候的英國所舉行的煽動人民戰爭熱情以求信任政府的那次選舉（Kilnaki Election）一樣。一九二八年白魯姆競選失敗，迨至一九二九年再以那爾旁（Narbonne）區的代表資格，當選為議員。同年他又被推為法國國會中社會黨代表團的主席。當時「人道報」變成了共產黨的機關報，白魯姆於是另辦一新報，這就是「人民報」（Le Populaire）。他差不多每天要為這份社會黨的正式機關報撰一篇社論。因為是個社會黨的領袖，他非常堅決的拒絕參加歷屆急進派所組織的內閣，他曾經說過：他不負責任，就不接受權力；沒有權力，決不接受責任。他的態度，既是異常堅決而不妥協，所以在三〇年代最初數年差不多有人當他是個政治上的怪物——一個社會黨的領袖，居然提到做官就要面色驚得灰白到了一九三六年，社會黨第一次成法國各黨中最大的一黨，大家推他做內閣總理，他承應了；在十七年不願做官之後，他終於接受了職位。並且差不多就在十七分鐘之內，法蘭西便大踏步走向一種新的途徑。

三 個人生活

白魯姆夫婦，住在聖路易州（Ile de Saint-Louis）中，面對着塞茵河，是巴黎最古雅最可愛的處所。人們傳說，萊翁富於資財，其實這話並無根據。他們置有許多的書籍並且居室內的各種陳設，正如法國人所謂「都是精選的，可是這種雅緻的鋪排，卻算不得奢華。有人以為白魯姆集有大宗銀器，並且請他出借若干，參加展覽；但他因為除了僅足供自己中庸的餐桌以外，並無多餘之物可資出借，結果未能答應。白魯姆夫婦在遷入現在的居所以

前，曾經看中了陶賽碼頭 (Quai d'Osney) 按：在巴黎塞茵河中段南岸，為法國政府機關所在地，普通常以之為法國外交部的代名詞的另一住宅。那座住宅，曾為從前做過總理的班樂衛 (Paul Painlevé) 所住過。房東對他說：「我很高興把房子租給你，但是以前班樂衛住在這裏的時候，新聞記者和政客們成羣結隊的來看他，這種情形我不喜歡，我怕你將來有一天也要成為國務總理。」白魯姆回答他說，這恐怕是不會有的事體。然而他不願在房租契約上，訂明將來不任該項職務，於是交涉便告破裂。

現今的白魯姆夫人，是他續娶的太太。他的第一個夫人，是劇作家保羅杜加斯 (Paul Dukas) 的姊妹，長久與藥檯茶爐為伴，前幾年才逝世；她生下一個兒子，現在「伊新巴奴——許查工廠」(Hispano-Suiza Factory) 中任事。至於第二位夫人，並未生育。現在的白魯姆夫人，從前聞名為戴蘭·貝萊拉小姐 (Mlle. Therèse Peirena)，是社會黨中一個重要分子，並且是一家裝璜公司的職員。他們的婚姻生活是非常愉快的。白魯姆夫人到處陪伴着他的丈夫，在任何一個政治集會中，她總是隨着他。在白魯姆就任總理的前夕，她差不多成為他的「機要祕書」了。現今白魯姆的祕書，名字和他很相近，叫做白魯姆爾 (Blumel)。

白魯姆的辦公地點，是瓦雷尼路 (Rue de Varenne) 的馬帝農飯店 (Hotel Matignon)，講起這件事的歷史來，倒也很有趣的。牠在十八世紀巴黎的許多特種旅館中，是最著名的一家，建築非常壯麗，前面有高大而堅固的大門，庭院中鋪着滑石為路，路旁柔草如茵，花木繁茂。在歐戰以前，是奧匈帝國駐法的使館。一九三三年佛蘭亭 (Blanchin) 擔任總理的時候，他感覺到法國的內閣總理，除非自己兼任部長的職務，簡直沒有辦公室，沒有做

事的處所。於是頒佈一道法令，把馬帝農飯店像英國唐寧街十號一樣，永久作為總理的官舍。那裏設有起居設備，佛蘭亭即會宿在那裏；但白魯姆卻喜歡住在家裏。

白魯姆日間公務很忙，但晚間則擺脫公事，從事閱讀和研究。他每晨八時起身，親自閱覽報紙，在早飯以後，接見關係最密切的左右，大概十時半就到馬帝農去辦公。他時常回家吃中飯，飯後即回辦公室作事，直到八時半才告結束。他一向不去參加宴會。他已經六十五歲了，身體又不十分康健，所以頗有節省精神的必要。他也很少走進戲場，他最近所看的一齣戲，為「國慶日」(Le 14 Juillet)，是個愛國的劇本。他的睡眠很安適。枕邊讀物為巴爾什克及聖西門的作品。

他辦事的方法，並不按部就班，然而非常精到。他極愛作筆記，不但把自己一時的心得記下來，即使別人的會話也都寫了下來。無論在汽車中，飯桌上辯論時，飛機裏，乃至於開會的時候，他一旦想到了什麼，立即就從衣袋裏摸出筆記簿子來，拿起鉛筆飛舞着。假如手頭沒有筆記簿，他便從近旁隨便找些紙頭，有時且會利用新聞紙。因為他覺得無論什麼事情，都得立刻記下來。他所作的筆記非常多，他把牠們仔細校閱，分類，並保存。有許多東西，是在就寢之前寫成的。而他的演說、論文和辯辭，都以這些筆記為依據。

他的演說非常之明朗，用語極其清晰，給與聽衆以深刻的印象，他之所以能夠如此，實在得力於事前的一番細心預備和筆記。

白魯姆之當選為衆議員，原是代表那爾旁選區；那爾旁是個農業區域，並以出產葡萄酒著名，然而白魯姆卻



白 魯 姆

不喜歡酒。他的食量很適中，不像外長戴爾波（Delbos）那樣的貪吃。他吸用國貨 Citizens 牌香烟，這種香烟的尼古丁已經抽出，所以氣味很和潤，二十支裝每包約值三個半法郎。他每日要吸一兩包。他愛紙牌中的一種「過橋」遊戲（Bridges），但很少時間玩。他戴着一頂黑色拉丁式的大方帽。他喜歡和人交談，不過英語和德語講的並不十分流利。他的朋友很多。他在社會黨之中，是唯一能得到邦恩加雷（Boncompagni）青睞和讚譽的人。他並不厭恨任何人，可是他與那野心勃勃的達拉第（Daladier——可說是他一個重要的合作者）——意氣不十分投合。

四 性格

白魯姆的品性，除了可親、好潔、和博學之外，還有超越的忍耐。談到他的忍耐，例如上面已經提到，他在未能遵照自己的條件以前，長期拒絕擔任閣員。另外一個例子，便是一九三三年新社會黨員（Neo-Socialists）的背離事件。當時白魯姆屬下的三個有能為的黨徒，即馬奎（Marquet）、戴亞（Daut）和勒努德爾（Renudel）三人，對於他的「僧侶般的」態度和偏重理論的事實感到厭倦，聯袂要求他改取更積極的政策，並放棄國際社會主義。他們向白魯姆當面吵鬧了一會，便和他脫離關係了。白魯姆對於他們的行為，沒有多講什麼，他仍舊願意等待。到今日，那所謂新派，早已沒人過問而被忘卻了。馬奎還算做着鮑爾度（Bordaux）的市長，戴亞已經不在國會，而勒努德爾則已逝世了。

白魯姆的頭腦極機警，他雖然並不刻薄，但卻巧於辭令。有一次邦恩加雷對一羣朋友說道：「我臭到了戰爭的氣息。」白魯姆聽了祇講一句話：「那末請他把自己去消毒一下好了。」

他對於自己所認為合理的事，便不顧一切的做法，可算非常忠實於自己的認識。法國的政客，能不犯貪污的，可說是鳳毛麟角，而白魯姆則與這一類不名譽的事件絕無瓜葛。某次他對雷那特說：「於心無愧者，才是自由人。」他的態度極和善，頗能與民衆合得上，雖然其間保持相當的距離。他就是對於賴伐爾（Laval），也用唯唯諾諾式的詞藻。不過世人不能因此說他是個滑頭。他對於政治傾向的分析，可謂極端精透；早在一九三三年，他已經暗中感到他的前途，是要走上人民陣線了。

直到一九三六年的夏季，人民還嫌他是一個不能實踐的理論家，然而接着白魯姆的提案，在國會中捲起了狂風暴雨；他們這才打碎了以前的信念。

他的演說過於合理與精密，所以不宜於發表演說向羣衆宣傳的演說；他能否變成一個民衆的英雄，乃是一個疑問。他是太隔離，太用腦筋，太嚴肅了。他還須磨練自己，要學得白里安（Briand）一般的謙卑，或則像老虎總理 克勒蒙梭（Clemenceau）一般的鋼硬。在若干人看來，他並不是一個戰士；因為他祇有觸鬚，而沒有肩膀。他的實際行政的經驗，未免太少了。一個做總理的人，須有堅強的體格，據一般人看來，他的體格是太弱了。（一九三六年春他曾被復辟派暴徒狠狠地打了一頓。）

正當法國多數民主派的政治家，成了一般笑罵資料的時候，正當法國的廣大羣衆，非常憎惡巴黎一大半政

客的貪污，缺乏效率，投機取巧，以及崇拜英雄的時候，白魯姆卻能出類拔粹，潔身自好。凡是了解他的人，對於他的清廉的心地和行爲，莫不加以尊敬和贊揚。

剛在白魯姆就任爲總理之前，他在薩勞居士 (M. Sarrault, Mgr.) 的會客室中趕到了教皇的聖使馬格聊翁居士 (Monsignor Maglione)。馬格聊翁表示頗願意與他結交，說道：「我立刻就要離開法國，（他要到羅馬去做主教，）我在沒有和萊翁白魯姆握過手以前，我不能起程。」於是他們交談了一兩分鐘。當馬格聊翁告別的時候，白魯姆說：「我很想請你爲我祝福，但是不敢。」那位聖使想了一下說道：「我將轉請上帝，請他爲你祝福。」

五 人民陣線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七日，法國社會黨全國大會，在經過許多心理上的準備，和一年熱心的調協之後，卒以三、四七一票對三六六票之絕大多數，通過了共產黨方面的提案：建立反戰反法西斯的共同行動政綱。此次兩黨合作的草約，是由十個社會黨員和十個共產黨員的聯席會議所起草的。於是所謂人民陣線 (Front Populaire) 卽告成立。人民陣線之所以能夠產生，有兩個主要的原因：（一）爲對於希特勒之畏懼，（二）爲莫斯科共產國際 (Comintern) 之採取新政策。該項新政策，決定暫時放棄世界革命的意旨，准許法國共產黨站在愛國的，非革命的基礎上，去參加國會選舉。

法國共產黨領袖青年礦工韜雷 (Maurice Thorez) 曾經發表過聲明，說他和他的黨員，並不認爲人民陣

線是實現社會主義化的工具，更談不到是共產主義的工具。（見一九三六年七月八日泰晤士報）他希望共產制度在法國終有實現的一日，但謂其形式必為具有法國色彩，而非抄襲他邦的。韜雷的動機很為明顯，就是法國強盛而統一，方為蘇俄對抗希特勒之最良的同盟，所以共產黨不欲發動內戰，以削弱法國的實力。

就白魯姆方面而言，也贊成共產黨的動議，於是若干年以來，互相猛烈攻擊，各自要求絕對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便互相協調起來，並草議一種共同的政綱。那些網領，在當時看來，好像是過分野心與空想。其中包含着改組法蘭西銀行，軍火工業之國有化，解散法西斯聯盟，保衛（奇怪得極）法郎，四十小時工作週，集團論價等項。此外他們還決定在競選的時候，他們的投票人應該盡力支持那些左派主要候選人，不論其黨籍如何。

法國在一九三四和三五兩年，國情混沌而式微，希特勒的勢力，屢屢乎向外擴展。佛蘭亭、賴伐爾和薩勞諸位內閣總理，俱因國內經濟問題之紛擾而無所能為。賴代爾的「節儉令」，徒然降低了每個法國人民家庭的生活程度；斯達維斯基（Stavisky）大騙案及二月暴動，使法國內部的創傷更為深刻；洛克上校（Colonel de la Rocque）所領導的火十字團（Croix de Feu），更使人們對於法西斯政變的恐懼，日益增加。迨至一九三六年三月，又發生了希特勒進兵萊茵區域的事件。於是法國感到戰慄，要求有所轉變。所以四月二十六號及五月三號的兩次選舉，左派皆得了壓倒的勝利，而把人民陣線擁上了台。白魯姆以各黨聯合中最大政黨領袖的資格，就任為第三共和國第一任社會黨總理。

左派各黨，在下議院中共得議席三八一席，右派合計二三七席，白魯姆以急進黨（類乎英國的自由黨）及

社會黨組織政府，同時並得共產黨的支持。共產黨在國會中勢力，由十個議席增加至七十二席，然而不願參加組閣。他們這種地位，就和白魯姆的社會黨對於以前各屆內閣的態度差不多；即在政見相同的條件下，以左翼集團的資格，襄贊政府。不過也有不同之處，就是白魯姆的政綱，是共產黨經由協定的手續而同意的，而白魯姆對於前此急進黨員赫里歐及達拉第等所組之內閣，則一向未曾表示承認其政綱。可是無論如何，白魯姆必須拉攏共產黨，最近他在私人談話中曾經表示過：「假如我有充分的時間，我準能實行我們要做的事。假如我的左翼方面的朋友們，不是迫得太急了，我儘有時間。我有辦法對付激進黨。我更不怕右翼方面的敵人。」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白魯姆剛剛走進了馬帝農總理官邸，立刻就遇到了大規模的恐慌，原來左派工人都起來罷工了。據有經驗的觀察家表示，其性質完全是出於自動的，並非是社會黨和共產黨所唆使或組織起來的。各業工廠的工人，一個學着一個，好像精神上的傳染病似的，把生產工具放下來，直到法蘭西全國的生產工作都癱萎下來；估據着各工廠的工人，約有一百多萬。旅館，百貨公司，船塢，軍火製造廠，飯店，礦山，乃至於美容館，都關上門，至於罷工的時期，則自一兩天乃至數星期不等。左派在慶祝勝利之中，似乎是在表示給白魯姆看，他是代表怎樣一種潛勢力啊。

這一次罷工，足以證明一般法國人民，都有自愛和自檢的性能。這次罷工範圍之龐大，在歐洲堪稱為戰後之首屈一指，然而沒有二個工具被毀傷，沒有一架機器被損壞，沒有一個人被捕，沒有一點血流出。美國駐巴黎名記者莫勒 (Magar Ansel Mowrer)，在拍到美國去的電報上說，在罷工最緊張的時期，即使要他帶領一班女學生

經過巴黎的貧民窟，他仍會毫不遲疑的。大百貨商店中，男女員工不回家睡在床上，卻睡在店裏的地板上，他們薪工固然過低，不時遭受飢餓，然而絕不竊取店中的食物來充飢。

這次罷工，對於白魯姆具有很大的利益，因為由此可以充分表現法國工人的力量 and 紀律。他們給參院一種警告，敦促其從速通過他所提出的一連串法案。白魯姆抱着很堅決的態度，決不用軍隊或政府權力去肅清那些工廠。他知道那樣做去，不免要引起流血的慘劇。他曾經說道：

「我也知道這種估價是非法的；但是與其引得他們出來抵抗警察，攻打法西斯聯盟，還是讓他們很安靜的坐在商店和工廠裏好得多。反正他們對於器物並未破壞。保安隊和正式軍隊，固然可以肅清那些工廠，但在他們被肅清之後，工場裏面還能剩下些什麼東西來？」

他這種意見原是合理的。不過在經過一個星期之後，罷工的風潮仍然一天天的擴展着，這時當局不得不表示在必要時，即將採取步驟，以強力恢復常態。果然白魯姆不願把局面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韜雷首先勸令共產黨所屬工會會員復工。內政部長沙朗格羅（Roger Salengro）：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間，因右派各報之造謠中傷，已憤而自殺。）更以明令通告，謂今後倘有繼續罷工者，政府絕不坐視。於是全國工人，個個很安靜的很有紀律的復工了。

此次所以能這樣迅速告一段落，當然得歸功於白魯姆的勇敢周詳，和進行的迅速改革。他就任以後，立即實踐人民陣線的政綱；這種政綱，在五個月以前，還是被人認做幻想的，而今民衆見他果然實踐他的政治諾言，不禁

有些妒忌，至於右翼各黨惟有目瞪口呆，懷着滿腔憤感和驚奇。左翼中人，對此雖然裝做不爲所動的樣子，但暗底裏也不免受了刺激。

在當局與資方締結「馬蒂農協定」之後，便制定了第一批法案。確立了四十小時工作週，最低工資額，勞工集體論價權，以及有給休假期。據負責方面之計算，這些辦法將使法國的工業生產成本增加了百分之十二。雖然代價很高，但白魯姆卻願意——也許是被強迫——冒這種危險。

政府接着又討論若干次要的法案，（政府中有三個次長是婦女，婦女入閣，實開法國歷史上的新記錄。）學生的強迫教育年限，被提高了起來。內閣的行政機構，亦經改組爲七「組」，藉以增進行政的經濟和效率。賴伐爾所規定的減削薪工辦法，予以部分的取消。政府更草定新恤金制度，並宣布新大規模農業計劃。此外還有一件猛浪的事，就是提出一個制止巴黎各報惡意宣傳的法案。

凡此種種，只是小試鋒芒。白魯姆的眼光還在瞻望着更大的事業。不久之後，又有三項驚人的法案，在國會中通過了。第一，國會以空前的大多數（四四四對七七票），通過改組法蘭西銀行法案，剷除該行所享受的封建特權。此項新法案，廢除了該行舊時支配政府的「董事會」制度，使該行僅做銀行的業務，以期爲法國的僕人，不復爲法國的主人。第二，國會以更大的大多數（四八四對八五票），通過了軍火工業國營的法案。此舉開辦費，就要十萬萬法郎。像這樣的法案，在歐洲的歷史上，可說是絕無僅有的。第三，國會又通過了解散法西斯聯盟的法案。這些在社會上橫行不法的家伙，原是白魯姆的主要政敵，自從他以勇敢的手段予以打擊以後，於是火十字團員，

一時只好夾着尾巴，躲在屋子裏去了。

到了十月間，白魯姆更採取了一個極端重要的步驟，他把高價的法郎貶了值。法國遭受金本位的牽累，凡達七年之久，以致產業普遍衰退，國民生活費可驚的抬高，然而法國歷任內閣總理，沒有一個膽敢放棄金本位。白魯姆卻鼓起莫大的勇氣，施行某種限度的通貨膨脹。法郎價值的減削，凡達百分之三十左右。英美兩國之聯袂贊助新匯率，可說是強大的民主主義國家將來可望合作的朕兆。對於這件重要的措施，法國一般輿論，大體也還令人滿意。

白魯姆以爲人民陣線的政綱，如果歸於失敗，則洪水巨禍，即將以法西斯的形態流進法國。他最近表示：「有人以爲我們的命運，殆將等於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克倫斯基政府，祇算是爲列寧開路，受益者將爲另一個列寧。這種觀察可說很錯誤。我以爲在今日的法國，克倫斯基如果失敗了，得利的恐怕不會是列寧。」

六 旭丹

一九三七年七月，由於一種錯綜複雜的恐慌，和財政狀況的惡化——法郎繼續跌價——白魯姆只好退任。他在職共達十三個月。繼任的人，爲急進黨領袖旭丹（Camille Chautoups）。這個新政府，繼續代表人民陣線；白魯姆在新政府中，擔任副總理的任務，而大多數閣員，也皆沒有更動。我們如說旭丹內閣，就等於白魯姆內閣，祇不過是發號施令的時候。白魯姆的名字居次而不居首罷了；這樣講也許不大妥當。我們如說旭丹之執政，是由於白

魯姆之默許，那倒是正確的。無論在什麼時候，白魯姆如果撤回了對於他的支援，則旭丹即將被迫而下野。

旭丹之爲政治家，遠不及白魯姆。他是一個職業的政客，一向就有投機取巧的惡習，自一八七一年以來，他的家族便有急進派的色彩。法國的保皇黨，稱他爲黑暗的蔭影 (Le Tanébreux) 一般人皆知他是共濟會會員 (Freemason)。當斯達維斯基大騙案爆發時，他也被牽涉在內；旭丹在斯達維斯基走紅的時期，充任內政部長，他的至戚普萊沙 (Plessard) 充任巴黎檢察署長，卻又將斯氏放出法網。當時右派各報對於旭丹的攻擊，其毒辣爲近代所少見。不過後來在調查委員會實際調查之下，證明旭丹和斯達維斯基私人之間，並無若何關係。他在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四年，夾在兩次達拉第內閣之間，二度擔任過總理。他有一件遺禍將來的錯誤，就是他因爲遭受二月暴動事件的逼迫，不待國會表決對於他的信任與否，即行自動辭職，這種行爲，可說是法國憲政史上一個不良的先例。旭丹亦爲巴黎產，生於一八八五年，青年時代受着做律師的教育。

世人歡賀人民陣線的初步成功，不可不帶些謹慎。美國當代總統羅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 在他受任的初年原是與白魯姆同樣地在大得民心和他自己的剛毅果敢之中度過的。但是法國的社會黨與急進黨的聯立內閣，卻有很大的危險。人民陣線的策進，在急進黨覺得太快，而共產黨則覺得太慢。何況右派的敵人，又在隱忍待發之中呢？但在一九三六年與三七年中，至少有一件事是不可否認的，那就是一陣新的風，新的空氣，吹遍了法蘭西全土，法國人民，皆知道他們現在有了一種新的政府，和往常遞嬗不息者全異其趣。這政府正以勇敢的按照合理計劃的方法辦事。白魯姆是代表理性的，所以理性也就在他那一邊了。（譯者按：查人民戰線內閣，先後凡有

三屆，卽白魯姆，旭丹，白魯姆等是。白魯姆第二次組閣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但至四月十日，因財政法案在參議院「以急進黨議員居多數」未經通過而辭職。十一日急進黨魁達拉第繼組新閣，社會黨拒不入閣，且社會黨在下院中對於新政府之贊助與否，亦保留自由權，於是人民陣線已瀕破產矣。

第九章 法國的政策及其淵源

「有錢朋友倘欲避免革命，必須極端聰明與謹慎。」

「對付普魯士人的唯一辦法，只有踩他的腳趾，直到他道歉為止。」

——凱因斯 (J. M. Keynes)

——法國俗語

一 法蘭西銀行

在人民陣線一時勝利以前，法國的國務總理，個個都是金融寡頭政治的奴僕。作者在前一章上，已經提及法蘭西銀行 (Banque de France)。法國數百年來，國政的運行，全在兩百個財閥所組成的一個集團支配之下，他們的活動又是以法蘭西銀行為中心。關於這種寡頭政治之傳統的活動，頗有一述的必要。誠如法國人所說，法國現在已經不是一個王國了，而所謂第三共和國者，不過是該行十八個「董事」的爪牙而已。

法蘭西銀行由拿破崙一世所創辦；該行雖然有權發行全國通用的貨幣，並保持其金準備，但只是一家私人銀行而不是國家銀行。照該行章程規定，只有兩百戶大股東才有「董事」選舉權，這些董事，絕對統制着法蘭西銀行。白魯姆企圖改革者，便是該行的基本章程。

據一九三三年的統計，法蘭西銀行的股東共達四萬人左右，其中一七、八八九個股東，每人領有一股，九、〇二一人領有兩股，八、〇二一人每人四股；總計起來，即二四、九三一一個小股東，共領六八、〇一五股。其餘一、一五、四八五股，統由六、〇六九個股東所掌有。而在這六、〇六九人中，祇有股份最多的兩百家股東，有選舉及當選為董事的權限。

法蘭西財界的這兩百個巨頭，施着驚人的金力政治，他們的團結，非常之堅固，猶如像一聽沙甸魚一樣，任憑你有龐大的財富，也不能買通一條路，走進這個內圈裏面去。例如化裝品巨擘科蒂 (Coty) 和汽車大王雪鐵龍 (Citroën) 兩個人，他們俱是現代法國的一等富翁，然而並不是那金融寡頭中的一員。被選進這個裏圈中去的人，須具兩種資格，第一為歷代具有顯貴的門第，第二為現時仍有雄厚的財力。他們的興起，直在法國大革命以前；他們在拿破崙一世時代，是所謂上層資產階級；在路易非力 (Louis Philippe) 及拿破崙三世的政權之下，才互相合作，逐漸鞏固了他們的權力。據說被採納到那寡頭政治圈中的最後一人，叫做司乃得 (Eugène Schneider)，一個鋼鐵及軍火商人，這還是三十年以前的事。

在法蘭西銀行的十八個董事之中，總裁及兩個副總裁，是政府委派的，他們三個人的表決權，和其他董事相等。總裁的意見倘與其他私人董事的意見不合，他除了辭職以外，就別無他法。按照拿破崙法典的規定，總裁須有該行股票一百股，副總裁各須有五十股。現時每股的市價，約為一萬法郎，法國的文官不見得都有五十萬乃至一百萬法郎可以花費，於是產生了一種習慣，即由其他董事，把該項股份的價格，借給新總裁。當一個總裁退任之後，

大家都爲他留心着去路。例如新近退職的兩個總裁，塞房 (Servant) 和魯奎 (Luquet)，便做了巴黎聯合銀行 (Banque de l'Union Parisienne) 的董事；這家商業銀行的規模很大，其設立目的，爲替法蘭西銀行私人董事辦理商業事務。又如前任總裁莫萊 (Moret)，進了巴黎鄉村銀行 (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 前任總裁李士特 (Charles Rist)，則進了法國總統退職以後的安身所，蘇彝士運河公司 (Suez Canal Corporation)。

法蘭西銀行另有三個董事，在向來的習慣上，爲政府的文官，代表法國的財政部。他們之所以被任爲這個職位，主要目的乃在監視財政上的出納。他們既是法國文官制度中的財政監督，所以可說是金力政治的尖端。這班充任財政監督的人，事先皆須經過全世界最嚴格的磨練。他們須有豐富的智識和高貴的門第。在全法國之內這一類人僅有八十名，他們皆居在常任文官的頂尖。受過若干年訓練之後，他們變爲監督；嗣後或可變爲法蘭西銀行的董事，或辭去公務，擔任工商業或銀行業方面的私人職務。這僅有的八十名「財政監督」，構成了一種財政的參謀本部，散佈在法蘭西共和國的財政組織中；他們的職務雖然分散，而他們各人之間，則仍密切地結合着。

其餘十二個理事，代表私人的權益；在白魯姆上任以前，他們是法蘭西銀行的實際統制者。據一般人講來，他們是法國金融、工業、商業及農業的經緯。十二個之中，六個是銀行家，他們的董事席位，都是絕對「世襲」的，即是由父傳子的。他們這六個理事的祖先，有五個在十八世紀中即由瑞士移居法國，以助芮克 (Necker) 的理財。第六個席位屬於羅斯契爾一族，羅斯契爾氏的先人羅斯契爾·亞爾封斯男爵 (Baron Alphonse Rothschild)，於一八五五年成爲董事。

六個銀行業董事的名氏如次：

羅斯契爾 (Baron Edouard de Rothschild) —— 羅斯契爾銀行。

何丹格 (Baron Hottinguer) —— 何丹格銀行。

紐夫里 (Baron Jacques de Neufize) —— 紐夫里銀行。

馬勒 (M. Ernest Mallet) —— 馬勒銀行。

魏爾 (M. David Weil) —— 拉查·富來而銀行。

米拉保 (M. Pierre Mirabaud) —— 米拉保銀行。

上列各銀行，都是資格很老的私人營業，牠們除了經營通常商業的業務以外，向來並為法國的貴族管理財產。牠們同時又代表了世襲的家族。例如米拉保 (Pierre Mirabaud) 的董事席，受自他的伯父威廉·戴克達 (William d'Eschhal)；威廉受自叔父保羅·米拉保 (Paul Mirabaud)；保羅受自祖父亞道夫·戴克達 (Adolphe d'Eschhal)；又如魏爾 (M. Weil) 受自費力斯·維尼斯 (Felix Varnes)；費力斯則由父若祖所傳而來。馬雷 (Mallet) 一族，父子相傳，歷一〇九年而未會中斷。

其餘若干董事席位，則歷來都由產業家及富商巨賈之持有該行股票者所佔。他們的名氏如下：

溫舍爾 (M. François de Wendel) —— 鋼鐵業巨擘及軍火商。

伏居 (M. de Vogüe) —— 化學工業巨擘兼法國農業家聯合會會長。

特契門 (M. Fexé Duchemin)——化學工業巨擘。

梯那東 (M. Thardon)——產業家。

布朗克 (M. Camille Poulenc)——化學工業巨擘。

達勃萊 (M. Robert Darblay)——紙業巨擘。

伏居像銀行的董事一樣，也是貴族出身，頭銜是侯爵，兩代以來，他的家族經營着法國最大的化學工業「聖戈本玻璃製造廠」(Manufacture de Glaces de Saint Gobain)，他本人又是克羅梭地方司乃得公司 (Schneider et Cie, of Creusot) 一家大軍火工廠的董事，正像溫台爾一樣。

上面銀行業和工商業十二個法蘭西銀行董事，在法國九十五家公司中，佔據一百五十席董事，而九十五家公司的出品，當佔法國全部工業生產額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他們擔任董事的公司，如以業別分類，則有私立銀行三十一家，保險公司八家，鐵路公司九家（其中四家為外國的），輪船公司八家，鑛冶公司七家，電力公司八家，開礦公司八家，化學公司十二家。

此外，上述這班人物，又多為龐大的冶煉業公會 (Comité des Forges) 的重要分子。

法蘭西銀行的董事，對於法國政治，具有決定的控制力，因為他們如果對某一總理感覺不滿，只要不放款給國庫，內閣就不得不倒。該行多少代表利貸階級 (Money Class)，所以主張絕對通貨緊縮政策。而代表市民階級的衆議院，被他們罵為狂妄的，則反對這種政策。因此該行只有設法使衆院對此不得染指。他們所採用的方法，就

是支持他們所中意的總理，使其獲得「全權」(Plains Pourvois)。例如在斯達維斯基案之後，老態龍鍾的杜邁格 (Gaston Doumergue) 就任爲法國「國民政府」的首腦，該行即從事勸誘他向國會要求施政全權。誰知那個老朽昏庸的紳士，立刻被國會一脚踢出去了。繼任總理佛蘭亭，在位半年之中，也始終被該行所牽制包圍。

佛蘭亭 (Pierre-Etienne Flandin) 屬中央黨，倒是一個誠實的家伙，他不願意無條件拜倒於法蘭西銀行的意志之下。他說：「我們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通貨緊縮，便是法郎貶值。我決不願意將自己困處於這兩難之間。」他走了第三條路，便是膨脹過甚時緊縮，緊縮過甚時膨脹的「通貨調整」(reflation) 政策。法蘭西銀行對於此種提議感覺不滿，於是製造一種恐慌出來，企圖推翻佛蘭亭的政權。佛蘭亭乃採取報復手段，下令將該行總裁莫萊免職。自此該行對於政府的短期借款，即行拒絕其再貼現；而新總裁湯納利 (Jean Tannery)，也是其他董事的俘虜。政府所受該行的壓迫，於是日見沉重。迨至六月十五日，法國政府因爲急須償還巨額公債，而國庫業已空空，佛蘭亭不得已，祇得借用郵政儲金，以求堵塞於一時。法國一般人民，鑒於此種情形，深恐通貨膨脹之即將實現，紛紛收買黃金，並將資本運出國外。法蘭西銀行本有阻止黃金外流的力量，但他爲着要打擊佛蘭亭，所以置之不問，任其一直外溢。佛蘭亭當初原不打算向國會要求施政全權，現在遇到恐慌，他只好提出這種動議了。結果國會當然對他不表信任，佛蘭亭遂告下台。法蘭西銀行既已勝利，便設法堵住了黃金外流的缺口。以上所述，便是一九三五年六月法國財政恐慌的內幕。

佛蘭亭下台以後，賴伐爾繼任法國總理，他完全服從法蘭西銀行，毫不留情的探行通貨緊縮政策。不久治煉

業公會會長溫台爾提出一項計劃，要求政府在減稅及津貼的形態之下，以四十或五十萬法郎貼補工商業，以整頓經濟。賴伐爾對於這種要求，一時未肯接受；租稅繼續增加，民衆生活也更感困難。可是後來賴伐爾終究在德望德爾的指使之下，向國會請求四十萬法郎，作爲特別軍事放款之用。國會對於他的原議，提出兩條修正案，（一）限制軍火工業之利潤，不得超過百分之五；（二）須在一年之內，將軍火工業化爲國有。賴伐爾後來看看這兩項修正案會在下院通過，忙把原案撤回了。

溫台爾、賴伐爾法令，「侵入私人企業的領域」之程度，在法蘭西共和國的歷史上，開了一個新紀錄。政府公債的利息，由法令減削十分之一；政府又取得物價和利潤的規定權，幾乎推及於工商業的每一個部分，房租及不動產抵押價格，也由法令減去十分之一；私人負債者，可以減付利息；薪俸、工資，以及恤金，各減少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十不等；此外煤炭、煤氣及電力的價格，亦均相當削減。但是即使經了這次減削以後，法國的生活費仍舊高出世界生活費水準百分之二五。

當時法國政府，如果實行通貨膨脹，貶低法郎價格，可以很容易的達到減低生活費之目的。然而賴伐爾竟採用上述那種麻煩的方法，爲什麼債主、小資本家，及有儲蓄的農民會願意接受呢？這原因大部分由於心理。因爲通貨緊縮的恐怖，人們比較還沒有嚐到過，而通貨膨脹的恐怖，則爲他們所熟知，且爲他們所特別畏懼。在人民陣線政府以前，法國完全爲牢守黃金的心理所統制，很像胡佛總統時代的美國。談到這裏，我們有提起另一件事的必要；就是在邦恩加雷掌政之下，因爲恢復法郎的金本位，法國資本階級的儲蓄，一時損失了五分之二。

世間有人以爲法西斯政治，祇是產業資本家爲圖謀他們自身利益，而運用的一種力量，抱有這種觀念的人，在此地要遇到難題了。法國是一個民主國家，然而法國產業資本家在法國的政治生活上所有的權力，比較德國產業資本家在德國所有的權力，要大得多。德國方面，希特勒最近下了一個命令，使一切產業的利潤，不得超過百分之六。如果說經濟是法西斯主義之唯一的索引，我們很可以說，法國之爲「法西斯」的國家，其色彩比德國還要濃厚得多了。可是誰要說法國是法西斯，那就未免大錯特錯。

二 冶煉業公會

法郎梭·溫台爾(François de Wendel)除了擔任法國冶煉業公會的會長以外，還經營其他事業，最顯著的，就是他自家的煉鋼事業「溫台爾父子公司」Les Petits-Fils de F. de Wendel et Cie。溫台爾一族，是具有國際性的，他們有昆仲三人，共同經營着事業，此外還有一個現已去世的堂兄弟，——他的名字叫做 Ivan Edouard von Wendel (1871—1931)，是法郎梭的堂兄弟，不是一般人所說的親兄弟。他在歐戰以前，是個德國的公民，所以在自己的姓上，不冠法文的「de」，而冠以德文的「von」。法郎梭·溫台爾，是法國參議院的議員，他自己辦了一家論壇報(Journal de Débats)，而對於那半官的時報(Le Temps)，也握有大宗股票。

所謂冶煉業公會(Comité des Forges)就是法國的煉鋼業聯合會，與美國的鋼鐵業聯合會性質相似。牠本身並不售賣或生產鋼，但牠有兩百五十家會員，牠就專爲會員的產品決定產額和市價。在這個公會的會員之

中，最有名的當推司乃得公司，係司乃得所經營，設於克羅梭州。「司乃得」一族，也是德法的混合血統，其公司係現在的司乃得的祖父（爲薩爾州人），於一八三六年到法國境內創設的。該公司自己產鋼不多，而向同業中大批採購，以供製造軍火之用。

筆者如果不幸，死在今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希望人們在我的墓碑上，記下這件事來；就是殺我的子彈，每粒的生產成本不到美金一分，而其售價則在三分之一以上。我希望藉我的死亡而獲利的人，讓大家知道他是誰。

子彈的價格並不算昂貴，但你如果每小時發一百萬響，而以每千粒價值六英鎊（美金三十元）計算，則其耗費就很大了。一枝來福槍的價格也很有限，不過五鎊（二十五元）左右。但你要武裝一百萬人，就要破費五百萬鎊（二千五百萬元）了。一架機關槍的價格，約在一二八鎊（六四〇元）；法國所有機關槍，共達四萬架之譜。一尊口徑三十七公分的野戰砲，價值兩百鎊（一千元）；而每顆砲彈則售三鎊（十五元）；法國著名的七五公分口徑的大砲，每尊約值一千六百鎊（六千元）；價值固昂，構造極精，導火管做得像時錶一樣正確。所用砲彈，每顆約值五鎊（二十五元）；而一砲打出去，有時可以擊燬價值數百萬的財產。一輛大型坦克車，加上裝備費，價值一六、〇〇〇鎊（八萬元）；一架轟炸機約值兩萬鎊（十萬元）；一艘近代化的巡洋艦，約值二、二〇〇、〇〇〇鎊（一千一百萬元）；一艘航空母艦，約值三、八〇〇、〇〇〇鎊（一千九百萬元）；一艘巨大的戰艦，計值六、〇〇〇、〇〇〇鎊（三千萬元）。

由此看來，戰事是非常耗費的。牠破耗我們的金錢，而增加我們的賦稅。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從戰爭上取利的；

那便是世界上最稀奇的軍火業了。

依照國際聯盟的統計，一九三四年份，世界各國所消耗的軍費，共達八五五、三六〇、〇〇〇鎊。（合美金四、二七六·八百萬元，此數在最近兩年以來，約增一倍。一九三七年世界各國的軍費，達美金一百萬萬元，信不信由你。）這樣龐大的數字，簡直像是天文學上所用的數目了。假如有這樣多的金錢，則我每天用兩鎊（十元）在用了百萬年之後，當必還有餘剩。假如把牠打成極薄的金條，則以每哩美金一元計算，牠可以圍繞世界一七二、一六九週，假如我能把牠變為每塊十元的金塊，而以每秒鐘一個的速率去數牠，那倒要我數了二十六年！

談到軍火問題之根源，我們知道唯有那些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才能製售高貴的軍火以獲厚利。他們所製造的軍火，賣給產業落伍的國家去。全世界軍火的總出口額百分之九十八，皆是由十個國家所供給的，而其中五個最大的輸出國，即英、美、法、瑞典、捷克，合佔百分之六五左右。一九三二年，法國軍火的產量，約佔世界總產額的百分之二七·九，皆是司乃得工廠（Schneider-Creusot）所製造的。

法國的司乃得工廠，和世界其他各大軍火公司一樣，具有多方面的性質。牠是一個軍火公司，一個怪物，一個鋼鐵廠，一個軍火工業的小世界，一個國民的機樞，一個攪亂和平的惡魔，一個受愛國者崇拜的偶像，一個以上的國度之軍事上的必需品。從表面上看來，司乃得公司的主持人，以及冶煉業公會所屬的其他經營軍火的公司之主持人，都像態度溫雅的紳士。他們並無兇惡的面貌；然而他們的營業，卻是發明、製造並販售那殺人的工具。

世界各國的軍火公司，大抵皆像雜交的白老鼠一般，彼此互相勾結着；他們在一同玩耍，一同長大。這因為他

們彼此之間，並不具有競爭關係；一家營業興盛，則另一家的營業，亦將隨之而盛興。例如司乃得公司從甲國方面接到大宗訂貨交易，則其他公司，即從與甲國不睦的隣邦之乙國，獲得另一筆軍火訂貨交易，一個國家購買了軍事上的新發明，則其他國家亦必隨之而購買。在某一單獨國家之內，軍火商人或可為着一筆交易互相貶價以競爭；然而從整個國際情形去看，他們畢竟是一致，可以獲利的。

全世界的軍火公司，雖然國籍不同，但他們相互之間，類皆具有相當的連繫。例如經由著名軍火販商柴哈洛夫士（Sir Basil Zaharoff）之連絡，司乃得公司和英國的維克斯公司（Vickers）間有了關係。司乃得又從法國，握有股權的歐洲聯合銀行（Union Européenne）方面，設法統制着捷克的最大軍火業，斯可達公司（Skoda）。歐洲聯合銀行，又與一家大規模的匈牙利銀行互通資金，週轉司乃得公司產品賣買時的金融。又聞司乃得的經濟力，更統制了一家奧地利銀行，而該行則與奧國主要鋼鐵公司亞爾本（Alpine Montangesellschaft）頗有往來。同時這家亞爾本公司，又是為德國鋼鐵托辣斯（German Steel Trust）所領有，而據傳經由萊茵曼達區的杜斯道爾夫鋼鐵廠（Düsseldorfer Rheinmetall），司乃得和德國的克虜伯（Krupp）軍火廠，又有相當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在歐戰期內，法德兩國的鋼鐵生產家，曾經成立不成文的默契，相約不轟炸對方的工廠。所以在大戰期內洛林（Lorraine）始終是法國最平靜的戰區。法國的空軍，接有命令，不得轟炸布里伊山谷（Briey Vally）。溫台爾的業產，雖然把那裏德國人可資利用的鑛場炸燬以後，可以保全許多法國人的生命。現在又有同一的情

形發生了。最近德法兩國各出半數資本，設立一家洛薩(Losar)製鋼廠，擁有一部份洛林所產之鋼的專賣權。據稱與洛薩有關係的某公司，接到一批定貨，交付二千五百噸塊鋼，作建造法國西線新砲壘之用。這批交易是由法國冶煉業公會副會長特勒(Alexandre Dreu)和德國產業資本家羅契林博士(Dr. Roehling)談判成功的。所以德國資本家，得從法國的國防上賺錢。大砲固然昂貴，砲料卻很便宜。

至於軍火商在其營業上，絲毫不存着國籍的偏見，更是老生常談的故事。他們在發生戰爭之際，向雙方交戰國售賣軍火，售給友邦，也售給敵國。在西北部戰線上戰死的英國士兵，假如你從他的屍體上拔出子彈來一看，可以發現那是英國貨。法國下院議員福爾(Paul Faure)藏有幾幀歐戰前土爾其及保加利亞代表在法國克羅梭州購買司乃得廠軍火的照片，而該兩國於參戰之際，即用該項軍火打法軍。他另外還有一幀司乃得與德國廢皇凱撒·威廉在遊艇中遊樂的照片。當亞白特·克林(Abel Krim)在摩洛哥方面與兵反對法國的時候，他的部下的武器，就是法國軍火販賣商所供給的。在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方面，土耳其人以英國製造的大砲來攻擊英人，結果英國有幾艘戰艦，為英國的武器所擊沉了。

軍火商在開戰時期可以發財，而在世人恐懼戰爭發生時，也是能夠發財的。自從希特勒在德國上台以後，巴黎股票交易所中司乃得及斯可達兩種股票，價格一天天的騰漲起來。斯可達的紅利，就在不景氣的年頭，還達到二分八厘半的高率。一班軍火販賣商，在比較平靜的時期，無不設法鼓勵戰爭。關於這些事件的詳情，民主統制協會(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在倫敦會經發行兩本小冊子，一為「秘密國際」(Secret International)。

「爲『愛國有限公司』(Patriotism, Ltd.)頗值一讀。

權戰心理固佳，實際戰爭更佳。這兩句話該不會錯誤的罷。軍火商是要求戰爭的，假如他們不承認這件事，那便是在作偽。戰爭對於他們，就像乳汁之於嬰兒。他們靠着戰爭才會肥胖，就像豬要吃穀才能肥胖一樣。

大家不要以爲司乃得和溫台爾，在一般軍火商當中，是最腥臭的典型。其實法國固有這種貪得寡恥的軍火販商，而其他各國亦莫不然，乃至於號稱爲和平國家的丹麥和瑞典，也是難逃此例。從大體上看來，司乃得比較幾個最大的同業競爭者，——包括英國的維克斯在內——也許稍微還有些香氣。維克斯可算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軍火廠。人們當還記得華盛頓會議開會時，不是暴露了一件不名譽的事嗎？（此事由倫敦首先揭發，一時英國報紙紛紛騰載。據稱討論裁軍問題的英國代表團主席班克斯爵士(Sir John Eldon Bankes)，一位八十一歲的老頭子，是帝國化學工業廠(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Ltd.)的大股東。該廠雖非完全製造軍火，但在炸藥、化學品和毒氣方面，是英國最大的一家工廠。）

能夠伸手去處置軍火商的，白魯姆要算當代政治家中之第一人。一九三七年白魯姆內閣業已下了明令，將司乃得軍火公司改爲國營了。

三 自由平等博愛和人口稀少

法國的農業和工業，可說是非常均衡的，牠所需要由外國入口的糧食，爲數極其有限；牠又不像英國及德國

那樣，要怎樣去依賴國外市場。法國的骨幹，是一班小資產階級，小地主和鄉間資本家；工業則因有洛林的鐵礦，基礎也穩固。法國的政府雖則窮困，然而國家卻頗富有——這就是法國永恆不變的經濟實情。

可是除了經濟生活之外，法國人還是具有一種缺憾；並且無論是旭丹也好，賴伐爾也好，泰狄歐也好，赫里歐也好，溫台爾也好，皆是沒法彌補牠。法國這項極重要的問題，不是內部的經濟或財政問題；也不是萊茵河岸的邊境，對德國大敵防禦工事是否安全的問題；而是一個人口統計上的問題——即是人口生育之減退。

就一九三四年而言，法國的出生人數爲六七七、三六五，死亡人數爲六三八、五二五；生死數量沖銷之後，只多了四萬人口出來。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季，出生數較之去年同期，還減少了一萬人。法國人口的生育率，歷年皆呈減退的傾向；一九三四年的出生率，爲千分之一六·一（即每千個人中，生出十六個人有奇），而死亡率則與之接近，爲千分之一五·一人。若拿德國來比則其出生率爲一八·〇，死亡率只一〇·九；意大利的出生率爲二三·二，死亡率爲一三·一；蘇聯出生率爲四四·一，死亡率爲二六·一。平均起來計算，德國自希特勒上台以後，雖然竭力獎勵生育，但仍趨減少，可是即使如此，每年新生人口還有一百十萬人；而法國生育率最高的年頭，也祇能生七十萬人。

法國人口現爲四千二百萬，而德國則達六千五百萬，無怪乎法國望着萊茵河對岸的德國，要感到心驚肉戰了。無怪乎福煦元帥有一次半開頑笑的說道：解決法德問題之一勞永逸的途徑，祇有閹割了兩千萬德國人，使他們不能夠生育。

四 口頭禪——安全

「招租——本公寓尚有房間五大間，鄰近公園，水汀公用，屋頂有防備飛機轟炸設備。」

——見巴黎日報廣告欄。

法國雖然也有軍火商人，但一般的說來，法國乃是世界上最愛和平的國家。法國的高利貸者和小店主們，大多數不願再有戰爭。根善（Frances Garther）曾經說過，假如我們留心各個民族所常用的口頭禪，一定會覺得很有趣。例如德國人喜歡說：「德國高於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和「統治布勒塔尼亞」（按 Britannia 省在法國東南部）而法國人則報以「法國萬歲」（Vive la France）。法國人不願意束手待斃，他願意活着，經營他的小鋪子，耕他一小塊農田。

李頓·斯德拉契（Lytton Strachey）曾經援引吉朋（Gibbon）的話說：法國人具有幾種舊道德，就是精密、均衡和爽直。他們厭惡過分和迂滯。他們愛好秩序。法國國民之儲蓄的習慣，及其在政治方面之安全的欲望，皆是一種本能所發生的作用。法國人把金子放在鐵筒內，把條約放在邊境上，其目的如出一轍——經濟與秩序。這裏我所說的秩序，不是指上操時正步走的那種秩序，而是指在個人生活及政治生活中由爽直和均衡兩種智力所引起的活動之內在的調協。

西治諾布（Stenobos）曾經說過，法國向來不會在國際會議中要求什麼東西，這句話不免有些誇張。法國

從歐戰中所得的很多，法國人現在所要者，就是准許他保持既得的權利。我剛才說他所得很多，實際究竟是否很多呢？拿法國人的犧牲和德國的損失總額比較一下，法國所得的一份還不算過大。他當時得到的有亞爾薩斯·洛林州；佔領薩爾區十五年；敘利亞委任統治地和喀麥隆（Cameroun）；西非德保護國，再加上一筆賠款。不過亞爾薩斯·洛林州，自路易十四以來，即屬法國；薩爾已讓德國拿回去了；敘利亞委任統治地，祇能使法國多一筆無益的開支；還有賠款，啊，賠款，現在那裏去拿？

站在法國方面說，一九一九年的「和平」業已證明其未能令人滿意。你看十五年之後，德意志軍國主義的鐵拳，又對着法國東部脆弱的邊境高舉起來了。法國在一百多年之間，三次遭受德國的侵入；他們現在不願意再被侵入了。

談到歐戰的責任問題，那是很複雜的。法國對於大戰之釀成，當然不能沒有干係。單說德國一國有過，誠不免過甚其辭。不過德國的陸軍，畢竟是侵略者。好多年以前，法國總理白里安和德國外長施德蘭斯曼曾有一段談話。白里安嘆了一口氣說道：「我不知道歷史將要怎樣講，但我恐怕你會同意一九一四年比利時並沒有侵略德國。」法國原是一個現實主義的國家，他在歐戰中死了兩百萬人民，而財產及人力之損失及摧毀，更是無可比倫。於是戰後想創造一種國防組織，而名之為「安全」。其所謂安全，包含下列各項。

建立最強大的陸軍於西歐。

建立最驚人的空軍。

建立最大數量的坦克車與重砲。

建立防禦線於東疆。

建立大規模軍火工業。

保持全世界最大的金準備。

實行國聯盟約與凱洛格非戰公約。

解除德國武裝。

實行洛加諾條約。

與小協約國家（捷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及波蘭等，締結軍事的外交的同盟。

與英意兩國，締脫萊撤陣線——可惜是短命的。

上面所舉的各項，皆是法國戰後的勝利品；可是他們一部份已趨於崩壞了。這一切法國現在已經有了——或者過去曾經有過。但他還是恐怕不夠。這倒不是沒有理由可言。

照法國人講來，法國的陸軍，今日在歐洲已不是最強的了；論數量不及蘇聯，論實質不及德國。法國的徵兵一旦遇到了德國的職業軍隊，不免要像牛油般的溶化了。法國的空軍已經陳舊了，而戈林將軍新練空軍所有的機數，怕不比法機為少。馬奇諾防線，是設在地下，德國人很容易飛過去。有人說「法國在一九一四年所預備的，是一八七一年式的戰爭，而一九三七年所預備的，又是一九一四年式的戰爭。」國際聯盟的組織，因為日本之侵佔滿

洲，及意大利之併吞阿比西尼亞，業已遭了致命的打擊。小協約各國的同盟雖還可靠，而波蘭的態度則很曖昧。德國自退出國聯以來，已把國際政治上的「軍縮」一筆勾消；法國雖圖以「集體安全」制代替軍縮，而實際上則既未集體，又不安全。法蘇協定雖有價值，然而蘇聯和法國隔得很遠，并且蘇聯和德國又非毗隣。至於斯脫萊撤陣線，因英國之簽訂英德海軍協定，及墨索里尼之征阿，也歸於崩潰了。

在白里安長期掌政之際，法國雖然還存戒心，但已對德國逐漸妥協。白里安看得很明白：德國位於歐洲的中部，包羅人口六千五百萬，是不能永久被人壓在底層的；他以為健康的德國，乃是安定歐洲一般政局之必要條件。然而結果如何？法國每退讓一步，而德國卻要前進兩步。法國撤退萊茵駐兵，德國給牠的答覆是停止支付賠款。法國准許德國軍事上的平等，所得到的回答是希特勒。他們把薩爾區域交還德國，所得的回答是德國恢復徵兵制，再加上戈林的擴充空軍。

法國人心裏想：片面的廢除條約，乃是大決口的小孔隙。西班牙如果向美國突然提出要求，要將菲律賓歸還西班牙，美國人當作如何感想？法國在海軍方面，已甘處下風，對於英美的五比五，自己接受一·七五的比率；然則德國有何不可接受同樣下風的比率？難道德國祇須開口索取，就可收回牠以前所失掉的一切麼？如果他們不喜歡凡爾賽條約，以前爲什麼要簽字？總而言之，打勝仗有什麼用處？誠實的法國人會得承認；而事實也的確如此：打了勝仗並沒有多大的收獲；戰爭只有兩敗俱傷；勝利者等於受損者。

一九三七年的法國政策，和往常一樣，係以國防上的必要爲基礎。自從杜邁格政府以來，法國陸軍的參謀本

部，實際上即已參加閣議。最初是由貝當大將 (Marshal Jéhu) 參與，近時則爲戴南將軍 (General Danain)，他擔任航空部長。佛蘭亭內閣，將徵兵的服役期間，增加了一倍。這因爲歐戰期內法國的出生率激減，以致最近可供徵集的成了太少，所以必須延長兵役期間，以資補充。

在外交方面，法國循着巴爾都 (Barthou) 的政策，用締結關於領土方面公約的方法，使其同盟國安處於聯之內。法國的同盟國，都是主張維持現狀的國家，是歐洲的「有國」(Haves)；是歐戰以後多少滿足其要求的國家；如比利時、捷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此外蘇聯也與法國結爲同盟。至於那些「無國」(Have-nots) 是主張改變現狀的國家，如德、意、奧、匈及保加利亞等。這兩個集團之間的衝突，產生了一種危險的空氣。「有國」的安全辦法，刺激「無國」的改變現狀，而「無國」的改變現狀的威脅，又使「有國」加強其安全的標準。法國的國家主義刺激德國的國家主義，反過來也是如此。德國愈要改變現狀，法國也愈要保持現狀。

依照法國所提條件，牠所歡迎的新公約如下：

(一) 西歐天空軍公約。就是擴張舊時的洛加諾條約，使德法以及其他簽字國家，如有被人攻擊者，則其他簽字國立即用空軍援助。這個公約對於法國的利益，在於與英意兩國能夠團結得密切。不過法國要求同時在東歐方面，也建立一個安全制度。希特勒對單簽西歐空軍公約，也許願意參加，現在雙管齊下，卻不肯承應，於是全部交涉皆告失敗了。

(二) 多瑙河公約。此約如果成功，則將由法意兩國共同保證現時中歐疆界，並與奧國的獨立以相當援助。德

國因爲該約實現，足以凝固現有的國界，限止其德奧合併的企圖，所以表示反對。

(三)「東歐洛加諾」公約，其目的爲保證波蘭、德國、蘇聯及波羅的海諸國的疆界。蘇聯很願結此公約，並且先已和若干緩衝國訂了關於領土方面的條約。但德國卻表示反對，波蘭也不贊同。

比較具體的，要算是法蘇互助協定了。該約於一九三五年簽字，在法國議會中經了一年的熱烈辯論，才能得到通過。此約無論就法國的政策而言，或是就整個的國際局勢而言，皆是極關重要的。自從洛加諾條約破裂以後，牠已變成了保障法國安全的主要城堡。何以呢？近年大多數國際條約，都是「互不侵犯」條約及修好條約，除了一紙具文以外實際上並沒有多大意義。而法蘇條約則爲互助條約，換言之，不論其有無祕密軍事條款在內，實爲一種同盟。依照該約規定，法蘇兩國如有一方遭受第三國攻擊，則另一方即當起而以武力援助。接着捷克也和法蘇兩國也各締同樣的條約。因此在歐洲大陸上，造成了一條防守同盟的戰線。

說起來倒也有趣，法蘇條約之交涉及簽字，並不是出自左派的人民陣線之手，而是出自法國右派的國家主義政府之手。牠是「非赤化」的巴爾都和賴伐爾的產物，其佈置出於賴伐爾遊莫斯科之舉。所以無論誰要說這純粹是「共產黨」的協定，那就很容易加以反駁。德國對於法蘇條約，極其憤感，該約的簽字，便成了他們「侵入」萊茵區域的藉口。後來他們又與日本訂結同盟，並且成立「德意軸心」，以爲應付。正像一九一四年時一樣，互相衝突的條約把歐洲分成了兩大陣營；不過在一九三七年，對陣的性質，是以意識形態及民族感情的不同做基礎的。法國、捷克和蘇聯，組成了一個「民主的」集團；而其對方的競爭者，則是帶着很明顯的法西斯性質。

西班牙的戰爭，把歐洲兩個互不相容的集團的裂痕，像火炬一般照得非常明顯；這件事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了。

在希特勒剛剛上台之後，有人以為法國趁着德國比較還軟弱時候去攻打她，比較等着德國強盛之後，反來挑戰，要便宜得多了；因此恐怕法國要向德國打個冷棍，而實行防止的戰爭。結果這種預測沒有實現，原因很簡單，就是法國不願意作戰。法國的政府，永也不能使其人民越出國界，去作侵略的戰爭。但外國軍隊如果踏進法國領土一步，就要遭遇強烈的抵抗的。

五 賄賂的盛行

外國人對於法國的真相之所以不容易了解，其最重要的原因，即為法國各報館之貪賄。單就「巴黎」一地而言，所有日報共達一百零兩家；其中除掉保皇黨的「法蘭西行動報」(Action Française)及共產黨的「人道報」以外，態度光明正直的實在很少。他們中的大多數，從頭到尾，都有專供出售的新聞欄。

有一家法國小報，報名叫做「嘴和爪」(Bec et ongles)，真的做了一筆好買賣，同時得到法國政府、德國人和斯達維斯基的津貼。(見 Alexander Werth 所著 France in Peril 一書第三三八頁。)當美國駐法大使，愛治 (Walter Edge) 新到巴黎上任的時候，某大報的一個編輯，特來訪問他的祕密，把帽子拿在手裏，心中很有把握，以為新大使對於該報的拚命鼓吹，一定會得體會其中的意義。一兩年前，我在西班牙的巴塞羅那 (Bar-

caloni)聽到加他蘭人運動 (Catalan Movement) 的領袖對我說，他不得不去賄賂另外一家大報，以便能將同情於這種運動的論文，在那報紙上登載出來。

巴黎的報紙，可以接受日本及意大利等外國政府的津貼。在日本進兵滿洲的時候，巴黎各報的言論，大部份皆是祖日，這便不是沒有原由的。又據某一可靠的估計，意大利在一九三五年間，運動法國各報的資金，共達六千五百萬法郎。至於法國政府，對於報紙也有津貼。法國的外交和內政兩部，都有巨額祕密費以供使用。

六 法蘭西精神

誠如莫勒 (Edgar Ansel Mowrer) 說，法國是一個成功的國家。她的語言、文學和文化，都是各國的知識分子所認為值得羨慕的，法國可說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不過自從歐戰以來，法國人已經發覺單有和諧與文明，是不夠的了。在過去五十年間，世界上發生了有史以來所未見的重大變化，使法國那種完美的素質陷於孤立的狀態了。今日的世界，其範圍已不再限於聖傑門條約簽訂室的樸素的牆壁之間了；也不再限於諾曼底省的蘋果園裏了；更不再限於里昂小店主那清潔樸素的店舖了。法國人眼看着他的世界的價值已經改變，他感覺得手足無措。

在法國大人物中，比白魯姆或賴伐爾更為重要的是「法蘭西人先生」(按：作者此處所指之 Jean Frenchman 是象徵的，不是實有的，意思是指一般法國人)。法國是一個四千二百萬個人主義者的國家。一般法國人對

於四分五裂的世界，對於一天天走向崩潰路上去的世界，作何感想呢？「法蘭西人先生」是一個標本，因為他的國家是一個成功的國家。他差不多是個墨守成規的人。他腦子裏一個最好的時光，是釣魚。他對於一切事物，都要使之合理。他有一個很長久的時期，不相信希特勒只是杜鵑。現在他知道得更多了。不過你若告訴他希特勒是一個先知，他會猶疑一下，然後合理的說：「先知？現在再沒有先知了。」

「法蘭西人先生」一生就住在火山上。就記憶所及，火山已經爆發過兩次。（按：指一八七一普法戰爭及一九一四世界大戰。）今後恐怕還要爆發。他抱着着慌而有些向好處着想，同時又對他的孩子一生出來就教導他們能夠負責。「法蘭西人先生」所需要的是安靜。他祇想日子平安過去，一無事事。除了受壓迫的時候之外，他是一個無用之徒。莫勒說：「無論那一方面，法國的實質，要比表面高強二成，而德國的實質，要比表面低劣二成。」假如戰爭發生了，「法蘭西人先生」一定高興作戰，而且很難於打敗他，雖然他的文明過於完美，以致減少了他的體力。他所不能保衛的東西，他寧願燒掉，而不肯留給德國人。成熟不一定就是衰頹，德國人在凡爾登（Verdun）已經得過教訓了。

第十章 再論法國人

「不從個人方面來觀察，你就看不到法國。」

——西多弗里特 (André Siegfried)

一 政局的不安

德國可以希特勒一人爲代表，而代表法國的却有許多人。其間當下議員的就有一百六十八人，他們又分成數目繁多的黨派。法國共和政體的歷史祇有六十五年，而內閣却多至九十八屆。平均壽命祇有八個月。目前在世的退任總理，共有十五人之多。——彭古 (Paul Boncour)、加伊猶 (J. P. Cailhau)、馬爾沙 (François-Marsel)、米勒蘭 (Millerand)、斯提韋 (Steeg)、蒲依松 (Bourisson)、旭丹、達拉第、杜邁格、佛蘭亭、泰狄歐、赫里歐、薩勞、賴伐爾、白魯姆——他們活着一天，你就皆得稱他的官銜「國務總理先生」(M.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從某一觀點看來，法國可說是民主政治的「反證」(reductio ad absurdum)。

法國政治之所以極端不穩，蓋有數種成因。第一，誠如西多弗里特所說，法國人的心放在左邊，而他的日記本則放在右邊，所以他往往自相矛盾。第二，各黨派的界限，不像在英美那樣的明確。法國的政治，大半是以人爲中心

的，議員都是個人主義者，而非爲嚴格的政黨黨員；而且有許多議員——本屆國會內有三十一人——不屬於任何政黨。

法國的選舉制度，兼具英美兩國的特徵；每屆國會，定期（四年）改選一次，但內閣的行政方針，在國會內一旦難得多數通過，即須宣告辭職，新的內閣，仍在舊的國會監視之下施政；這便是混亂的由來。政黨的數目很多，但沒有一黨在國會中能佔絕對多數的議席，於是唯有組織聯立內閣。左派自己不能組織清一色的左翼內閣，但要倒其他的閣却有餘。

古拉德（Albert Girard）說：「法國各黨的命名，是顛倒黑白的。所謂『自由黨』實際上很保守；而『保守黨』在精神上、言論上、及方法上，皆是革命的。『社會急進左派』是屬於右翼的；『急進社會黨』是隨波逐流的兩頭蛇；而近年來最反動的政治家米勒蘭，卻是一個社會黨黨員。法國政黨的真相，比影子還要不易捉摸。要劃分民主黨大同盟、左派共和黨，以及共和黨聯盟之間的界限，就是有神仙那樣的聰明，也是難於區別的。」

因爲法國的內閣，不息地在那裏輪流轉換，所以外國觀察者往往弄得眼花撩亂，易於把內閣起落的意義看得太重大了。其實那種登台下台，不見得都有重大的意義。法國的文官——各部的常任職員——把政府的經緯抓得很緊很穩。內閣總理祇是名義上的統治者，而不是實際上的統治者。他「好像氣候的信號球，正確地記錄着某一時的輿論狀態」在他後面，有一個官僚階級在那裏負責進行。

自歐戰以來，法國政府的重大變遷，實際上祇有五次，和英國變遷的次數一樣。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四年間，由

國民集團 (Bloc National) 所統治，掌政者爲克勒蒙梭，邦恩加雷，及財界巨頭。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赫里歐所領導的左翼聯合 (Cartel des Gauches) 掌了兩年的政權。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邦恩加雷以國民同盟 (Union Nationale) 再行登台，來挽救法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四年產生了一連串左翼聯立政府，多少皆有反對寡頭政治及法蘭西銀行的色彩。接着是杜邁格，佛蘭亭及賴伐爾的「國民政府」(Gouvernement National) 時期。及至一九三六年，乃有「人民陣線」的產生。

插入政治漩渦中的最重大的事項，要算是宗教的衝突。法國在宗教方面，分爲兩個極端：那就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共濟會。天主教的團體最大，是國家主義的，保守的，在金融寡頭政治及陸軍中頗佔勢力；有些如「法蘭西行動黨」的小冊子專家們，是保皇黨；但大多數天主教徒皆忠於共和政體，雖然屬於右派。

在另一方面，共濟會大部分爲左翼各黨所代表。白里安被視爲共濟會會員，赫里歐據說也是，旭丹則確實是的。共濟會據稱統制着急進黨；他們熱烈擁護共和政體，非常反對天主教；尤恨金融寡頭政治及一般銀行。在整個歐洲之中，共濟會成爲嚴重的政治問題者，祇有法國一國，例如法國右派曾經攻擊共濟會，說斯達維斯基舞弊案，便出於「共濟會」的陰謀。

二 賴伐爾

「世界上有五六個人肩着和平的責任；命運迫我爲其中的一員。」

賴伐爾，巴黎近郊奧勃維勒（Aubervilliers）市長，塞茵省參議員，前任內閣總理及外交部長，一八八三年生於奧凡涅省（Auvergne）的謝德登村（Châtillon）。奧凡涅人蒙着一個綽號，叫做「煤炭木頭人」（Le Boucraut）。大家於是便轉贈給賴伐爾。奧凡涅省的地層，為遠年的花崗岩所組成，在法國南中部一帶，要算最堅實的；奧凡涅人是法國農民中最不講究清潔的，耐勞習苦，性情狡詐，舉動粗暴，保守成性。他們在法國全境之內，到處販賣着煤炭和木頭。奧凡涅人的體態，有許多頗具非洲黑人的風味，而賴伐爾也是嘴唇很厚，頭髮又厚又黑而發油光的。

賴伐爾的主要特性，在於講求實際，再加上詭譎多端。誠如法國人說，他是 *malin* 的——這個形容詞頗難翻譯，意思是指莽撞機詐，但不傷大雅。有人嘲笑他，說他太聰明了，連 *Laval* 這個姓，都生得那麼特別，上下顛倒，左右翻向，讀起來聲音都是一個樣子。他由赤貧起家，爬到家擁鉅資；但他也是少數不貪污的法國政客中的一個。他像貓一樣的馴柔。因為像隻貓，所以他對於沒有十分把握的東西，就不肯貿然圖謀；他對於每跳能跳多遠，自己先就計算很清楚。他擺住的東西，常令人吃驚。他逃避了入伍，據說為的是患靜脈腫脹病。

曾經撫翼他的白里安，對於他的圓滑，下了這樣一個品評說：「啊，每個人都和賴伐爾合不上來。」然而另一方面，賴伐爾卻是面面俱到。在國會休息室中，他的態度比任何人都要老練圓熟。他是一個「滑頭」政客，善於拍馬鑽營。他不擺架子，也不自矜持，他的朋友之中，有各黨黨員，和各國記者。人家說他以唯唯諾諾的方法來結好於人，所以在法國大人物之中，人緣要算他最好。

他不但善於結交朋友，同時對於一切人們，又皆用着警戒的眼光。他實在過於老奸巨滑，以至無論對誰，都不肯完全信任。法國人原有一種好懷疑的國民性，而賴伐爾的性格中，便含有一個很大的成分。據說甚至他的機要秘書羅謝（Roehant）與人通電話，他也要暗下接過來偷聽。

賴伐爾的遠祖，據說是侵入法國的北非摩爾人（Moor）。他的父親是一個屠夫，他兒時日常幫他父親做些雜務。稍長到學校中去讀書，非常勤奮，並且自習希臘文。當他十九歲及二十歲的兩年間，在鎮中擔任教員。其後他便研究法律，到巴黎參加政治活動。至今他在巴黎上訴法庭中，還是一位掛名的律師。他在以前真正過着律師生活的時候，因為時候很短促，不會接到重大的案件，並且他又喜歡為訴訟者調解，所以是一個不出名的律師。後來他踏進了廣大的政治界，卻有很大的成就。

一九一四年，他代表奧勃維勒市，被選為衆議院議員，他的政治事業由此開章；並且從此以後，他就擇居在那個地方。奧勃維勒臨近巴黎，居民多為產業勞動者；他自遷居那裏以後，就設法與工人密切連絡，那裏共產黨的勢力很大，他因為受多數共產黨員的支持，所以長期被選為市長。一九三五年他再度起來競選，當時法國政府正在進行法蘇互助條約的談判，所以共產黨也沒有和他怎樣為難。他的選民大家都稱他為「丑角」，（Pierrot，按此字含有雙關意義，一指穿白衣白袴面塗白粉的丑角，一指賴伐爾派，因為他的名字叫做 Pierre）他和每個人都合得上來，該市的貧民，尤愛他的本地色彩。

他以急烈的社會主義者的資格，開始其政治生活，至少在一九二二年以前，大家還曉得是極左派的分子。自

從一九二二年以後，他便逐漸右傾，現在立於中央派了。他不屬於任何政黨，並且自稱為「獨立」，說他像法國其他有名的政客一樣，利用社會主義以爲獲得政權的工具，後來便一脚把他踢開了；這話未免不很公平。因爲他從來沒有做某一黨的正統派黨員。他是一隻貪得無厭的孤獨的狼。據說一九二〇年在都爾市（Tours）與社會黨分裂後——當時他反對大多數人贊成與第三國際相聯合的主張——他做了騎牆派，一身而兼社會黨與共產黨員。又據戴爾（Robert Doll）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民族」雜誌（Nation）上講，他曾一度參加流產的「共產社會黨」，可是該黨的勢力還未越出巴黎的勞工區域一步，不久也就消滅了。

賴伐爾當選議員之初，和平運動正在虎虎有生氣，他遂成爲一個熱烈的和平主義者。他的名字當時記在內政部的「乙種不安分子名冊」中，被認爲一個「危險的」反戰論者。他不肯自願投效法陸軍，被強拉進去以後，也祇當了一個普通兵——而且爲期甚短。在歐戰最激烈的時期，他的和平論，頗受一般不願作戰的步兵的歡迎。一九一六年，他在國會中大聲疾呼：「要不是爲了俄國，我們根本不應該參戰！」一年以後，社會主義者在瑞典召開和平大會，他因此又大聲喊道：「瑞典是我們希望的北極星！」

一九一九年他在下議院中落選，一直到一九二四年爲止，沒有爬上政治舞台。誰知他暗中鑽營，竟一躍而入閣了。原來一九二四至二六兩年間，左翼聯合政府負責人屢有變更，賴伐爾被班樂衛委作調人，聯絡白里安和加伊，而昇以工務部長之職，作爲報酬。加伊猶就住在他的屋內，而白里安也喜歡他。及至白里安高居總理，他先被任爲地位重要的祕書長，稍後又任司法部長。

及至左翼聯合崩潰，邦恩加雷登台，賴伐爾便居閑起來。因為在冷酷的遵法主義者邦恩加雷看來，他依然過於左傾了。他得了這個教訓，便設法連絡一個不以左派聞名的人——泰狄歐。及至一九三〇年泰狄歐組閣，賴伐爾得以擔任勞工部長。他同時把白里安與泰狄歐玩於掌股之上。一九三一年正月，他因為得到白里安的推崇，一躍而為總理，並且寧願犧牲了左翼的支持，把泰狄歐任為農業部長。他首次做內閣總理的任期，竟達十三個月，這在法國可算是個長命的了。

爲着要連絡德國，賴伐爾報聘柏林，他是戰後法國總理到德國作政治拜會的第一人。他在國內原是一個八面玲瓏的人，現在他又想在國際上做個面面俱到了。誰知德國對他的接待，卻是裝出來的。（據說當時德國總理白魯寧，恐怕白里安到達柏林車站時，德國羣衆難免要向他示威，因此派了幾千偵探和他們的妻子，預先裝着歡迎的羣衆，把車站佔滿了。）一九三一年六月，經他苦苦的爭辯了十七天之久，法國才承受美國胡佛的停兌法令。因此世界人士皆知道他的堅執。十月間他報聘美國——又是法國總理赴美的第一人——在刺匹丹（Cardan）地方與胡佛晤談。到了這個時候，白里安因爲老而多病，不願活動，勢力逐漸衰弱了。一九三二年正月，白里安便辭去外長之職，賴伐爾遂以總理而兼外相。賴伐爾和白里安，彼此極相照顧；有人說白里安之失勢，是受賴伐爾的排擠，卻是不正確的。

到了一九三二年二月，賴伐爾忽而辭職了。因爲他任意跑到美國去，一部份人對他表示不滿意，並且他既堅主張歸附英鎊，其後由於英鎊之脫離金本位（一部份由於賴伐爾之長期爭論胡佛的停兌令），法蘭西銀行

在票面上損失了二千萬鎊（合美金一萬萬元），因此對他也很有氣惱。這樣一來，他祇好辭職了。可是同時他也多得了一個教訓，以後再做內閣總理，便要很小心，聽受法蘭西銀行的意見。他一開下來，又是兩個半年頭。一九三四年十月，外長巴爾都在馬賽吃了南斯拉夫的子彈，因為不及急救而致殞命；賴伐爾遂繼任外長。一九三五年六月，他的友人佛蘭亭總理，被金融寡頭推倒之後，他又二次擔任組閣了。

賴伐爾的口才不佳，除非絕對必要，他不在下院中演說。他演說時，把左手插在褲袋中，右手在空氣中搖動。有人批評他的演辭不「文雅」，不過這位黎黑的鄉人之子，並不想假裝文雅。而且在會場以外的密談，既然更有效力，又何必在議會中的公開講演上去煩心呢？在必須藉用演說的時候，他的政治的直覺常能幫助他。一九三五年六月，當法國發生恐慌之際，他的前任蒲依松不能獲得下院的信任，而他卻贏得了下院的擁護。

法國政界要人不會著過一本書的，最後志願不想成為法蘭西學會（Académie Française）會員的，怕祇有賴伐爾一人。他不像邦恩加雷或赫里歐那樣好學不倦。他的智能是工程師的智能，而不是學者的智能。他不喜歡抽象，也很少應用藝術、科學及純文學。

賴伐爾是一個典型的法國——非指巴黎——中產階級人物：敏捷、機警、合理、切實，而且爽直。他的智力，可以與一個德國人，例如希特勒的「智囊」羅森培（Rosenberg）相對比。誠如名記者湯布森女士（D. Thompson）所說，羅森培是個最聰明的人，同時也是個最糊塗的人。他像許多德國人一樣，又靈敏又笨拙。脆弱得連黃口孺子都能打碎的，假定他會用極端華美的詞藻作一翻大辯論。賴伐爾卻完全和這種德國人相反，他不但用頭腦思想，而

且用指尖思想。

每個德國人都有國家使命的觀念，而每個法國人都像賴伐爾一樣，具有個人命運的觀念。隨便抓住一個德國人，你會發現他是一隻綿羊，隨便抓住一個法國人，你會發現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根善 (Francis Gunther) 說：「取消了德國人的自由，你可以統一國家，取消了法國人的自由，則必致革命。」

克勒蒙梭有一句名言，他說「白里安不知道一切，可是理解一切，邦恩加雷知道一切，可是不理解一切。」賴伐爾可算處在這兩人的中間。他知道許多，但非知道一切；他所理解的，比所知道的還要多一些，但他也承認他的理解有限。他愛調和衝突。他是一個律師，但不拘泥於法律的形式。他比較一般政客，還有一個特質，就是不尚虛華。賴伐爾的夫人，亦為與凡涅產；她像多數法國政客的太太們一樣，不參加政治活動。他們一家在巴黎的住宅是個一頭不通行賽特別墅 (Villa Said) 和文豪法郎士的家毗鄰。他愛鄉間，甚於巴黎，所以時常回到他的降生地謝德登去。在那裏，這個鄉下人為補償他從前的赤貧，置了一所壯麗的別業。他在內閣形勢危急的時期，每逢星期六也要離開巴黎到鄉間去。他的鄉間地產有兩三處，包括諾曼底省高比埃 (La Courbière) 的牧場。他到各處去的時候，常叫他漂亮的女兒喬賽 (Joë) 作伴。

賴伐爾很少不良習慣；以前他濫吸香煙，自從醫生告誡以後，現在已經減少為八十支一天。他因為白色領帶不易褪色，便於洗滌，所以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一直使用白領帶。

一九三五年六月間，他似乎並不想來擔任內閣總理。他願意繼續做他的外交部長，而他在外部的成績確還

不錯。他知道總理的地位不穩固，而外相卻可保持長久，所以在遲疑了許久之後，才決定擔任總理。他一生的雄心，是希望能做法國偉大的常任外長，和英、意、德諸國長距離交好，以保證法國的安全。他還熱切希望做第一個被希特勒邀請到柏林去的法國人。（這使我們想起一個笑話：原來在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和法國外長巴爾都被害之後，法國人竟想叫希特勒來作一次政治訪問——到馬賽）

他任外相時，正當巴爾都忙着補綴法國在中歐方面斷脫的防線，而惹怒德人之後。這時薩爾公民投票之舉已在目前，賴伐爾以極合理的，像做交易一般的態度，結束這個問題，以求配希特勒的胃口。他的政策很有見識，因為他知道無論如何，薩爾總要被德國收回，所以不如爽快些還給她為妙。在那種狀況之下，慷慨是不費本錢的。甚至他還和英國外相艾登，主張組織國際警察，來監督公民投票；此舉如成事實，在歐洲將開一個極重要的先例。

不久賴伐爾報聘羅馬，並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和墨索里尼成立了一個有名的協定，據稱解決了兩國間的一切懸案。他把利比亞一塊毫無價值的沙漠，給墨索里尼，而從墨索里尼那裏得到了法意兩國在中歐方面一致行動的諾言。誰知道這次遐邇聞名的談話，後來竟給他一個極大的困難。原來在墨索里尼舉兵侵阿之際，法國人既要求到給與墨索里尼——墨氏似乎以為賴伐爾已默許他對阿自由行動——的諾言，而在國聯機構之內，又不能不與英國敷衍。賴伐爾竟然大踏步前進，據說他現在兩方都有面子。

不久制裁問題起來，再加上國內的陰謀，把他的政治生活結束了——至少在現在。

三 赫里歐

愛多亞·赫里歐 (Edouard Herriot) 里昂市長，一個魯鈍而又熱情的理想主義者，擔任急進社會黨 (Radical-Socialist Party) 領袖，迄今已有多年。急進社會黨爲法國下院的第二大黨，其性質略等於英國的自由黨，實際上既非急進的，也不是社會主義的，而赫里歐，一個多方面的人物，很能代表該黨的宗旨、步驟和範圍。因爲一般法國人都是急進的，所以他很具權威。所謂急進分子，當然是屬於人民陣線了。

赫里歐在一八七二年生於里昂，現今還住在那裏。他自一九〇五年以來，一直擔任里昂市長，從來未曾中斷。每當地方人士激烈反對他的時候，他便會跑到市議會去痛哭流涕，使他們不好意思另外提出候選人來，於是便繼續當選。他少時貧窮，讀書多靠自修。最初他做一個教員，後來升至里昂大學教授，最後乃爲衆議員。

他是一個善於表情的大藝人。有時那種過於悲傷的表情，竟會做得奇形怪狀。當一九二六年法郎破產之後，他和邦恩加雷爭論得極其激烈的時候，他涕泗滂沱的對大家說道：「諸位先生：我們決不能再在母親（法國）的病狀旁邊吵鬧了。」他很喜歡把手放在胸口，而後對大家發出動情的演辭來。爲了這個緣故，他受到許多諷刺。（漫畫家爲赫里歐畫的像，老是身體透明，其中有六七個心。）

邦恩加雷爲人清瘦而穿慾，赫里歐則肥胖而饕餮。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日內瓦和赫里歐一同吃「點心」，看見他吃了一盆湯、兩條魚、一盤野雞、許多蔬菜、一盆甜點心、一份乾酪，同時還灌下去兩瓶葡萄酒。他除了葡萄酒和啤酒以外，其他烈酒一概不喝，所以身體還很健康。

赫里歐於一九二四年初任法國內閣總理，一反克勒蒙梭及邦恩加雷之報復主義的政治。歐洲對他存着厚

望和注意。這時赫里歐和隔着海峽的麥唐納，似乎成了新修好時代的象徵。而特別具有大膽、慷慨、寬仁、大方、及學者氣味的赫里歐，更使國家主義的歐洲想起了過去的法國，想起了盧騷（Jean Jacques Rousseau）那種古典的人道主義的法國，想起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各種理想。

他確有一個時期，走着和邦恩加雷辛辣手段相反的路。他和英國成立了協定——當時英法關係非常惡化，——又以解決賠款問題而與德國相和解。在他就任總理兩月以後，法國即已撤退魯爾區域（Ruhr）的駐兵，並使道斯計劃（Dawes Plan）見諸實行。這些事件在今日看來雖非如何重大，但在當時已屬難能。赫里歐給與歐洲一個新的起點。他首創法國倚重國聯的政策，自此以後，法國的外交政策，即以國際聯盟為其中心。

更後直到一九三〇年，赫里歐還是為軍縮計劃而奮鬥；軍縮計劃，也許有引誘德國參加歐洲政治協調的魔力。洛桑協定（Lausanne Settlement）結束了賠款問題，關閉了幽暗的戰後歐洲政局的一幕，而赫里歐適巧就是這個協定的交涉人。在法國歷任內閣總理中，他是和蘇聯講求敦睦邦交的第一人。遠在一九三二年，他就簽訂了法蘇互不侵犯協約。他覺得法國對美應該償付戰債，而吝嗇的法國人，正像有紳士之名的英國人一樣，覺得這種行為沒有意思，於是他就下台了。

赫里歐由此轉變了，他的理想主義和他的令譽逐漸失掉了光澤。他像一般自由主義者一樣，必然地和各派妥協起來。他在杜邁格的內閣中做官，而他的政黨則並未參加。也許有人覺得他反對金本位，反對賴伐爾之遷就銀行業的態度，可是賴伐爾組閣，他也入閣。據他的朋友講來，他這樣的做，是想便於在日內瓦監視賴伐爾的行為，

並加以矯正的。

赫里歐能作宏壯的演說，無論在什麼時候，即使不經預備，也能有洪亮的聲調，和威儀的態度。一九三三年他乘着「法蘭西島」號 (Ile de France) 郵船由美回國，同船有一位波蘭總統兼音樂家派特婁斯基 (Paderewski)。恰巧那一天適值波蘭的國慶日，同船諸人德惠派特婁斯基演奏鋼琴，當時燈光放得很低，使大家對於這位患風濕病的老人，看得不很清切。派特婁斯基好容易舉起老手在鍵盤彈奏他的得意之作，而且奏得很動聽。赫里歐當然得演說一番，爲他介紹。他講話的語調和琴音很一致。結果凡是不認識他的，會疑心他是一個波蘭人。

他像許多別的法國政治家一樣，非常博學，而文章體裁也可算得到第一流。他對於每一句子的節奏和諧，每一形容詞的活潑生動，和每一動詞的恰到好處，看得非常重大，就像他在里昂所愛好的餐館裏吃魚丸子的時候，非有醬油不可一樣。赫里歐著了好幾本書，都是有口皆碑。一本研究法國著名社交花李加梅夫人 (Mme Récamier)；一本研究德國音樂家悲多汶 (Beethoven)，爲歷來所作悲多汶傳中一本最出色的。

四 達拉第及其「銚手」

愛多亞·達拉第 (Edouard Daladier) 代表奧論治市 (Orange) 的下議員，綽號「野牛」、「怪物」、「寡言人」，一一八八四年生於法國的南部。他的面貌與拿破崙非常相像。他在里昂大學讀書的時候，赫里歐是他的教

授；受赫里歐之提携者，亦達十年之久。但現在彼此已成政敵了。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巴黎發生暴動，達拉第和他
的副員，以武力解散示威的民衆，因而博得「銃手」(Fusilliers)的雅號。這班人在急進黨中被視爲「少壯派」，
他們主張參加人民陣線，與社會黨和共產黨相聯合。達拉第在第一屆白魯姆內閣中，曾任副總理。

達拉第頭腦坦白而驢直，演說拙質而有力，生活簡單而平民化，爲人不很機警而頗有聲譽。他娶了一個有錢
太太，但他天性不愛奢華，不尚虛榮。他不是一個野心的投機分子，與鋒銳畢露的泰狄歐正處於兩個極端。

照一九三三年的情形看起來，達拉第的事業前途似極光明。英國人喜歡他，與德國人的關係也弄得很不錯。
在當時法國辣手的環境之中，達拉第似乎是踏破鐵鞋所難覓的民主政治領袖。他以內閣總理兼任軍政部長，一
直做到一九三三年十月，旋因國內一個減薪爭執的小問題而去位。他第一次組閣，只做了四天總理，即自一九三
四年二月三日至七日，但在這四天中，法國政局掀起了很大的波濤。斯達維斯基大騙案和巴黎暴動把他打毀了。
關於這些事件的詳情，留待下章討論。這裏所要說的，就是達拉第被迫到了無法開交的地步，不得不開鎗驅
散科特廣場 (Place de la Concorde) 那些瘋狂的羣衆。照各種證據而言，確是羣衆先開鎗的。但是達拉第可
不能逃避他的責任，他陷入了從未遇到過的一個暗洞中。法蘭西行動黨常稱他爲「兇手」。

在達拉第的短命內閣中，有一位內政部長富勞特 (Eugene Frot)，他是一個青年律師，有一雙生動的黑眼
睛，一臉光潤的黑鬍鬚，從下顎一直連到兩鬢。據一般人所知，他對於當時的議會政治之危機，對於當時法國行政
之缺乏效率，是該負責的少壯派急進黨員中之一人。人們說他是「左派中的法西斯」。他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六

日事變中，是一個主角；因為他使警察總監姬亞伯（Chlappe，科西嘉省人）解職，以致政潮爆發。姬亞伯說，富勞特挑撥火十字團，故施恐嚇，聲言將用他自己的爪牙在街上自由行動。又據人說，這個錯綜複雜的浪漫青年，身任內政部長，自當負治安責任，而他自己卻深陷於左右之爭中，希望從街頭暴動中產生民主政治，使他本人成爲民主政治的「救主」。保皇黨們稱他爲「兇手」。有一次在公共集會中，用一桶屠宰作裏的牲血潑在他的身上。

另外一個「銜手」是高德（Pierre Cot），他在達拉第及旭丹政府中，屢任航空部長。他是一個體格清瘦、面貌不揚的學者，但富有行政能力。他在就任航空部長以後所做第一件事，就是學習駕駛飛機。他的任務在於整飭航空郵政方面的弊竇，並改組法國的民用航空，使其抵於合理而有效率的途徑，所以歷屆內閣都沒有調動他的地位。航空部長一席，好像是非他不可似的。然而二月六日的暴動，終於使他去職了。

他隨達拉第一道參加社會黨及共產黨的聯合陣線。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國慶日，人民陣線在巴士的廣場（Place de la Bastille）舉行大示威；他坐在一輛汽車頂上，揮着一面極大的三色旗；而旁邊一輛汽車上，則飄舞着一面同樣大的赤色旗。羣衆看到他，皆表示歡迎，高呼「迭克推多萬歲」（vive le dictateur）。至於達拉第，則和示威領袖在行列中參加游行。看到達拉第的人很少，看到高德的人卻很多。可是大多數人，仍然相信高德不會做得太過份的。

五 加伊猶



旭 丹

約瑟夫·加伊猶 (Joseph Caillaux) 這位老頭子，現年已經七十四歲了。有許多人當還記得一九一三年時，他的夫人因「策士報」(Figaro) 按此字原爲法國文學家 Barrucandais 戲曲中的主角名字，以足智多謀見稱，法國右派政客即以之爲報名。主筆加美德 (Gaston Calmette) 誹謗其夫，憤而將他殺死，加伊猶的財政部長職司因連坐而去職，但到一九三七年底，加伊猶卻還活着，不但活着，而且是法國政界的重要人物，這不得不引爲奇事。加伊猶是急進社會黨中的一個領袖，和赫里歐及達拉第一般有勢力。他現今在參議院中，擔任很重要的財政委員會的主席。

加伊猶至今還是風流倜儻。他愛驕傲、清潔、和虛榮，但思想精密、頭腦清楚。青年人有一部份極其崇敬他，一部分非常厭恨他。是法國少數勇敢的人中間一個，在歐戰時期，敢大膽的說：戰爭會使勝敗兩方同歸於盡，結果克勒蒙梭不得不認爲他「私通德國」，而把他監禁起來。直到一九二〇年，才公開審判，法官認爲他言論不謹，判決褫奪公權五年，並不准在巴黎居住；這種限制寓居的處罰，在法國通常施諸販賣人口犯、吸毒犯、和殺人犯。加伊猶是一個富翁，且有很高的教養；一九二四年赫里歐將他特赦了出來。

六 彭古

約瑟夫·保羅·彭古 (Joseph Paul Boncour) 法國最有名的律師，當法蘭西行動報不稱他爲「賴伐蒲的童若塵」(Don Jean de la Tavoblo) 時，便稱他爲保羅·亞萊德·彭古 (Paul-Arlette Boncour)——因爲這位著名法律家，曾有結識美麗動人的亞萊德·西門女士 (Arlette Simon) 的光榮。亞女士爲斯達維斯基

的太太，在斯達維斯基舞樂案未發覺以前，當她臥病醫院的時候，彭古是曾經去看她的兩位部長之中的一個。

彭古是下議院中的老手，最初以社會黨黨員的資格參加政治活動，接着自己又組織一個短期的政黨。他的相貌很像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名雕刻家米啓蘭基羅（Michelangelo）所作的天使——也許是墮落的天使罷。他額上刻着許多皺紋，頂上覆着一堆白頭髮。他擔任外長時，在法國參謀本部看來對德過於軟化，幾乎失了位置。他在日內瓦方面，曾經發表過許多漂亮的演說；但因為他在火車站上，忘記會見波蘭外長貝克上校（Colonel Beck），以致大遭攻擊。

急進黨中其他傢伙，都是卑卑不足道。亞爾培·薩勞（Albert Sarraut）前會做過總理，恨極共產黨，是個舊派的政家，當他在邦恩加雷政府內擔任內政部長的時候，把姬亞伯任作警察總監……喬治·龐南（George Bonnet），歷任財政部長，會因一九三〇年在施脫萊薩與斯達維斯基同吃過中飯而被連累。他否認會有一事，於是法蘭西行動黨便稱他為「說謊者龐南」。 亨利·齊龍（Henri Chéron）也會屢次任財長，他在海牙開賠款會議時，英國代表斯諾登（Philip Snowden）稱之「滑稽可笑」。後來斯諾登晉爵貴族，法國各報立刻用頭號標題追述往事：「男爵斯諾登——滑稽可笑」……亞爾培·達里米（Albert Dalimier）在急進黨內閣曾任閣員，他曾勸募貝伊翁債券（Bayonne Bonds）以致引起了斯達維斯基案的爆發。後來急進黨把他開除黨籍，可是已經太晚了。

七 泰狄歐

安德雷·泰狄歐 (André Thureau) 是個巴黎人綽號「鯊魚」生於一八七六年。他在法國右派政治家中是一個代表的人物。可是構成法國社會基石的，是一班巴黎以外的鄉下紳士，他們永遠不信任他，他的政治事業之所以相對的失敗，一部分恐怕就是爲此。泰狄歐曾經三任閣揆；但是因爲他的雄心太大了，所以他現在的地位反而不能副他少年時代的襟抱。他在高級師範學校畢業的時候，名列全班第一；參加外交官考試，亦以第一名錄取；只有二十三歲，就做到一八九九年內閣總理華爾達克·盧遜 (Waldeck Rousseau) 的祕書長。

一九〇二至一九一四年這十二年中，泰狄歐從事新聞事業，爲巴黎「時報」、「策士報」及「兩世界評論報」(Revue des deux mondes) 記者。在法國的近代史上，他可算風頭最健的新聞記者。在這個期間，他又在政治科學院及最高軍事大學中擔任歷史教授；他寫了六冊近代史。他於一九一四年被選爲下院議員，開始政治活動；歐戰前半期中，都在前線作戰，嗣因負傷，中毒氣，軍部特予召回，贈以勳章。克勒蒙梭把他提拔起來。自從一九一七年以後，他便成了克勒蒙梭的羽黨。最初被任爲駐美專員。他以周旋中節，英語流暢，和擅長交際，頗受美國人士的歡迎。後來他更被任爲參加和平會議的代表，並任解放區域的地方長官。

這位聰明、機警、手段圓滑的人，一生蒙受許多不名譽的指摘。某次有一位議員在下院中說：「有一些人，大家都知道他們貪污，但至今未受處罰。泰狄歐先生，世界上有權罵他人爲賊骨頭者，你是其中最後的一個。」(見 Quinny Howe 所著 World Diary 第二五頁。)他在下院中，時常惹怒社會黨，每當他惹怒他們的時候，他們就大叫「Hons-Bagdad」或「N'goko-Shanghai」——這兩個古怪的名字發音很難，可是叫起來極響亮。

所謂「Horns-Bagdud」者，原是大戰以前一個銀團的名稱，該銀團曾從土耳其獲得某項鐵路築權，現在那個地方已屬伊拉克國（Iraq）。泰狄歐被指摘的第一個原因，爲的是運用他的「勢力」在巴黎「時報」上爲銀團鼓吹；第二個原因，爲的是以不正當的壓力，加諸反對該項築路權的法國駐土大使；這件事情還牽涉到法國外交部的三個青年職員，他因竊取檔案中的秘密計劃而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

所謂「Nigoko-Shanghai」者，原是非洲剛果（Congo）取得某項讓與權的公司名稱。早至一九一一年時，泰狄歐對該項權利就有關係，當時該公司的舉動，盛傳黑幕重重。他在一九一九年任和會代表時，曾力勸克勒蒙梭於凡爾賽和約上，加一條款，賠償該公司股東戰爭期內的損失——這種純粹屬於商業性質的事情，當然不應該放在和約上面。

泰狄歐有一次倒閣的原因，爲了奧斯得利克銀行（Oustrie Bank）的舞弊案，後來國會組織調查委員會追究此事，證明泰狄歐與奧斯得利並無關係。他曾與奧氏同過一次餐，可是社會黨首領萊翁·白魯姆同日也在座。三年以後，他的名字又被牽累於斯達維斯基大騙案中，因爲在這個大騙子的支票存根上，有一張寫着「泰狄……三十萬法郎」幾個字樣。可是後來證明，這是一個玩笑，原來泰狄與泰狄歐並非一人。

一九三五年，他欲藉攻擊急進黨來推翻杜邁格的舉國一致內閣，接着便辭了閣席，是年一大半時光，在退休中過去。據說他的政躬違和，醫生說他將不久於人世。泰狄歐在右翼方面，正和達拉第在左翼方面一樣，都輕視目前的議會制度。曾經表示過，任何內閣，如果仍舊建立在目前這樣的基礎之上，他決不入閣。今後法國若變爲法西

斯或半法西斯，則泰狄歐也許再要成爲一個重要的而且危險的人物。

八 蒙德爾與萊諾

法國政治人物中，還有一位傑出的角色，名爲喬治·蒙德爾（Georges Mandel），真名爲羅斯契爾（Rothschild），他自稱是獨立的，而實際則屬於右派。在一九一七至一八年，他是克勒蒙梭之最大的幫手，因爲老虎總理把全部精神完全放在戰爭方面，所以那兩年間的法國，實在是由蒙德爾主持的。自此以後直到一九三四年，他老是做一個不露面的紅衣主教李契留（Richelieu），隱在幕後牽線的要角。他知道一切，同時不忘記一切，當他在國會中發言的時候，全場都要爲之震倒。雖然歷任總理皆想請他入閣，但他不願正式做官，直到最後才接受佛蘭亭的敦促，就任郵電部長。法國一切重要事項，無論爲明爲暗，他都能夠聽到。他對於第三共和國的祕密生活，可說是一部沈默可畏的百科全書，因此他的權力很大。

據傳蒙德爾在當初向克勒蒙梭要求在老虎總理的機關報館任職時，克勒蒙梭說：「你簡直是一隻醜老鼠。」蒙德爾指着老虎總理對面的鏡子說：「我在鏡子裏面也能看到。」老虎總理因爲蒙氏不通國際情形，便指定他專寫外國領袖人物的文章。他有一次說：「蒙德爾，你的文章寫得並不比別人壞。不過太繁雜一些。以後請你在每一句句子中，只用一個主詞，一個動詞，和一個目的詞。目的詞必須用直接目的詞；如果你要用一個間接目的詞，得先和我商量。」

於是十五年來蒙德爾一直追求着許多間接目的——但不是屬於文字方面。

右派方面還有一個重要人物那就是保羅·萊諾（Paul Reynaud），一八七九年生於巴塞羅那德省（Barcelonaet），他是一個律師，並且是多年的下議員，在泰狄歐內閣中任過財長，在賴伐爾內閣中任過殖民部長，萊諾是巴黎名律師羅貝（Marthe Robert）的女婿，他頗有才能，並且具有雙重外交策：一方面是個熱情的國家主義者，但同時又主張德法修好。他的主張對德談判，比當代法國其他人物還要急切得多。一九三五年關於阿比西尼亞問題他所發表的反對賴伐爾的言論，非常引起世人注意。他說法國如果爲着墨索里尼那種不可靠的友誼，而和英國疏遠起來，那簡直是發瘋了。

九 中央派佛蘭亭

誠如西格弗里特說，法國政界的中央派，並不是如何龐大的天然集中點，祇不過是中分左右兩派的分水線而已。中央派的典型人物，當推佛蘭亭（Pierre-François Hanudin）。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領袖，也不是一個動態的人物，但也有可取之處：如勤勉，講求均衡，在經濟及財政方面，具有豐富的技术智識。但是因爲他主張貨幣貶值，所以正如前面所述，被法蘭西銀行逼得下野了。

佛蘭亭身長六呎四吋，體格結實，高大得像一座建築物，所以有「摩天樓」的綽號。他在四十五歲時，就任內閣總理，在法國歷史上算是年紀最輕的總理。大戰期內他是一個飛行員，他雖屬於中央派，但爲一個虔誠的共和

主義者，他的家庭雖然富有，且與重工業界有裙帶關係，但也並不贊成寡頭政治。他早上不讀報，而在修面時聽七點一刻無線電時事廣播。他任總理時，特別裝設一架電話機，使他自己的侍從長——多少帶些密探性質——不能偷接他的消息。

十 基督將軍魏岡特

一九三五年初，魏岡特將軍 (General Maxime Weygand) 辭去法國陸軍總監職務時，已臻六十八歲的高齡了。不過如今戰事倘再爆發，這位老態龍鍾而雄心未死的隨軍牧師，這位「華沙奇蹟」的著者，恐怕一定還要東山再起，再度充任法國陸軍的領袖。

他是一個外國人，生在比利時，謠傳爲比王奧波爾特二世 (Leopold II) 的私生子，他冒名考進法國的聖西爾陸軍學校 (L'École de St. Cyr)。在第一次馬內 (Marne) 之役以後，霞飛 (Joffre) 派他做福煦 (Foch) 的參謀長，於是在整個歐戰中間，他一直做福煦的右手（福煦會這樣稱呼他）。福煦和魏岡特一樣，也是虔信天主教的，於是這兩位將軍每晨在開始大屠殺以前，總是一同當衆祈禱。

歐戰告終之後，福煦將魏岡特借給波蘭人，他便着手改組波蘭的陸軍，增加其戰鬥力，並且在兵臨波京華沙城下之時，把赤軍全部擊退。波蘭人對於他打救他們的恩典，當然不會忘懷；他並未向波蘭討取報酬，但波蘭人卻很不高興這一點，要是換了別一國人，當然以爲這是最好也沒有的了。魏岡特爲人很爽直，他曾說道：世界上最壞

的陸軍，當推波蘭和俄國。

這裏很值得引用克勒蒙梭對於魏岡特的意見：

「魏岡特有些了不起。醜陋——他生得醜陋，畸形，滿身疙瘩，彎腰曲背，我想他在小時候，一定被父母時常拷打。但他很聰明，很有一些本領；很像一個不露光的暗火。在協約國聯席會議上，他每每使我生氣。他是一個——我怎樣說呢？——有危險性的，在緊急時能有作爲的，冒前直衝得過遠一些的人。……危險，但也貴在於此。……他有一種特質，就是自己不講，也不待人家對他講，就知道怎樣去做自己的工作。他到波蘭去，在那裏做了些什麼我不知道；但他所做的一定是應該做的。他回來之後，也不講什麼。你不知道他過去做些什麼，或現在做的是什麼。好處就在這裏……福煦並不愚笨。他有好少年的天稟，爽直。魏岡特還有一些了不起的地方，那便是溫文和深刻。他是一個澈頭澈尾的教士，那當然不用說了。」

魏岡特因爲太迷信於天主教，遂不免引起左派的懷疑。他們責備他具有政治的野心，怪他把聖西爾陸軍學校變爲保皇黨和天主教的大本營。魏岡特在到波蘭去的前後，確是十分厭恨共產黨的。他曾一度擔任敘利亞的總督，後被赫里歐所排擠，而由赫氏繼任。直到現在，他還不曾晉級爲法國的大將；雖然也許從技術方面看來，祇有陸軍最高司令長官，才能爲大將，而他只是參謀總長而已。右派對於魏岡特頗存厚望，而法西斯同盟，更把他看作寶貴的寵兒。

貝當大將（Marshal Pétain）在杜邁格政府之下，曾任軍政部長。他是「左傾的」將領，換言之，是個善良的

共和主義者。因為他在軍事上成績卓著，不可磨滅，所以右派也只好容忍他。不過貝當現在已經八十歲了，無論在軍事上或政治上，都已沒有實力了。

十一 總統勒白倫

法國現任總統勒白倫 (Albort Lebrun) 是個和藹可親無傷於人的老年紳士；如果他不病死，而法國亦不發生革命，則他的總統一席，是可坐到一九三九年的。正像法國其他一切總統一樣，他是一個極端安分人物，不露鋒芒，沒有怪僻，安居總統府中。據說他愛流淚，所以漫畫家爲他畫的像，老是站在水壑中。有一次，一個騎腳踏車的人將他撞倒了，他對於那個粗心的惡徒，竟然贈給五百法郎。他有個叫做「寶寶」的綽號，因為他在就任總統之後，帶着太太、兒女及孫子女多人拍攝有聲影片。他的小孫子忽然哭起來，勒白倫忙把他抱在膝上哄騙，忘記了有聲電影，嘴裏對孩子「寶寶」的哄個不住。於是這些不幸的聲音便傳遍了整個法蘭西。

勒白倫原是邦恩加雷手下一個並無藉藉名的輔佐，直至杜美 (Doumer) 被刺殞命後，才把他抬舉起來做總統。他根本屬於右派，可是激進派的內閣，儘管川流不息的掉換，他還是安然做他的總統，雖然，當斯達維斯基 大鬧案鬧得滿城風雨時，曾有動搖的危險。魏斯 (Weiss) 在其「法國在醞釀中」(France in Ferment) 一書裏，講起一則他上台的小故事。他不肯減輕刺殺前任總統杜美的兇手戈爾古洛夫 (Gorgulov) 的死罪。於是他那位講求實際的太太便罵他忘恩負義。她說：「要不是戈爾古洛夫把杜美刺殺，我們那有今日的肥缺？」

第十一章 法西斯與人民陣線

「民主主義如果不能自衛，即無存在之權利。」

——麥米兒·富蘭克博士 (Dr. Emili Franko)

一 斯達維斯基案

斯達維斯基案件的內幕，其大要如此：他是一個小流氓，認識若干要人，及至他的小作弊機關崩潰後，即行自殺；一說是被人暗殺的。像這樣的案子竟能震動法國的議會政治，自不無理由。在法國六百十個眾議員和三百〇五個參議員之中，認識斯達維斯基，或與他稍有瓜葛的，至多不過十人左右；而他騙得的金額，總數也僅有四千萬法郎；可是這件事的關係，竟牽連到法國政治生活的核心。

法國向有成千成萬的政治騙子，間接又間接的結識一班與內閣官員有瓜葛的人。他們時常等在官廳的應接室中，偷用公家信箋。法國的律師，像美國的情形一樣，祇要到法庭去說一聲當事人「有病」，案件的審問便可以延期。法國政府的本身並不見得怎樣腐化，但是一出了辦公廳而到要人的私邸中，則都糊塗、「拉攏」和腐敗。斯達維斯基並非是個高明的騙子，但他卻有拉攏的手段。這種情形未見得就算是腐化，議會政治的風氣根本是

如此。當案件洩露之後，旭丹最初尙冀加以遮掩，豈知事體弄得欲蓋彌彰。旭丹事前究竟知道有多少，大家都不能確定。不過右翼反對派，如法蘭西行動報、法西斯聯盟會、冶煉業公會，以及金融巨頭，便利用這種無上機會，來攻擊「共濟會」，急進黨，左派，和政府。

斯達維斯基 (Serge Alexandre [Sacha] Starvicky) 一八八六年生於俄國的基埃夫 (Kiev)，他出身於猶太小資產階級的破落戶。他的老父在其子的第一次舞弊被發覺以後，就羞憤自殺。……斯達維斯基的行業，在巴黎的下層社會中，可算是典型的。他開設妓院，販賣毒品，私造貨幣，設局翻戲，最後還參加拐騙事業。他的行業很得手，於是買進一座戲院，在都城 (Deauville) 聚賭抽頭，並且還收買一家報紙。……誠如魏斯說，他已在下流社會的低級班畢業，而升到高級了。

一九二六年間，因為有兩個捐客控告他騙了美金三十五萬元，他被當局逮捕，這是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立刻就得到了假釋，自此以後再也沒有進過監獄。巴黎檢察署對於他的案件，前後延審達十九次。檢察署長普萊沙是旭丹的舅子。巴黎警察當局，也「知道」斯達維斯基，並且曾經辦理他的案件達四十五次之多，而卒未加逮捕。

斯達維斯基在假釋期間，正是最得意的年頭。他支配着兩家日報——都是下流小報——一為左派的意志報 (Volonté)，一為右派的衛國報 (Rassemblement)。他的法律顧問，有一位是前任司法部長雷諾爾 (Renoult)。他認識無數公務員並賄通了十九個下級官吏——那班人因為薪水很少，生活困頓，所以樂於受他的賄買，他們在事敗

之後至少有兩個自殺。他自己有一批保鏢，由「喬麗王」(Jo-La-Farour)領頭。他的朋友杜巴里(Dubarry)把他介紹給警察總監亞伯·杜巴里自命爲一個新聞記者，結識許多要人，連泰狄歐也在內。^(註)他真是一個多方面的人物，內政部保安隊(Cherite Generale)——與巴黎市警察局是兩個機關。

斯達維斯基的手段雖然高明，但在一九三三年中失手了兩次。於是他想了一個新計劃，假冒貝伊翁市立當舖的名義，發行僞債券，流行於市面。旭丹內閣中的一位閣員，竟然爲這種僞債券介紹給朋友來推銷。在一九三三年聖誕節前後，真相透露了出來。七年來封在上百張嘴裏面的祕密，噴出來成爲怒吼的舞弊的急流。斯達維斯基與僞債券的關係，以及他在警署裏犯罪的記錄，都一古腦兒公布於世。他從警署裏拿到一張假造的護照，躍之大吉。他逃到法國東部沙穆尼山谷(Chamonix)住了兩星期，希望風潮能够平息下來，誰知反而愈鬧愈大。到了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他知道他的前途已經絕望；據官方宣布，他就在那天自殺。但據說那是警署爲了滅口起見把他殺死的。

這次案件真是鬧得滿城風雨，在一月裏就嚟嚟的發響而沸騰起來，到了二月六日大流血，遂達最高峯。此案牽涉非常之廣。達拉第怒姬亞伯之無能，任祕密警察長道梅(Thome)爲國立法蘭西劇院的監督。右派聲稱達拉第之升遷道梅，把前任監督法白爾(Emile Fabre)免職，是因爲法白爾上演了沙士比亞的「羅馬英雄科立奧」雷那(Coriolanus)一劇，而這個劇本，左派斥爲「權力主義」的。法蘭西行動報大聲號叫，說保安隊和共濟會爲着要保全自己的腦袋，所以暗殺了斯達維斯基。右派議員攻擊政府，說急進黨曾經接受斯達維斯基的捐款，補助

黨費。法西斯黨徒，則開始結隊到街上示威。

幾星期後，又發生了普倫斯 (Prince) 案。敘述這件血腥氣的案件，我簡直覺得有些慚愧。普倫斯博士原是檢察署裏一位行動有些曖昧的法官，那天他正在草擬斯達維斯基案的報告書，忽然接到一個來歷不明的電話，說他的岳母生病，騙他到第戎 (Dijon) 去。第二天有人在巴黎第戎間的火車軌道上，發現了他被火車軋壞的屍體。據官方報告，說普倫斯因為辦理斯達維斯基案失職，所以懊喪自殺。誠如佛蘭南 (Janet Flanner) 說，要是聽信這個說法，那末真相便是這樣：「這位法官自己捏造一個假消息，託故赴第戎，先把自己在一輛怪汽車中麻醉，不知不覺的馳到冷靜的鐵路上，然後讓火車輾過自己的身上。」最初好像就是如此。後來經過調查的結果，又確切判定，——雖然不能令人相信——普倫斯是自殺而死的；因為他與斯達維斯基案件也有些關係。於是為着普倫斯案，又發生了新的彈劾與反感。法蘭西行動報，說是保安隊謀殺了普倫斯，以圖滅口。

一一二六事變

我們再來看一看二月六日的慘劇罷。這件悲劇的情形，可以概略地說一說。法國的暴動，可說是世間少有的瘋狂的交戰團體，都會保持着完好的紀律。這次事變慘殺了十七個人，負傷的達數千名；但在下午七時半至九時之間，戰鬥就停止，因為各人都要吃晚飯去了。在戰鬥開始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這是革命；而不過是一次大規模的暴動而已。共產黨、保皇黨、法西斯黨、和社會黨，肩並肩的在紅旗和三色旗之下，一同抵抗警察和衛兵。及至敲了十

二點鐘，戰鬥便全部結束了；因為巴黎地底火車在十二時半停駛，而各人都不願徒步跑回家。於是滿身血污的，裹着綳布的戰士和警察，一同擠到火車裏面。及至第二天早上七時半，他們又出來對打了。

在整個的正月當中，右派暴徒時常出來示威。及至一月二十七日，旭丹內閣被迫辭職，達拉第繼起組閣。他預料法西斯難免掀起政變，所以他說他的內閣，將為一個「敏捷堅固」的內閣。左派和右派的武力，已快到接觸點了。達拉第覺得警察總監姬亞伯，似乎故意縱任示威者滋事，或者竟會將全市交與右派的叛徒。在事實上，一般警察在正月間，對於示威者都很寬容，每次都讓他們幾乎——但並不完全——衝到國會。

經富勞特的愆惡，達拉第決定排除姬亞伯。他的佈置真是令人莫明其妙。他鑄下一個大錯：不是一腳把他踢開，而是調他去做摩洛哥的總督，以償他的失意。姬亞伯拒不接受。後來在議會上答覆質問的時候，他們兩人各有各的說法。姬亞伯被免職之後，在電話中說——他老是在電話中說話——「就算這樣，我今晚要上十字街頭了。」他力言他所謂「上十字街頭」是法文中的「à la rue」，意思是「失業」，而達拉第以為他所謂「上十字街頭」是法文中的「dans la rue」，意思是指暴動。所以達拉第認為革命既難免發生，他就必須採取防衛手段。這是二月三日的時候。（法國最俏皮的報紙 Canard Enchaîné 另闢蹊徑，說是姬亞伯既未說「à la rue」也未說「dans la rue」，而是說「Chez Larue」，意思是「上拉留酒家」，巴黎一家著名餐館。見魏斯書一三二頁。）達拉第新任了總理，定於二月六日首次出席國會。「反動派因為他在國會中一定能夠獲得多數，於是發起狂來了。」各種十字街頭的團體，如皇室人馬團（Chamois du Roi）、青年愛國團（Jeunes Patriotes）、法國

團結黨(Solidarité Française)火十字團(Croix de Feu)以及全國退職公務員聯合會(此會比較溫和，但亦最爲主要)等，都準備示威。巴黎警察多數信仰姬亞伯，因此對於示威非常冷淡。達拉第不得不手忙腳亂的把駐紮在鄉間的衛兵召到巴黎來，因爲這批衛兵對於政治並無熱忱。

無論如何，達拉第是不能讓那三萬示威的羣衆，在當夜得入康科特廣場的。於是他和富勞特兩人，竭力從事預防的布置。他們倆本來或可禁止示威，但因不信任警察，所以不敢這樣做。他們借重衛兵，第一步就是不智；可是決心既已下了，那就得有許多衛兵，幾個是不夠的。究竟誰先開鎗，誰也不肯承認。鎗聲既響，羣衆就變得不易駕馭。——瘋狂得足以大鬧國會，而把其中的議員殺得一個不留。結果死了十七個法國人，其中有些還是曾經爲祖國而戰的老戰士。

三 未來希特勒洛克

法國第一號法西斯，法國唯一可能的「進軍羅馬」者，是加西米·洛克中校(Tenant-Col. Casimir de la Rocque)，火十字團、國民義勇隊及少年火十字團的總領袖。他生於一八八五年，家世顯貴，其父爲一伯爵，在大戰時與凡涅一役中任砲兵司令。

洛克爲人清瘦有風彩，頭髮稀疏；善於組織羣衆，但不善於宣傳；學識淵博，但威儀不足動人；富於思考與勇氣，但缺乏魔力。他的名字對於他很不利，因爲法國人覺得「加西米」是個好笑的名字，就好像一個「總統狂」在

美國而用「亞爾豐斯」或「加米匹」的名字也不會得到好結果一樣。

洛克的軍事生涯頗為煊赫，他以優等成績卒業於聖西爾陸軍學校，於一九〇七年，至摩洛哥開始實際工作，在北非洲住了九年，當時在故大將李耀德 (Marshal Lyantoy) 之左右，為一最傑出的青年。他的亞拉伯語，幾乎能夠說得爐火純青。據說他有一次曾被訓責，因為他浪費子彈，並無敵人而在沙漠中大開其鎗，想欺騙上司以為他真在打敵人。他方面，他受過幾次傷，也受過幾次獎。一九二一至二三年間，他任福照的參謀，旋即隨從魏岡特到波蘭。一九二五年他重回摩洛哥，參加攻克里姆 (Abdel Krim) 之役；並任「第二科」(特務機關)科長。一九二八年他辭去軍職，着手組織火十字團。

他出身上等中產階級，虔信羅馬天主教，反對自由主義。他的兄弟貝爾·洛克伯爵 (Count Pierre de la Rocque) 為巴黎伯爵 (Comte de Paris) 的副官，而巴黎伯爵則為法國國皇位覬覦者居斯公爵 (Duc de Guise) 的承嗣人。但貝爾與加西米兩兄弟的感情，並不融洽，加西米伴作不熱心於政治，並脫離許多政治團體的關係，表示不願接受保皇黨明顯的援助。

他時常談起自己的「祕訣」，是由愛國熱情、軍人道德、和宗教信仰三者混合而成的。他的背後雖有強大的勢力，但他否認具有獨裁的野心，他說他所需要的祇是法國能有「秩序」。他向來不會參加競選，但他的部下則永久醞釀着政變。他說他將要扶助「有用的」政府，攻擊「危險的」政府；但他從來不會確實表示過何為有用，何為危險。「他不是耶穌基督，而祇是使徒約翰」，他有一個黨徒這樣講；但未解釋這句話的真義，也未表明誰才

真是耶穌基督。他的社會政綱，是以上層階級蓬德爾太太式的慈善主義（Lady Bountiful Charity-pater-nalism）為基礎的，他的團體在貧民區設了許多施粥廠，還造了幼稚園和慈善醫院。

洛克像是一個灰色的法西斯；但是民衆仍然怕他。他像希特勒一樣，組織了一個私人軍，只是限制頗嚴格；例如第一個條件，便是團員只限於上過火線得有十字勳章的退伍兵。目的極其空泛，據說在於「恢復為祖國而犧牲的『秘訣』」而獻身為法國服務。」他的黨徒在開頭很左傾，有一項非正式的政綱，是掃除法蘭西銀行的董事；然而洛克本人，卻是與產業巨頭勾結得很密切。據說溫台爾就有該團第十三號團員證。溫台爾之於洛克猶德國鋼鐵業巨頭帝森之於希特勒，他以巨額資金支持洛克。此外，洛克還有兩個後台老板：一為電氣業大王梅萊（Ernst Mercier），一為香檳業巨擘繆姆（Mumm）。

正像希特勒一樣，洛克逐漸放棄了他的社會主義的信徒。這班人要求他們所謂「中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這顯然模倣國社黨的玩意兒，一方面厭惡無產階級，一方面又具有一些社會主義的雛形。洛克的一個主要助手穆德孚（Bertrand de Mauhuys）——其父為歐戰時統率藍鬼隊（Blue Devils）的有名軍官——因為要求在法西斯運動中增加一些社會主義的成分未遂，脫離了洛克；正像奧士·施德拉薩脫離希特勒的情形一樣。洛克不但使他左派的信徒大失所望，就是右傾分子，也覺得他太迂緩，太謹慎了。一九三五年四月，他的部下有兩三個人，侵入巴黎費多路（Rue Feytaud），社會黨主義聯合會的總機關中搜劫軍火，結果毫無所獲。洛克頗為煩惱，經過一翻嚴厲的責問之後，最後便將他們開除了。

他一共遇到三次可以奪取政權的機會，但每次都錯過了。在二六事變中，他的隊伍很可以佔領國會，但他把部下撤退。據他說來，「法國還未成熟。」他也許要想像希特勒那樣，以合法手續取得政權。在杜邁格辭職之後，他已像一九三二年的希特勒一樣，政府領袖有事常向他商量，但是沒有人請他組閣。他時常攻擊法國議會制度的弱點。他說：「我們（軍人）一度救過法國，我們能夠再來救她。」這也許就是他的政綱。要做一位民衆的領袖，他是太猶疑不決了。「天之驕子，是不該長期立在門外的。」

火十字團在最盛的時候，據其領袖說，包羅團員五十萬人以上，都是退職軍人和他們的兒子。火十字團的紀律很嚴格，組織方法也很秘密。洛克力主完全實施領袖主義，雖然實施起來要與法國人個人主義的性格相衝突。團組織不僅支配着團員和金錢，並且還支配着許多乘客汽車和運輸汽車，以及六十架飛機。他們時常深夜在巴黎郊外作秘密演習，而且有一次若非經了政府嚴重脅迫，他們還想舉行飛機示威哩。法國火十字團的意義，與美國三K黨（Ku Klux Klan）的火十字團不同；所謂「十字」是指大戰時所得的十字勳章，所謂「火」是指前線戰壕裏的砲火。

洛克的勢力雖然雄厚，誰知在白魯姆內閣解散火十字團及其他右翼各同盟時，這位中校竟像綿羊一樣沒有抵抗，這件事真令人驚奇不止。他想將部下組成一個合法的政黨，即「法蘭西社會黨」（Parti Social Français），可是沒有成功。自一九三七年克里其暴動（Clithy riots）以後，世人發現了這位純潔的神祕的人物，竟然曾經受過泰狄歐的秘密津貼，於是他的信譽就一落千丈了。

四 其他法西斯之花

火十字團，在其他街頭團體之中，是「最高尚的」，因為法國人是一種高尚的民族，所以連他們的法西斯主義，也要竭力做得彬彬有禮。（奇怪的是，這許多團體，誰也不承認自己是「法西斯」。）公開親德的祇有一個團體，那就是「法蘭西團」（Francistes），一個勢力很小的魚秧子，大家都說他們受有德國人的津貼。

「青年愛國團」的後台老闆是重工業，其領袖為衆議員泰亭善（Pierre Taittinger）。他們是國家主義派，反對共產主義派，而且是極右派。團員據稱達四萬人，其領袖中不乏當時重要人物，如衆議員葉巴內加里（Ybarrigaray）等是。李耀德大將是一個名譽團員，而魏岡特將軍，據傳也是的。

「法蘭西團結黨」是科西嘉化妝品製造商科蒂（Coty）所組織的。該黨比火十字團要右傾得多，但還不到青年愛國團那樣右。科蒂既未插進金融巨頭的行列，所以藉此團結黨以謀自重，而對抗法蘭西銀行。據稱該黨黨員共有十八萬人。

全國參戰兵士協會（Union Nationale des Combattants）凡有會員九十萬人，他們比較不大喜歡到街上示威。昔日戰士聯合會（Federation des Anciens Combattants）有會員四百萬人，是右派組織最大最重要的分枝，現在已成爲「左傾的」退伍軍人團體。舉凡這些最右傾的團體，一九三六年都受了白魯姆的壓制。

保皇黨本來應該另立一節來敘述，但因篇幅關係，只好附帶在這裏說一說。他們的機關報當然就是「法蘭

西行動報。」他們到街上示威的團體，爲「帝國人馬團」由一批無賴所組成，以掃帚爲武器，因爲加入的人很少，所以託失業的亞拉伯地毯商人一類傢伙代徵會員，而這批人，大家都知道是下等咖啡館裏的老顧客。該黨領袖有雕刻匠沙特 (Real del Sartre) 組織員布若 (Maurice Pujol) 宣傳小冊專家穆拉 (Charles Maurras) 及都德 (Leon Daudet) 保皇黨的經費，多由「皇室婦女協會」中的老寡婦所捐贈。他們雖然發狂般的叫聲，實際上地位並不重要。法蘭西行動報，在新聞界把法國弄成了一個非常好笑的國家，但其影響不過止此而已。至於皇族的本身，反而唾棄他們。

五 姬亞伯

法國最危險的人物，恐怕不是魏岡特或洛克，而是那個短小精悍帶白手套的前任警察總監姬亞伯——在巴黎，到處以小型約翰遜 (Jean Hess) 聞名。

姬亞伯和拿破崙·科蒂和巨匪斯巴達 (Spada) 同鄉，都是科西嘉州人。真是有些奇怪，最初他爲急進黨內閣所起用，而現在卻屬於極右派了。他的義女婿加布夏 (Horace de Carpucci) 也是同鄉，辦有一份最反動的日子報，名爲 Gringoire。姬亞伯有個朋友叫做曹格拉福 (Zographos) 是一家希臘公司的經理，該公司專在都城 (Deauville) 比亞里滋 (Biarritz) 及蒙德卡羅 (Monte Carlo) 等地以開設賭場爲營業。姬亞伯在任警監的時候，和部下警察相處很好。

禿頂、櫻黑、矮胖而壯健，姬亞伯是個著名的決鬪家，如果演起戲來，他是一個驚心動魄的角色。他的性格陰險而兇狠，足以代表巴黎一羣科西嘉同鄉的生活。他的相貌好像歌舞劇中的反派小生，又好像翻戲黨，一個快活的而過於矮小的藥學教授；一個馬戲班裏的野獸訓練員；一個土耳其浴室中的粗鄙侍者。他在社交界很想多結英雄豪傑，而且也很著名——至於在某一部份。

姬亞伯於二六事變免職後，重入政界，是很可驚人的一件事。他先被選為代表巴黎近郊聖傑門區 (Paris (district of St. Germain des Pres)) 的市參議員，後來又成為巴黎市參議會主席，即巴黎市長。假如有一天他能在右翼內閣中做閣員，則達拉第、富勞特及其他社會黨和共產黨的皮毛，恐怕都要飛脫了；因為這個帶白手套的科西嘉人，是個著名辣手的獵赤專家。

姬亞伯之失去警察總監的職司，間接由於斯達維斯基。他不得不承認會「遇見」過斯達維斯基，但他以科西嘉人的咒誓否認會和他「勾結」。

六 新社會黨

這是一些背叛白魯姆過早了的人，領導者為牙科醫生馬奎 (Adrien Marquet)，鮑爾度市市長。他於一九三三年退出那正統派第二國際的社會黨，另組一個小團體，即新社會黨 (Neo-Socialists)。他是一個大膽強暴的政客，在鮑爾度市有個地方組織做後盾，以與赫里歐在里昂市的地方組織相對抗，下議院中受他支配的議

員達五十人。馬奎是個比較年青、有力、極受女人喜歡的人，而又是法國人認爲見風轉舵者。據傳某次有個舊日的社會黨員，到市政府去拜訪他，口口聲聲稱他做同志，馬奎很不高興的說道：『在市政府外面我是「同志」，在此地我是市長！』

馬奎之所以脫離白魯姆，由於他覺得正統派的社會主義，已經不能適應戰後歐洲迫切的需要。他常叫的口號是「秩序、權威、和民族」。他自己承認國社黨德國某幾種特質，是他所稱贊的，且謂世界——及法國——需要革新、改造、和「善意的權威主義」。可是後來他之參加杜邁格的「國民」政府，實在鑄成一個大錯；使他的同志懷疑他改變了主義，因而把他逐出他自己所組織的那個新黨了。

繼他而爲新黨領袖的，是戴亞 (Marcel Déat)，一個與凡涅人，與賴伐爾同鄉，急躁而勤勉。

可是馬奎和戴亞兩人，目前都不怎麼重要，而且當人民陣線在朝的時候，他們兩人在政治上並無作用可言。

七 背黨的道里奧

獨特異見的共產黨員道里奧 (Jacques Doriot)，在法國政界中是一個有趣味的人物，因爲他代表托洛斯基主義的殘餘。他的新黨組於一九三六年春間，名爲人民黨 (Popular Party)，同時還辦了一份民族解放報 (Émancipation Nationale)。該黨初視之好像祇是那些阻擋左翼方面有效合作的「分裂」團體中的一個。但是如果把他看做一個反史丹林的共產黨員，則道里奧畢竟有些重要；他反對當今蘇維埃的政策，認爲那種政策

爲了鼓吹保衛民族主義，竟把革命停放下來了。他要求立即革命，說是蘇俄「帝國主義者」史丹林爲着蘇俄的需要，犧牲了法國的需要，並且出賣了「真正的」共產黨。不幸今日如在法國煽起革命，則足以削弱法國對抗全世界共產主義之大敵的希特勒的力量。可是這話似乎並無多大意義，而道里奧也不至於與希特勒爲友，而且採用法西斯的主張。

道里奧過去在革命事業上，曾有煊赫的成績。他做了許多年的正統派的共產黨員，所以在俄國住了很久。他曾兩次被捕，一次由於他在安南煽起暴動。他有一個時候，與韜儒一同領導着正規共產黨。他做了許多年的衆議員，並且不久以前，還做過巴黎附近聖德尼（Saint-Denis）市市長。

八 農民法西斯

亨利·陶爾善（Henri Dorgeres），在法國政界中，一度負有重望，他的真姓名爲亨利·達魯恩（Henri d'Halinin）。他是一個農民的領袖，曾經組織以武力均分土地的運動，這次運動的重要，可以與一三五八年的農民暴動（Jacquerie）相等量齊觀；一時曾以「農民陣線」（Front Paysan）的名義風靡了法國的鄉村。他不是國會議員；其次本有承繼旭丹位置的希望，可惜還缺少幾百張選票。陶爾善是法國富有演說天才中的一人；據他的敵人說，他是一個假裝的騙子，並非農民出身，不會種過田地，而是一個假扮的貴族，原爲達魯恩子爵。這些故事都不確實。他固然姓達魯恩，但並不是假裝的騙子。他的父親是里勒（Lille）地方的牛販子。他的政策完全

是反革命的主張「槍決全體可惡的議員」來肅清國會，「解放」農民，建立一個農民集團國家。

佛爾南曾經描寫過他，說他是：「一個古怪的屠夫兒子，面孔嬌小，帶有貴族氣味，姿態清秀，過於做作；口才敏捷，頗爲動人，最近在鄉鎮公所中一次演講，吸引了八千多種小麥和甜菜的農民，遠道跋涉而來聽他。」

九 左派的戰士

一九三四及三五年間法國社會黨與共產黨的聯合陣線的組織，是個值得注意的革命步驟，在歐洲各國左翼聯合陣營中，是最先有效的一個。社會黨主張保存民主制度，而共產黨則傾向消滅民主制度，兩者竟會攜手，驟然看來是件奇怪的事件，不過社會黨和共產黨對於二六事變都認爲一種法西斯革命的企圖；於是乃不得不取必要的手段。這種聯合陣線，還把法國一向對立的兩大工會攜手起來，即社會黨領導之下的「工聯會」(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 Unitaire) 和共產黨領導之下歷史較短的「工統會」(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 Unitaire) 此外，以溫和著名的急進黨也有一大部分加入。

達拉第、富勞特、高德，以及在二六事變流血日「救了」共和政體的其他統帥，於一九三五年七月都加入了聯合陣線，席捲急進黨的左派，大敗赫里歐。達拉第施盡全身解數，把這批人都拉攏於左派聯立內閣中。

聯合陣線的發生，最初倒並不是由於姬亞伯或法蘭西行動報的跳梁，而是由於史丹林態度的轉變。他的政策，主張暫時放棄世界革命，而准許蘇聯以外的共產黨，可以變成「穩重」一些，要是他們有這種浪漫的意思。當

一九三五年春賴伐爾訪問他的時候史丹林表示法國的同志應該放下革命，聯合反法西斯主義者並在可能範圍以內，永遠支持法國政府和軍隊，來對抗法西斯勢力。

聯合陣線的亞父為著名青年政治理想家貝格里（Gaston Bergery）；他最初隸屬急進黨，繼而脫黨獨立，終於因反對杜邁格組織國民內閣及其施政方針，以致失掉了衆院的議席。當時沒有另外一個議員和他一致行動。接着他在芒德選區（Marais）從新熱烈參加競選，卒在一萬六千餘票之中，以數百票之差而落選。

貝格里是一個精明強幹深悉世故的青年，娶了一個美國女子蓓蒂娜（Bertina Shaw Jones），於他事業頗有幫助。她的身材修長，裝束入時。她幫着丈夫運動選舉，戴着一頂白色無邊的小帽，還牽着一隻鍾愛的小猴子！芒德原是一個工業發達的無產階級選區，選民分爲兩派，一派擁護貝格里右傾政敵作爲工具的「小麥托辣斯」，一派擁護他或他太太的猴子。

在共產黨和社會黨未曾組織聯合陣線以前，貝格里早已自己組織了一個團體，最初稱爲「公社陣線」（Front Commun），後來改稱「社會陣線」（Front Social），最後稱爲「人民陣線」（Front Populaire）。這個組織的目標，與聯合陣線相同，即聯合一切左派勢力與法西斯主義及軍人同盟作最後的奮鬥。這位青年是理想家兼實際政客，他並沒有主義而只有觀念，這種觀念卻由別人代他實行了。從此以後，聯合陣線就以「人民陣線」一詞爲其全部運動的名稱。

因此之故，貝格里被人稱做「法國的列寧」，「法蘭西共和國的尼羅」及「馬拉與羅伯斯庇爾」兩個人

格的合一。事實上他既非共產黨員，也非社會黨員。他說，他的運動只是「反資本主義」運動。他要求構成法國人口九五%的農民、工人、小資產階級和中等階級聯合起來，對抗五%剝削他們的資本家。他是一個有高深造詣的貴族，而非爲無產階級。他以爲在社會主義的機構中，無產階級的地位是過於看得誇大了。他指出在法國四千二百萬人民之中，真正屬於馬克斯主義者所謂的工人，只有七萬人。

人民陣線有兩大台柱，一爲萊翁·汝霍 (Léon Jouhaux)，一爲馬賽爾·韜雷 (Marcel Thorez)。汝霍年紀較老，生於一八七九年，是工聯會的領袖，法國工團主義者的首領。他的父親參加過巴黎公社，祖父曾於一八四八年革命時奮鬥過。汝霍十六歲時入火柴廠做工，自一九〇九年以來，即成爲工聯會中一位帶些老派但是善意的獨裁者。白魯姆任他爲法蘭西銀行的總裁；這好像美國工運領袖路易士 (John L. Lewis) 做財閥摩根的合夥股東……韜雷要少壯得多，他於一八九六年生，兒童時代即爲農業勞動者，後來又做礦工。由於他的勇敢和奮鬥，終於在一九三二年爬到共產黨書記長的地位。

在外交政策方面，人民陣線好像石頭一樣的堅硬。從前法國的甲可必黨 (Tocohins) 究竟是民族主義者。所以現在左派的愛國戰士也是如此。韜雷雖爲共產黨領袖，但是每次演說的時候，老是以馬奇諾防線爲立場。白魯姆真可算得虛懷若谷，他甚至要在罵他爲社會黨和猶太人的社會之中，找出一些優點；不過在爲社會黨或猶太人之前，他曾以肯定的話，說他是一個愛國者，一個法國人。人民陣線之注重國防與堅定的外交政策，正不下於右派，而且比賴伐爾一派的內閣，更傾向於反希特勒或墨索里尼。

國內方面，白魯姆雖已有了一些改革，但在目前來推斷人民陣線的結果，未免太早了。可得而言之者，就是人民陣線的產生，確已削弱了法國法西斯的勢力；足證法國民主政治已經有了保護自己的組織；除非出於內戰，法西斯主義才能立足於法國。

（註）杜巴里從保安隊那裏恢復了斯達維斯基所營跑馬場的賭博執照；其次，保安隊有一位督察員要想逮捕跑馬場違法營業員，杜巴里竟敢阻止他說：「你膽敢這樣做，我就要把你向安德雷報告。」其後督察員科倫巴尼（Colombani）向審查委員會陳述案情時，曾說：「安德雷就是泰狄歐的名字。」見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四日「新政治家週刊」（New Statesman）。

第十二章 西班牙內戰

「西班牙是歐洲最易佔領的國家，同時也是最難征服的國家。」

——麥考萊爵士 (Lord Macaulay)

一 幾件基本事實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星期六，西班牙在這天發生了內戰。一羣野心的懷着國家主義頭腦的軍人首領，起來反對西班牙合法的，由民主主義方法選舉出來的政府，將那半島變成了屠場。這戰事在最初原為一種軍變，發展到後來遂成爲意識形態的衝突了。德國及意大利幫助西班牙的法西斯，而蘇聯到了後來，也稍微幫助那民主主義的政府軍。在這個戰事的第一年中，雙方死亡約達五十萬人，這種野蠻的流血，在近代可算是很少見的了。隨着德國及意大利之干涉，遂使這一次戰爭，更有變爲世界大戰的可能。一九三七年九月間，海盜潛艇公然轟擊地中海上中立國的商航，於是一月緊張一月，歐洲注視着西班牙的刀釜鼎鑊。

西班牙內戰所代表的裂痕，無論在縱的與橫的兩方面看來，都是很大的。窮人對抗富人，工人對抗軍隊，俗人對抗高級教士，義勇軍對抗僱傭兵，農民對抗貴族，無土地者對抗封建地主，民主主義對抗法西斯主義；凡此各相

敵對的分子，無有不參加西戰。而這種對抗者，又不限於西班牙人。西班牙內戰的反響之所以發展到世界各處，其原因是容易了解的。這種鬭爭，在情緒方面，業已變為世界鬭爭了。雙方各以好勇鬪狠的精神，互相黨同伐異，因為這種鬭爭，實在代表着兩種普通人的口號、階級意識和宗教感情。

有幾件基本的、無可辯駁的事實，會為宣傳所掩飾，這裏得先來講一下子，有人用什麼「赤色」叛亂一類詞語，這是大錯特錯的，那裏原不會有任何「赤色」的變亂。事實很簡單，叛亂者是佛朗哥將軍（General Franco）和他的朋友。他們所要推翻的那個共和國政府，雖得左派政黨之援助，但政府內部，卻並無共產黨人乃至社會黨人。社會黨及共產黨是後來參加進去的。當佛朗哥在七月十八日發難的時候，西班牙政府中並無他們的蹤跡。牠是一個左傾的政府，——一個溫和的、不很有效率率的左派，——但其中並無馬克斯主義者。

其次要談到外國干涉的史實。現在大家都知道，在德意實行干涉的幾月以前，蘇俄並未援助西班牙。德國及意大利的飛機，在戰事發生之初就活動起來了，而援助西政府之國際縱隊的組成，乃是幾個月以後的事體。至於蘇聯，則像意大利以前一樣，不會送過「軍隊」到西班牙去。

談到雙方的實力，我們可以分門別類的講一下，在叛軍（佛朗哥的報紙自稱為「國民軍」）方面的廣義言之，有官僚階級、封建貴族、有政治野心的羅馬天主教徒中之大部分、君主主義者、前那瓦王國（Navarre）的加羅黨（Carlist 按即 Don Carlos [1788—1865]的黨員）、法朗其派（Falangistas）或法西斯派、陸軍軍官、一部分產業資本家，及一部分警察或保安隊。在他們的下級戰鬥力之中，包含德國人、意大利人、由西屬摩洛哥及

里夫 (Riff) 按在摩洛哥之北) 地方而來的摩爾人 (Moor) 按即北非信回教的土著) 及西班牙的駐外軍隊——總而言之，除了加羅黨及法朗其派之外，很少是真正的西班牙人。

在政府軍一方面，最初是祇有政府本身。後來才逐漸包羅了各種左翼的武力，計有共和黨、自由黨、民主黨、社會黨、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此外還有集中於巴塞羅那的加他蘭人 (Catalans) 及羅馬天主教中之巴斯克自治派 (Basque Autonomists)。巴斯克人教徒極擁護政府。此外還有大部分農民、大部分無土地者及全體工人——不過他們人數甚少。這裏有多數的共濟會員，多數的中產階級，多數的智識分子。政府方面的軍隊，因為百分之九十五的軍官都投附了弗朗哥，所以當初毫無紀律可言，後來因為屢經激戰及外國志願兵的援助，遂成爲第一流的戰鬥力了。人民在戰前所組的民團，現在變成了民衆的軍隊，他們的紀律很好，但紀律之執行，不是由軍官之手，而是由下層發動的。

西班牙戰事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西班牙的人民，普通人民，經過幾百年的封建制度之後，團結起來向進步邁進，拼命爲克服反動派的暴動而戰。這種戰爭完全是左派和右派之間的戰爭；而右派是錯誤的。西班牙人民，在共和政府五年軟弱的存在之後，現在起來防衛她了。——因爲不論好壞，究竟這是他們自己的政府。

二 君主專制的推翻

西班牙在君主專制之下，是和沙皇時代的俄國一般落後。文盲率在歐洲（葡萄牙除外）要算最高，達百分

之四十五。西班牙的國史，在過去三百年中，祇是一部分崩解體的歷史。該國原有潛在富力，近代則停滯於腐敗與衰頹之中。沒有土地的勞動者，生活狀況比農奴好不了多少，有一部分幾與牛馬相等。至於那班統治階級，拿左派的話來講罷，「可說是世界上最壞的頭目，——不負責任、驕傲、虛榮、無知、庸碌而且無能。」

西班牙的君主政體——在二十世紀可以亞爾豐梭十三世 (Alfonso XIII, 在位 1902—1931) 為代表——由三個台柱支持着，那就是擁有土地的貴族、陸軍和教會。

西班牙的中心問題是土地，談到這個問題，這裏有些統計可以參考。西班牙的人口百分之一，領有全國土地百分之五十一。約有一萬五千至兩萬的地主，共領二五〇公頃的土地。大多數人民（西班牙全國業農人口占百分之七十二），都沒有土地，或者僅有一小塊土地。而大地主亞爾巴公爵 (Duke of Alba) 則領有像比利時國一般大小的地面，其中包含五十六個村鎮。地主鮮有出錢改良土地的，因此有許多肥田都變為荒坵了。每年祇有一次收穫；有些地方，竟不知灌溉這一回事，而且禁止使用機器。大多數地主，自己並不種田，也不住在鄉下。

在全世界上，西班牙的陸軍組織，要算最為頭重足輕的了。全國的現役將軍，凡有三六五人（連後備者共七百人），一年中每天可分得一個下級軍官二一、〇〇〇人，對於士兵的比數，為六個士兵，即有一個軍官。即使一九一四年的德國，也沒有二萬一千個軍官。自從一六四〇年以來，這班陸軍對於國家便無什麼特殊的貢獻，然而每年的經費，卻至少要佔總預算的四分之一。軍人擁有封建特權。保衛團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在一九三一年以前，軍事法庭還有審訊平民的權力。

教會在西班牙的國民生活上，占有極重要的統治地位。牧師和教士，共達四〇、〇〇〇人之多，都由政府給養，都是政府的一部分；並且差不多個個都在精神上及政治上與封建地主及軍人有連繫。教會及教會機關，不但在政治上和宗教上佔着很大的勢力，並且在工商業上，也有很大的勢力，因為他們領有礦山、工廠、航業、公用事業、銀行、運輸機關、橋樑等種種產業。教會統制着教育，自己成爲教育機關的一部分，然而西班牙的人民，竟有百分之四五，皆是目不識丁。教會有錢而腐化，他們的違背與濫用教規，可謂達於極點。僧侶階級和教會機關，在西班牙境內權力之大，簡直使人不能相信。誰說了一句瀆神的話，就被當做罪犯。直至一九三一年，教會的審判權才經正式廢除。

一九三一年間，西班牙的君主專制，因其自身的腐化而崩潰了。但是推翻專制的卻不是革命，而是選舉。血未會流一滴，鎗沒有放一聲。亞爾豐梭很安全的由瑪德里乘車到加太琴那（Cartagena），他爲多年虐政所付的代價，便是如此而已。沒有人阻撓他，而貴族、陸軍及教會方面，也沒有誰爲他撐腰。五百年來統治西班牙的王朝，像梅子從樹上落下一樣，墮入歷史的塵土中去了。然而亞爾豐梭背後的武力，卻依然存在。

三 共和與反動

全世界自由主義者，對於一九三一年四月成立的西班牙政府，頗存厚望。政府的組織，大半爲中產階級的智識分子，如教授、學者及文人之流。西班牙共和國之精神上的國父，不是政客及陸軍將領，而爲一班醫生，如馬拉農

博士 (Dr. Gregorio Marañón) —— 醫治結核病的專家——革命會議即在他家中舉行的，和一班哲學家，如鳥那摩諾 (Miguel de Unamuno) 及粹蓋 (José Ortega y Gasset) 他的「民衆的反抗」一書，便表現出共和運動的理想。在政府人員之中，有文學家如亞查那 (Manuel Azana)，他旋即任爲內閣總理，大學教授如李奧 (Fernando de los Rios)，勞工領袖如加巴勒羅 (Largo Caballero)，他以前的職業是泥水匠。

我們可以從一國所派的使節，以推知其國政。倘若英國委派出去的重要使臣，爲韋爾斯，赫胥黎及羅素等文人，該是怎麼樣？我們來看看西班牙罷。他派到日內瓦去的是馬達里亞加 (Salvador de Madariaga)，大學教授兼新聞記者；派駐倫敦的是著名小說家埃伊亞拉 (Ramón Pérez de Ayala)，派到德國的是一個左傾社會主義智識分子亞拉奎斯丹 (Taris Araguistain)，派到墨西哥的是伐伊奧 (Alvarez del Vayo)，從前做過孟卻斯脫導報駐瑪德里的記者；派到羅馬去的是一位詩人；派到智利的是一個韋爾斯「世界史綱」的譯者。

共和政府最先着手所做的，爲制定憲法。這個憲法真是世上少見的，其中不但包含法儒盧騷與美國總統賈斐孫的學說，同時還含有德國魏馬憲法的氣息。牠推倒了宗教（這是重大的條文），使政教分立；宣布西班牙爲「各階級的勞動者之共和國」，廢除不合法理的制度，施行強制的初級免費教育，給女人選舉權——在西班牙牠把離婚手續簡單化；牠使工人可以分取產業的盈利。牠又是各國憲法中之急先鋒，把一部分國家主權讓與國際聯盟；例如憲法中規定非合於國聯盟約所規定的條件，不得對外宣戰。這在今日看來，真是一種諷刺了！

可是這些憲法的條文，很少見諸實行。這個幼年的共和國，太注重理論，把精神費在紙頭上面，而不能將其主

張轉爲具體的事實。牠祇顧到優美的文句，竟忽略了具體的政策。牠的領袖如亞查那等，其信任自由之深，竟願將言論自由的權利，給與那企圖毀壞言論自由的人。亞查那一班人，覺得不必藉用革命，即可以澈底變更社會的組織。其實他們是錯誤了。

共和政府的領袖們，很明白誰是敵人，並且着手去處置他們，而不是太不辣手了。他們的措施，適足激起反動。他們是些不熟練的政客，對於新組的國會（Congress）有些應付無方。他們的任務，應該是破壞西班牙的封建制度。他們對於敵人應該毫不留情，因爲他們知道敵人對他們是不留情面的。他們本該得到俄國的教訓，認清楚除非把有產階級根除了（不是遮蓋起來）以後，革命即不能成功。然而他們竟然不着實際，模稜兩可，做了一些冷淡的，沒有效率的改良。

對付貴族——共和政府祇把他們的榮銜削去，便以爲就可削弱他們的勢。例如亞爾巴公爵在舊日的官報上有二十六個頭銜，現在降爲平民化的「先生」（Baton），然而亞爾巴公爵本身，並未消滅。在理論，土地改革的計劃也制定了，然而實際上農民所得的土地依然很少。一九三二年，彬如約將軍（General Sanjurjo）用西班牙的老方法，與兵反對新共和政府，不久就被壓服了。政府規定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以爲彼等參加叛亂的懲罰，然而終屬一紙空文。

對付教會——亞查那只打擊牠，然而沒有消滅了牠。他剝奪了牠的一些特權，適足使牠因怒而益強。他在一九三二年六月所頒布的宗教團體法案，將教會財產一萬萬鎊收歸「國有」，然而仍然放在教會的掌管中。他在

理論上解散了耶穌教團體，而耶穌教徒並未被逐出。他禁止耶穌教徒傳教，然而禁令並未生效。教會在兩年之內，像那黑色、堅韌、生長迅速的草菌一樣，不久便又生發起來了。而且就在那共和新政之下，教會在西班牙的勢力，也比在歐洲他國要大些——奧國或可除外。

至於對付陸軍，共和政府認為解散一萬名左右的軍官，而給他們終身恩俸，就可以解決那軍人叛亂的恆久的問題了。

他方面，新政府也有一些積極的措施。第一，亞查那等一班人，給西班牙一些政治的意識，使她與現代世界相接觸，並賦與希望。第二，他們實施了大規模的教育計劃；教育部長李奧，以有力的手腕在全國設立近萬個學校。第三，他們廢除了一些不重要的封建餘孽。第四，他們准許加他蘭人實行地方自治，以解決四百年來西班牙政治上的一個嚴重問題，同時他們又准許巴斯克人自治。

一九三三年秋，亞查那被迫辭職；左翼共和黨第一期的執政，只有兩年半。於是右派各黨（假如由他們執政，他們也忠實於共和）組成聯立政府；而其行政方針，多具反革命色彩。一九三四年十月，社會黨興起攻擊反革命的運動，旋被武力壓平，而流血不少。右派（在理論上仍忠於共和）以摩爾軍，擊潰亞斯都里亞（Asturias）省的礦工及其他工人。昔掀動黑禍的摩爾人，又重現於西班牙！死亡共達一、四〇〇人，中以平民居多。右派用血手來掃清了亞斯都里亞。而恐怖遍及於西班牙全國。及至一九三五年冬，社會黨及共和黨之被捕者，計達三萬人。

自一九三三年秋至一九三六年夏，內閣雖迭有更換，但政權依然在右派手中。「盧騷—哲斐孫式革命」似

乎是中止了。但一九三一至三三年間曙光的一閃，仍舊照着民衆的心田。右派經過許許多多的誹謗，終於在一九三六年二月，被選舉行選舉了。共和派各黨聯合起來，組成了人民陣線，結果總算勉強獲勝。計人民陣線加上巴斯克人，共有四、八三八、四四九票，而右派則爲三、九九六、九三一票。人民陣線政府就此組成——但未包含社會黨及共產黨——並着手恢復一九三一年的共和政體。

新政府施政不久之後，反對派即以弗朗哥將軍爲領袖，於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與兵作亂。經完全自由的和合法的手續當選登台的左派，即與以抵抗。於是西班牙發生了內戰——自一九一九年俄國以外歐洲所僅見的一次真正的內戰。

四 幾個人物

這裏對於某幾個人物有一述必要。在大多數觀察者看來，亞查那簡直是個難解的謎。他在二月選舉之後，又做西班牙的總理了（這是他第二次擔當大任），可是不久他就當選爲總統，而減少了活動的機會。亞查那以一九〇年正月十日，生於亞乃累（Alcala de Henares），與「吉訶德先生」著者西萬提司（Cervantes）同鄉。他是一個學者，一位哲學家；如果他沒有做了總理和總統，那末世界各國智識分子之能讀西班牙文者，一定都能知道他。他曾著有許多論文、劇本和小說，其中至少有一種是，可稱爲傑作的，那便是「僧侶的園地」。他對於西班牙的一切事物，有精密的理解；他在青年時期，曾經譯過鮑羅所著「西班牙的聖經」一本關於戀愛的傑構。

亞查那做了許多年文官；但他心中不忘政治，尤其喜歡研究陸軍組織及軍事問題。某次有位朋友問他：「你爲什麼要鑽這些沒味的兵書？」他回答道：「因爲在二十年内，我將要做陸軍部長。」他做到了。從這一點，也可想見他的抱負。一九三六年路易·費雪去見他的時候，表示希望他來年仍舊在任；他回答道：「那當然，除非我厭煩政治。」

他的政治哲學見解一點也不掩飾。當作者在一九三二年去訪問他，並問他屬於那一方面的時候，他很爽快的答道：「我是一個智識分子，一個民主派，和一個布爾喬亞。」

西班牙共和國的第一屆政府，包含共濟會會員七人，而亞查那也是其中的一個。這與他在一九三三年的下台，是不無相當關係的。共濟會在西班牙的政界，和法國的情形差不多，是很有地位的。我們這樣講，並非特意要把共濟會與天主教的界限分得清楚，而視之爲革命中的重大因素。實際上這種界限是不合論理的，是歪曲的。例如勒魯屬於共濟會，羅布爾屬於耶穌會，他們兩人卻曾熱心合作過。

在西班牙內戰發生以前，右派陣營中的兩個最有趣的人物，即爲勒魯 (Don Alejandro Lerroux) 與羅布爾 (Don José María Gil Robles)。勒魯在國外雖不甚著名，但他可算現代歐洲一個最奇怪的人物。他最初有許多年從事於暴動和革命，後來發財得勢；在第一屆共和政府中做了一會官，不久又轉到右派中去了。他全部的事業，就是不停的轉變。急進社會黨發起人之一，早年且與勒魯爲同志的杜明哥 (Marcelino Domingo) 曾經正式責他在一九一七年發難中背叛了其他共和黨領袖。巴斯克的大哲學家烏那摩諾，曾用譏諷的口吻說：勒魯

既自稱爲共和黨員，那末別人就不許再做共和黨員了。

勒魯有個朋友馬契 (Juan March)，一位煙業寡商，曾經資助弗朗哥的叛變。在歐戰期間，勒魯曾與馬契合作，以軍用品供給伊伯利亞 (Iberian) 沿海的德國潛艇，獲利頗厚。勒魯到巴黎時，對巴黎新聞報 (Le Journal) 記者，堂而皇之的敘述自己及西班牙的目的。後來他有個舊友說：「當新聞報到瑪德里時，大家不禁爲之作三日嘔。」他還有一個故交談論他道：「在這個人的肚子內，就有七大罪惡。」還有一個故事說，在西班牙共和國成立的初年，有一個人填寫申請書，在那「過去經歷」一項下面寫道：「既非囚犯，也非勒魯信徒。」

比較勒魯更危險的，是少壯派羅布爾，生於一九〇一年。他的父親是個大學教授；他與一班耶穌教徒同學，在校成績頗爲優異。出校以後最初當教員，接着做新聞記者，最後則爲政客。他組織了右派自治黨聯合會 (C. E. D. A.)，強迫勒魯政府邀他入閣。他雖在共和政府中供職，但同時又公然攻擊共和制度。他曾說過「共和政體好像是種麻疹病，我們要打破這種病癥而生存。」羅布爾是個好戰的天主教徒，也是一個反動分子，但他的毅力，則爲一般西班牙人所不及。他是個可畏的演說家，但缺少西班牙人所謂尊嚴。他有的是暴躁而非熱情，暴怒而非義憤。總之，他爲人聰明，具有大志，且有先見。在內戰爆發以後，他逃往葡萄牙。弗朗哥並未用他。

五 戰事的爆發及其過程

人民陣線政府，自一九三六年二月被選登台，直至七月中旬，其治事經過，可謂非常困難。擾亂秩序之事屢有

發生；歷年來埋在心頭的仇恨，都向外爆發了。誠如「生活月報」(Life)說，民衆要打死黨政領袖，而黨政領袖則不願坐以待斃，於是暴力乃不可避免。在短短六個月期間，政治暗殺多至數百件。法西斯黨故意挑撥感情，從事擾亂秩序，以爲日後要求恢復秩序的藉口。左派也採取報復手段。左派軍官巡緝警察加斯蒂羅中尉(Lieut. Castillo)爲一右派銃手所槍殺。繼而曾在李佛拉(Primo de Rivera)內閣中任財長且欲爲右派聯合陣線的領袖德羅(Señor Calvo Sotelo)亦爲加斯蒂羅的同志所殺。這兩次殺人事件，便是燃着全西班牙大火的兩個小火星。

關於戰爭的過程，這裏祇能作簡要的說明。西班牙各地的駐軍，經過詳密的計劃，(但因梭德羅之被刺而更提早)遂於七月十八日起事。他們的叛變，在薩拉孟加(Salamanca)、塞維勒(Seville)、桃里多(Toledo)等市鎮，都算是成功了；然而在重要的大都市，如瑪德里、巴塞羅那、瓦倫西亞(Valencia)、馬拉加(Malaga)及畢爾波(Bilbao)等處，則或因自身失機，或爲憤怒的羣衆所擊破。例如在瑪德里方面，民衆差不多以赤手空拳，衝破了駐軍的營寨。這些政變，就其爲政變而言，可說是失败了。牠的目的是要在一晝夜之內，奪取全國各地的政權，然而沒有成功。誰也不會預料到政府和民衆能夠抵抗。

於是金絲雀羣島(Canary Island)總督弗朗哥將軍，偷偷地溜到摩洛哥，以意大利飛機的援助，衝破了直布羅陀的封鎖線，由空中將國外駐軍及摩爾軍運至大陸，開往塞維爾及前線。(不久他的飛機驅開了政府軍的艦隊，得以控制海運。) 摩爾軍開始流入西班牙。西班牙以前屢次侵入摩洛哥，而今則反被摩洛哥人所侵擾了。

摩爾人原是出色的騎士，他們在後來幾次總攻擊中，例如攻巴斯克省的羅馬天主教徒之役，便顯出很強的戰鬥力。弗朗哥這批以服膺天主教的政治團體，竟然利用了摩爾人，再加上德國政府的援助，來與梵蒂岡作激烈的宗教鬭爭，這在近代史上，可算最有趣味的一件奇遇。

意大利在最初就干涉西戰，那是毫無疑問的。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即有意大利飛機二十架飛往西屬摩洛哥，去幫助那裏原有的飛機，其中有兩架墮在法國領土內。法國當局檢查之後，認出這是意大利空軍的轟炸機，因為在一層薄漆之下，還可以看得微號。駕駛員的身上，都攜有軍事公文。至於其他飛機，據信在開戰以前即抵摩洛哥。而德國飛機，早至八月中旬，亦已非常活動。

戰事以幾次並無連絡的進襲開始，到後來使處於膠着狀態。叛軍佔領着直布羅陀一帶的海岸，塞維勒，桃里多，及北部若干地面。在政府手中者，則有加斯蒂爾（Castile）之中部平原，大部分南方海岸，及加他羅尼亞省（Catalonia）之全部。叛軍在八月中間，先後奪獲了伊倫（Irun），山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an），並對瑪德里採取大包圍的形勢。接着就有進襲桃里多的冒險之舉，在那裏叛軍於開戰之初，曾在亞爾加查（Alcazar）附近中計，損傷頗大。弗朗哥仍然頑強進攻，至九月二十八日，凡作七十天的圍困。政府雖欲設法驅逐叛軍，但實力似覺不足。摩爾軍既進桃里多，發現醫院中有政府方面傷兵六百人，即用手榴彈將其全部屠殺。此事之前，在薩近（葡萄牙的巴達約士（Badajoz）地方，有政府方面的民衆及軍隊四千人，爲弗朗哥部下所俘，當被驅於鬪牛場中，以機關槍全部射殺。

這時弗朗哥節節勝利，所向無敵。他的陣線一天天的逼近瑪德里，而在十月上旬，就將瑪德里包圍起來。但同時政府方面的軍隊，也不可思議的強化起來。弗朗哥軍於十一月七日到達瑪德里四郊，政府被迫遷往瓦倫西亞。這時有二十四小時的空隙，叛軍祇要開進城去，就可毫不費力的佔領首都了。瑪德里之所以沒有失陷，可說由於桃里多做了牠的替身，假如弗朗哥不用迂迴戰術，恐怕瑪德里在九月中旬就要失守了。在十一月中旬以後，雖然敵軍仍然伏在牠的四郊，但瑪德里已經轉危為安。包圍經過一月又一月，瑪德里不斷的遭受轟炸與炮擊；且遭五次不同的步兵之進襲，但結果都未收效。城市的三分之一，皆被炸彈及炮彈所破壞；首都中的生命多半肢解了；死難的民衆及婦孺，共計不下數千人。

到了這種時候，戰爭的歷史和國際干涉的問題，已經聯結得難解難分了。德國軍艦在一九三六年的八月中旬，即已出現於北非休達（Oran）口外，不久更有多數德國驅逐艦與潛水艇，點綴着西班牙的領海。而德國及意大利的飛機，也以德人及意人為駕駛員而參加陸地戰役。政府軍於八月八日，即已首次俘獲德人的麥克式轟炸機，而意大利的加布羅尼式飛機，亦不斷飛翔於上空。德意兩國的坦克車、軍火、高射砲、及各種戰爭「材料」，充滿了弗朗哥的領域。軍火的輸入，毫無困難，既可取道於叛軍手中的海口，又可取道於並不怎樣假裝着中立的葡萄牙。向後德國軍隊也真的出現了。（Freda White 所著「War in Spain」一書所述，他們始於十二月十五日，至德里的西南方參戰。）意大利的軍隊也出現了。而意大利的軍隊，不久便實際佔領了馬若加島（Majorca）。

凡此種種，在弗朗哥方面說來是很簡單的。因為他找不到許多西班牙人為他作戰，所以要靠客籍軍，要靠

「亞利安摩爾人」要獨裁國家的「志願軍」就干涉國一方面而言，理由也很簡單。此次戰爭，原被他們看做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的戰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能忍受西歐有一個「赤化」國。西班牙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是他們的角逐場。他們知道西班牙法西斯化，足以大大削弱法國的勢力。他們熱望着在摩洛哥及西部地中海，能得到一個勢力範圍。他們的血眼早就望着西班牙。西班牙的彬如約將軍，會於開戰之前報聘柏林，而德國派往弗朗哥那裏做大使的福貝爾將軍（Gen. Furbel），原來即為柏林的「伊伯利安局」局長。至於和羅馬方面的連繫，也是結得很緊的。意大利，尤其是德國，老早就渴望着西班牙的鐵礦及其他礦產，而在戰事發生未到六個月的時候，便有銅和鐵運往漢堡，以為德國干涉的代價。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德國與意大利，一同承認了弗朗哥的政府。

弗朗哥真是有趣得極，他在開戰之初，看不起法西斯主義。「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及「新聞記事報」（News Chronicle）駐西名記者亞倫（Jay Allan）會於七月二十八日（開戰方十日）作了一次歷史的訪問，弗朗哥對他說：「此次運動並非法西斯運動，而是西班牙民族運動……法西斯主義在西班牙是可笑的，真是可笑的。西班牙自由主義的中等階級，都信仰共和政體、共濟會，以及與此相類的東西。法西斯在德國及意大利，是一種中產階級的運動。此地李佛拉總理的部下自稱為法西斯，祇不過是說說罷了，他們真是可笑得極。」

可是不久弗朗哥因為需要德國及意大利的援助，不能不付相當的代價，於是他的論調就改變了。

依據可靠的估計，截至一九三七年春，德國派往西班牙的技術人員，增至八千到一萬人之譜，而意大利派去的軍隊，則在六七萬人之間。德意兩國干涉的程度既然逐漸加重，當然不免要引起反應。反干涉方面，有兩種形式。第一，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志願兵，其中有自由主義者、反法西斯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他們為着厭惡法西斯的侵略，所以大家湧到西班牙，組成了一個前所未見的國際縱隊，其中包含波蘭人、比利時人、捷克人、美國人（由美國前往者凡達二、七〇〇人）、英國人、法國人、反法西斯的意大利人及反國社黨的德國人。這個縱隊，合計約在兩萬人左右，他們於三六年十一月八九兩日開到瑪德里的前線，於是把西班牙的首都守住了。第二，為蘇聯政府，自一九三六的十月間起，即開始派遣坦克車、飛機、糧食，及外交代表往西班牙。蘇聯雖未派出軍隊，但他們的飛機是派去了，他們的援助之價值，差不多是難於估計的。他們高速度的驅逐機——構造模倣美國，叫做「嘉都」式（Chatos）——使西政府在翌年春初便能控制天空了。

戰爭一天天的延長下去。全世界的報紙上，滿篇載着可怖的殘殺消息。叛軍獲了幾次大勝，例如二月七日佔領了馬拉加，七月十九日攻陷了畢爾波。然而他們沒有粉碎瑪德里方面的軍心和物質防禦，也沒有接近巴塞羅那及瓦倫西亞。政府軍於三月間，則曾在瓜達拉哈拉（Guadalajara）前線獲一大勝，將白里胡迦（Brihuega）一帶的意軍完全擊潰；意兵在此役中死亡之衆，超過在侵阿戰爭中全部的損失。據被俘意兵供稱，意政府徵調他們的時候，原說開往阿比西尼亞服務，豈知一運上船，竟被開到西班牙來。及至仲夏之際，政府軍在兩線皆取反攻戰略。

一幕一幕的屠殺，對於世界人士的觀感，已經失卻刺激性了，不過六月間弗朗哥之攻進巴斯克省，又給世人一個新的感觸。德國的航空人員，將巴斯克的聖城革尼加（Guernica）完全炸燬了；像這樣故意消滅整個城市，不論戰鬪員或非戰鬪員，一概從空中用炸彈與機關槍加以殺盡，這在歷史上真是創例。據弗朗哥辯稱，說是他們自己把聖城和居民放火燒了的。可是倫敦泰晤士報訪員斯諦爾（G. I. Steer）所記目睹的情形，卻完全兩樣。

「全鎮居民七千人，難民三千人，都被逐漸的有系統的炸得粉碎了。在半徑五英里的圓周之中，叛軍的空軍，轟炸那些分立的農房。……鎮周村莊，無一不被轟炸。革尼加其實並非為軍事目標，鎮外的兵工廠，即未遭任何災殃。……該鎮和前線隔得很遠。

「他們轟炸這座未設防的市鎮，其步驟是很有計劃的。他們先用手榴彈和重炸彈把居民驚得逃出屋外，然後用機關槍向下掃射；最後以重炸彈和燒夷彈炸燬他們的房屋，把他們燒死在下面。

「記者曾目擊並測量巨大的彈孔，這些彈孔在我前一天經過那裏的時候還沒有。記者在革尼加發現未經爆炸的德國鉛質燒夷彈，上面所鑄着「一九三六年萊茵道夫廠製」幾個字樣。」

一九三七年九月，叛軍雖然又有進展，並且攻陷了散丹台（Santander），但戰事仍處於膠着狀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德意兩國軍隊參戰的愈來愈多，西政府究能支持好久。

六 弗朗哥將軍

假如有誰把弗朗哥將軍只看做惡棍或屠夫，那真是釵到極點了。他是他的社會階層的產物，是他的倫理環境的產物，而且是個優秀的代表者。他的聰慧與勇敢，曾爲人所稱道；他具有實際手腕和動人的風采。他口口聲聲談愛國，當然也可算爲一個愛國義士。同時，他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不過我們應該記得，發動戰事的是他，他如果失敗了，不免成爲悲劇人物，正像俄國革命時反對赤黨的朗格爾（Wrangel）和登尼金（Denkikin）；自己創造了自己所要消滅的東西。統一西班牙左翼各派而使之團結起來的，也就是弗朗哥和他所代表的人們；假如共產主義降生於西班牙，弗朗哥將軍便就是牠的產婆。

在歷史上的偶發事件中，弗朗哥要算一等的例子。當初誰也沒有打算把他推做叛軍的最高領袖。政治領袖原該是梭德羅，他在七月間被刺殞命了；軍事領袖論理是彬如約將軍，他在開戰後三日，因飛機失事而喪生了。於是弗朗哥起來繼承他的職務。他的能幹超越餘子，他的軍事地位也優於他們，所以他能號召摩爾軍及海外駐軍，並且在開戰後兩月，穩固了他的指揮權。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他被推爲西班牙「國家」的元首。

弗朗哥體格短小，身長僅五呎零，溫文大度，手足纖細秀雅，素有「小兒將軍」之稱。他以一八九二年，生於加里西亞（Galicia）他的家庭，歷代皆任軍職。他的兄弟拉蒙（Ramon）爲西班牙最著名飛行家。弗朗哥年事雖輕，但在軍事方面已有足稱的成績。他早年服役於摩洛哥，所得經驗及教訓頗多；而在三十四歲的時候，就變爲西班牙陸軍中最年青的將軍了。在共和政府之下，他最初服役於巴勒利克羣島（Balearie），旋又任職於摩洛哥。當魯奧羅布爾聯合組閣時，他被任爲參謀總長。此舉引起了共和黨的猜疑，於是在人民陣線登台後，他遂被免去原

職，轉任西非金絲雀羣島的總督。

亞倫會晤這位溫文儒雅，懷着空想抱負的矮子時，曾有如次的談話。

問：將軍此次政變，既未能如願以償，然則屠殺將延長多久？

答：絕無妥協休戰之可言。

問：意思是說將軍將掃射半個西班牙？

答：我再說一遍，不惜任何代價。

問：將軍若能如願以償，貴政府將採何種政策？

答：我將建立軍人獨裁。

問：那時預備怎樣對付那些共和黨的政客？

答：沒有什麼，除非他們願意參加工作。

問：將軍何故能以忠誠態度，與共和政府共事如許長久？

答：我認爲共和政府能夠一日代表民意，卽一日忠誠與之共事。

問：將軍對於二月選舉態度如何？是否足以代表民意？

答：任何選舉，不足代表民意。

弗朗哥想盡種種方法，企圖包羅各種分子，成立一個龐大的右派陣線。他誠意信仰超階級超黨派的獨裁制。

當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日，他宣布自己爲一黨專政國的執政及領袖時，他自己定了一個包羅萬象的名稱，即「西班牙國粹主義派及全國積極工團主義派大同盟」(The Spanish Phalanx of Traditionalist and Offensive National Syndicalist Juntas)。

弗朗哥的頌揚者把他讚美得無微不至。例如巴黎公正報 (Paris Candide) 上曾經刊載一篇班加明 (Bené Benjamin) 的文章，其中有謂：

「弗朗哥身材不高，短小精悍。啊！他的慧眼一轉，令人永不忘懷，真是世所罕見。他只要向你迅疾一瞥，便會使你戰慄不安，但是這一瞥之中，又充滿着甜蜜；其人和靄雅致，而又高深莫測；他真是一個溫文與沉毅所造成的奇蹟……弗朗哥令人消魂的地方，就是在於他的純潔。」——見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紐約日報」譯文。

此外有嘉文 (J. L. Garvin) 在倫敦「觀察報」上還投了一篇真是可歎的文章，稱他爲「偉大的紳士」。可是這位偉大的紳士，曾經兩次違背自己的誓言，第一次在他服務於共和國的時候，他背了國王；第二次在他起兵反叛的時候，又背了共和國。

其他右派的將領，最值得注意的，當爲怪誕不經的傢伙拉諾將軍 (Gen. Don Gonzalo Queipo de Llano)。他差不多全用舌頭作戰。他是叛軍中的播音人，他每夜在塞維勒的無線電台上，爲着叛亂而吼叫。八月二十七日，他下了一個命令，共產黨殺了任何一個人，則須殺死其家族五人以爲抵償。當四千民衆在鬪牛場中被屠殺的時

候，他狂吼了一夜：「耶格士上校在巴達約士執行了我的訓令，結果美滿。」他聲言「赤色」女子應該送給黑色摩爾人——二十個摩爾人共「用」一個女子！他稱英國人爲「背信的鱈魚」，並謂不列顛帝國即將崩潰。

拉諾曾經一度做過共和黨員，實際上是總統的侍從武官長。因爲國王不會重用他，他就變爲共和黨人了，及至失掉侍從長的職務，他又起來反對共和。政府軍布奎德將軍（General Burenne）說，他在摩洛哥做軍事法庭審判長的時候，曾經兩次審問拉諾作戰不力的案件。

七 恐怖

在戰事發生未久的時候，瑪德里和巴塞羅那兩地屢有恐怖事件發現。這固然是不愉快的事實，但亦無庸諱言。教堂多被劫掠毀壞，教士輒遭暗殺，凡知道是法西斯分子者，被屠殺殆盡。這時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尤其野蠻。不過我們應該記得，這種現象，發生於弗朗哥興亂之後，民衆受了重大的刺激，所以也就瘋狂了。社會的常規是崩頹了。而當摩拉將軍（General Mola）發表一個愚笨的聲明以後，暗殺事件的發生愈多，因爲他說：城內有法西斯「第五縱隊」潛伏，皆同情於叛軍，必將爲內應以陷城。所以這班法西斯主義者都被民衆搜出槍決。政府方面的負責人員，對於此等恐怖情形深覺可憫，並力謀加以節制，於是不久之後，恐怖事件便不再發生了。

但在叛軍方面，其恐怖主義的施行，則正有加無已。叛軍將領，輒以命令施行殺戮，並以殺戮爲其政策的一部分。每當攻下一城，則凡知道是忠於共和政府之人物，立即被捕槍決。前面所說巴達約士的情形，不過是幾個例證。

中之一罷了。在戰爭發生之初，凡是工會會員，共濟會教徒，投票贊助人民陣線政府者，以及譏笑做彌撒者，皆得遭受槍決的處分。

據泰晤士報載稱，在那伐爾（Navarre）地方，「每個村鎮中都要殺死三四個爲首的共和黨人。」在考多巴（Cordoba），有二千民衆被殺，在薩拉哥沙（Saragossa）有一千八百人被殺。塞維勒民衆之被殺者達九千人，格拉那達（Granada）六千人，潘柏羅那（Pamplona）三千人。叛軍飛機在瑪德里上空，曾經發下如次的傳單。

「國民軍在指顧之間，即可攻下瑪德里。茲特警告爾輩，國民軍方面如有一人被殺，則將以爾輩十人抵償。爾輩當知國民軍在各省已獲有赤色民團俘虜一千人，且爾等如有軌外行動，則瑪德里城內之二萬二千傷兵，將爲爾等替罪。」

弗朗哥軍攻陷馬拉加的時候，全鎮市民都知道大難就要臨頭了，於是紛紛逃亡。在叛軍尙未進城之時，已有三分之一的市民，負物逃往亞爾默利亞（Almeria），他們寧願遭受困苦，離開家鄉，在路上冒着死險——因爲沿途屢遭轟炸——卻不願留在弗朗哥的城內。這種可怕的景象，和十五萬男女老幼的逃亡，是一個美國醫生所親眼目觀的。在畢爾波陷落的時候，情形差不多也是如此。不過沒有中立國人士目觀罷了。

八 左派

在內戰爆發以前，西班牙無產階級的情形，在世界上要算是最複雜的了。所謂左派，包含着七個陣營。

一、爲幾個資產階級共和派的集團，可由亞查那等一班人做代表。

二、爲加他羅尼亞及巴斯克兩省的自治派，他們知道共和政府可以保證他們的自由，而弗朗哥將軍那樣的中央集權主義者，將取消其自由。

三、爲工團主義派，這種組織在歐洲各國，要以西班牙的爲最有勢力。西班牙的勞工運動，幾十年來，早就平分爲社會主義及工團主義兩派。社會黨及其所組織的總工會（Unio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屬於第二國際，在瑪德里及北方一帶頗有勢力；而工團主義派，則組有「全國工人聯合會」（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 Trabajos），設總會於巴塞羅那，而在加他羅尼亞及安達魯西亞（Andalusia）一帶非常興旺。自從巴枯寧（Bakunin）時代以來，工團主義在這些地方就逐漸繁殖起來。當一八七二年馬克斯與巴枯寧爲着無政府主義問題而分裂的時候，工團主義在西班牙就生根了。

一般工團主義者，都很怪僻，他們一向不參加政治，直到最近還不肯投票選舉。他們是「反政治的」。他們有一班無政府主義的朋友，可說是擾亂治安的原動力。無政府主義派既然完全不相信政府，所以把擾亂秩序認爲有利於自身。往日右派即常賄買無政府和工會主義的分子，使他們去引起紛擾，以作攻擊比較愛好秩序的社會黨這種反對派的藉口。勒魯便是過去慣做這種勾當的斡輪老手。在理論上，工團主義派所希望的一種國家，要以自上而下的各級工會做基礎。及至他們看到法西斯主義在西班牙抬起頭來，知道對他們必施辣手的時候，於是他們便改變一向的態度，關心到政治了。他們願意與那比較溫和的左派合作。他們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破天荒隨

着人民陣線一同參加選舉。也祇因為工團派的幫助，左翼的競選才能夠獲勝。

四、爲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西班牙的組織，是「伊伯拉無政府主義者聯合會」(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ora)，會員僅有八千人，但混在「全國工人聯合會」中，一度佔着很大的勢力。於是工團派的負責領袖，退出了全工聯會，以表示與政府團結的誠意。

五、爲社會黨。他們一向爲溫和的馬克斯主義者，不過在戰爭快要爆發之前，其中忽然發生非常急進的一派，由加巴勒羅所領導，要求採取積極的革命政策，其改變態度之目的，一部分也在於想能獲得工團派的援助。加巴勒羅的一派，既走向了共產黨的左翼去，於是西班牙在二月選舉之際，演出了一個笑柄。就是：「選舉共產黨，以便將西班牙由馬克斯主義中救出來。」社會黨中另一派，係由白里多 (Indelacio Prieto) 所領導，態度要溫和得多。白里多爲西班牙一個極有才幹的人，一個有錢的報館老闆，也是巴斯克省的產業資本家。他願意與亞查那合作，並參加組織政府。倘非戰事發生，則社會黨內部的分裂，一定是難免的了。

六、爲共產黨。在戰爭發生以前，共產黨在西班牙的勢力很小，西班牙的議會中共有四七三席，共產黨的議員祇占了十六席。社會黨及工團派，在西班牙的急進派中，勢力要算最大了。

七、馬克斯主義者連合黨 (P. O. U. M.)，牠是共產黨中分出來的異端，爲安德雷寧 (Andrés Nin) 及穆林 (Joaquín Maurín) 兩人所領導。其勢力以在巴塞羅那州爲最雄厚，牠在一九三六年很顯然的變成取消派和托洛斯基派，現在已經被壓制下去了。

戰爭到來了，瑪德里變得天翻地覆。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內閣就改組了三次。最初是左派的共和黨繼續掌政，可是到了九月間就崩潰了，因為政府的支配作戰沒有效率。雖然民衆仍在繼續應戰，但情形近於混亂狀態。於是加巴勒羅在九月六日組成新政府，其中除了他自己以外，還包含社會黨員五人。伐伊奧擔任了外交部長，白里多擔任了海空部長。爲着適應當前的環境，同時包容了共產黨員兩人，另有代表巴斯克民族主義者一人，代表加他（關人）著一人，及共和黨員二人。稍後政府又復擴大組織，准由工團派人士入閣。

加巴勒羅的內閣，一直延長到次年的春天。他的忠誠是沒有問題的，他的威信也很大，他的毅力更無可否認。但他仍然失敗了。他沒有打勝仗，他最初所允諾的社會革命，也沒有見諸事實。他的年紀（六十七歲）是太老了，身體又不十分康健，據說他每晚九點鐘就要入睡，因此九時以後西班牙政府就不能處理要事了。做一個工會的領袖，加巴勒羅是個極完善的典型，他的品格高尚，他以整個生命供獻給西班牙的無產階級；他少時爲手工業勞動者，在二十歲以前還不會識字；他曾七次入獄，最後一次且被判處死刑，在他執政的末期，共產黨受到蘇聯的援助，勢力逐漸膨脹，到了一九三七年五月，眼見得在政府軍方面，要以共產黨的軍力最爲強大。加巴勒羅因爲厭惡共產黨，他便掛冠而去。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奈格林博士（Dr. Juan Negrin）繼起組織內閣，他並不是共產黨，乃是左翼的社會黨員，但他與共產黨及共和黨都應付得很好，於是行政也轉見生氣了。自無政府主義者在巴塞羅那起事經歷平後，他棄絕了他們。他又請加巴勒羅及「馬克斯主義者連合黨」不要掣肘，他集合政府方面的各種力量，共赴

最高的任務——戰勝。奈格林爲一四十八歲的醫生，會到各處旅行，精通各地方言，他爲人機警，堅強，文雅，而以財政專家聞名於世。他在加巴勒羅內閣中擔任財長，並兼轄稅警團（*Catalineros*）。他既就任閣揆，乃擴展該項組織，使之成爲強有力的軍隊，幫助着拯救西班牙。

九 不干涉

依照常時國際公法而言，各國政府皆有權力向外購買軍火，以爲壓服國內叛變之用，然而西班牙的合法政府，竟未能享這種權利。第一，因爲弗朗哥的海軍（雖然叛軍並無交戰權），實行一種非法的而同時有效力的封鎖。第二，因爲各大強國，發起了一種奇怪的「不干涉協定」，禁止裝運軍火及志願兵到西班牙的雙方去。這種協定對於政府軍，可說是一種桎梏。他們因此既不能從法國得到軍火，而從蘇聯所得的也很少。至於叛軍方面，則德意在協定簽字以前，早有大批軍火和人力運往，且即在簽字之後，也每任意破壞協定。（在英意「紳士協定」簽字後之第一天，意大利即有五千兵隊在加狄司（*Cadix*）登陸。）

不干涉公約，是英法在開戰之初就想出來，以免戰爭擴大範圍的，他們以爲嚴格的干涉制度，可以限制全面的延燒。公約自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三七年二月，經德、意、葡三國不斷的反對——尤其是葡萄牙，一有機會，即阻撓談判——歷盡千難萬辛，最後才由二十七國簽字；迨至一九三七年四月，國際海軍開始巡邏西班牙領海。

這裏可以把法國的立場簡略地說一下。大多數法國人，都不願意弗朗哥戰勝。這原因只要翻開地圖一看，就

可知道。原來法西斯主義者如在西班牙戰勝，則法國在對德國或意大利開戰的時候，勢必增加第三條需要防守的邊境。意大利或德國在巴勒利克羣島或摩洛哥方面，如有海軍根據地，則地中海的均勢必遭破壞，而法國由非洲運輸後備兵的生命線，亦有被切斷之虞。不過另一方面，法國一部分有力人士，則因階級的立場而同情於弗朗哥。法國人幾乎不惜任何代價——即令西班牙政府軍完全失敗亦可——以圖避免即時發生大戰之禍。法西斯主義者又把握住一次勝利。他們之所以敢一再實行侵略政策，因為看透了英法兩國不敢虛聲恫嚇，如果恫嚇，那就是開戰了。

英國的態度，與法國如出一轍。由國家主義的及帝國主義的觀點而言，弗朗哥的勝利，對於英人即令日後實倒了弗朗哥，也是一個煩惱。因為這樣一來，不免要危及直布羅陀——在西戰之初，弗朗哥或其同盟，已裝好了控制直布羅陀海港的祕密砲位了——而給奧德意兩國在地中海西部得一立足點。地中海對於不列顛帝國的交通，原為一極重要的關鍵。但從財產、特權、及階級各點來看，英國卻希望弗朗哥戰勝；英國人固然愛其帝國主義，但更愛其資本主義。他們恐怕西班牙赤化，恐怕庇里尼山以南有共產主義。英國人的心理既然自相衝突，於是他們的政策也就徬徨不定。結果他們就猶疑躊躇，在法西斯國的屢次侵略行為之前，顯出畏葸的態度來。他們在龐大的軍備計劃沒有完成以前，是不惜任何代價以求和平的。

不干涉協定的生命，可說多事多難。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政府軍飛機誤認伊比查港內的德國袖珍艦「德意志」號為逆艦「巴勒利克」號，竟然投彈轟炸。德國勃然大怒，兩天以後即正式派遣海軍，攻擊西班牙的

亞爾默利亞城。不干涉協定的假面具，就這樣的揭穿了。德意兩國，在理論上參加不干涉計劃，制止外國軍隊在西班牙作戰，然而他們自己卻有成千成萬的軍隊在那裏打着！後來連這不干涉的假裝也逐漸卸掉了。當弗朗哥軍隊（大部分爲意大利人）攻克散丹台城的時候，意大利國內竟然公開熱烈的慶祝，就像慶祝意國自己的勝利一樣。

及至六月十九日，又發生了「來比錫」事件。據稱德國巡洋艦來比錫號，在奧蘭海外，忽被怪潛艦發出三個魚雷轟擊。可是沒人看到那艘潛艇。於是有人評論此舉是無中生有的事件。希特勒因此又大怒了，一時歐局頗有發生戰爭的危險。

到了九月間，又發生了另外一件最重要的危機。據傳有擔任爲叛軍實施封鎖的意大利潛艇，用魚雷轟擊地中海內中立國的商船。一時英國、希臘、丹麥及其他中立國的船隻，先後被擊沈者凡十二艘，這簡直使人想起一七一七年潛艇橫行的故事。那些從來不現形的「海盜」潛艇，不但攻擊西班牙領海中的船隻，並且遠達於愛琴海。英國及其他小中立國，最初也還是隱忍不發，但當兩隻俄船被擊沉的時候，於是蘇維埃政府便大怒起來，要求採取報復手段，並正式責備意大利爲海盜國家。不久各國在瑞士尼翁召開會議。意德兩國卻都拒絕參加。這正中蘇聯的下懷，因爲她本來打算把他們排除在外。這時英法兩國終於挺起了腰，採取斷然行動。意大利因爲未曾出席，所以被擠除外，而英法兩國則決定派艦巡邏地中海，以便「遏制海盜」。這當然爲意大利人所不悅，認爲等於英法管轄他們的海岸線，所以要求同來參加巡邏。

十 葡萄牙

這個小國家，全國的人口還不到倫敦或紐約一市，產業落後，民智未開，與世遠隔，靠着輸出軟木、魚介、和酒類爲生。在西班牙戰爭以前，她在國際政治上，是個受人尊敬愛好和平的角色。七百年來她是一個君主國，一九一〇年的革命，推翻了布拉根那皇室（Bragans），建造了共和。革命以來，政治歷經變遷，直到一九三三年，沙拉柴博士教授（Professor Dr. 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生於一八九四年——才樹立了軍事獨裁的政權。沙拉柴教授過去是位遁世者，現在還是一位遁世者，這一點與其他獨裁者如出一轍。他本來是個經濟學家，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三年間，曾任財政部長。他說他的獨裁權是被迫出此的。他是一個虔信耶穌教的基督徒，所以對奢侈浮華，極其厭惡。他在財政部長任內，曾以平衡預算付償國債而蜚聲海外。不久他把獨裁制度應有機構推動了起來：創立清一色的職業團體國家，舉辦幹練的祕密警察，組織爲私人所用的綠衫軍，實施軍隊化的青年運動；密切勾結其他法西斯國家，排除別的政黨而以一黨專政，自任黨魁——舉凡一切法西斯國家的制度，莫不應有盡有。

沙拉柴教授某次自己化裝爲一個關員，親自檢查旅客行李，因爲他曾聽到海關的檢查，辦事拖延，沒有效率。某次他的旅行社曾經出了一個賞格，凡在葡萄牙旅館中找出一個死跳蚤或死臭蟲者，賞洋一金鎊，因爲他以為合於衛生的旅行事業，於國家大有補益。

葡萄牙多年以來被視爲英國的一個領地。她是英國最老的同盟國——同盟條約可以追溯到一三七三年——而英國也的確支配着她的財政，並且是她最重要的顧客。

第十三章 墨索里尼

「我要使我的生活成爲一篇傑作。」

「我的作風是絕對意大利化的。我信仰拉丁民族的功能。」

——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

一 首相的出身

班尼托·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凶暴而好做作，是一個鐵匠的兒子，現代意大利的創始祖，阿比西尼亞戰爭的製造者，於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生於羅馬格那 (Romagna) 的普萊多巴奧·多維亞 (Dovia di Predoppio) 村中。他的一生可說是集近代史上叛徒、流氓、和天才的大成。

除了貧困之外，沒有其他明顯的動機促成他的事業。是的，他的父親是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是本鄉地方的無政府主義者；不過，在墨索里尼的一生中，並沒有遭逢像列寧或畢蘇斯基 (Pisudski) 那樣兄長被處死刑的悲劇。他的母親，一位教員，正像一切大人物的母親一樣，是一個不平凡的婦人，但她給墨索里尼的影響似乎很

小他雖然尊敬他的母親，但卻不像希特勒那樣終身受着母愛的影響。凱末爾（Kamal Atatürk）的母親曾受希臘人的虐待，後來這位土耳其的獨裁者便將希臘人驅逐出境；在墨索里尼的一生中並沒有這樣戲劇似的直接衝動使他彌補憾事。

我們也不容易發現墨氏個人的什麼特出事件，好像沒有了這些事件，這位首相便會終身做個鐵匠的兒子，老死在福利（Forti）似的。誠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所說，如果列寧沒有一個德國將軍護他乘了一輛貼封皮的貨車通過德境，俄國的革命也許永不會發生。如果托洛斯基不因一時之怒而拒絕參加列寧的葬禮，蘇聯或許永不會有五年計劃。陶爾斐斯（Dollfus）之所以能在奧國行施獨裁，乃是因為在國會決定投票時，一位社會黨議員走到浴室裏去了。像這類在歷史中起重大作用的個人的偶然事件，在墨索里尼的一生中是不大顯著的。他自己製造他的幸運。他的事業是一種不斷的繁榮的生長，正如某種毒草的蔓延一樣。

墨索里尼在青年時代所受的主要的個人影響，要算是一位流亡於瑞士的俄國人巴拉拜諾夫（Angelica Balabanov）夫人了。在他初期革命時代，她照顧着他，改善他的健康，供給他精神和物質上的糧食。當時墨索里尼是一個砌碑匠，他之會見列寧，顯然是巴拉拜諾夫介紹的。數年後，列寧還責備意大利社會黨人不該失掉他們中之傑出人物墨索里尼哩。

每個人是一個各種志願的戰場，各種志願的賭注。墨氏早年的志願大部分是在文學上與智識上。他天資聰穎，好學不倦，曾經讀過馬克斯、黑格爾、馬基維利（Machiavelli）、拉薩爾（Ja Sallo）、尼采、巴勒托（Pareto）、索

勒爾 (Sorel) 們的著作。他像吸墨紙似的吸收了他們的思想。他從尼采學到恨羣衆，從馬克斯又學到愛羣衆。他曾說，在青年時代，他老是把一枚馬克斯的紀念章放在衣袋裏。

二 大言不慚

亞歷山大·墨索里尼 (Alessandro Mussolini) (他給他的兒子取上一個墨西哥革命者班尼托 (Benito James) 的名字，這位班尼托便是發令處死麥西米倫皇帝 (Emperor Maximilian) 的人) 與鄉村學校教師羅莎·瑪爾托妮 (Rosa Maltoni) 兩人的兒子是從極端貧困中長大起來的。他在二十歲以前從沒有嘗過咖啡的滋味。他睡的不是褥子而是草堆，他下地來的那間臥房，現已改成了一個博物院，仍保存着赤貧的痕跡。墨索里尼不時回到他的故鄉去，並在附近建造了一個模範農場。他不像希特勒，他對於活着的親戚們的生活是相當關懷的。

他父親雖是個鐵匠，然而祖上歷代是務農的。一九三五年十月，他在農民的大會中會說：「那種喜歡在舊紙堆裏找骨頭的人滿以為發現了我的祖宗是貴族定能討我的歡喜。我對他們說：『停止吧！』我的祖父，我的會祖都是農夫，並且爲了免除一切懷疑起見，我在老農場的牆上放上了一張匾，上面寫着自我以上的各代墨索里尼都是用手耕田的。」

墨索里尼因了他母親的主張，進了教會學校（像斯丹林與凱末爾一樣），雖則父親是一個絕端反對教士

的人。後來他便自己在學校裏教書，每月掙五十六個里拉（當時合二鎊五先令或美金十元二角五分），直到他十九歲逃到瑞士爲止——爲的是逃避服兵役。他在一家糖果廠裏做泥水匠兼工人以糊口；他常常挨餓，巴拉拜諾夫會描寫他有一次如何搶奪兩位在公園裏野宴的英國女人的食物。晚上他便研究社會主義學說。他變成了一個煽動家，常常和警察發生糾葛，於是被監禁起來，並從瑞士的這一縣被逐到那一縣。在意大利和瑞士，墨索里尼一共會被捕過十一次。

他痛恨牢獄；他看不上在監禁中所受到的精神上的污辱和肉體上的苦痛。有一次，他曾被日內瓦的警察迫令打手印；從此他便恨透了瑞士，我們假定他之所以厭惡國聯，一部分乃是由於他早年從日內瓦受到了侮辱，也不算是無稽吧。當然他的牢獄經驗也使他厭惡透了狹窄的屋子。有一次他拒絕進卡普利（Capri）的監獄（Blue Grotto），所以他以愛好寬敞的房間聞名，像在威尼齊亞宮（Palazzo Venezia）他的辦公室，大得有六十英尺長，四十英尺寬，四十英尺高，這樣總算大大地補償了他早年的被關在小監牢裏。

一九〇四年墨索里尼在二十一歲時，回到了意大利，此後做了十年激進社會主義者。

這時他以教書和不斷辦報爲生。他不是像蕭伯納或托洛斯基那樣寫小冊子的專家，但他確是當代第一流新聞記者之一。他早期的冒險創作，一部叫作「主教的情婦」（The Cardinal's Mistress）的小說，並沒有成功；不過，這部小說可算是部「硬性、激烈、諷刺、傲慢、有力、晦澀」的作品（引用法朗西哈蓋德（Francis Hackett）的話。）他也曾作過一篇約翰赫司（John Hays）傳。一九〇九年，他在福利創辦了他自己的報紙「階級鬭爭」。

(La Lotta di Classi) 這張報紙使他在全意大利的社會黨人和革命黨人中間出了名。一九二二年他任社會主義機關報前進 (Avanti) 的主筆，在三個月內把這張報紙的銷路擴增到三倍。以前他曾在厥倫多 (Verona) 後來又到奧國住過一時，於是收復失地政策的經驗喚醒了他性格中一件主要東西——國家主義。一九二四年他是「紅色運動週」(Red Week) 的組織人之一，這是社會黨在羅馬格那暴動的企圖。「他曾被奧國的警察逮捕，並被驅逐出境。救他出獄的人是威尼斯一位社會主義者哀倫保根 (Tillienbogen)。二十五年後，因墨索里尼的奧國政策所造成的奧國二月「革命」發生後，這入自己也被捕了。」

歐戰的大禍截斷了他的社會主義活動，正統派的社會主義者都主張意大利守中立；而墨索里尼卻贊成參加協約國作戰。費納博士 (Dr. Finer) 在他一部透澈的著作墨索里尼的意大利 (Mussolini's Italy) 中說：「要知道他怎樣會變成一個戰士，祇需注意他的體格就得，不用在旁的地方找原因。」站在政治的國家主義立場上，和純粹由於他生性好尋事，墨索里尼要戰爭。他放棄了「前進」報的編輯職，並且被社會黨開除。他對羣衆心的分析，有獨到的鑒別的，當他的老同志們大罵他變節時，他大聲疾呼說：「你們恨我，因為你們仍舊愛我呀！」幾個月後，他便創立了那張至今仍由他主持的意大利人民報 (Popolo d'Italia)。這張報受了法國人的津貼——因為法國渴欲將意大利拖入戰爭漩渦。

在不久以前，墨索里尼尚是一個反戰者，這時他卻激烈鼓吹武力了。他說：「我們必須認清此戰與彼戰之不同，正像認清罪與罪，血液與血液間之不同一樣。……我們不是，也不願意做陳死人，永遠躺着不動。我們是人，是活

人，我們願意在歷史的創造上有所貢獻，不管這貢獻是如何的平凡。」（費納書一〇一頁）不過他自己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以前並沒有到過前線去，而且他在壕溝裏只蹲了三十八天，一個壕中的迫擊炮炸裂起來，炸得他受了重傷。他在醫院裏住了七個月。關於這件事的官方的說法至少是如此。

戰事結束後，墨索里尼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組織了最初的法西斯戰鬥團（Fasci di Combattimento），加入者大半是戰爭初起時附和他要求參戰的人。他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雖則並不是社會黨員；他第一個政策便是要求那些因戰爭而獲利的企業，應抽百分之八十五的稅。他不喜歡也不信任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貴族階級。「法西斯」（Fascio）一字原是一個意大利文，其意僅指「羣」或「捆」；墨索里尼便以為這字正好代表羅馬帝國的「示威棒」（古羅馬執政者之權力標記——譯者）。第一批法西斯主義者是意大利人民報在朗巴地（Lombardy）地方的通訊員，這個運動便是由他們發起的。起初「法西斯」並不是一個政黨，而祇是一個民團，其主要力量，係在退伍兵士之中，尤其是前線的義勇軍（Arditi）。墨索里尼說：「我們從前線生還的人要求意大利的統治權。」

這個運動很快地發展起來，它的根源正和德國以及後來產生希特勒的根源一樣，便是退伍士卒的失業；民主內閣的式微；代議政治的腐敗；國家主義的興起；左派份子的傾軋，以及對正統派國際社會主義的不滿。當墨索里尼的勢力膨大起來的時候，軍隊紛紛做他的後盾，正像德國國防軍做希特勒的後盾一樣。政客們目擊他的發展，竭力想把他所領導的運動收買過來；前任首相喬利蒂（Giolitti）便是意大利的巴本。大資本家也像在德

國的情形一樣準備着援助他的政治機構。

在一九二〇與一九二一年之間勞資糾紛震撼了意大利。工人們起來反抗低得忍無可忍的工資與生活狀況。當意大利北部工業區中六十萬工人企圖奪取生產工具的時候，墨索里尼便挺身而出，成爲第一個支持「佔領工廠」的領袖。「佔領」是失敗了，一半因爲社會黨的領導懦弱無能。這倒給了墨索里尼鼓勵羣衆的便利。不過說他把意大利從赤化中「救」了出來，那是荒誕之談。即使是意大利人也不再相信這句話了。

到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穩固地擴展着他的勢力，並且用了一件後來的獨裁者都來效法的武器——暴力。他變成了流氓頭腦一類的人物。（不過，他仍舊是一個活動的新聞記者；他記錄下一九二二年康斯會議（Convegno di Como）的經過，並設法訪問白利安與勞合喬治。他後來記載說，這次教了他國際匯兌的神祕的第一課，原來他發現意大利的一里拉值不到法國一法郎，心中頗覺羞慚無地。）墨索里尼的黨羽在六縣內打出了勢力。巴爾蒲（Balbo）在弗拉拉（Ferrara）向赤黨進攻，法郎那西（Farinacci）在克利蒙那（Cremona）向赤黨進攻。具體而微的游擊隊式的內戰，恐嚇着意大利。墨索里尼在理論上仍自稱爲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是爲了劫奪勢力，他必須有一個對象；於是在他「解放」勞動階級的口號下來攻打他們。

一九二二年十月進軍羅馬之後，跟着來了最高度的反應——和更大的暴力。他的做首相，其實不過是一個流氓頭頭的勢力大得足以嚇退政府，使政府屈服而已。他直到確有把握能夠奪得穩軍隊不會反對他，意皇肯任他首相時，才要求全權。所謂進軍羅馬，當然並不是真的軍隊開入羅馬，而是法西斯黨佔領幾個城市，而軍隊則守

中立袖手旁觀而已。墨索里尼乘着臥車到羅馬，那班聚集在羅馬城中的五萬法西斯黨人，到第二天才悄悄地解散。

一九二二年後墨索里尼的歷史是大家所熟知的。他先組織了一個聯立內閣，於是，正像十年後的希特勒一樣，把法西斯黨員一脚踢了出去。他靠着美國富豪摩根 (Morgan) 的借款做後盾。在一九三五年意阿戰爭發生以前，他唯一的嚴重危機是麥梯奧蒂 (Mattiotti) 事件。大部份的輿論現在都不認為首相會直接發令刺死這位社會黨領袖，但是他不能逃避道義上的責任。那班消息靈通的人士，以為真相是這樣的：墨索里尼不僅在議會裏恫嚇麥梯奧蒂，並且私下也斥罵他，提到他的名字便冒火直跳起來。人們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到他向他的爪牙狠狠地叫着：「麥梯奧蒂那個小子——」（貝克特 Thomas a' Beckett 的被殺，也是由於亨利二世 Henry II 露了同樣口氣所致。）他的爪牙一得這個暗示，心想討首相的歡心，便自動去幹起來，把這位青年社會黨員綁架了暗殺掉。像這樣一番把戲，對於獨裁者原是有大方便；如果賣賈做得「好」，那末自然是值得的，如果不好，就是說出了醜，那末獨裁者可以否認自己是同謀。不過，墨索里尼總算是有勇氣負起他的責任的；他膽敢承認凶手是「高級」法西斯黨人。事實上他親近的幾個朋友，確是有份的。在對下議院所發一篇有名的演詞中，他大言不慚的這樣說。

「諸位，在羅馬先皇帝 (Titus) 神靈之下，我們還要找什麼粉飾呢？我在這裏議會之前，在全意大利人民之前，宣佈我，單獨一人，負此次事件一切政治上道義上，歷史上的責任。假如多少經過割裂以後，一紙判決書依然

足以絞死一個人的話，那末把絞圈拿出來好了。假如法西斯主義祇是一服蓖麻油，或一根棍棒，而不是意大利優秀青年高貴的熱情，那末我承受責罵！」——墨索里尼自傳英譯本二九一頁。

六卅慘案後希特勒所採用的技巧，差不多就是這一套。他也擔認了全部責任；在意大利和德國都用這種方法消滅了國內大部份人良心上的不寧。可是麥梯奧蒂事件，在首相內心中的確深為戰慄。自全體而論，此舉對他確有很大價值，因為從此以後，他可以使他的反對黨孤立，因而更順利地去摧毀他們。（暗殺麥梯奧蒂的幾個真兇，倒祇被判很輕的刑罰。其中有一名是美國聖路易市的一個流氓。）

三 思想轉變

在這次意阿戰役的時候來追溯一九一一——一二年的意土戰爭，那是很有意思的，我們當還記得墨索里尼那時是竭力反對戰爭的。意土戰爭也發生在非洲，他在當時還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所以認為那次戰爭是帝國主義的罪行。他在福利組織反戰罷工，結果坐了五個月的牢。他那時寫着，利比亞戰爭，及其所引起的報紙文章，乃是「國家主義狂熱病之十足的、典型的、矛盾的表現。」

當年他在「前進」報的社論上所寫的話，到一九三五年讀起來很奇妙：

「我們處於一個國家主義的、教會勢力極大的、保守思想盛行的意大利之中，她要把大刀當做法律，軍隊當做國家的學校。我們早就看到這種道德的沒落，那並不使我們驚奇。一般人以為黷武好戰，即所以表現強盛



墨 索 里 尼

之兆，其實他們是錯誤了。強盛的國家應有適度的理性，不必入於瘋狂的狀態中。像今日意大利所走的路一樣。國家主義的，黷武主義的意大利卻顯得她缺乏這種理性。所以會發生了這樣的事，把悲慘的侵略戰爭當作了羅馬帝國的勝利來慶祝。」——（倫敦每日快報，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

費納博士發現了一段與此同調的可貴的文字。「想想這麼一個意大利吧！」墨索里尼在一九二二年怒氣勃勃地寫道：「在這個國家裏面，三千六百萬人思想如出一轍，好像他們的腦子是由一個模型中刻出來似的，像這樣一個國家你就會想到無異於一個瘋人院，或者說得貼切一些，是一個絕對無聊或精神衰弱的王國。」

對於這一句話，慣會捉狹的觀察家就要回答說：居然如此！

四 他的爲人

看見過墨索里尼的人大半都要驚奇他身裁的矮小。他像拿破崙一樣祇有五尺六寸高。兩肩很有力。雙手的样子很漂亮，竟可以說是很文雅。他笑起來樣子非常沉着。他常穿着法西斯軍拿破崙式的制服。他的辦公地點是在羅馬市中心威尼齊亞宮，起居的地方距此乘車十分鐘便到，就是托隆尼亞別莊（Villa Torlonia），面積寬大，建築考究，地近披霞門（Porta Pia），腦門塔那路（Via Nomentana）邊，且有一座富麗堂皇的花園。別莊原屬一位羅馬貴族托隆尼亞親王（Prince Torlonia）所有，他因無力撐持門面，便把它獻給墨索里尼，現在他很想要回來，可是墨索里尼已中意了這個地方，特別是那座花園。

他的夫人裘婦女士 (Donna Rachade Grifi) 向來住在米蘭 (Milan) 新近才搬到羅馬來，現在便住在托隆尼亞別莊裏。裘婦的出身很模糊，據一說她是福利地方一家酒店的侍女，一說是墨索里尼父親不做鐵匠以後所雇的女僕。她給墨索里尼生了五個子女。

墨索里尼實在是現在唯一出名子孫滿堂的獨裁者；也是唯一對家庭生活極為關心的獨裁者。和拿破崙（還有奧登堡）一樣，他信任自己家裏的人，而不大信任旁人。歷年來他唯一的朋友是他的兄弟亞那爾杜 (Arnaldo)，他繼承他哥哥做意大利人民報的主筆；墨索里尼差不多每天早晨要從羅馬打電話到米蘭給他。亞那爾杜的暴卒對首相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墨索里尼的女兒愛達 (Edda) 酷肖乃父，是唯一敢於責難他的人；他鍾愛着她。他的丈夫齊亞諾伯爵 (Count Galeazzo Ciano) 是墨索里尼的報館經理，後來在阿比西尼亞領導轟炸機與驅逐機的敢死隊。墨索里尼的兩個大兒子，維多利奧 (Vittorio) 十九歲，勃魯諾 (Bruno) 十七歲，也是這次戰爭中的飛行員。好像是要給兩個小兒女羅馬諾 (Romano) 與安娜瑪麗亞 (Anna-Maria) 也去接觸接觸天空。墨索里尼會親自駕駛飛機給他們一次初離地面的經驗。

墨索里尼現年五十三歲，身體非常的強健，這一半也是他嚴肅注意養生法的結果。他做了首相之後不久，便害了極嚴重的胃病。現在除了牛奶和水菓之外，他吃得很少。他最近告訴一位美國訪員說，一面指着桌上一盤水菓，「那就是我保持健康的祕密，——水菓，水菓，水菓。早上我喝杯咖啡，吃點水菓；中飯我吃點湯或粥，和水菓，到了晚飯，只吃水菓。我從來不碰肉類，可是我有時也吃一點魚。」他愛運動，各種運動：如擊劍、游泳、滑雪，在托隆尼亞花

園內騎騎馬；他不喝酒，不吸煙。年青時也歡喜女人，但近年來他不大注意她們了。（但一九三七年初，一位法國女子芳太琪夫人 Madame de Fontanges 會講過一段他的瘋狂的戀愛故事。）

墨索里尼生得像一付鋼質的發條。（史丹林比起來是一塊冥頑不靈的花崗石，希特勒像原形質外層的斑點。）墨索里尼對於飲食男女的自制力像一個硬漢的自制力，他痛恨放縱，因為他已嘗夠了，知道那會損害他的健康；希特勒的自制力則像一個懦夫那樣，深恐受誘惑。史丹林正相反，他的嗜慾正常得像一隻水牛。

首相不參加社交生活。當兼任外相必須應酬的時候，他不在威尼亞齊宮或托隆尼亞別莊內，而在一家專爲此事租下來的旅館裏接見賓客。他並無有錢朋友，他看輕沒落和放蕩的羅馬貴族。他極愛看戲，但沒有功夫去看，有時他在自己家裏放映電影。他在一九二八年所寫的自傳裏，會說他執政六年以來從沒有跨進過一個貴族的客廳，或甚至一家咖啡館的門檻。

照例，墨索里尼每天辛苦地工作五六小時——遇有要事需要更多時間例外——餘下的時間他便看書，沉思，或者運動。他講究清潔，精密，有秩序；據名記者羅惠 (Emil Ludvig) 在一篇引人入勝的「墨索里尼會談記」中說，他最恨「媽虎」。他的工作即在最細小之處也是有系統的。從他的性格的多方面而論，他是一個完美無疵的行政長官；他非到一天工作做絕，絕不離開威尼齊亞宮。

他很不在乎錢，雖則他的大家庭使他在經濟問題上比別的獨裁者稍爲注重一點。他的官俸是每月八千里拉（約合一百三十五鎊或美金六六〇元），可是他在國庫內可以隨時提取「小數雜項開支」。他在美國版的

自傳上，收到了五千鎊（美金二萬五千元）的版稅，其中一部捐給羅馬的窮人。據說有好一時期他的收入來源是靠哈脫報（Hearst Press），每星期支美金一千五百元；不過，早在一九三五年，他就放棄了經常寫稿，因為國際政治內情太微妙，使他不能坦白地表示自己的意見。他把一部份哈脫收入分給了爲他作傳，替他整稿的人沙法蒂（Margherita Sarfatti）。墨索里尼的兄弟亞那爾杜很有錢，因爲意大利人民報從前現在都是一個賺錢的報紙；現任經理是墨索里尼的姪子。

這位首相是現代獨裁者之中唯一和宗教相妥協的人。一九二九年的拉德備條約（Ratona Treaty）調整了意大利的政教關係。此後不久，墨索里尼和教皇——兩個性格都很強的人——即在法西斯青年的教育上起了衝突；一九三二年，首相親赴梵帝岡跪下來祈禱，當時大家都相信他受了聖洗。他年輕時是一個直言不諱的無神論者，和他父親一樣；後來他卻變得極其虔信宗教了。他每天都禱告。他給長女愛達的結婚禮物是一串念佛珠；他最幼的女兒安娜瑪麗亞是他第一次所取的宗教名字。

墨索里尼是歐洲最易接近的政治家（像捷克的貝奈斯 Beneš 一樣），他接見過許許多人。他每天第一個客人總是警察長；（如南斯拉夫的亞率山大第一件事便是接見保安官。）這位首相好奇心很大，對於人性很有興趣，並且和羅斯福一樣，是個足智多謀喜見賓客的人。費納說他見客已有六萬次以上；說他關心過的個人「公民事件」已有一、八八七、一一二件。

墨索里尼很肯聽別人講話——但是他不大接受別人的意見。他獨自下決斷。當他願意的時候，他可以使自

已像一個西藏喇嘛一樣地不可接近。在一九三五年的日內瓦緊要關頭上，當他大發雷霆的時候，沒有一人可以近他的身。亞勞西男爵 (Baron Aloisi) 及其他要人對他報告，他聽不聽得由他高興。羅馬有幾位外交官，例如英大使德羅蒙爵士 (Sir Lurie Drummond) 不歡喜和他談話，因為他實在嚇得他們喪膽。墨索里尼相識的人有好幾千，這一點很可以驕傲，但自他的令弟去世後，就沒有一個朋友；他曾告訴羅惠說他一個人也不信任。這段話在羅惠那部書的意大利譯本上是被刪去了的，因為許多意大利人曾為首相效勞過，而自以為他們應得他的信任。

他是一個很好的新聞記者，所以他也喜歡報館裏的人。但他自估甚高，因此記者必須小心對付他才行。他從不討好人家；他輕視一切阿諛，但馬屁工夫最高者除外；他有時候野蠻、乖戾、愉快、或高聲說話，這都要看他的情緒如何而定，他是不大想掩飾，或隱瞞他的任性的。他喜歡接見善於辭令的人；有時他的問話比答話來得多。欲得他的青睞，大膽是一條捷徑。記得作者曾看哈蓋脫代表圖表縱覽雜誌 (Survey Graphic) 去訪問他出來以後，氣色很有點急喘的樣子，因為他竟敢問了一句冒險到極點的話：「閣下，假如自己也奉行法西斯的紀律，效忠和服從的美德，那您在您的事業中會變成怎樣的情況？」（對此墨索里尼軟弱地回答說「戰爭」已改變了一切。）墨索里尼深知見客是一個最妙的宣傳方式；於是他濫見訪問者。大多數新聞記者——和他們的主筆——都不肯放棄和一位獨裁者或一國之主談一談的榮幸；他們祇要被墨索里尼或希特勒接見一次，他們便會生出了一種感恩圖報的心來，把他們客觀的視線改變了。要一般通訊員去說一位剛才恩賜了他一小時友誼談話的，

工作很忙的要人的壞話，這是很難的。

一位英國的訪問員最近見了墨索里尼，並且竟因他的一句說明使墨索里尼笑了起來，這是很難得的現象。在那篇訪問稿裏，這位通訊員寫道：「首相的笑，引起了我對法西斯制度得到一個批評，原來法西斯制度是不許有幽默表示的。」該稿在發表前呈請審查時，（每稿必經墨氏審查）墨索里尼便堅決地將這一段他笑的事實刪去。因為獨裁者是從來不笑的！

兩個新聞記者會使首相公開受窘，這也是僅有的一種記載。那時他正在洛加諾，簽訂一九二五年的安全公約。（一九二二年以來，他偶然離開意大利有三次：第一次是出席那年的洛桑會議；第二次是一九二三年匆匆報聘倫敦；這是第三次。）他剛接收了意大利自由主義派的各大報，國際通訊機關團對此大為憤感，於是相約拒絕參加他所召集的記者座談會。墨索里尼發現自己已被一批會藐視他的新聞記者包圍在旅館的應接室裏。他很懊惱，臉作不屑之狀。他對那個每日新聞（Daily Herald）記者司洛孔（George Stoombe）說話，這位記者是個長着紅鬍子的有名人物，他在康斯會議（Conference of Cannes）期內，一直與他見面。「哈！墨索里尼粗暴地叫道：『你的共產黨朋友們怎樣了！』司洛孔很心平氣和地答道：『我不是共產黨，總理先生，我是社會黨。』」「哈！墨索里尼又哼着說：『那末我弄錯了。』這時有一個荷蘭記者，尼貝爾（George Nypels）尖聲叫道：『可惜這並不是第一次！』」

墨索里尼一天到晚的讀書，沒有一位現代政治家——也許前捷克總理馬薩里克除外——像他那樣熟諳

時文。他有一本有系統的讀書札記本。他的歷史智識之淵博與精駭，竟使羅惠驚奇不止。正像許多喜歡讀書的人一樣，他也喜歡寫作，並且寫得非常之好。他只要寫一本十二頁的小冊子，就可把法西斯主義的要義包括無餘，而在希特勒用「我的奮鬥」那種方法寫起來，恐怕得費六百頁的篇幅。他真是獨裁者中最有學問，最善詭辯的人——他真正可稱為唯一博學的現代統治者——他自修過法文和德文，並且講得很老練。大約在一九二五年間，開始學習英文，然後他才可以讀泰晤士報上的政治評論。他選了一位英國女記者吉勃生小姐 (Miss Gibson) 做他的教師。他常常隱名——為意大利人民報——寫文章，他和人家合作寫了一個劇本，以拿破崙自哀爾巴島 (Filippo) 遁歸法國的日暮途窮時代為題材，名為「操場」(Campo di Maggio)。他還寫了另一個劇本，以他心目中的第一個英雄凱撒大帝 (Julius Caesar) 為題材，但現在尚未出版。

墨索里尼最恨的東西是：希特勒、貴族、錢、貓和老邁龍鐘。他痛惡老年人，特別是老太婆。他不喜歡人提到他已做了祖父這件事，而且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正逢五十年生辰那一天，不准意大利的報紙提起這句話。墨索里尼最愛的東西是：羅馬城（他熱心獎勵「禮拜羅馬」）、長女愛達、農民、書本、飛機與迅速。

他善駕機器腳踏車，並且像已故的勞倫斯上校 (Colonel Lawrence) 一樣，愛在夜裏駕車於鄉間疾馳。歐戰後不久他便學會了駕駛飛機，並且在自傳中詳細述着他許多次遇險和被迫降地，以及如何神祕地脫險，又如何使他快樂異常。

五 他的性格

從墨索里尼複雜的性格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微明的線索，由此求表示他之所以得權的由來。

第一，他有骨氣和勇氣，而在意大利這樣一個國家有時往往兩樣都付闕如。

他雖則大言不慚，他的智識卻是冷靜的、分析的、演繹的，又是澈底現實的。（我的同事伏德（F. A. Voigt）曾說祇有大歌劇盛行的國家才會產生法西斯主義。）

他那火燄般的利己主義，那神聖不可侵犯的利己主義（*Sacro egoismo*）是意大利人都抱有的。他的虛榮心顯然到了極點，例如，他規定十九個里拉等於美金一元，這個比價其實定得太高了，大半也是因為他想比法國所定的比價高一些。遠在一九一〇年起他便有瘋子之稱了。

他激頭激尾是一個實幹的人。關於德國的六卅事件，最使他驚異的一段事是希特勒費了五個鐘頭和一個他以為是賣國賊（羅姆）的談話。

他的直覺性，無論在人事上或政治上，都很銳敏。他說，「我不能使我自己改變。我和野獸一樣，能預先嗅出天氣的好壞。如果我聽從我的本能，我從來不會錯誤。」

他是一個用筆的雄辯家。他用寫文章來獵取政權。

像所有的獨裁者一樣，他是不肯饒人的。希特勒、史丹林和墨索里尼從未寬恕過一個敵人。

他倒並不是一個偽善者。他從不把他的雄心隱藏起來，他坦白地說過他的雄心是要攫取權力，並且儘可能地長久把持下去，在另一方面他堅持說他並不是個「愛國主義的漁利者」。對意大利盡責是他的熱誠。「不是抓權的慾望佔住了我的心田呢？」有一次他說道：「不，我相信，憑良心講也沒有一個意大利人會這麼想。就是我的最大的政敵也不會這麼想。這是責任心。一種真正對革命對意大利的責任心。」（費納書二九五頁。）

他的演戲天才是了不得的。恐怕除了托洛斯基外，當代沒有一位政治家是這樣好的演員了。

他顯然對於政治有一種世界感，希特勒以為德國是一個與世隔絕了的國家；墨索里尼卻很知道意大利之外世界所包含很大。

最重要的是他有着一種充滿了熱情的體力。他的生活力在每一種姿勢中自行流露出來；比方說，當他行禮的時候，他那麼用力地擲出他的手臂，使你以為他的手會斷掉。他這種活力是馬上會吸住守人的。當他一到預備給檢閱的軍隊前面，他的出現竟有一種雷震電擊的效果。

從消極方面講，他的性格可得而述者，有下列幾點：

他極其暴躁，有一位他很熟識而又欽佩的新聞記者，在一九三五年到意大利來，寫了一篇頗為客觀的故事，說是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用兵，世界輿論並不怎樣同情。墨索里尼看見了這段文字（剪下的報紙他大半都讀）在約定時間的幾個鐘頭前他便取銷了接見那位新聞記者的約會。有一樁小事件他曾命令「幸運雜誌」（Fortune）的意大利專號禁止在意大利發行，這份雜誌對他原是很公正的，他之所以停止其發行，一般人都以

爲由於引用了他早年所說的一句話，這話是：「我一醒過來時，第一件做什麼事呢？立刻跳出來！不管我枕邊的臉蛋兒是如何地美麗。」

他很迷信。在他創業的初年他於數千件堆到他面前的禮物中，接受了一個埃及的木乃伊。不久亞登卡門陵（Tomb of Tutankhamen）的發掘人卡那奉爵士（Lord Carnarvon）死了。墨索里尼下令將那個木乃伊搬去。他喚醒了契其宮（Palazzo Chigi），當時他在那裏辦公的職員，叫他們立刻將它搬開，因爲他恐怕木乃伊會在半夜裏壓到他的身上。

他厭惡住在狹小的房子裏，我已經提過了。他極端嗜好迅速和粗暴的動作，也許就是要補償他前關在六英尺闊四英尺長的牢獄中踱步的日子。

像許多意大利人一樣，他疑心病很重。例如，當意皇從羅馬打電話到米蘭給他，任他爲首相的時候，他雖非不相信這個消息，但是非等到正式電報加以證實時不肯有所行動。

他並不是驚人的創造者。他大部份的思想是有所從來的。在思想上法西斯祇是馬克斯、尼采與索勒爾（Sorel）被曲解了的產物。法西斯的敬禮也不是他發明的，那是大農齊奧（D'Annunzio）的一個提議，黑衫服裝也不是他設計的，他不過從前線義勇軍的制服上抄襲過來。

他有時也會得說客氣話。「一個像我這樣地位的人」他告訴羅憲說：「每星期至少總要發一次呆。」

墨索里尼，自己很明白自己性格的複雜。他很感興趣的讀到一家法西斯報上連載的關於他的性格的討論。

讀了以後，他打電報給當地的縣長說：「拜煩你通知主筆一聲，請他用下面話來結束討論：『因為墨索里尼自己也說不知道他究竟是怎麼一個人，所以要別人研究出來是相當困難的。』」

哈蓋德在一九二六年去過羅馬後寫道：「不管他流芳百世或遺臭萬年，墨索里尼總是意大利一個怪傑，實大膽，有生氣……他是那些新進天才們的恐怖劇本中的主角，這種劇本在英國結局是巴力門山（Parliament Hill），在意大利是維蘇威火山（Vesuvius）。墨索里尼的性格，原屬維蘇威火山式。他有時會得熱血奔騰，有時怒從心上起，有時惡向膽邊生，而結果也許是煙霧、火崩、毀滅。哈蓋德在寫那篇文章的時候，腦子裏在想著考夫島（Cornu）九年以後便輪到阿比西尼亞了。」

倘然他不坦白，他這人就不足為奇了。一九三七年十月在巴洛那（Bologna）演講時他說：「我向世界要求和平的桂冠。這個桂冠是從八百萬支大槍林中產生的，每支槍頭插上磨得鋒利的刺刀並且從勇敢的青年胸口向外描射。」（國際新聞日刊 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News 十三卷十號。）

當他接見一個德國新聞記者時，他大聲疾呼說：「我們已經向前跨了一大步。我們已將德意軸心鍛煉成功了。這是歐洲局勢的開始。你得明白——我不相信什麼歐洲合眾國。那是一種烏托邦，因受歷史上和地理政治上的限制，完全不能實現……我們正在經驗着時代的改變，打倒一切政治的、社會的意識形態。民主政治是完了。牠們是傳染病的中心。時局的前途脫離了集體制度，脫離了羣衆不定的反應，而有所轉變。民主政治像一般流動的散沙一樣。我們的國家政治的理想卻像花岡石峯一樣地堅固。」

不久首相便實行了他的話——在西班牙。

六 暴力

「許多人不認識現實，但是發現實歷碎了之後便不得不認識了。」

「不相信武力便等於不相信地心吸力。」

——墨索里尼

——托洛斯基

墨索里尼第一次發表的作品是一篇關於武力哲學的論文。這是他二十一歲時在尼采的強烈影響之下寫的。武力的概念常常迷惑着他。但是誠如他所說暴力應作「割治」用，而不作「遊戲」用，他解釋意大利的恐怖爲一劑「國家的預防藥」，他寫道：「有些份子應禁止其活動，正像醫生禁止受了傳染病的人活動一樣。」在他生涯中有一時期，即一九二一年之初，他辭去——爲時甚暫——法西斯運動的領袖地位，因爲他反對別動隊（Squadrista bands）採用那樣過度的暴力。不過他並沒有取消這種別動隊，直到一九二七年他們的蓖麻油與棍棒工作穩當地完成了的時候。

對於暴力問題墨索里尼經過了一番考慮，發表意見如下：

「歷史上曾有過一個完全依照民意而不用任何武力的政府嗎？這樣組織成的政府過去從不會有過，將

來亦永遠不會有。民意之易於改變，正像海灘邊的沙堆形一樣。我們不能一直抓住民意。民意是永遠統一起來的。從來沒一個政府能夠使人民個個都快樂幸福。你要解決一個問題，無論所用的方法是怎樣，即使你有神的智慧也必然會使一部份人懷怨。……你怎樣才可以避免這種怨望傳播開來，避免因此造成一種對國家團結的危險呢？你得用武力來避免——在必要的時候，一定要鐵面無情的應用武力，倘使褫奪了任何政府的武力，剩下來只有不朽的原則，那麼這個政府一定要爲首先一個成立的，志在推翻政府的集團所控制。」（費納書二二三頁。）

行刺墨索里尼的企圖，曾經有過五六次；他是一個深信死生由命的人，但也沒有相信得對於保護自己也不加以嚴厲的防範。據說羅馬祇有一個人，即警察長，能夠指示墨氏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首相取道那一路線，是聽從他的話的。羅馬有幾條街他從來不走，但是在另一方面，每天從家裏到辦公處，他並不作特殊的戒備。

據說希特勒在他的辦公桌抽斗裏放着一管小手鎗。一旦他的政權崩潰，我們可以想像到希特勒是會得自殺的。首相卻不然。墨索里尼是一隻厚皮的猩猩，他不會用這麼直捷了當的方法來結果自己。

七 心理分析

維也納的心理分析家，史丹克爾博士（Dr. Wilhelm Stekel）對墨索里尼曾作過一番極其引人入勝的研究。據史丹克爾的說法，認爲墨氏之所以渴欲奪取政權及其深自抱負偉大的歷史命，乃是由他對他父親愛與

工作很忙的要人的壞話，這是很難的。

一位英國的訪問員最近見了墨索里尼，並且竟因他的一句說明使墨索里尼笑了起來，這是很難得的現象。在那篇訪問稿裏，這位通訊員寫道：「首相的笑，引起了我對法西斯制度得到一個批評，原來法西斯制度是不許有幽默表示的。」該稿在發表前呈請審查時，（每稿必經墨氏審查）墨索里尼便堅決地將這一段他笑的事實刪去。因為獨裁者是從來不笑的！

兩個新聞記者曾使首相公開受窘，這也是僅有的一種記載。那時他正在洛加諾，簽訂一九二五年的安全公約。（一九二二年以來，他偶然離開意大利有三次：第一次是出席那年的洛桑會議；第二次是一九二三年匆匆報聘倫敦；這是第三次。）他剛接收了意大利自由主義派的各大報；國際通訊機關對此大為憤感，於是相約拒絕參加他所召集的記者座談會。墨索里尼發現自己已被一批會藐視他的新聞記者包圍在旅館的應接室裏。他很懊惱，臉作不屑之狀。他對那個每日新聞（Daily Herald）記者司洛孔（George Stoombe）說話；這位記者是個長着紅鬍子的有名人物，他在康斯會議（Conference of Cannes）期內，一直與他見面。「哈！」墨索里尼粗暴地叫道：「你的共產黨朋友們怎樣了？」司洛孔很心平氣和地答道：「我不是共產黨，總理先生，我是社會黨。」「哈！」墨索里尼又哼着說：「那末我弄錯了。」這時有一個荷蘭記者，尼貝爾（George Nypels）尖聲叫道：「可惜這並不是第一次！」

墨索里尼一天到晚的讀書；沒有一位現代政治家——也許前捷克總理馬薩里克除外——像他那樣熟諳

時文。他有一本有系統的讀書札記本。他的歷史智識之淵博與精賅，竟使羅惠驚奇不止。正像許多喜歡讀書的人一樣，他也喜歡寫作，並且寫得非常好。他只要寫一本十二頁的小冊子，就可把法西斯主義的要義包括無餘，而在希特勒用「我的奮鬥」那種方法寫起來，恐怕得費六百頁的篇幅。他真是獨裁者中最有學問，最善詭辯的人——他真正可稱為唯一博學的現代統治者——他自修過法文和德文，並且講得很老練。大約在一九二五年間，開始學習英文，然後他才可以讀泰晤士報上的政治評論。他選了一位英國女記者吉勃生小姐 (Miss Gibson) 做他的教師。他常常隱名——為意大利人民報——寫文章，他和人家合作寫了一個劇本，以拿破崙自哀爾巴島 (Elba) 遁歸法國的日暮途窮時代為題材，名為「操場」(Campo di Maggio)。他還寫了另一個劇本，以他心目中的第一個英雄凱撒大帝 (Julius Caesar) 為題材，但現在尚未出版。

墨索里尼最恨的東西是希特勒、貴族、錢、貓和老邁龍鍾。他痛惡老年人，特別是老太婆。他不喜歡人提到他已做了祖父這件事；而且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正逢五十年生辰那一天，不准意大利的報紙提起這句話。墨索里尼最愛的東西是羅馬城（他熱心獎勵「禮拜羅馬」）長女愛達、農民、書本、飛機與迅速。

他善駕機器腳踏車，並且像已故的勞倫斯上校 (Colonel Lawrence) 一樣，愛在夜裏駕車於鄉間疾馳。歐戰後不久他便學會了駕駛飛機，並且在自傳中詳細述着他許多次遇險和被迫降地，以及如何神祕地脫險，又如何使他快樂異常。

五 他的性格

從墨索里尼複雜的性格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微明的線索，由此求表示他之所以得權的由來。

第一，他有骨氣和勇氣，而在意大利這樣一個國家有時往往兩樣都付闕如。

他雖則大言不慚，他的智識卻是冷靜的、分析的、演繹的，又是澈底現實的。（我的同事伏德（Dr. A. Voigt）會說祇有大歌劇盛行的國家才會產生法西斯主義。）

他那火燄般的利己主義，那神聖不可侵犯的利己主義（Mauro egoismo）是意大利人所都抱有的。他的虛榮心顯然到了極點，例如，他規定十九個里拉等於美金一元，這個比價其實定得太高了，大半也是因為他想法法國所定的比價高一些。遠在一九一〇年起他便有瘋子之稱了。

他激頭激尾是一個實幹的人。關於德國的六卅事件，最使他驚異的一段事是希特勒費了五個鐘頭和一個他以為是賣國賊（羅姆）的談話。

他的直覺性，無論在人事上或政治上，都很銳敏。他說，「我不能使我自己改變。我和野獸一樣，能預先嗅出天氣的好壞。如果我聽從我的本能，我從來不會錯誤。」

他是一個用筆的雄辯家。他用寫文章來獵取政權。

像所有的獨裁者一樣，他是不肯饒人的。希特勒、史丹林和墨索里尼從未寬恕過一個敵人。

他倒並不是一個偽善者。他從不把他的雄心隱藏起來，他坦白地說過他的雄心是要攫取權力，並且儘可能地長久把持下去，在另一方面他堅持說他並不是個「愛國主義的漁利者。」對意大利盡責是他的熱誠。「不是抓權的慾望佔住了我的心田呢？」有一次他說道：「不，我相信，憑良心講也沒有一個意大利人會這麼想。就是我最大的政敵也不會這麼想。這是責任心。一種真正對革命對意大利的責任心。」（費納書二九五頁。）

他的演戲天才了不得的。恐怕除了托洛斯基外，當代沒有一位政治家是這樣好的演員了。

他顯然對於政治有一種世界感，希特勒以為德國是一個與世隔絕了的國家；墨索里尼卻很知道意大利之外世界所包含很大。

最重要的是他有着一種充滿了熱情的體力。他的生活力在每一種姿勢中自行流露出來；比方說，當他行禮的時候，他那麼用力地擲出他的手臂，使你以為他的手會斷掉。他這種活力是馬上會吸住了人的。當他一到預備給檢閱的軍隊前面，他的出現竟有一種雷震電擊的效果。

從消極方面講，他的性格可得而述者，有下列幾點：

他極其暴躁，有一位他很熟識而又欽佩的新聞記者，在一九三五年到意大利來，寫了一篇頗為客觀的故事，說是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用兵，世界輿論並不怎樣同情。墨索里尼看見了這段文字（剪下的報紙他大半都讀）在約定時間的幾個鐘頭前他便取銷了接見那位新聞記者的約會。有一樁小事件他會命令幸運雜誌的意大利專號禁止在意大利發行，這份雜誌對他原是很公正的，他之所以停止其發行，一般人都以

爲由於引用了他早年所說的一句話，這話是：「我一醒過來時，第一件做什麼事呢？立刻跳起床來！不管我枕邊的臉蛋兒是如何地美麗。」

他很迷信。在他創業的初年他於數千件推到他面前的禮物中，接受了一個埃及的木乃伊。不久安登卡門陵（Tomb of Tutankhamen）的發掘人卡那奉爵士（Lord Carnarvon）死了。墨索里尼下令將那個木乃伊搬去。他喚醒了契其宮（Palazzo Chigi），當時他在那裏辦公的職員，叫他們立刻將它搬開，因爲他恐怕木乃伊會在半夜裏壓到他的身上。

他厭惡住在狹小的房子裏，我已經提過了。他極端嗜好迅速和粗暴的動作，也許就是要補償他前關在六英尺闊四英尺長的牢獄中踱步的日子。

像許多意大利人一樣，他疑心病很重。例如，當憲皇從羅馬打電話到米蘭給他，任他爲首相的時候，他雖非不相信這個消息，但是非等到正式電報加以證實時不肯有所行動。

他並不是驚人的創造者。他大部份的思想是有所從來的。在思想上法西斯祇是馬克斯·尼采與索勒爾（Sorel）被曲解了的產物。法西斯的敬禮也不是他發明的，那是大農齊奧（D'Annunzio）的一個提議，黑衫裝也不是他設計的，他不過從前綠義勇軍的制服上抄襲過來。

他也有時也會得說客氣話。「一個像我這樣地位的人」他告訴羅惠說：「每星期至少總要發一次呆。」

墨索里尼，自己很明白自己性格的複雜。他很感興趣的讀到一家法西斯報上連載的關於他的性格的討論。

讀了以後，他打電報給當地的縣長說：「拜煩你通知主筆，請他用下面話來結束討論：『因為墨索里尼自己也說不知道他究竟是怎麼一個人，所以要別人研究出來是相當困難的。』」

哈蓋德在一九二六年去過羅馬後寫道：「不管他流芳百世或遺臭萬年，墨索里尼總是意大利一個怪傑，堅實大膽，有生氣……他是那些新進天才們的恐怖劇本中的主角，這種劇本在英國結局是巴力門山（Parliament Hill），在意大利是維蘇威火山（Vesuvius）。墨索里尼的性格，原屬維蘇威火山式。他有時會得熱血奔騰，有時怒從心上起，有時惡向膽邊生，而結果也許是煙霧、火崩、毀滅。哈蓋德在寫那篇文章的時候，腦子裏在想着考夫島（Cortu）。九年以後便輪到阿比西尼亞了。」

倘然他不坦白，他這人就不足為奇了。一九三七年十月在巴洛那（Bologna）演講時他說：「我向世界要求和平的桂冠。這個桂冠是從八百萬支大槍林中產生的，每支槍頭插上磨得鋒利的刺刀並且從勇敢的青年胸口向外描射。」（國際新聞日刊 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News 十三卷十號。）

當他接見一個德國新聞記者時，他大聲疾呼說：「我們已經向前跨了一大步。我們已將德意軸心鍛練成功了。這是歐洲局勢的開始。你得明白——我不相信什麼歐洲合衆國。那是一種烏托邦，因受歷史上和地理政治上的限制，完全不能實現……我們正在經驗着時代的改變，打倒一切政治的、社會的意識形態。民主政治是完了。牠們是傳染病的中心。時局的前途脫離了集體制度，脫離了羣衆不定的反應，而有所轉變。民主政治像一般流動的散沙一樣。我們的國家政治的理想卻像花崗石峯一樣地堅固。」

不久首相便實行了他的話——在西班牙。

六 暴力

「許多人不能認識現實，但是給現實壓碎了之後便不得不認識了。」

——墨索里尼

「不相信武力便等於不相信地心吸力。」

——托洛斯基

墨索里尼第一次發表的作品是一篇關於武力哲學的論文。這是他二十一歲時在尼采的強烈影響之下寫的。武力的概念常常迷惑着他。但是誠如他所說暴力應作「割治」用，而不作「遊戲」用，他解釋意大利的恐怖爲一劑「國家的預防藥」。他寫道：「有些份子應禁止其活動，正像醫生禁止受了傳染病的人活動一樣。」在他生涯中有一時期，即一九二一年之初，他辭去——爲時甚暫——法西斯運動的領袖地位，因爲他反對別動隊（*Squadristi bande*）採用那樣過度的暴力。不過他並沒有取消這種別動隊，直到一九二七年他們的蓖麻油與棍棒工作穩當地完成了的時候。

對於暴力問題墨索里尼經過了一番考慮，發表意見如下：

「歷史上曾有過一個完全依照民意而不用任何武力的政府嗎？這樣組織成的政府過去從不會有過，將

來亦永遠不會有。民意之易於改變，正像海灘邊的沙堆形一樣。我們不能一直抓住民意。民意是永遠統一起來的。從來沒一個政府能夠使人民個個都快樂幸福。你要解決一個問題，無論所用的方法是怎樣，即使你有神的智慧也必然會使一部份人懷怨。……你怎樣才可以避免這種怨望傳播開來，避免因此造成一種對國家團結的危險呢？你得用武力來避免——在必要的時候，一定要鐵面無情的應用武力，倘使褫奪了任何政府的武力，剩下來只有不朽的原則，那麼這個政府一定要為首先一個成立的，志在推翻政府的集團所控制。」（費納書二二三頁。）

行刺墨索里尼的企圖，曾經有過五六次；他是一個深信死生由命的人，但也沒有相信得對於保護自己也不加以嚴厲的防範。據說羅馬祇有一個人，即警察長，能夠指示墨氏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首相取道那一路線，是聽從他的話的。羅馬有幾條街他從來不走，但是在另一方面，每天從家裏到辦公處，他並不作特殊的戒備。

據說希特勒在他的辦公桌抽斗裏放着一管小手鎗。一旦他的政權崩潰，我們可以想像到希特勒是會得自殺的。首相卻不然。墨索里尼是一隻厚皮的猩猩，他不會用這麼直捷了當的方法來結果自己。

七 心理分析

維也納的心理分析家，史丹克爾博士（Dr. Wilhelm Stekel）對墨索里尼曾作過一番極其引人入勝的研究。據史丹克爾的看法，認為墨氏之所以渴欲奪取政權及其深自抱負偉大的歷史命，乃是由他對他父親愛與

很的相反傾向而來，老墨索里尼是他們本鄉的第一人，於是小墨索里尼成了意大利的第一人。他在青年時代是個社會主義者，這一點和父親相同，後來卻又把自己特顯出來，一脚踢開了社會主義。史丹克爾以為墨索里尼一生的轉變點是在他從意大利逃往瑞士這一端上，此次逃亡是想逃避他父親的影響。他的父親曾被當地警察送入了監獄；現在墨索里尼把他父親一類的人物（按：即指社會主義者）也送入監獄。

墨索里尼一向要居於領導地位。他在小學生時代坐的位置是在第三排，這是專為窮孩子而設的；他始終不遺忘這個恥辱。他記下說他爬山的唯一愉快是爬到山頂，站在那裏，做一個居高臨下的勝利者。做砌磚匠時，他總是喜歡去安放那頂上的一塊磚。他曾當過泥水匠，這一回事，史丹克爾相信，是有心理學上的意義的。他先做房屋的建築者，然後做意大利的建築者。

在他的一生中，他內心裏起着兩種衝突，一方面想做新聞記者，一方面想做藝術家。像所有的新聞記者一樣，他想寫小說和戲劇。他也學過小提琴（他接見塞爾茲 George Goldis 時，作了一次生動的談話，解釋音樂——特別是意大利音樂——對於他具有如何意義。）除掉凱撒與拿破崙之外，他最崇拜的人是想像力豐富的作家——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貝得拉克 (Petrarch)、巴斯加爾 (Pascal)，他想做一個詩人是失敗的；所以他想使他的生活成爲一件藝術作品。一半也是因爲他實在沒有偉大的藝術創作力，所以他祇得幹獨裁者的營生了。

他的生活，史丹克爾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向孩子時代開倒車；他能吃苦而也要享樂以補償年青時經受到的恥辱與失敗；他醉心着羅馬歷史，這是他自己國家的黃金時代。他認爲凱撒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人物。他

使自己和凱撒十分相像。（還有一點不大重要，但頗有趣味的相像之處就是他和凱撒一樣的對壞天氣有銳感性。）在他的政治感情內惟一可與凱撒比肩的是拿破崙；他老是以拿破崙爲意大利人。他寫的拿破崙劇，描寫拿破崙從哀爾巴島歸來，在日暮途窮之中作人定勝天的最末一次掙扎，是有相當意義在內的。

墨索里尼之所以恨希特勒，因爲他不能容忍有和他競爭的獨裁者。天下不容有第二個墨索里尼，他不單想方想阻撓和打敗希特勒（例如在陶爾斐斯被殺後的奧地利），他更想越過他。希特勒只脫離國聯，但墨索里尼則進一步實行對國聯挑戰。希特勒溫和地要求殖民地而一點沒得到；墨索里尼則乾脆從阿比西尼亞雕刻一塊出來。

在凱撒時代不列顛祇是羅馬帝國的前哨地。墨索里尼已在公共廣場（Forum）的附近衆目昭彰地建立了巨形的嶄新的歷史紀念碑，來把這件史跡指示給羅馬人士看。到了十八世紀，英國打敗了拿破崙，把他幽禁在哀爾巴島與聖海倫那。而現代的英國則正在設法將羅馬人目爲「我們的海」的地中海，變爲英國的內湖。所以如果我們以爲墨索里尼有爲凱撒吐氣爲拿破崙報仇的迷夢，也不算是全屬幻想吧？

八 法西斯主義是什麼

當墨索里尼抓取政權的時候，他除掉一心想把住他的地位之外，什麼政綱也沒有。他很坦白的承認這一點。但是他不久便找到了一個政綱：那便是想把階級協調來替代階級鬭爭，其實他對於加緊階級鬭爭卻比誰也盡

過力。這就是法西斯主義實踐的來歷。他顯然和希特勒適得其反：希特勒搗了一個確定的政綱而上台，上台後就丟掉它；墨索里尼是先沒有政綱而後再很快的發明了一個。

法西斯的經濟綱領是盡人皆知的。私有財產私有利潤仍舊保持着，不過處於國家嚴格的統制之下。理論上，雇主雇員兩方面所代表的國家全部生產力，組織成了二十二個「職業團體」，再由其中選出代表為下議院議員。代表的選舉，根據職業制而不根據地域制；換言之，祇有旅館業的代表，而沒有都林（Turin）省的代表。

這個計劃實施得很謹慎，所以發展得很慢；到了一九三六年還是一個雛形的結構。每一「職業團體」有三個法西斯黨的監察員；而由墨索里尼所指定的部長或次長為之長。選舉人只能就法西斯大議會（Grand Fascist Council）所圈定的候選人「投票」；他們的選舉權祇限於對整個名單投贊成票或反對票，而不能選擇其中某某幾個候選人。墨索里尼兩次的普選是完全無聊的勾當。

國家是最高的權威，所以國家之管理經濟，祇以國家本身的福利為前提。法西斯主義在精神上也許可以說是「企圖將意大利人變為羅馬人」，但在實際上它把意大利變成了一個監獄。照尙蒂爾（Gantile）說：「法西斯主義是凝成一個人形的一連串理想」；而墨索里尼這一特殊的人物，和他那特殊的性格，便決定了法西斯主義得形的重鎮。

墨索里尼在一九三五年告訴英國一位政論家說他不願意法西斯的意大利有正統派的資本主義存在，在全國「職業團體」代表大會的著名演詞中，他又宣布一九三一——三四年間的世界經濟恐慌給予資本主義

制度一個極深的打擊，竟使資本主義本身已經成爲這種制度的危機。他說：「今天，我告訴你們，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壽終正寢了。」

我們在這個「職業團體」的國家之中的確可以找到一大堆外貌動人的反資本主義的力量。沒有一個雇主可以不經政府允准而解雇工人。沒有一個資本家可以不得政府同意而有任何單獨行動，即使如擴大工廠之類的小事情也須先求許可。工資是由政府規定的；雇主祇可以從政府所辦的勞工介紹所裏雇用工人，沒有國家的准許，廠主不得清理其營業；政府統制他的信用資源，苛捐雜稅分潤了廠主們大部份的進益。

他方面工人在法西斯主義之下的不利嚴重到不知伊於胡底。自由在法西斯制度下是不存在的；個人的利害，並不成爲問題；成問題的祇有制度是否得不償失。工人已被剝奪了論價權；他們的工會已被解散；雇主有同業公會，無組織的工人與雇主對較起來當然站在弱者的一方；工人仍舊被壓在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下面；他們的工資也許（而且也已經）被無情地依法減低了；尤重要的是他們喪失了罷工權，在資本家一方面，雖也感到一些不便，但仍舊保全了護取私人利潤的根本特權。墨索里尼所提倡的法西斯主義，其原意並不在於支持資本主義的機構，但結果卻產生了這樣的效果。至於限制資本主義的任意活動，那就好比一種保險費，資本家爲了取得完全保障使工人不許提出任何要求，他們是願付這種代價的。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百科全書中論法西斯主義一章上，開頭即說「格言，先見與熱望」怎樣連串起來；日久鍛煉成爲「一種有條理的學說」。關於法西斯的歷史，他說明有三件東西他是要加以攻擊的：（一）和平主義，

(二) 馬克斯社會主義，(三) 自由民主主義。他說：「祇有戰爭能使全人類的精力趨於極端緊張，凡是有勇氣去應付戰爭的人民他們身上都打上一個尊嚴的印記。」他攻擊唯物史觀，以為「法西斯現在，並且將永久，信仰神聖使命，信仰英雄主義。」關於民主主義：「法西斯主義否認多數人，單單爲了是多數人這一事實，而即能統治人類社會；它更否定多數人能以定期聚商的方法來理政；它肯定人類的平等是永久不變的，有益的而且有好結果的。」

他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說明法西斯主義是舉國一致表現：

「世界上從來沒有一種學說，其產生是完全獨創的，定義分明的而又不依賴歷史的……法西斯主義的基礎，即在於國家概念，國家特性，國家任務，與國家目的。法西斯主義認國家爲絕對的，一切個人或團體和國家比起來，祇是相對的，只有與國家發生關係方有到個人或團體的概念……法西斯主義所認定的和創造的國家，其本身完全是個精神的和倫理的事實，因爲國家的政治、法律、經濟等組織只是一種具體的東西；這種組織必須發源於國家而演爲精神的表現……」

「法西斯國家是獨一無二的，且爲原始的創造。它不是反革命的而是革命的，因爲如此，所以它對於普遍的政治問題有先見之明，在未會發生之前，卽加以解決；這在其他國家，必須於問題發生以後，在政治舞台上以各黨競爭授大權於議會，及政治團體的互相推諉等方法來解決。法西斯國家對於經濟方面的種種問題，則用同業團體的制度來解決，這種同業團體，不但在工業方面日形重要，卽在工人方面亦復如此。在倫理方面，法西

斯國家實施秩序，嚴飭紀律，並服從國內固有的道德信條。」

他在最後一段結論上，更以迫切的言詞，訴諸帝國主義：「在法西斯主義看來，帝國的發展，就是民族的擴張，所以要發展帝國，必須表現民族擴張的活力。」

第十四章 意大利要人一斑

「我如前進，跟我來；我如後退，殺我死；我如死亡，復我仇。」

「革命革不了人的本性。」

——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

一 誰是繼承者

墨索里尼一身而兼三要職：法西斯黨領袖；首相；意大利最高政府機關法西斯大議會(Grand Fascist Council)主席。他以首相的地位，在原則上是對意皇負責的；他以黨魁的資格，任命法西斯大議會的一切而自爲之長。這議會又統治了國會。德國的希特勒將國與黨打成一片，他以總理兼任了總統。墨索里尼可並不是首相兼國王，雖則效果還是一樣的。蘇聯的史丹林和墨索里尼比起來，有一點不同，他在理論上是由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其他委員委任的，並且是對他們負責的。在意大利則法西斯大議會的份子全是墨索里尼的部下。不過，史丹林有一點和墨索里尼相同，就是在理論上把黨和國劃分開來。

據我們所知，這位總理是唯一預先把將來繼承他的人安排好的獨裁者。法西斯大議會的會員約有二十五人；除掉依據職權與終身會員之外，他們是祕密決定而且時常調動的；他們的集會也是祕密的。（黨祕書與某些

別的貴人，當他們在黨內或閣內握着職權的時期中，始終是大議會會員；現存進軍羅馬時代的四軍團長之一——巴爾蒲 (Balbo)、波諾 (Bono)、與維契 (Veohi)——便是終身會員。如墨索里尼去世，大議會當負責呈出一張名單，從這張名單中意皇將挑選出一位承繼者。據說名單上現在已有三個名字——那當然是由墨索里尼選定的。

墨索里尼告訴羅惠說第二個首領是永不會有的；他的意思顯然是說能及得到他自己的第二個首領是永不會有的。他四週的人，的確都是小脚色。意大利沒有德國那樣的戈林 (Goering)，也沒有蘇聯那樣的嘉加諾維基 (Kaganovich)。當一個屬僚像格蘭地 (Grandi) 或巴爾蒲那樣變得大顯煥時，不喜歡有第二者來抓權的。墨索里尼便會設法去掉他。波諾剛攻下阿杜華 (Adowa) 與麥開爾 (Mekle) 便被調離了阿比西尼亞。目前的黨祕書司達拉斯 (Starace) 正在克盡其卑躬屈節之能事以捧住他的職位；萬一他愚笨起來權勢變得太大時，他一定會被辭歇的。

首相本人便是法西斯制度；一旦他去世，這制度是否仍然存在呢？人們的回答總會是否定的，可是別忘記了別國的前例。歐戰後四位獨裁人物已經死啦：列寧、陶爾斐斯、南斯拉夫的亞力山大，和畢蘇斯基，但他們手創的制度——當然在形式上和精神上是大不相同的——卻仍舊活着。

二 意皇愛麥虞咸

意皇，一位容貌端正、身材矮小的家伙，只要他自己願意，可以保證墨索里尼把首相做下去，因為他依然有權指定一個新首相。墨索里尼和其他一切獨裁者不同的地方，便是他高興在自己之上，永遠有一個名義上居於最高地位的傀儡。

維多利亞·愛麥虞咸三世 (Vittorio Emanuele III) 生於一八六九年。他是歐洲帝皇中的老前輩，在位已有三十七年。他在父皇被刺殞命後，繼承大統。他的壯年時代在軍隊中過去。他娶了一位黑山國的 (Montenegro) 公主愛娜為后。他畢生有兩次最大的決心，一是一九一五年罷免喬利蒂 (Giulini) 的首相職（他就是使意大利捲入了大戰漩渦的人），一是屈服於墨索里尼進軍羅馬之下。他是一位熱心搜集古幣的專家。他的性格溫文爾雅，他的學問精駭淵博，並且像多數意大利人一樣，天資極其聰敏。他的年俸有一千一百二十五萬里拉，約合英金二十萬鎊。正與謠傳相反，他和墨索里尼的關係很好。

有一個小故事說愛麥虞咸曾經滿意地慶祝着阿比西尼亞戰爭。

據報告他曾說：「如果我們勝利，我可做阿比西尼亞王。如果我們失敗，我還是做我的意大利王！」

三 一等爪牙

法西斯黨祕書的職司是製造錯誤。墨索里尼將所有的內部工作都交給他做；當他因了執法過嚴，不肯予人升擢，為事擇人種種緣故而結怨於人，結到夠深時，他便被辭退，讓別人來接替他。自一九一九年該黨成立以來，祕

魯已經換了六位了；這就是說平均每人祇經用兩年半便只好廢棄不用了。皮盜契 (Bianchi) 四軍團長之一是第一個祕書，因為牽涉於麥梯與蒂事，墨索里尼便不要他了。他的後任者琪恩太 (Tinnato) 是攻打飛鳥梅城 (Fiume) 時大農齊奧 (D'Annunzio) 部下的一個軍團長。後來一個是法拉那西 (Roberto Parinari)，法西斯黨 克利蒙那 (Chenona) 支部黨魁；連首相也嫌他太粗暴，現在已是一個被人遺忘的沒聲名的脚色了。再下來是都拉梯 (Angusto Turati) 是一比較能幹而可尊敬的人物，總算他克勤克儉地在位有四年之久；不過，他現在終於被拘禁在羅特島 (Rhodos) 上。他的後任是居拉梯 (Girardi)，「法西斯十誠」的作者。目下在職的是一隻小心翼翼的看門狗，阿契爾·司達拉斯 (Achille Starace)。

碰巧司達拉斯的眼睛也是突出的，有點像墨索里尼；當他的眼睛瞪起來骨落地轉動的時候，——這是常有的事——人家便會罵他卑鄙，說他在身體上模仿他的主子。略帶好名之癖，在不傷脾胃的限度內，他撐着一個莊嚴的辦公廳，甚且爲了要使握手有力量起見，大概他還會用機械的方法運動過他的手指哩。司達拉斯做一天黨祕書即做一天大議會的副主席，他在黨內人事方面的勢力很不小。他也是「業餘公會」(Dopolavoro) 運動的領導者。這個運動，不但支配法西斯黨員辦公時間內的工作效率，抑且監督其公餘之暇的活動。他的職位使他不受人歡迎，不過他的忠實卻爲大眾所公認。到現在爲止，司達拉斯祇有一次過失：那就是他通令全國國民，在他寫信完畢的時候，信末一句「此請近安」等類的客套，必須換以「領袖萬歲」。第二天意大利人民報上的社評欄內，墨索里尼用隱名指責這個意思，他是不願意抄襲納粹黨德國的希特勒。

和墨索里尼最親近的人是他的東床。現任外相，迦利茶·齊亞諾伯爵 (Count Galeazzo Ciano)，他的父親康士頓茶·齊亞諾伯爵 (Count Costanzo Ciano)，前任交通部長，現任下議院的議長，也是墨索里尼的親信之一；老齊亞諾大概就是法西斯大議會的候補名單上三人中之一。能幹而聰明的小齊亞諾，則投身於外交界，最初任南美洲大使館祕書，嗣任上海總領事，又任宣傳部長，後在阿比西尼亞效勞。他在羅馬新聞界頗孚衆望。

他的朋友們有一次聽到他滿不在意地敘述他用現代武器的殘殺行爲，很有些吃驚。某次他在阿比西尼亞駕機轟炸回來，有一位記者去訪問他，據稱他曾這樣說：

「當你看到阿軍集中在一起時，你可用機關槍向他們掃射一陣；於是他們便散開，藏在深草叢中。然後，你再向他們胡亂掃射一陣，他們每一個人都以爲子彈落得很近，所以就立刻從長草裏鑽出來向各方面跑。這時候你便可以切切實實的射擊他們了。」——（晚報 Evening News，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七日）

一九三六年他和德國簽訂了造成意德軸心的六項條款後，小齊亞諾於接見訪員時發表了一句驚人的話，紐約泰晤士報曾加以引用，他說：「我的得意計策——密切聯德——終於實現了。」

小齊亞諾做外相時，並不寫意。西班牙內戰正爆發着，地中海危機捲入了漩渦，而他和英國之間的關係又老是弄不好。大家都以爲張伯倫在英意「紳士協定」之後，盡力想討好墨索里尼，但終沒有多大成功。英皇的加冕典禮，意大利沒有代表參加；有一時意大利新聞記者且從倫敦撤回。

另一比較勢力大的屬僚是羅沙尼 (Edmondo Rosoni)，首相的副理；他曾在美洲做過好幾年勞工運動

的組織者。墨索里尼的工團組織，便是由這位羅沙尼所創的。

四 巴爾蒲

意大利·巴爾蒲 (Italo Balbo) 以發明用痺麻油來對付非法西斯的反對分子而著名。他「從第一個鐘頭起，即爲法西斯主義者」並且一度做過墨索里尼的「右手」，但迄一九三七年，仍舊流亡在北非意屬殖民地利比亞，做着該地的總督。他在阿比西尼亞戰役內並未參加。據說他像參謀本部一樣，在開始時會極力反對侵略。一九三三年六月，當他從羅馬領導一隊飛機橫斷大西洋，作不着陸飛行參加芝加哥百軍進步博覽會成功回國後，便被束之於利比亞的高閣。現在他的名字在意大利的報紙上最多一個月提到一次。

據說墨索里尼放逐巴爾蒲的主要原因是因爲他那壯觀的飛行功績使他過於出風頭了。不過另一個原因顯然是他和皇太子恩倍爾多 (Umberto) 親近太甚的緣故。一九三二——三三年間恩倍爾多曾有反法西斯的傾向；於是墨索里尼便恨恨地變更了軍中的誓詞，刪去對「皇位繼承者」效忠的一段。據說墨索里尼的嬖人奧斯太公爵 (Duke of Aosta) 也許會代皇太子的嗣位。巴爾蒲本來是恩倍爾多派。現在，大部份消息靈通的人士相信，意皇已勸恩倍爾多去注意他的愚行。可是巴爾蒲卻仍舊跟恩倍爾多過往甚密；隔不多久他便會從利比亞飛到這位太子住的地方拿泊爾 (Naples) 來，並且堂堂皇皇在皇宮裏住上一兩日。

在法西斯意大利內，巴爾蒲是——即使現在也如此——唯一任性行動的人，雖然得有某種限度。有一次，當

(二) 馬克斯社會主義，(三) 自由民主主義。他說：「祇有戰爭能使全人類的精力趨於極端緊張，凡是有勇氣去應付戰爭的人民他們身上都打上一個尊嚴的印記。」他攻擊唯物史觀；以爲「法西斯現在，並且將永久，信仰神聖使命，信仰英雄主義。」關於民主主義：「法西斯主義否認多數人，單單爲了是多數人這一事實，而即能統治人類社會；它更否定多數人能以定期聚商的方法來理政；它肯定人類的平等是永久不變的，有益的而且有好結果的。」

他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說明法西斯主義是舉國一致表現：

「世界上從來沒有一種學說，其產生是完全獨創的，定義分明的而又不依賴歷史的……法西斯主義的基礎，即在於國家概念，國家特性，國家任務，與國家目的。法西斯主義認國家爲絕對的，一切個人或團體和國家比起來，祇是相對的，只有與國家發生關係方有到個人或團體的概念……法西斯主義所認定的和創造的國家，其本身完全是個精神的和倫理的事實，因爲國家的政治、法律、經濟等組織只是一種具體的東西；這種組織必須發源於國家而演爲精神的表現……」

「法西斯國家是獨一無二的，且爲原始的創造。它不是反革命的而是革命的，因爲如此，所以它對於普遍的政治問題有先見之明，在未會發生之前，卽加以解決；這在其他國家，必須於問題發生以後，在政治舞台上以各黨競爭授大權於議會，及政治團體的互相推諉等方法來解決。法西斯國家對於經濟方面的種種問題，則用同業團體的制度來解決，這種同業團體，不但在工業方面日形重要，卽在工人方面亦復如此。在倫理方面，法西

斯國家實施秩序，嚴飭紀律，並服從國內固有的道德信條。」

他在最後一段結論上，更以迫切的言詞，訴諸帝國主義：「在法西斯主義看來，帝國的發展，就是民族的擴張，所以要發展帝國，必須表現民族擴張的活力。」

第十四章 意大利要人一斑

「我如前進，跟我來；我如後退，殺我死；我如死亡，復我仇。」

「革命革不了人的本性。」

——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

一 誰是繼承者

墨索里尼一身而兼三要職：法西斯黨領袖；首相；意大利最高政府機關法西斯大議會(Grand Fascist Council)主席。他以首相的地位，在原則上是對意皇負責的；他以黨魁的資格，任命法西斯大議會的一切而自爲之長。這議會又統治了國會。德國的希特勒將國與黨打成一片，他以總理兼任了總統。墨索里尼可並不是首相兼國王，雖則效果還是一樣的。蘇聯的史丹林和墨索里尼比起來，有一點不同，他在理論上是由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其他委員委任的，並且是對他們負責的。在意大利則法西斯大議會的份子全是墨索里尼的部下。不過，史丹林有一點和墨索里尼相同，就是在理論上把黨和國劃分開來。

據我們所知，這位總理是唯一預先把將來繼承他的人安排好的獨裁者。法西斯大議會的會員約有二十五人；除掉依據職權與終身會員之外，他們是祕密決定而且時常調動的；他們的集會也是祕密的。（黨祕書與某些

別的貴人，當他們在黨內或閣內握着職權的時期中，始終是大議會會員；現存進軍羅馬時代的四軍團長之一——巴爾蒲 (Balbo)，波諾 (Bono)，與維契 (Veschi)——便是終身會員。如墨索里尼去世，大議會當負責呈出一張名單，從這張名單中意皇將挑選出一位承繼者。據說名單上現在已有三個名字——那當然是由墨索里尼選定的。

墨索里尼告訴羅慮說第二個首領是永不會有的；他的意思顯然是說能及得到他自己的第二個首領是永不會有的。他四週的人，的確都是小脚色。意大利沒有德國那樣的戈林 (Goering)，也沒有蘇聯那樣的嘉加諾維基 (Kaganovich)。當一個屬僚像格蘭地 (Grandi) 或巴爾蒲那樣變得太顯煥時，不喜歡有第二者來抓權的墨索里尼便會設法去掉他。波諾剛攻下阿杜華 (Adowa) 與麥開爾 (Makale) 便被調離了阿比西尼亞。目前的黨祕書司達拉斯 (Taracco) 正在克盡其卑躬屈節之能事以捧住他的職位；萬一他愚笨起來權勢變得太大時，他一定會被辭職的。

首相本人便是法西斯制度；一旦他去世，這制度是否仍然存在呢？人們的回答總會是否定的，可是別忘記了別國的前例。歐戰後四位獨裁人物已經死啦：列寧、陶爾斐斯、南斯拉夫的亞力山大，和畢蘇斯基，但他們手創的制度——當然在形式上和精神上是大不相同的——卻仍舊活着。

二 意皇愛麥虞咸

意皇，一位容貌端正，身材矮小的家伙，只要他自己願意，可以保證墨索里尼把首相做下去，因為他依然有權指定一個新首相。墨索里尼和其他一切獨裁者不同的地方，便是他高興在自己之上，永遠有一個名義上居於最高地位的傀儡。

維多利亞·愛麥虞咸三世 (Vittorio Emanuele III) 生於一八六九年。他是歐洲帝皇中的老前輩，在位已有三十七年。他在父皇被刺殞命後，繼承大統。他的壯年時代在軍隊中過去。他娶了一位黑山國的 (Montenegro) 公主愛倫娜爲后。他畢生有兩次最大的決心，一是一九一五年罷免喬利蒂 (Giolitti) 的首相職（他就是使意大利捲入了大戰漩渦的人），一是屈服於墨索里尼進軍羅馬之下。他是一位熱心搜集古幣的專家。他的性格溫文爾雅，他的學問精賅淵博，並且像多數意大利人一樣，天資極其聰敏。他的年俸有一千一百二十五萬里拉，約合英金二十萬鎊。正與謠傳相反，他和墨索里尼間的關係很好。

有一個小故事說愛麥虞咸會經滿意地慶祝着阿比西尼亞戰爭。

據報告他曾說：「如果我們勝利，我可做阿比西尼亞王。如果我們失敗，我還是做我的意大利王。」

三 一等爪牙

法西斯黨祕書的職司是製造錯誤。墨索里尼將所有的內部工作都交給他做；當他因了執法過嚴，不肯予人升擢，爲事擇人種種緣故而結怨於人，結到夠深時，他便被辭退，讓別人來接替他。自一九一九年該黨成立以來，祕

魯已經換了六位了，這就是說平均每人祇經用兩年半便只好廢棄不用了。皮盜契（Bianchi）四軍團長之一，是第一個秘書，因為牽涉於麥梯奧蒂事件，墨索里尼便不要他了。他的後任者琪恩太（Gimtas）是攻打飛鳥梅城（Fiume）時大農齊奧（D'Annunzio）部下的一個軍團長。後來一個是法拉那西（Roberto Farinacci），法西斯黨克利亞那（Cromona）支部黨魁；連首相也嫌他太粗暴，現在已是一個被人遺忘的沒聲名的脚色了。再下來是都拉梯（Augusto Turati），是一比較能幹而可尊敬的人物，總算他克勤克儉地在位有四年之久；不過，他現在終於被拘禁在羅特島（Rhodes）上。他的後任是居拉梯（Girardi），「法西斯十誠」的作者。目下在職的是一隻小心翼翼的看門狗，阿克爾·司達拉斯（Achille Starace）。

碰巧司達拉斯的眼睛也是突出的，有點像墨索里尼；當他的眼睛瞪起來骨落落地轉動的時候，——這是常有的事——人家便會罵他卑鄙，說他在身體上模仿他的主子。略帶好名之癖，在不傷脾胃的限度內，他捧着一個莊嚴的辦公廳，甚且爲了要使握手有力量起見，大概他還會用機械的方法運動過他的手指哩。司達拉斯做一天黨秘書即做一天大議會的副主席，他在黨內人事方面的勢力很小。他也是「業餘公會」（Dopolavoro）運動的領導者。這個運動，不但支配法西斯黨員辦公時間內的工作效率，抑且監督其公餘之暇的活動。他的職位使他受人歡迎，不過他的忠實卻爲大眾所公認。到現在爲止，司達拉斯祇有一次過失：那就是他通令全國國民，在他寫信完畢的時候，信末一句「此請近安」等類的客套，必須換以「領袖萬歲」。第二天意大利人民報上的社評欄內，墨索里尼用隱名指責這個意思，他是不願意抄襲納粹黨德國的希特勒。

和墨索里尼最親近的人是他的東床。現任外相迦利茶·齊亞諾伯爵(Count Galeazzo Ciano)，他的父親康士頓茶·齊亞諾伯爵(Count Costanzo Ciano)，前任交通部長，現任下議院的議長，也是墨索里尼的親信之一；老齊亞諾大概就是法西斯大議會的候補名單上三人中之一。能幹而聰明的小齊亞諾，則投身於外交界，最初任南美洲大使館秘書，嗣任上海總領事，又任宣傳部長；後在阿比西尼亞效勞。他在羅馬新聞界頗孚衆望。

他的朋友們有一次聽到他滿不在意地敘述他用現代武器的殘殺行爲，很有些吃驚。某次他在阿比西尼亞駕機轟炸回來，有一位記者去訪問他，據稱他曾這樣說：

「當你看到阿軍集中在一起時，你可用機關槍向他們掃射一陣；於是他們便散開，藏在深草叢中。然後，你再向他們胡亂掃射一陣，他們每一個人都以爲子彈落得很近，所以就立刻從長草裏鑽出來向各方面跑，這時候你便可以切切實實的射擊他們了。」——(晚報 Evening News,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七日)

一九三六年他和德國簽訂了造成德軸心的六項條款後，小齊亞諾於接見訪員時發表了一句驚人的話，紐約泰晤士報曾加以引用，他說：「我的得意計策——密切聯德——終於實現了。」

小齊亞諾做外相時，並不寫意。西班牙內戰正爆發着，地中海危機捲入了漩渦，而他和英國之間的關係又老是弄不好。大家都以爲張伯倫在英意「紳士協定」之後，盡力想討好墨索里尼，但終沒有多大成功。英皇的加冕典禮，意大利沒有代表參加；有一時意大利新聞記者且從倫敦撤回。

另一比較勢力大的屬僚是羅沙尼 (Edmondo Rosoni)，首相的副理；他曾在美洲做過好幾年勞工運動

的組織者。墨索里尼的工團組織便是由這位羅沙尼所手創的。

四 巴爾蒲

意大利·巴爾蒲 (Italo Balbo) 以發明用痺麻油來對付非法西斯的反對分子而著名。他「從第一個鐘頭起，即為法西斯主義者」並且一度做過墨索里尼的「右手」，但迄一九三七年，仍舊流亡在北非意屬殖民地 利比亞，做着該地的總督。他在阿比西尼亞戰役內並未參加。據說他像參謀本部一樣，在開始時會極力反對阿。一九三三年六月，當他從羅馬領導一隊飛機橫斷大西洋，作不着陸飛行參加芝加哥百軍進步博覽會成功回國後，便被束之於利比亞的高閣。現在他的名字在意大利的報紙上最多一個月提到一次。

據說墨索里尼放逐巴爾蒲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那壯觀的飛行功績使他過於出風頭了。不過另一個原因顯然是他和皇太子恩倍爾多 (Umberto) 親近太甚的緣故。一九三二——三三年間恩倍爾多曾有反法西斯的傾向；於是墨索里尼便恨恨地變更了軍中的誓詞，刪去對「皇位繼承者」效忠的一段。據說墨索里尼的嬖人奧斯太公爵 (Duke of Aosta) 也許會代皇太子的嗣位。巴爾蒲本來是恩倍爾多派。現在，大部份消息靈通的人士相信，意皇已勸恩倍爾多去注意他的愚行。可是巴爾蒲卻仍舊跟恩倍爾多過往甚密；隔不多久他便會從利比亞飛到這位太子住的地方拿泊爾 (Naples) 來，並且堂堂皇皇在皇宮裏住上一兩日。

在法西斯意大利內，巴爾蒲是——即使現在也如此——唯一任性行動的人，雖然得有某種限度。有一次，當

他做航空部長的時候，墨索里尼不批准他的航空預算案；巴爾蒲趕到威尼齊亞宮發現墨索里尼桌子旁原有的椅子已不見了，而他的主人卻仍安然坐在那裏。這個意思就是說巴爾蒲好像小學生一樣，得受一番訓斥，並且得站着講話。但是他立刻坐了下來——坐在墨索里尼的桌子上。

巴爾蒲身材高大，虬鬚滿面，神氣十足，一八九七年生於巴洛那（Bologna）附近的弗拉拉（Ferrara）。他在孩子時就投軍，十幾歲時即得勳章；二十歲創辦一報，曾經參加大農齊與攻飛烏梅之役，並且在一九一九年第一個去投奔墨索里尼。在「牛皮時代」，他就聞名於短棍隊中；他從社會黨手中將拉佛那（Ravenna）奪下，他圖困派買（Parma）曾經一時被黨開除。二十六歲時，他先做法西斯民軍司令，再做國民經濟部次長，最後做航空部長。在飛往芝加哥前，他曾組織並領導同一隊形的飛行隊環繞地中海，飛往奧得賽（Odessa）和巴西（Brazil）。

費納會引巴爾蒲的一段話，從這段話中，可見法西斯先進的意大利，與後進的德國，其口氣之大，如出一轍：

「當我從戰場上回來——正和許多別的人一樣——我憎恨政治和政客，他們降底了意大利的地位，使之忍辱媾和，祇知崇拜英雄，這種人我認為有負軍人願望。誰會為恢復喬利蒂時代的土地，而奮鬥作戰，把每一個理想都兌現？沒有。我們應該否定一切，破壞一切，然後從頭建設一切。」

波諾元帥（Marshal Emilio de Bono），進軍羅馬時代的另一個四軍團長，是侵阿意軍的第一任總司令。他生於一八六六年，比巴爾蒲老一輩，做正式軍官的履歷很長，歐戰時是墨索里尼所屬團部的司令。他因憤於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間意大利的「腐敗」，辭去了凡洛那（Verona）駐軍的司令職，而加入法西斯運動。他

素好研究音樂，第一支黑衫進行曲便是他的作品。他一度做過意屬北非的黎波利 (Tripoli) 的總督，後來又任殖民地大臣。

五 其他戰士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墨索里尼派意大利名將陶立奧元帥 (Marshal Pietro Badoglio) 到阿比西尼亞替任波諾。這次調動有幾個原因。一則波諾不能速戰速決，總算已經完成了他的任務。再則，一旦委派了巴陶立奧，則任波諾之舉便正式正式成爲正規軍隊所幹的，而不再是黑衫隊所幹的事情了。意相巧妙地使巴陶立奧負起責任，務必馬到成功。而巴陶立奧的確幸不辱命，於是他成爲阿比西尼亞的第一任總督和阿狄思亞巴巴 (Addis Ababa, 按即阿京) 的公爵。

巴陶立奧是按部就班升上去的，不過他的軍功確頗顯赫。他生於一八七五年，於一八九〇年即加入砲兵隊。此後意大利每一次戰事他都參加；一八九六年阿杜華一役，意軍被阿軍打得落花流水，他總算是少數生還者之一。他以奮勇而受勳章者達七次之多，大戰之後，歷任上議院議員，巴西大使，參謀總長，軍事參議院院長等職。如果當時意皇同意的話，他很有力量將進軍羅馬的黑衫軍擊敗。大家都相信，當初他曾反對侵阿戰，參謀本部曾作了一個估計此戰成敗的報告書，但是據說在墨索里尼盛怒之下給撕掉了。現在看來，墨索里尼那時是對的，他們是錯的了。

格拉齊亞尼將軍 (General Rudolf Graziani) 在先是意屬東非索謀利蘭 (Somaliland) 部隊總指揮，所以對於非洲情形很熟悉，他曾在埃利厥利 (Eritrea) 按：在紅海沿岸非洲東北部與阿國接壤，任少將職七年，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〇年，任西勒南加 (Sudan) 的「宣撫使」軍事專家都稱他爲意大利的名將。他繼巴陶立奧而爲侵阿意軍最高指揮官。一九三七年，在阿京曾有謀刺他之舉，於是他對阿國土人來了一次大屠殺。德羅齊將軍 (General Attilio Teruzzi) 曾任法西斯民團的參謀部長七年，一九三五年任侵阿黑衫軍司令，現在卻捨軍從政。和波諾一樣，他在大戰後放棄了軍人生涯而來投奔墨索里尼。他身強力壯，有一副黑大鬚子，曾任下議院議員，內政部長，及利比亞總督。

巴奉納將軍 (General Giuseppe Pavone) 是一個正規軍的軍官，對非洲頗有經驗，曾因參加大農齊奧的冒險之舉而被尼蒂 (Nitti) 內閣免職；墨索里尼又復了他的職。拖着流蘇的黑帽子，便是他發明的，這種帽子有點像土耳其式小帽子（紅色而有黑縷——譯者）現在已成爲黑衫制服的一部份。在陶爾斐斯被殺之後，將巴杜亞 (Padua) 師圍開到奧地利邊界去的也是他。巴奉納的父親，一八四八年因愛國之故密謀在拿泊爾造反，企圖推翻波爾旁皇室 (Bourbons) 而被處死刑。他有一個綽號，叫做「黑鬼」 (Diavolo Nero)。征阿之役他率領埃利厥利土著軍從北面進攻阿國。

六 外交人物

亞勞西男爵 (Baron Pompeo Aloisi)，墨索里尼駐日內瓦的代表，把一件棘手的工作，做得很好；當一九三五年十月意阿戰爭急轉直下的時候，他雖然祇是首相的舌人，但他一方面多少得維持自尊心，一方面還得使別國代表信服他。一己所發表的意見，他那兇暴的主人在威尼齊亞宮裏大發皮氣，而他在日內瓦的會議桌上，給人以平心靜氣舉止沉着的印象。墨索里尼常給他難題做，例如禁止人說「侵略」阿國，他必得老着面皮婉轉其辭的把這話講出口來。

亞勞西一八七五年生於羅馬貴族家庭，他出身海軍將校，後來再轉入外交界服務。他的經驗極為豐富；一九一九年時他還在托斯肯尼 (Tuscany) 和愛米里亞 (Emilia) 任意大利分艦隊隊長，嗣即參加巴黎和會議。意大利代表團任情報員。他是一位有豐功偉績的外交家，為墨索里尼所留任下來的少數人中之一；他做過駐哥本海琴 (Copenhagen) 梯拉那 (Tirana) 蒲卻萊司脫 (Bucharest) 安卡拉 (Ankara) 東京等地的大使或公使。他是墨索里尼侵入阿爾巴尼亞 (Albania) 的代理人；在日本時，好事研究的他，還寫了一本論日本美術的書。一九三二年首相派他出席國聯。他以國聯委員會主席的資格，辦理薩爾區域公民投票事宜，成績頗佳。

格蘭地一度做過墨索里尼外交方面的寵兒，但是，英法兩國在開洛桑賠款會議中簽訂了一個協定而把意國除外，因此墨索里尼罰他到倫敦做大使，叫他多學學英國的狡猾手段。據說一九三五年之夏，墨索里尼對格蘭地大為憤怒，因為格蘭地沒有預先警告他，英國會領了頭來制裁意國。不過蒙在鼓裏的不祇是格蘭地一人，有許多人都被隱瞞過了。格蘭地一度做過分艦隊的隊長，他一向過着渾渾噩噩的日子。他和熱諾亞的蘇利買 (Sulimani)。

(rime) 打撈公司會有關係；該公司從大戰時被德國潛艇擊沉的「埃及」號中撈起了許多金塊，這是近代海洋打撈史上一件最驚人的事。他爲人極瀟灑可愛，大概可算英國聖詹姆士宮 (Court of St. James) 中一位最孚人望的大使了。

前任外交部次長蘇維契 (Fulvio Suvich) 以衣服豪華出名，他生於厥利司得 (Trieste)。當時該地尚屬於奧地利。大戰發生後，他從奧國越過防線到達意大利軍隊內。現在他對於意大利的外交政策，並沒有決定的權力；一九三六年他被任爲駐美大使。

七 幾個笑話

孟卻斯脫導報最近會說：「有許多人相信獨裁者都是鐵骨厚皮的；這因爲他們是世界上最爲神經過敏的傢伙……祇有民主國家的領袖才是優柔寡斷的。他們肯忍受批判，或者把善意接受，或者一起置諸不理。獨裁者可並不如此；一句不客氣的話，或一句即使是好意的諷刺，便會惹出大禍來，獨裁一怒，全國震顛。」

蘇聯的笑話，多半關於五年計劃的嚴格；德國的笑話，多半關於國社黨的恐怖手段；意國的笑話可很有意思——除了國際間搆統諷及一切獨裁者的笑話外——多半關於政治的腐化。墨索里尼本身，在理財的廉潔上倒是無可非議的；但在意大利被壓制的笑話，如果一旦任其放棄時，則下級法西斯黨員對於小領袖與次領袖的廉潔就會流露其懷疑。所有最優的缺份，當然都爲高級黨員一手包辦；因此便產生了大批的笑話。

意大利的笑話多半跟了「Mangiare」一字而來，這個字有兩種意義：一指「吃飯」，一指「攔騙」。

例如，墨索里尼的小兒子羅馬諾在用餐時間首相道：「爸爸，要怎樣才能做到像你這樣的大人物？」墨索里尼答道：「多吃飯，少開口。」

在動物之中，象最能像法西斯主義，因為牠先行一個法西斯敬禮，然後再開始吃。每一輛火車頭上都放上法西斯的徽章，因為火車頭「吞吃」鐵路。維蘇威火山最近得了一個榮銜，因為它張開着嘴——等吃。旅客如問警察：「本鎮那個地方可以吃到最好的東西？」回答是：「黨部。」

還有一個故事如下。法西斯老黨員開會時，有人喊道：「意大利屬誰？」羣衆：「勝利屬誰？」羣衆：「屬我們！」「首領屬誰？」羣衆：「屬我們！」於是另一聲音插進來：「勞動屬誰？」到這裏羣衆面面相覷，於是便開始唱法西斯黨歌（*Giovinezza*）。

在意大利沒有一條路名，以墨索里尼命名，因為意文「路」（Via）這一個字的意義不僅是街道，並且也是指「滾蛋」。

第十五章 意阿之戰

「我們的未來是在東方與南方，亞洲與非洲。」

——墨索里尼。

「政治家祇在犯了過失的時候才談命運。」

「如果不是爲了近視眼呀，我們能夠看見阿比西尼亞。」

——墨索里尼。

一 背景分析

一九三五年十月，阿比西尼亞戰事爆發。冷血的墨索里尼——祇有意大利人才會冷血的——挺身而出，破壞了他誓必擁護的條約，掠奪並征服了一個他答應保護的國家。

多年來他威脅着要向東進展。所以此次長征，沒有一個人引爲驚異。他曾虎視眈眈地望着突尼斯（Tunis）蘇士間的協定阻止數年前他在阿那托力亞（Anatolia，即現在小亞細亞）試探。他需要土地——殖民地——意大利的發展。但是他好虛張聲勢的皮氣，可憐使得西歐老百姓以爲他祇是吹吹牛而已。爲什麼他既蓄意已久，定要選擇一九三五這一年來動手呢？又爲什麼他選中了阿比西尼亞來證明他的行動凶於言語呢？

這裏我們必須要停一下，來說說意大利的基本經濟實情，這種實情與墨索里尼的存在與否是無關的。

意大利有四千二百萬人口，和法國一樣多，但是卻擁擠在祇及法國三分之一的可耕土地之上。人口的增加，

達到了一個驚人的數目，每年生育了四十五萬之多。墨索里尼親口說：「我們極其需要土地，因為我們的生育力很大，並且願意多多生育。」在四千五百萬人民中，絕大多數是從事農業的，全國祇百分之十的人口從事工業，文盲的數目，不下佔百分之二十一。本國根本缺乏原料；它不產樹膠、錫、鎳、雲母或鋼精；依賴國外輸入的棉花達百分之九十九，羊毛百分之八十，煤百分之九十五，礦油百分之九十九，鋼鐵百分之八十，銅百分之九十九。墨索里尼的「節食運動」並無用處，本國所需要食物還是不能自給；必須要輸入百分之十五的肉類，與百分之二十的穀。最後，除了日本以外，意大利的海岸在世界各大國中最易受攻擊。

法西斯黨執政後的頭幾年中，墨索里尼的工作一般說來是試將這個先天不足的國家改造成爲一等強國。他成功了，但是所付的代價是駭人的。賦稅的增加佔全國總收入百分之三十。國際貿易方面入超驚人。預算的短少與年俱增，一九三〇——三一年還不過短一、〇〇〇、〇〇〇鎊，一九三二——三三年短了六、〇〇〇、〇〇〇鎊，一九三三——三四年竟短了一〇七、〇〇〇、〇〇〇鎊，約等於總歲入的百分之二十五。侵阿戰爭開始前，意大利的備戰費已用去二十萬萬里拉，約合三千三百萬鎊。意大利的存金已去了一半；雖則墨索里尼曾發誓要以他「最後一滴血」來維持里拉金本位，但結果還是不得不放棄了。此外，又得加上浩大的戰爭本身耗費。威如克涅克布克 (H. R. Knickerbocker) 與湯布森 (Dorothy Thompson) 所說，在獨裁政治之下，民主國家所適用的經濟法則簡直無法通用，這話現在看起來是很對的。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可以拿錢來變花樣，這在正統派放任政策的資本主義之下是不行的。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治下的經濟問題已變成純粹的政治問題了；

惟一的問題是人民能夠熬受這種由獨裁操縱的殘忍壓迫有多久。雖然如此，一九三四年冬與一九三五年春的意大利內政情形已變成不得不把目光轉移向外，這是獨裁者們的慣技。墨索里尼不應該作戰的原因正是他要作戰的原因。「這不是他能否作戰的問題，而是他能否不戰的問題。」

然而作者並不認為墨索里尼（他像希特勒一樣對經濟是不大有興趣的）之出於一戰是完全由於經濟因素。他們兢兢業業所要解決者大半在於政治的國家主義。（國家主義當然一半就是經濟現象。）墨索里尼並不是把國家或邊疆當作解除經濟壓力的主要方法的人。他心裏是要直接劫取土地，借此以表示他的政治聲望。我們切不可忘記了倫敦的密約，是引誘意大利撕毀了三國同盟而參加了協約國方面作戰的。根據了這密約意大利原可以分贓分得比她後來實得更多。

從全體而論，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是失敗了。他所處的地位很矛盾；意大利雖為戰勝國，同樣地要修改條約。法國把他踢出於突尼斯之外；他侵入阿爾巴尼亞，是種既費錢而又不生利的試驗；他那四強公約，原想以類似主張修改條約者的立場而組成一種二十世紀的神聖同盟，卻未曾產下已經夭折；在阿剌伯戰爭中他攻打錯了一方面；他力使巴爾幹保持其氣勢，但是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土耳其，希臘聯合起來反對他，簽訂了巴爾幹公約將他擊敗；不過他的權勢總算伸展到奧匈。

不過單單政治也不足以引起戰爭。法西斯的高潮已很緊張。像所有的獨裁者一樣，墨索里尼也是一「貪名的人」。他必須要不斷的幹點事業。希特勒已在全世界報紙的標題上偷去了他許多地位。他的為人，根本是一個戰

士與帝國主義者；他稱「帝國主義」是人生永久不變的鐵律。墨索里尼是絕頂聰明的人，他明知每一理性的或客觀的理由在告訴他，阿比西尼亞戰爭是一樁艱難而冒險的生意。由於海岸線易受攻擊，地中海為英艦控制，意大利命中注定要永久依賴大不列顛，這在歐洲政治上久已成了不辯自明的真理。墨索里尼卻嗤笑這個真理。這真是政界中一位大人物，或者可說一位誇大狂者的有趣實例。地質學家關於阿比西尼亞的悲觀報告不會驚倒首相。他只知道他主要的收穫——光榮。

二 「戰爭之美」

墨索里尼自己對於戰爭固然會得眉飛色舞，但這裏，我們不妨順便引用一下意大利名預言家馬里納梯（F. T. Marinetti）的宣言，那篇宣言的題目，叫做「戰爭自有她的美」。

- (一) 因為戰爭含有力與仁。力而無仁則趨暴，仁而無力則趨懦，故必兩者合一然後產生「團結與寬宏」。
- (二) 因為戰爭給予機械化的人，即配備防毒面具，揚聲器，燒夷彈，擲射器，坦克車等的人，以至尊的保證。
- (三) 因為戰爭開始了夢想已久的人類「金屬化時代」。
- (四) 因為戰爭以機關槍的「蘭花」來完成了一片原野的美。
- (五) 因為當步槍聲與重砲聲的音樂一停止，就可以聽到兵士的歌聲，嗅到烟火氣與腐屍臭。
- (六) 因為戰爭以受了靈感的砲火改造了塵世美景。

(七) 因為戰爭創造了新的建築術，例如重坦克車。

(八) 因為戰爭的暴力，超過了神魔之鬪。

(九) 因為戰爭以精練合時的英雄主義根治了人類所有個人的恐懼心，與羣衆的驚慌心。

(十) 因為戰爭回復了男性的青春，使女性人更其需要。

(十一) 戰爭自有她的美：因為戰爭「足以助成大法西斯意大利的擴大」。

——孟卻斯脫導報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另一個因素，即所謂國家的「光榮」這個空虛而浮泛的概念。我們已經知道，幫着希特勒在德國握權的也是這個因素。意大利人受有兩次奇恥大辱，這兩次恥辱是他們永不能忘的，不獨墨索里尼一人已也，那就是一八九六年阿杜華之役，被阿比西尼亞人殺得落花流水，和世界大戰時凱泊利多 (Capeort) 之役，被德奧聯軍殺得片甲不留，其慘爲大戰中歐洲大國所未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樣是在滿雪前恥，好像坐在血盆邊上來恢復意大利的尊嚴。

三 戰端的近因

墨索里尼究竟爲什麼選中了阿比西尼亞呢？最簡單的理由是意大利出世太遲，趕不上參加各帝國主義列強摘取殖民地的果實，而唯一摘剩下來的祇有阿比西尼亞了。那末英法怎麼會沒有沾染阿比西尼亞呢？因為歐

洲人移殖到那裏的費用太大，那裏資源豐富與否還是一個疑問，況且尤爲重要的是土民慍悍，武力難以征服。又他們對意大利人積極經營的厭惡，更使人相信阿人不是溫良柔馴的民族。

至於移殖的困難則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新共和國雜誌」(New Republic)中一文，頗足說明，茲摘錄於下：

「一個意大利的移民要想到阿比西尼亞去從事耕種，他必須將全副用具帶去，連建造房子的材料也不能缺。除非要政府重重津貼每一個移民，否則意大利不能把阿國來當作他人口過剩的出路。歷四十年之久，意大利試盡方法想在埃利厥利殖民，這塊高原和阿國是很相像的。埃利厥利目下的白種人僅只四、五六五名，而且大半是政府官吏……」

「還有一個殖民阿國的障礙——阿國土人約有一千萬，許多土人已進化爲技術熟練的工人，這在兩家已成立的比利時咖啡農場上就可以證明……在全非洲白人想依靠自己勞働來耕作是永不會成功的，還不如土人在白人管理之下勞働來得好。一個意大利的人民到阿國不是過當地的土人生活，便是餓死。

「想把阿國做原料的給養地，意大利一定要逢到地理上的阻難……勇敢的白人們曾在阿國經過多年的探尋，並且想在他們理想中的發現上投資。但至今還沒有有人作過足以使人信任而肯爲後盾的確實報告……」

不過阿比西尼亞地理上的障礙卻也阻止不了帝國主義國家照常的侵略行動，遠在一八九一年與一八九四年英意兩國就在阿比西尼亞劃定了他們的「勢力範圍」了；意國所得的「範圍」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但英

國的「範圍」內卻包括了察那湖 (Lake Tana) 流域，由此流出了灌溉蘇丹埃及兩國土地的藍尼羅 (Blue Nile) 水源。一九〇六年，雖則阿國的獨立是為意大利所承認的，但一張三國條約 (Tripartite Agreement) 正式把阿國瓜分成英法意三國的「範圍」；這是帝國主義國家典型的戰前條約。阿比西尼亞雖然極力對此抗議，但是沒有人去理會她。

一九一五年的倫敦密約，前面曾經提到，規定說「英法兩國若在非洲增加殖民地而排斥德國，則兩國在原則上贊同意國若干公平補償要求，尤其關於埃利厥利、索謀利蘭、及利比亞三意屬殖民地邊疆問題給予有利意國之解決。」

阿比西尼亞於一九二三年由法意提攜之下加入了國聯。意大利爲了想牽制英國侵佔阿國，所以特別切望阿國做國聯會員。豈知墨索里尼卻是搬了石頭壓自己的腳面。凡是想做了圈套要英國來攢的人，結果終是自己攢了進去。阿比西尼亞要不是國聯會員，英國也不能煽動世界的輿論來作難意大利。

一九二五年，奧斯頓張伯倫 (Sir Austen Chamberlain) 曾與墨索里尼商訂一個條約，確定彼此在阿國的勢力範圍。墨索里尼在一九三五年九月間提到這個條約時，憤憤地說：「你們得明白我，這個條約所分割的祇是一個實際上早已四分五裂的阿比西尼亞而已。」當時英國想在察那湖附近築一道水閘，爲了要換得意大利的承認與贊助，他們答應「承認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西部的經濟專有權，並且擁護意大利通過阿境，建築一條從埃利厥利索謀利蘭的鐵路計劃」。但阿國自一九二五年起已是國聯的會員，而且阿皇海萊撒拉西埃 (Haile

Solano。其時是攝政王，反對甚力，這條約終於祇得作廢了。

一九二八年意大利與阿比西尼亞簽訂了一個「親善、修好、和解」條約。在該約第二條中，二國擔保「不得採取任何威脅對方之獨立的行動。」這樣過了七年，一直到墨索里尼現在動手為止。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在瓦爾瓦爾 (Valvarai) 所發生的事端，意大利稱之「邊疆」衝突；其實，即使在意大利地圖上（後經匆匆改變），瓦爾瓦爾也要離開意屬索謀里蘭邊境有一百英里，而深入阿國領土的內地。當英阿對疆聯席委員會發見了瓦爾瓦爾有意圖軍隊駐紮在那裏時，戰爭便行開始。當時英人悄悄退卻，阿人卻上前接戰。意大利兵死掉三十二個，阿比西尼亞人死掉一百十個。這也許就是墨索里尼所等着的藉口；一張威炎逼人的最後通牒和以前對考夫島的態度一樣，下給了亞狄斯阿巴巴；意相——這是十足地「戰前」式的——要求阿人謝罪向意大利致敬，並付賠款二萬鎊。

此後的事是衆所週知的，不列顛帝國也開始動員了。

四 一鼻孔出氣

墨索里尼當初必定料到英國不會反對他的冒險。否則意相是否肯動手就成疑問了。不過他終怪英國給他上了一個大當。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他派格蘭第到英國外交部「邀請英國政府特別考慮兩國協定，以便調整英意在阿利益。」他說他願意立即開始談判。英國的答覆卻含糊其詞。英國外交部顯然不贊成意相這提議；

但在另一方面卻好像也沒有給他一個確實反對的警告。

當英國表明立場開始反對他，並借國聯之力加以壓迫時，墨索里尼不禁大發雷霆，大肆咆哮。當時五國小組委員會提議若干土地畀與意國，以圖息爭，他對一位訪員怒吼說：「我可不是一個荒漠蒐集家。」（他告訴每日郵報訪員潑拉司（Ward Price）說：「我不久以前，剛從法國得來十一萬方英里的撒哈拉沙漠，你知道在那塊荒僻地方有多少人口六十二人！」）他聲稱如果國聯實行制裁意大利，他就「立即」退出國聯；但他並沒有真的立即退出。艾登、賴伐爾、亞勞西三人在巴黎開會時，他在國內駕着一尊榴彈礮車大聲疾呼地鼓舞黑衫黨員說，不管有國聯或沒有國聯或與國聯意見相左。」總之，在任何情形下他仍要繼續前進。當時英國外相霍爾（Samuel Hoare）在國聯會議前作了一篇有歷史性的演講，聲言英國遵守條約，主張「集體維持國聯盟約的完整，特別對於一切無故侵略行動與以堅決的集體抵抗。」

墨索里尼對此的答覆有兩方面：他先進行戰事，於十月三日開始侵阿。難得他的巧辯，他說海萊撒拉西埃才是侵略者，巴德萊（Vernon Bartlett）諷刺得好，撒拉西埃在「命令自己的軍隊從自己的領土內撤退時，他就犯下了挑戰的行爲了。」另一方面，墨索里尼亂七八糟發表了許多聲明與談話，其語調真是沉痛之至。

他對晨報（Morning Post）記者說：「我們已經開始進軍，現在要我們中止是太遲了——請看看葡萄牙、比利時和荷蘭。他們都有物產豐富的殖民地，當然意大利也得有物產豐富的殖民地啊！我們只要一有這種殖民地時，我們就會變得像一切有殖民地列強一樣地保守了……他又對紐約日報（New York Sun）訴苦：「爲

什麼你們自己在必要時做的事，我們做了就要定罪呢？當利害有關你們時，你們絕不會躊躇於戰爭的，諸想想墨西哥和古巴，還有你們本國內的南北戰爭吧！美國是怎樣廢止奴隸的？」他在一次演講裏道，「命運之輪向着一個目標轉，那旋律越來越快，是阻止不了的。世界正以最黑暗的不公平手段來對意大利人，甚至拒絕他們在陽光下佔一席之地。除非事實證明，我絕不相信英國人民會爲了保衛一個不能側身文明人羣中的野蠻國家而願意流血，而使歐洲陷入慘禍之中。」

他把英國恨入骨髓。英國，毋庸他指出來，自己佔去了約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統治着四萬五千萬人口的帝國（其中三萬八千四百萬的人民是有色人種），卻來阻撓他這一件小小的事業。這不過是一件英國自身會千百次幹過的殖民地事業而已。但是，不列顛帝國是在戰前造成的，國聯盟約對劫奪新殖民地已換了一副面目，這些現在和他講也沒用。英國自己也會在南非從事過蒲爾戰爭（Boer War）；英國壓迫着印度三萬二千萬人民；英國沒有止日本侵佔中國的滿洲。因此墨索里尼就不勝憤憤了。

除了墨索里尼以外，別人也的確能將英帝國主義的行爲開一張單子出來。

從一七八八年起到一九二五年爲止，英國爲了開放通印度的道路，據估計打了約計大小二十次仗。（當然，英國不是唯一實行帝國主義政策的國家。同時間內美國得到了德士与州——Texas；按前屬墨西哥——巴拿馬運河，菲列濱等。）英國人在尼羅河上，在厥拉法爾加海岬（Trafalgar），在阿波基（Aboukir），以及間接在哥本海琴與拿破崙作戰，對這些地方濫施蹂躪。英國在埃及和密謀併吞亞丁（Aden），侵佔阿比西尼亞，深入波斯，

和在克里米亞戰爭 (Crimean War) 中幫助土耳其人打俄國。英國攔得西蒲拉斯島 (Cyprus) 擴充埃及管理權，進攻蘇丹，並且參加大戰阻止德國人的稱霸全球。

十月間法國右派的機關報 Gringoire 會發表了「英國會不會變成奴隸」一文。該文惡意的挖苦，還會引起了一件小小的外交交涉，使賴伐爾不得不向英大使道歉了事。該報咕囔道：「英國的政策要使世界擾攘不安，這樣才能保得住他的海上霸權……我認爲英國的友誼乃是上帝所賜給人民的最殘酷之禮物，當我看到英國一手執聖經，一手執國聯盟約，既贊助弱國又擁護正義，我不禁相信她自有她的道理……我曾看到英國警察在開羅 (Cairo) 街上鞭打埃及學生，我曾看見考克 (Cork) 市長死於倫敦獄中，我曾看見被勞合喬治扮成兵士模樣的劊子手，將巴爾勃利根 (Balbriggan) 的義士在他們草屋門口擊死……難道把通印度的航路屬於英國，是爲人類謀幸福所必不可少的嗎？」

最近新導報 (New Leader) 上刊印了一張英政府於一八七〇年以來所得「獨立領土」的名單：

俾路文 (Baluchistan)。緬甸 (Burma)。西蒲拉斯島 (Cyprus)。威海衛 (Wei-hai-wei)。香港 (Hong-Kong)。考維脫 (Koweit)。西奈 (Sinai)。北畿尼亞 (North Guinea)。南畿尼亞 (South Guinea)。東畿內亞 (East Guinea)。沙羅門島 (Solomon Island)。東布島 (Tonga Island)。蘇丹 (Sudan)。烏干達 (Uganda)。英領東非 (British East Africa)。英屬索謀里蘭 (British Somaliland)。善什巴爾 (Zanzibar)。德蘭斯瓦 (Transvaal)。鄂蘭吉自由邦 (Orange Free State)。羅德西亞 (Rhodesia)。英領中非 (British

Central Africa) 尼日利亞 (Nigeria)。

此外一九一九年的和平條約所產生的國際聯盟委任統治地，又在實際上擴大了不列顛帝國的領土。計開巴力斯坦 (Palestine)，外約旦 (Transjordan)，坦噶尼加 (Tanganyika)，土哥 (Togo)，喀麥隆 (Cameroons)，西南非 (South-West Africa)。顯然的，英國自己也在覺得她的領土似乎太多了一點。無怪意大利人對霍爾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國聯大會演講內的暗示說殖民地原料分配不公平，要表示深切的懷疑了。

五 經濟制裁

截至一九三五年多事之夏爲止，英國對於違反國聯盟約的意大利，是否將實施制裁，始終未有明確的主張。在開頭，英政府並沒有採取防止戰事發生的有效辦法。和平呼聲 (Inquest on Peace) 的隱名作者寫道：「她誠心願意獅子羔羊躺在一起。至於羔羊究竟應該橫在獅子的外邊或是裏邊，這問題還有點模糊。」一旦墨索里尼的行止已達不易轉篷的地步，派遣十萬大軍入阿境時，英國的政策才始尖銳化起來。一方面海軍部把地中海塞滿了兵艦，一方面艾登在日內瓦堆動着對意經濟制裁。這樣一來，大家都說英國要和意國反臉了。這種猜測還未免太唐突了一點。事實上英國正在爲她不得已而下的決心煩惱着。她那基於兩個否定的政策是矛盾的。她不願戰爭，同時又不願永和墨索里尼對立。一方面英國不喜歡因侵阿戰爭而破壞世界和平；另一方面她又願墨索里尼退出國聯而投入希特勒懷中，以致破壞了集體安全制。

德國一向是英國歐洲外交政策中的問題中心。所以祇有明瞭德國的真意如何，才能妥善地解決對意實施制裁或否的問題。人們可以贊成制裁的實施，也可以反對制裁的實施；贊成的理由是國聯盟約必須絕對尊重，與墨索里尼的侵阿必須澈底阻止，這樣才可以給希特勒一個警戒，使他日後不敢破壞和平；反對的理由是，制裁會削弱意大利的勢力，動搖中歐局勢，而坐令德國得一擴大勢力和從中漁利的機會。

還有一個問題即是，英國如果不預備惹起一個比意阿之戰較大的戰爭，則是否能阻止墨索里尼的行動。關於這一點，英國內閣的意見並不一致。英國反意的初步決定，是墨索里尼自己惹出來的，因為他迅速調遣意軍入利比亞，並且擺出要覬覦馬爾太島和埃及的陣勢。直到至少有幾師意兵開入利比亞和西朗奈卡（Cyrenaica）境之後——此舉與實際侵阿並無關係——英繼才始集中在地中海。

臨時施用制裁政策的理由大概有下舉數點：

第一，上面已然提過，阿比西尼亞的危機對國聯機構之有效與否是最後一次試驗。問題很明白：國聯究竟行使其職權呢，抑或失卻其應有的機能。日本因滿洲問題已背棄了國聯，此次對墨索里尼，國聯更應極力維持盟約的尊嚴。在離歐洲尚遠的亞洲，已經未加以任何處罰而發生了違背盟約的事件。阿比西尼亞——在非洲——離歐洲更近。假如讓意大利得手於阿比西尼亞，那末歐洲勢將不斷發生侵略行動。所以對意制裁亦即日後對德制裁的先聲。

第二，英國的各自治領都極力贊成對意制裁的實施。她們自威士敏士達議定書（Statute of Westminster—

成立以後，都有脫離不列顛帝國的權利，而只以英皇爲唯一的聯繫。日內瓦於一九三五年九月間充滿着理想主義的空氣，而南非佔了其中一大部份。英政府適應時變，小心謹慎的政治家，知道國聯可以成爲一個鞏固帝國勢力的機關，其價值實無法計算。

第三，英國的自由主義者，恨極法西斯主義，他們主張站在政治道德的立場上，應該打倒墨索里尼（聖保羅教堂總監英治 Dean Inge 曾對泰晤士報表示他的權意。他說：「我想所有國聯的同志都應該謹防他們在不覺間與社會主義結交。社會主義者絲毫不關心阿國或者國聯，他們祇想借意大利來搗亂我們，因爲他們對法西斯主義又怕又恨。假如俄國攻打阿富汗，他們將唱出又一種論調了。」）

第四，在辭西爾勳爵（Lord Cecil）有力的領導之下，英國國聯同志會曾於六月間舉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和平投票」。投票者共計一千一百五十萬人，而其中一千零八萬八千人贊成對侵略者施予經濟和非軍事的制裁，如有軍事制裁的必要，還有六百七十四萬八千人願意切實贊助。英國現在普選選民的平均總數也不過二千萬，政府當然不肯忽略過半數選民的意見。「和平投票」的結果，一方面大大地加強了內閣中像艾登一派贊成制裁的開員的勢力，一方面打擊嫌惡國聯的那一派。

第五，在議會中正式處於反對黨地位的工黨，完全贊成制裁政策。

第六，誠如英大將司墨茲（General Smuts）所說，阿比西尼亞戰爭在非洲與別處英國殖民地中，恐怕會目爲黑人與白人之戰，這對英國是大爲不利的。

第七，英國的利益就如前述的變成太錯綜複雜了。理想主義與所謂「骨氣」，在英國整個外交政策中是相當重要的，但僅僅理想主義也不足以決定英國對意的態度。理想主義，加上埃及、紅海和印度的利益，才使英國反對意國。此次鬭爭是已經飽餐了的舊帝國主義和猶未嘗新的新帝國主義之鬭爭。一旦墨索里尼將大軍集中在埃及附近，英國便直跳起來。（日內瓦盛傳「S. d. N.」——*Société des Nations* 國際聯盟——是「Source du Nil」尼羅河之源。」霍爾——直至他下台為止——是現代最幸運的外交部長；他能把理想主義和帝國主義貼切的配合在他的政策裏面。不但上帝站在他一旁，連英國的自治殖民地也做他的後盾。

六 英法兩外交家的妙計

但制裁的實施，進行得很慢又無誠意。在禁運項目中汽油並不包括在內，英國有幾家公司，且以汽油供給齊亞諾伯爵的飛機。而英國或國聯始終就未曾想到過施行軍事制裁——或封鎖蘇彝士運河。但事實雖然這樣，英國十一月的普選還是以和平與制裁問題為號召，政府因其擁護國聯的態度，獲得了空前的勝利。因此，當十二月間霍爾賴伐爾妙計（Hoare Laval Plan）的消息透露出來時，輿論界真是大為驚愕了。

這條妙計的經過內幕好像是這樣的：英法兩國外交部的專家費了好幾個星期想研究一個中止戰事的好辦法出來。十二月八日，星期日，霍爾赴巴黎與賴伐爾匆匆晤談數小時後，於是說因急需休養，便上瑞士去度滑冰假日。隨後英法聯合發表了一篇聲明，謹慎地表示事情的討論已有眉目。該聲明宣稱：「發表辦法已無問題」。接



威林登 (Wellington) 及 霍爾

着照例有人在巴黎將消息透露出來。於是英國星期一的報紙滿載着些多少可靠的報道，說意大利可以分得一大部份阿比西尼亞的領土以作停戰的賄賂。

霍爾賴伐爾聯合聲明書的原文說得很明白，原來英內閣對於上述辦法，並未批准。於是內閣就必須立即設法補救。技巧倫敦海軍會議在這一天的早上——十二月九日，星期一——舉行開幕典禮。作者記得當時每一個人對鮑爾溫所致開幕詞的特別簡短，與他說因有要事不得不立即退席的歉意，表示如何驚異。雖然到底有什麼要事，知道的人很少，但事情必定是很急要的。原來當時內閣因為迫於巴黎已經漏出了消息，與其時輿論越來越激昂的情勢，必得立刻決定到底還是採用霍爾賴伐爾的妙計呢，還是否認霍爾的主張。結果它決定採納這條妙計。那時傳聞在內閣會議室中因為沒有地圖，所以那輩閣員連究竟分多少阿比西尼亞的土地給意大利也莫名其妙，就此匆匆加以通過了。

第二天鮑爾溫在下議院作了一篇驚人的演說，這時妙計的詳情已逐漸披露了出來。鮑爾溫自稱他的「嘴唇是封沒了的」，不過事情一過去，他能夠使情形如此：「沒有一個人會去運動議員來反對我們」。這個新奇的觀察自然引起了許多人的好奇。霍爾自身仍舊不在倫敦。到了十三日這天，英法的提案終於公佈了。公佈的提案比主張制裁者所預料到的更壞。十四日這天大家才知道霍爾已經致電駐阿英公使，叫他「用全力」敦促阿皇對此提案「慎重地好好的考慮一下」。

全國發生了暴風雨，整個英國在困惑、憤怒、驚惶之中奮起了。艾登感到難以對他的朋友解釋英法兩國政府

怎樣——終於——把阿比西尼亞推落水中。經常擁護政府的泰晤士報與每日電訊，這時也開始遊移起來。要人們一個個上唐寧街十號來責問鮑爾溫，並告訴他這慶幹簡直是不行。甚至保守黨也提出抗議。霍爾於是始從瑞士回來。這事總得要有一個人出來受過，否則政府本身便得傾覆。正像一件拋入大海的血祭品一樣，霍爾終於辭職了。而妙計也就此掩埋了起來。

十二月十九日霍爾向下議院演講時，不能把真相全部講出來，不過他以嚴肅動人的話，辯護了一下他的政策。許多人認為辭職的應該是鮑爾溫，而不是他的外交部長。因為授意霍爾與賴伐爾談判和明明批准那個計劃的正是整個的內閣。鮑爾溫對於這一點，始終未把他的嘴唇「啓封」。他的意思究竟如何，他未作一句聲辯。從此以後卡通畫家羅大衛 (David Low) 給他作諷刺話時，便在他嘴上加了一張膏藥。還有一位著名諷刺畫家給鮑爾溫背後畫上一具國聯的屍體，他透過膏藥喃喃地說：「你們知道你們可以信託我」。

六個月之後，空氣漸趨冷淡，說明亦來得容易些了。鮑爾溫心中很有把握，他料得到對意制裁特別是禁止汽油出口，大有觸怒墨索里尼之虞，因而乘勝攻擊英艦。英國唯一的企圖，不過是防止再來一次歐洲的大戰。但此外還有幾種看法。某一派英國人目擊當時墨索里尼對於戰事很不得手，他們以為一旦他若失敗，他在意大利就要崩潰，因此會得動搖整個歐洲的機構。另一種看法適得其反：那班消息靈通的人相信墨索里尼對於此次戰事並未失手，而反得手，所以趁他未將阿比西尼亞全部吞下以前，還是先賄以一小塊土地為妙。

如果英國沒有放棄她那條妙計之前，墨索里尼倒已經答應了這個提議，那麼這將成為怎樣一個怪局面呀！

七 閉幕

一九三六年初，墨索里尼仍爲制裁問題而煩惱，他決定將這次殖民地戰爭變成一次真正的大戰，他派遣近五十萬大軍入非洲，並且還施用毒氣，這樣當然不久可以得到一個結果。可是意軍進軍的神速與猛烈，竟出於所有軍事專家的意料之外。他們沒有料到阿軍的軍備與指揮會有這樣壞，也不會料到機械化部隊，即使在困難的地形上作游擊戰，也會如此有利。巴陶立奧元帥的總攻擊，真是機械化部隊作戰史上一篇大傑作。意軍在短促得難以置信的九日之內從哥拉姆（Gorham）前進了一百二十英里，隨即於四月十五日佔領了台西（Dessie）。五月五日他們已到達阿狄恩亞巴巴了。於是阿皇隨即出奔。

希特勒在萊茵河的勝利，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亞的勝利，和西班牙戰爭，都不外是一棵毒樹上的枝而已。他們固然有資格證明爲「凱旋」，但是他們的勝利，只是代表速戰速決的法西斯主義，對行動遲鈍勢力分散的民主主義的暫時勝利，正如當初希望實施制裁的人所預料到的一樣。自墨索里尼得勝之後，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各地就越來越猖獗了。格萊塞（Grosset）在但澤市，弗朗哥在西班牙就在實踐他們的主義。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有一天總會因奧國問題而衝突起來，但在目前他們卻一鼻孔出氣。（按德國終於併吞奧國了，但墨索里尼卻不但不會反對，並且還拍電致賀呢。）今日歐洲所進行的鬭爭，是一方面法律與公理，一方面拳頭與機關槍的鬭爭。也是尊重國際義務與但求本國利益的鬭爭。冒險家們已打勝了二次重要的小戰。但是最後勝利恐將屬於民主主義。

* * * * *

墨索里尼這位聰明而有勢力的投機者，已將意大利安放到新的軌道上。但是意大利的前途正和德國的前途一樣，將視不列顛帝國而定。法西斯國家殘忍少壯的氣勢，遲早會與英國老成持重的態度相抵觸。

第十六章 英國的統治階級

「英國非爲一人所能救。」

——英名相畢德 (William Pitt)

一 摸不着邊際的國家

英國永遠是個令人摸不着邊際的國家。她是世界上最鞏固的君主國，最堅強的寡頭國，又是最自由的民主國。世界大戰以後，唯一遺留下來的帝國也只有她。她又是一個鄉間別墅所統治的島，基礎建築在煤礦之上；雖然歷盡無限憂患，依然興盛繁榮。全國的財富，有百分之六四，握在百分之二的業主手裏。這批人構成了一個兔起鶻落、頭撲不破的統治階級或身份，這種現象，在今日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英國之所以成爲這樣一個國家，多半由地理因素所造成；她的後台靠着地主或全世界市場的商業；她篤信良心和宗教；她把下議院和上議院當做俱樂部；她信仰言論自由和民主政治；她採納民意；她以海軍、英蘭銀行、文官制度做中流砥柱；她在公立學校和鄉間別墅中過着政治生活；她的帝國是她最大的誇耀。

統治階級所吸收的全國收入和經濟權是絕對不平均的。例如以倫敦的地產而論：某貴族在西城佔有二百

七十英畝地產，而在倫敦八百萬居民中，有地產的只有四萬人，其中價值最高的地產只是握在二十個人手裏（見陶爾頓：「英國實用社會主義」(Hugh Dalton, *Practical Socialism for Britain*, 第一五一頁)英國每年收入在二千鎊(美金一萬元)以上者約有十萬人，要佔全國收入的百分之一六，而每年工資在二百五十鎊(美金一、二五〇元)以下者有一千八百萬人，只佔全國收入百分之五六。在這些英國人之中，死後遺產價值一百鎊(美金五百元)以上者，四人之中只有一個。

英國的財富，巨額集中於下議員的手裏；據「星期快報」(Sunday Express)某作者說，一九三四年下議院裏一七〇個議員，擔任着六五〇個公司董事的職務。某議員一人而兼三十四個董事職。最近「新政治家雜誌」(New Statesman)發表了一個上議院議員的統計：在七二九名上議員之中，二四六人是地主，一一二人是保險公司董事，七四人是金融投資家，六七人是銀行家，六四人經營鐵道公司，四九人經營造船或其他工程。最有趣的是在七二九名上議員中，三七一人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一年一向未曾在辯論時發表過一言，一一一人一向未曾參加過表決；平均每次參加表決的，只有八三人。

在英國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上，最重要的基本事實是地理。英國是一個島國。誠如小學生所下的著名定義：島者，即全由英國海軍包圍的一片陸地也。英國人原是一個混合的種族，其構成分子有英格蘭人(Angles)、撒克遜人(Saxons)、猶特人(Jutes)、羅馬人(Romans)、北曼人(Normans)、條頓人(Teutons)、塞爾特人(Celts)，他們都是在比較孤立的環境之中發展和結合起來的。自伊麗沙白女皇(Elizabeth)以來，他們便未

曾受外族的侵略，而只侵略他族。所以他們的島國遺傳性，賜予他們一種遠大的目光，因為歷代以來，他們老是注目於海外。在這個帝國種族之中，地理產生了一種固執的地方色彩。二三年前一個冬季裏，颶風完全切斷了英吉利海峽的交通。於是報紙上不禁盛傳英國成爲一個「孤島」了。

事實上氣候是個重要的政治因素，這在他國也是如此。例如在奧國，人民的許多怪僻特性，便是多半受着軟懶無力的「薰風」的影響。類似地，在英國，重霧和潮濕鑄成了國民的骨格。從某種觀點看起來，英國的天氣可稱全世界最好的，因為你在一年四季中，幾乎每天可以打高爾夫球；雖然你會濕透衣服，但你可以打球。英國人差不多一生下來便未雨綢繆；及至成人，他已養成了事先準備的習慣，不獨僅在天氣方面。所以不列顛帝國是地理和氣象因素所造成的必然產物；凡在倫敦度過過冬的人，都可知道帝國的建造者爲什麼要追求太陽。（心裏學家就可以說國民積蓄財富的本能，大概與陰黯天的概念有聯帶關係。）

英國所需要的糧食，本部只生產五分之三；英國行銷於世界市場的製造品，本部只生產百分之二〇的原料。但她卻富於煤鐵的蘊藏。當然她是歐洲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她所生產的財富有這樣多，甚至百分之四〇的商業是出口貿易。她供給於世界者，不僅是些鋼鐵、皮鞋、布襯衫、火車頭、括鬚刀、和控架橋，而且還有航業、保險、和金融。英國個人的收入，雖然分配不均，但是全國的總收入卻比歐洲任何國家爲大。據柯爾（C. D. H. Cole）統計，英國平均每人的收入爲八七鎊（美金四三五元），而德國只有四六鎊（美金二三〇元），法國只有四三鎊（美金二一五元），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只有二八鎊（美金一四〇元）。

統治階級所得的錢，多半靠賴商業。有些統治階級分子以土地爲生，但商業是主要的國民職業。有人說：「英國人對於商業看得很重。他們一生視爲重要的事便是商業。在英國的場合，上帝與財神是二位一體。財神的胃口，只有誠實爲第一要義這句話才能夠引起。上帝是善，是愛，是正義，是仁慈，再加上百分之五的穩健投資。」一種商業要使得受人尊重又可以賺錢，原有種種因素；誠如傑羅特（Douglas Jerrold）從前說，「無論什麼社會正義都不應該干涉買賤賣貴的權利。」英國是世界上少數國家之中能用國旗做商品廣告的一個。甚至皇冕也得付利息；你想到倫敦塔去參觀一下皇冕，就得付上六辨士。

英國人在一星期之中，有六天在英蘭銀行裏做禮拜，到第七天上便到英蘭教堂裏做禮拜。因爲宗教在統治階級方面是個強大的力量。正像其他近代國家一樣，英國也有一個國教，一個專爲英國人所用的「孤島宗教」。與宗教相聯的，並且從宗教的嚴肅儀式而產生力量的，是道德的因素。社會生活標準在英國是全世界最高的，英國人最講究禮貌，這種風氣在政治上佔着很重要的地位，使外國人弄得難於瞭解。不過禮貌當然要與實際利益相印合。德國人之侵犯比利時，不但破壞條約，並且對英吉利海峽口岸放了一支冷箭。但事實在於誠如某重要外交家告訴我的朋友說，「英國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國家，因爲唯有她能爲他國之故參戰。」

統治階級之所以信仰自由，信仰民主政治，正像德里凡亮（Trevlyan）說，一半因爲自由和民主政治比專制政治「有效能」。英國的人民爲了自由會付很高的代價，這在法國的人民亦然；他們爲要取得自由，甚至得流國王的血。查理一世（Charles I.）之被送上斷頭台，對於英國人的良心上，固然很過意不去，但是議會的制憲特

權，至今還是熱烈地被保衛着。我們一讀英國史，看到有這許多人爲自由而失去頭顱，便會覺得驚惶莫名。英國的民主政治是保守的，英國人解釋「保守」一詞，頗爲皮相，牠的意義是指保存東西。只有一次大火才能破壞英國的毫髮。

全世界都景仰威士敏士達（Westminster 按即下議院所在地）的代議政治的成習，這也並非沒有理由。在獨裁國家中，人民是政府的隸僕；在民主國家中，政府是人民的隸僕。英國人永遠不忘記這一點。鮑爾溫（Baldwin）曾經說過，英國在已往三百年中，只有十年處於獨裁制度之下。英國議員對競選的態度是十分光明磊落的。在選舉結果揭曉之後，競選人時常互相握手，就如比賽一場網球一般。當鮑爾溫初任首相以後，他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拜訪他的政敵牛津勳爵（Lord Oxford），請求他的指教。

大多數的英國人，當然把英國放在政黨上面，這也是英國人能自治的原因之一。當保守黨名人寇松勳爵（Lord Curzon）逝世後，工黨黨員卻在下院發表贊美他的演詞。在一九二六年大罷工期內，大家都知道威爾士（Wales）的罷工工人和警察還在星期日乘休假之暇作足球比賽呢。

在英國，即使最窮的人也知道效忠國家。外國的遊歷家，看到泰納沙特（Tyne-side）和杜爾漢（Durham）兩地人民的窮困而會不發生革命，真覺得有些不可思議。英國的失業工人有二百萬，其中一半是決沒有再得職業的希望，但他們不僅不想革命，而且有許多失業工人不投工黨的票，反投保守黨的票。原因就是中等階級恐怕工黨沒有足夠的從政「經驗」，另一原因就在現代的英國有社會保險制度和勞工立法，他們每星期化了二百

萬鎊（美金一十萬元）的失業救濟費，來收買這些失業者的人心。

統治階級施治的工具有好幾種，例如海軍有那樣嚴明的紀律，例如銀行有那樣奇特的制度，貴族階級常川吸收有才幹的平民，也是另一種方法。公立學校也是如此——這種學校的「門牆關係」已經成了一種風氣。在英國內閣全體閣員和次長五十五名之中，出身於埃東（Eton）的不下十六名，出身於哈羅（Harrow）的不下六名，出身於其他著名公立學校的，不下十七名。又如大戰以後做過閣員的九十七人之中，有四十人出生於牛津或劍橋。

鮑爾溫在「英國論」（On England）一書中會說：「當我奉召組閣時，我的第一個念頭便是不要辱沒哈羅的名聲。我記得前幾位內閣裏面，有四五個哈羅畢業生，我決心要有六個。組閣好像填字謎一樣，我自己兼任了財相，我要把六個同僚也好好地安插。……以上帝的幫助，我對於這次艱難締造的事業，將使無論那個哈羅同學不會說我有玷校譽。」

鄉下別墅也是施治的一種工具。他們每逢週末必下鄉休息，但他們並非聚集幾個貴族在作什麼政治陰謀。但是如果新聞記者要想訪問一些要人，那麼鄉下別墅如像阿斯脫夫人（Lady Astor）按：阿夫人是保守黨內閣的重要幕後人物，且為英國第一個女議員）的克勒佛登（Cliveden）按：此為阿夫人的別墅名，為保守黨政客普萃之地，卻是一個理想的地方。有錢有勢的人物，平時在倫敦有許多無聊的應酬，所以每到週末，便離開世界上最可憐最不舒服的都市，躲到鄉下去稍緩一口氣。雖然他們的聚會，脫不了政治，議論政治，決定政治，但他們的

態度卻是很自然。

我到倫敦的時候，有人告訴我說，保守黨有拉攏英國特出人才的手段。他們只要遇見有新起的人才，便立刻羅致在黨裏。戴高帽子原是人人所喜愛的。使工黨領袖麥唐納（Ramsay MacDonald）從礦業國營的主張改變到組織國民內閣者就是鄉下別墅制度造成的。政客要想上台，必須出身於鄉下別墅，否則他的頭、他的腳、和他的舌都要受到牽制。左派的運動，無論怎樣激烈，如果與鄉下別墅沒有聯絡，一定要碰富豪的釘子。

報紙也是一種有力的統治工具。統治階級對於「每日郵報」的羅塞米爾勳爵（Lord Rothemore of the Daily Mail）和「每日快報」的裴佛布羅克勳爵（Lord Beaverbrook）的言論，並不怎樣注意，這兩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報界大王」，雖然大聲疾呼——裴勳爵的人品還頗孚衆望——現在卻沒有多大的勢力。他們要想打倒鮑爾溫，自己卻反被打倒。然而倫敦泰晤士報的主筆陶遜（Geoffrey Dawson）卻可躋於英國十大名人之列。「觀察報」（Observer，按：保守黨喉舌）的嘉文（J. L. Garvin）也有一部份潛勢力，雖然他對意阿戰爭的言論，並不得人心，關於西班牙內戰，尤與現實相距過遠。

再來談文官制，這是英國政治機構的中流砥柱。如果用合理的方法來推薦，我的聽差也很可做財政大臣或陸軍大臣的職務；因為實際部務，儘有常任官來辦理。像外交部常次范希達爵士（Sir Robert Vansittart）和財政部常次費希爾爵士（Sir Warren Fisher）這班人，才是真正治理英國的人物。這一班人，除了范希達以詩文著名，其餘多半雖有才幹而無名聲。他們常避免公眾的注意。他們只在幕後參與機要。但是他們的權力卻非常之

大。例如漢蓋爵士 (Sir Maurice Hankey) 以一人而兼任內閣、樞密院、和國防委員會的秘書，地位可算非常重要的了，然而知道他名字的人，卻依舊不多。至於其他未來的范希達們、費希爾們、甚至漢蓋們，在幕後的幕後做工作的，尚在繼續不斷的訓練中，以便等到他們的老師退休後把職司接收過來。他們沒有一人是可以缺少的。所以政治機構永遠自強不息。

英國是一個體制最難懂的國家，所以統治階級不但有種種特權可作護符，並且有傳統這座很厚的圍牆來保護自己。人們在英國，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被指摘為不懂世故；有一個年青的下議員有次告訴我，他差不多費了兩年功夫方才明瞭議會的門徑。誰曾聽見過一個掌璽大臣「勳爵」可以由一個平民擔任，一個國王的幼子必須在結婚以後方可做貴族，君主甚至不能進下議院。英國的憲法是不成文的。英國的下議員不可以辭職（他必須就任為白金漢郡 (Buckinghamshire) 的王室直轄領地大總管即百戶長 (Chiltern Hundreds) 以後才能辭去議席。）還有首相的本職，並沒有俸給。

英國統治階級宣傳方法的巧妙，為德國宣傳部長哥培爾博士夢想所不及。他們時常停止檢查新聞，但永遠以不利於政府的新聞消滅於無形。他們不用命令來揭制某項新聞的登載，而以各報自動聯合不登的方法來避免某項新聞的傳佈。例如各報的主筆，都知道去夏地中海上英國艦隊的實力，但是沒有一報加以刊載，即使反對黨的報紙也諱莫如深。勸誘是他們唯一所用的方法。外交部的官員會得說：「你看，我親愛的朋友，我不能請你為我做這件事，但是如果你肯這樣做，那才是合式。」

由於一區一議員的小選舉區制度，統治階級得以操縱選舉，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保加利亞或土耳其，就會使自由主義報紙的主筆大發雷霆。例如一九三一年舉國一致政府的選舉，鮑爾溫·西門·麥唐納聯立內閣只有一四、五〇〇、〇〇〇票，而得五五六席，反對黨七、二〇〇、〇〇〇票，卻只有五九席。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選舉中，政府黨所獲的票數只有百分之五四，而在六一五個議席中卻得了四二八席。如果採取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法，政府黨的多數就只有四八席，而不會有二五〇席。但是因為不採取比例代表制，所以反對黨雖然獲有百分之四六的票數，而議席則相距甚遠，至少在四五年之內，他們就沒有握權的希望。

最後，雖然「特殊區域」的形雲籠罩着，可是統治階級不但把政治完全安定下來，並且把產業也大大復興起來。在一九二五年間，預言家會說「不列顛帝國是「完了」；其實這個推測是錯誤的。英國不但大增國內的實力，並且在國際事務上又恢復了優勢的地位。英國本來只以帝國利益為前提，而抱着「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傾向，但現在卻又與歐洲列強攜手起來了。而為增加當前動亂時代的實力起見，鮑爾溫開始實行龐大的整軍計畫，來鞏固「國防」，其經費至少達十五萬萬鎊。

二 「雜拌兒」

除了種種勢力與反勢力、角色與反角色以外，在英國政治生活大舞台中可得而述者，臚列於下：
曲棍球，和打球時一種類乎宗教儀式式的公正精神。

國教的信仰。

生育率的減退，據正確估計，到一九八五年人口將減至三千三百萬。

特殊人才，如前聖保羅教堂總監英治大師 (The Very Rev. W. K. Inge) 帆船比賽的名舵手克立啓萊將軍 (General Critchley)，前皇御醫潘道森勳爵 (Lord Dawson of Penn)

世界最偉大的漫畫家羅大衛 (David Low) 豪放出羣的漫畫。

海德 (Hyde Park) 獨樹一幟的露天講壇。

政治上的父子傳統，不但保守黨的蘭道爾夫邱吉爾 (Randolph Churchill) 承襲其父溫斯東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的衣冠，即使工黨的政客也有克紹箕裘的令子，例如奧度漢德森 (Arthur Henderson) 的兒子，也是國會議員。他如自由黨勞合·喬治 (Lloyd George) 的男女公子也是俊才。

出版界的巨擘，維克多戈蘭茲公司 (Victor Gollancz Ltd.)

以政治為國內第一種職業的事實。

泰晤士報的投函欄。

黨和個人都肯承認失敗，在失敗後仍榮忠實地幹去。例如溫斯東·邱吉爾對印度法案多年來會作反對的奮鬥，但該法案一經成立，邱氏即拋棄反對。

胸算。

各派經濟學家如凱因斯 (J. M. Keynes) 沙爾德爵士 (Sir Arthur Salter) 史丹普爵士 (Sir Josiah Stamp) 萊登爵士 (Sir Walter Layton) 執法的嚴厲。

青年政治家之崇拜和平與不喜從前的軍銜。例如海軍大臣古柏 (Duff Cooper) 前外交大臣艾登和殖民地事務大臣奧母斯比·戈爾 (Ormsby-Gore) 都不稱「大佐」(Captain) 而稱「先生」(Mr.)。前幾年愛禮歐少校 (Major Walter Elliot) 甚至發出正式通告，說是從此以後，他的正式稱呼改爲「愛禮歐先生」。

海軍部的情報。

皇家委員會的調查。

牛津及愛士葵伯爵夫人 (Countess of Oxford and Asquith)。

拉斯基教授 (Prof. Harold J. Laski)。

死亡稅。

牛津劍橋兩大學許多學生的激進主義。

不服老。一位政客到五十五歲還算很年青。鮑爾溫稱他的一位四十二歲的書記爲「黃口孺子」。鮑氏自己也到四十一歲才入議會。

大主教於某項政治問題白熱化時投函泰晤士報籲請民衆舉行祈禱大會的習慣。例如一九三五年二月嘗

印度法案將近完成時他曾這樣做過。

慈善機關的衆多。

大教堂狹隘的入口。

俱樂部。

產業公會。

先巴特 (Cannon "Dick" Sheppard) 及牛津系的和平主義。

女子之喜學父親；愛穿男裝；參加獵狐；在議會中主張激烈。總之英國是個男性文明。

鄉下酒店。

「既成事實」的習慣，以及凡在「裏圈」中的人，從少就知道全國的要人。

帝國主義之擴張於本國以外。例如葡萄牙就像愛爾蘭一樣處於英國勢力範圍之下。自喬治二世巡遊地中

海回來以後，希臘也是如此。

「噴趣」(Punch 一種幽默刊物。)

法官、閣員和駐外大使俸給的優厚。

三 政治裏圈

提起英國的統治階級，我們不要以為有這樣一個團體，在某處開會，選出一位主席，然後各司其職，執行統治的機能。英國沒有像法蘭西銀行董事會那樣一個團結密切的寡頭政體。我們固然可以說，政治裏面，包括若干人物，如鮑爾溫，前駐法大使替里爾勳爵 (Lord Tyrrell)，泰晤士報主筆陶遜，前掌櫃大臣沙立斯布利勳爵 (Lord Salisbury)，大經濟學家史丹普爵士，前大法官海爾珊勳爵 (Lord Halsbury)，現任首相尼維爾·張伯倫，前陸相德貝勳爵 (Lord Derby)，英蘭銀行總裁挪曼 (Montague Norman)，內閣祕書長漢蓋爵士。但是我們如果要大家舉出裏面中應該包括些什麼人，那末除了鮑爾溫以外，其餘舉出來的，一定會言人人殊。英國的政治裏面，並不真有一個裏面，至少沒有固定不變的裏面。儘管你是一個資格最老的貴族階級分子，也不一定可做「裏面」人物；僅僅有錢可與特權並無多大關係；只有腦筋也還是不夠；有品格倒是庶幾乎。

四 皇室

英皇喬治五世，已於一九三六年一月長逝，現在大家覺得他確是一位少有的君主，可以算得一位歷史的人物。第一，他在一九一〇年贊助愛士葵 (Mr. Asquith) 和貴院鬭爭，同意遇到貴院堅拒衆院所提出的預算時，勅封新貴族來壓倒舊貴族。第二，他在一九二三年波那·勞 (Bonar Law) 辭職後，不召寇松勳爵而召鮑爾溫組閣，開了後來鮑氏許多年的相業。翌年總選，工黨雖然只能組織在議會佔少數議席的政府，他卻任命麥唐納為首相，創了英國史上社會主義者組織政府的先河。最後，當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英國陷於金融危機的當中，喬治

便自動由巴爾穆拉 (Balmoral) 回到倫敦，勸麥唐納組織「舉國一致內閣」。

英皇喬治對於英國政治的安定，有着很大的貢獻，他在位二十五年之中——一九三五年五月剛舉行登極二十五週銀紀念節——只換了五個首相。他在人品方面，最賞識愛士葵。這次銀紀念節，在分量上實在值得黃金那樣的貴重。姑就舉行紀念節時偶然增加倫敦數百萬鎊的收入不論，它非但象徵英國繁榮的比較恢復，並且足以表示國民對於皇室愛戴的赤忱。喬治本來是很可接近的，因為他是一個極端謙和的人，所以民衆由他引起的熱烈情緒，使他受到深刻的激動。銀紀念的起源，已不可考。慶祝君主登極二十五週年典禮，以前並無先例。當下議院最初討論此事時，沒有人預料到此次慶祝會有那樣熱烈與普遍的程度。

英國的國王，無論其為英明或庸碌，都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第一，皇宮是統治階級最後的衛城，統治英國的人，都集中於幾個「裏圈」，而以皇座為中心。第二，自威士敏士達議定書成立以來，國王這個人物，成為英國與其自治領之間的主要連鎖。第三，國王及其周圍的人是安定政府機構的一架旋轉儀。他必須超然立於政黨政治之外（愛德華之退位即其顯例），經過他所選定的樞密員，他行使着重大的影響，並且他還有鑒定和諮詢外交及內政政策各方面的權利。

與英皇最接近的大多數人物，不容說是保守黨。國王對於政治是超然的，但是如果他個人的同情和習性，與統治階級發生歧見，那就將演成不可思議的情勢。比方說，將來有一天，工黨克利布士爵士 (Sir Stafford Cripps) 或其他急進的社會主義領袖當了首相，也援引愛士葵的先例，要求勅封一千名新貴族，以便在貴院通過迫切的

社會立法，那將要怎麼辦呢？按照向例，國王應該聽從首相的勸告。但據作者所知，「英國的憲法是以現行事態做標準的」，所以宮廷裏的保守派樞密員頗有發言的餘地。

五 外交政策

誠如前外相霍爾最近說，英國的外交政策，世代相傳，極少變動；廣義言之，根據均勢概念，而由英國維持其間的權衡。奧斯頓·張伯倫說：「英國歷次大戰，全是爲了阻止武力龐大的國家，稱霸歐陸，和控製英吉利海峽的沿岸以及荷比的海港。」德里凡亮也說，「自都鐸王朝以來，英國對於歐洲政治，只看作保護本身安全和促進海外經營的一種方法。」英國遵循着這種政策，到了近代便在法國比德國強大時，即揚德以抑法；在德國比法國強大時，即揚法以抑德。自從大戰以來，國聯便成爲遂行這種目的的一個很適宜的機構；如果國聯不能供英國利用，則英國即將棄之不顧了。爲此之故，狡詐的英國人，便在一九一九年把各自治領和印度當做分立的國家拉進了國聯，所以她永遠能左右國聯的決議。大戰以前，英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則，便是對於大陸未來假定情勢，不作任何行動。洛加諾條約的成立，可以看作這種均勢政策的頂點，自此以後，形勢爲之一變。這一切考慮，當然全以「不列顛和平主義」(Pax Britannica)爲基礎，不列顛原是一個商業國，所以需要和平。

此外還有一種極奇怪的小因素，使大陸觀察家摸不着頭腦的，這裏也值得一談。英國人甚至把外交政策看做一種遊戲。德法兩國人，把政治看做生死系之問題；英國人可不像那樣，他們對於當前繁複的外交，能夠用極不

關切的態度去應付。他們根本把歐洲看作一個戲台；一切發生的事件只是一幕戲。如果有人忘卻了怎樣扮演，或背錯台詞，普通英國人總以為這僅僅是一種預演，將來再演時還可以糾正。

英國的外交部，大概可以分作兩派。第一派是贊助國聯的理想家。他們希望用集體安全制度使德國能和世界列強友好合作。他們把戰爭直認為恐怖；所以對於意阿爭端看作歐洲道德律的破產。第二派大半以年紀較大的人為代表，他們願意給國聯一切援助，但是不相信集體安全的效率，而寄希望於（一）強大的海軍，和（二）孤立主義。這一派人的意見，很可以鼓勵德國，因為孤立主義——即不干涉歐陸——就是等於援助德國。

英國有很強烈的親德勢力，即在希特勒獨裁以後仍然如此。這種勢力總括起來有如下述：

（一）許多保守黨員畏懼赤化，有些頭腦頑固的人認希特勒為防止將來蘇聯西進的保障。英德兩國應該聯合抵抗共產大敵蘇聯。復次，俄國是英國「傳統的」敵人，俄國再加上共產主義，那就雙倍的可怕。

（二）倫敦金融界對德國有鉅大的投資，對於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尤欽佩得五體投地。

（三）英國有許多要人不喜歡法國和法國人，因此便傾向親德。

（四）擁護羅錫安勳爵（Lord Lothian 原名 Philip Kerr）在巴黎和會中為勞合·喬治的親信）的一派人物，都欽佩希特勒；他們相信一個穩定的德國，在希特勒領導之下，可以保障和平。羅錫安是基督科學會（Christian Scientists）的教徒，這班教徒不相信死亡或罪孽，所以比別一派教徒容易接受希特勒表面的諾言。

（五）倫敦泰晤士報（羅錫安與該報主筆陶遜是至友）態度的獨立，當然是毋庸否認的，該報駐柏林訪員

時時揭發國社黨的橫暴與偏見，不能不說功在社會；但是該報之恨共產黨，甚於國社黨，有時無疑的在外交政策予希氏以有利的輿論。

(六)工黨裏面，也有些親德分子，那真是奇怪得極。英國如果處於國社主義之下，他們的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主義者，顯然將遭受德國同僚相類的痛苦，但是英國工黨的外交政策，向以不贊成凡爾賽和約為標榜，並主張對德維持正義，所以英國的左派，並沒有為了希特勒的摧殘工運，而改變了他們的親德政策。（拉斯基教授某次說，這是受了美總統威爾遜的遺毒，因為威氏把德國的統治者和人民分別看待。現在有許多工黨和自由黨員，還是把希特勒看做德皇威廉第二。）

如果英國一旦與德國戰，則上述各種勢力，應負相當責任，因為現在和一九一四年一樣，英國人若幻想着他們可以維持中立，那無異促進希特勒的備戰。

英國對於希特勒整軍計劃的答覆，是一種典型的折衷辦法：一方面，英國利用英德海軍協定，易收了海權競爭的限制；他方面，內閣宣佈加強英國空軍實力三倍。

關於英德海約的成立，作者曾經聽得一個奇離的解釋。（該約的成立，海部出力較外部為多。）據說一九一四年英國之所以與德開戰，就是因為德國奪了英國的世界市場，致使英國國內發生產業蕭條和失業。現在日本的舉動，與德國如出一轍。英德海約使德國能夠控制波羅的海（雖然波蘭外長貝克上校（Colonel Beck）對於該約之增加德國的實力，大為驚駭；）英國很知道，惟有德國強盛的時候，日本才會進攻蘇聯，如果德日聯合對蘇

作戰，這三國的力量便全將削弱，那與英帝國是有利的。

這一切產生了一種矛盾的現象。有許多人是親德國，而同時又反對法西斯主義，就好像半張嘴吃下一隻橘子，還有半張嘴又把吃下的橘子吐出來。在外交政策上，英國爲了防止唯一可能的敵人德國而拚命擴軍，但同時與論方面卻又強烈的增進敵國的勢力。

英國現在是正在等候着，拖延着時日，以待她本身的大擴軍計劃的完成。

第十七章 退位問題

一 愛德華素描

一九三六年二月初旬，作者開始寫一篇威爾士親王愛德華（Edward of Wales）按英國太子永封爲威爾士親王（個性的素描。該文並未完成，但在作者的札記簿中，卻發現了一些預備應用的資料，而爲作者所完全忘記的，那些資料中有這麼一句話：「愛德華也許是有一天必將創造歷史的少數君主之一——雖然他自己容或不願這樣做。」

愛德華可算世界上最著名的青年，他君臨英國，爲時雖然頗暫，但一開始便引進了現代的意識。自愛德華七世（Edward VII）按即愛德華之祖（以來，爲了多有一些行獵的白天時間，山林漢行宮（Sandringham）的時鐘，要比標準時間快半小時，他第一個人加以校正。英國國王向來不乘飛機，他在喬治後即刻飛到倫敦，打破了前皇的慣例。他對議會演說，不用第三人稱而用第一人稱。三月一日，他又用無線電廣播，對帝國億兆人民發表演詞。一時宮廷裏大有一番新氣象。

愛德華頗有一些神經質，又是一個固執成見的強頭漢，但爲人卻極其和藹可親，大家都以爲他有些兒「粉

紅色。」他對於窮苦的人民，一向具有強烈的仁愛心腸。當一九三五年他遊歷奧國時，堅執要參觀馬克斯院，此事使奧國天主教當局大爲受窘，因爲這座社會黨員的公寓，正在一年以前，曾受他們砲火的洗禮。他的頭上雖戴着皇冠，然而愛德華卻顯然是一個屬於平民那方面的人。他登極不久，曾到英國造船業中心格拉斯哥（Glasgow）舉行「曼麗皇后」號的下水典禮，路過貧民窟，停下來對人民表示極大的同情。一九三六年秋，他參觀南威爾士的礦區，目擊工人黑臉受苦的悲慘狀況，不禁脫口而出的說：「我們應當想些辦法。」

有些人說愛德華甚至同情法西斯和國社黨，這話實在不大合邏輯。法西斯黨和國社黨在最初的時候，固然也是「粉紅色的」，因爲他們想以此弋取勞動階級的同情。英國的皇室，在私人方面久有親德的名聲。愛德華對於來英聘問的德國外長紐拉特，招待得非常親熱，他有幾個朋友，是德國駐英大使里賓特羅甫（現任德外長）的至交。他方面，愛德華對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也很親熱。他永遠儼談國社主義，他在退位以後遊跡國外的時候，世界上儘有許多人的家裏可住，而他卻選中住在一個猶太人的家裏，不但是個普通的猶太人，並且是一個國際金融巨頭的奧國猶太人，而爲國社黨所深恨的。

愛德華登極以後最初幾個月，總算一帆風順。他極得人民的愛戴。他對於君主國家的儀節和繁文不大大注重，所以廢除了很多，但並沒有犧牲莊嚴和禮貌。不錯，他是違反習俗的；不錯，他擯棄了幾個往來於宮廷之門的元老，而結交新交；但照大半消息靈通的人士判斷，他的治國要比先皇更長久，更太平，更愉快，更有聲有色，雖然他棄卻喬治時代若干悠久的傳統。消息靈通者是錯了。人人都錯了。皇宮裏平地起來一場千年以來英國所未見的風波。

風波的中心人物是一個美國婦人華麗絲·辛溥森夫人 (Mrs. Wallis Simpson)

二 辛溥森夫人

關於這件奇難的案件，全世界人士已經說了許多話，這裏我們不得不總括地講一下。辛溥森夫人在處女時代，閨名 蓓西·華麗絲，姓華爾飛 (Bessie Wallis Warfield)，一八九六年生於美國 布雪爾 凡尼亞 省的蒼峯鎮 (Blue Ridge Summit, Penn.) 出身於一南方的望族，而會歷盡千辛萬難。有些系譜學者甚至把她的先祖追溯到十一世紀時的英皇威廉一世 (William the Conqueror)。她生長於美國 巴爾的摩 (Baltimore)，是個瀟灑可愛，但並不特別出名的南國美人，她引起了英國 近代史上最嚴重的憲法危機，而成爲曼根 (H. L. Menckan) 所謂「耶穌復活以來最大的新聞故事」的中心人物。

她在一九一六年遇見一位美國 海軍軍官斯賓塞大尉 (Lieutenant Earl W. Spencer, Jr.)，遂即與之結婚。十一年後在一九二七年，她又和他離婚。此次離婚破滅了一切。當時斯賓塞夫人 做夢也不會想到這次婚姻的合法解決，會得阻礙她以後做皇后，並且會犧牲了一個愛她的皇帝的皇位。一次離婚已經足夠了。主教、清教徒、議會派的怒火，都集中於辛夫人 的身上，不但因爲她是一個平民（新后在嫁與約克公爵 Duke of York 按即今皇喬治六世 前也是一個平民，）不但因爲她生下來是個美國人，並且因爲她是一個離婚婦。他們覺得人人都知道皇后的底細，這實在是不能容忍的。

當然一次離婚已經足夠引起暴風雨了。離婚以後再結婚，尤其增人的憤怒。她與斯賓塞脫離關係後，於一九二八年又嫁給一個年青的紐約人辛溥森 (Ernest Aldrich Simpson)，他服務於「寒流巡洋隊」(Coldstream Guards)，後來加入倫敦航業界，加入英國籍。辛溥森夫婦遷居於倫敦後，(她嫁給辛溥森先生後即自然成爲英國公民)就加入了上流社會的社交生活。一九三一年她現身於宮廷中，過了一二年便成爲皇太子威爾士親王的朋友。

這種生活當然並無絲毫反常或怪僻。辛溥森夫婦以及和他們做朋友的一班人，其舉動正與世界上千萬人所做的一樣。他們跳舞，他們互相取笑，他們喝混合酒 (Cocktails)。這個字含有諷刺大主教的意思，他們高談闊論。辛溥森夫人並不是一個俚俗的、假裝正經的、或懷有大慾的人，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她有社交手腕、謙遜態度、處世方術和隨機應變的急智，過去有，現在也有。她比宮廷中人要聰明得多。她是一個很可相處的人。她待他像一個人，像一個有血肉之軀的人，而不是待他像一個皇太子，像一個傀儡，因此他就深深地愛上了她。這似乎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快樂地墮入情網。

當他做太子的時代，他們的關係已經很密切，而不會引起公衆的注意。辛溥森夫人的名字第一次見於美國報紙，是在一九三四年夏在地中海沿岸法屬康斯鎮 (Cannes) 過暑假的時候。後來在一九三五年初皇太子遊捷京和奧京時，她也伴着他。當一九三六年一月前王喬治五世駕崩時，太子的地位更加困難起來，因爲既然身爲國君，則個人私事就不能長此成爲個人私事了。誠如英國評論家哲斯脫敦 (G. K. Chesterton) 某次說，無論一

個怎樣衆目昭彰的人物，總不能沒有私生活的。從此新王決定把事情逐漸公開出來。他永遠不喜歡偷偷摸摸的做事。一九三六年夏，當他乘着遊船巡遊地中海和愛琴海的時候，辛溥森夫人和一班伴侶陪着他。他們倆在南斯拉夫沿海和土耳其拍了許多照，但在英國發表的很少。至於單獨與辛溥森夫人在一起的，一張也沒有發表。英王愈想把事情公開出來，英國報紙愈把「流言」的痕跡隱藏起來。英王像是故意要給人民知道的樣子，曾經兩次把辛溥森夫人的名字印在宮報上。一次是在晚宴會席上，那次首相鮑爾溫夫婦也在被邀之列——還有一次報告辛溥森夫人和好幾位朋友到巴爾摩拉爾 (Balmoreal) 的消息。

後來英王受了刺激，決心和她結婚，以便一勞永逸地解決此事。他們倆的友誼也許可以得人民逐漸的承認和同情。但是流言卻很廣大的散佈開來。在英國各界以及美國全國，人們都以此為唯一的談話資料。到了八月中旬，大家都知道辛溥森夫人將與其夫進行離婚手續。國王要結婚，他不滿意現狀，也許他覺得這種生活不能再過下去的。據各方報告，離婚的動機出於國王的教唆。十月二十七日，辛溥森夫人在伊普斯威巡迴裁判所 (Ipswich Assizes) 接到一張「判決書」。這時全世界——英國除外，因為自動的新聞檢查制度依然有效——都注目於後事。只要再過六個月，即在翌年四月二十七日，辛溥森夫人就可自由嫁與國王，要是「國教代理律師」不干涉，不宣告最後離婚令為無效，則她也許就可成為皇后了。

但是干涉者卻大有人在——英國教會、下議院和首相鮑爾溫。

三 不愛江山愛美人

暴風雨終於爆發了。泰晤士報在十一月三十日的社評上，發表了一篇極有含蓄的警告，其中有謂：「向者國家在緊急之秋，下議院常能代表民意，在此同一情形之下，似亦應有所表示……樞密院於內政外交生死關頭，亦不能逃避其責任。」第二天，正像預先安排好的信號一樣，白蘭福主教（Bishop of Bradford）用嚴厲的話來衝撞國王，他說：「國王個人的主張，固然是屬於個人的，但同時依然爲一國之主的主要意見……國王的職位，須仰仗上帝的聖恩。我們希望他明白這一點。我們之中，頗有人願他對於他所明白的一點，表示更積極的態度。」

有些觀察家相信宮廷裏有一派人和保守黨的高級黨員，事先早有謀劃，推出主教來說這樣的話。據說這一派人倒並不反對辛溥森夫人，因爲他們對於她是可以一口氣吞下的，他們所反對者在於國王之擴張一向的成規與傳統，他在政治上的「反覆無常」，他想做實際統治者的決心，而不願僅做一個傀儡。

主教不久就親自解釋，說他並未講到國王的私生活方面，他只說加冕典禮（充其量也不過是宗教儀式）的日期近攏來，而愛德華卻不願到教堂裏去。他直率地說，當他起草他的演詞時，絕對未嘗聽到「這些謠言」（辛夫人）這也許是實情。主教不過是一個無辜的犧牲者，幕後還有一些更狡猾的權勢推動他作那篇演說，這也是真的。

無論如何，英國一般不明內幕的民衆，聽到了英國教會的一個主教，竟然敢用數百年來所未聞的話來罵國

王，不禁大爲驚駭。究竟那是爲什麼緣故？有什麼目的？國王用什麼方法來對付全國上下，都瞠目不知所對。他們的「好奇心不久就滿足了。十二月三日，各報衝破了「報業公會」自加的新聞檢查，於是全部驚人的消息都暴露出來。

鮑爾溫於十月二十日，曾自動奏見國王，在培爾佛地堡（Fort Belvedere）舉行秘密會談。他向國王報告，他對於辛溥森夫人事件所引起的風潮，極爲驚異；他對於迫切的民意會得不利於皇位，極爲恐懼；他對於離婚案「判決書」宣佈後局勢的改變，極爲關切。

（鮑爾溫與國王的會見，直到鮑氏於十二月十日在下院發言時才爲大眾知道。以後幾次秘密會談，也在那時才發表。全國當初幾乎都蒙在鼓裏。但人們可不能責鮑爾溫未將詳情透露出來。）

第二次會談出於國王自己的召見。時在十一月十六日。後來鮑爾溫又發表下面的談話：

「在離婚判決書宣布那一天，我覺得我應該……開始與國王談話，我對皇上談了一刻鐘關於婚姻的問題。」

諸位應該記得：我的關員並未全體知道這件事。關於培爾佛地談話，我只對四位高級同僚報告過。

我告訴他（皇上）我不以爲這種婚姻，會得國民的贊同。

此次婚姻，包含着一個皇后的問題，我的確告訴皇上過一次，說我可算是維多利亞女皇時代的一個遺老，但是即使反對我最烈的政敵，也不能說我不懂得英國人民對於不合常規的舉動，會起反感。

我告訴他，如果他們（英王及辛夫人）任性行事，我敢確定那是辦不到的。

我不能再詳細地說下去，但要旨已盡於此，我向他指出：國王妻室的地位，與全國任何公民妻室的地位不同。這是國王應付代價的一部份。他的妻室就是皇后。他的皇位就是全國人民的皇后，所以在選擇皇后的時候，全國的民意也應該顧到。

於是皇上對我說，他允許我轉告諸位，說他要告訴我久想說出來的話。他說：『我將與辛溥森夫人結婚，我準備退位。』

我說：『陛下，這是一件最可嘆的消息，我今天對此不能發表意見。』

所以鮑爾溫爲自己負責起見，在十二月十六日告訴國王婚姻不能成立。關於這一點，閣員知道的只有四個，各自治領顯然並未知道。鮑爾溫本人——只有鮑爾溫——決定辛溥森夫人不能做皇后。

第三次會議舉行於十一月二十日。此次談到了貴賤聯婚的折衷問題。國王可以娶辛夫人，國會將通過一條辛夫人得做妻室但不得做皇后的議案——因爲在法理上英國不得有貴賤聯婚之舉。鮑爾溫未曾明說，這個折衷辦法究竟出於何人之意。他只說：『有人對我建議。』他也不曾說建議出於國王。照他的話，國王只『問我已否接到建議。』鮑氏回答說『已經接到了，』國王問他對此作何感想。鮑爾溫說：

『我告訴他，我對這個意見，還沒有加以深切的考慮，但是如果他問我第一個反應如何，那我可以說，國會恐怕永遠通不過。』

我說要是他需求，我可以正式研究一番。他說他並無這樣的請求。於是我說，那我只好以此正式供全體閣員及各自治領總理討論，並問這是否爲他的願望。他告訴我是的，於是我說我將這樣做。」

（同時在四千萬英國人民之中，知道這些重要談話進行的，還不到十個人。鮑爾溫不會告訴他一個同事，「他羞於發表」……）

十二月二日，鮑爾溫對國王又作第四次決定的會見。鮑爾溫告訴他說，他的探問雖然並不普遍，但已足夠表示英國本國和各自治領都不會容忍貴賤聯婚。

就鮑爾溫的責任而論，在這篇聲明中含着整個故事的關鍵。他的探問是否做得正確？他從答案中所得的結論是否無誤？如果是這樣，那麼他做驅逐愛德華王位的代理人是對的。如果不是這樣，那麼他犧牲了帝國的國王是不公平的。

首相的演詞如下：

「皇上問我是否能夠回答他的問題（貴賤聯婚是否可能問題）……我給了他一個答覆……皇上說，他對於這個答覆並不驚異。他接受了我的答覆不會問什麼，以後也從來沒有再提起。」

十二月二日是暴風雨晴朗的一天。國王與他所要下的決心，苦苦地奮鬥了八天之久。從這一天起，如火如荼的民意，已經逐漸低下來。緊張的局面幾乎到了再也不能容忍的地步。國王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放棄辛溥森的夫人繼續在位；（二）拒絕接受鮑爾溫的奏議令他辭職，另由一個新閣施治，或者甚至迫內閣成爲一個「王黨」。

來統治(三)退位。

鮑爾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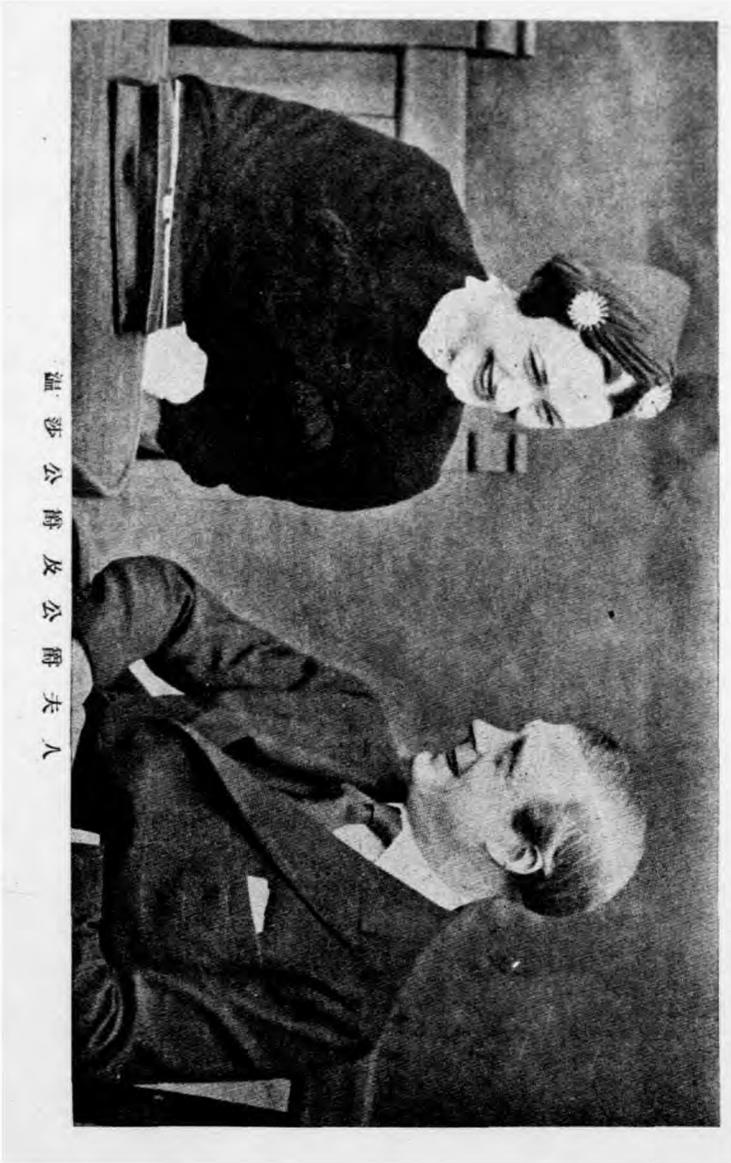
「從那天到現在，正是皇上內心奮鬥的最後關頭。我們談了許多話，討論着這個小問題的各方面，下院應該明白——其實這是很難明白的——皇上並非是個孺子。他的相貌這樣年青，使我們都把他當做我們的太子。但他已經是個成年人，對於人生和世界，有廣大的閱歷。

屢次在談話之間，他反覆提到他有三個動機：第一，如果他去位，他要走得光明正大；第二，他不讓任何使他不能做到這事的情勢發生；第三，他去位時要竭力不驚動他的大臣和人民。

他要在可能範圍以內竭力不引起他兄弟繼承王位發生困難的環境中去位，我可以說，如果有什麼所謂王黨的觀念，那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

他留在培爾佛地，因為他說，如果這些事情因民衆的興奮而依舊不解決，則他不返倫敦。我尊重他那當時的態度。」

在一個美國人看來，實在難於理解護憲主義究竟有什麼力量能在英國有這樣的根深蒂固，以及下議院大多數人這樣恐懼王黨的產生。國會高出於國王之上。從「大憲章」成立以來，這個問題已成不爭的事實，查理一世爲了反對「大憲章」，甚至付了頭顱的代價。有許多議員——例如溫斯東·邱吉爾——以爲當各事依紛爭不決的時候，國王不應該被人待得這樣不恭敬，並且對他提出這樣不公平的最後通牒，但是英國要實行君主獨



温莎公爵及公爵夫人

裁，卻也不爲大多數人所願見。至於組織王黨的思想，尤爲穆思萊（Mosely）、霍斯東夫人（Lady Houston）以及羅塞米爾勳爵輩曾經企圖促其實現的那班人所不信任。

同時辛溥森夫人，不得不逃避這個洪流。自古至今，從來沒有一篇奇談會有這樣一個女主角。她由一位國王最親信的朋友伴著，偷偷地乘着汽車駛過法國，避居於地中海沿岸康斯鎮羅傑士（Rogers）夫婦的別墅裏。在緊急期內，她的舉置毫無過處；就是到了法國以後也是如此。她竭力想保持她的清白，做得完全自然的樣子；照常出門買花買物。不久有位醫生和一位律師乘着定期載客飛機冒霧訪問她。最後她發表了一篇聲明，這篇聲明說得極其莊嚴，不失她的身份，可與任何議員任何演詞相措抗：「最近數星期以來……我會想竭力免避足以不利於皇上或王位的任何舉動或言論。今日……我願……於不快的局面中，自告引退。」

十二月十日，局勢到了頂點。律師、官員和審計員，都明白了前所未知的詳細情景，鮑爾溫 and 國王不斷地在通着消息，最後皇族召開一次沉痛的餞別宴。皇太后曼麗發表了一篇悲切的聲明。愛德華簽定了退位詔，並由他三個兄弟作證，約克公爵準備登極。下午國會召開會議，議長宣讀愛德華詔書，鮑爾溫發表演說。羣衆在一兩天以前還紛紛對內閣表示不滿，這時卻驚惶得啞口無言，而在兩種情緒的衝突中，對新皇發出抑鬱的歡呼。

十二月十一日，愛德華在無線電中宣讀他的告別辭，全世界都傾聽着。這篇演詞可稱本世紀的傑作，其動人之深，爲前所未見。

「我終於可以說幾句衷心的話了。我從來不會固執什麼，但是直到現在，我才始得到合憲的發言權。」

數小時以前，我卸卻了英王和皇帝的最後責任。而現在，我已有我的兄弟約克公爵繼承大寶，我第一句話應該宣告我對他的效忠。我以全心履行這句話。

你們知道迫我去位的原因，但我要你們瞭解我在下決心的時候，未嘗忘懷國家和帝國，這在二十五年以來我做太子和最近做國王的時候，是始終企圖服務的。

但是當我告訴你們由衷之談的時候，你們應該相信我：因為我覺得如果沒有我所愛的女人的幫助和支持，我不能負擔我的重任和做國王的職責。

我要你們知道，我所作的決定，出於我的本心，出於我一個人的本心。

這件事情，完全要我自己來決斷。其他關係最密切的人，曾作最後的嘗試，勸我採取另一種途徑。

我會以此舉，作為我一生最嚴重的決定，而我唯一的念頭，在於結果如何可使各方面最好。

我作這個決定的時候，困難並不多，因為我確切相信我的兄弟，於本國公務曾有長久的訓練並且有許多美德，足能接我的位置，而不至間斷或有損於帝國的生命與進步；此外，他還有一種無比的幸福，為你們許多人所享受而為我所不克享受的，那便是一個有妻室兒女的快樂家庭。

在這些艱辛的日子中，我的母親皇太后，和我的家族，都來安慰我。王室大臣，特別是首相鮑爾溫君，永遠以全副考慮待我。

我與他們之間，以及我與國會之間，從無憲法上的異見。我受父皇對於憲法傳統的教誨，決不容有這種問

題發生。

自我爲太子以來，和後來登基的時候，無論我住在或行抵帝國任何地方，各階級的人民，都以最大的好意待我。我今特表謝忱。現在我是脫離公務了，我是卸去我的仔肩了。

在我重返祖國以前，容有相當時日，但我將永遠以深切注意，關懷不列顛種族和帝國的幸福，並且將來在
任何時候，如果我能夠有對國王以私人立場效力的必要，我將立刻盡責。

現在，我們都有一個新皇了。我以至誠，願他和你們，他的人民，都有幸福和繁榮。

上帝降福你們衆人！上帝保佑國王！

像這樣一個向以言論自由的國家，而居然禁止這篇演詞的留聲片在國內發售，那真是令人有些驚駭。（當然統治階級爲「培植」約克公爵起見，要想盡方法立刻把愛德華從人們的印象中消滅。）

那天晚上，愛德華孤單單地坐上一艘驅逐艦往法國開去，從此住在一個與猶太人的家裏過着放逐生活了。

四 追思

這件事情充滿着矛盾，炫惑得令人莫明其妙。第一個矛盾是國王的人物，倒這樣不重要，自愛德華轉換到約克，在表面上看起來進行非常順利；而皇后的人物，卻有這樣重要，甚至犧牲了愛德華一個王位。

第二個矛盾是英國教會在辛溥森夫人提出離婚時，就禁止國王和他結婚，而教會本身，卻是一個身為國王而居然休棄皇后的亨利八世所創立的。

第三個矛盾是英國除了一切事情以外，號稱「自由」國家；但是無情的新聞檢查，卻壓住了當代最偉大的新聞，助成愛德華失卻皇冠。他方面，赫爾斯德（Hersford）卻又從旁諷刺，在很早的時候便捏造故事，大放空氣，說愛德華將與辛溥森夫人結婚，這個消息傳到鮑爾溫的耳朵裏，他才竭力破壞婚事，所以愛德華的退位，赫爾斯德也有助成的責任。

至於美國報紙，倒並沒有像許多人想像那樣的瘋狂。對於辛夫人的流言，從來沒有刊布過。她只是一位嫁過兩次丈夫的女人。美國報紙並未把這件事情鋪張誇大，他們所發表的消息，多半是愛護辛溥森夫人的。

為什麼事情會弄到這步田地呢？鮑爾溫說，因為輿論日漸高漲，所以他不得不向國王進言。但是見重於英國的人，個個都知道辛夫人的特殊地位，只有六個月的功夫，已經大大地增進了君主的性格和快樂，把他造成一個更英明的國王。新聞檢查應負重要的責任。如果輿論能夠被許逐漸有利於辛夫人及其對國王的良好影響，則流言不至於起來。如果鮑爾溫夫人能夠邀她參加茶會，或皇太后曼麗能夠帶她出來買物，則結果恐將大不相同。

鮑爾溫夫人很可以左右她丈夫的意思。

愛德華當然抱着絕對的決心，要與辛夫人結婚。否則這個問題就毫無意義了。他之所以放棄王位，並不是為了一個女人，而是為了一個妻室，這情形就有些兩樣。

因此又發生了另外一個矛盾。愛德華不願過着放浪的生活。他可以有許多情婦。但他要結婚，要一個家。而儼然以道德家自命的鮑爾溫先生，卻反對他這一點。他根據道德的立場，來拒絕國王以道德的方法解決這個問題。激動英國教會暴怒者，倒不在於不道德而在於道德。

這件案子對於英國一切離過婚的人，好像蓋上一個烙印。辛夫人的一次半離婚，是絕對合俗、絕對正當的。她兩位「現存的」前夫，都很稱贊她。假定她做了兩次寡婦，情形會不同嗎？假定她兩位前夫下星期去世，整個風潮會平息嗎？

鮑爾溫說，貴賤聯婚，前無成例。但是像這種樣子的國王退位——更加要破壞偶像一些——也是前無成例的呵。

首相所引用的萊梯斯〔*Leticia*〕按萊梯斯為沙翁名劇哈姆萊德中 *Opheelia* 之兄〕的話是很動人的。但是鮑爾溫先生難道忘了「哈姆萊德」〔*Hamlet*〕的結局嗎？

有許多人期望工黨不這樣冷漠地「遵守憲法」。英國的憲法是允許成立新先例的。如果亞德里（*Athens*）及其顧問的態度更積極一些，目光更遠大一些，則在一月至十月之間，他們或者要比實際上更接近國王得多；國王原是很同情他們的呵。如果親熱的關係成立以後，工黨領袖對於離婚不這樣墨守成規，則他們的地位也許要穩固得多，很可以告訴鮑爾溫說他們願意改選國會。但是他們卻不敢這樣做法，這也許因為工黨崩潰得太沒有希望復活了。不過他方面，也有一批觀察者以為他們失去了東山再起的大好機會。這裏又牽涉到新聞檢查問題。

大部份的人民，一些也不知道這件風潮，直到十二月三日，才像晴天霹靂似的打到他們的頭上。鮑爾溫當然永不容許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

我並不以為鮑爾溫、大主教和泰晤士報，結黨圖謀驅逐愛德華。像這樣的事情在英國是不會有的。即使愛德華的巡閱威爾士之舉（當時那裏正發生罷工風潮），對於內閣也不過是一小小的窘迫而已。在統治階級之中，沒有一個要人存心要國王退位，雖然他們也許很願意愛德華安分守己一些，雖然他們把這件事情處置得幾乎太難堪一些。

鮑爾溫的演說，原是一篇確鑿的傑作，頗得力於他的性格中所含古怪的清教徒的玄虛。雖然他也許還留些餘地。愛德華的演說也是一篇傑作，並且充滿着感情。

如果國會要干涉一個國王的私生活，則國會應該對他的教育和撫養負責。

總而言之，這件事情無論在帝國方面或在個人方面都是一幕悲劇。愛德華的態度，也許染着一些神經病的色彩，但是他的退位，無疑地浪費了許多人類的精力。由此引起的政治後果，不謂不大。愛爾蘭獨立運動的領袖凡勃拉，立刻搬開了總督抬起頭來。當一個國王的統治正在全盛時代，就被當做一盆殘餚那樣丟入垃圾桶裏，那麼印度、非洲和南洋羣島的人民——如果他們有機會——對於象徵帝國統一的英王的價值，當作如何感想？君主立憲政體的政治價值，在於牠所給予鞏固、尊嚴、穩定和持久的擔保。而現在，這次風潮卻證明了國王究竟也是一個「人」罷了。

當作者在英國的時候，聽到許多人講起愛德華確有親德的傾向。大多數王室人員，其親德態度，也許並未較反法爲甚。究竟他們第一代或第二代的血統裏，含有日耳曼人的成分，而且法國人又永遠激怒他們，炫惑他們。我不以爲愛德華的「親德態度」能夠成爲一種極其重要的政治力。他之所以親德，不但由道德而來，並且還由一種友誼感而來，因爲大戰以後，德國被列強待得很壞，所以應該援以一臂之力。新王的基本動機和觀念，大概多出於此。因此我們可以下個結論說：自愛德華轉變爲約克，對於這個重要問題，將無若何不同。不過約克的性格，沒有像愛德華那樣的活潑，無疑地他將更受樞密員的勢力所左右。

人們疑惑着，愛德華在放逐期內，是否會像羅馬尼亞的廢王卡羅爾（Carol）一樣，成爲一個攪亂政治的泉源？當然有一批專門製造擾亂的人，急於想利用他的境遇，例如穆思萊便是其中之一。但是愛德華會否注意他們，實在還是一個疑問。如果當他在位的時候，過於受人蠱惑來保持他的王位，則將來他也可以受人蠱惑，設法把王位拿回來。所以愛德華受人蠱惑的程度，倒是一個重要點。

最後，作者頗願聽聽馬克斯主義者對於此事的解釋。經濟定命論者於辛溥森夫人將有何說？

五 新王喬治六世

約克公爵繼位以後，取名爲喬治六世（George VI.），人人都深望他君臨久遠，而無色彩。他極爲安分，並無很大的野心，而且最初還不願做皇帝；據傳他提議要他的女兒伊麗沙白登基，但因內閣竭力反對而作罷。喬治六世

以一八九五年生於約克精舍 (York Cottage)，過去經歷頗有丈夫氣概，但並無卓異之處；他曾在海軍中作戰，進過劍橋大學，遊過不列顛帝國的各處。所奇怪的是從未到過美國。一九二三年，他與史特拉斯摩伯爵 (Paul of Strathmore) 之女伊麗沙白·鮑威斯·里昂 (Elizabeth Bowes-Lyon) 結婚；因此一位蘇格蘭女人就成爲英國的皇后了。

喬治六世原來有些口吃的毛病，這話有地位的人從來沒有在報紙上說過，但自坎特布里大主教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在無線電廣播中特別提起以來，現在說說似乎也無妨。大主教說：「當他的人民聽他演說的時候，他們會得聽到他的話中時常斷斷續續。不過他已經深自留意，所以聽他說話的人，並不發生困難，因爲他們都能懂得他的意義。」

自愛德華退位離國以後，坎特布里又在無線電廣播禮拜時，嚴厲罵他「但求一己的快樂，不顧基督教的婚律，像他這樣處世的方針，在社交界之中，實在與他人民的優良本能相違背的。」接着約克大主教也說了同樣一番話，雖然他的觀點並不像坎大主教那樣含有報復的意味。這兩次演說，引起了人民大大的反響。在一切風潮平靜以後，每個人在最困難的環境之中總算都有禮貌，而唯有這兩位大主教卻添上了一個下流的註腳。

一九三七年春，愛德華（這時他已稱爲溫特沙公爵 (Duke of Windsor)）與辛溥森夫人悄悄地在法國結了婚。大騷動是平息了，懷着好心腸的人們都希望他們幸福無疆。



尼維爾·張伯倫

第十八章 張伯倫與鮑爾溫

一 一門三相的張氏

新任英國首相尼維爾·張伯倫 (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 是一個商人。他在英國政治界中，很可作爲一個代表人物——由中等商業階級出身，轉變爲政府要員。他的前任首相鮑爾溫，是一個米得蘭 (Midlands) 的製鐵商；張伯倫 的壯年時代，也是全部化在商業上。他是英國比較少數的著名政治家之一，既非埃東 或哈羅 出身，又非劍橋 或牛津 出身。他所進的公立學校叫做魯比 (Rugby)，從來不會進大學。

張伯倫 任首相不久，就說：「我雖不能以高貴的血統或煊赫的門第見稱於世，但我以出身誠實的商人較之先祖擁皋 皮佩虎符，更引以自傲。」不像許多前任一樣，新首相並不是一個貴族；一個豪富；一個大學者；一個像巴爾福 (Balfour) 那樣的哲學家；一個像愛士葵 那樣的古典文學家。

然而張伯倫 卻十足是個英國人，就像英國牛肉之帶着十足英國風味一樣。早至一七三〇年，張伯倫 一族，已在尉爾特郡 (Wiltshire) 做着製造麥芽糖的生意；第二代改業爲製革商，以後五代墨守着祖業。他們族中一度做過製革公司生意的，不下十一人之多。近年來大家都知道他們漸漸蜚聲於政界。尼維爾 的父親是格蘭斯東

(Glustone) 仇隙最深的政敵約瑟夫·張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 他的同父異母兄是奧斯頓·張伯倫 (Auston Chamberlain) 過了一生顯赫的政治生活後，於去年逝世。

尼維爾一八九六年生於伯明翰 (Birmingham) 現在那裏已經成爲張氏一族的管轄區域了。他比鮑爾溫少兩歲，鮑氏因爲年齡過老，不勝負擔重任，所以退讓了首相的職司。約瑟夫對於他的長子奧斯頓，從少就施以政治訓練，但是自從約瑟夫失卻了國家最高的職位以後，克紹箕裘的卻不是奧斯頓而是尼維爾，這不得不算歷史上的異數。奧斯頓有兩次可做首相的機會而兩次都失卻。尼維爾本來想以純粹經商終老的，現在卻拜了相印。

約瑟夫好動、硬直、幾乎獷野的特性，對於尼維爾有深切的影響。約瑟夫是英國史上大急進分子之一，尼維爾在做衛生大臣的任內，頭腦中存着住宅問題和社會問題，當然是他父親的一個遺傳性。約瑟夫是近代第一個帝國主義者，尼維爾在打開「帝國優惠稅率」之路的沃太樺會議 (Imperial Conference in Ottawa) 上，似乎也穿上了他父親的靴子。約瑟夫一生可述的政績很多，最重要的當推保護關稅政綱，而尼維爾就任爲財政大臣時，推翻了一百年來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代之以保護關稅政策。

尼維爾開始經商係在英屬西印度羣島，管理他父親所手創的龍舌蘭種植園（龍舌蘭爲麻之一種，其纖維可製繩），在那裏住有七年之久。他回到伯明翰以後，於一九一一年與安妮·柯爾小姐 (Miss Annie Cole) 結婚，從此她成爲他不能分離的愛侶。他說她要他改業入政界。一九一五年，他以一個鉅商的資格，被選爲伯明翰市長（他的父親做市長有四十年之久）他第二次成爲全國聞名的人物，是在勞合·喬治組織戰時內閣的時

候，首相特地爲他創立一個公務部長(Director of National Services)的職司。勞合說他做公務部長是失敗了，因爲這一部所管轄的職權，並無顯著的範圍，不免被其他各部所侵奪，所以他不久就回到伯明翰。

他第一次入議會在一九一八年，當他做下議員的時候，差不多已經五十歲了。他的升遷很快，因爲像波那·勞和鮑爾溫一樣，他也拒入勞合·喬治的聯立內閣，而在野的保守黨員中，出色人才又不多。(奧斯頓留戀於勞合·喬治的聯立內閣中，因而失卻了做保守黨領袖的機會。)尼維爾做了沒有多少時候的財政大臣，他沒有時間提出預算案——然後又做衛生大臣。當一九二三年鮑爾溫做首相時，他又邀張伯倫任財相。張氏從蘇格蘭寫信給鮑爾溫道：「今天的運氣多好啊！上午釣得兩條沙門魚，下午釣得一個財相職！」(因爲尼維爾是一個釣魚名手。)

他拜辭了財相，而愛做一個地位較次的衛生大臣，除了一度退休外，一直做到一九二九年。他在衛生部的時候，幫助平民建築了九十萬所住宅，他所提出的「分級稅估價值法」(一九二八年)和「地方政府法」(一九二九年)頗得一般輿論的稱許。當舉國一致政府組成時，他接受了財相的職位。他的預算案以正統、儉約聞於世，他取得倫敦財閥絕對的信任。他最驚人的演出是採取保護關稅政策。反對他的人，罵他刻薄對待社會救濟制度，擁護他的人，譽他爲「嚴拒浪費」。

他在內閣中的權勢日增，他在全國的令譽亦日大，當大家都知道鮑爾溫將引退的時候，他之繼任首相是必然的結果；因爲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的大時代中，他事實上已經做了首相，雖然名義上只是財相。

他是一個虔信的民主主義者，正直而又嚴肅，並不頑固但很怕羞，看過他的人不會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像勞合·喬治一樣，是個沒有特殊顯著個性的人物，既無鮑爾溫那樣的玄虛，又無邱吉爾那樣的辭藻，深恨浮誇鋪張。他辦事極肯勤奮負責，政躬健康（除了偶然要發痛風症以外），事事整飭得像藍晒紙一樣，要是現在的舉國一致政府不倒，他大概可以首相做下去。在一九四〇年以前，他無須改選。

他愛種花、釣魚、研究自然；這是他懂有的嗜好。他又極愛鳥類。在唐寧街十號至十一號之間的花園中，他特地築一座浴鳥臺。張伯倫夫人說，每天早上他們用晨餐的時候，就望着山鳥浴為樂。一九三六年皇家公園護鳥委員會的報告書中，就有新首相三次觀察的報告。第三次在二月十三和十四，他看見「大羣紅翼鵝」；第二次在一月十六和二月十七，他看見「身上有斑點的鵝」；二月十七日所看到的是不常見的全黑種；第三次在八月一日，他看見「一隻褐雨燕掠過騎衛隊」；這些都是他在聖詹姆士公園和格利恩公園散步時觀察的結果。

某次正當金融風潮鬧得非常緊張的時候，他還有餘暇投函泰晤士報說：

「主筆先生：鄙人今日於聖詹姆士公園中散步，曾見一灰色鵝飛至橋下近水開處，乾涸湖床中，啄食龜裂處之小蟲，此事頗有一記與趣。此鳥見於倫敦市中心，以前容或有人會加紀錄，但鄙人在公園中實未之前見。」

再者：為打破疑團起見，誠如余等在衆院所見，鄙人似應再加一筆：該項鵝羽現灰色，而非斑駁。」

他極其怕羞，他的知交很少。他遇到攝影記者的時候，往往遮住面孔，像這樣的照片現在還有不少保存着。還有一件很特別的事情：他高興反覆哼着黑種人的招魂曲，那是許多年前他在西印度羣島時學會的。他的後母加

妮琪夫人 (Mrs. W. H. Carnegie) 是一個美國人。

他除了必要的話以外就不談。在他最近一次預算案中，他對於三萬五千萬鎊的匯兌平準基金，只加了四五個字的說明，說這筆基金是有利的，但其運用「必須繼續保持秘密」。

在西班牙內戰中，曾經發生過一次德國巡洋艦來比錫號被不知名潛艇轟擊的案件，當時衝突幾乎達到爆發點，張伯倫籲請下院頭腦冷靜一些，言論小心一些。勞合·喬治攻擊他說：「只有魚類的頭腦才能冷靜。」

某次有一個人偶然說到他：「尼維爾？遭荒年的伯明翰市書記而已！」

二 就任的經過

張伯倫內閣組織於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其中變動甚少。蘭姆賽·麥唐納退出了政界，哈里法克斯勳爵接受他的位置而為樞密院院長（按現任外相）。聯立內閣中的自由黨領袖西門爵士繼張伯倫為財政大臣，代表國民工黨的華爾伯爵 (Earl de la Warr) 任掌璽大臣。他如外務大臣 艾登、航空大臣 斯文登勳爵 (Lord Swinton) 按現已辭職、印度事務大臣 齊脫爾侯爵 (Marquess of Zetland) 殖民地事務大臣奧姆斯貝·戈爾 (Ormsby-Gore) 農務大臣莫里遜 (W. S. Morrison) 保守黨後起之秀、自治領事務大臣瑪爾康·麥唐納 (Malcolm MacDonald) 蘭姆賽三十六歲的兒子按現任殖民大臣，仍未變更。沙崇爵士 (Sir Philip Sassoon) 任工務大臣，霍爾爵士任內務大臣，特夫·柯柏 (Duff Cooper) 改任海軍大臣，倍利夏 (Leslie Hore-Belisha)

由交通運輸大臣改任陸軍大臣。

新閣組成後，首相立刻遇到了一個嚴重的危機。原來他的預算案中，包括一項重徵利潤稅的規定，此項稅率較之一九三三——三五年的平均數，計增百分之三〇。增稅的目的據說是「建設國防」，其實動機有兩方面：一為調整資本家的獲利過鉅，一為助成英國鉅大的擴軍計劃。此舉引起了全國的驚駭，股票市場立時崩潰，在一星期之內，價格暴跌幾達五萬萬鎊。各黨議員都要求張伯倫撤回議案，甚至工黨議員也作這種主張；邱吉爾為他緩和了空氣（他引用十九世紀以剛愎著名的英首相狄斯拉里（Danreth）的話說：「在一個民治國家之內，有時必須順從民意；」）於是新首相出乎他政敵意料之外的馴服，撤回了舊議案而提出一個新議案。

張伯倫的最大任務為監督英國重整軍備。整理計劃在他就任首相以前原已產生，而現在則成為他的嬰孩了。這嬰孩是有些分量的。據估計所得，未來五年之中的整軍費，不下美金七十五萬萬元。並沒有充分的理由，英國顯然不會從事這樣鉅大的事業。人們但須一望英吉利海峽的對岸或地中海，就可以知道了。在最近英國史上，整軍計劃是一件最重大的事故，不但影響於全國人民的生活和每一產業部門，並且要重振海陸空軍——尤其是空軍——的實力和配備。這在國防上也是一件要事。英國因為不能兩面顧到，所以最近在法西斯國侵略的威脅之下，態度只好軟弱。英國如果強盛起來，就可再在外交上握着舉足輕重的力量。英國的強盛，可以穩定歐洲，這在歐洲各國都看得很明白。但在整軍計畫完成以前——事實上的完成時期要比期望的長得多——英國的政策只好模稜兩可，拖延時日。

新首相上台的最初幾個月之中，正遇着世界怒焰萬丈，擾攘不安的時候。西班牙內戰造成了一個嚴重的地中海危機。英國的商船被海盜潛艇的魚雷所擊沉，英國的驅逐艦被襲擊。張伯倫卻想與德意兩國成立友好關係與和解。他與墨索里尼交換了親善牒文。但他不得不與法國攜手巡邏地中海。湊巧遠東的烽火又燃起來。英國的利益在中國各地都受威脅，英國的駐華大使許閣森爵士 (Sir Hugh Knatchbull-Eggesen) 且受日本軍用飛機的轟炸與機槍掃射。張伯倫政府向日本遞了一件嚴厲的通牒，但卻收到一個並不十分滿意的覆文。

三 鮑爾溫

「鮑爾溫是最幸運的無能政客呢還是最機詐的有能政治家？」

——斯提特

「鮑爾溫頗有英國人的天才，樣子做得像個業餘運動家，實際是個職業運動家。」

——拉斯基

「獨裁制度像一株巨大的山毛櫸，——全盛時代看起來枝葉茂盛，樹蔭下面卻是寸草不生。」

——鮑爾溫

鮑爾溫在喬治六世加冕以後辭了職，在全球贊揚之中，成爲一個彈着六絃琴的武士，並且接受了子爵的封號。他克服了愛德華退位的嚴重風潮，襯托了帝國的一個君主，然後自己又告老還鄉。鮑爾溫畢生的事業，在近代史上是少見的。十五年以前，他是一個默默無名的人，有位保守黨著名領袖說，他在鮑氏任首相以前，看都沒有看

到他過。鮑爾溫自己曾經記錄了這樣一件事：「有位蜚聲社交界的女士」會問他的朋友說，「新首相你說是個受有高等教育的人嗎？」

無論過去和現在，鮑爾溫代表着兩種人格：一方面他是一個「約翰牛」(John Bull) 按此為普通英國人的綽號，正像稱美國人為「沙姆大叔」(Uncle Sam) 一樣，具有英國人所固有的專講實際的特性；一方面他又是一個北歐的神祕家，一個虔信的清教徒，頗得力於「精神」的價值。他不是「智識分子」，他沒有特別的機智和魄力；他解決問題時，並不經過深思熟慮，而莽撞瞎衝；他很容易為感情所動，像英國人那樣沉着的聽衆，他也能夠掀動他們強烈的感情。他一旦抱定了宗旨，沒有一個人可以搖動他的信心。他的事業是英雄造時勢的實證。有人說，「鮑爾溫精神上的寄托是最後防線。」

鮑爾溫一八六七年生於伍薩斯德郡的布特萊地方 (Bovdley, Worcestershire) —— 代表該選區有許多年。他的父親亞爾弗烈特 (Alfred Baldwin) 是大西鐵路公司 (Great Western Railway) 的董事長和鮑爾溫製鐵有限公司 (Baldwins Ltd.) 的老闆。鮑爾溫公司原為鮑氏一族所創辦，自十八世紀以來，經營已有四代。鮑爾溫本人是個典型的英國人，那就是說，他的父親是蘇格蘭人，母親是威爾士人。他的外祖父麥唐納 (G. B. MacDonald)，一位威斯力派美以美教會牧師，是個熱心的禁酒論者，曾經發表過許多反對釀酒的製。在他姨母之中，一個嫁給畫家羅·瓊斯 (Burne-Jones)，一個嫁給建築家潘恩脫 (Sir Edward Poynter)，第三個是文學家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的母親。鮑爾溫和吉卜林是嫡親的姨表兄弟。

鮑爾溫在他的自傳中曾經寫過，他青年時代有個想做鐵匠的志願；他又曾經描寫過自己如何考不取哈羅公學四年級的升級試驗。他很失望，但他說，「我在晚年也就淡然置之，因為我發現今日政界中兩位最有名的人物，也會遭到與我同樣的命運。」其中一位就是斯密士（J. E. Smith），後來晉封為白金海勳爵（Lord Birkbeck）。鮑爾溫想起了往事，不禁要說這是他不能列入第一流人才的第一次。這對於頭銜煊燁但是地位不穩的白金海，當然是個很有效力的報復，他有次譏笑鮑爾溫說，鮑氏的智力只能列入「第二流」。出了哈羅以後，鮑爾溫又入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在那裏完全庸庸碌碌的過去。他自己說「我在大學裏一無所事」。在有一次演說中他說「我所有的天賦智能，可以歸因於青年時代之未曾用功過度。」他與托洛斯基或墨索里尼實在相距太遠了！

他入了他父親的鐵工廠裏做事，未曾有一次公開演說或參加公共活動的紀錄，幾垂二十年。「我生活於逆流中，」他說。他的父親亡於一九〇八年，空起一個坐了十六年的議席；小鮑爾溫到四十一歲才在一次補缺選舉中繼任了這個議席。他在下議院中，等了四個月才作處女演說；其內容為反對礦工每日八小時工作制。他一些不為人注意，甚至漢沙（Hansard）會把他弄錯成他的父親，叫他「亞爾弗烈特·鮑爾溫」。他在下議院中做了九年議員，只演說過五次。

當一九一六年生於加拿大的政治家波那·勞任財政大臣時，他邀鮑爾溫為國會祕書（Parliamentary private secretary）。按英國上議員不能出席下議院，故上議員任部長時，須有一國會祕書為其私人代表，出席下

議院，答覆下議員責問，其地位稍次於政務次官，故非閣員。據說勞氏之所以責識他，爲的是他老實得不會施陰謀反對他，並且不夠聰明來搗亂。事實上鮑爾溫是由一位蘇格蘭人老朋友大衛遜（J. C. O. Davidson）——保守黨議員——推薦給勞氏的。一九一七年由大衛遜的保舉，鮑爾溫升任度支部副大臣（financial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按此職爲度支大臣之副座，度支大臣（First Lord of Treasury）通常由首相兼，其部務皆歸副大臣辦理，故度支部副大臣雖非閣員但較次官之地位爲重要，事實上度支部現僅爲一空頭機關，其實權操之於財政大臣（Chancellor of Exchequer 之手），這是他進身入閣之始。據羅斯提特（William Stead）在其所著深刻沉着的「鮑爾溫真相」（The Real Stanley Baldwin）一書中說，波那·勞最初躊躇不決，「他疑心鮑爾溫是否有做閣員的資格，或者能夠勝任這個「職位」。

大戰以後，泰晤士報發生了一件著名的投函案，在這次案件之中，鮑爾溫想用匿名捐助家產五分之一給國家。信末署名爲 F. S. T.，據羅斯提特所記，其中封着鮑爾溫的一張名片，當初大家不知道這人究竟是誰，後來才猜到所謂 F. S. T. 者，原來是 Financial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度支部副大臣）的縮寫，而泰晤士報的主筆，把這件祕密保持得很好。這封信極其重要，由此可以看出鮑爾溫的個性，所以這裏不妨完全轉載一下：

「主筆先生大鑒：

一九一四年八月中，我國所遇危機，爲有史以來所未有，至今固已毋庸諱言。所幸人民自願犧牲，已使國家渡過難關。當時舉國興奮，團結一致，共赴國難。最優良之男子，紛紛投軍，最優良之女子，傾家效力，最優良之老年，

從事前所未任之工作。在此四年半中，不少人士之理想，容已黯淡，然而當年精神動力，則固始終如一，躋國家於不墮也。

今日和端將現，吾人又遇另一危機，表面雖無前此之明顯，而意義則更為重大。全國資財，業已竭矣。各階級由於大戰期內過盡刻苦生活，故一反而沉溺於奢侈逸樂，追求物質之浪潮中，此種危險，正與十七世紀清教徒統治推翻後，王政復興初年之過度放縱，如出一轍。借債度日，固可取快一時，而來日方殷，則殊難先見也。

人但知嬉戲容易，殊不知不事操作，固難嬉戲久長。愚人天堂，僅與愚人地獄，一室之隔耳。

然則吾人將以何法使國民瞭解財政狀況之嚴重；及愛國勝於愛錢乎？

此則唯有以身作則，始克奏效；而今日富豪階級，固有一永不再遇之服務機會也。

渠等明知目前負債之危險；亦知將來之負擔；更知若藉國家法律，向全國人民普遍徵收資本稅，實際必有困難。然則何不請渠等自動量力輸將乎？此舉實現，則在一年之內，財部即可得款五千萬，而不須費納稅者分文。

鄙人考慮此舉，已近兩年，惟所以遲遲無所舉動者，實因不欲故事鋪張，而望有人挺身領導。茲就精確估計，鄙人共有私產約值五十八萬鎊，願以五分之一即十二萬鎊，購置新戰債十五萬鎊，獻於政府，加以註銷。

鄙人捐此微款，聊資報效，深信欲助國家，目前為最佳時機，此機一失，吾人將永難再得矣。

F. S. T. 啓

在一個不懷好意的批評家看來，一定以為除了愛國心以外，還有其他原因鼓勵鮑爾溫寫這封不平常的信。

他難道會不曉得這封信公布以後，他匿名的祕密，結果會不洩露嗎？鮑爾溫製鐵公司，在大戰期內正像其他製鐵公司一樣，很賺了一筆大錢，難道他良心上會過意得去嗎？誰又知道他之所以這樣做，不是爲了保護他自己，以免國家來抽更重的利潤稅呢？（奇怪的是跟着鮑爾溫把一部份財產捐給國庫的人很少。捐款總數還不到五十萬鎊。）

一九二一年，鮑爾溫正式達到了內閣閣員的身份，而任爲商務署署長（按英國商務不稱部 Ministry，而稱署 Board，其長官不稱大臣 First Lord 或 Chancellor 或 Secretary of State 而稱署長 President，又部長不一定即爲閣員，如工務部長郵務部長等；他方面，閣員亦不一定即爲部長，如掌璽大臣，樞密院院長等。「不管部閣員。」）他在內閣中正像在下院一樣不開口。第二年他一生的轉變點發生了。勞合·喬治的聯立內閣倒台，保守黨分成是否繼續擁護首相的兩派；而由波那·勞和鮑爾溫各領導一派。當時該黨在卡爾登俱樂部（Carlton Club）召開會議，討論他們應取的主張。鮑爾溫在一篇驚人的演說中，幫助推翻勞合·喬治的風潮；保守黨撤回了對政府的支持，從此勞合·喬治便失勢引退。

鮑爾溫原是英國要人中一個最無名的人，而他居然打倒了一個最有名的人物勞合·喬治，他的成功，多半得力於精神上和感情上打動人心。這時凡爾賽時代業已過去，所以一隻穩重自持的烏龜，代以猝然絆倒了健步狡猾的狐狸。

勞合·喬治下台後，保守黨波那·勞繼起組閣，於是鮑爾溫被任爲財政大臣，他之所以能爬到這個職位，因

鮑爾溫在家中



爲保守黨裏的要員，如奧斯頓·張伯倫、邱吉爾、白金海、霍恩（Mr Robert Horne）輩都隨勞合·喬治以俱去，因此沒有其他適當的人來承乏。他跑到美國，心中很有把握，以爲英國願付戰債，因此就以英國人認爲絕對不勝負擔的條件，與美國談判，把戰債問題解決下來（十年以後鮑爾溫自己手下的財政大臣尼維爾·張伯倫又全部抵賴）波那·勞一聽到便大發雷霆，說這個協定會把英國的生活程度降低一輩子。

波那·勞於一九二三年初因病辭職，他並沒有推舉繼任。所以英王不得不就外相寇松勳爵和財相鮑爾溫二人之間，選定一位首相。他降大命於鮑爾溫，一則因爲人品的關係，再則因爲工黨已成最大的反對黨，所以首相不適宜任命貴族。寇松聞之目瞪口呆。他說鮑爾溫「甚至不是一個公衆人物」，「既無經驗，又無聲望」。鮑爾溫從宮中謝恩出來以後接見新聞記者時說：「我不需要你們的祝賀，我只需要你們的禱告。」

四 個性特寫

鮑爾溫現在不大接見賓客；他的生活只限於故鄉伍薩斯德郡和在愛東方場（Daton Square）落成的新屋之中。人一方面給他影響最大者，當然是他的夫人露茜女士（Lucy）。有他夫人在旁邊，即使是一件他義不容辭要做的事，他也不敢放胆做去。某次報閥攻擊得他太過意不去，他一時憤感起來想辭去保守黨領袖的地位，夫人力加勸阻，才作罷論。他的兒子奧立佛（Oliver）是個激烈的工黨黨員，在政治上很給他難堪。

鮑爾溫的演講稿，都是他自己草擬的；據說他從不讀報，他所喜歡的讀物は紀元前四百年雅典史家修昔狄

提斯 (Thueyides) 的作品——帶着字典，他不愛運動，而愛吸煙，所以煙斗成爲他「人物」的象徵，可是十年前當鮑爾溫這個嗜好還不爲人所知道的時候，漫畫家爲他作像時，並不畫上一隻煙斗，因爲他煙斗永不離嘴，現在無論在什麼地方，凡是畫到他的時候，口中老是含着一隻。

拉斯基教授論他道：「鮑爾溫裝作淡泊寧靜的模樣來獲人信任，其實什麼人也騙不過；一個淡泊的人從來不會做英國的首相。他的豬和他的煙斗只是他宣傳的技巧而已。正像張伯倫的蘭花和狄斯拉里的鬚髮一樣，無非造一個使大眾能記憶的偶像，使無數信徒把他們對豬和煙斗的共同興趣，永遠當做政治結合的一個基礎。」

鮑爾溫覺得有錢只是增加負擔，所以他大半生的辰光，都化費在行善上。他雖然反對八小時工作制，但是當大戰以後鮑爾溫製鐵公司停工期間，他卻挖出自己的腰包，來付工人的工資。他頗以爲產業管理是雇主對工人的一種個人責任，猶如家門以內主人對傭僕的關係一樣。他做首相時，通過了一九二七年的工會法，「英國一百餘年來第一件不利於工會的立法」，但是保守黨極端派的政敵，卻稱他爲一社會主義者。斯提特曾經紀錄過一次他的「慷慨和喜歡暗中行善」的故事。原來有一次，鮑爾溫在葛羅賽斯德郡 (Gloucestershire) 閉步，聽見兩個老婦討論着怎樣籌款，設立一所女瘋人院，於是他收來二百張髒污的一鎊票，用舊報紙裹着，送給她們，外面還故意寫上幾個歪斜的字，當做一個「過路流浪兒」的禮物。

英國的首相，其本職照例沒有俸給，但他老是兼任一個部長，支兼職的俸祿，最普通的是度支部。鮑爾溫任首相時，他所兼任的度支大臣的年俸是五千鎊（合美金二萬五千元）；但他說他得借債度日。一九二八年五月，他

說「我在首相任內所得的每一先令，現在剩得不及一便士了」他「靠預支過活」這句話，曾為許多人所引用。可是據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星期快報」載稱，他在鮑爾溫製鐵公司中有普通股票一八一、五二六股，優先股票三七、五九一股，以當時市價計算，約值十萬鎊（合美金五十萬元）。他的債務有多少，當然沒有人知道。他並無揮霍的習慣。他所購置的唯一東西是書籍。

一般批評鮑爾溫的人，常說他懶惰。也有人說他狡猾。更有人說他太因循，太「消極」。有時他的謙遜確是很驚人的。可是一旦他認真起來，他也能夠以人為膺。他在保守黨裏，曾經掀起兩次大風潮：一次是當報關用盡種種方法想推翻他領袖地位的時候；第二次在黨外雖無第一次那樣有聲有色，但在黨內卻鬪爭得比第一次還激烈，那就是當邱吉爾、沙立斯布利勳爵及其他幾個黨內聲譽最高的人物，為了他對印度的寬大態度——至少與他們比起來是寬大的——而想排擠他的時候。

他的行動很迂緩，但他能夠大胆作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他把倫敦達雷勳爵（Lord Londonderry）擠出內閣，結果向來國會開幕前夜得在倫敦達雷邸第舉行宴會的，這次卻沒有舉行。倫敦達雷為了他做航空大臣時一句話，在選舉運動中大大地受了窘。原來他在貴族院中論到裁軍會議時說：「當時我在大眾叫囂之中，要想保留轟炸機，以備在中東和印度之用，極端困難。」

一九三五年重組內閣時，以「海盜」聞名的邱吉爾之未能入閣，對首相鮑爾溫頗感失望。邱吉爾在選舉運動中的演說，鋒銛太露，而對德國整軍一事，攻訐尤不遺餘力。事事審慎的鮑爾溫，明知邱氏努力充實國防，頗為可

取，但他入閣以後，將對政府外交，發生牽肘。當時鮑爾溫不欲將英國大舉擴軍政策，公開出來。此外也因為他自己在下院中已握有極大多數的議席，所以毋須乎邱吉爾死硬派的支持。

鮑爾溫不是一個會用陰謀的人，他曾經描寫他自己在第一次參加選舉競爭時，因為奔走運動，內心很感不安，他每晚讀拉丁詩人賀拉斯 (Horace) 的詩和希臘詩人荷馬 (Homer) 的「奧特賽」(Odyssey) 以安慰他自己的靈魂。他不愛修辭，但他卻能出口成章。他承認「帶着一些軟弱的天性，」老是「高興把不調和的事物調和起來，」但他說，他的血管裏，雖然染着無抵抗主義者的血，但是情願孤注一擲，卻不肯放棄一個主張。他為人極其好勝，其次引用羅馬時代的哲學家辛尼加 (Seneca) 的話說，「與命運相關爭之強者，為神所愛看之人。」他也說「成功不一定是件要費你畢生精力的事。」

鮑爾溫不輕然諾，除非是他能夠辦得到的，才肯答應。這也是他成功的一個原因。他的長厚幾乎帶着吉訶德先生那樣的氣息，他的忠實又是很出名的；在第一屆學國一致內閣時代，他雖然操着實權，卻不會強奪首相蘭姆賽·麥唐納的大權。他他很能超脫，例如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選舉運動正在激烈時，他突然停止下來作一次早已約好的和平演說，這番演說，至少使人得到這樣一個印象，以為他的心中已經撇開了選舉競爭的念頭。他的政治見識是非常明敏的；他第一個抓住與希特勒上台以俱來的國際關係新形態，說英國的國防線已移至萊茵河岸。最後，他頗安於其位。

一九二六年時，他對古典文學研究會發表過一次演說，從這篇初期的演說中，頗可窺見他性格的一斑：

「我記得許多年以前，曾經立在意大利佛羅棱斯市一所美麗別墅的露台上。那時正當九月傍晚，下面山谷神化於落日的餘暉中。我聽見了一聲鐘聲，那鐘聲是我在陸上或海上從未聽見過的，牠的每一個振動在我內心深處，發生一個回音。我對女居停說：『這是我有生以來所聽到的最美麗的鐘聲。』『不錯，』她回答，『這是一架英國鐘。』我去一看確實是架英國鐘。牠的聲音在英國原野上響澈過好幾代，從一座英國寺院的鐘樓上指示英國人工作和祈禱的時間。自從宗教改革以後，有些聰明的意大利人買了那架鐘……送到亞爾諾山谷，到今日四百年後，牠還能打動一個英國遊子的心，使他緬懷起故鄉。」

五 三任首相

鮑爾溫第一次任首相在一九二三年，做不到一年。當時保守黨所佔的大多數不是絕對的，他覺得很不可靠，因此決定用保護關稅為競選的標榜，而訴諸民衆。可是那時國家對於保護關稅尚無準備，於是他就失敗了。在這次任內，他說過一句驚人的話：「做首相可以獲得一個從來沒有的經驗。」

蘭姆賽·麥唐納繼起組織第一屆工黨內閣，壽命亦僅一年，因齊諾維夫案而去職。鮑爾溫二次組閣，議會中的大多數大為增加；他的第一件事便是捐棄前嫌，起用邱吉爾、白金海、奧斯頓、張伯倫等黨內的政敵，另以重要閣席。他自一九二四年起任首相，一直到一九二九年才動搖；他以「安全第一」的口號——這個口號實在奇怪得很——參加競選，結果大遭失敗。

一九二四——二九年任內，給他許多教訓。他似乎沒有足夠的興趣，抓住他的職位，因此在國事混沌、議論紛歧、和手下對他進拙劣之言的時候，就手足無措。他對煤礦風潮處置不善，——這個風潮除了把開採權收歸國有以外，便不能解決——因而引起總罷工。他想「改革」上院，即增強其力，卻遭到嘉文在「觀察報」上用極大的篇幅罵他的政府為「混蛋」。他的外交政策除了洛加諾公約差堪人意外，一切措施，謬誤叢出。他的政府推翻了日內瓦議定書，延阻德國加入國聯，鼓勵墨索里尼覬覦阿爾巴尼亞和阿比西尼亞，削弱凱洛格非戰公約的實效。以後才簽訂，成立英法海軍妥協而激怒美國的情感，破壞日內瓦海軍會議，引起了薛西爾勳爵的辭職。

但在一九三五年他第三度組閣的時候，卻得到了壓倒的多數。當國際風雲緊急，人民多願支持一個強硬、「安全」的政府時，他舉行十一月十四日選舉，可稱適當其會，這種政治手段當然是靈敏不過的。結果人民對於鮑爾溫的為人，大為贊成。原來選民並不怎樣高興投保守黨或舉國一致政府的票，他們只是投鮑爾溫個人的票。一九三七年愛德華退位，喬治加冕以後，他辭了職。

他其次說，英國永遠不高興物色一位克倫莞爾(OConnell)按十七世紀的革命家)第二但英國也許會產生其他鮑爾溫。



7
47535

(2)



編主冰寒孫 軒南吳

種一第書叢社摘文

幕內洲歐

下

譯楷學蔣 著室根

本原版一十四第年八三九一自譯

行發館書印務商



MA
D750.0
18
2:2

Inside
Europe

歐
洲
內
幕
下

文摘社叢書第一種

吳南軒
孫寒冰
主編

蔣學楷
John Gunther
著
楷譯



3 2167 9106 5

第十九章 白邸要人

「我們當前的要務，是用這種方法，和別種方法聚積、聚積、聚積產業的收入。」

——孟德斯鳩導引麥唐納語

「因為你不冷又不熱，所以我只好把你吐出口外。」

——霍斯東夫人引麥唐納語

一 沒落了的麥唐納

詹姆斯·蘭姆賽·麥唐納 (James Ramsay MacDonald) 工黨的創立者兼破壞者，被人喚作「出賣耶穌的猶太」 (Judas Iscariot)，你可稱他為英雄，也可稱他為棄婦，無論在朝在野，他都是一個孤獨的人。他的出身頗為寒賤，一八六六年生於蘇格蘭，現在英國報紙上或甚至閑談上，當然再也不談起了，但在大戰期內，當麥唐納成為愛國者的死對頭時，報上卻引證他是一個私生子。低微的出身，在他一生事業上，發生深刻的心理影響。他畢生的努力，似乎都在為補贖他童年的貧困。據斯諾登說，麥氏拜受天命為舉國一致內閣的首相時，曾經含笑說道：「明天倫敦每一位公爵夫人，都將以一吻區區為榮了。」他終於把青年時代不幸的回憶一筆勾銷，而獲償了向平之願。



大戰以前和大戰期內他的事業的紀錄是很光榮的。他在十四歲時便離開蘇格蘭的學校，自謀生活，身邊莫名一文的到了倫敦，總算在一家棧房裏找到了一個小差使，每星期賺十二先令六便士，每晚自己研究科學和經濟。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他竟會鼓足勇氣，敢與全議會作對，指斥戰爭的不是。一時他的政績幾至推翻無餘，即使現在保守黨極端派如霍斯東夫人（Lady Houson）還在「星期六評論」（Saturday Review）上，翻印他署名主張援助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工黨宣言，而加以非難。大戰期中，他以和平主義者的資格，要想到瑞典京城去參加和平大會，嗣因船上水手以罷工相要挾，禁止他登輪，他不得不絕跡到高爾夫球俱樂部去，甚至出席開會也得有警察的保護，以免被毆。工黨大眾，在當時已經背棄了他，這是很可注意的。

麥氏有兩次湊巧遇到好運道。據說一九〇〇年時，「詹姆斯·蘭姆賽·麥唐納」被選為工黨前身新組織的勞工代表委員會的幹事。但據「每日新聞」（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載稱，許多代表以為他們所選的是另外一位麥唐納——詹姆·麥唐納（Jimmie Mac Donald），倫敦工會執行委員會著名委員。當時名單上提出的名字是「詹·麥唐納」（J. Mac Donald）。蘭姆賽將錯就錯的得了勝。

第二次發生在一九二二年，他以兩票之多，勝過了克林斯（J. R. Clynes）而被舉為議會中工黨的領袖，也就是爲了反對黨領袖的資格。他在第二年做了首相。克林斯派是從格拉斯哥郡（Glasgow）英國造船業中心）而來的急進份子，他們之所以擁護他，以爲他天然會採取左傾的政策。當他初任首相時，的確有敢作敢爲有聲有色的人格。他的豐富的蘇格蘭人的口才，本能的領袖風度，辛辣的議會手腕，以及堅決的談判勇氣和熟練，把

這位英國史上第一位工黨首相造成了一個世界人物。

但是在他自己的黨內，即使初年，麥氏已不孚衆望。培南斯 (Robert Bernal) 在其「當代偉人」(Great Contemporaries) 第二六〇頁上說：「他在他所克服的世界中，永不合適。」他極好驕傲和虛榮，因此不爲屬下所愛戴；據說除了在內閣以外，他甚至永不對工黨之內坐第二把位置的領袖奧與·漢德森說話。從來沒有一位首相曾經這樣不與他的同僚相親切。他像美國總統威爾遜一樣，受不住人家的批評。於是他的黨徒開始對他怨望，說他「高高地在上。」

他有一位閣僚說：「首相從來不抽出一部份的時間和精力，與他自己黨內的黨員或甚至他的閣僚作友誼的社交，如果他這樣做，一定可以減少摩擦，增進團體精神。他一天天把他空閒的時間，消費於可厭的社會中。」有一個不經的故事，說他某次逃避各黨的擁護者，倒在倫敦達雷家裏的靠圈椅上嘆氣說：「我不能告訴你從我的閣僚那裏逃出來到文明人的隊裏，靈魂上有多少安慰。」

麥唐天生沒有幽默的感覺，他是一個生性怪僻而剛愎的人，對他手下常常看不起。在他個性當中，充滿着蘇格蘭陰霾的霧氣。他極愛受人稱頌，而像他那樣的人，又引不起硬頭的、個人主義的同僚對他發生稱頌的情緒。他所熱愛的夫人，已於一九一一年去世，他成了一個極端孤獨的人。因此他不得不轉向社交。他被倫敦達雷那班人所「收羅」，於是除了自大以外，愈無他物足以使他介意。

倫敦達雷夫人對麥氏的一生有很大的影響；她以倫敦第一位女主人的資格，對他事業與以極大的幫助，尤

其在他任舉國一致內閣的首相時。獨立工黨領袖麥克斯頓 (Jimmy Maxton) 某次在下院中間麥唐納是否已經決定「爲了愛好倫敦達雷的氣氛而棄卻紅旗」(完全是愛爾蘭人的語調。)一九三三年在日內瓦，新聞記者們特別請他吃一頓午餐；他到時間相近的時候才問倫敦達雷夫人的座位排在那裏，主人們對他說，這是一位男性的社交會，並無女性參加，他就拒絕出席，除非她也被邀請。

他有許多笑話。據說一九二九年他在赴美途中，拍無線電給倫敦，請示他——第一個工黨首相——在宴會席上應穿什麼服裝。外交部恐怕他會戴上低頂緊合的帽，穿着長統皮靴或別的他以爲適當的裝束上岸，於是趕緊拍回電去，說應戴大禮帽、穿晨禮服。

一九三五年斯脫萊撤會議以後，當他任舉國一致內閣的首相時，他使一羣友誼的新聞記者大爲驚駭，原來他叫他們離開公共餐車，等他吃完了晚餐以後再來。當時大家肚皮都很餓，可是他老人家卻要單獨佔據餐車向日內瓦開去。

所謂「舉國一致」的內閣，真是一種巧妙的辦法，用這種辦法，領袖可以打破難關，以不利的條件邀請其他各黨代表入閣。其結果可以分散並削弱反對黨，打破黨的畛域，而維持着各黨擁護的局面。麥唐納在一九三一年時，便做了第一屆舉國一致內閣的首相。他滿以爲他的工黨關係會完全唯他馬首是瞻。大概他沒有留心到他們是否會得信從他。他們居然不會這樣做。

一九三一年的金融風潮，是由兩個原因促成的，一是英國出口貿易的減退，二是英國航業和海外投資的不

振。倫敦銀行家以年息三厘向法國借入短期借款，而以年息六厘對德國放出長期放款。這樣一進一出，英國可以生得三厘的利息。但是後來不幸德國發生了金融風潮，無力償還英國的債務。這時英國存金只有五千五百萬鎊，而到期債務卻有二萬五千萬鎊。倫敦銀行家以為向美國借債，可以打救他們自己，但是紐約銀行家卻說英國的預算，已被完全合法的社會救濟費及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未曾指明名目的「賑款」佔去一大部份，除非把這種預算平衡以後，他們才肯放款。麥唐納以繼續維持金本位和主張清算債務的諾言，作為號召。他在舉行選舉運動中，用了英國未之前見的煽動手段，拿着德國通貨膨脹時期所發行的紙馬克給聽衆看，說英國如果步德國的後塵，恐怕用一百萬鎊的紙幣，還不夠買一張郵票。人民受了他的恐嚇，於是便一致贊助他。豈知麥氏一上台以後，內閣不得不採取麥氏以前誓必不行的政策。原來英國也貶低通貨的價值了。

舉國一致政府成立後，大權不在首相麥唐納，卻在財相鮑爾溫的手中。牠破壞了裁軍會議，抵賴了對美戰債；由牠召集的世界經濟會議也流產了。他方面，牠採取保護政策，把英國的關稅政策革了一下命，大大地刺激了產業復興；把二十萬萬鎊的戰時公債由五厘改成三厘半；並且在自治領根據威士敏士達議定書取得分離權以後，按照沃太權協定成立一種帝國關稅聯盟。

在他任期的中途，麥唐納的健康開始衰弱了。他的目疾鬧得很厲害；當一九三三年他到日內瓦去的時候，他的醫生得陪伴他，照顧他每一個舉動。接着又發生了一件非常事故，報關拚命的攻擊他，說他因為體氣衰弱，所以辦事沒有效率。首相召集了幾個國會探訪員，親自拿出一份書面談話，否認他患重病，說他不過「記憶力消退」。

而已。以國事爲重的主筆先生們，當然把這篇宣言壓下來。

在此時前後，他所發表的公開談話，就語無倫次起來。他對下院講到失業問題時說：

「如果在人道上可能的話，應該想些辦法出來，應該想些政策出來，救救這一部份人（即短時期內無獲業希望的失業工人），不要把他們看做廢物，不要把他們看做無可藥救的人，而把他們看做無論如何得給以職業的人，而那種職業，雖然不一定在經常開工的工廠裏，或在有組織的大規模產業團體裏，但在心理上、道德上、精神上、和物質上，對於他們卻有同等效力，要是把他們躋於這個人道主義的社會之中，這個社會，並不是永會產生最好的結果，如果我們根據富的立場從較高的文明看起來，則多半並未產生許多人所期望的善果。

「這個問題，就是我們應該應付的。」

關於軍縮問題，他對軍縮會議小組委員會全體大會說：

「諸位對於這個問題和其他問題，已經有過相當的研究，現在所遇到的是各個問題如何處置的問題，但是事實很明顯，當諸位分別看透了各個問題的表面情形以後，諸位所要知道的，就是在整個計畫的關係上，實際提出的是什麼和實際所得的是什麼。所以，當枝節的研究達到某種程度時，必須有一個人，把諸位的一切問題，都聯貫起來，草成一篇整個方案的聲明和宣言，由本會議爲給予安全保障，給予裁減軍備，給予未來希望起見，加以通過以後，才能完成諸位的使命——這個方案未擺在諸位面前的時候，諸位不能完成局部問題的研究。」

阿斯脫夫人在下院問他對於任命一個婦女為議會中的政黨領袖，是否願加考慮時，他答覆道：

「鄙人當然很贊成在行政機關中不但一位，就是六位也可以，但是將來如果貴議員找不到六個之多，或者甚至一位也沒有，則在鄙人已對閣下聲明並保證以後，究竟結果如何，鄙人敢完全相信閣下不會歸罪於我。」

當麥唐納作其中一次演說的時候，他有一位朋友從上院走廊裏望下來，看到首相頻頻停頓，急切地朝後面看，好像有個人在追着的樣子。

「你在演說時覺得不舒服嗎？為什麼老是像這樣朝後看？」他的朋友問。

「我有一個印像，」麥氏回答，「好像走廊裏有個人要從後面用鎗打死我。」

他不斷地抱怨精神疲倦，操勞過度，但是據他的職員說，他的大部份時間，都化費在注視首相官邸裏壁爐中的熒熒火光，而不披閱緊要的文件和報告。另一方面，他做外相時，外交部的一個職員卻說：「他是一個最容易應付的部長。」當德國代表團到倫敦來討論該國生死所關的道威斯計劃 (Dawes Plan) 時，麥唐納的開幕詞，把他們嚇了一跳，因為他急於要到羅西口 (Loosmouth) 去休養，所以說這次會議應在三天之內結束。

他對於一切事情，似乎沒有直接的感情，而往往以各種事情與他自己的關係方面來看。

邱吉爾在麥唐納體氣最不好的時候，稱他為「沒有骨格的怪物」，他說首相「講話的天才可算一等，但是話中很少有思想。」托洛斯基某次罵麥氏「精神完全破產」，他稱他為「一個冷酷的、畏葸的守財奴，只有一方

寸毛毚那樣大的詩意。」

麥唐納當然失卻了一切社會主義的特性，在「生活測驗」（註一）問題的爭論期內，他被她以前的關係罵爲一個「江湖醫生」、「一隻猶狸」、「一隻應該逐出政界之外的惡狗」。於是他只好過着淒涼的生活，或托庇於富者之門。某次在宴會席上，他爲自己解嘲說：「我離開這一班意氣相投的朋友，心中頗爲不快，但我不得不做煤業委員會的主席。」那批促狹傢伙說：「蘭姆賽終於把政府『舉國一致』了。」

他有一件事情倒是頗可稱道的，那就是在一九三五年春，竭力反對希特勒；他看到了德國將變成一個怎樣危險的國家。但他之所以對國社黨起惡感者，不但因爲希特勒殺戮像他那樣（理論上）的和平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並且多少受了感情的衝動，因爲德國政府還鎗斃了兩個漂亮的貴族女間諜。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舉行改選時，麥唐納被打敗——解救了他的數百萬同胞。英王喬治五世舉行登極二十五週紀念以後，他已將印讓與鮑爾溫。當鮑氏下臺，張伯倫繼任首相的時候，麥唐納完全脫離了政界。

二 新內相霍爾

狡黠、精細、嗜書、好作滑冰運動的新內務大臣霍爾爵士（Sir Samuel Hoare），常給人一種城府高深的印象。他任航空大臣時，已經嶄露頭角；曾於英印間作過兩次往返飛行。他在印度事務大臣任內所作出的印度法案，是英國議會史上最長的文件；爲了這個法案，他答覆了質問一萬五千起，演說六百次，披閱報告書二萬五千頁，參

加辯論達七年半，在議會紀錄冊中佔字一千五百五十萬，若以英文聖經來比較，等於該書二十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大部份工作期內與他抗辯的人，溫斯東·邱吉爾，是下院中一位最有才幹的雄辯家。

一九三五年鮑爾溫任首相，邀霍爾擔任外務大臣，一半爲了契重他的才能，一半也是爲了報酬他在印度大臣任內的動績。印度法案的本身，可說代表鮑爾溫型的政策，完全是一種折衷的辦法：一方面允許印度自治，一方面卻由英國保留基本統治權，因此對印度的民族主義者和英國保守黨的死硬派，兩面都不討好。

甘地正像霍爾一樣，因爲他說霍爾對於辦不到的事，就直接了當的說個「不」字，不像麥唐納那樣遇見辦不到的事時，常虛詞掩飾。這位印度偉大的領袖，對於前任印督歐文勳爵（Lord Irwin）按即現任外相哈里法克斯，極表傾佩，雖然他們倆的政見完全不同；他某次對他說：「你知道我信任霍爾，正像我信任你一樣」——這樣的恭維在甘地的字彙裏已經是很高的了。

霍爾出身於英國著名銀行家的家庭。他曾經學過一些粗淺的俄文——他的教師是帝俄駐英使館的翻譯員和正教會唱詩領班——大戰期內赴俄任英國情報員。他的工作做得很專門，據一九三三年他自己在一篇演說中透露，幼皇責他預先知情俄帝嬖倖拉斯蒲丁（Rasputin）的暗殺。霍爾於一九一七年二月離俄，隨米爾納勳爵（Lord Milner）赴意，任參謀官之職。戰後他在捷克住了一些時候，至今還做倫敦英捷協會的會長。同時自一九一〇年以來，他聯任保守黨下議員，代表齊爾西選區（Chelsea）。

霍爾在文學上對法國的感情很濃厚。作者最近在「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上讀到他夫人的姑婆愛美·高涅(Aimée de Coghny)對於法國十八世紀大詩人雪尼的「年青女俘」(André Chénier's La Jeune Captive)受着很大的靈感。正像外部常次范希達爵士一樣，他的作品在法國文學刊物上常有刊載，而他自己也精通法語。一九三五年十月，他引起下議院一次小小的驚動，因為他以外相的資格，引用了法國文學家普魯斯(Marcel Proust)的一句話，這在英國議會史上又是一件創舉。霍爾在感情方面親法甚於親德；像這一類的考慮在政策上頗佔相當重要。

自意阿議和草案「霍爾賴伐爾計劃」揭露後，他的聲望曾暫時墮落。他顯然是一隻代人受過的羔羊，所以自辭去外相以後六個月，他又入閣為海相——一個與外相同等重要的位置。有一件事情，常常作為取笑的資料。二月間他對齊爾西區的選民解釋阿和案時，曾為他赴巴黎去會滑頭政客賴伐爾之舉作辯護。他說他本來不願意去，但是英國駐法大使打破了他遊瑞士的行程。他的信上說：「我無法拒絕，雖然我取消了原意以後，就不得不與穆德夫人(Lady Mand)和行李相失散了。」

如果張伯倫有一天辭職，霍爾的繼任首相的呼聲很高。

三 國聯砥柱艾登

艾登(Anthony Eden)之真誠嚮向和平，不是沒有緣故的。他的弟兄全犧牲於大戰，大哥愛德華陣亡於法，



艾 登

幼弟威廉·尼古拉殉難於遮特蘭 (Turinad) 海戰，只有十六歲。

艾登生於一八九七年，繼任霍爾爲外相，在今日世界政治上，是個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的母親是位著名交際花，他的父親威廉·艾登爵士 (Sir William Eden) 是位鄉下紳士，也愛好藝術，某次曾與畫家兼雕刻家輝斯勒 (Wistler) 發生著名的爭執。他的家庭關係是紳士階級的典型。他的夫人爲貝克特爵士 (Sir Charles Beckett) 之女，他有一次曾與華慧克伯爵夫人 (Frances Countess of Warwick) 相競選，這位伯爵夫人的底細，恐怕只有專門研究家譜的人才弄得清楚。她是貝爵士 姊妹的婆婆，又是他夫人後母的姊妹。艾登 七歲時便參加大戰，在伊泊爾 (Ypres) 中過毒氣，二十一歲時升任上尉。戰後他仍回到牛津 大學基督教學院繼續求學。當時他對政治並無絲毫興趣，甚至連同學會也沒有加入。他研究東方語言，得過第一等獎，他在大學時代唯一著名的活動恐怕就要算他所作的一篇論文——法國畫家賽尚 (Cezanne) 論。

不久他就獻身於政界，他升擢得特別快。他具備青年政界中人的各種必要條件，高貴的門第，牛津 畢業，參加戰役，漂亮的夫人，寬裕的家產，華貴的服裝，英俊的面貌。所以一九二六年，他便成爲外相張伯倫 的政務秘書。這一半因爲機警的鮑爾溫 看中了他，一半因爲保守黨的領袖英格新進。一九三一年，他擢任外交部政務次官，當西門爵士 的聲望在日內瓦 和白邸 失墜後，艾登 便代之而與。他大半力量用在日內瓦。一九三四年時，他雖然擔任掌璽大臣 的職務，實際上卻是一個外次；一九三五年他以不管部閣員入閣，專心辦理國聯 事務。

艾登 達到這個職位，不僅由於他對和平的真誠，以及他爲人的可親，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的原因：第一，他生性

不落英國正統派政客的窠臼，這一點特別可以注意，因為他的外表極其適合一般潮流。他習波斯文，倒有些古怪。某次他在瑞典被邀參加狩獵，不肯用鎗打死一隻壯鹿，因為牠「太美麗了。」第二，他在外交部中具鮑爾溫的嫡系，鮑氏之所以引進他爲的是要把他對抗保守黨所厭棄的西門。第三，外部常任官都擁戴他。

艾登是個幹練能耐的談判家；當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在馬賽被刺後，他竭力調解南斯拉夫夫人和匈牙利人，使他們修好，此舉猶如他使戈林和德國國會縱火案嫌疑犯第米洛甫接吻一樣。他是英國閉員之中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到俄國去的第一人；這件事情需要最大的手腕、彈性和坦白，因為蘇聯對於英國的政策，懷疑甚深，而英國保守黨則視史丹林及其部下含有毒汁。艾登和史丹林卻一見如故。自意阿爭端發生後，艾登在英國政治上的地位日增；他成爲和平主義者的瑰寶，如果他一離職，內閣就有倒臺的危險。在千百萬英國人的心目中，艾登這個人物就等於和平。

「霍爾賴伐爾計劃」失敗後，艾登爲什麼不辭職呢？大概因爲同出一個桃李門牆的關係，把他拉住在內閣之中，繼續效忠於他的首領張伯倫。

保守黨中有不少死硬派，不歡喜艾登，但是祇要張伯倫繼續做首相，他的地位是很穩固的。

（譯者按：作者這個推測是錯誤了。艾登終於孤掌難鳴，敵不過死硬派之親德親意的一貫政策，於一九三八年二月憤而辭職，由掌璽大臣哈里法克斯繼任外相。但張伯倫內閣卻依然未倒。艾登辭職不久之後，即有德奧合併之舉。據一般人傳說，希特勒之膽敢進軍維也納，是先得到哈里法克斯和張伯倫的默契的。接着四月間又有英

議談判的成功，英國實行對意妥協。五月國聯召開常年大會，英國且領導着正式承認意國吞阿，而把繼續在抗戰之中的阿比西尼亞逐出了國聯。回憶艾登時代英國的強硬外交，真是令人不勝有今昔之感。不過我們不要以為艾登會長此在野的。他的一封辭職書，曾經贏得許多人的眼淚，當時機成熟的時候，無疑地他將東山再起。

四 新外相哈里法克斯

我們已經提過好幾次，薛西爾勳爵 (Lord Cecil) 是英國裁軍運動最前進的「使徒」。這裏也應該一言提及哈里法克斯勳爵 (Lord Halifax)，所謂英國官場中之「至聖」。正像許多英國上流社會的人士一樣，他的名號也換過好幾次了。任農務大臣的時候，他叫做愛德華·伍德 (Edward Wood)；任近代最著名的印度總督時，他叫做歐文勳爵 (Lord Irwin)。自從他父親死後，他便襲封為哈里法克斯勳爵。他本任掌璽大臣、貴院領袖，且為艾登的外交幫辦。他像西門及其他智識分子兼政客的几个英國人一樣，是牛津大學萬靈學院 (All Souls) 的一員，這是一種殊榮。自一九三三年起，他任牛津大學校長。他虔信宗教，是保守黨中的自由主義者。因為他的恬退、超脫、淡泊以及道德的高尚，使他成功了英國政界的聞人。

五 保守黨的其餘諸子

愛禮歐 (Walter Elliot) —— 以前稱「少校」，現在稱「先生」—— 一度做過糧食管理部部长，現任蘇

格爾軍務大臣。他最初投身政治生活的時候，是個「費邊社會主義者」(Fabian Socialist) 按即主張不參加直接鬭爭而以和平感化手段宣傳社會主義，以期改革社會制度的分子。工黨的成立頗得其助，但現在卻改入保守黨。他最信仰「計劃經濟」這個時髦的口號。他從事改良英國農業的實驗，他設計了許多複雜的津貼制，比例限制，和推銷辦法，這一切都是必要的，因為英國如果完全採取了農業保護政策，則英倫三島的人民就只好餓死。他的父母本來教他習醫，但他自己卻要做一個政治上的科學家。在他看來，預言家威爾斯(H. G. Wells)的各種計劃，還不夠味兒。愛氏批評威爾斯一篇「不列顛往何處去？」(Whither Britain?) 的演講說：「他一開篇就把自己囿於十九世紀。」

正像許多英國人一樣，愛禮歐很會做打油詩。他在對亞伯丁大學(Aberdeen University)所作的校長致辭中，曾說定命論的哲學，可用下面一首詩表現出來：

「啊狗屁！我終於認識了自己，

正像在宿軌中行動的東西，

我甚至不是一輛公共汽車，

而只是一輛電車，——行在地底！」

他描寫天文學家詹姆斯·瓊斯爵士(Sir James Jeans)說：

「啊嘯！他的相貌雖然愈長愈糊塗，

不管他們怎樣說，我要行我素。

因爲我不願做一輛地底電車，

卻願做公共汽車——在地上代步。」

當他在格拉斯哥大學 (Glasgow University) 做學生的時候，曾經寫了一篇「豬獾頌」，其中有一聯如下：

「汝在世兮爲人所嘔，

汝歸天兮味極可口。」

他的經濟建設觀念是屬於正統派的；他以為放任政策的資本主義，可以產生出「有關國家」。他是一個專靠經驗的家伙，據說他之所以能安做農務大臣，爲的是換了一個人，就不懂得他所頒布農業條例的複雜內容。結果當然引起了各自治領的磨擦，因爲他們互相爭執着要多向英國本國輸出肉類；並且提高了英國消費者糧食的市價，以維持生產者的生存。

奧立佛·史丹萊 (Oliver Stanley)，前勞工部長，現商務署長，是德貝伯爵 (Earl of Derby) 的兒子，娶了倫敦達雷動爵的女兒穆倫夫人 (Lady Maureen Stewart) 爲妻。他像多數保守黨政客一樣，大戰期內立有功勳；但與他們不同的是，他有急智。某次他說社會科學著作家的血管裏也有「藍皮叢書」。在大罷工期內，他曾自告奮勇，在威士敏士達地底電車站裏服務。承認錯誤是英國政治的特色，所以當生活測驗條例失敗時，他就引咎

辭去勞工部長的職司。他說：「我不能逃避其錯在我的責任。」可是他未曾解釋當初爲什麼要犯這個錯誤。工黨首相麥唐納拒絕他辭職。

現任海軍大臣古柏 (Alfred Duff Cooper)，狄安娜夫人 (Lady Diana) 的丈夫，在保守黨中，高人一等；聰明、好辯、剛愎、外交政策健全，富有自由主義思想。他與外交大臣艾登、殖民大臣奧姆斯貝·戈爾，同稱保守黨內閣的「少壯派三傑」；與強化的老頭政治家成爲強烈的對照。做了多年次等角色以後，古柏終於在一九三五年冬任陸軍大臣，他在任內頗顯出他的手段。當時他與海軍大臣霍爾（現任內務大臣）和航空大臣斯文登（一九三八年五月辭職，遺缺由衛生大臣伍德繼任）共同切實負責發展擴軍計劃。需要放大砲的時候，他就毫不遲疑的往前猛衝。他在陸相任內，曾對擁護和平的主教放了一支冷箭；一九三六年六月間在巴黎，他用法語作一篇聳人聽聞的演說，暗示英法同盟，因而引起一件小小的風波。他只有四十六歲。他夫人的美貌和交際手腕，對於他的事業影響很大。他的幼兒像他父親一樣，將來也要進埃東公學。古柏著有兩本評傳，一本論法國政治家泰勒朗 (Talleyrand)，很出色；一本論英國名將海格元帥 (Field Marshal Haig)，稍次。

神祕的殷斯吉浦爵士 (Sir Thomas Inskip)，現在已是六十多歲的老頭兒了。一九三六年春他擢任國防調整部長，大出衆料之外，殷氏虔信宗教，尤其穩健可靠，所以據說他將來頗有充任首相的希望。有個挖苦他的故事說，殷氏被任爲國防調整部長，是因爲鮑爾溫要找一個「比他本人才能稍次的人物」。殷氏以前做律師時，很幹了一番事業。（張伯倫組閣時，他仍蟬聯國防調整部長。）

六 自由黨首領西門

現任財政大臣約翰·西門爵士 (Sir John Simon) 在一九三五年的總選舉中，也是膺選者之一，雖然他一派擁護聯立政府的「國民自由黨」人數減少了，無論怎樣不孚衆望，西門在內閣中的地位總是很穩固的，因為「國民」內閣的面子如果要維持下去，他所代表的自由黨就非羅致在內不可。這對保守黨方面當然要引為不滿；麥唐納的「國民工黨」在下議院中只有七個議席，卻佔了三個閣席（自湯麥斯 J. H. Thomas 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因預算虧空案辭職後，減至二席）；西門的自由黨只有三十三個議席，也佔了四個閣席；保守黨議席達三百八十四，僅僅得了其餘二十二個閣席，教他們怎能滿意呢？

西門是英國現代一位最著名的律師，也是一位最惡劣的外相；他老是要想沽名釣譽。這是他一生的悲劇。除了麥唐納以外，關於英國政界中人挖苦的故事，要算他最多了。

有一個故事講：他常常苛於責人，卻忘記了他自己的過處。

據說勞合·喬治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西門騎牆騎得這樣長久，直到他懷喪欲絕。」

有一個外傳說：西門發現了一位很有地位的相識可以利用一下，於是親身去拜訪他，把手臂圍在他的肩膀上，但是把他的教名叫錯了。

嘉文講到第一屆舉國一致內閣「心不在意」的外交政策時說，西門給人一個印象，走路就好像踱方步的。

樣子。

還有一個故事說西門爵士打高爾夫球時，老是把球打不中穴裏。

據說他無論什麼事情，都要經過一番思想以後才會瞭解。

勞合·喬治說，有一次他真發脾氣的時候，「有許多比他好的人在他之前脫離下院，但是沒有一個人在他後面留下這樣一種偽君子的嬌柔做作的痕跡。」

斯諾登說：「西門爵士是政府和他自己的一個廣告家；但是他如果能夠覺到他在崇高的職守所作可憐的失敗，那末他就該躲到一個角落裏，銷聲匿跡，使人淡忘，不致有傷國體，再不應該在公衆面前出現了。」

西門當然不是像這些故事所講那樣一個可厭的人。他特別膽小、孤獨，而急於想出風頭，不敢得罪於人。不過他爲國效勞的確也有好幾十年。

他任外相時的不孚衆望，多半由於在日內瓦討論東三省事變時竭力贊助日本的結果。日本代表松岡洋右告訴他的朋友說，西門在一刻鐘內所說的話，可以抵得過他在幾星期中所想說出的話。在東三省爭端期內，西門觸犯了美國；他喪失了國聯的權威；軍縮會議的失敗，也是應當由他負責的。

西門在英國大罷工期內作了一次歷史的演說，聲稱此次罷工爲非法，這篇演說尤足破壞工人的精神。他不得勞動界的愛戴者以此。

他任印度法案審查委員會主席時，草了一本好幾百頁長的報告（未發表以前是種空文），其中對於甘地

的名字，幾於絕口不提。

最後，西門任內相時，又應該對防毒指南的出版負責，沒有一方面人高興讀那種東西，這也是他常常遇到的壞運氣之一。

七 風中之燭的勞合喬治輩

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大選舉中，反對派自由黨事實上完全失了勢。一度做過該黨領袖的薩穆爾爵士 (Sir Herbert Samuel)，一位學問淵博的猶太哲學家，失去了他的地位，繼任者為亞契巴·辛克萊爵士 (Sir Archibald Sinclair)，一位帶着一半美國血統的青年蘇格蘭人，曾以溫斯東·邱吉爾的秘書開始政治生活。辛克萊是個忠實勇敢的人，他爲了不肯放棄自由貿易的政策，忠於舊「自由黨」的殘留主張，情願犧牲——暫時的——他的地位，當沃太樺協定成立以後，他離開了下院，並且辭了第一屆舉國一致內閣的閣席。

勞合·喬治 (David Lloyd George) 及其家屬團體，在一九三五年選舉中依然倖存，他們是「獨立」自由黨。勞氏本人聯任下議員至四十五年之久，這是英國議會史上一個驚人的紀錄。但在他一生事業的末頁，這位偉大的威爾士人卻在鬪爭着一個比政敵更厲害的敵人——時代。他最後幾次演說，在內務方面無論怎樣出色，卻不能引起注目於外務的朋友的興趣。勞氏晚年的態度傾向於親德，這無異地是他對凡爾賽和約的贖過。

勞氏一派的自由黨，很想與工黨共同組織聯合陣線，但是到現在為止，工黨並沒有這個意思。

八 無線電大王李滋

約翰·李滋爵士(Sir John Reith)的身材很高，他是「英國無線電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極有勢力的董事長，雖非白頭貴人，但是波特蘭廣場(Portland Place)上那座最新式的電臺，在不列顛的生活中，卻比多數政府機關重要得多。李滋的性格是很複雜的，「他是一位虔誠得發狂的清教徒，畏懼地獄，但又懷疑天堂；」他用「一隻鐵手統治着英國廣播電臺。」他巍梧得好像一座黑塔，一隻眼睛燃着凶焰，一隻眼睛卻不怎樣嚇人，口中永遠不說話。」「他的微笑是這樣少有，這樣可愛，簡直就像海市蜃樓一樣……他沒有知己，就是普通朋友也很少。要從他的職員中來探聽他是沒有用的，因為他們不熟識他，他也不熟識他們。」(以上引「新政治家」雜誌中隱名作家的話。)

李滋是個蘇格蘭人，其父為格拉斯哥的一位牧師，他的工程經驗很豐富，最初任職於海軍部土木工程司，後來任威廉·皮特摩父子煉鋼公司(Wm. Beardmore and Sons)的總經理。他使英國無線電廣播公司造成一種不信仰英國國教的印象。他又使之成為全世界最優良的廣播組織。即使社會主義者也高興該公司，因為該公司是根據「憲章」辦事的一個公共團體，該公司與國家的關係也是帶着半社會主義的。李滋氣量雖然窄狹，卻頗具才幹，如果他高興入政界，一定可以創一番大事業。

大家都說英國無線電廣播公司的僱員如果在離婚案中是被判為有罪的一造，或「被控為有不正当的性

行爲者，」就保不住他的飯碗。

九 英蘭銀行總裁挪曼

「非有激烈的辦法來拯救，則世界各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必將於一年內崩潰。」

——挪曼一九三一年語

從一九二〇年起，挪曼 (Montagu Collet Norman) 就做英蘭銀行的總裁，他先天是個銀行家。他的祖父和外祖都是該行董事，其中一位且做了五十餘年之久。他進過埃東公學、國王學院和劍橋大學，參加過南非戰爭。他在商業銀行中服務了好幾年，像其他大銀行家一樣，個人方面對金錢並不發生興趣，也不是一個富翁；在他看來，金錢和金錢的機構只是一個引人入勝的問題，他以外交家、數學家，甚至創造的藝術家的態度來對付。

他不同凡俗的古怪脾氣是很著名的。他要什麼就有什麼，因為他做英蘭銀行的總裁，比歷史上任何人都長。他娶了一位離婚婦，但宮中邀請他的時候，她也被列在內。他的服裝很奇特，愛戴寬大的便帽，邊緣下垂的黑禮帽，還蓄着一臉滑稽鬚鬚。他的住宅築在倫敦坎普頓山 (Campden Hill) 上，裝飾得窮極縹緲。可是他每天早上去辦公的時候，卻坐着地底電車，而且愛最後跨上自動電梯。他老喜歡做出神祕的樣子，一生只作過三次公開演說。挪曼頗有滑稽性。當南非戰爭以後，他回到本鄉倍特福郡 (Bedfordshire) 的時候，全市人民熱烈歡迎他，因為他是他們最超越的戰士。他們請他坐上馬車，拉上一個陡峻的山坡，送他到家裏去。半路上村民攔住車轅看，

車子是空的。挪曼上尉到那裏去了呢？原來他正在車後推！

坎普山上挪曼的住宅，雖然在倫敦市中心，卻頗帶有鄉村風味。那裏有一塊蘋果園，一塊玫瑰畦，和一個養着金魚的小池。但像大多數倫敦人一樣，他卻愛好真正的鄉下。每到星期六下午，他老是到他兄弟在后德福郡（Hortfordshire）的麥處哈鄧村（Much Hadham）的田園精舍中去，而且每次他去，總是喬裝而行，穿着法蘭絨褲，腳管上夾着一副騎自由車時所用的鋼夾，戴上一頂鮮紅舊時的軍帽。他連腦子也要裝飾一下——用吉卜林的詩。

他和美國有一位年已八旬的女富豪是很親密的，幾乎每年都要祕密去看望她一次。據說她的兒子在英國會與他同學，有一次他們乘假往美國旅行，他的同學被汽車撞死。挪曼爲安慰他同學的母親起見，從此便當做他的兒子一樣。

憑着他的經驗，挪曼是個傑出的人才。但是他的長處，還不僅在經驗。他對於處置金融問題，尤其驚人的本領。在談判的時候，有靈敏的手腕和魄力。正像其他的英國人一樣，他在外表上是很謙虛的；一九三二年十月時他說：「困難是這樣大，壓力是這樣多，先例是這樣少，兄弟簡直不知道對整個問題從何着手。……此事在兄弟實是在是太重大了——兄弟承認目前尚無適當的辦法。」

某次當他和一位銀行家的朋友作密談時，聽了金本位會使英國終於陷於窮困的辯難，做出不懂的樣子。他問他的朋友說：「請你告訴我，你以爲富比窮好嗎？」他的朋友回答：「我從前很窮，現在很富了，我想再富一些。」

挪曼答稱，他相信太富的國家，會得崩潰，他還指出古代的雅典和羅馬帝國作證。他的朋友並未將談話的內容洩露出來；大家都不知道這位英蘭銀行的總裁，爲了國家的福利起見，會把淪陷他的國家於窮困當做自己的責任。

一九二五年英國恢復金本位，他當然主張最力。結果英國的產業大受打擊；但像多數中央銀行的總裁一樣，他崇拜黃金。他力請財政大臣斯諾登維持金本位（斯氏毋須他人的勸誘已經作這樣的主張），所以一九三一年的金融風潮，可說是他在幕後造成的。他也曾經承認各國（尤指德國）產業界頗有能力「舉借短期借款，如果各放款者事先不知此事，問題也許就不會發生的。」倫敦各大銀行顯然並未合作；他們競爭着把款子放出去。據說英國最後不得不放棄金本位時，他驚惶得暈過去。

大家都知道挪曼極其傾佩德國中央銀行總裁沙赫特博士；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總裁，關係原是很密切的，他之佩服沙氏的機警手腕，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七年，當時他們倆一同出席紐約開會，沙氏反對各國採取寬大的貨幣政策，挪曼卻贊同這種政策。後來事實證明沙赫特的意見是不錯的，因為當美國金融界不穩定的景氣崩潰時，就引起了世界經濟恐慌；從此挪曼就尊敬沙氏的眼光遠大，也就證明了挪曼的眼光沒錯了。

陶爾頓（Hugh Dalton）任第二屆工黨內閣的外交次官時，曾經紀錄挪曼的外交政策如何與他自己的不謀而合。他們倆好像一對「雙簧」，真正的外交部無論怎樣做，挪曼的政策總是根據下面的觀點：「除非德國在經濟上強固而繁榮起來，即不足維持法國單面政治力在歐陸的均勢。」當一九三一年奧國發生金融風潮，羅斯契爾銀行（Rothschild Bank）行將在維也納倒閉時，挪曼便給奧國墊了一筆正照奧國所希望那樣大的信

用放款，把風潮平復下去。兩年以後這筆放款從英蘭銀行的賬上轉到財政部的賬上，換言之，轉到英國納稅者的頭上。

挪曼雖然是一位重要人物，但是現在英國的財權，並不單獨操在他的手裏。以前斯諾登固然聽命於他，但是尼維爾·張伯倫卻不是這樣。自金鎊貶值以來，財政部的重要超過了英蘭銀行，因為財部以三萬萬鎊（合美金十五萬萬鎊）的基金，設立一個國際匯兌平準局，因此奪去了該行的一個基本職權。挪曼頗想擡高鎊價，使其趨於穩定，甚至想恢復金本位。財部則主張抑低鎊價，並且在某種限度內使其價格常有變動，以便減輕預算上國債的負擔，同時又可給產業以鼓勵。這兩種財政政策當然是矛盾的，但是到現在為止，得勝者還是財部。

十 奧斯頓與邱吉爾

政客外表與內性的矛盾，沒有一個國家再比英國明顯的了。例如奧斯頓·張伯倫爵士（Sir Austen Chamberlain）便可作為代表——他於一九三七年春正當他的同父異母兄弟尼維爾受任為首相以前突然辭世。二十年來，漫畫家都把他畫成一個鐘乳，一個冰柱的樣子，帶着古板的單隻眼鏡，下頰特別突出。事實上奧斯頓卻是一個活潑的七十二歲的老年，為人非常和藹可親，又是滑稽突涕。他更是一個人格高尚、性情溫和的人道主義者。除了首相以外，他幾乎做過每一要職。要不是為了忠於同僚，他就有兩個做首相的機會。一九三一年他為斐拔新進，辭入舉國一致的內閣。自那時起，他在全國的勢力不但不會降低，反而實際增高。這因為他在下院的力

量，比任何政黨領袖還大，就是邱吉爾也及不到他。他是保守黨的最高統治者之一。當他對霍爾賴伐爾計劃表示不滿時，這個計劃只好成爲畫餅了。大家都知道他是親法反德的。

溫斯東·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像其他許多英國政客一樣，氣概要比他的年齡青得多。就他的活潑和英國一般要人不服老的傳統而論，他的六十二歲實際上好像還在兒童時代。他當然歷任各要職，而且不限於政界。這位馬爾巴羅 (Marlborough) 按十七、十八兩世紀之交的英國名將) 的後代，母親是個美國人，經驗極其豐富，志向也是很大，做過兵士、水彩畫家、新聞記者、史家、砌磚匠、行政官、和雄辯家，性情非常冷僻，手段極其辛辣。據說他有一個「複雜」的頭腦，極講究辭藻；但在風格的華美和條理的分明上而論，近代英文書籍能與他的「世界危機」(World Crisis) 一書相抗衡的就很少。邱吉爾人格和智力的缺點，在於事事不澈底。最近他狂妄得少一些，至少就外交政策上而論是這樣，因爲他畏德國甚於畏蘇聯。英國重整軍備計劃的促進，邱吉爾之力爲多。據說他的判斷力不完全；他的舉動過於乖張，主意太拿不穩；不過一般人都相信英國一旦有事，他將成爲民族領袖。

十一 報閥裴佛布羅克

全世界銷路最大的日報，當推英國的「每日快報」，現在的銷路有二百五十萬份，不久就可增至三百萬份。這家報館的老闆便是裴佛布羅克勳爵 (Lord Beaverbrook)。他的野心永遠在商業、政治、和報業三方面兜圈。

子。他與鮑爾溫的深仇一半已經爲人遺忘了，他對於自由貿易與美修好與歐陸孤立等運動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他的好客全球聞名；交友幾遍天下，全世界的朋友莫不稱他可親。斐佛而羅克原名威廉·馬克斯完爾·埃德根（William Maxwell Aitken），晉爵以後始改今名，是英國的「報閥」大王，在英國要人之中，可算最會掀風作浪，最具卓見，最有精神的一個。

斐佛而羅克的父親是個長老會的牧師，一八七九年生於加拿大的翁太略省（Ontario）。他出身很窮苦，但到三十歲時已經以電力廠和水泥廠起家，至少賺了一百萬鎊的錢。於是他棄卻商業，跑到英國運動作議員，成爲波那·勞的至友。十年以來，他老是隱身幕後（雖然一度入閣過）牽動着閣員，就好像傀儡一樣。他曾使波那·勞與勞合·喬治攜手結成同盟，也會陰施手段推翻愛士麥。不久他對政治倦勤，同時他的身體也時常有毛病。於是他接辦「每日快報」，創辦「星期快報」，控制「標準晚報」，從此成了英國報界無情的促狹鬼。

（註一）所謂「生活測驗」（Means Test）者，即是調查失業工人是否適合救濟資格的一種方法，調查時以工人的家庭爲單位。如果失業工人的子女僥倖能賺到一個先令，則其父的救濟金中必須減去一個先令。結果離開了千萬青年人的家庭。一九三四年的新立法更把失業救濟費的數目減低。

第二十章 左翼與右翼

「一個革命黨如果不會得到大多數革命階級的前鋒或農村人口的擁護，則舉事就無法成功。舉事不但需要大多數人的擁護，並且需要把革命的浪潮，推及於全國，需要完備的精神，和舊政制的破產——再加上這班不堅決分子有自身地位不安全的深切感覺。」

——列寧

一 左翼鳥瞰

英國的社會主義有一種特質，就是沒有革命性，無論貧民區的生活怎樣暗澹，兩百萬的失業工人怎樣受苦，克利布斯的口才怎樣流利，也不能使之具有革命性。在那個像密爾斯基（Mills）所謂「最低微的白領書記也自以為與工人不相為謀」的國家裏，要把窮人團結起來，那是很困難的。英國之所以能夠復興，一半犧牲了勞工階級的利益才能辦到；而這種復興辦法未嘗稍增工黨獨立工黨，或微弱的共產黨的票數。

工黨本身，原是費邊主義所謂「漸進的必然性」的產物，牠到一九一八年才始正式宣布採用社會主義。馬克斯學說對於英國社會主義者的影響比較微小；當第一屆工黨政府組成時，不但有在可能範圍以內不採取社會主義辦法的默認，並且還有不這樣做的諒解。代表八百萬英國工人的工會，直到一九二四年才正式宣稱服膺社會主義。托洛斯基曾引用麥唐納的話說：「革命只是一個大破壞，大災難，此外便一無所有。」

陶爾頓說，工黨被召組閣時，牠只有三條路可走。第一，牠只有拜辭大命，因為牠在下議院中沒有壓倒的多數。第二，牠可以拜受大命，採取「一些勇敢的社會主義辦法」，被人打倒然後訴諸民衆呼籲改選。第三，牠可以大度地坦白地與舉足輕重的自由黨合作。然而這三條路麥唐納內閣卻一條也沒有走，牠只是徬徨着。

一九二九年大選中，工黨在下院獲得二六一個議席，這個數目是很驚人的。但在一九三一年金融風潮發生，和舉國一致內閣組成以後，議席減至五十七。一九三五年議席又增至一五四，雖然反對黨的成份只構成百分之四六。局面之所以沒有好轉，有幾個原因：第一，舉國一致政府誇言牠會致國家於繁榮，事實卻並不如此。第二，工黨的外交政策是辦不到的，因為一方面牠擁護政府實施對侵略國的經濟制裁，他方面則又不合邏輯的反對重整軍備。

整軍問題近幾年來對於各國左派政黨是個不幸的問題。如果他們的目光遠大一些，他們會採取必要的步驟，以備一旦有事，可以抵禦德國。但是如果他們擁護整軍，擁護強固的政府，則他們無異幫助資本主義，使其更強起來，因而破壞本國社會主義改革的期望。左派的第一個任務是擁護蘇聯。然而因為德國是蘇聯主要的假想敵，所以他們要擁護蘇聯，唯有增強反德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因而使這種國家地位更加穩固起來，足以破壞國內的革命。

英國的工黨，患在領導乏人。自奧叟·漢德森（Arthur Henderson）逝世以後，尤感羣龍無首。漢德森是一位勇猛的人物，他的精神和身體受到軍縮會議牽延的打擊很大。他所發表的言論，是他的下手沒有勇氣或能力

可以摹倣的。據「新政治家」雜誌說，他任第二屆工黨內閣的外相時，他的一位屬僚建議他拍電向墨索里尼和教皇致賀，意國政府承認羅馬天主教爲其國教的「接特倫條約」(Lateran Treaty)與奧大叔卻回答說：「我不拍電向教皇致賀，因爲我是一個衛斯力美以美教徒，我也不拍電向墨索里尼致賀，因爲我在一篇公開演說中，指摘他爲謀殺馬梯奧蒂的兇手。」

在當代工黨首領之中，最可注意的是莫理遜和克利布斯。

二 工黨倫敦市黨部首領莫理遜

「未來社會主義的部長，必須是一個爲公眾利益效力的人，就好像一個最能幹的資本家或董事長對私人利益效力一樣。……社會主義應該是一種健全的公共事業，其社會道德也應該健全，這是必要的。」

——莫理遜

赫白德·莫理遜(Herbert Morrison)按：保守黨也有一位莫理遜 W. S. Morrison 現任農務大臣)生於倫敦，是一位警察的兒子。他有一目失明，只受過中等教育。他當過信差，商店助手，和電話接線生。他的頭髮鬚曲，他的脾氣幽默，他的辯才鋒利，他的主義樂觀，總而言之極像威爾斯(H. G. Wells)初期著作中所描寫的吉勃斯(Kippes)一流人物。自從一九一四年起，他就充任工黨倫敦市黨部的祕書，是一位極富效率之組織人才。自一九三三年起，他不但成爲工黨倫敦市黨部首領，並且成爲倫敦市議會多數黨的領袖。這個地位在美國就等於

市長。他在第二屆工黨內閣中，充任交通運輸部長，他所提出的倫敦市交通改革案，是一件最值得稱道的立法。他口齒伶俐，手段靈活，思想周密。

克爾斯 (A. J. Cummings) 在「新聞記事報」中說：「莫理遜是工黨中與的希望，也可以說是工黨唯一的希望。他比較年青，政治前途未可限量，將來頗有做首相的可能。他是一位敏銳的政客，有着誠篤的信念，黨員對他效忠是毫無問題的。」

可是出於意外的，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選舉中，莫理遜並未當選為上院工黨的領袖，反而在人格和推動力方面比他較次的亞德利卻當選了。此舉對於以莫氏必然成為領袖的人，大失所望。莫氏失敗的原因有好幾個：第一，他在黨中的態度太右，不合左派的脾味。第二，工黨怕他個性太強，難以駕馭。第三，他是一個倫敦人，而工會卻厭惡倫敦的工黨，因為他們在其中的勢力較小。第四，他是惰性的犧牲者；當蘭斯伯雷 (George Latham) 因老辭職的時候，亞德里暫時庖代下院工黨首領的職位，在競選的時候又是由他領導工黨黨員，因此他們覺得不便另有更動。

莫理遜不是一個外交專家，但是他的轉機很快，天資很敏。例如在一九三五年工黨大會中，他力言「勞工運動（剛以二十票對一票通過對意制裁的決議案）不要犯了錯誤，以為排除了墨索里尼，就可以消滅法西斯主義，猶如從前我們希望打倒德皇以後，黷武主義就可消滅一樣。」

他在勞工運動中顯然站在右派，但即使如此，左派卻完全尊敬他。

三 工黨碩學克利布斯

「如果你一翻開不列顛帝國的歷史，你會壓碎你的頭，羞於做一個不列顛的人民。」

——克利布斯

在工黨下議員中，智識最豐富的，大概要推克利布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了。他是巴穆爾勳爵（Lord Parmoor）的兒子，韋勃夫婦（Webbs）的內姪，篤信社會主義，在下議院中是個出人頭地的議員，並且像西門一樣，是個著名律師。他在下院工黨議員中，組織一個社會主義者聯盟，思想是極其左傾的。某次他驚倒許多人，竟敢說：「我們要克服白金漢宮方面的反對。」保守黨中怕他的人很多，而怕莫理遜的人卻很少，這一點很可注意。他們以為克利布斯一旦當政，他必然會採取現代社會主義政策，甚至會打算取消貴族院，而以「授權法」（Enabling Act）統治英國。這種主張把工黨中的保守份子也嚇倒了，所以克氏開頭做黨領袖的起步很好，而以後則比較式微了。

英國原是一個有許多令人莫名其妙事情的國家，所以看到克利布斯這位魯殿靈光的工人煽動家是一個大財主，他就用不到驚異；他從裏面與根深蒂固的特權作戰。據估計他做王家法律顧問時每年的收入，約計三萬鎊（美金十五萬元）。某次他在一個政治集會上講到他以律師資格得過許多統治階級人士說：「他們付我很高的代價，來為他們解決困難。我敢說，本國的勞工階級，行使統治要比他們能幹得多。」他抱着急進的熱誠，要實

現他的信心。

克利布斯指出在第一屆舉國一致內閣期內，靠着「救貧法」(Poor Law)救濟的貧民，數目增加到四十萬，他深信法西斯主義已經突然伸出醜惡的手指於不列顛生活之中。孟德斯脫導報最近引他的話說，實現法西斯主義第一個確定的、明白的步驟是一九二七年的勞資爭議法 (Trades Dispute Act of 1927)。一九三一年的選舉，「根本帶着法西斯性質」；資本主義的力量，在選舉上已經得到這樣一種勝利，「毋須乎任何正式的獨裁人物了。」他說，政府一方面對資本家津貼——例如愛禮歐的農業方案——一方面又「用生活測驗，叫工人守紀律」，那完全是矛盾的。「英國的工人，無論過去和現在，都不會像德意兩國那樣施以怪僻的、殘酷的訓練，而施以溫和的、堅決的訓練，希望他成爲一個鄉下紳士式的法西斯主義者。無論教他們穿着黑衫、褐衫，或其他有色制服，都不必要；而且過於觸目；雇用一隊特別巡警要便宜得多，並少引人注目。」

他爲「職團國家」所下的定義很有趣味，說那是「一種手段，用來把全權交與資本家，造成他獨佔的地位，使他有染指國富的保障，並使他得把工人作爲奴隸，褫奪了他們團結的自由與權利，給他們在產業政府中一種名義上的、無效力的少數表決權。」

克利布斯和莫理遜兩人，雖然意識形態有不同，但很有合作的可能。克氏長於理論與策略；莫氏長於組織與運用政治，但足爲他們兩人阻力的，還有一個重大的保守勢力，即工會。

四 工會派要人

「在我看來，要保全現社會制度，與其靠保守黨首相鮑爾溫，倒不如靠英國工會運動的大師錫特林爵士。今日的保守主義，沒有再比工會派的理論與實際所包含那樣的可怕與不能搖撼的了。」

——沈明斯

在一九三七年下議院工黨反對派的議席之中，七十二名爲工黨黨員，七十四名爲工會代表。工會代表之中，又可分析如下：三十七名爲鐵聯合會代表，七名爲市區工人，六名爲鐵路職員，六名爲運輸工人，五名爲分配工人，三名爲全國鐵路工會代表，二名爲排字工人，尚餘八名，爲其他工會代表各一人。他們大多數所需要的最後東西，是現代的社會主義。

工會派的要人如工聯會總秘書錫特林爵士 (Sir Walter Chittine) 和成立較新力量較大的運輸總工會首領裴文 (Ernest Bevin)，全非下議院議員——鮑爾溫的政治手段尤其毒辣，他要前屆舉國一致政府爲錫特林加上爵士的頭銜，使他永遠不能成爲下議員。按照工聯會 (Trade Union Congress) 的章程，首領不能作積極的政治活動，但是他們握有基金，所以工黨不得不受其支配。

錫特林的成功在於他的手段。他原是一個電力工會的會員，後來做工聯會的助理秘書；他擅長組織，因此成爲工聯會一個不可或缺的要角，最後終於繼任總秘書。據說他辦事全靠檔案，所以他簡直是一個保管檔案的機

器人。某次工黨智識份子邀他參加非正式的討論，解決一些黨務，他帶了檔案和一位秘書蒞場；他當時所發表的言論，全由秘書替他紀錄下來，以便將來引用時不會弄錯。他頭腦冷靜，辦事精細而明確；他一生從來沒有一個活的觀念；「他的演說猶如不斷的雨點。」

一九三五年秋，錫氏曾遊莫斯科，回來著了一本據說並無偏見的書。但他拒絕了共產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結成聯合陣線的建議。自一九二八年起，他充任國際工會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的主席。

五 工黨首領亞德里

工黨領袖兼反對派忠實首領亞德里（Major Clement Attlee），如果一九三一年選舉中，工黨在下議院的前排座位不被全部肅清，就不會做領袖。但自一九三一年來當他有機會表現自己身手時，他的能力便大大地增進了。亞德里出身中等階級，他之成為社會主義者而加入工黨，並不是由身歷窮困，或目擊社會不平，而是由智識上的信仰而來。他很有豐采和機智，但也有固執的脾氣。他與西門合作，在印度法案審查委員會中做工黨代表有二年之久。他只有五十四歲。他所最缺乏的是明顯的個性。不像多數工黨領袖一樣，他是一個公立學校和牛津大學的學生。

在比較年輕一些的工黨黨員之中，最可注意的也許要推培凡（Aneurin Bevan），他的夫人李瑾妮（Jennie

Loo)是個蘇格蘭獨立工黨的青年黨員。培凡是個威爾士人，一個鑛工的兒子，從小就在地下做工，雖然因為貧窮的障礙，他卻教育着自己。他靈活而有志，極能吸引注意，而且富於威爾士人固有的滑稽，在下議院中，是最動人的人物之一。他對制裁意大利的批評，可看出他辛辣的個性：「英國的政策，就好像一個從前做過強盜現在保守家產者的政策，所以他要有雄厚的警力。如果我請工人流一滴血，那我不就要他為中世紀的阿比西尼亞而流，也不要為法西斯的意大利而流，要為本國社會制度的改良而流。」

六 共產黨與獨立工黨

英國下議院中，有一名共產黨議員嘉拉善（Willie Gallacher），一位蘇格蘭的老革命黨員，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總選時膺選的。他真是一位典型得極的蘇格蘭克萊德河畔（Glydeide）十字軍，最初隸屬於自由黨，後來加入工黨，最後成為共產黨；英國第一次反對大戰的罷工（一九一五年），便是由他主持的，所以列寧很稱贊他。但是嘉拉善在共產運動中，並沒有像該黨領袖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包立德（Harry Pollitt）那樣的重要。包立德是馬克斯主義理論家，職業為製造汽鍋，同時又從事新聞事業和政治活動。倫敦有一位最尖刻的新聞記者告訴我，在他看來，包氏的「新聞體験」比他還敏感。包氏主張用內外夾擊的政策，他自己依然做着工會會員，但是在上次選舉時，除了少數沒有共產黨的選區以外，他卻命令黨員投工黨的票。因為是個共產黨的組織者，他每週得到四鎊（美金二十元）的薪水，這在黨中已經算是最高的了。他當然竭力主張聯合陣線。包氏是

便難以遏制的演說家、著作家和宣傳家，所以在英國官場中，也可算最引人注目的一個。

從某幾個觀點上講，獨立工黨 (Independent Labor Party) 比共產黨還要左傾，正像西班牙的馬克斯主義者聯合黨 (P. O. U. M.) 一樣。該黨反對制裁，而共產黨卻加贊成；該黨拒絕與工黨有任何聯合，而共產黨則甚至投工黨的贊成票。獨立工黨現在下院有四個議席，團體雖小，卻是喧擾非常。獨立工黨創立於一八九三年，最初常與工黨政策以極大的影響；但自一九三一年專誠採取革命政策以來，即與工黨決裂。

獨立工黨的領袖麥克斯頓 (James Maxton) 正像李維諾夫一樣，也曾當過兵。為大不列顛領土保衛軍 (Territorial, 1907—1908) 之一員。他生性保守，有人說，愛禮歐是保守黨中的費邊主義者，而麥克斯頓是獨立工黨中的保守主義者。麥氏身材瘦長，頭髮斑白，活像一位「英國的但東」 (Danton) 按：法國十八世紀革命領袖。當政府計劃撥款一萬萬鎊 (美金五萬萬元) 修築公路的時候，他用諷刺的口吻批評說，政府正在使下次饑餓示威遊行者容易走一些。從麥氏這位獨特人物的身上，又可看出英國人那種矛盾的性格；他是一個公開的革命家，但是鮑爾溫和麥唐納也會稱譽他是下議院中最孚衆望的一個人。而且和他交誼最厚的朋友都是保守黨員。

七 極右派

極右派方面，比張伯倫、海爾珊和倫敦達雷更甚的，還有二位孤獨的、最後的帝國主義者：一是前任殖民大臣

愛麥雷 (L. S. Amery) 一是前任孟買總督和埃及高級專員勞合動爵 (Lord Lloyd)。愛麥雷最近的行動很引人注目，他是下議院中那班最堅執主張防止德國收回殖民地議員的領袖。培爾斯說：「如果請我提出今日大政客中最死硬的人名，我一定不提邱吉爾而提愛麥雷……他是屬於德國多賓支克 (Traisack) 和本哈第 (Bernhardi) 一派的帝國主義者。」因此他不能安於其位。愛麥雷的身材矮小，極好爭鬧，是一個縱然枯燥，但難取勝的雄辯家，正像多數英國第一流的政客一樣，學問非常淵博。

勞合動爵過去的政績不在議會而在國外，祖先在九百年以前是南威爾士的一個藩王。他是勞倫斯隊中最初出征亞拉伯的一員。甘地第一次被捕，便是由他主動的；當主張妥協的奧叟·漢德森任工黨內閣的外相時，他失去了埃及高級專員的職位。像愛麥雷一樣，他也是一個孤立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他任總督時治下極嚴，而喜鋪張。某次威爾士親王在孟買會見他時，據說太子曾謂「我沒有遇見勞合之前，真不知道皇家有這樣的尊嚴呢！」

八 法西斯運動領袖穆思萊

「在此大整個德阿爭端上面，飛揚着一股煤油臭，比煤油臭更強烈的，是一股猶太臭。」

——穆思萊

英國的法西斯主義，在穆思萊爵士 (Sir Oswald Mosley) 的領導之下，已經成為強弩之末了。拿比喻來講，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好像一杯濃鬱的醇酒，而英國的法西斯主義只是一盆淡泊的清茶。誠如威爾斯所說，如果我們把現代的獨裁者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比成毒烈的疔瘡，那末穆思萊就只可以算為一粒烏痣罷了。

穆思萊的野心很大。他像奧國的史泰亨優親王一樣，相貌生得極其英俊。他可算英國第一流的雄辯家。他個人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在他轉向法西斯主義以前，英國很有不少傑出青年傾心他。但是在一九三五年底，他的運動卻一蹶不振了。在十一月選舉中，法西斯黨沒有一個候選人膺選。

據哈蒙德 (Barbara Hammond) 說：「一九三六年時，有一位穆思萊先生……以三、五〇〇鎊的代價，收買了一塊土地，就是現在的孟卻斯脫市。一八四六年，孟卻斯脫市政府又以二〇〇、〇〇〇鎊的代價，從穆思萊爵士手中買回了那塊采地和一切權利及附帶物……」

現在的穆思萊爵士是世襲第六代的男爵，他從母親手中繼承了一筆二四七、〇〇〇鎊（美金一、二三五、〇〇〇元）的遺產，從一九一五年去世的祖父手中繼承了一筆六〇、〇〇〇鎊（美金三〇〇、〇〇〇元）的遺產，他從父親那裏似乎沒有得到什麼，據「勞工調查局」出版的「穆思萊法西斯主義」第三頁上說，他的父親曾在一封致報館的信上說：「許多年來我從私囊中拿出幾千鎊的錢來教育他撫養他……他一生就沒有好好地工作一天。」穆氏是故寇松勳爵的女婿，芝加哥富豪黎德 (Levi Leiter) 的外孫女婿，當他和辛夏·寇松女士 (Lady Cynthia Curzon) 結婚的時候，有兩位國王和王后參加婚禮，她本人也很有錢。

穆思萊初入政界時為代表哈羅區的保守黨下議員，但不久便脫黨獨立。這有好幾個原因：第一，做一個年青

有錢的保守黨員，他不過是許多年青有錢的保守黨員中的一個。第二，做一個獨立派，因為他有錢，其他各黨就會拉攏他。第三，工黨的勢力正在膨脹，而穆氏對於經濟改革又有雄心。於是在一九二四年他便加入工黨。他說：「當拙荆與我入工黨的時候，那無異斬斷家族及從前的關係。」可是他之躍入無產階級，是有報償的。他以九千鎊（美金四萬五千元）的代價購置一座極其華美的古屋，再費一萬鎊（美金五萬元）加以改建和備置。同時勞苦大眾聽到他的太太不願意人家稱她「男爵夫人」而願意稱她平民化的「穆思萊夫人」時，覺得很感興趣。可是穆氏的父親一死，就立刻承襲了爵位。

一九二九年，當他三十三歲的時候，他以蘭坎斯特公爵封地大臣入工黨內閣。這個職位是無事可辦的閒曹。在實際上他是辦理失業問題的不管部副員。他的聰明和他的吸引力是一等的。他竭力主張以建設公共工程來吸收失業工人的政策；但是湯麥斯（J. H. Thomas）及其他嫡派工黨領袖反對他的「穆思萊備忘錄」。他因此辭職而另組新黨。他吸收了幾個工黨黨員加入他，例如現在英國最出名的共產黨小冊子專家史德蘭契（John Strachey）便是其中之一；不過當他組織「新黨」時，下議院中只有五個議席，而他的思想愈傾向法西斯，他的左派擁護者都背棄了他。新黨只有一年的壽命，在一九三二年九月，穆氏便成了「英國法西斯同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的領袖。

穆氏的運動，正與一般法西斯主義運動如出一轍。

他攻擊英蘭銀行和猶太人；他主張對印度施行強硬政策；他籲請勞工階級的擁護，其所用煽動手段與希特

勒一樣；他雖然不鼓吹革命，但卻主張採用斷然手段；總而言之，他對於法西斯主義並未玩出什麼新花樣出來。他極其傲慢，目空一切，老喜歡穿着滑冰選手那樣的黑衫，藉以炫耀自異。他是現存最驚人的演說家之一，可是他所說的話，多半毫無意義。他所組織的黑衫隊，多少摹倣德國的樣子；但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在奧令比亞開會時，他的衛隊卻背棄了法西斯運動。

有一時期，英國報閥羅塞米爾勳爵會支持他；自「每日郵報」發表同情法西斯運動的第一篇驚人的文章後，英國法西斯同盟倫敦總部即發出下面一封通告：

「請絕對保守祕密，並請讀後即加銷毀。」

各支部及組織員各宣傳部幹事均鑒：

本月十五日羅塞米爾子爵於每日郵報所發表之大作，想均過目……該報友好舉動及其讀者之愛護，吾人應作贊助之表示。為完成此項目的計，各支部組織員及各宣傳部幹事，應立即各自投函該報主筆。至少應有十二函，以表示對羅氏大作贊助之反響。

此項投函之動機，應為該報讀者為主持正義反對他黨宣傳機關攻擊羅氏及其報館團體而作者……投報此項函件時，其態度應如出自讀者手筆，須與英國法西斯同盟無若何關係，僅因同情法西斯主義而受該文深切感動，故出此積極贊助舉動。

各支部如以此事作為本身責任幹去，則羅塞米爾子爵將有一深切印象，以為全國各地，業已法西斯化，此



穆思萊，勞合與麥克思登

後必更能出其毅力，援助吾黨。郵局方面已特派專車於一二日內分投本部郵件，務請努力從事爲禱。

宣傳部長伊文思。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穆思萊又致函德國紐蘭堡挺進隊首領斯德婁（Julius Streicher）如下：

「斯德婁閣下勳鑒：

頃自里斯、德返抵倫敦，得讀

尊電，對下走在該處所作演說，獎譽備加，深銘五內。吾人在此艱苦奮鬥中，忽聆

閣下致殷殷之意，能不令人感懷無已。吾人確登歐洲於正義和平衽席之上，則各大國猶太人之腐化勢力，必先應加克服。吾人奮鬥，固非易易；吾人勝利，則可操左券。謹掬至誠，藉表謝忱。敬頌

勳祺！

穆思萊謹叩。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每日新聞」）

穆思萊竭力攻擊猶太人，有時反而被人民所攻擊，說他的夫人也含有猶太血統。他（至少有一次）又手挺胸的回答：「我的太太出自荷蘭名門。」

羅塞米爾對穆氏的感情不久就冷淡下去，尤其是在德國六卅慘案以後；於是英國的法西斯黨也就消聲匿跡，他們當然是在不毛之地上作戰，因爲英國的產業正在復興了。不過有一件事情或者可使穆思萊恢復昔日的盛譽——那就是對強大的工黨政府來一次反動，如果工黨再能得權的話。

第二十一章 凡勒拉

一 愛爾蘭之父的國籍和綽號

正像許多現代的領袖一樣，凡勒拉（Edmund de Valera）也不是生在他所統治的國家。德國的希特勒是個奧國人，波蘭的畢蘇斯基是個立陶宛人，蘇俄的史丹林是個喬治亞人，土耳其的凱末爾是希臘沙羅尼加人，奧國的舒斯尼格是意大利里伐人。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戰後各國版圖變遷的影響。當凱末爾尚在襁褓時代，沙羅尼加還是土耳其的一部分；當舒斯尼格到上學的年齡，里伐仍為奧國的領土。凡勒拉出生的地方，卻在大西洋的對岸，與南愛爾蘭都有三千英里之隔。他在一八八二年生於紐約；他的父親是由古巴移植過來的西班牙人，他的母親是遷居美國不久的愛爾蘭人。也就是因為出生在美國——因而是美國的公民——才救了凡勒拉的性命。

希特勒爲了是奧國籍，曾經吃過一些虧；凡勒拉卻爲了是美國籍，方才做到愛爾蘭的主席。一九一六年復活節，叛變發生後，他之所以能免一死，完全因為英國的軍事法庭，不願意爲了鎗斃一個美國公民，而引起美國的反感。當時其他指揮事變的首領們全都被鎗決了，只有凡勒拉一人倖存。如果他不是生在美國，那末愛爾蘭自由邦

的歷史，一定將有很大的不同。或者是否將有自由邦的產生，根本還要發生問題呢。

凡勃拉和幾位少有的政治家如英相第斯拉里和二十六屆美總統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一樣，具有一個舉世聞名的綽號。每個愛爾蘭人都叫凡勃拉做「達夫」(Dov)。從這一件事上，我們便可以看出他的爲人。愛爾蘭人平常是不大喜歡替人起外號的；例如柯斯格萊夫 (Cobden) 始終就沒有綽號。一個全國聞名的綽號，可以表示那被叫的人爲大家所愛戴，這是可以抵過幾千張選票的；這是人民給予政治家的一種殊榮，僅僅是位煽動的政客，永遠不能獲得一個綽號，無論怎樣成功怎樣偉大也不能膺此榮典。希特勒就始終沒有，威爾遜也沒有。但是老羅斯福卻被叫做 Teddy 或 F. R.，勞合·喬治卻被叫做 L. G.。在意大利或土耳其沒有一個入膽敢爲墨索里尼或凱末爾起一個渾名。但是在愛爾蘭，人人卻叫凡勃拉爲「達夫」。

話雖如此，當面叫凡勃拉爲「達夫」的人卻不多。他的夫人如此叫他，關係密切得能叫他教名的知友，也如此叫他。里米立克州 (Limerick) 他的母族當中那些看他長大的人，仍然叫他「艾迪」(Eddie)。他的朋友和同僚常稱他做領袖，或愛爾蘭文的「主席」(Uachtaran)。凡氏自己稱呼屬僚，叫他們名字。人們只有在背後叫他「達夫」。

大概在十年以前，當他做在野黨首領的時候，黨員都叫他「共和國總統」(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當時柯斯格萊夫執政，任行政院主席 (President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他在「國民大會」(Dail Eireann) 按愛爾蘭的國會只有一院制，所以國民大會就等於國會) 中提出一個議案，說是除稱柯氏自己以外，

不得以「President」一詞稱任何人。這事觸怒了凡黨中的一位馬基維文伯爵夫人（Courtesa Markievitz），她在鄧伯林一次公開集會上，聲稱她以前只叫「共和國總統」為「達夫」，但是從此以後她卻要叫「達夫」做「共和國總統」了。於是那個議案便自動取消。

二 工作和嗜好

正像多數意志專一的人一樣，凡勒拉完成了許多工作。他一天到晚孜孜矻矻的辦事。通常他每早約在九點半到十點之間達官署的辦公室，照例召見歸他直轄的各部部长，縱然是件很小的事，他也全心留意。他回家午餐，但不消一會功夫又回到辦公室工作。他一直工作到下午六時回家用茶，晚間每每還到辦公室去。人們從官署經過，往往可以看到主席辦公室裏的電燈，到午夜還未息。他吃的晚餐只有牛油和麵包。除了因病以外，他從不告假。他是一個身材瘦長富有筋骨的人，正合一個狂熱者的條件。在他年青的時候，他是第一流的橄欖式足球員；他極愛騎馬，至今還是一位精練的騎手。他也喜歡遠足和爬山。每逢星期日，大家幾乎老是可以看見他在離鄧伯林十英里外的山徑上走。汽車夫和保鏢坐在汽車上，在前慢慢地移動，「達夫」卻跟在後面，如飛般走着，不戴帽子，頭髮直聳。即使在這種時候，他還是穿着黑色的衣服。他走得這樣快，甚至他的家眷怎樣也趕不上他。還有八個永不離遠他的暗探，緊緊地跟在後面。

凡勒拉在愛爾蘭和英國酒不入口。他以為酗酒是愛爾蘭的災禍。但是很奇怪，他一到大陸，卻喝甜酒和

啤酒了。他最愛坐在瑞士的楚利克 (Zürich) 或日內瓦的咖啡店裏，喝上一杯啤酒，看人們來來往往，每當這時候，他便萬念俱消。他並不吸煙。但在一九一六年以前吸酒吸得很凶。據說在復活節叛變發生後，他在被解往拘役道中，正裝滿一斗煙準備要燃着的時候，他突然停住了說道：「我不願意他們在監獄中連我這一點兒享受都剝奪！」說着他就把煙斗丟掉，從此他不再吸煙。

他的嗜好除了運動以外，還有下棋，聽無線電播音，而尤其是喜歡數學。在他患眼疾以前，他所讀的書是多方面的。他最愛讀沙士比亞和愛爾蘭本地作家的著作。他的愛爾蘭語說得流利準確，只是帶着些土音。他最得意的智識上消遣是數學。有一天在羅馬去的路上他問他的秘書對於四元方程式的定理有什麼意見。那位秘書的數學程度很淺，所以只好說「不知道。」那天很熱，隨員們多在打盹，但是「達夫」卻重整化了十二小時功夫教他秘書的四元方程式。據那位秘書說，「達夫」這十二小時的解說，是他一向沒有聽見過的最明白的解釋。當一九一八年在監獄裏的時候，他曾利用空閒時間研究愛因斯坦的理論。

三 凡勒拉夫人

凡勒拉的夫人是一位女教員，閨名瑾妮·法蘭娜安 (Sinead Ni Phalanaighin)，是他學愛爾蘭語時在愛爾蘭本地人同盟中遇到的。據說凡氏因為愛爾蘭本地文不及格，所以考不取文官試驗；這種傳說固然不足深信，但是無論如何他是和他的教師結婚了。那是一九一〇年的事。他們生了七個子女。有一個兒子白利安 (Brian)，

一九三四年二月在都伯林鳳凰公園中騎馬摔死。他們的長子維佛安 (Vivian) 曾在國立愛爾蘭大學得科學碩士學位。現任都伯林大學的實驗教授；以前會經營過義勇軍的實授中尉。長女也是國立大學的畢業生。其餘的子女還在大學和中學裏讀書。

凡勒拉夫人在年青時代是一位美貌白皙的女子。他的金髮現在已經變成灰色了。她像她的丈夫一樣，性格頗為沈默。除了最低限度的官場應酬以外，他們的家可說並無社交生活。當他任主席時，他的夫人會說她寧願政府爲他指定一位太太，代她參加官場酬酢。凡氏家庭住在黑岩十字大道 (Cross Arenu, Blackrock)，住宅頗爲簡樸。家中只雇一名女僕。一九三二年以前，他們還不雇傭人；房子也要小得多；一切家政全由凡勒拉夫人料理。他們就在餐室裏接見賓客。正像其他愛爾蘭人一樣，她的記憶力很強。他們的小兒女都很聰穎，黑岩地方的鄰舍全喜歡他們。就是凡勒拉以前的政敵，也常邀請他們。但是凡勒拉夫人卻推托孩子們的學業太忙，加以婉謝。

四 性格素描

在各國政治家之中，凡勒拉主席是最容易會見的一個；他接見過許多賓客。但他對新聞記者的談話，卻特別注意，非經他親自校閱畫諾，不得發表。他的朋友很多。其中有一位是有錢的鄉下醫生，名叫法南 (Farman)。凡勒拉往往深夜拜訪他，二人一同作很遠的散步。另一位是他的秘書凱絲琳·唐納爾女士 (Kathleen O'Connell)。她跟隨凡氏幾近二十年，對於他的工作和心中想出來的方法，知道得很透澈。凡勒拉很有吸引女子的魔力，但他

從不注意她們。在官場應酬上，她們往往圍繞着他；他的臉上帶着微笑，但是很沉默，從來不失禮貌，也不喜歡鋪張；他對婦女採取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

他對金錢毫無興趣。當他就職後，把自己的俸給從二千五百鎊減至一千五百鎊。他沒有私人進項，沒有靡費嗜好，也不喜歡奢侈。他極愛音樂。他對藝術的見解如何，不得而知，但他似乎不大有興趣於象形藝術。他當然虔信宗教，但是他對天主教的態度是不偏不頗的；他有幾位朋友是新教徒。只要可能，他每天做彌撒時總要領聖餐。他的一位職員曾對作者說，「他的整個生活就是一個祈禱。」

凡勒拉的幽默感覺並不十分大，但不能說沒有。那是屬於諷刺方面的。他不常說笑，但頗能領悟滑稽的情趣。他笑的時候常縱聲大笑。有一次他在安尼斯 (Annis) 演說，正說到當中，被官方捕去。一年以後被開釋，他重至安尼斯演說。他劈頭第一句話就是「正當我說話的時候，突然被人打斷……」

他為人的特性可以用下面幾句話來包括：嚴於克己，忠於為國，縝於思維，遠於世俗，而又帶些道學氣，固執性和仁慈心。據說他一生只發過一次脾氣，那是在辯論愛爾蘭印刷公債問題的時候。他的朋友們也很難想起他有感情衝動的事。當一九二一年英愛條約以七票多數被通過的時候，他立起來說道：「在過去四年之中，我們互相合作，好比親兄弟一樣……」說到這裏他嗚咽不能發聲，向座位上一坐，雙手掩臉哭了。他極其鍾愛他的兒子利安；但是剛在他慘死以後，他出席黨會，態度依然很鎮靜。當他插足公眾場所——例如足球賽的看臺上——的時候，他並不向羣衆微笑或點頭。他走路時一直向前，極其沉默，好像在假想着沒有羣衆在那裏的一樣。

五 革命經歷

凡勒拉到愛爾蘭時只有兩歲。當他父親在紐約去世後，他的母親便送他到愛爾蘭請他的舅父撫養。他住在里麥立克縣伯魯里（Bruce, Limerick）附近他外祖母的家裏。他的母親依然留在美國再醮了；他小時候母子倆間有什麼接觸，現不可考。他進了當地小學，同時以農爲生，因爲他的數學很好，畢業後就在考克（Cork）附近免費在教會中學裏讀書。他曾一度想進耶穌教的學院。但結果他卻入了鄧伯林附近的黑岩學院，後來他的子女也在那裏求學。他在皇家大學裏得到了學位後，又學習愛爾蘭語，當了一位教員，並以民族主義者和革命者開始他的政治事業。

在今日許多歐洲國家中，如凡勒拉一式的青年是很多的。作者在南斯拉夫、敘利亞、埃及和巴勒斯坦，曾經遇見過不少像凡氏青年時代那樣各種族的人。誰知道他們將來不會變成國父呢？但是—般的情形雖然很像，而智識像他那樣高超的人就不多，個性像他那樣剛強的更少見。從少處於窮困的境地，爲了教育和民族主義而奮鬥，對於宗教有誠篤的信仰，將全部生命貢獻給自由的熱切希望，像這樣的人格，只有凡氏所獨具。其他青年的民族主義，都是很脆弱很微渺的。他們所釀起的民族仇恨——例如敘利亞青年對法國人，克羅特人對塞維亞人政，府——是很可愛慮的。但這些仇恨正是今日歐洲活躍的因素。

凡勒拉在當初是極端派中的最極端者。他必然參加比爾斯（Pearce）、麥獨諾（MacDonough）、麥德穆

(MacDonnott) 等一班人，共同於一九一六年復活節起事，宣布愛爾蘭共和國的成立。當時頭腦不清的人，以為這是瘋狂的冒險，不能成功，純然是自殺。但是他們是錯了。叛事固然在一星期後被武力平服；各領袖除凡勒拉以外固然被判決死刑而鎗斃。但是復活節革命卻並沒有失敗。牠是成功的。至少凡勒拉會不當牠失敗。經過多年悲慘的苦鬪，愛爾蘭自由邦終於在革命之火與流血之中產生了，而凡氏本人也就做了該邦的元首。

凡勒拉是負責實地作戰的「指揮者」之一，他率領幾個部下，佔領了都柏林郊外的鮑蘭廠（Poland's Mills）地方。這是一個軍略要點，因為英軍渡海到都柏林，必須經過此地。英軍到達時，從鮑蘭廠發出密集的子彈。凡勒拉的部下在愛軍中是訓練最好指揮最優的，就是英軍自己也承認。凡氏運用的妙計之一是派遣極少的士兵攜帶兩挺機關鎗，守住一舍高揚愛爾蘭國旗的小屋。英軍中了空城計，以為這是他的主力所在。當都柏林市內的亂事救平後，凡氏還不肯投降，但他不得不服從上司的命令。於是他從廠中出來說：「你們把我鎗斃好了。不要難為我的弟兄。」

軍事法庭最初判他死刑，及至他們知道這個首領是美國人的時候，就改為無期徒刑。這時英國急於要美國參加協約國作戰；愛爾蘭系美國人的民意和感情是很重要的。他在達特摩（Dartmoor）只坐了一年監牢，因為一九一七年英國便舉行大赦。當時革命首領大半多被鎗決了，所以凡勒拉立刻被舉為「新芬黨」（Sinn Fein）主席。他又是代表克萊爾區（Clare）的新芬黨議員。他從來沒有機會在英國下議院中佔一議席——當然他是一個不合作主義者，即使被允許也是不會去的——因為在一九一八年初，他又被捕了，這次是關在林肯地方的

監牢裏。

關於凡勒拉從林肯逃出的傳說有好幾種。比較真確的說數大概是這樣：他在明信片上畫一張離奇的畫，上面有一個醉漢拿着一把極大的鑰匙在開鎖。那張明信片已爲獄中檢查通過，但是他那愛爾蘭朋友卻很笨，接到了明信片以後就丟在抽屜裏，以爲「達夫」發了神經病。原來這畫上的鑰匙，是照獄門上的大小繪就的。後來那位朋友又接到凡氏同樣奇怪的明信片一紙，這次鑰匙畫得比上次小一些。朋友把兩張明信片綜合一看，便恍然大悟。於是他打了一把鑰匙，私下遞給凡勒拉。那鑰匙還是不合用。於是「達夫」便從洋燭上拿些臘下來，做了一個鑰匙的模型。他又偷偷地把他傳了出去；後來他的朋友在送蛋糕進去的時候，裏面夾帶了一隻鑰匙和一把銼刀。在一個晴朗的晚上，「達夫」便安然步出了牢門。

他逃出以後，英當局大事搜索。凡勒拉逃到孟卻斯脫，匿居於一個教士的家裏。當他踏進教士的家門時，那教士正在讀聖經上「你敲門，那門將爲你開放」的一句。後來凡氏又逃到利物浦，經過種種困難方才回到愛爾蘭。據說他喬裝一個尋常水手在搜查每一隻船的暗探脚下擦甲板；還有一說講他的朋友把他藏在馬鈴薯堆裏，直到暗探走後才露面。凡氏又從愛爾蘭化裝一個火夫渡美，航行九日才抵紐約。那時英國警察還在英愛兩地不停地搜索呢。他在美國到處演講，爲愛爾蘭解放運動募款。從此他便被公認爲愛爾蘭自由邦的發言人了。

當凡勒拉由美返愛時，又遇到許多危險。他搭乘「賽爾特號」(The Celtic)先在利物浦登陸，他賄通一隻野鷄船的船員載他到愛爾蘭，代價是一百鎊。那個船員拿到錢後，便上岸去買醉。凡勒拉躲在他的槍裏。當開船時

聞到時，那個船員還沒有回來。船長在盛怒之下走到艙裏來找他。凡勒拉情急智生，便裝作一個醉漢，經過片刻緊張，船長也就把他當作船員的糊塗但無傷大雅的朋友，不再究問。凡勒拉一回到愛爾蘭——那是一九一九年——於是歷史便揭開了。

六 愛爾蘭獨立戰

這一幕歷史，是大混沌、殘殺、構覺和流血的歷史。講這個故事的人很多，而且也太長，不便在這裏加以複述。凡勒拉被推為國民大會的主席，這會是由南愛新芬黨代表所組成的。凡黨人員所組成的國民大會，拒絕對英王宣誓效忠，甚至進一步宣布獨立。於是內戰便開始了。愛爾蘭王室警吏團的新募警吏（Black-and-Tans）與愛爾蘭民族主義者互相屠殺。一九二一年七月雙方成立休戰，開始談判，到五個月後英愛條約才簽字。根據該約，愛爾蘭得到自治領的地位，但南愛自由邦與北愛烏爾斯特卻從此分開。凡黨內部因此發生了裂痕。赴倫敦談判的代表，雖然是由凡勒拉授予全權的，但是凡氏卻不承認他們談判的結果，而拒絕接受英愛條約。他要求更大的收權。他成爲反對派，這就是說內戰又重新開始了。

內戰結果，兩敗俱傷；於是在一九二三年春，停止開火令，把流血告一段落。這時凡勒拉及其信徒，成了少數黨。他們堅持英愛條約是勞合·喬治以開戰的威脅加諸自由邦的，所以表示不取消議員，「爲愛爾蘭及大不列顛共同民權及爲歸附並加入不列顛各民族聯邦計」對英王效忠的宣誓，決不出席國民大會。一九二七年六月，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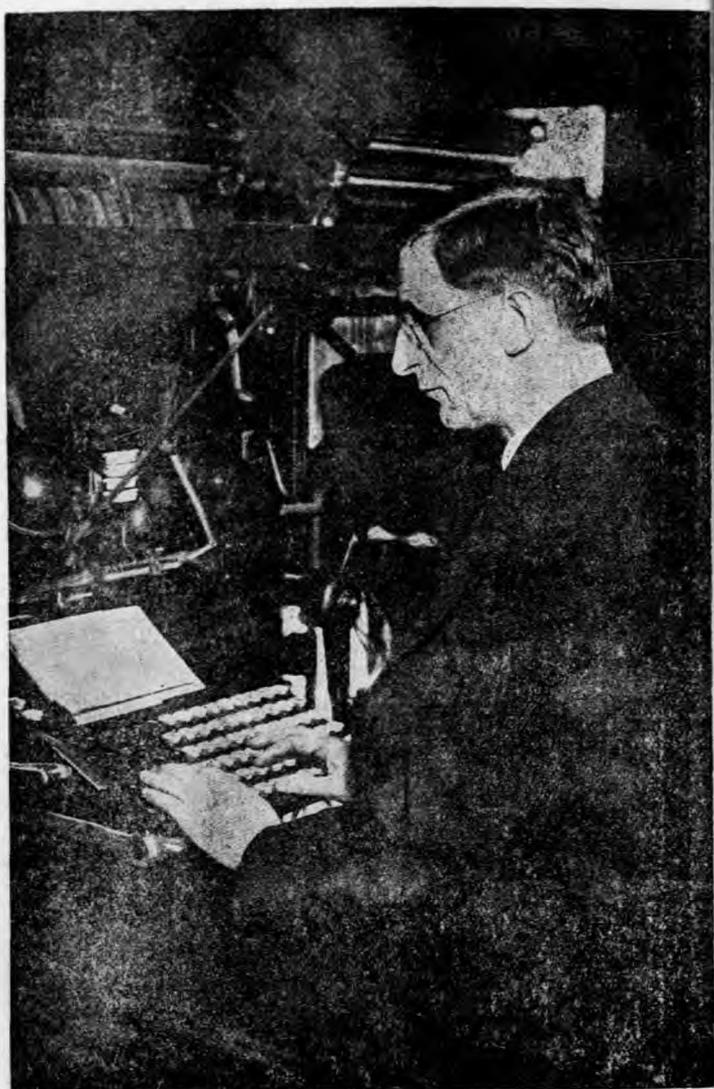
斯格萊夫政府通過了一個法案，規定國民大會議員候選人，當選以後應出席大會。此舉使凡勒拉和他一派的議員四十三人，全都出席大會。在第二次選舉以後，凡勒拉被選的議員增至五十七人。最後在一九三二年，他聯合了工黨，獲得大多數，並取柯斯格萊夫的地位而為主席。一九三三年他參加改選，又得到明顯的多數，從此當權到現在。

七 凡氏訪問記

一九三五年之夏，作者去見凡勒拉，當時約定我不直接引用他關於愛爾蘭問題的談話。那不是一次正式的訪問，而只是一次隨便的閒談。他的辦公室佈置很簡樸，白漆塗過的玻璃門上，用黑漆寫着「主席辦公室」幾個字。看外表就好像一家小公司的職員辦公室一樣。室中沒有什麼特別的陳設，也沒有成羣的辦事員，更沒有什麼排場。臨近小窗有一張大寫字檯，坐着一位瘦長的人。

凡勒拉的相貌，並沒有像照片中那樣的嚴厲。長鼻子和口旁的深綫可算他最富特徵之點。在我看來，他年青得好像不到五十四歲。他很靈敏，有興趣，並且極其謙恕。他說話時帶着顯著的土音，講到「that」或「this」時，對於「it」的聲音老是重讀。

我向他說新近奉報館之命充任駐倫敦訪員，這是我到愛爾蘭的第一次。我說當我擔任駐歐陸訪員多年後，奉派到這些新地方來，極為欣幸，並說不列顛羣島的生活最引人入勝。我說「不列顛羣島」這句話，是在無意之



凡 勒 拉

間脫口而出的。凡勒拉先生便立時向我糾正。他嚴肅地微笑着，說我把愛爾蘭包括不列顛羣島之內，相信一定只指「地理而言。」我向他解釋，我對報館的主要任務是增長學識和明白背景。凡勒拉說，「好的，請君發問。」於是他先開始說明「愛爾蘭」和「不列顛羣島」的分別。坐了不久，我又說到我的活動範圍，稍停一下，我不敢再說「不列顛羣島」而自己編了一個名詞，說我的活動範圍是在「歐洲北部的一羣海島。」他聽了不禁仰椅大笑。我希望他不會介意我講出這個小故事。

我們談了許多關於奧國和中歐的事，因為我新近從那裏而來。主席對於歐洲的情形和問題非常熟識，一時幾乎是他成了訪問者，而我成了被訪問者了。原來他對我們問了許多問題，都是極深刻的。我試着回答。如像奧國公民投票的結果如何？奧匈合併是否可能？舒斯尼格的個性如何等等。

主席以為歐洲目前最可慮的事，就是人民——善良有智識的人民——都被時勢所迫，不得不認第二次大戰為不可免，他相信在五年之前，人們不會作如此想法。當時大家還長懼戰爭，而希望不發生戰事。但現在似乎大家都以為戰爭是期望中的尋常事了。他嚴肅地搖頭說，如果他是德國人或法國人，他一定要將整個生命獻給於謀求德法之間的永久和平。

談到這裏我們轉到愛爾蘭，於是我開始問。他很有耐心，很是坦白，而且異常講理。不過在他瘦長的臉上，我卻看出一副狂熱的眼睛。當我告別的時候，深深地留下了他那愛爾蘭人可怕特性的印象，並且想起了他第一次和英相勞合·喬治會見的小故事。那時曾經有人問這位威爾士人說：「你和凡勒拉會見的經過如何？」勞合·喬

治嘆一口氣說：「我們談了兩天，後來他要到白里安那裏去了。」

八 上台後的凡勒拉

除了堅執、明智等顯著的特性以外，凡勒拉得權的主要原因是在能孚衆望。他的地位，特別自上議院廢除以後，就等於一個獨裁者，但他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民主主義者。他信任人民，人民也信任他。最近他說，他以為此後他將不會再用武力爲愛爾蘭作戰了，但是爲了民主主義，他卻很願奮鬥，甚至爲之效死。他深信人民根本是善良正直的。但在一九三三年，他卻很快的撲滅了法西斯的藍衫運動，因爲他都知道最優秀的人民，也會被人引入歧途，所以一個民主國家的第一任務便是保護他自己。有一件應該憶及的事，便是當他主席的地位正在炙手可熱的時候，他便立刻舉行一次在技術上並不需要的選舉。他準備一失掉大多數，就提出辭職。一九三四年，愛爾蘭發生了一次反對地方稅的有組織運動。他有些朋友們勸他對於斫倒樹木橫在路上和割斷電線的破壞者，採取更嚴厲的手段。凡勒拉說：「不，讓人民去對付他們吧。人民自己會校正他們的。」

南愛一般人民對凡勒拉的信任，幾乎要偶像化了。當一九二一年內戰行將爆發的時候，凡氏着手組織義勇軍，在都柏林附近舉行動員試驗期內，他發現路上埋設的地雷發生毛病。他跑來察看，找到了錯誤所在，立刻加以修好。於是他一個部下說：「他是一個比拿破崙還偉大的軍人。」縱然凡勒拉熟諳軍事，這種比較是很可笑的。據告訴我這個故事的愛爾蘭人說，「他能使部下真正把他比之於拿破崙，就憑這一點，已經可算是個偉大的領袖

了。」

他完全沒有個人的野心。他唯一的志願是愛爾蘭人民的統一和自決。某次他對訪問者說：「這不是我要什麼的問題。而是愛爾蘭人民要什麼的問題。」

自從凡勒拉執政以後，他曾捉弄英獅的尾巴，這當然是必然的事。國民大會廢除了對英王效忠的宣誓，大大減削總督的權力和特權，否認愛爾蘭最高法院向英國樞密院的上訴權，並且停付購地年金。所謂購地年金者，就是上世紀愛爾蘭佃農向英國地主購買土地的代價，現時由愛爾蘭每年償付英國五百萬鎊。英國報復的方法，便是對愛爾蘭主要出口貨如牲畜、牛乳、牛油等農產品課以極重的關稅。於是兩國便開始作經濟戰爭，一直到現在還繼續着。結果凡勒拉不得不重加改變愛爾蘭經濟生活的機構。他減少輸入品，建設糖廠，播種小麥，並且鼓勵製革業和肉類食品複製業，替過剩的牲畜想出辦法；總之，他受了英國的壓迫，不得不從事自給的嘗試。究竟成效如何，沒有人敢確說。不過努力是很大的，代價也是很昂的。主席現在仇英的態度頗有緩和的趨勢。本年初，他曾宣布愛爾蘭自由邦決不容許外國利用他的領土作為進攻英國的根據。

綜觀凡氏的一生，只為一個理想所支配：即愛爾蘭的統一和獨立。這一點他還不會成功。他所成功者，只是在不列顛聯邦之中，造成一個自由邦。自由邦原是獨立共和國的期望與不列顛強權的實現之間一種折衷辦法。凡勒拉的意思也許以為在人類的一生中，一代的時間是很短促的，而自由邦的締成，只是將來可以向應達目的前進的一個開始。他有一位朋友告訴我，凡勒拉只需要二件東西：和平與時間。

席。

一九三七年四月，愛爾蘭自由邦的憲法公布，是年七月，凡勒拉經過一度侷促的競爭，又被選為行政院的主

第二十二章 多瑙河的憂鬱

「德國的情形，嚴重而不絕望；奧國的情形，絕望而不嚴重。」

——維也納諺語。

一 戰後的奧地利

維也納社會民主黨的創立者，維克多·亞特勒（Viktor Adler）曾說，「奧國乃由經 Schlamperer 修正的專制政治統治着。」我不知道這個可愛的維也納詞 Schlamperer 究竟該怎樣譯法，不過大略說起來，意思是「不修邊幅而有點迷人，如果你不生氣的話。」亞特勒說這個小笑話，是在好多年以前；奧國在一九一九年以後雖然經歷了許多可怖的試驗，在一九三四年還發生了兩場內戰，但這句話還是適用的。

不過今日的奧國及其迷人的首都維也納，已不像從前那樣代表着未曾沖淡的人生之樂了。從阿爾卑斯山上吹來的使人陶醉的薰風，本是瀰漫於維也納的迷人之處的一大來源——不錯，這種薰風依舊在吹拂着。非常文明的維也納人，依舊喝着大量的啤酒和世界上最精美的咖啡，一邊恬靜地談論着真正重要的人間事物，例如莫柴（Mozart）的樂曲和打成泡沫的乳酪——不錯。

然而我們這些在一九三四年一年間住在維也納的人們，卻不能不更改我們那舒適的見解，以為維也納人

始終是懶洋洋、隨隨便便、好作奇談、十分溫和的。我們發現了有幾種事物，對於維也納人究竟比斜萊（Lary）的最新喜劇第一幕或弗洛伊特（Freud）學說的最近微妙修正更為重要。我們知道了，正如梅特涅（Metternich）所說，巴爾幹半島是在 Landstrasse Hauptstrasse（大道大街）地方開始的。

奧國在大戰後的領土，約等於英國本部或美國南加羅里那一省的面積五分之三；人口六百五十萬，比倫敦或紐約一市要少得多。在戰前，奧匈帝國共有人口五千萬，領土從卡巴山脈（the Carpathians）一直伸展到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奧國人在戰後的主要心理問題，就是要習慣於這種縮小——由一個大帝國縮成了一種渺小的存在。據說有兩個帝洛爾省人（Tyroleans）曾作過這樣一番談話，這故事是誰都知道的：「讓我們去散散步，」一個說道，「繞着奧國兜個圈子。」「不，」另一個答道，「我不願意在吃點心以前就回來。」

首都維也納好像是一個發腫的腦袋，生在一個矮小而萎縮的軀體上，其居民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這種尖銳的不相稱乃是奧國在一九一八年以後的主要經濟問題。全國的輸入額大於其輸出額；生產的糧食不足供本國人民的食用；所以奧國很窮。維也納張着一張大嘴，吞下了貧瘠多山的外省的出產還是不夠。奧國內地的主要物產乃是——風景。

在有一方面，奧國的弱點卻做了牠最大的長處。至少在一九三四年以前，牠的外交政策大部分可說是一種文雅的敲詐；牠向列強要求而且得到了財政上或政治上的援助，因為牠是一個處於衝要之地的緩衝國，如果牠

瓦解了，整個多瑙河流域的平衡就要崩潰了。有一個德國的笑話很可以在這兒引述一下：希特勒、戈林、哥培爾三人在討論，如果德國社黨倒了霉，他們該怎麼辦。戈林說：「我只要穿着平民的服裝，那末就沒人認識我了。」哥培爾說：「我只要閉着嘴不說話，那末人家就不知道我是誰了。」但希特勒卻說他什麼也不必做：「我是奧國人，所以列強自會來保護我的。」

奧國不但是多瑙河流域的樞紐，而且是距離遙遠的大事的鎖鑰。一九三一年三月間，德國的外交部長寇蒂斯 (Curtius) 與奧國的內閣總理休勃博士 (Dr. Schöberl) 提議在德奧兩國間成立一「關稅同盟」。這當然使法國大為憤怒，因為法國的外交部知道這是「德奧合併」的第一步。因而法國就向奧國各銀行收回其貸款，促成了中歐的主要金融機關——奧地利銀行的倒閉。結果是德國金融恐慌，賠款延期支付，放棄金本位。歐洲各國的銀行紛紛倒閉，鬧得一團糟。發生在遙遠的維也納的一種政治經濟爭執，竟動搖了英國的金本位。信心被「金鎊」出賣後，離開了大地，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奧國政治上的基調乃是馬克斯主義的維也納與教士控制下的外省間的不平衡狀態。維也納是社會主義的，反對教士的，很富裕的一個市區。內地是貧窮、落伍、守舊，信奉羅馬天主教，而且妬嫉着維也納的較高的生活程度。那些社會黨人，為要保衛他們自以為無法攻取的紫禁城，創辦了一種非正式的軍隊，由青年工人和知識分子所組成，名叫「自衛隊」(Schutzband)。那些外省立即也創辦了一種類似的軍隊來對抗。不過是由質樸而飢餓的農家子弟組成的，他們都穿着皮褲子，戴着綠帽子——名叫「內衛團」(Heimwehr)。

這兩大勢力的爭鬪，終於造成了一九三四年二月的內戰。

維也納的社會黨人創設了一種異乎尋常的行政機構，使牠變成了世界上成績最好的市區。他們用一種巧妙而有點激烈的捐稅制度，籌得經費來辦理各種空前的平民福利事業；他們建立免費醫院、公共浴室、健身房、療養院、學校、幼稚園，以及容納着六萬家社會黨人的巍峨而明朗的住宅——這些住宅即使說不上豪華，卻是很清潔雅緻的。他們已消滅了貧民窟；他們大大地減低了肺癆病患者的比率；他們從綽有餘力的富人那裏拿錢來，爲有價值的貧民造福。維也納社會黨人的成就，乃是戰後歐洲各國在社會方面的最可欣喜的紀念碑。結果呢，那些教士將牠完全轟燬了。

在三十年代最初數年間，由於可怖的貧困和緊縮，社會黨與其反對派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起來了。奧地利銀行的倒閉，使全國損失了十萬萬先令（Schilling），約合英金二千八百萬鎊。農產品在多瑙河流域的跌價，又斷送了奧國的淡薄的貿易。國內的政治機構幾乎緊張得要爆裂了。得到百分之四二的選民擁護的社會黨，乃是全國最大的政黨，但社會黨人偏處於維也納市內，並不去顧管全國；假使他們要想組織少數黨的內閣——因爲其他各黨聯合起來，票數就可以超過他們——也許就會發生內戰。由「內衛團」鼓動的小規模暴動，本來已時有發生，緊張的程度日益加甚了。

一般人依舊啜着咖啡，夢想着大戰前的光榮時代，似乎不大注意這種危機。醉人的黨風所造成的維也納的懶散氣氛，將一切的政治都包裹在倦怠的濃霧中。當「關稅同盟」和奧地利銀行等問題在全世界的報章裏

一頁上大施猖獗的時候，維也納報紙上所刊載的駭人標題，卻是關於市立劇場的收入不足。亞里斯多德曾說，人（原文爲男性的 *Hum*）是一種政治的動物；但維也納卻是女人。她對於政治——尤其是她自己的政治，沒有實際的頭腦。多瑙河諸國聯盟的計劃，僅使維也納人打了一個呵欠——但當錢利乍（*Jariza*）在湯好塞（*Tannhausen*）一曲中少彈了一個 C 高音的時候，全市都哄動起來了。奧國雖窮，但牠每年給予歌劇院的津貼卻達二十萬鎊之鉅——這樣就一切都很好。

於是發生了兩樁事情，驚醒了維也納的昏睡。其一是陶爾斐斯，另一是希特勒。

二 「十二開」的迭克推多

恩格爾勃忒·陶爾斐斯博士（*Dr. Engelbert Dollfuss*）在西歐的政治舞台上出過兩年風頭，因爲身材只有四呎十一吋高，是戰後最年青，最短小的獨裁者，故有「小梅特涅」（*Meinmeternich*）之稱。他於一八九二年十月四日，生於下奧地利省的坦克辛（*Tainitz*）村中。出身很低微；他的母親和弟兄們現在仍在他誕生的田莊附近墾地。他畢業於中學後，就進維也納大學研究法律；大戰爆發後，他在前線服役了三年。他去從軍時是一個小兵，但回來時已變爲一位上尉了——這在帝政時代的奧國陸軍中是很難得的事。

陶爾斐斯生來是一個農民，虔信上帝，這是他性格中的要點。他的可愛之處和力量，大半來自其極單純的性情；他的謙遜和爽直幾乎達到天真爛漫的程度。一個外國人如用恭維話去接近他，就會聽到一種粗大的農民聲

調回答道：Ach—aber gehen Sie（哦，說下去吧……）。他演說時絕不故弄玄虛，他的內閣中有好幾個閣員是專家，當他們演說時，他恭恭敬敬，專心一志地傾聽着，好像一個小學生一樣。他自己的演說是緊張、腫脹，而過於精細。他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的信心給了他一種古怪的天真，好像是一個聰明的老教士。

當然，他那短小的身材給了他不少助力。在國社黨的那些大漢面前，他變成了大衛（David）。他的短小將他送入了奧國政治的中心。他好像是一個「吉人」。你可以對一個身長六呎的大人發脾氣，但一位不着皮鞋身高不到五呎的內閣總理卻是無法抗拒的。（不用說，在他愚蠢地攻擊社會黨人的「二月事變」以後，這種感覺已煙消雲散了。）陶爾斐斯的身材雖短小，但並不是「矮子」。他不過體格比普通人短小了一點，但全身的各部分還是相稱的，容貌也很端正。

形容他的短小的笑話多得很：有一天他從梯子上跌下來，折斷了一條腿；因為他要爬上去採一朵蒲公英。——警察發現了一種謀害他的陰謀；有人在他的寢室裏暗裝了一只捕鼠機。——郵局將要發行一種郵票來紀念他的勝利，這種郵票上將鑄着他的肖像，跟他本人一樣大，並不縮小的肖像。——一位奧國物理學家因作分裂原子的實驗而得到了諾貝爾獎金，其實驗的題目為陶爾斐斯。——他夜間激動得睡不着時，就起來在床鋪底下踱來踱去，或在他那凍結的面盆裏跑冰。——他去拜訪墨索里尼時，並不是坐火車去的；他是被當作航空郵件載去的。——奧國的參謀總長在閱軍時，突然看到隊伍前面有一只烏龜，他不勝驚異；但仔細一看，他的驚異就消失了，原來那是總理大人，頭上戴着一頂鋼盔……

陶爾斐斯是以基督教社會黨（保守的）黨員的資格進身政界的，該黨的領袖是一個詭譎的教士——格奈士·蔡貝爾（Ignaz Seipel）。陶氏與農業發生了關係；他在下奧地利省組織了一個農民協會，不久就變成了現已壽終正寢的奧國國會中的一位議員。聯邦鐵路局恰巧需要一位農業專家，他就加入了牠的管理委員會；一九三〇年十月間，他變成了鐵路局長。一九三一年三月間，他得到了一個閣員位置——農業部長。一年後，萊虛博士（Dr. Buresch）領導的基督教社會黨內閣因某一棘手的事件而辭職了。陶爾斐斯奉命組織新聞。旁的人沒有一個願意幹這沒有把握的事，因為該黨在議會裏只有一票的多數。陶氏在受命之前，祈禱了一整夜。這是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的事。自此以後，他就做着內閣總理，一直做到兩年餘以後那些國社黨人殺死他的時候。

當他接受總理之職時，沒有一個人以為他會做久的；老實說，沒有一個人以為他有什麼本領。在他就職後第一星期內，作者會和一羣新聞記者跟他同進點心。誠懇、害羞、疲乏、而興奮的陶爾斐斯坐在那裏，抽着煙，談着話，一直到天黑。我們當時就覺得，這也許是一個有獨創性的人物。不久以後，他的兩種主要的處世手腕就顯露了出來：（一）隨機應變的本領，（二）對於戲劇的感性。使奧國可以得到三萬萬先令的「洛桑借款」協定（註）已提出於議會中，請其加以批准。那些社會黨人和「大日耳曼黨人」都反對批准。在這天早晨，政府黨的領袖蔡貝爾博士卻死了。陶爾斐斯的一票多數已到天上去。那小總理立即就命一個候補議員宣誓補了進去，同時又強迫他的黨內的每一個黨員去出席——無論是健康的或患病的；有一個議員由三個同志扛了進去，還有一個由醫院

裏出來，就直接到議會裏去，頭部繫滿着綳帶。結果陶爾斐斯勝利了——多得一票。而且是用了這麼反常，甚至暴虐的手段得來的！——奧國的人民驚駭地喊。在幾個禮拜以後，又有一件重要的議案要付表決。陶爾斐斯又勝利了，而且仍舊多得一票。那沒有投票的一個反對者是前任總理叔勃博士（Dr. Schöberl）——他已在上一天夜裏逝世了。

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奧國的國會竟然自殺了。這是一樁古怪的、典型的維也納事件。正在一件重要的議案要投票表決的時候，一個社會黨議員出去「解手」。於是一個同伴就代他投票，但一不小心卻在票子上填了自己的名字，沒有將那不在的議員的名字填進去，就將這張寫錯的票子投到了票櫃中去。投票的結果是八十一對八十票——反對政府者勝。但那豪爽的社會黨議長梭納博士（Dr. Reumann）卻宣稱，投票時有違法的行動。（註三）他後來一定常常懊悔此舉的。因為這樣一來，議會中就騷動起來了，而在混亂之際，梭納博士竟糊塗得辭了職，走出了會場。兩個副議長也跟着辭了職，會議就在喧噪中告終。

於是聰明的陶爾斐斯博士就發見國會已不能依法重行集合，因為法律規定只有議長或副議長才能召集會議，現在三個人既然都已辭職，就都沒有這種權力了。這其實不過是一種可笑的、小小的意外頓挫，可是奧國人是極其守法的，因此奧國的議會政治就壽終正寢了。陶爾斐斯好像一隻猛犬似的抓住了他的機會。他也提出了辭呈——他已知道政治上的訣竅：非在人家少不來的時候，決不提出辭職——他立即就奉到復職的命令，且賦有緊急處置的權力。在三月七日，維也納發見了一大批法令；人們一看牠們，才知道陶爾斐斯已做了他們的

「迭克推多。」

他的運道，直到最後，始終是非常好的；但最幸運的事卻發生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三日下午兩點十五分的時候：他遇刺了。在兩點十四分的時候，他還不過是一個內閣總理；到了兩點十六分，他已變成了一位殉道者，而且是一位活着的殉道者。只有好運道才能使那兩顆在不到一碼外放過來的子彈沒有打中他的心臟。他對於演劇的極大感性使他在病床上作了一番無線電廣播演說，這一來他就變成了世人最寵愛的病人。那個刺客原來是一個有點「焚琴煮鶴」風味的國社黨。希特勒是多麼恨他呀，因為他竟使其最壞的敵人變成了一位英雄！原來在這時候，國社黨的巨大陰影已在開始向奧地利籠罩下來了。

三 北方的劫掠者

希特勒已在這一年變成了德國的總理，他要併吞奧國的原因是很多的；在我的奮鬥開宗明義第一節中，他就提到了奧國和德國的合併。

(1) 因為他自己是奧國人，所以奧國的「舉止乖方」，他認為是自己的同胞直接棄絕他，損害了他的威望，是一種不可饒恕的過失。

(2) 住在與「第三帝國」接壤的奧國的六百五十萬日耳曼人，不但不崇拜卍字旗，反而嗤笑牠；這樣的情形當然不是國社黨的「大日耳曼主義者」受得住的。

- (3) 德國亟需在外交上得到一種勝利；進攻奧國如能成功，就可以遮掩住國內的不滿了。
- (4) 奧國的斯蒂里亞 (Styria) 省內蘊藏着豐富的鐵礦，這可以補救德國的鐵產飢荒。
- (5) 如果奧國併入了德國，「中歐大帝國」 (Mitteleuropa) 的夢想就可以逐漸實現了；捷克將被包圍，國社黨的勢力可以一直伸張到匈牙利及其以南的大平原上。

在最初，奧國境內的國社黨勢力是很小的。當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間舉行最後一次大選時，他們一個議席也沒有得到，雖然這時候的希特勒在德國得到了六百萬票。希特勒榮任總理後，國社黨就在奧國人中間日益得勢了。要是國社黨人的舉動不是這樣愚蠢，奧國也許早已投入他們的懷中了（因為奧國人終究也是日耳曼人啊。）與社會黨意見不和的陶爾斐斯，地位是很不安穩的；「內衛團」對他的支持也靠不住；含着妬意的天主教政客在暗中拆他的臺。而最有利於國社黨的，是奧國人的失敗論；奧國人不願意作戰，他們的態度多少有幾分如此：「唔，如果德國人要把我們併在一起而支持着我們，那有什麼不可以呢？」但是那些國社黨人並不靜待時機，卻採用了一種大規模的恐怖政策和暴力行動。這逼得奧國自己站起來了；這做了奧國人的潛伏着的愛國精神的後盾。接着，德國境內的「希特勒主義」又疏遠了不少奧國的教士、社會黨人和猶太人。在一九三二年的時候，奧國人民大概有百分之八十是贊成「德奧合併」的。到了一九三三年年底，至少有百分之六十的奧國人是反對合併了。原因是希特勒的恐怖行動。

雖然如此，當國社黨的進攻正式發動時，陶爾斐斯也遭遇了極大的困難。國社黨的暴行有槍擊、毆打、轟炸、恐

嚇、造謠、誹謗等等，幾乎日有發生。那短小而倔強的總理也盡力反攻。在「五一節」他禁止社會民主黨舉行照例的集會遊行，又在維也納的林蔭路（Ringstrasse）上佈滿了軍隊和鐵絲網以示威——這使民衆吃了一驚。接着，他將那正在奧國各處周遊演說的巴威亞（Bavaria——德國的一省）司法部長弗蘭克博士（Dr. Frank）驅逐出境。德國的報復行動是對每一個到奧國去遊歷的德國人處以一千馬克的罰金，這使奧國的旅行業受了一大打擊。陶爾斐斯對此的報復，是宣告國社黨爲非法組織。在柏林，奧國公使館的情報部長也被捕而驅逐出境了。這事發生於陶爾斐斯將對「倫敦經濟會議」致詞的前夕。這件意外之事使大家非常注意他的出席，而他得到了一場極熱烈的歡迎。國社黨人就以更甚的暴行來對抗。

於是一場戰爭爆發了——這是古今中外聞所未聞的最古怪的一場戰爭，雖然並不流血（除了邊境上的小衝突偶有死傷外），但仍舊不失爲戰爭。國社黨人侵入了奧國。他們越過了邊界——從空中。他們的飛機丟下了大批宣傳品來；他們在莫尼哈的無線電臺，借了希特勒的「奧地利總監督」哈璧德（Harold）先生的喉舌，從以太中送過了許多演說來。從奧國逃奔出去的奧國國社黨員，在德國的境內被組成了一個「奧地利軍團」（Austrian Legion——即所謂「奧地利客籍軍」）其直言不諱的目的是克復故土。局勢日益緊張起來，直到最後「列強」覺得實在受不住了；英國、法國和意大利聯名向柏林提出了一個嚴厲的抗議，那些國社黨人才安靜了一些時候。

雖然如此，在一九三三年終時，陶爾斐斯的前途看起來還是非常暗淡的。

四 南方的保護人

接着發生了三樁非常重要的事。第一，墨索里尼將陶爾斐斯放進了自己的口袋裏，在實際上做了奧國的「太上保護者」。這是因為意大利不願有強壯的普魯士人來代那些孱弱的奧地利人扼守意奧交界的伯倫尼要隘 (Brenner Pass)。如果奧國社黨化了，實際上就等於德國人進了厥里司得 (Trieste)——亞得里亞海北岸的意國重要港口) 的後院，瞭望着意國北部的郎巴地 (Lombardy) 平原；而意大利政策的要點是要維持着奧國的獨立，作為兩個「法西斯」大國間的緩衝。而且意大利的南帝洛爾 (South Tyrol) 省內還有二十萬講德語的人民——在墨索里尼方面說起來，當然德國離他們愈遠愈好。陶爾斐斯前後去拜訪了墨索里尼三次。他們的利害是一致的。

第二，陶爾斐斯將日益擴大的權力讓予了「內衛團」該團的領袖是一個年青貴族「冒險家」史泰亨堡親王 (Prince Ernst Rudiger von Starhemberg) 和一個倔強的維也納退伍軍官費少佐 (Major Emil Rey)。「內衛團」是深惡痛嫉社會黨的，牠在實際上變成了陶爾斐斯政府的非正式軍隊。該團要求對社會民主黨採用日益嚴厲的行動，作為其支持的交換條件。陶爾斐斯解散了社會黨的「自衛隊」，時常譏刺、質難社會黨的領袖們，減輕維也納市區的財政上特權，不住地順從「內衛團」的挑撥。而且「內衛團」的經費一部分是由意大利接濟的，所以陶爾斐斯落在兩重的意大利掌握中了。

第三，陶爾斐斯已兼任了五個關員的職務（奧國內閣中共只有九個關員位置），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獨裁者；他又宣告將公佈一種新憲法來改造政府，以權威主義和「同業公所」（*Standische*）為基礎。他這主意得自一九三一年「四旬齋」的教皇通諭；在其中，教皇庇護司十一世（*Pius XI*）曾籲請大家停止社會爭鬪，並勸告採用職團制的社會組織以「治療」階級戰爭。這種辦法如果完全實施起來，那在社會黨控制下的「工會主義」就完了；所以那些社會黨人要拚命反對牠。同時，陶爾斐斯又創立了「祖國陣線」（*Vaterländische Front*）以輔助新憲法，那是一種超越黨派的國民運動，是以愛國為前提的。墨索里尼對這兩個辦法都加以贊許。

但是德國方面的危機又急迫起來了。奧國政治上的平衡一直被擾亂着。本來是旗鼓相當的兩派——社會黨與教士——互相爭雄，現在陶爾斐斯卻陷在猛烈的三角爭鬪中了；全國分成了勢力約略相等的三個集團——社會黨、國社黨、政府的「內衛團」。這場爭鬪的前途是很難估計的。陶爾斐斯站在「中央」向「左」「右」兩面應戰。如果國社黨人和社會黨人聯合作戰，那他就要被擊敗了。可是希特勒使社會黨與國社黨攜手的事成為不可能。於是另一種危機出現了：國社黨人和「內衛團」着手作秘密談判了。

為要改善自己所處的苦境，陶爾斐斯自己也開始對國社黨人暗送秋波了。他的政策始終是取守勢的；他願意在奧國獨立的基礎上跟國社黨議和。希特勒也贊成了議和。詳細的節目當由陶爾斐斯與哈璧德加以解決；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哈璧德依照約定的辦法，在莫尼哈跨進了一架飛機，就向維也納飛去了。但在最後一分鐘，

陶爾斐斯卻撤消了這個計劃——其理由是，國社黨違反停戰協定，在前一天晚上又作了恐怖行動。哈璧德是在半空中被陶爾斐斯打來的無線電阻止了前進。

在下一星期，墨索里尼的外交次長蘇維區（Svirich）正式造訪維也納。他提議了一條新的出路。奧國政府在左右兩面的夾攻中是絕難倖存的；陶爾斐斯必須先將敵人消滅其一，然後可以專心對付其他的一個敵人。墨索里尼痛恨奧國的社會民主黨人，因為他們曾在上一年的希登堡（Hirtzbühl）軍火案中揭破他私運軍火到匈牙利去。所以那些意大利人告訴陶爾斐斯，以消滅社會黨人的辦法來「解決」其問題。他們說道，「肅清那些社會黨人——無論用什麼方法都行。」這就是接着發生的可怕事件——二月裏的內戰——的真因。

（註一）由列強擔保而借給奧國的「一九二三年國聯復興借款」快要到期了，而奧國卻無力清償。如果到了期，真的不予以清償，那末列強就得賠出這筆錢來，還給原來的那些投資人，所以他們決定再借些錢給奧國，說是要「保全」奧國。——這就是「洛桑借款」的起源。

（註二）這次所談要表決的，是一件為鐵路工人求寬厚待遇的動議——那些鐵路工人已在幾天前罷了工，因為鐵路管理局負債太多，無力發全薪給那些工人。工人們就加以抗議。這律只因為鐵路局的銀箱中少了幾千個先令，奧國的議會政治竟一命嗚呼。

第二十三章 二月慘劇

一 事前的準備

這場內戰，在歐洲各國內閣中引起了惡劣的反響的，陶爾斐斯政府稱之為社會黨「革命」。正如德國的國社黨人要世人相信，他們是從馬克主義的洪流中把德國救拔了出來一樣，那些「陶爾斐斯——內衛團——天主教士」的代辯人也解釋他們所以要用野戰砲來屠殺公共住宅中的婦孺，乃是為要鎮壓「赤化的叛亂」。這話當然是不確的。二月十二日的悲慘可怖的流血，乃是冷酷無情的法西斯（內衛團）「政變」所造成的。社會黨人當然會加以抵抗，當德國的軍隊在一九一四年侵入比利時境內時，那些比利時人也加以抵抗的。首先放槍的或許是比利時人，但引起大戰的並不是他們。

政府以「赤化」的罪名加在社會黨的兩個領袖——鮑安博士（Dr. Otto Bauer）和德志上校（Col. Julius Deutsch）——身上。其實呢，倒是這兩人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牌子，在一九一九年把奧國從「赤化」中救了出來。當時巴威和匈牙利都先後陷入了共產黨的掌握中。政府又說社會黨的「自衛隊」隊員私藏軍器。他們確乎是有軍器的——這些軍器還是政府自己交給他們的。當局故意忘了，當一九二〇年邊境上發生危機

時，「自衛隊」特地武裝起來以防禦南斯拉夫，而且嗣後多年間，「自衛隊」一直與正規軍共同保管着那些軍器。政府又說，那些社會黨的公共住宅乃是「堡壘」。當然囉，任何現代的房屋，當敵隊對牠開火而裏邊有帶槍的防禦者時，都可以立刻變成一座堡壘的。

在史泰亨堡和費少佐（他在當時是內閣副總理）領導下的「內衛團」自一九二七年以來就一直竭力要消滅那些社會黨人。在一九二九年，一場「內衛團」的暴動是憑着極大的僥倖才得避免的；而在一九三一年，斯帝里亞省內的「內衛團」叛亂是用軍事行動來平定的；結果史泰亨堡被捕下獄，判處罰金五鎊十先令。（詳見 G. E. R. Gedye 的名著哈布斯堡皇室的後嗣 [Heirs to the Habsburgs] 第一〇五頁。）於是，在一九三二年，蔡悲爾將「內衛團」帶入了他的政府中；而在陶爾斐斯治下，這組織竟被官方認為了一種輔佐的軍隊。社會黨人的厄運並不是由進攻的行動招來的，而是由因循偷安企圖妥協招來的。這種態度被「內衛團」認定是實力不足的徵象。社會黨人要和平；但「內衛團」卻要戰爭。

在哈壁德碰壁、蘇維區訪奧以後，「內衛團」就如怒馬脫韁一樣了。牠的領導者決意強迫陶爾斐斯動手，因為這小總理害怕流血，似乎還在猶豫不決。為方便起見，他就前往匈牙利作正式訪問去了；究竟他對於其離國期間所發生的事故會予以若何程度的鼓勵，沒有人能確說。全國的「內衛團」日益在各省放肆起來了。讓我們引用英國國際事務皇家學院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所出版的國際新聞公報 (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News) 的記錄來說明當時的情形吧：

一月三十一日「內衛團」的領袖向帝洛爾省省長提出了六個要求，這些要求如實行起來，就等於在該省建立了半軍事性質的統治……在上一天（三十日）已有「內衛團」八千名總動員，以防國社黨人的擾亂。

二月六日 上奧地利省的「內衛團」領袖，得了「祖國陣線」的支持，據說正在提出與帝各爾省相同的要求，他們的部隊已佔據了省會林茲（Linz）市內的一部分公共建築。

二月七日 斯蒂利亞和布根蘭（Burgenland）兩省的「內衛團」領袖，向各該省的省長要求建立一更有權威的政府和一種半軍事性質的行政機關。

二月八日 警察搜查勞工時報（Arbeiter Zeitung）的辦事處……幾天以前，曾在許威卡德（Salzwedel）地方，社會黨人可以自由進出的房屋中查獲了許多軍器和爆炸物——這次搜查的勞工時報館乃是其後果……

二月九日 沙爾七堡（Salzburg）的「內衛團」領袖向省長提出了權威主義的要求。據說下奧地利省的省長會拒絕接見當地的「內衛團」領袖，其理由為他們的要求不合憲法。又聞「內衛團」正在要求政府下令禁止社會黨並佔領誰也納市政廳，社會黨總部得此消息後即宣稱，此等行動將為總罷工的信號。陶爾斐斯自匈京布達佩斯回來，接見「內衛團」的領袖們。

二月十日 內閣副總理（費少佐）剝奪了維也納市長（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和市府其他官員的監

察公安事件的職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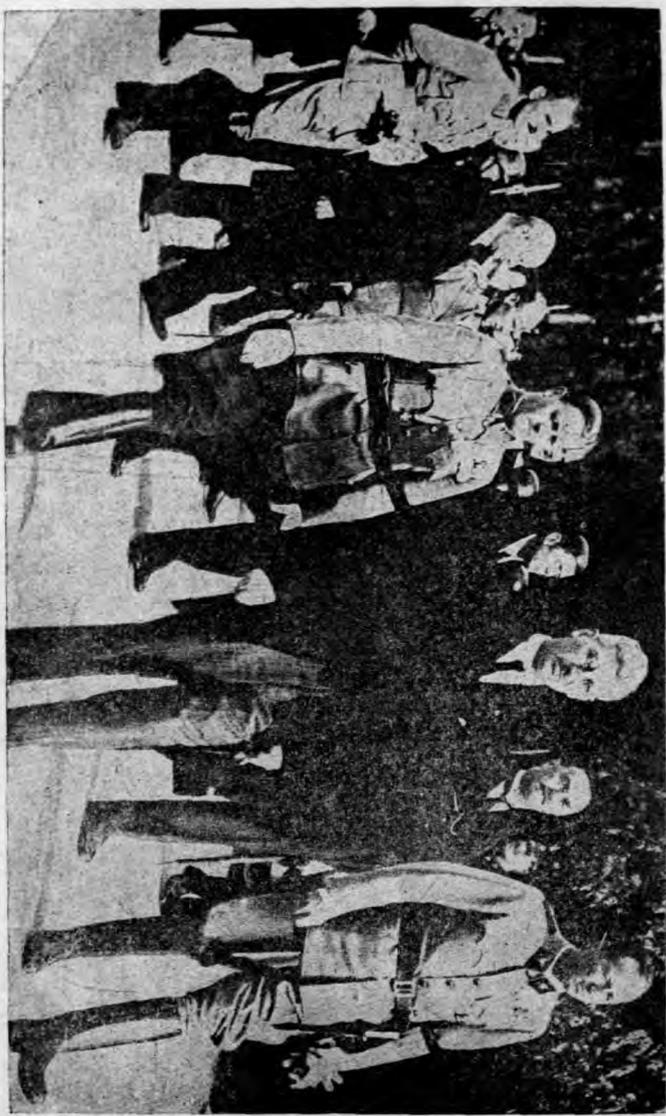
二月十一日，在檢閱「內衛團」時（當時軍事部長也在場），費少佐演說道：「在最近兩天內，我已經斷定陶爾斐斯先生是跟我們站在一起的。明天我們要肅清奧地利了。」

費少佐的說話是極可靠的。在二月十二日，戰事就發作了。

二 序幕初開

這天上午八點半左右，當地的一個通訊社打電話給我，說戰事已在林茲爆發了。他知道的情節很少。彷彿是「內衛團」的衛兵要侵入那些社會黨工人的住宅，工人們就起來抵抗了。早在二月七日，我拍給自己的報館（芝加哥每日新聞）的專電就以「內戰頗有可能」一語為結論。但在十二日早晨，我以為陶爾斐斯或許還能保持其理智而避免這迫切的危機的。社會黨的領袖鮑安博士在不久以前曾告訴我，他將與陶爾斐斯舉行「談判」。我打電話給社會黨的機關報，勞工時報，可是沒有回音。我就奔出去探訪消息；在十一點三十分左右，我就回來寫我的報告。在十一點四十五分鐘的時候，我的內子說：「試把電燈開開看。」我把電鈕轉了一下——不亮。啊，總罷工了！

當時我們以為是總罷工，可是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只是電業工人的一部分罷工。他們一得到林茲發生戰事的消息，就自發地丟下了工具。我看到街道上異常靜寂，因為電車都停駛了；多數的司機和賣票人都不知道電流



費，舒斯尼格與史泰亨堡

爲什麼突然斷絕了；小羣的好奇民衆圍繞那些「拋錨」的電車。（這天午後，我們看到無數汽車和馬在把那些電車拖到車廠裏去……）到了勞工時報館門前，我才知道那些戴鋼盔拿盒子礮的警察已排除了館內的人員。我們夫婦倆跟兩個友人駕着汽車，匆匆地穿過了奧太格林（Ottalring）和郝那爾斯（Hernals）兩勞工區域。當我們駛近一所市辦的大公寓時，我聽到了已有多年不聽見的刺耳的、不和諧的聲音——來福槍聲。

這場戰事在維也納持續了四天，在各省持續了五六天。被殺死的男子、婦女和兒童約有一千人。九個社會黨領袖被處了絞刑，其中有一個已受了重傷，是從一具擔架上被拉到絞刑臺上去的。馬克斯院和哥德院——世界上最精美的兩排工人住宅——都被礮火轟燬了。我在轟擊後幾小時在哥德院裏看到了一個場面：悲傷的婦女和害怕的兒童可憐地注視着那些警察。那些簡單、乾淨的小房間都被礮彈炸碎了。我走到幼稚園裏去。書桌、黑板、教科書、顏料匣、玩具……都被搗爛了，跟折斷的樑木和落下來的灰泥雜在一起。在一堵牆壁上，釘着一幅顏色紙的圖案，旁邊得意地寫着作者的名字——年六歲。一顆子彈已在這幅圖案上穿了一個洞。在另一堵牆上——在這馬克斯主義的「無神論者」的教堂中——掛着一幅石印的「耶穌受難圖」。其玻璃框子已被「基督教社會黨」的礮彈擊碎了。

我直到二十二日才得跟陶爾斐斯晤談。當我提起社會民主黨的領袖鮑安和德志——他們已在戰事絕望時逃往捷克去了——曾在勃拉蒂斯拉伐（Bratislava）告訴我，說他們在十二日上午竭力想跟陶氏接洽，以期在最後一分鐘成立一種妥協辦法以避免流血，但始終沒有成功——的時候，那位總理好像莫明其妙似的，誠懇

地溫和地說道，當電燈熄滅時他正在聖斯蒂芬禮拜堂中做「彌撒」——他對於電燈的熄滅，認為只能解釋作總罷工的信號。……在十三日午後，當戰事正在最劇烈之際，陶爾斐斯卻跟教皇的代表在一道喝茶，恬靜地談了一小時。

陶爾斐斯和「內衛團」所得的戰利品極多。在土耳其人劫掠歐洲以後，實在沒有人得到過這樣多的戰利品。社會黨的市政府擁有維也納的土地，不下百分之三五；牠僱用着五萬四千人，乃是中歐最大的企業機關；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牠在住宅等計劃上所化的費用，幾達二千二百萬鎊，其基金即以存在各市立儲蓄銀行中者而言，已有一千四百萬鎊左右了。牠所收的捐稅每年約有五百萬鎊，而且牠還辦着那市立煤氣廠、電力廠、電車、公共汽車、地下電車、屠宰所、公共浴室、一個公墓、一家釀酒廠、一家麵包廠和一家很大的百貨公司。這一切都歸入了中央政府的掌握。成千成萬人被捕了，成千成萬人失業了；這場事變所造成的社會紊亂是很厲害的。

三 社會黨的內幕

關於這場「叛亂」在社會黨方面的祕史，還沒有人全部講出來。

這場衝突的一個極重要因素，乃是社會黨領袖鮑安與陶爾斐斯之間的深刻的私人仇恨。

鮑安是一個極有修養的猶太人，年五十五歲，可算是社會民主黨的「智囊」。他是一位「紳士政客」，他的行為是摸倣英國的「紳士政客」的，不過他將他們稍微理想化了一點。他很忠厚，審慎，公正。他是一個不折不扣

的知識分子；他造出一番健全的理論，但絕對不能應付意外的情勢——他往往要輕視或竟否認這種情勢的存
在或其重要性。陶爾斐斯恰巧相反；他幾乎跟一個跳蚤一樣的不會講理論；他只是憑着本能跳來跳去。

鮑安對人的判斷頗不正確。對於基督教社會黨的領袖蔡貝爾的智力，他是欽佩過度了；他稱蔡氏為一值得
他筆伐的敵人；他所愛好的政治，乃是在工時報的封面上跟在帝國郵報 (Reichspost) 上發表文章的蔡貝
爾反復辯論；而對於陶爾斐斯，鮑安卻輕視得厲害。他稱之為傻子。其實，狡黠如農民，迷人如兒童的陶爾斐斯，決不
是一個傻子。鮑安曾在議會裏公然稱這位總理為撒謊者和「無賴」 (Schurke)。陶爾斐斯永遠沒有饒恕他。要
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或許只要設法取銷鮑安的黨魁地位就完事了，但這位總理的心思還要複雜得多。他知道
黨對於鮑安，比他自己的地位是更重要，只要黨繼續存在，他對於自己的境遇是不大顧念的；所以陶爾斐斯決意
要將社會黨連鮑安一併除去。

在這深刻的私人仇恨後面，自然還有社會黨人在意識方面和政治方面所處的極困難的境地。在一九三四
年，正統的「第二國際」社會主義，是跟馬車一樣老式的。被夾在法西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反對派之間，原是革命
黨的社會黨人已變成了一個中央黨。他們代表着有工作的工人；而且在哥德院或恩格斯院過了多年舒適的，近
乎「蒲爾喬」的生活以後，他們已喪失了不少革命的熱情；他們已不像先前那樣熱心於參加巷戰了。

「社會主義」在奧國失敗，是由於其自己的清高。那些社會黨人厭惡流血和暴行；他們不相信他們的敵人
是會欺詐和殘酷無情的；他們天真地相信了他們的反對派的謊言，因為他們自己的性格是以正直和誠信為主

的。

「在戰略上，社會黨人處於一個絕望的境地，」新聞記者弗蘭西斯·根善 (Frances Gunther) 曾在那時寫道。「以社會主義者的地位而論，他們是信仰無產階級獨裁的。以民主主義者的地位而論，他們又信仰多數黨的寬容的統治。由於兩頭落空，他們就跌下來了。他們社會化了一部份奢侈品，但並沒有社會化什麼生活必需品。在一九一九年時，他們曾有機會取得奧國工業的樞軸——亞爾本鋼鐵公司 (Alpine Montangesellschaft)；但他們卻放過了這個機會，只是爲維也納的小子們建築漂亮的游泳池和公園，其經費則得自公平的捐稅——但正因爲這種捐稅是公平的，所以原來的上層階級覺得加倍難受。在軍事方面，以社會主義的地位而論，他們是把自己武裝起來了。但以民主主義者的地位而論，他們卻沒有解除其敵人的武裝。」

自一九三二年以後，鮑安及其部下的處境是日益窘迫了。陶爾斐斯的策略是逐漸削去他們的勢力，但決不給他們一個堂堂正正的題目來反對他。失業和經濟恐慌的加甚，已使社會黨的無上武器——總罷工——使用起來日益危險了。領導着全國最大的政黨且擁有維也納百分之六十的選民的鮑安，真可爲非實際主義和清高的表率，他竟向陶爾斐斯提議：只要國會的主要委員會能繼續行使職權，就准許陶氏獨裁地統治兩年。陶爾斐斯卻拒絕了。社會黨人前後十七次提議解除其「自衛隊」的武裝，只要政府同時解除「內衛團」的武裝。陶爾斐斯並不作明白的答復，只是讓鮑安懸空吊着。最後，社會黨人宣佈了將引起總罷工的四樁事情：(1) 以法西斯的憲法加諸奧國，(2) 在維也納設一政府特派員，(3) 解散社會民主黨，(4) 解散各工會。陶爾斐斯一聲不響，只

是高高興興地將這四項事情黏在他的帽子裏。他知道他只要避免這幾樁重大的激怒的事，他就可以得勝了。

鮑安自己也慷慨地承認了他的錯誤。在其近著燄火下的奧國民主主義 (Austrian Democracy Under Fire) 第四十二頁上，論述國會之死時，他說道：

「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我們很可以用總罷工來抗議的。絕沒有一個時候的形勢對於罷工像當時那樣有利。正在那時達其最高潮的德國反革命，已喚醒了奧國的大眾。多數勞動者正在等候着作戰的信號。鐵路工人還沒有像十一個月以後那樣的被壓倒。政府的軍事組織也比一九三四年二月裏薄弱得多。在當時，我們很可以得勝的。」

可是我們卻沮喪地縮退了。我們仍舊以為可用談判來求得和平的解決辦法。陶爾斐斯會答應不久就跟我們開談判……我們仍舊愚蠢得相信陶爾斐斯的話。我們遷延着不作戰，因為我們要避免悲慘的內戰的災禍。不料內戰終於在十一個月之後爆發了，而這時的形勢對於我們是不利得多了。這是錯誤——我們的最致命的錯誤。」

四 變本加厲的混亂

在二月十一日的晚上，即內戰爆發的前夜，鮑安夫婦跟兩個友人在電影院中看嘉寶 (Greta Garbo) 主演的大飯店 (Grand Hotel)。那「布爾雪維克陰謀家」是這樣準備其「革命」的回到家裏時，他看到了林茲

的「自衛隊」領袖培那賽克 (Bernack) 寄來的一通密電，說「內衛團」明日或將進攻，他（培那賽克）將以武力抵抗之。鮑安吃了一驚，就發了下列的回電給培那賽克，囑他不要挑釁：「姑母安好，醫生及奧都姑丈皆認為此刻不宜有所舉動。」但暴躁的培那賽克卻覺得鮑安太謹慎了，竟不願這個命令，在第二天就拿起武器來自衛了。

接着發生的乃是革命史上的一場最可怖的混亂。

鮑安在八點三十分左右得到了林茲流血的消息。他立即召開工會與社會黨的執行委員會會議。舉行總罷工的動議僅以一票的多數而得通過。這時候，那勢力很大的電業工會中的工人，因非常憤怒，都寧願死戰而不願慢慢地被悶死，所以沒有奉到命令，就已經罷工了。於是發生了一樁可怕的事。總罷工的宣言急急地送到勞工時報的印刷所去付印。但在那些電業工人和舉行執行委員會會議的勞工時報館之間，並沒有保持聯絡。正當那些宣言要付印時，印刷機突然停止了。原來電業工人已截斷了電流，因此總罷工的命令始終沒有公佈出來，爲了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人沒有奉到命令就先罷工了。

預定的總罷工開始時間似乎是下午五時。原意是想嚇倒政府，實際上卻給了政府很可寶貴的七小時準備時間。鮑安和德志上校到「自衛隊」的總部去指揮作戰行動去了，但其他的社會黨要人卻靜待政府再來向他們求和。「自衛隊」的一個執行委員，柯爾納將軍 (General Koerner)，去見大總統米克拉斯 (Miklas)，一羣右翼社會黨人由前任國會議長梭納博士領導着，去晉謁下奧地利省省長，請他出來調停。（他們不願直接去找

陶爾斐斯，因為他們太憎恨他了，而且他們知道他不會見他們的。政府幹了任何頑強的政府都會幹的事，很方便，除鮑安和德志外，社會黨的全體領袖都留在羅網中，當局就把這班人完全逮捕了。柯爾納將軍真正是在米克拉斯總統的應接室中被捕的，其他的人——連正在採訪消息的社會黨新聞記者勃勞泰耳（Braunthal），在內——都被一網打盡。唯一保持着理智和尊嚴的社會黨人，乃是那老練的維也納市長，卡爾·蔡志（Karl Seitz），他死守在市政廳的辦公室中，好像一位軍艦艦長死守在司令橋上一樣，直到最後才被用人用武力拖了出去。

總罷工可怖地失敗了。一切可以出毛病的事物都出了毛病。自然沒有人會預計到陶爾斐斯和費少佐的毫不容情的銳敏和能力。在午後三四點鐘的時候，所有的社會黨重要領袖都已被捕下獄。為預防這樣的事變，社會黨對於每一職司本來都派有兩個副手，但他們也統統被捕了。結果，發號司令的人一個也沒有。本來預定以火車的停駛為總罷工的信號。但那些鐵路員工並沒有停駛火車，因為他們始終沒有知道已正式下了總罷工的命令。許多專差被派到全國各處去喚醒民衆——可是太遲了，他們多數都被捉住。在事前，本來已設立了一個聯絡委員會，以傳達各戰鬪者與司令部之間的消息。這委員會始終沒有開會，因為對於約定的聚會地點說錯了一點。

接着發生的那場戰鬪是很悲慘的。我大部分都看到。組織的散漫，看了真覺可憐。極端注重紀律的鮑安，已硬化了自己的黨。許多極想衝到街上去的年青人在星期一靜待了一整天，到星期二還在等候作戰的「命令」。可是命令始終沒有下來；於是這些年青人就開始放槍了，結果都被殺死。早在二月三日，政府得了叛黨告密的「自

「衛隊」隊員之助，已逮捕了一批重要的「自衛隊」領袖。多數工人並不知道他們的軍器藏在那裏。每區只有不多幾個人能辨認秘密貯藏軍火的場所。結果我知道許多年青的「自衛隊」隊員在星期一和星期二晚上，整夜用手在他們的住宅的院子裏挖掘着，發瘋地尋找他們知道會藏在那裏的軍器。他們始終沒有找得。

有一隊三百人的「自衛隊」隊員始終沒有得到軍器，因為那副司令拒絕在奉到上峯命令以前宣佈牠們貯藏的地點，雖然大家都猜到他的上峯已經被捕了。還有一個人，我知道很可用機關槍掃射一大隊警察的，但照規矩一個社會黨人在沒有受到攻擊以前是不准開槍的；因此這位機關槍手只好靜待那些警察佈就了很好的陣勢，向他進攻。政府已割斷了那些重要的電話線，以致各座被圍困的公共住宅彼此無法互通消息。在一所房子裏作戰的工人，不知道他們的伙伴是否還在繼續戰鬥。而且政府又在無線電台上不住地散播謊話和謠言——例如說鮑安和德志已帶着工會的公款逃走了。

對於社會黨的領袖們，各人的意見儘可以不同；但對於那些黨員的奮勇，卻沒有人能說一個「不」字。一枝一萬九千人的現代化軍隊，帶着機關槍、鐵甲車和野戰砲，足足化了四天工夫，才得擊破五千左右孤立無援、四面楚歌的「自衛隊」隊員的抵抗。這是一場毫無希望的戰鬥，可是卻很悲壯。全世界的勞動者永遠不會忘記維也納的無產階級在二月事變時的英勇的。

五 隱憂消滅了嗎？

在二月事變後，陶爾斐斯公佈了那職團主義的新憲法。昏睡了一年左右的舊國會被喚醒過來，令其實行合法的自殺。那部新憲法真是一種異乎尋常的文件，牠使人想到二十世紀的奧地利行將回復牠在十九世紀時的原狀了——歐洲反動派的中心和靈魂。自由的平民的參政權消失得影蹤全無了。哈布斯堡皇室復辟的門戶被打開了。以同業公所為基礎而選舉出來的議會，代替了原來的國會。憲法的弁言竟宣稱：奧國人民的一切「權利」都得上帝。

但佔有着那位小總理的心思的，卻是更世俗的事務。一個自相爭奪權力的混亂時期開始了：陶爾斐斯與史泰亨堡互爭國家的控制權，同時史泰亨堡又與費少佐互爭「內衛團」的控制權。陶爾斐斯恐怕「內衛團」勢力太大了，就扶助着另一種非正式軍隊的發展，那就是司法部長舒斯尼格博士（Dr. Schuschnigg）所領導的極端教士派和保皇黨的「衝鋒團」（Sturmabteilung）。「內衛團」傷心起來，就又要跟國社黨人眉來眼去了。（註一）而國社黨人就在這些混亂的蜜糖上好像蜜蜂似地砥食着。

自二月間直至仲夏，陶爾斐斯亟需全部的力量來求解決之方，故對於其最惡劣的敵人——國社黨人，他竟出乎意料之外地溫柔。一場新的暴力運動又開始了。他屢次恐嚇，說要絞死一個國社黨的恐怖主義者，但始終沒有實行。原因是：（1）他害怕報復；（2）他為其自己的官吏怠着；（3）他不願使國社黨的罪犯成為殉道者；（4）他仍舊不願關閉與德國談判的門戶。

不久時勢就表明，由二月事變獲益最大的乃是國社黨人。事實證明墨索里尼與蘇維混的計劃完全錯了。陶

爾斐斯殺害了那些社會黨人，非但沒有增強自己的地位，反而險惡地削弱了自己的依據，因為他破壞了全國政治上的民氣。國社黨人很高興，因為陶氏代他們除去了民主主義的最好保衛者——勞動階級的運動。社會黨人下去，國社黨人就上來了！雖然如此，墨索里尼的支持卻維繫着陶爾斐斯的地位。

前後五個月間，佈滿着一種不安的沈靜，只有國社黨人的炸彈聲不時打破這種沈靜。於是，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內戰又侵襲奧國了。在這以前，有一個社會黨的少年毆傷了一個警察，當局就決意拿他來做榜樣；這是一個極妙的機會，既可以實踐那些處死刑的恫嚇，又可以避免國社黨報復的危險。這個孩子，名叫約瑟·格爾（Josef Gerl），是在七月二十四日被絞死的。國社黨的叛變並不是這件事直接促成的。但在二十小時之內，陶爾斐斯自己也死了。說也奇怪，他絞死了一個社會黨人，接着那些國社黨人就殺死了他。

（註一）當時有一段最流行的談話，說「內衛團」團員遇見了另外兩個團員，在彼此分散以後，前兩個團員說道：「我疑心這兩個國社黨人知道我們是社會黨人呢。」

第二十四章 陶爾斐斯之死

一 後臺與前臺

陶爾斐斯的被殺，是「流氓政策」(Gangsterism) 進入歐洲國際政治的第一聲。六月三十日，國社黨人在德國境內仿效着阿爾·嘉邦 (Al Capone) 到七月二十五日，這種方法竟推行到了一個鄰國。這件暗殺案乃是一種深思熟籌的政策之實施；國社黨人不能不殺死陶爾斐斯，因為其他各種擊敗他的計劃都失敗了。陶爾斐斯的被殺，乃是一件有組織的謀殺案。

所有的暴動者似乎都屬於黨衛隊（即希特勒黑衫軍）第八十九團，該團為秘密潛伏於奧國境內的黨衛隊四支隊之一。參加這陰謀的分子多數原是奧國正規軍中因同情於國社黨而被革斥的下級軍官或士兵。其中還有許多現任的維也納警官巡長，他們所做秘密的國社黨活動在事前沒有被覺察——這是極重要的一點。

這些陰謀分子希冀從三方面得到支持：(一) 在德國有弗勞恩費爾特 (Frauenfeld) 和哈壁德，他們都是逃亡在外的奧國國社黨領袖。(二) 在維也納有一羣高級警官和警署行政人員，這些人後來都被捕或逃亡於國外。(三) 在羅馬有「安東王」林德倫 ("King Anton" Rintelen)。此外還有一個領袖，是一個神祕的平民，其

化名爲孔士(Kunze)，詳見下文。

安東·林德倫博士是一個白頭髮剪得短短的人，年紀五十八歲，樣子絕不像一個陰謀家；陶爾斐斯將他昇任爲奧國駐意大利公使，使他不致留在國內。他的勢力很大，所以不能公然加以革職。他曾在維也納的擾攘不安的斯蒂里亞省，做過十年省長。他狡黠、冷靜，而頗有野心；雖然那些國社黨人推舉他爲內閣總理，但他並不是國社黨人。他是林德倫。幾年以前他曾與社會黨人眉來眼去，希冀跟社會黨結爲同盟而取得政權。當社會黨失勢而，國社黨興起來時，他就私通國社黨了。他跟國社黨攜手，並不是因爲他愛好希特勒，而是因爲他要地位和政權。同時，國社黨人也需要他。他很「可敬」，而且他們知道取得奧地利的最輕易辦法是先建立一個過渡的聯合內閣。林德倫乃是他們的「奧國巴本」(Austrian Papen)——按：希特勒在攫取德國政權時，曾先請巴本爲內閣總理，而自己副之，故云。

斯蒂里亞省的許多實業家，都是林德倫的朋友。在他們的工廠中——例如奧國最大的工業機關：亞爾本鋼鐵公司——那些工人已照着挺進隊的方式祕密地被組織起來了。斯蒂里亞省的叛徒的軍火，也藏在這些工廠中。

德國曾用大批黃金來培植不滿的情緒和陰謀。據作者自可靠方面得到的資料，在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一九三四年七月這十七個月內，德國在奧國所花的宣傳費用共有七千五百萬馬克之多。對於陶爾斐斯的被殺，德國所負的道德上責任是無法否認的。莫尼哈的無線電臺，天天宣講着暴行。還有不少證據可以證明德國預先知道

這謀殺的計劃：

(一)據官方維也納時報 (Wiener Zeitung) 記載，莫尼哈的國社黨總部在二十五日上午九時左右備着一架特別飛機，預備載着哈璧德和弗勞恩費爾特凱旋地飛回維也納。

(二)早在七月二十一日，柏林就有一個通訊社將林德倫的照相送往各報館，上面標明着「奧國新總理——貯備刊用」等字樣。

(三)一個名叫亞伯勒格 (Abereger) 的國社黨人，因私運炸彈而在殷斯勃魯克 (Innsbruck) 被捕，(後被判處無期徒刑) 據他供稱：七月二十二日，即陶爾斐斯被殺前三天，曾有一個莫尼哈來的專差告訴他，奧國的武裝暴動定於二十五日起事。

(四)據意國的密探報告，「駐奧軍團」(在德國境內的奧國國社黨人) 在二十四日晚上，曾開至距奧國邊境二哩的地方。

(五)最重要的是德國官辦的「國民通訊社」(Deutsches Nachrichten Büro) 在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發出一篇通告，命令德國各報只許登載德國官方所發關於當天奧國尚未發生事件的記載。後來該通訊社又擬好奧國叛變「成功」的消息，分發各報，但實際上這時暴動還只有剛開始。

國社黨急於要下手，因為陶爾斐斯已預定本星期內到意大利的海濱避暑地利西奧尼 (Riccioni) 去訪問墨索里尼，他們恐怕墨氏與陶氏訂結了什麼新的協定，會把他們終於打敗。據有一說，這場暴動最初是定於七月

二十四日起事的，後來因有內線報告那些陰謀者，說是陶爾斐斯的最後一次開議將在二十五日舉行（並非如以前所料，在二十四日舉行），所以才延遲了一天。那些陰謀者原意是想將全體團員一網打盡。林德倫已在二十三日由羅馬回到維也納來了。表面上說是回來休養幾天。

背景是如此。現在再說七月二十五日的事變發動時的情形：

在上午十一時左右，那些陰謀分子已聚集在維也納的幾處街道上。他們組織得極好，行動非常準確順利。有一羣人一個一個地走攏來，聚集在柯洛佛拉廣場（Kolovrat Platz）的人行道上。他們已在上一夜從他們的領袖那裏得到了武器，有一部分人在他們的信箱中看到了指示他們在何處集合的紙片。這些陰謀分子並不全體都知道在上面發號司令者是誰；他們的暗號是一個數目——「八十九」。有十四人由柯洛佛拉廣場出發到無線電總站「拉伐格」（Raveg）去——暴動的信號是從那裏發出來的。他們並沒有化裝，而且是步行去的。在「拉伐格」所在的約翰街（Johannsgasse）上，有兩個穿制服的警察在閒蕩着，他們是那些暴徒的同黨，當時就「掩護」着他們，引導他們到無線電總站的門口去。

同時，更大的一羣人已聚集在西本斯端倫街（Siebensterngasse）上。德國體育會的健身房附近了。說也有趣，這所房子就在一個兵營隔壁。這陰謀是計劃得非常週密的，有一個參加者後來供稱，他曾得到一個電報，告訴他到那裏去並且幹什麼。這羣人共有一百四十四個，其中有一百零六個都曾在正規軍中當過下級軍官或士兵，還有十個是現役警察。攻擊的時間選定得極妙：那些陰謀分子要在總理官邸中的衛兵掉班時趕到那裏，因為這

時最易攻入。

在上午十時左右，有一個名叫度勃勒 (Dober) 的警官，原是一個重要的、祕密的國社黨人，所以知道這陰謀的，這時突然變了卦，以一種非常雜亂的、維也納人的方式將國社黨的密謀通知了當局。(註二) 假使當局的動作敏捷一些，陶爾斐斯是不會被暗殺的。但那些忠心的警察已爲過多的虛驚弄得疲乏了，而那些不忠心的警察則在暗中阻撓着警戒的設施。

度勃勒在這天上午的行動極爲詭祟。因爲要通知當局而又不願讓人家知道告密的是他，所以在十點鐘至十一點半之間，他和幾個不倫不類的居間人，至少在三個不同的咖啡館中跟公務人員舉行會議。約在十一點十五分的時候，公安部長費少佐的副官佛拉培爾少佐 (Major Wrabel) 已聽到了這密謀的要點。他派了一個心腹的偵探馬雷克 (Marok) 到西本斯端倫街上去偵察。費少佐似乎是在十一點四十五分的時候才得到一些「頗含糊的」報告。他立即行動，將此消息報告了內閣中人，但已經太遲了。

偵探馬雷克抵達西本斯端倫街上的警房附近時，看到了那些陰謀分子，但同時又看到有穿制服的警察在場，所以沒有立刻察破他們的行跡。總之，這場陰謀全靠那些「掩護」分子之力，才能成功。雖然如此，馬雷克看了一些時候，就愈加懷疑起來了，他在十二點十分至十二點三十分之間打了三次電話給佛拉培爾：一次在一個公用電話處，一次在一家咖啡館中，還有一次則在一月傢具店裏。佛拉培爾將此警報傳達給公安部的官員，但警察總署方面卻稍後才去通知。在這時，那些忠心的警察已受了狡黠大膽的間諜之騙，走入了迷途，因爲那些間諜宣

稱，有人正在市內另一處地方準備攻擊陶爾斐斯。

馬雷克在打了他的第三個電話以後，被那些陰謀分子看到了，他們就抓住了他。他被拉到那健身房裏去，在那裏他看那班人都換了軍裝——維也納鼎鼎大名的「德意志大師」(Dauschmeister)團的軍裝。那些叛黨爬進了三輛預先僱來的運貨汽車——在一輛外面標着「奶油與雞蛋」等字——就向總理府進發了。他們不知道如何發落馬雷克，因此(怪得很)竟帶着他同走。當他們行近總理府時，馬雷克就跳了出來。那些國社黨人因為恐怕驚醒人家，竟不敢開槍打他。讀者或許要問了：怎麼三輛滿載「兵士」的運貨汽車在正午時分穿過維也納的十多條熱鬧的街道，不會引起人們注意？但要知道，在當時的維也納，軍隊的調動是司空見慣的事，而那些站在階腳板上的穿制服的警察又消除了一切的懷疑。

那些暴徒於十二點五十三分開抵總理官邸。這是預定的作可怕的驚人事件的場所。但我們得先將無線電總站方面的事變講一講。

二 無線電叛亂

七月二十五日雖然沒有太陽，但天氣卻很熱，我頗想去游泳。在一點另七分的時候，我已做完了上午的工作，正戴上了帽子預備出去進午餐，這時電話鈴卻響起來了。有一個跟我暗通消息的人低聲說道：「你有沒有聽無線電，維也納無線電台剛才作了這報告：『陶爾斐斯政府已辭職。現由林德倫博士組閣。』」這也許是一句笑話。我

不知道。我去調查一下，再打電話給你。」

我立刻請電話公司接一個長途電話到巴黎去（我們是用電話來傳遞消息的）在等待的時候，我打了三個電話給：（一）美國公使館，（二）孟德斯脫導報的通訊員福度（M. W. Fodor），他是跟我密切合作的一個友人，（三）總理官邸。公使館說，已聽到了那無線電報告，正在調查中。我的朋友福度立刻就趕到市內來看我。總理官邸——有趣得很並不作答。接着有一個本地的通訊社，電聞社（Telegraph-Compagnie），在電話中將那無線電報告告訴了我，並且說一場國社黨的暴動正在進行中。我當即寫了一篇很短的報告，剛寫好，巴黎的電話已接通了。這時是一點十九分。我依舊戴着帽子。

我大約多化了十分鐘工夫，因為一個警官攔住了我的汽車，要我送他到警察總署去。據他說，一個普遍的警報已發出來了，但他不知道是為什麼？我在一點三十五分左右駛抵總理官邸門前。那兩扇黃褐色的橡木大門緊閉着，門外站着幾個警察，此外並沒有什麼異樣。我以為是那些政府要人將自己封鎖在裏邊，準備保衛自己了。

這時有一輛裝甲汽車駛過，我就跟另外兩個新聞記者一同追隨着牠。牠轉了一個灣，沿着柯洛佛拉廣場蹣跚地走到無線電總站所在的約翰街上去。這個地方很像倫敦的攝政街（Regent Street）或匹嘉沃雷（Piccadilly）。裝甲車在這兒停住了，在車塔上的警察把頭縮到了那鋼殼中去。於是我就聽到了手槍聲和機關槍聲。警察正在向無線電總站進攻，要消滅裏邊的國社黨暴動分子。我覺得一切如在夢中。警察把我們推回去，但是我們卻很想看看：在維也納的中心正式作戰，不是很難得的事嗎？於是我們聽到了一陣手榴彈爆炸的聲音。有一個穿

着白制服的侍者托着一盤啤酒，從人叢中溜了過去。

發生於無線電總站的事變是這樣的：在一點缺兩分的時候，那從柯洛佛拉廣場前來的十四個暴徒侵入了該站。他們開槍打死了守衛的忠心警察以及那在門口開蕩的電台監督的汽車夫。四個國社黨人衝進了播音室，那裏正在廣播着一些唱片。他們抓住了那播音員，拿一支槍對準他的胸部，逼令他發表了他們的「消息」。這乃是起事的信號。牠傳遍了奧國各處。

但有一個勇敢的電話接線女子卻抽出時間來報了警，雖然通往警察總署的各線都「忙着」——這一點是很有趣的。還有一個非常明白事理的職員割斷了通往皮爽堡發電站的電線，使那些國社黨人不能再廣播消息。他們原定的計劃是每十分鐘反復說一次，「陶爾斐斯已辭職，林德倫繼任總理」而在其間則夾以致全國人民的訓令、虛偽的消息等等，以破壞政府的一切防禦行動。我記得好幾年前，一位英國的無線電專家曾經告訴我，如用無線電來指揮革命，那是多麼美妙。

一個不幸的戲子本來正在那裏演習廣播滑稽戲，他嚇得得了神經病，就狂叫起來，因而被開槍打死了。警察衝進去時，又有一個警察被打死了，同時那些暴徒的首領也死了。在前後死亡的五個人之中，三個是因沒有醫生救治，流血過多而死的。我們在外面靜待着，直到三點二十分左右，那些得勝的警察才把他們的俘虜拖了出來。我就動身回家去，寫了一篇較長的報告，而且又打了一個電話到巴黎去。

在三點五十分左右，我又驅車往總理官邸。在途中，我遇見了紐約時報的通訊員蓋提（G. H. R. Getty），

他正從無線電總站回來，我們各自煞住了車，不約而同地說道，「唔，看起來一切都了結了。」我們的話當然是不對的，不過在當時很少人知道除了無線電總站以外，還有什麼地方出毛病。我自己也曾打總理官邸前面經過，可是除大門緊閉外，一切都與平時無異。雖然如此，我也發生了一點懷疑，就對蓋提說道：「你知道，在發生重大事變之際，一個政府照例不會把自己封鎖起來的。」他也表示同意：「真滑稽。」我們又記起了，打電話給總理府時沒有得到回音。於是我就向總理府走過去，附近一帶地方已佈滿了一隊哨兵，不許我過去，於是事情大白了。

三 謀殺政策

奧國的總理官邸乃是梅特涅的故宮，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就是在這裏開會的。自從那時以後直到今日，牠一定沒有看到過更動人心魄的事。牠是一座莊嚴而怪樣的建築，乳酪色的門面朝着鮑好斯廣場（Ballhausplatz）。裝着優雅的鐵欄的陽臺突出在人行道之上，達二十英尺高。正對面是一個郵局，嵌在從前的皇宮的厚實宮牆中；西邊則有一道高大的門，通往宮堡公園的青草地。

從西本斯端街前來的一百四十四個國社黨人，擁進了院子裏，就捉住了留在裏邊的內閣閣員：陶爾斐斯、費少佐及其助手卡溫斯基（Kawinsky），以及一百五十個左右重要官員、公務員、書記等等。駐在官邸中的六十名衛兵並沒有疑心到什麼——至少他們並沒有抵抗，就被解除了武裝，拘禁起來了。那些參加陰謀的警察，很熟悉這座錯綜複雜的房子裏的門戶和路徑（其中有幾個會在那裏站過崗），所以佔領的行動是很迅速而激

底的，若要拿英國的事情來作比，就好像是唐寧街十號被強佔了，因為這總理官邸是與國政府的神經中樞呵。

但聚集在門外的一小羣人，一點也沒有知道這些事變。有好幾個外國的新聞記者，在聽到了那無線電報告以後，約在一點十五分左右就來到這裏，一直守到天黑的時候，如荷京商報 (Handelsblat) 的尼貝爾 (Nybele)，紐約論壇報 (Herald Tribune) 的狄歐士 (Dise)，美聯社的魏納 (Werner)，兩個匈牙利人，一個阿爾巴尼亞人，一個捷克人。他們並沒有像我那樣，追隨着那裝甲汽車到無線電總站那邊去。所以他們看到了全部的經過情形，現在我將他們的報告綜合起來，寫成了如下的記錄。

在尼貝爾之後第一個來到鮑好斯廣場上的人，是一個身材高大，白膚金髮的年青德國攝影記者，他是上天由柏林來到維也納的。他泰然自若地擺好了他的三腳架子。在一點二十五分左右，幾個穿便衣的偵探和四個穿制服戴鋼盔帶來福槍的警察來了。從總理官邸底層的窗內有人大聲喊道：「走開，不然我們放槍了！」在一點五十五分左右，一個「內衛團」的副官赤手空拳地來了，他用兩個拳頭敲着門，以吉訶德式的莊嚴態度喊道：「我限令你們在五分鐘內開門，不然我就要搗毀進來。」這樣表演過後，他就走了，以後永沒有再露面。

(這時候，陶爾斐斯已奄奄待斃了，鮮血從他喉部的傷口中不住地湧出來——但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另外又有幾個官到來，他們向四周環顧一下，斷定並沒有出什麼亂子，就又走了。這時候，一切交通還是如常。於是，在兩點〇五分左右，政府機關報郵報的老編輯芬特博士 (Dr. Funder) 到來。裏邊有人喊道：「不要慌。林德已繼任總理，一位新的警察署長正在從柏林前來。」芬特聽到這話後，就匆匆地走了。此刻已到有許多

「內衛團」的人員和警察，約莫從兩點三十分起，直到天黑，接連提了好幾次「哀的美頓書」，在兩點三十五分左右，一個「內衛團」軍官敲着門說道：「我們給你們二十分鐘時間，過後我們就要轟炸這座房子了。」——「走開，不然我們放槍了！」一個變調的重濁的聲音在門內答。現在大家都感到，恐怕政府中的要人已全部拘禁在內了。

在三點鐘左右，「內衛團」軍官兼下奧地利省副省長巴爾少佐（Major Bauer）來了。一個警官對他說：「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我在等候援兵和命令。」這時那些「內衛團」都聚集在通往宮堡戲院（Burg Theatre）的道路上，但警察卻將他們趕回去。有人問巴爾：「誰在裏邊？」他答道，「陶爾斐斯、費少佐和卡溫斯基都在裏邊，被那些暴動分子拘禁了。新政府已成立，正在軍事部內開會。」增援的警察來了，一位彬彬有禮的警官說：「請注意，諸位先生，此地不是站立的好地方，因為這兒正在火線上。」在三點四十五分左右，街上終於禁止通行，那一小羣旁觀者就像一個孤島似的，留在那寬闊空洞的方場上。

在三點五十七分的時候，臉相有如一柄戰斧的費少佐，初次出現於陽台。他的臉色蒼白如紙。他搓着兩手，彷彿要除去從門柄上沾來的灰塵似的。伴着他一同出來的，是那些叛徒的首領霍爾士韋勃（Holzweber）——一個帶眼鏡的小個子，雖然穿着金飾輝煌的隊長服裝，卻仍像一個辦公室裏的小職員。當台下的羣衆叫喊起來時，費少佐低聲喊道：「不要吵！」

大家立刻想，「這場暴動是費少佐和正規軍發動的。」

費少佐喊道：「指揮官在那裏？」指揮官不知到何處去了，但有一個警察走上前去，恭恭敬敬行了一個敬禮。「你是誰？」費氏問道。「我是巡長愛培耳（Eipel），敬候台命。」那個警察答。霍爾士韋勃對費氏耳語了一下，費氏就說道：「不要帶武器，到後門口來。」愛培耳點點頭，霍爾士韋勃又望着他喊道：「決不要帶武器，而且只許你獨自一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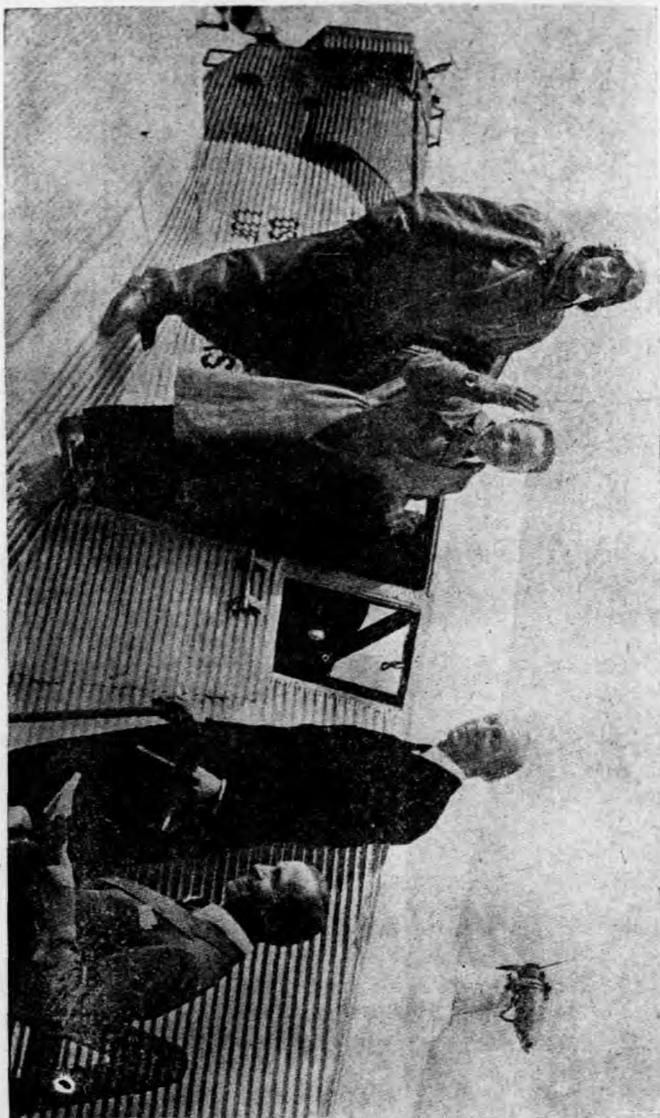
在廣場上的「內衛團」人員已看到了費少佐，就大聲叫喊道：「費我們的費！」在四點〇八分的時候，愛培耳從美太斯太西奧街（Metastasiogasse）上的總理府後門回來了。他跑得很急，鋼盔已經除去，頭髮又濕又亂。他抓住了一個報警用的電話，向總署報告。大家都聽到了他所說的話：

「我已進去過了，我會和費少佐講話。總理（陶爾斐斯）顯然已受重傷。他已辭了職。新政府已成立，費少佐仍舊做副總理。」總署方面問了幾句，愛培耳答道：「他們很有紀律，好像軍人一樣。內閣中的要人，和一百五十個男女，都被看管在院子裏。」

這時候，指揮官亨貝耳（Hornut Humpel）已經來了，他對愛培耳說：「如果總理受了傷，那是應該請一位醫生來的。你跑到後門口去，要求去接一位醫生來。」愛培耳回來說：「我去敲門時，那哨兵說道：『已經用不着醫生了。』」於是這一小羣人就知道陶爾斐斯已經死了。

在四點二十分的時候，費少佐又出現於陽台，身旁緊跟着霍爾士韋勃。以為這場暴動是費氏主持的見解被打破了，因為明明是霍爾士韋勃在指揮一切而且命令費氏。費氏喊道：「別作聲！」於是在陽台上俯身向下，喊道：

陶 爾 斐 斯



「林德倫在那裏」那些「內衛團」對裏邊的國社黨人喊道。

「要是你們傷害了我們的費，你們就得遭殃！如果觸犯了我們的費，我們就要把你們一一吊死在這些樹上！」

費氏喊道：「不要作什麼行動！在我發命令以前，什麼都不許幹。我在這兒指揮。」他向亨貝耳招招手，命他繞到後門口去。有一個高大的「內衛團」團員正站在陽台底下，他交叉着兩手，做成一個座位的模樣，示意費氏跳下來。過了約莫二十分鐘之後，亨貝耳回來了，他大聲說道：「林德倫繼任總理，費仍是副總理。他們在等候林德倫，他在幾分鐘內就要來了。」

四 在陽臺上

可是來的並不是林德倫，而完全是另一個人——陶爾斐斯內閣中的一個閣員，牛斯帶特·史杜滿（*Nearstadter-Stinner*）。他等了一會兒，費少佐就又出現在陽台上，喊道：「林德倫在那裏？」

牛斯帶特·史杜滿站在街道中喊道：「林德倫不來了！」

費少佐吃了一驚，轉過臉去看看他身旁的霍爾士韋勃；有一個「內衛團」團員大聲說道：「要我們衝進去嗎？」

費氏向下喊道：「不，什麼都不許幹。沒有我的命令，不許取什麼行動。」

牛斯帶特·史杜滿說道：「新政府已經成立了，我是牠派來的代表。我以政府的名義，答應給那些叛徒一種安全保障。他們將被護送到德國的邊境上。如果你們在二十分鐘內不降伏，我們就要衝進來了。」

費氏喊道：「不，你們不要衝進來。我是全國公安部長，沒有經我准許，你們不能取什麼行動。」

牛斯帶特·史杜滿厲聲向上喊道：「你錯了，費先生，被拘禁的政府中人處於脅迫之下，是沒有資格發號司令的。現在是五點二十八分。到五點四十八分，我們就要衝進來了。」

當這「哀的美頓書」的期限將滿的時候，大家都躲藏起來了，但並沒有人開槍。牛斯帶特·史杜滿繼續在街上走來走去，而費少佐已回進去了。這真是「奧國式的哀的美頓書」，有人說笑。但當時的空氣是緊張得很可怖的。在六點〇四分的時候，費氏又走出來，說那些叛徒願意降伏了，不過要問那安全保障有什麼擔保。他們要求用軍隊護送至邊界上。「這是可以辦到的，」牛斯帶特·史杜滿答道；於是費氏代陽台上的另一叛徒呼特耳(Hurtel)問道：「我們可以再延遲十五分鐘嗎？」有一個平民喊道：「他們決不能傷害屋內的任何人。」

在六點三十分的時候，費氏又出來了。他想對代理部務的軍事部次長柴納爾將軍(General Zeiner)講話，但這時人聲非常嘈雜，誰也聽不清楚。警察、新聞記者、「內衛團」旁觀者，大家都在陽台底下叫嚷着。因此柴納爾和牛斯帶特·史杜滿就繞到後門口去見費氏。於是，德國的公使利茨博士(Dr. Rieth)到來。在六點五十五分左右，柴納爾回來宣佈道：「他們將由軍隊護送至邊界上，由一參謀將校率領。」

約莫七點三十分的時候，費少佐從後門出來了。他走到牛斯帶特·史杜滿前面，說道：「給我一支煙。」有一

個新聞記者喊道，「可恥的安全保障！」費氏勉強提高了聲音說道，「別作聲！」牛斯帶特·史杜滿問他，「陶爾斐斯真的死了嗎？」費答道，「是的，我在他剛要逝世時還跟他講過話。我進去時，他已受了傷，躺在一隻彈簧長椅上流血。」他捏碎了手裏的香煙，說道，「再給我一支煙。」

在七點四十分左右，利茨和卡溫斯基出來了。新總理舒斯尼格也來了，他率領着費氏、柴納爾和牛斯帶特。史杜滿到總理官邸西面的宮堡公園中去。他們進去後，警察就關閉了圍門，於是他們就在暮色蒼茫中站在草地上舉行了一次閣議。這時候，二十輛軍用汽車已排列在鮑好斯廣場上了，大批警察走進去解除那些叛徒的武裝，預備護送他們到邊界上去。那些叛徒出來時都很自滿，有恃無恐。大家以為他們一定可以到德國去了。他們自己也這樣想。可是他們想錯了。

五 死

陶爾斐斯是在十一點鐘開始舉行最後一次閣議的。在當天的議案中，有一件是管理維也納一專演滑稽歌劇的著名戲院的規程草案。警報直到十一點鐘以後才傳到內閣中。總理官邸的大門沒有及早關上，這恐怕應由維也納的 Schlamperer（不修邊幅而有一點迷人的習慣）與叛逆一同負責。陶爾斐斯一得到警報，就以極大的能幹和冷靜應付着。他解散了閣議，命令各關員分散到各自的辦公室去，只有費少佐和卡溫斯基留着。這救了奧國的命，因為要是舒斯尼格和牛斯帶特·史杜滿也留在那裏，那場暴動恐怕已達到了目的。

在十二點五十五分的時候，那些叛徒已進了門——共有一百四十四人。「我們奉米克拉斯總統之命逮捕你，」他們胡亂喊。

據總理官邸中的官員在下一天告訴我，最初他們還以為是軍隊在演習奇襲呢。那些軍裝都像是真的，而且紀律又很好。於是，沿着各排辦公室，有粗魯的聲音喊道，「走出來！舉起手！」門戶被敲破了，全體人員都被趕到了院子裏去。比較重要的官員被拘禁在一個小房間裏，並且告訴他們說，如果這計劃失了風，首先就槍斃他們。接着又選定了一班人，預備在失敗時繼第一班人加以槍斃。當那些暴徒一完成佔領工作，就去打開電話總機來與德國公使館接通的時，大家才明白他們原來是國社黨人。有一個叛徒而且對我的一個朋友說道，「你覺得奇怪，是不是？在半小時內，你就可以在莫尼哈的無線電上聽到一切詳情了。」

在解除了衛隊的武裝以後，有一隊叛徒立刻就走上樓梯，不顧一切地去搜尋陶爾斐斯，一找到就把他打死。這一隊人專門負着這個使命，這是很少疑義的。領隊的人名叫奧泰·普拉奈泰（Otto Planowicz），曾在軍隊中當過伍長，他的下巴好像一隻鬪拳時用的手套。他們沒有給陶爾斐斯逃避的機會。他們本來也可以把他活捉的，像費少左和其他的人那樣。但這些叛徒只抱着一個目標：殺死他。他們是在十二點五十五分侵入總理府的，至遲在一點零二分的時候，陶氏已被開槍打中了。

在遣散了全體開員以後，陶爾斐斯回到自己的書房裏去，那是一間掛着黃綢帷幔的小房間。他的僕役海特維茨克（Hedewitz）在窗口望見那些叛徒的汽車已到了院子裏，人們正在從車上跳下來。他就叫陶爾斐斯

趕快逃避。這位短小的總理敏捷地跳起來，離開了那間黃綢的書房，跑進一間乳白色的房間，想逃到那著名的議事廳裏，再從那裏穿過一條夾在那些錯雜的檔案庫中間的甬道，由一道秘密樓梯逃出去。這乳白色的房間共有三道門，一道開在（正式的）樓梯頂上，那些叛徒就從這門外進來了。通往議事廳的門卻鎖着，海特維賽克模索着鑰匙眼。短小的陶爾斐斯伸出手去想握住那門柄，領隊的叛徒普拉奈泰就在相距不過二十英寸處對着他的腋窩開了一槍。陶氏搖擺了一下，普拉奈泰就又開了一槍——這次是對着咽喉，在相距不過八英寸處開槍的。陶爾斐斯就跌倒了。（「他的頭在樓板上撞得多響啊！」海特維賽克後來說。）

「救命，救命！」陶爾斐斯含糊地喊。

普拉奈泰說，「站起來。」

「我不能，」陶爾斐斯低聲說。

他們將他抬起來，放在那玫瑰色和乳酪色的路易十五時代的彈簧長椅上。當我第二天上午去參觀時，還有些僕人在這間房裏用真空掃除器來吸去那些塵埃和血。在那只長椅的繡花墊子上有三大塊血跡，形狀和顏色幾與大橡樹葉完全一樣。

被扣留在附近的費少佐，也聽到了這些槍聲，但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約莫在兩點半的時候，一羣國社黨人招呼他出去，帶他到陶爾斐斯還在喘氣的房間裏去。陶氏看到了他，就有氣無力地說道：

「如果我死了，請你照顧我的家屬。」

那些叛徒用一支手槍抵着費氏的腰部，不准他說話。陶爾斐斯又非常微弱地說道：

「舒斯尼格在那裏？」

費氏搖搖頭，於是陶爾斐斯聚集了所剩的力量，低聲說道：「設法將此事和平解決，請林德倫來和解。」

費少佐被擁出了那個房間。他要求那些叛徒去請一位醫生來——至少也得去請一位教士來。他們都不答應，雖然他們會問那些被拘禁的人，其中有沒有做醫生的，而且有一個叛徒拿了一杯水給那垂斃的總理喝。陶爾斐斯一定以為是他自己的軍隊背叛了他；不但暴動已達到了目的，而且殺死他的是他自己的部下。後來他顯然深信那些圍繞着他，注視着他那萎縮的臉孔的人，並不是叛徒，而是忠心的兵士，因為他曾低聲地說：「孩子們，你們對我這麼好。為什麼那些人不像你們這樣呢？我所求的只是和平吧了。願上帝饒恕那些人。」這時候，他那身體內的血液快要流盡了。長椅底下放着一隻承接血液的盆。在三點四十五分左右，他就死了。

在五點鐘以前，那些叛徒始終自以為已經得勝了。在四點三十分左右，他們的副指揮呼特耳會對被拘禁在院子裏的那些人說，新政府已成立，新總理林得倫立刻就要來了。於是約有二十個官員就對他行希特勒敬禮，還有些人則高呼「希特勒萬歲！」據呼特耳後來供稱，在總理府中被捉住的佛拉培爾（費少佐的副官）曾將自己的卡片遞給他，說道：「稱我爲 *nd* 吧。」（*nd* 爲德語第二身的暱稱。）

在五點鐘左右，牛斯帶特·史杜滿來到總理府前以後，那些叛徒逐漸氣餒起來了。他們的領袖霍爾士韋勃走到費少佐面前去，坦白地說道：「事情已有了一點阻礙。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費氏聳聳肩。於是，維也納人的

特殊作風來了，霍爾士韋勃接着說道：「啊我打電話到愛勒思咖啡館去問問看，孔士先生有沒有在那裏。」你看，內閣總理死了，政府中斷了，奧國在抽搖着，歐洲瀕於戰爭的危境了，而這時候叛徒的領袖卻要打電話到一個咖啡館裏去問問看，能夠指教他怎麼辦的那個人有沒有在那裏！

孔士乃是一個神祕的平民，這天上午也在西本斯端倫街上聚會。原定出發時由霍爾士韋勃率領第一車人，呼特耳率領第二車人，而孔士則應在第三車內。可是他並沒有來。沒有人確鑿地知道他遇見了什麼事，或是怎樣失蹤的。維也納的警察認為他是一個國社黨律師，在最後關頭滑了腳，逃到德國去了。

約在六點鐘左右，在得到了安全保障的諾言以後，叛徒們決意降伏了。霍爾士韋勃宣稱，如果不允許他們安全地出境，那被扣留的一百五十人將完全加以槍斃。費少佐會對新政府派來的談判員說：「你們切勿願慮到我的安全而影響你們的意見。」於是呼特耳提議打電話去請德國公使利茨博士來作安全保障的證人。費少佐在電話中說明了一切情形，利茨就問他要不要來。費氏答道：「我不便命令你或勸阻你。我不過將這些人的要求傳達給你吧了。」利茨來後，談判就告成了，接着就開始離境了。

這時候，那一大批被扣留的人仍舊不知道總理已經死了。在離開那座房子時，有一個叛徒喊道：「我們還留下一個死的在樓上房間裏。」一個官員連忙奔上去一看，就發見了陶爾斐斯的屍體。牠已萎縮得好像葡萄乾，黏而且濕，呈着青色。臉孔並沒有遮蓋好，現着極痛苦的神情。有一塊帆布遮蓋着屍身的一部分。喉部有一個可怖的創口。在那長椅底下，血液從盆裏溢出來，淌了滿地。

六 失蹤的首領

現在要說到林德倫了。林德倫爲什麼不來呢？這場暴動爲什麼會失敗呢？

林德倫所以不來，因爲他已被捕。他並非爲警察或政府所捕，而是他的老朋友，帝國郵報的編輯芬特博士，加以逮捕的。原來芬特在兩點十分左右離開了總理府前，就一直到了林德倫下榻的帝國旅館去，以自己個人的名義勸他到軍事部去自首，以避免流言。由於他是公使的身分，所以並沒有被搜查。據說在一點五十分左右，無線電總站方面會打電話給林德倫請他否認由他繼任總理的無線電報告。林德倫答道：「我沒有這樣幹的權力。」隨即將電話搖斷了。在這天半夜裏，他向自己打了一槍。傷勢雖然十分危險，甚至於他的心臟都得縫合起來，但並不致命。

關於費少佐在這次事件中的態度，恐怕永遠將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我個人以爲他對於這次的陰謀，在事前是一無所知的。當那些叛徒最初逮捕他時，雙方究竟說了些什麼話，沒有一個外人能確鑿地知道；不過先後進去的兩個警官都證明費氏在陶爾斐斯死後不到一分鐘，已做了林德倫的新內閣中的副總理。但在另一方面，費氏叮囑那些忠心的「內衛團」團員等不要衝進去，這是很難加以責備的。他不但要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且對其他的一百五十個被拘禁者的安全也負着責任。如果費氏在這天午後露面時喊道：「他們已殺死了總理；你們衝進來吧，不要管我們的死活！」——這樣的態態當然是很莊嚴的，不過恐怕將死傷許多的人。我們得記着，費氏在當

時對於外邊的情形是一點也不知道的。他以為林德倫真的已做了總理。雖然如此，假使他看見牛斯帶特·史杜滿時能微露愉快之意，而並不反復地詢問林德倫在那裏，那末，他的忠心和勇敢的名望就不會受着這樣重大的打擊了。

給予那些叛徒的安全保障的諾言，後來竟取消了，這事使許多人發生惡劣的感覺。他們並沒有被送到德國的邊境上，卻送到了不到一哩外的馬羅嘉納 (Marokannar) 警署收容所裏去。政府辯護其失信的行為說：(甲) 費少佐沒有給予安全保障的諾言之權，而(乙) 牛斯帶特·史杜滿提供這諾言時，沒有知道五點鐘的臨時開議已議定當以沒有人死傷為條件。我猜想不釋放那些國社黨人的最後決定，是在七點半左右在青草地上舉行的那一次開議議定的。舒斯尼格在這時才知道陶爾斐斯被打死的情形，他當即決定不放棄那些兇手。牛斯帶特·史杜滿在霍爾士韋勃受審時說道：「不錯，我提供了我做軍人者的諾言。不過軍人的諾言是給予其他的軍人的，並不是給予不許醫生和教士來救助一個受重傷者的人們的。」

這場暴動所以失敗的另一個原因是，全國多數地方並沒有發動。在斯蒂里亞和卡林蒂亞 (Carinthia) 兩省內，國社黨人有軍械的地方，曾經發生劇烈然而短促的戰爭，但其他各處都沒有動靜。一年來，我們大家都妄信國社黨人佔全國人民的百分之五十或六十。這或許是真的，但在緊要關頭，那些國社黨人卻並沒有什麼舉動。那叛變的信號傳遍了全國，前後有四小時沒有正式的政府；可是並沒有發生什麼。國社黨人沒有費神武裝他們的信徒，因為深信軍隊一定會起來叛變而以武器供給他們的；但是軍隊卻始終効忠於政府。這樣，他們就喪失了他

們的無上機會。

這場暴動所以失敗的最大原因，是希特勒臨陣脫逃了。那一百四十四個暴動分子，在七月二十五日這一天被人出賣了三次：第一是被他們自己的上司，其中以孔士爲主；第二是被那安全出境的諾言；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被德國出賣了。前後有一年半之久，那些德國人天天鼓動他們的奧國堂弟兄起來暴動叛變；但在緊要關頭，卻放下他們。「駐奧軍團」並沒有開進去；反之，看到這場暴動已經失敗的時候，牠竟被解散了。希特勒的「奧地利總監」哈璧德被免了職，弗勞恩費爾特也不知去向了。駐奧公使利茨博士立刻被革職，而代以巴本。不久大家都知道，原來墨索里尼已下了動員令，如果這場暴動成功了，意大利的軍隊就要開進奧國去；這在二十五號下午六時已成了十分明白的事，因此那些德國人只好狼狽地爬回去，洗淨了他們的手，而且以後也一直企圖卸去對於這件事的責任。

十三個暴動分子被處了絞刑，其中有四個叛逆的警察——霍爾士、韋勃和普拉奈泰當然也在內。當霍爾士、韋勃在宣判前站起來說下面的話時，法庭中的激動情形是我有生以來少見的：

「我曾得到保證，說是不會殺害什麼人的。人家告訴我，我將在總理官邸中找到林德倫，而且新內閣已經組成了。當我沒有在那裏遇見這次起事的首領時，我就立刻向費少佐自白。我對他說，『我站在這兒，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三小時後，他和普拉奈泰都被絞死了。兩人都慷慨就死，臨死時都喊着「希特勒萬歲！」可是希特勒並沒有

聽見他們。在東普魯士與登堡總統正在喘最後的一口氣，而希特勒正在忙着預備做德國的大總統。

* * *
林德倫在七個月之後被控犯叛國罪而受審，被判處了無期徒刑。在監獄中禁錮了沒有多久，他就被轉移到一個療養院裏去，由警察加以監視。在審判時提出來的他犯罪的證據，並不十分具體。因此就發生了謠言，說林德倫來維也納的目的，是預備參加另一種反對陶爾斐斯的叛變，參預這密謀的除他以外還有別的要人。七月二十五日的暴動，據說是哈璧德發動的，因為他要占林德倫的先著。照這謠言說起來，林德倫的暴動本來預定在這天前後發動，其作用是在為一國社黨政府開道；但在莫尼哈的哈璧德不信任林德倫等人，所以他在七月二十五日突然開了械，林德倫和他的同謀者不知道那正在進行的暴動究竟是否他們的暴動，因而舉動如此慌亂。

林德倫本來或許可以宣告無罪的，但他的意大利籍僕人利波耳第（Ripoli）卻供稱，其主人在羅馬時與被判斷定為國社黨密使的人頗多往來。這又為整個事件下了一個難解的、奇異的註解。利波耳第曾經做過林德倫的友人，金融家嘉斯蒂格利奧納（Omittio Castiglione）的僕役。他在法庭上承認，嘉斯蒂格利奧納會勸他由米蘭打電報給法院，說自己知道林德倫的行為，而且那筆電報費也是嘉氏代付的。

嘉斯蒂格利奧納生於意國厥里司得港，為一教書先生的兒子；大戰期內，他由兜售飛機賺了很大的錢；戰後成為歐洲國際匯兌上最大的投機者；在他交紅運的時代，他曾為德國大演戲家兼戲業家雷印哈德（Max Reinhardt）、重建柏林都擇夫斯泰德（Joesfstaedter）劇場；資助奧國薩爾斯堡（Salzburg）音樂會；並為墨索里

尼進軍羅馬作財政上的援助。他與林德倫做了多年的密友。當時這兩位故交——都是流寇——已經翻了臉。他們互相間的利益關係是中斷了。所以嘉斯蒂格利與林德倫放了一冷箭，連累他入獄。

(註一) 度勃勒後來自殺了，但也有人說是被患心的或國社黨的警察殺死的。詳細的情形見奧國官方對於此事的報告，其英譯本名德爾羅斯之死 (The Death of Dollfus)。

第二十五章 奧地利的災殃

「我這年青，我還沒有準備得最高權力。」

——史泰亨，堡親王

一 舒斯尼格小史

繼陶爾斐斯而任奧國總理和「半獨裁者」的舒斯尼格博士 (Dr. Kurt von Schuschnigg) 一八九七年生於意大利的嘉達湖 (Lake Garda) 區內，這在當時尚為奧國的領土。他在十八歲時自告奮勇去從軍，一九一七年為意國軍隊所俘獲。自此以後直到大戰結束時，他始終住在一個意國俘虜營中。我們很可以說，現在他仍舊是意大利人的俘虜——如果德國人下星期不抓住他的話。(按：這是一九三七年的話，現在果然應驗了。)

在舒斯尼格繼任總理後不久，兩個維也納人在斯蒂芬斯廣場 (Stephansplatz) 上相遇了，一個說道：

「我已有了一個差事。」

「什麼？一個差事？不可能的，」另一個答道。

「真的，我坐在聖斯蒂芬教堂的鐘樓上，靜待關於舒斯尼格的第一個笑話誕生。到那時我就敲鐘。」

「哼——哼。這不算什麼好差事。你的薪俸是多少？」

「每天五十格羅生（Groschen）等於英金五辨士或美金一角。但這是一個終身的差事呢。」

舒斯尼格博士，為人整柄魯鈍，是一位將軍的兒子。他的家族是個小貴族，虔信天主教和君主政治。他曾在斯勃魯克大學（University of Innsbruck）研習法律，後受基督教社會黨總理蔡貝爾的掖助而進政界。最初任教育部長，繼而任司法部長，終於做了陶爾斐斯的最可靠的助手和心腹。

他不像陶爾斐斯那樣的靈敏；他很冷靜、嚴厲、講理、盡職、枯燥。他是絕對忠實而有良知，所以可作為抵消那離奇狂妄的史泰亨堡的一種勢力。舒斯尼格沒有權術（demagoguery）——奸雄的手段。陶爾斐斯最不喜歡權術——但他自己的卻居於例外。他所需要者是能夠辦事，能守祕密，能絕對可靠的人。

舒斯尼格原來的志願並不想做政客，而是想做一位大學教授——一位專攻法律史的學者。但是時勢抓住了他。為要斷絕帝洛爾省青年界的「希特勒主義」潮流而使之傾向於愛國的奧地利民族主義，他創立了他那戰鬪的天主教青年團——「衝鋒團」（Sturmabteilung）。當史泰亨堡的「內衛團」勢力日益強大的時候，陶爾斐斯立即就利用「衝鋒團」來抵消牠。

在一九三五年夏間，舒斯尼格擔任總理將滿一年的時候，他的夫人在一次汽車出險時被摔死了；這似乎暫時破壞了他的精神。在事前，國社黨人曾以種種可怖的惡作劇來恐嚇舒斯尼格夫人；有人說他們曾在暗中損害

那部汽車，但始終無法加以證實。

在一九三六年跟「內衛團」的爭鬥中，舒斯尼格開始顯示了他的能力。在這以前的很久時候，消息不靈通的人都以為奧國政府的實權是握在「內衛團」首領副總理史泰亨堡親王的手中；舒斯尼格不過是他的「聽差」吧了。但是舒斯尼格卻逐漸設法使那年青的親王陷入了困難的境地，終於除去了他。

史泰亨堡被免職的近因，據說是在阿比西尼亞陷落時他拍了一個熱烈的、措辭不慎的賀電給墨索里尼。史氏的電報上說：「閣下以法西斯精神戰勝民主主義之虛偽作做……在此著名偉大勝利之日，敢以愚誠爲閣下賀。」這使舒斯尼格受不了，因爲他在那時正在儘量設法使其統治現得像民主政治的模樣。這場決裂的內在原因，則是舒斯尼格要想跟德國和解，而偏袒意大利的史泰亨堡卻不贊成。

舒斯尼格知道史泰亨堡以愛好美女且喜與時髦女子作伴聞名。所以這位枯燥的「半獨裁者」在擯出了史泰亨堡以後，彷彿譏刺他似的，就封他爲「奧國母親救濟會」的名譽會長。

舒斯尼格繼續有條不紊地肅清「內衛團」。他在是年十一月間改組內閣，擯除了那些「內衛團」分子；一九三七年三月間重行改組，減少了閣員的人數，將權力集中在自己及其朋友們的手中。最後，他取消了「內衛團」的獨立資格，將牠併入了政府主辦的民團中。

在奧國政治上，還有一個重要人物不能不在此提一筆，那就是紅衣主教殷尼芝（Cardinal Innitzer）。他對於舒斯尼格的左右力是極大的。

二 離開了政界的親王

史泰亨堡親王生於一八九九年，其事業大部分應歸功於其家族——尤其是他的母親。他是神聖羅馬帝國 (Holy Roman Empire) 的十二家皇族之一的直系子孫，其先祖奧太嘉一世 (Otakar I) 乃是一千年前的斯蒂爾伯爵 (Count of Steyr)。其姓氏原來是「史篤琴堡」 (Storchenberg)，義為「鵝山」 (Stork's Mount)。他的一位高曾祖曾在一六八三年抵抗土耳其人，保全了維也納。史泰亨堡一家人因為自己是一個老望族，所以常把哈布斯堡皇族 (the Habsburgs)——奧國的最後一朝皇室——看作是「暴發戶」。他的母親弗蘭茜斯加·史泰亨堡伯爵夫人 (Countess Franziska Starhemberg) 對他的一生影響頗大，她在基督教社會黨內部佔着相當大的勢力。

史泰亨堡名叫安倫斯忒·羅迪格 (Ernst Rüdiger)，他在十七歲時加入奧國的軍隊。大戰後，他變成了一個風雲兒，一個海盜式的冒險家，跟巴威的奧勃蘭團 (the Bavarian Oberland Organization) 一同在西里西亞 (Silesia) 的邊疆爭吵中戰鬪着。他遇見了希特勒，就加入團體，後來也參預莫尼哈的啤酒館暴動。他的母親恐怕這個血統高貴的兒子受到希特勒的「流氓無產階級」的、反天主教的影響，就將他帶回了奧國。她請求蔡貝爾博士照管她的孩子，援助他開始一種「高尚的」政治生涯。

年青的史泰亨堡決定要自行創設一種非正式軍隊。他在奧國各處擁有十四座古堡。在華克森堡 (Waxen-

Perz)，他將八百個侍從——其實是奴隸——組成了「史泰亨堡狩獵團」(Sturmhörjäger detachment)。該團後來就與「內衛團」合併了。前後好幾年，史泰亨堡以自己的家財接濟着該項運動。在一九二六年，他做了上奧地利省「內衛團」的首領；到一九二八年，他已是奧國全國的「內衛團」領袖了。

他的財產化完了；他向各方借錢。有一個時候，他的負債額據說達英金十二萬鎊左右。當他瀕於破產時，有幾個富足的實業界朋友——以及墨索里尼——救濟了他。對陶爾斐斯，那些意大利人曾在一九三二——三四年的艱難時期予以若干忠告；但對史泰亨堡，他們卻予以更重要的東西——金錢。

說到史泰亨堡的能力，各人意見頗不一致。我個人以為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年青人，恐怕一般自由主義者都太輕視他，正如從前輕視陶爾斐斯一樣。我曾在陶爾斐斯安葬時聽到史氏演說；他以熱情的、親暱的「你我」稱呼對那已故的領袖致辭，全篇演說可算是我生平聽到的最動人的演說之一。在幾星期後的一個茶會上，史泰亨堡破例跟一羣新聞記者談話；他的答語是很審慎的，而且稍嫌冗長，但措辭卻很漂亮得體。他頗羞怯，有時態度有點拘束。

說到史泰亨堡的相貌，大家是意見一致的。他生得極漂亮。說到他的性格和理智上的基本目的，大家也意見相同。他是一個十足不扣的志願法西斯主義者。他也很野心——如果神經過敏的話。他的好夢之一是做奧國的攝政者，好像霍爾修(Horlay)在匈牙利那樣。史泰亨堡幾乎隨時會「捲土重來」。

三 蹺脚的獨裁制

在陶爾斐斯被殺死以後，奧國政府的行事，好像一個人一脚踏在街上，一脚踏在溝渠中走路；牠搖搖擺擺蹺蹺着，牠想跨過不自然的極遠的距離——可是卻站住不動。牠確是獨裁政府，而且是世界上最澈底的——如果不很整飭的話——獨裁政府。希特勒還「製造」選舉；墨索里尼是一個賦予國家若干活力的政黨的首領；史丹林是他對之負責的有機體的一部分。但在奧國，卻只有舒斯尼格、「祖國陣線」和無所不能的上帝——此外什麼也沒有。

這混合物，憑着政治上的權力和意大利的支持，君臨奧地利。牠規避選舉，因為牠知道選舉將放進國社黨人來。牠瘋狂地侵犯公民的權利。例如在一九三四年一年間，僅維也納一處，被警察搜查的住宅就有十萬〇六千所之多。被捕的共有三八、一四一人，其中有一九、〇九〇名是國社黨人，二、二七六名是社會民主黨人，六、七七五名是共產黨人。然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然而」——這種恐怖行動卻決計及不上國社黨的壓制手段那樣厲害。多數被捕的人不久就從獄中放了出來。即使在最極端的方面，也很難將舒斯尼格的獨裁完全當真。（註一）這是由於奧國人的文雅，奧國人的妥協才能，奧國人的愛朦朧的法律上理想，以及奧國人的 Schlangerei（不修邊幅而有點迷人）。

一九三五年初，受了二月事變的創痛的社會民主黨人，跟忘卻自己常用口號的共產黨人組成了一條

「聯合陣線。」一支新的「自衛隊」從舊日的殘燼中興了起來，那些社會民主黨人已得到了切實的教訓，乃將他們的名稱改爲「奧國革命社會黨人」(The Revolutionary Socialists of Austria)。他們用文字來向全國進攻。散佈違禁的宣傳品，雖然在奧國要受到極嚴厲的懲罰，但在維也納市內幾乎沒有一天沒有人在大分傳單或小冊子。小型的報紙由大家傳觀着；已在捷克的勃倫(Brno)地方復刊的勞工時報，也印在小型的報紙上，每兩星期約有三萬份偷運入境。在我的信箱中，我每天可以看到各種攻擊當局的印刷品。政府竭其所能來阻止這潮流，可以正如想用一塊海綿來吸乾多瑙河一樣的無益。

四 德奧協定

一九三六年七月間，舒斯尼格與德國的駐奧公使巴本成立了一種協定，以恢復兩國的正常關係。哥培爾稱頌此事爲德國新外交術的傑作；奧國人對此似乎也相當滿意。依照這協定，德國承認了奧國的主權，而奧國則釋放國社黨政治犯並准許國社黨人以私人資格加入「祖國陣線」。德奧間的長期緊張據稱已消滅了——這顯然是一種極重要的發展。

巴本的策略實在很聰明。他知道鐵腕政策也會奏效，所以就試用「麂皮」手套。他的方法是將奧國的要人拉到一邊去，輕輕地對他們說，他自己也覺得國社黨的統治頗有可厭之處，(真的)接着就勸他們雙方合作，以求那些往昔「大日耳曼」理想的實現。巴本慢慢地進行着——頗有把握地。他的政策彷彿如此：對於你下星期

就要跟她結婚的女子，你是不必去強姦她的。但是他的工作卻遇見了兩種阻礙。第一，他不受人信任。第二，正如弗蘭西斯·根善所說，沒有一個奧國人是能夠一天到晚做國社黨人的。這太費力了。說也奇怪，維也納的「國社主義」並不失敗於舒斯尼格和史泰亨堡的機關槍之下，而失敗於奧國人的柔軟的性格上。

雖然如此，舒斯尼格總得跟德國成立一種 *Modus Vivendi*（臨時的休戰協定）的。德國的抵制快要扼死奧國了。有一個時期，墨索里尼不准舒氏妥協，因為這位黑衣首相對陶爾斐斯之死所生的怒氣還在胸中蓬勃着呢——我們該記着，陶氏被殺時，其夫人正在墨索里尼的利西奧尼別墅中作客。但到了一九三六年夏天，舒斯尼格顯然會告訴墨索里尼，他不能再支撐下去了，非與德國訂立一種協定不可——不管條件如何。在實際上，舒斯尼格這次得到的條件是相當優美的。

奧國人究竟並不是意大利人；他們也是日耳曼人，與德國人同種，所以在希特勒上台以前，有百分之八十的奧國人是贊成德奧合併的。當民族問題還在中歐各國間的經濟關係上和精神關係上作梗時，要想拿「多瑙河流域大同盟」的計劃來解決奧國問題是不可能的。奧國的命運是跟德國的命運密不可分地連在一起；奧國的最後出路只有走上德國的軌道。長久隔絕着那兩個法西國家的奧國，或許將變成聯絡牠們的橋樑；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但在一九三七年，則這個小國還是夾在兩大將之間的一小卒。（按：一九三八年三月，這小卒終於被德國吞吃了。）

五 哈布斯堡叫喧聲

一九一九年制定的幾種法律，剝奪了哈布斯堡皇室的財產，並將皇室中的人驅逐出境，但陶爾斐斯的職權主義憲法卻廢除了這些法律的合憲性質。到一九三五年七月間，舒斯尼格和史泰亨堡的政府竟廢除了這些法律本身。因此已沒有法律上的障礙阻止前奧匈帝國的皇太子奧都親王 (Prince Otto) 及其母后齊泰 (Zita) 回到奧國來了。但他們的回國，一時還不致實現。舒斯尼格所做的，不過是將奧都從袖子管裏摸出來，以便突然將他放在桌上。因為哈布斯堡皇室的復辟可以做國社黨併吞奧國的最後的、終極的障礙呵。

因此，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那逃亡在外的奧都及其生涯和性格吧。

(註一) 例如紀念奧國前皇約瑟夫 (Franz Josef) 的博覽會中，在一個光榮的地方卻懸着維也納社會黨的創立人維克多·亞特勒 (Viktor Adler) 的一張肖像。還有一件事：那些市立大公寓的名稱更改者極少；恩格斯院仍舊是恩格斯院。馬克斯院直到一九三五年七月間才改名。在其圖書館裏，你仍舊可以讀到馬克思主義的書，但在另一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受審的「自衛隊」隊員卻被判處了極重的刑罰。

第二十六章 匈牙利與哈布斯堡博士

我信仰上帝，我信仰我國的統一，

我信仰永恆的、神聖的正義，

我信仰匈牙利的復興。

阿門！

——匈牙利「國民信條」

一 奧都與復辟問題

奧都背後，藏着七百年左右的瘋狂、謀殺和憂鬱。最近六十年間，他的堂弟兄和長輩至少有五個是暴卒的，還有好幾個則死於瘋狂。皇太子魯道爾夫（Rudolf）——奧都的長兄（之自殺於梅耶林（Mayerling）地方，乃是近代最大的皇家祕事；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奧都二兄）被刺死於薩拉耶伏（Sarajevo）地方，則成了世界大戰的導火線。結果奧都就居於目前的孤單而謎樣的地位上，成了哈布斯堡皇室的全部領域的繼承人。他將來也許會做皇帝哩。

這位自命有繼承奧都皇位的資格的奧都大公兼哈布斯堡·洛林親王，他的全名寫出來是很長的——

Archduke Franz-Josef-Otto-Robert-Marie-Antoine-Karl-Maximilian-Henrich-Sixtus-Xavier-Felix-Renatus-Ludwig-Gaetan-Pius-Ignaz, Prince of Habsburg-Lorraine. 他的父親故皇卡爾 (Karl) 和已寡的母后齊泰 (Empress Zita of Bourbon-Parma) 共有八個子女，而齊泰自己也有十六個弟兄姊妹，她排行第十。與都乃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生於維也納附近的一座別墅中——這別墅現已改為公寓。

哈布斯堡皇室實在不止是一族，而是一種有機體——長期附着於歐洲的政治團體（國家）上的一種光輝的寄生菌。其多產有如白鼠，其國際性有如偽造貨幣者。斐迪南大公共有二、〇四七位祖先（包括母系方面的），其中有一、四八六個日耳曼人，一二四個法國人，一九六個意大利人，八九個西班牙人，二〇個英國人，五二個波蘭人，四七個丹麥人。哈布斯堡皇室統治歐洲，約有十六代之久。他們擁有語言不一的領土，有時達二十國之多，最少時也在一國以上。他們始終將皇室置於國家之上。在舊日的奧匈帝國內，皇室的法律居於國家的法律之先；在一八三九年制定的「皇室憲章」始終沒有公佈，所以至今沒人知道牠的內容。當做過六十六年奧匈帝國皇帝的老約瑟夫 (Franz Josef) 聽到一九一四年斐迪南被刺殞命時（此舉解決了承嗣皇位的懸案），他喊道：「啊！我不幸不能維持的大統，居然有更高的權力加以確定了。」

哈布斯堡政權在一九一八年大戰告終時顛覆了，但哈布斯堡皇朝卻並沒顛覆。當人家請最後的皇帝卡爾——他是一個懦弱的人——退位時，皇后齊泰兇猛地答道：「我寧願跟你一同死在這裏。那時奧都就會來了，我們一家人都死光的時候，還有不少的哈布斯堡皇族哩。」卡爾真的始終沒有退位，雖然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

月十一日和十三日，分別宣告不參加奧國和匈牙利的政府。他和齊泰逃奔了出去。在一九二一年三月間和同年十月間，卡爾在匈牙利發動了兩次暴動，但都沒有成功。海軍上將霍爾修（Admiral Hortly）主持的匈牙利政府打败了他。他在一九二二年死於葡萄牙的馬地拉（Madeira）島上。自此以後，齊泰就訓練她的兒子奧都親王，預備將來做帝王。

奧都成長後，很勇敢、聰明、敏感，而且非常美貌。他並沒有生着哈布斯堡皇族的傳統的倒垂下唇和袋子似的眼睛。我有一個朋友最近會到比利時的斯丹諾克齊耳（Stanoekzeel）古堡中去訪問奧都母子，他回來時說道：「讓這小夥子到奧國來隨便逛逛，使人們有機會看到他，那末舉國的人就會捧他有如捧范倫鐵諾（Valentino）——美國風流美貌的電影男明星了。」

奧都是一個謙虛的少年，禮貌極好，但七百年的哈布斯堡歷史已將帝王的特權思想完全灌輸進了他的腦海中。即在目前，他偶然作公開談話時，就稱奧國人為「我的人民」。一個英國朋友最近問奧都對於希特勒有什麼意見，這位王子答道：「不幸我還沒有機會接見希特勒先生，所以我說不出來。」

因為預備做帝王，所以他不能不學習多種語言；他的德語、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英語、和匈牙利語，都講得很流利。齊泰始終沒有學會匈牙利語，因為這是一種極艱難的語言；那些極端愛國的匈牙利人始終沒有原諒她這件事，所以她很注意，使她的兒子不致再犯這錯誤。他當然自小就進了羅馬天主教；他每天祈禱三次。

經家庭教師教導了多年以後，奧都進了比利時的魯文大學（University of Louvain），畢業於一九三五

年春，得哲學博士學位。他恐怕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得正式博士學位的僭望皇位者。他的口試題目有多瑙河流域、諸國更密切的經濟合作、職團主義的奧國新憲法與民主主義的發展和調和的可能性，以及匈牙利一部分平原上的重行植林，等等。其論文的法文本共有三百六十八頁之多，題為「在奧國農村土地所有權上因使用與農民的繼承法律而產生的不可分割的權利。」他先用德文著成，後又將牠譯成法文。出版時所署的名字為「奧都·封·哈布斯堡博士」(Dr. Otto von Habsburg)。

他曾遊歷北歐諸國、德國和意大利，考察一切。每次遊歷歸來，他仍住在斯丹諾克齊耳古堡中，與其書籍和母親齊泰作伴。直到現在，那位「皇太后」還沒有替他找到一位新娘。意大利王的幼女瑪麗亞公主(Princess Maria)可算是一個理想的配偶。但跟一般人所想像的相反，墨索里尼卻不喜歡哈布斯堡皇室復辟的主意，因為這會在他的亞德里亞海側面重新創立一個帝國；大半爲了這政治上原因，所以那件婚姻沒有訂定。

這位年青的王子似乎具有很銳敏的政治上智力，他知道奧國政府可以用他來作抵制德國的武器。他已採取了一種強烈的反希特勒態度：「我絕對反對奧國接受「國社黨的」法西斯主義……這種非奧地利的運動許諾大家可以得到一切，其實卻想極無情地征服奧國的人民……奧國人民決不容許我們的美麗的祖國成爲一被剝削的殖民地，奧地利人成爲一種第二等的人。」

奧都很得奧國的民心，這是沒有疑義的。但他的母親齊泰卻並不這樣的得民心。據我的管見，如果復辟時奧都的母親並不伴着他一同回來——姑且不說那些將如蟻附蜜地回到維也納來的成千成百窮困潦倒的哈布

斯堡親戚們——那末復辟的實現就容易得多。這位「皇太后」性格極強，且具有若干舊式的思想，她固然是一位良母，但唯其如此，她恐怕是不肯放奧都獨自回來做皇帝的。而不少的奧國人卻不願看奧都繫着齊泰的裙帶爬到皇座上去。

復辟的障礙大半是在國際方面。奧都所以住在比利時的斯丹諾克齊耳古堡中而不住在維也納的故宮中，主要的原因是捷克和南斯拉夫將用戰爭來趕他出去。因為捷克和南斯拉夫是從舊日的奧匈帝國腰部剝下來的國家，牠們內部有大批人民將因復辟而騷動起來，以圖重行加入那復活的帝國。

在今日的世界上，擁護帝王的唯一口實，乃是帝王可作為一種恆久不變的象徵。牠使一個國家在未來的黑暗中有一件繫維之物。奧國或匈牙利如將奧都迎接回去，就可以得到一位固定的元首和一種固定的延續。但不幸在為未來作這種佈置時你不能不深深地發掘過去的暗影。復辟似乎是非常落伍的舉動。捷克的總統貝奈斯博士 (Dr. Benes) 曾說：「我們並不是為要復古而作戰的。」

復辟問題雖經官方否認「確切」，但奧都在奧國方面實在很有希望，所以他近來竟不提他對匈牙利的權利了。他在匈牙利方面，不僅有國際的阻礙，而且還有重大的內部阻礙。奧都在今日還沒有回到匈牙利去，其最大原因還不是捷克和南斯拉夫要趕出他，而是霍爾修和貢博斯 (Cemhos) 不要他進去。

二 「貴族有義務」？

匈牙利自公元一〇〇一年以來，始終是一個獨立王國，其內部的主要問題乃是土地問題。全國幾乎全是麥田。在一九三〇年以後，農產物的價格繼續暴跌，國家負債日深，每一國民分擔的外債額在歐洲各國中居於第一位。由此而生的危機，因國內的經濟力分配不均而更形急迫。封建的貴族在全國作威作福，匈牙利的全部可耕之地有三分之一為九百八十個大地主擁有着。

還有六分之一的土地，則為一、一二個大鄉紳所有——這些數字使人聯想到西班牙的情形。其次約有二十五萬個小地主，每人擁有一百五十英畝以下的土地。其次約有六十萬半自耕農，其所有的田地極少，故不能不將其一部分勞力出售與人。最後約有一百十三萬完全沒有土地的農民，如以匈牙利的總人口（八百六十六萬左右）為比例，可算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羣沒有土地的農業無產者。

那些貴族雖有許多因匈牙利在大戰後的被宰割而喪失了不少勢力和財富，但仍不失為一羣茂盛的、怪誕的人物。那幾家最有名的貴族，如愛斯忒海柔（Estorházy）、卡羅利（Károlyi）、捷柯尼支（Czakonichs）、匈雅第（Hunyadis）、德萊基（Teleki）、柴巴利（Szaparys）等，依舊保持着一種朦朧的魔力，恐怕除了波蘭貴族中的封建殘餘以外，全歐洲沒有其他事物可以跟他們相比。有一次，一個姓愛斯忒海柔的曾用一幅十六世紀威尼斯名畫家鐵善（Titian）的傑作來做大衣的裏子。一個姓卡羅利的，有一次特請鐵路局開一班專車，送一瓶名貴的葡萄酒給他的愛人。

這些貴族互相通婚，以致幾乎大家都成了親戚。例如溫迪虛格蘭芝伯爵（Count Windischgrätz）的夫

人本姓施青伊 (Szechenyi)，她的丈夫曾因為造法郎而入獄。他們的女兒嫁給了卡羅利家的一個兒子。有一位卡羅利伯爵夫人本姓亞麗伊 (Apurji)，曾任非常短命的匈牙利共和國大總統的米凱爾·卡羅利 (Michael Karolyi)，其夫人本姓安特拉西 (Andrassy)。海軍上將霍爾修的女兒寶蘭德 (Paulette) 嫁給了米凱爾的本家愛麥利虛·卡羅利伯爵 (Count Emerich Karolyi) 的兒子，而其兒子則娶了這同一位伯爵的女兒。一般人深信將繼霍爾修而任「攝政」的斐利斯·卡羅利伯爵 (Count Julius Karolyi)，其女兒嫁給了愛斯忒海柔家的一個兒子。

這些貴族中人幾乎無一例外，贊成奧都的復辟。但霍爾修和貢博斯卻竭力反對。他們反對的動機並非全是自私的，雖然奧都的回國將使霍爾修喪失其「攝政」的好差事，而且齊泰決不會忘卻他兩次撲滅前皇卡爾的暴動之仇的。霍爾修和貢博斯兩人，以為復辟只會削弱而不會增強匈牙利的國勢，他們覺得哈布斯堡皇室給予匈牙利的，是害多而利少，所以他們的心中就在此復辟與愛國兩者之間徬徨着。

匈牙利並不如一般人所說，是採用獨裁政制的國家，成立於公元一二二二年的匈牙利「國會」，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國會之一，牠在理論上正如英國的國會一樣，可以用不信任的表決來推倒任何內閣總理。「攝政」霍爾修，雖然在社會思想或經濟思想方面是反動的，但在實際上卻是現在還遺留一點民主主義和立憲主義的保護人，因為阻止那內閣總理（貢博斯）廢除國會而建立獨裁政制的大半是他的力量。

只要霍爾修和斐利斯·卡羅利伯爵還生存着，匈牙利的內部政治爭鬪是不會怎樣嚴重的，因為那些領袖

人物都是一個秘密團體的會員，這個團體名叫「雙十字團」(Double Cross)，內戰時期和「白色恐怖」的遺物，象徵着匈牙利國教徒會的聖十字。雙十字團爲一九一九年，霍爾修及其部下所創立，當時他們在施奇特(Szeged)地方組織一臨時政府以對抗布達佩斯(Budapest——匈牙利京城)的共產黨政府。自從這次反革命成功以後，匈牙利的歷任內閣總理都是「雙十字團」的團員。現尚生存的團員約有三十五人，其中多數人每月在布達佩斯的一家酒館中聚餐一次。裴德蘭(Bethlen)和卡羅利也許會發生爭吵，但他們在這秘密團體中的弟兄之誼勝過了私人的仇恨：他們會聯合起來對付外界的人。「雙十字團」團員大半是地主紳縉和新教徒。那些正統的大貴族並沒有加入其中。

三 暴躁的海軍上將

霍爾修的全名是 Nicholas Horthy de Nagybanya，一八六八年生於外西凡尼亞(Transylvania)現屬羅馬尼亞省內，出身是海軍軍官，生性並不怎樣聰明，但卻具有公正、勇敢等品質，所以雖然沒有多少財富或家世作與援，竟在服役了三十六年後升任爲前奧匈帝國的皇帝約瑟夫的海軍副官，旋又被任爲海軍提督，統率奧匈的海軍。在這任內，他曾平定了一場海軍叛變，去年紐約戲劇協會還把這一段情節採作「加他羅灣的水手」(Sailors of Otranto)一劇的脚本。

關於霍爾修的最令人不快的事，乃是其施行「白色恐怖」的歷史。自培拉·昆(Bela Kun)的共產黨政

府崩潰後，他是反革命政府中的軍事部長。一九一九年八月十日，他的軍隊正駐紮於外多瑙省的西奧福克（Ödenburg）地方。有幾個酒意方濃的軍官渴血地談着布爾雪維克黨人的兇暴之事。霍爾修插嘴道：「空話，只會講空話！永遠不會行動的！」那些軍官——其中有些後來變成了著名的「虐待狂者」——一聽這話，就跑出去，在這天晚上殺死了六十個猶太人和共產黨人。這是「白色恐怖」的開端。後來的一個英國勞工代表團調查了這些暴行，去向霍爾修控訴，那些負責的軍官並沒有受到懲罰——這位海軍上將竟憤憤地答道：「唔，他們是我最好的部屬呢！」

霍爾修是歐洲說話最不謹慎的要人。現在他很要朋友，又愛吹牛，所以他喜歡接見去遊歷的名人和新聞記者，但他的左右卻竭力設法隔絕他，因為恐怕他肆無忌憚地、老實不客氣地說出他的意見來。在私人談話時，他所說的關於南斯拉夫人、捷克人、德國人、或你所提及的任何人的話，是會使你毛髮倒豎的。他的年紀已經六十八歲，但卻燃燒着一種滑稽的暴躁的生氣。他時常感情迸發。在某一時候，他會因討論修改匈牙利的條約而爆發其領圈；在另一時候，他會拿起一把裁紙刀來，表演着殺人的姿勢；再有一個時候，他會眼中含着淚水說到老皇約瑟夫是多麼好的一個人，但那個「可憐的小子」（指奧都）卻如何不能希冀來代他（霍爾修）統治匈牙利。

四 貢博斯

貢博斯將軍（General Julius Goemboes de Jaktá）的一生，始終是一個冒險家、民族主義者、亡命之徒。

式的政客，一八八六年生於匈牙利的一個居民多數是日耳曼人的區域中。他的母親到現在還不能講正確的匈牙利語。他們這一家人來自德國的萊茵省，本姓蓋爾勃（Gail）。他的父親是一個小學教員，在這位未來的總理誕生前若干年，將其姓氏馬扎亞化了（按 Magyar 爲匈牙利國中最大的民族）。「貢博斯」貢博斯死於一九三六年十月。

他是一個叛逆的、極端的馬扎亞民族主義者。少時曾肄業於士官學校，後又考入維也納的陸軍大學。有一次他幾乎被斥退，因爲一位教授問他，萬一發生革命時，他是否將爲哈布斯堡皇朝效忠？貢博斯激烈地答道「不。」他說，他是一個馬扎亞軍官，所以他將爲民族主義的匈牙利而戰，不爲哈布斯堡皇朝而戰。正如希特勒和畢蘇斯基一樣，他的性格上的基調自幼就是狂熱的民族主義。

大戰時，貢博斯曾在羅馬尼亞前線上受傷，後乃供職於維也納的參謀部。因爲是一個很有野心的陰謀家，他在當時就組織了一個秘密團體，名叫 M. O. V. E.（馬扎亞軍官團）——可說是匈牙利軍官的一種「勞動組合」。貢博斯跟其偶像墨索里尼一樣，早期帶着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匈牙利發生革命後，貢博斯向社會黨人米凱爾·卡羅利自薦，替他改組其軍隊。卡羅利不信任他，拒絕了他的提議，貢氏就奔往維也納，與同時逃亡在那邊的裴德蘭伯爵（Count Stephen Bethlen）密謀推翻卡羅利的共和政府。當培拉·昆取得政權後，貢博斯就到施奇特去，與霍爾修協力組織反革命的軍隊，於是他就開始飛黃騰達了。

無疑的，對於那場至少殺害了幾千無辜的猶太人和共產黨人的「白色恐怖」貢氏比霍爾修更應負責。

同樣無疑的，他是藏在霍爾修背後的兩次破壞前皇卡爾的復辟陰謀的勢力。他曾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插身在霍爾修與卡爾之間，說道：「陛下，我命令你在今晚八點鐘離開本國。」在同年十月間卡爾第二次起事時，貢博斯不信任那些正規軍，就召集了他的秘密團體中人和學生軍來加以鎮壓。

這時候的匈牙利是歐洲最壞的獨裁國家。其中含着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切法西斯的傾向：橫暴的經濟國家主義，憎恨猶太人，壓迫自由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等等。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貢博斯的確跟希特勒保持着積極的聯絡，但在慕尼黑的啤酒館暴動發生以後，他就不再認希氏爲朋友了。殺死德國外交部長藍德瑙（Rathenau）的那些兇手會喬裝爲圍丁，在貢博斯的拿奇·戴德尼（Nagy-Teteny）田莊上躲藏了多年。

貢氏本來是斐德蘭的「聯合黨」黨員。在一九二三年，他退出了該黨，另行組織一個匈牙利的法西斯黨，前後在野消磨了五年。到一九二八年，他重新跟斐德蘭攜手，做了軍政部長。那性格複雜難解的斐德蘭，在做了十年內閣總理以後，終於在一九三一年的匈牙利金融恐慌聲中辭了職，於是就由貢博斯繼任。

在一九三五年，貢博斯企圖推廣匈牙利的對外政治活動的範圍，就引起了世人的注意。自從斐德蘭與意大利相結合以後，匈牙利一直做着墨索里尼的傀儡。貢氏卻望着北方的國社黨人。他又積極地進行談判，希冀組成一中歐不滿意國家的集團——德國、匈牙利、和波蘭。當戈林將軍爲要達到這目的而在東普魯士舉行其著名的狩獵大會時，貢博斯曾親往參加。

繼他而任內閣總理的達拉尼博士 (Dr. Kálmán Darányi de Pusztaszentgyörgy and de Tóthlak) 現年五十歲，出身於一大地主家庭；他的叔（伯）父是一位很有名的農業部長。貢博斯真正是中流人和小農的朋友，並不愛好那些封建貴族，且曾宣告將瓜分其地產以予貧農；但達拉尼博士卻明確地代表着大地主階級，在他的總理任內恐怕那些改革土地制度的計劃更將延緩實行了。達氏被稱為斐德蘭一派的人；這就是說，他的政策將親意甚於親德。在一九三七年初，國社黨人曾企圖在布達佩斯暴動。

五 收回失地

在匈牙利境內，瀰漫着歐洲最強烈、最普遍的民族主義。在狂熱的愛國精神上，匈牙利人甚至可勝過波蘭人。我們可以引用一個小小故事來說明這個：有一個八歲女學生的父親高傲地走進地理班去，給她一個地球儀。她細看了一下，就痛哭起來了。「爸爸，」她哀號道，「我要一個只有匈牙利在上面的地球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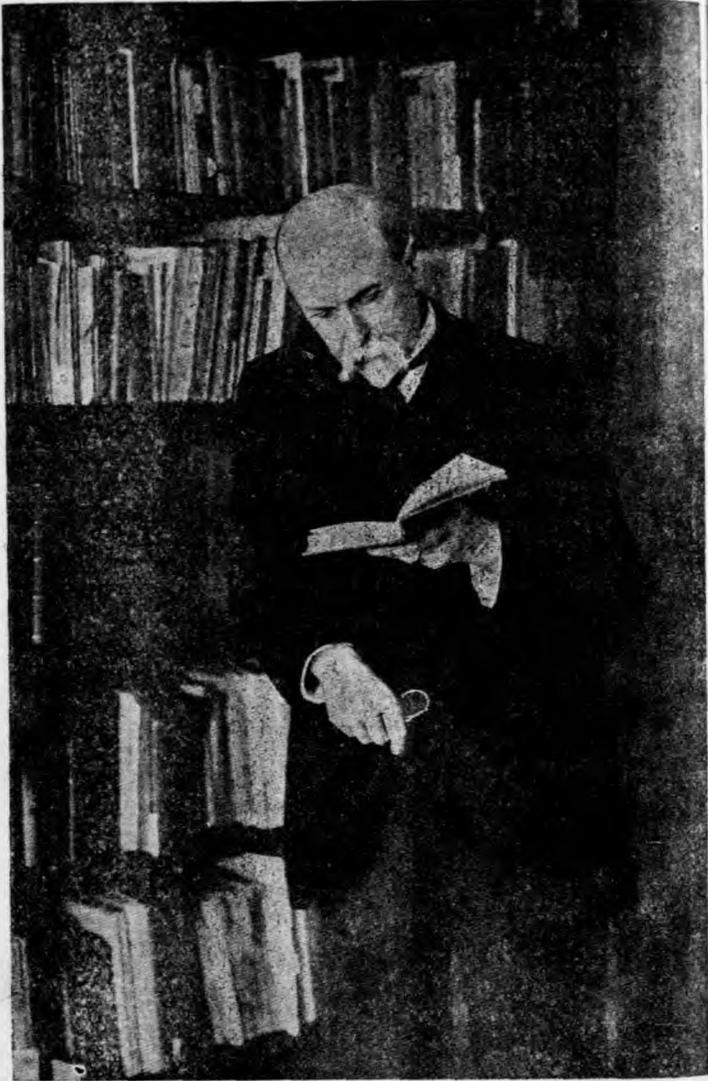
自一九一九年以來，匈牙利的民族主義一直由那最不公正的對匈和約 (Treaty of Trianon) 所造成的創傷孕育着。匈牙利在戰後喪失了百分之六八·五的領土——一九一、七五六平方公里，其原有面積為二八二、八七〇平方公里。匈牙利喪失了百分之五八·二的人口——一〇、七八二、五六〇人，其原有人口為一八、二六四、五〇〇人。匈牙利喪失了牠全部的金、銀、銅、鹽和水銀；牠喪失了其最好的煤礦，百分之八五的森林，百分之六五的葡萄園，牠喪失了百分之五六的馬，百分之六九的牛，百分之五二的工廠，百分之五七的可耕之地，

百分之五二的小麥產額。匈牙利的海口也被割去了。多瑙河盆地的經濟本是十分平衡的，現在統一性卻被破壞了。

不過同時，我們得加以指明，這些可怕的損失中包含着並非匈牙利人所住的地方。在原來的人口，足足有百分之四十四是少數民族——斯洛伐克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人、克羅地人、羅德尼亞人、意大利人、斯洛文人，等等。對匈和約的表面上辯解，就是說要解放這些少數民族。但是毛病也在於此。假使那些戰勝國真正能照着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區域劃定了正確的界線，那末匈牙利就沒有多少口實可藉以要求修改條約了。但事實上卻有三百萬左右的純粹匈牙利人也連着那些少數民族被抓過去，使他們住在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捷克的新領土上，成爲一種新的少數民族。

匈牙利戰後的外交政策，始終以修改條約——以期收回其失地——爲本。

爲要阻撓匈牙利的計劃，包圍匈牙利的「小協約」就組成了。讓我們環繞着匈牙利四周，到捷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去巡遊一下吧。



馬 薩 里 克

第二十七章 馬薩里克與貝奈斯

「波希米亞之主人翁，即爲歐洲之主人翁。」

——俾斯麥

「我們將始終做世界上的少數民族，但一個小國如能以其有限的資源完成什麼事業，則其所成就的是有極大的特異的價值的，正如寡婦的錢一樣可貴。……我所懷抱的愛國心是深思熟慮且能辨別是非的，並非那種不辨是非的愛，以爲掛着本國的招牌的一切事物都是不錯的。……愛自己的國不必因而而不愛別國。……各種制度只有本身是不夠的。」

——馬薩里克

一 捷克開國元勳

馬薩里克(Masaryk)——這名字含蓄着多麼偉大的意味啊！一個奴隸的兒子，卻創造了一個國家；一個鐵匠的學徒，卻具有了「本世紀最精美的智力」；一個和平主義者，卻組織了一支完成軍事史上空前大業的軍隊——越過西伯利亞直抵太平洋沿岸的「捷克遠征軍」；一個哲學家，卻違反本意變成了一位政治家；一位現尚生存的國父，（按：已於一九三七年九月間逝世，享年八十有七。）同時又是一個最單純的公民；一位不屈不撓的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在現世界的混亂中依舊信仰着寬容的政治；他比任何人更有力地搗碎了舊日的奧匈帝國，

使自由的捷克共和國從其廢墟上興了起來，成爲最安定最富強的一個新興國。

馬薩里克在其自傳中說，他的一生「充滿着矛盾。」例如他原是一個馬車夫的兒子——今日他卻住在普時波希米亞帝王的宮室中。他的父親又在一塊皇家采地上做過僕役，他是在前院裏於極度窮困之中生長起來的，所以當他將哈布斯堡皇室從捷克趕出去時，馬薩里克彷彿是將他們從那院子裏趕了出去。

又如，他做過鎖匠的徒弟，也做過鐵匠的助手，因爲他在少時厭惡學校。在大戰期間，他是一個頭等的實際陰謀家，一個弄密碼、詭計、串騙的專家。然而他的事業的全部基礎卻是道德的、合乎理智的。他是現代一個最有學問的人，一位了不起的哲學家 and 先知。

這位當代最偉大的捷克人，生平所作的第一件著名的事，是研究一批爲那些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 (Slovaks) 所尊敬崇拜的文件而證明其出於偽造。他本是羅馬天主教徒，後來卻變成了一個新教徒，很早就因替一個被誣控爲暗殺某教堂司儀員的猶太人辯護而得名。他揭破弗里特雄 (Friedjung) 一案中奧國外交部所捏造的文件，因而斷送了他當時的職業；但這件事卻使他成了被壓迫的斯拉夫諸民族的英雄。支配着他的一生的是這兩個因素——對於捷克斯拉夫的信心和追求真理。

馬薩里克之所以稱其哲學爲「現實主義」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在大戰期間，有一次他打定主意要回到奧國去，以便被當局絞死——他知道他的殉道將有利於捷克的復國運動。有好幾次人家要暗殺他，他都付之一笑——他在心理上是不會害怕的——但他爲防萬一，預先擬好了自己的訃聞，使牠可以成爲其同胞求解放的最

好宣傳。

他在美國的匹茨堡 (Pittsburg, Pa.) 和華盛頓兩地創立了中歐諸國中最居中的那個國家：在匹茨堡他議訂了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聯合爲一的條約，在華盛頓他發表了捷克的獨立宣言。當他被選舉爲捷克的大總統時，他已有四年不履該國的土地，且身在四千五百哩外。

他的自傳中充滿着熱情和剛毅，無論在理智上、道德上、和情感上都絕對力持正直。他記述有一次在莫斯科街道上遭遇了急迫的危險，只要撒一個極簡單的謊，說他是路旁的那個旅館中的旅客，他就可以避入其中；但是他卻不願撒謊，雖然子彈在他的四周橫飛着。然而就其一生的事業而言，他卻是一個高明的機會主義者。

當他在華盛頓預備晉謁大總統威爾遜時，馬薩里克先化了好幾個星期的工夫，仔細閱讀威爾遜的著作。這位老教授的前後左右都堆滿着論述威氏的以及威氏自己的著作。於是他才起草他的捷克獨立宣言，將牠遞給了威爾遜。在這宣言中，馬薩里克至少有六次巧妙地引用威爾遜自己的著作中的話，作爲捷克的要求的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依據。

茲從其鉅著建國歷程 (The Making of a State) 中引用兩節，以示馬薩里克性格之一斑：

「我剛在日內瓦住下，我的兒子赫勃脫患病的信息就從巴拉格 (Prague——現爲捷克首都) 我的家屬方面傳來了；到（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五日，又來了一個電報，報告他已逝世。這樣，正如國內的成千成萬人家一樣，我們也遭殃了。他是非常清白正直的，是一個詩人兼畫家，以單純爲美的極致。他也很康健，且因多運動

而很強壯。他會竭其所能以避免爲奧國作戰，可是結果還是間接地死於這場戰事。殺死他的是傷寒病，是從幾個他正在救護的加里西亞難民那裏染得來的——這是定命論者的好資料！那些一向反對我的教士從巴拉格寄了許多粗暴的惡毒的匿名信來。「天意啊！」他們說。可是對於我，這倒像是一道要我不厭不倦地繼續努力的命令。」

又如他在一次訪問托爾斯泰後的感想：

「我覺得無論在道德方面或心理方面，托爾斯泰都沒有認清侵略的暴行與自衛行動之分。他就錯在這裏；因爲兩者的動機是截然不同的，而倫理上的決定因子乃是動機。兩個人一樣開槍，但一個出於攻擊而一個出於自衛，則其間就有區別。那些機械的動作是相同的。但這兩種行動在用意上、目的上、道德上卻是相異的，托爾斯泰會用算術來辯論，說如果攻擊不加抵抗，則殺死的人可以較少；說在戰鬪之際，雙方都更其狂暴起來，殺死的人就更多；反之，侵略者如果不遭遇抵抗，他就會停止殺人。但在實際上，重要的卻是：如果有人得被殺死，則這被殺者應得是那侵略者。爲什麼該殺死一個愛好和平、毫無惡意的人而不該殺死那懷着惡意殺人的人呢？……我也知道有時很難正確地指明誰是侵略者，但並不是絕對不可能。思想正直的人一定可以無偏私地辨明攻擊是從那方面發出來的。」

馬薩里克名湯馬斯·茹利格 (Thomas Garrigue) 一八五〇年三月七日生於莫拉維亞 (Moravia) ——

現爲捷克一省)的霍度寧 (Hodonin) 鎮上。他的母親是一個女廚子，她似乎是一位了不得的女人。馬薩里克在

其自傳中動情地贊美她的能力，她的理想，以及堅持要她的兒子受教育的主張。對於他的父親，馬薩里克顯然沒有多少同情。他肄業於維也納，回來在巴拉格當大學教授，著作得很多——他的第一部著作是論述自殺的，這事實有一點心理學上的趣味——於是進了政界。他的夫人是美國女子，原名夏洛蒂·茹利格（Charlotte Garrison），他是在德國萊比錫（Leipzig）求學時與她相遇的，後來且將其姓「茹利格」加在自己的名字上。他描寫她道：「她很美貌；她具有比我更好的智力。」（註一）他們的兒子約翰（Jan），是一個好動的坦白的人物，現任捷克駐英公使。

馬薩里克一生的真正事業直到六十餘歲才開始。他記述當時人們替他舉行一個紀念的聚餐會，可算是他那著名的學者事業的頂點；他不快地說到他當時在內心中感到，彷彿沒有身死就在被安葬了。於是，在六十五歲至七十歲之間，他的大時代來了，他從巴拉格逃到國外去從事組織捷克的復國運動。在他最後的事業——教養新興的捷克國——開始時的年齡，多數人的一生和事業早已完結了。

他現在已經很老，但還相當活潑；他的興趣範圍是非常大的。他的談話稍嫌冗長一點；他常會忘情地滔滔不絕講下去。在我跟他談話的半小時內，除了本國的政治問題外，他還提及生育節制、愛爾蘭民族主義與天主教會、美國的參議員波拉、生物學、近代美國文學（他對這是極有研究的）、波蘭走廊、前往法國作戰的美國的兵士零用錢之多、哈布斯堡皇室、杜斯妥也夫斯基（年已八十五歲的他，剛完成了一部論述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著作）、別爾·哈特（Bill Hart）、世界經濟恐慌、南斯拉夫的雕刻家梅斯屈羅維克（Mestrovic），以及一部他剛才在

讀着的英國新小說，可是他卻無論如何記不住書名。

我本來以為將遇見一個極嚴肅的、或竟假正經的人，但其實馬薩里克卻具有強烈的幽默意識。他時常呵呵大笑。他對於人性所抱的廣大興趣，並不放過其滑稽可笑的一面。他曾告訴嘉班克（Cooper——捷克著名作家）正式的心理學並沒有幫助他了解人性——「只有生活和小說。」據他說，七十年來，他天天在閱讀小說。「人是一種邪氣複雜難解的機器。而且又各不相同。」在整個大戰期間，他說，他只睡了五、六夜；他想要用讀小說來代替睡眠的吧。

在跟他晤談以後，我作了如下的這些簡略的速記：親熱而有力的握手；不帶眼鏡；老年人的眼睛，很難說明其顏色，大概是深灰的吧；頭皮上還有一些白髮；所有的牙齒，連一枚金牙，笑時都發着光；鬚鬣很多，短鬚；玻璃似的有光澤的面頰；隆起的鼻子；典型的農民臉孔，顯然不是貴族或「智識分子」；一塊皺紋滿佈的、風雨剝蝕的、出土的漂石（Boulder）。

馬薩里克老了。但他的事業已經完成了。他已創立了一個國家。他一生的故事，在其因果關係的完整上，好像是一齣希臘悲劇——不過結局卻是美滿的。他不久就要死了。現代恐怕沒有一個人能比他更流芳於後世。

二 貝奈斯

馬薩里克曾對嘉班克說過：「我敢說，要是沒有貝奈斯，我們的革命是不會成功的。」自大戰時起，他們兩人



貝 奈 斯

就一直合作着——雖然貝奈斯的年紀比馬薩里克小三十五歲。那位老哲學家週遊世界，為捷克的復國運動尋求同情，同樣逃亡在外的貝奈斯，則留在巴黎——他是組織家、管卷員、精明而堅韌的實際政治家。馬薩里克將捷克的熱望寫在天空中，頑強的貝奈斯將他們寫成了改變歐洲地圖的條約。

貝奈斯博士 (Dr. Eduard Benes) 是一位尖鼻子、尖眼睛的聰明而負責的世界政治家，他是歐洲的一個最健全的公務人員，自一九一九年以來始終做着捷克的外交部長，所以他是歐洲的外交部長中間的老前輩。他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一八八四年生於波希米亞 (Bohemia)——戰前屬奧，現為捷克一省) 的柯士拉尼 (Kozlaty) 地方。跟馬薩里克一樣，他幼時也很貧苦，是完全自修的；不過馬薩里克的哲學博士論文是論述自殺，而貝奈斯在一九〇八年所作的博士論文卻論述着一個更實際的問題——「奧國問題與捷克問題」。

貝奈斯跟一座發電機一樣的有效能。我從來沒有見他笑過。他身材短小，時常在頭頂上戴着一頂闊邊的帽子。他每天工作十五小時左右，而且跟墨索里尼一樣，很喜歡接見能夠告訴他許多事情的人，(不過除此以外，這兩人是沒有一點相像的) 他是最容易謁見的一個歐洲政治家。他沒有什麼口頭禪或私見。他只談事實。他傾聽了你的話，將你的意見組成了有秩序的一串：(一)——(二)——(三)——於是依次討論牠們。在發表他自己的見解時，他也使用數目字，不過下面附着字母，例如 (一) A, (二) B, 等等。有條不紊乃其成功的基礎。他是一位堅韌的談判員。從來沒有人能把什麼強加在貝奈斯頭上。

貝奈斯並不一定名就叫貝奈斯，在從前他的化名很多，例如 Spolný, Bělský, Berger, Novotný, Kunig

Sichu, Teblano 等等都是。在十五年前，這位捷克外交部長正與馬薩里克一樣忙著偽造護照，或偷偷地爬過國境，如被發見時是有被當作間諜而立刻槍斃的危險的。有一次，他曾因偽造旅行護照而在英國被捕。不到六個月以後，他就在代表着他協助創立的國家正式簽發護照了。

跟馬薩里克一樣，貝奈斯是一個良善的歐洲人。他巧妙地將國民的愛國精神與他所認定的對全歐洲的義務調和在一起。他協助創立了國際聯盟，且助其處理一切。他是現尚生存的關於安全和裁軍的一個最偉大的主動者，有好多年他在日內瓦幾乎忙碌得跟在巴拉格一樣。每逢歐洲發生重大的問題時，貝奈斯就寫一篇「說明」——往往是一種長約八九十頁的小冊子——而在捷克的國會中宣讀；不用說，這種敘述一定是很完備且可靠的。在一九三五年九月間，貝奈斯曾任國聯的「制裁大會」主席。他最大的壯志是要組織一個有效力的「歐洲合衆國」。

不出一般人所料，當馬薩里克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退職後，貝奈斯就繼之而任捷克的大總統。

三 捷克的錯綜

真正的良妻是不大有人談起的。在國家也是如此。差不多每一個遊歷了捷克回來的人都要引用這古語說：「沒有歷史的國家是幸福的。」當然，捷克有很多的歷史，不過在馬薩里克的感化之下，捷克所採取的對內政治方針是非常平易而毫不觸目吧了。

當我第一次往遊巴拉格特時，在我首先遇見的人們中，有一個就是捷克的名作家嘉班克（Karel Capek），他立刻說道：「你到此地來幹嗎？我們並沒有什麼希特勒，皇位承繼人，國社黨暴動，共產黨搗亂，或宮闈醜聞。我直截了當的警告你——我們絕對引不起人的興趣。」真的，那些頑強的捷克人，跟浮誇的匈牙利人，癱瘓的維也納人，「神經質」的柏林人——適成一極好的對照。

我在外交部裏遇見了一位情報員——這可算是歐洲辦理最完善的一個「情報局」。捷克因為是一個文明國家，所以一個外國的新聞記者不用浪費其最初三天的光陰，以向當局證明自己不是盜賊或間諜。捷克的「情報局」辦得非常好，以致時常有人說牠從事「宣傳」。當然囉，宣傳原是牠存在的主旨。不過捷克的敵人所反對的，乃是捷克的宣傳是如此親切，如此得力，而且一般而言，是如此忠實正確，以致跟牠敵對的各國都無法勝過牠。

捷克開國時自然比其各同盟國或反對國更幸運。即以其人民而言，乃是一個密切地連在一起的文化單位，同奉着古代的波希米亞帝王的傳統。捷克人比其輕浮的南斯拉夫堂弟兄更堅實，比波蘭人和羅馬尼亞人更勤懇，而且比斯洛文人或塞爾維人更有行政上的經驗——捷克人是從前的奧匈帝國中的公務人員。

而且他們繼承着奧匈帝國的四分之三左右的工業，及其大半礦產和其他資源。因此每年有大量的玩具、陶器、玻璃器、紡織器、鋼鐵製品、軍火、啤酒、紙張、紗線、火腿、鈕扣等物，從捷克輸出出來。還有一層，捷克在大戰期間並沒有南斯拉夫或波蘭那樣，作真正的戰場，所以沒有物質上的復興問題。最後，捷克還有一支結實的，沒有吃敗仗的

軍隊（係由舊日的俄國駐軍所組成，）不像其他的新興國那樣，只有一些潰散的敗兵，以恢復秩序。

年青的捷克國就建立在這樣幸運的基礎上，好像一只長鼻子的足短身長的獵犬似的嵌在歐洲中央。牠不借長期或短期的外債，所以在一九三一年的金融恐慌中，沒有像德國和多瑙河流域其他諸國那樣受到劇烈的影響；牠嚴格地限制輸入，以維持其有利的貿易差額（捷克的第一任財政部長會說，「購買橘子的捷克公民都是賣國賊；」）牠的預算很平衡；牠的土地改革已有相當成效；牠設立了許多免費的學校；牠的內部政治建築於一個很廣大的聯合基礎上，連社會民主黨也包括在內；牠對國內的許多少數民族，採取一種相當合理的政策。

雖然如此，在經過了十餘年幾乎毫無風波的平靜發展以後，到一九三五年前後，捷克也遭遇了嚴重的困難。國內外發生了兩樁非常重要的事件。其一是個喬裝的國社黨（按：這就是最近向捷克政府提出完全自治的要求的「蘇台德日耳曼黨」）的突然勃興，領導者是一個三十五歲的「小希特勒」，本是波希米亞的一個體育教員，名叫康拉特·漢倫（Konrad Henlein）。該黨代表捷克境內的三百三十萬日耳曼少數民族，在一九三三年的選舉中得到了二、二四七、〇〇〇票，一夜之間變成了國內的第二大黨；在國會中所佔的席數由零升到了四十四。漢倫曾宣告效忠於馬薩里克和捷克。但是如果與國「國社化」了，捷克在實際上就將為希特勒主義所包圍，而漢倫的運動將成爲一種嚴重的威脅了。

聰明的貝奈斯博士是知道這個的。因此就引起了第二件大事。他周遊歐洲各國，勤勉地敏捷地從事修補藩籬。其政策的第一項要目是與法國聯盟，其次是鞏固「小協約國」——捷克、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的連帶。

一致關係。但當德國的氣餒日盛而捷克與波蘭的關係日益惡劣時，貝奈斯博士知道他還需要一些東西，因此他就到莫斯科去，與蘇聯訂結了一種互助條約——並不是普通的互不侵犯條約。這樣，捷克變成了法國與蘇聯間的軍事上連鎖，以抵制德國及其他主張修改條約的各國。地點適中的巴拉格，可供法國和蘇聯的飛機用作航空根據地。貝奈斯是完全爲了自衛而構成這個體系的。

四 霍德柴及其問題

貝奈斯昇任總統後，就由斯洛伐克族的農民黨人霍德柴博士 (Dr. Milan Hodza) 繼任內閣總理。任命霍氏爲總理，是對國內的大批斯洛伐克人表示好感的一種聰明政策。有大志而頑強的霍德柴，多年來一直居於反對黨的地位，在就總理職之後卻幹得很不錯。他於一八七八年生於蘇嘉尼 (Šurany——當時屬匈牙利) 鎮上，是一個新教徒。他在維也納大學得哲學博士學位後，做了一個新聞學者，並代表斯洛伐克少數民族出席於從前的匈牙利國會。

使霍德柴最爲擔心的，始終是德國。他自己在本性上是親德的（但並不贊成國社黨），頗願與德國、波蘭等難以應付的鄰人相和解，但他也覺得那些德國人不給他一刻的安寧。在國內，漢倫的國社黨時時設法搗亂；在國外，德國的政府不住地攻擊他。他們說，捷克境內已建築了秘密的蘇聯飛機場——築在地下，在西班牙的戰爭爆發以前，多數預言家都將捷克一致認爲下次大戰的戰場。

五 多瑙河流域公約

多瑙河流域是那兩個猛勇的戰士——「政治」與「經濟」——兇惡地交戰的場所。在表面上看來，要解決這一帶地方的困難，最合理的辦法似乎無過於重行創立一個統一的經濟上的帝國。廢除那些支離滅裂的關係；取銷那些沒有穩固基礎的民族工業；根據分工合作以提高效率的原則，以農產物去交換工業製品。這不是很簡單嗎？——絕不多瑙河流域各國是寧願單獨溺死，不願一同游泳的。這些國家間的民族仇恨是不能用圖表來表示的。這種仇恨簡直深刻得令人難以相信。我記得有一個年青的匈牙利人，當他聽到捷克和匈牙利同時互減關稅百分之十的提議時，他喊道：

「什麼！你以為我們對那些捷克人的仇恨只有百分之十嗎！」

不用說，多瑙河流域諸國的政治界限，是跟那一帶地方的天然經濟狀況並不相符的。那六個國家被分成了兩個集團：戰勝國的捷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與戰敗國的奧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亞。這樣的政治「集團」實在分得頗不高明。就經濟上立論，捷克和奧國應成爲一個集團——工業集團，而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等以穀類爲主要物產的國家則可成爲一農業集團。企圖拯救多瑙河流域的一切計劃都粉碎於這癥結上：政治上利益與經濟上利益間的根本的、無法逃避的對立。

此外還有旁的政治上困難。「奧捷聯合國」即使能成立，也不足以銷納匈、羅、保、南四國所出產的全部穀物。

最好的天然購買者——德國，必須加入在那工業集團中，於是「政治」又要露出牠那醜臉來了；因為法國將加以反對。意大利也如此。「小協約」諸國本身也絕不能算是一個美滿的經濟單位。捷克向其同盟的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所購穀物並不多，因為勢力很大的捷克農民黨，為保障其自己的利益起見，要求對這兩個同盟國輸入的穀物徵收很高的關稅。

六 巴爾幹諸國

「匈牙利與南斯拉夫間的戰爭總算避免了，國聯將想出一個方法來解決牠們中間的爭論。最好的解決辦法，或許是將巴爾幹山脈劃作三分之一。」

——勃魯培克 (Howard Brubaker)

在捷克之外和捷克之下，躺着巴爾幹諸國。他們真像一種地獄，每個強國都存着惡意想割取。誠如希臘政治家凡尼齊羅 (Venizelos) 所說，大戰的目的，是把巴爾幹歐洲化，但是大戰的結果，卻多少把歐洲巴爾幹化了。巴爾幹半島是個永不安定的金字塔，每個國家對另一國家懷着仇恨，而在一個國家之內又有每個少數民族對另一少數民族的仇恨。

他們之間的仇恨，很可以列一張表。南歐與東歐之間的最深仇恨是什麼？保加利亞人恨塞爾維人，甚於克羅地人恨塞爾維人嗎？兩種仇恨合起來，是否等對意大利人或對希臘人的仇恨？匈牙利人恨羅馬尼亞人，甚於羅馬

尼亞人恨保加利亞人嗎？加里西亞人恨波蘭人，甚於烏克蘭人恨俄羅斯人嗎？

這些不幸的巴爾幹小國，居然能够並且曾經吵起架來引起了世界大戰，這對於人類和政治，都是一個不能容認的侮辱。爲了一九一四年薩拉耶伏這個街道泥濘，民智未開的村莊發生一件斐迪南被刺案，竟致十五萬美國青年送了命。巴爾幹政治上討厭的幾乎猥褻的糾葛，對於西洋的讀者，雖然不易理解，但對於歐洲的和平——也許是世界和平——卻生死攸關。

(註一)見馬薩里克 (Masaryk) 的馬薩里克總統自述 (President Masaryk Tells His Story) 第一二二頁。

第二十八章 陰氣籠罩宮廷的羅馬尼亞

一 一個混混沌沌的國家

羅馬尼亞是個富庶的國家，人口一千八百八十萬；現由國王卡羅爾（Carol）統治着，而卡羅爾又受魯貝絲（Magda Lupescu）的統治。該國雖然因為官僚政客的腐敗與貪污，財富損失得很多，可是石油的產量依然豐富，同時盛產五穀與木材。國都蒲卡萊斯（Bucharest）非常繁華，可說是巴黎的縮影。市內主要的大街爲維多利亞路（Queen Victoria），寶馬、香車、達官仕女，來往如梭。他們享用多瑙河出產的魚子醬，外西爾瓦尼亞山上所產很大的紅梅，總之，挨飢受餓的農民們用血汗所生產的財富，皆讓他們任意揮霍掉了。

羅馬尼亞爲一個世襲半獨裁的家族，白拉夏紐氏（Branians）所統治，已有三代之久。第一代國王，即卡羅爾的伯祖，就是一位姓白拉夏紐的人，帶着羅馬尼亞的王冠，巡遊歐洲各國的宮廷而物色得來的。白拉夏紐氏所行的政策，是想盡方法來括地斂財；和以前統治該地的土耳其其握有宗主權者（Turk Sultans）及希臘握有讓子權者（Phanariot Greek Concessionaires）所行的虐政，先後如出一轍。歐洲各國，遭受這樣腐敗的治理與剝削的，可說祇有羅馬尼亞一國了。他們國家的口號，是賄賂（Corruption）。歐洲大戰以後，羅馬尼亞曾有一次土地

改革；農民爲着要購買種子與農具，祇能去走高利貸的門徑，利息常爲三分，四分，有時竟高至五分；但他們收穫的穀糧雖有益餘，卻又無法出售。於是發生了農業恐慌，便成千成萬的農戶歸於破產；而人民的平均負債額，佔了世界各國的第一位。全國的金融癱萎了，預算不足的數量之大，簡直使人驚駭。然而在蒲卡萊斯的繁華區域，仍舊很多揮金如土的情形。

世人對於羅馬尼亞 (Romania) 曾有一個酷辣的笑話說「馬尼亞」 (Mania) 的意思是瘋狂，「克來托馬尼亞」 (Kleptomania) 的意思是「盜竊狂」，而「羅馬尼亞」則可釋爲一個具有盜竊狂的國家。

羅馬尼亞的國民性非常溫和，他們都是信任天命，得過且過的；他們不喜歡擾亂與流血。他們不像塞爾維亞人 (Serbs) 那樣：懷着英雄主義，並且準備爲愛國而實行暗殺。因此羅馬尼亞境內，向來不曾發生過革命。羅馬尼亞人的血統是很複雜的，原來爲拉丁民族，是德拉潤 (Trajan) 皇帝遣往達西亞 (Dacia) 省的羅馬軍士之後裔；而數世紀以來，則參進了斯拉夫民族的血液。同時多數羅馬尼亞人，還具有吉普賽人、韃靼人、希臘人及土耳其人的痕跡。

距今約四十年之前，有個英國的公主，來做這個文化未開的羅馬尼亞人的皇后。她的名字叫做曼麗 (Mary) 爲愛丁堡公爵 (Duke of Edinburgh) 的女兒，她既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女，又是俄國沙皇的外孫女；這樣集中地代表着皇族血統的人物，在近代是少見的。她和羅馬尼亞王儲斐迪南 (Ferdinand) 結婚，共生子女六人，而以卡羅爾爲最長。她自一九一四年起即與斐迪南共理國是，直至一九二七年斐迪南逝世爲止。在這期間，

發生了各式各樣的醜事，而且層出不窮。

二 國王卡羅爾

卡羅爾在青年時代，性情複雜兇猛，固執而不馴；就在兒童時代，已經不易管束了。他不喜歡他的父親，那枯燥而不慈的斐迪南，但最初還崇敬他的母親。當時羅馬尼亞的大貴族司透貝親王（Prince Striboy）及執政官約翰·白拉夏紐（Jon Bratianu 爲司透貝之姊夫或妹夫）兩人，在朝廷內權力極大，這種情形，是卡羅爾所痛恨的。可是卡羅爾逐漸成長起來，卻步着朝廷上一般人的後塵，任情任性，過着非常放縱的生活。

一九一八年，他在嘉息（Jassy）結識了蘭白麗諾小姐（Zizi Iambriano）。嘉息是一個省城，歐戰時德人侵入羅馬尼亞之後，該國的朝廷就遷在此地避難。曼麗皇后想使他和蘭白麗諾小姐分手，可是結果反而增強他們間的結合。卡羅爾好像故意要煩擾他的家庭似的，竟和那個女郎實行結婚了。這並非是祕密的貴賤聯婚，而是在奧得賽的大禮拜堂內，很莊重地舉行婚禮的。羅馬尼亞的最高法院，判定這種婚姻爲非法；卡羅爾異常憤慨，甚至準備辭退儲君之位。然而經過了一年左右之後，他對於蘭白麗諾已經厭倦了；加以戰局十分緊張，於是什麼結婚什麼退位，都丟到腦後去了。蘭白麗諾爲卡羅爾生了一子，取名梅夏（Mircea）。她很愛卡羅爾。可是當她被逐抵巴黎時，卻對他提起一千萬法郎贖養費的訴訟。

這時曼麗皇后和白拉夏紐氏的巨宦，多少還有些把卡羅爾當作兒童看待，就吩咐他到世界各地去旅行，以

便修養心神，並忘記過去的不愉快的事情。卡羅爾從本國出發，只跑到瑞士，就在那裏遇到了海倫公主（Princess Helene）。她是希臘國王君士坦丁（King Constantine）的女兒，而君士坦丁王之子喬治，則由於曼麗的巧妙撮合，將與卡羅爾的妹妹伊麗沙白結婚。卡羅爾決定住下來，並於一九二一年三月，與海倫舉行婚禮。不久他們夫婦一同回轉蒲卡萊斯，準備一直很幸福的生活下去。

可是後來卡羅爾又遇到了魯貝絲叩，使羅馬尼亞的歷史，展開了簇新的一頁。

原來在這個時期，卡羅爾和執政官約翰·白拉夏紐，彼此已經發生了公開的衝突。他痛惡白拉夏紐的勢力，並且正式申明，當他繼承王位之後，必將掃除白拉夏紐和司透貝的一黨。白拉夏紐當然不是一個會隨便放過這種威脅的人。卡羅爾與魯貝絲叩的瓜葛，這時正在傳揚開來，適與白拉夏紐以進攻的機會。卡羅爾被任爲羅馬尼亞的特使，到倫敦去參加亞歷山大皇后的喪禮。他於任務完畢之後，就到米蘭與魯貝絲叩聚首，並且預備一同到威尼斯去旅行。這時他忽然接到一個電報，要他撤掉他的情人，立時回到蒲卡萊斯去，否則將作放棄王位繼承權論。這是白拉夏紐商得斐迪南和曼麗的同意，用這種方法去「教管」他們的兒子的。卡羅爾怒不可遏，拒絕回國。於是白拉夏紐就火速地召開一個王室會議（Crown Council），勸誘該會接受了卡羅爾的「退位」。

自此卡羅爾一直過了五年的流亡生活，而在這個期間，魯貝絲叩一步也不會離開他的身邊。

一九二七年斐迪南逝世，由卡羅爾的六歲的幼子繼位，他名叫米開爾（Michael），爲海倫所出。接着發生了一更爲重大的事件，就是約翰·白拉夏紐死掉了，他的同黨失勢，而農民黨的首領馬尼伍（Vintu Maniu）則乘着

擾攘不安的局面，取得羅馬尼亞的領導權，變為首相。這時白拉夏紐的餘黨，主張不准卡羅爾回國，而馬尼伍則要接他回來，以便保全這個王朝。馬尼伍的主意是，在卡羅爾的出亡期間，和海倫成立的離婚案，現在應加註銷，好使他回國來，真正安定地住下去。他為卡羅爾作了種種安排，而卡羅爾遂於一九三〇年六月，飛回蒲加萊斯，實現了愉快的政變。卡羅爾宣布自己為國王，使他的幼子米開爾退位，接管了他的父親和他的兒子都掌管過的朝廷。

馬尼伍是把魯貝絲叩不算在內的；他以為卡羅爾會拋棄她的。他是算錯了。

三 魯貝絲叩女士

魯貝絲叩女士，當然要算是當代的一個非凡的女子。她現在已經四十歲左右了，並且身體也發了胖，然而卡羅爾依然鍾愛着她；他覺得如果沒有了她，簡直是不能生活的。她是杜巴里（Du Barry）式和德彭巴都（de Pompadour）式的帝王所寵愛的人物。她對於卡羅爾個人的影響，大體上可說是好的；然而因為她是猶太人，而且又領導着政府內的一個祕密政府，於是在政治上釀成了嚴重的結果。

實際上魯貝絲叩祇有一半是猶太人；她出生於嘉息，是個藥店老板華爾夫（Wolf）的女兒。因為羅馬尼亞的律例，限制經營化學藥品業的猶太人的人數，所以華爾夫為着要得到營業權，特改名為羅馬尼亞文的「魯貝絲叩」。他有一次到維也納去，結識了一個羅馬天主教中的女郎，旋即結婚。所生的女兒就是馬格達·魯貝絲叩，她會受羅馬天主教的洗禮。

一九二三年，她在西內亞（Siam）認識了卡羅爾。西內亞為夏季的首都，卡羅爾常帶着一班遊佚的朋友，到那裏去打獵和作輪盤賭。她本來已嫁了一個陸軍官佐，及見卡羅爾垂青於她，她就悄悄地和丈夫離異了。她有極大的智慧，動人的性格，頭髮像火一般鮮紅；她的超凡的美貌，使卡羅爾願意為她而放棄王位。

直到最近為止，她住在蒲卡萊斯近郊的住宅區內，費爾巴斯路二號的紅磚砌成的二層樓房中，這所房子就在波蘭公使館的左邊，靠近亞歷山大路的轉角。那裏有個巨大的花園，沿着圍牆的一邊，列着一排令人看了疑惑不解的雞埕。許多來格好音雞，普里摩斯雞，還有一對火雞，都在鐵絲網後面低頭疾走，或則昂首闊步。據魯貝絲即不但照料這些家禽，還曾親手幫同木匠建造那些茅棚及雞埕呢。

她和卡羅爾不能公開同居，因為公開同居，在羅馬尼亞人的倫理觀念上，縱然不算大逆不道，然而在政治方面，卻怕發生危險。凡是住在羅馬尼亞的人，皆知她是卡羅爾的情婦；反對派在講演及宣傳小冊中，也公開的攻擊她與國王的關係。然而為了卡羅爾個人的例行公事，卻不能不稍加審慎。有時她在夜間坐着汽車進城，由一道邊門到御花園中去。花園裏有一小屋，雖與王宮隔離，但有路可以相通。我們得知道，王宮是在蒲卡萊斯的大街上，和匹加狄里（Piccadilly）在倫敦所占的地位略等。所以兩人的私會頗為困難。因此兩人一有機會，便到那山間的西內亞村去同居，這就是他們最初結識的地方。

羅馬尼亞人厭恨魯貝絲，是有種種原因的。一部分曾經長期治理並劫掠羅馬尼亞的王族，對於卡羅爾過着這樣不規則的私生活，非常感到不滿。其他許多羅馬尼亞人，無論貴族或是平民，覺得國王即使有二十個情婦

也不要緊，可是魯貝絲叩卻是猶太人，因而遂發生厭惡。更重要的，就是一般政治家，對她皆抱反感；這是因為她已變成了一個獨特的政客，且是全國最重要的政客——「君側私黨」的首領。

這個「君側私黨」(Canariile)的發生，一部分由於卡羅爾既在不結婚的狀態下，不能有一個王后及合乎常軌的宮廷；二則他對於少數舊日的密友，當然喜歡接近。而他這班知交，同時也是魯貝絲叩的朋友。「君側私黨」最初發生的時候，係由狄米柴斯叩(Poni Dimitrescu)所領導，他做了多年國王的私人秘書。該國有稱爲鐵衛團(Iron Guard)的法西斯團體，素欲剷除魯貝絲叩及她的一切朋友；迨首相杜嘉(Jon Ducea)被鐵衛團的團員所刺殺，第一屆的「君側私黨」即於一九三四年春間解散。然而新的「君側私黨」卻又產生出來了。

凡是羅馬尼亞的機要職位，皆有魯貝絲叩的朋友在那裏。她有她自己的特務機關。她派人去充任要職。首相所有的權能，差不多已經被她奪去了；任何首相，皆不能撇開了她而行使統治權，然而她又不對任何人負責。她並不過分干預各事，這是她的敵人也承認的；可是一切重要事項，不經她的同意即不能夠實行，那些政客因此非常氣惱。她這種活動，使國王更加重視她了；因為國王要行使正課以外的職權，她便是極便當的工具。凡是國王皆需要正經事情以外的娛樂，而在百般事物完全規定的羅馬尼亞，尤其如此。

曾經出頭公然反對魯貝絲叩的，共有兩個人，一個是馬尼伍，他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直到今日，國王如果要侵犯他，不免有引起革命的危險。可是馬尼伍爲了魯貝絲叩的原故，已經失去首相的位置了。至於另外一個人，

則爲普里克勃上校 (Colonel Vladimir Preun)。當卡羅爾飛回羅馬尼亞的時候，普里克勃就是在外邊佈置政變的主要負責人。他在過去若干年中，和那握大權的私人秘書狄米柴斯叩一樣，是卡羅爾的一個極要好的朋友。後來普里克勃認爲魯貝絲叩那樣的操縱卡羅爾，足以斷送國家，於是定了一個激烈的計劃想剷除她。他逮捕了既解除軍職，還判處十年的徒刑。

此外還有一個人，是敢在相當限度以內和她作對的；那就是尼古拉·鐵杜來斯古 (Nicolai Titulescu)。他在過去若干年中，是羅馬尼亞之巧言的怪癖的外交部長，不久以前才去職。在杜嘉過害以後，鐵杜來斯古表示在沒有蕭清君側以前，自己決不入閣。他以爲國王既受宵小的包圍，因而引起鐵衛團的暗殺；宵小一日不去，他決不在政府中供職。卡羅爾因爲國際事件方面，羅馬尼亞人在全歐素具威信者，祇有鐵杜來斯古一個人，所以不能少了他。鐵杜來斯古要求解散那第一屆的「君側私黨」，以爲入閣的代價。他是不喜歡什麼情婦的，他和國王的情婦魯貝絲叩鬪爭了一星期之久，結果他是獲勝了；可是還說不上能夠脅迫魯貝絲叩本人的地位。

假如不是爲了政治上的關係，魯貝絲叩實在可算一個合乎理想的情婦。她並不輕浮，反之，她的審慎倒是很著名的。在她自己的圈子以外，蒲卡萊斯的民衆曾經見過她的，一共不到四十個人。她在流亡的期間，已經領略到金錢的價值了；她勸告卡羅爾儲蓄金錢；然在另一方面，她也並不貪婪。據一般人談起來，她對於卡羅爾是很忠實的；這在荒淫無度的羅馬尼亞，實在是難得的。她也不打算與卡羅爾正式結婚；她曉得那樣做，不免要使卡羅爾的土朝走入末路。她也沒有生育私生子來，使卡羅爾受累。大家也許還記得，德蒙德絲邦夫人 (Madame de Mont-

capricious，曾生了七個私生子來磨難路易十四。（可是時常有一種謠言，稱魯貝絲叩將出嫁於某人，又稱卡羅爾將與日爾曼某公主訂婚。）

魯貝絲叩真是極端的時代錯誤者。帝王們今日是處在失意的年頭，而一切皇室的寵倖，像宮廷的優伶們一樣，幾乎都已跑開了。

據蒲卡萊斯人談起來，當卡羅爾的弟弟尼古拉斯（Nicholas）大鬧不入正軌的戀愛的時候，魯貝絲叩曾被她的父親很嚴厲的呵斥了一番。卡羅爾好像是已安定下來了，而尼古拉斯卻正在登場；他違背他的兄長的命令，和某一沙維紐夫人（Mme. Savennu）結了婚。卡羅爾少年時候的行爲，也會像這一樣的；然而改邪歸正的放蕩者卻是最嚴格的清教徒，因此他非常憤怒，他說尼古拉斯有玷王室的名譽。這件事引起了全城的注意，而當風傳尼古拉斯打腫他的兄王的眼睛時，蒲卡萊斯的人們更爲之震動。於是魯貝絲叩的年老的父親走來向她說道：「女兒，女兒，你參夾進了一個怎樣的家族呀！」

四 皇家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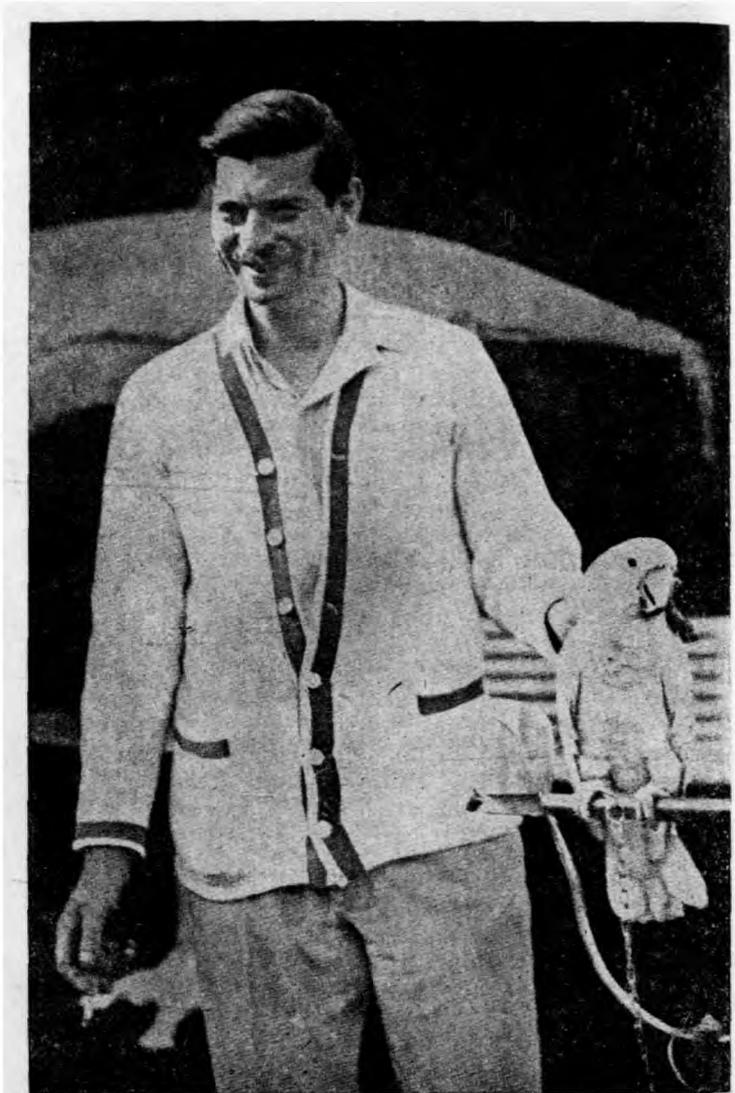
卡羅爾今日是很有威儀的，同時還有些嚴緊；他已不復是青年人了。他是矜驕，頑強而且堅執，然而同時並非缺乏知識的。他很少幽默的意味。他講英語時帶着德語的音調，講法語時帶點英語的音調，而講德語時又帶着法語的音調，雖然字眼是一點不錯的。就是他的羅馬尼亞語，也講得不十分完美，像巴爾幹諸國的國王學習多種語

言所具的病態一樣。

他的經濟情形現在很寬裕；他個人每年的薪俸，按目前匯價計算為七二、七二七英鎊（合美金三六三、六三五元）。他的生活相當的節儉，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奢華；薪俸的三分之一，當能儲蓄起來。據蒲卡萊斯某方面的估計，他的存款的數量，約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即二〇〇、〇〇〇鎊有奇；大部分皆存在外國銀行中，或購了外國債票。羅馬尼亞政府對於王室的支出，計如下表。

國王	卡羅爾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雷	（七二、七二七鎊）
太后	曼麗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雷	（三六、三六四鎊）
廢后	海倫	七、〇〇〇、〇〇〇雷	（一二、七二六鎊）
太子	米開爾	七、〇〇〇、〇〇〇雷	（一二、七二六鎊）
旅行	費	六、〇〇〇、〇〇〇雷	（一〇、九〇九鎊）
總計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雷	（一四五、四五二鎊）

卡羅爾對於全家的人，除了米開爾以外，感情都很惡劣。米開爾一度做過國王，而將來還很有再做該國國王的希望；這樣的童子，在歷史上要算是獨一無二的了。卡羅爾因為知道自己幼年所受的教育很壞，所以現在定的教育米開爾的方針，是非常合理的。可是卡羅爾隔絕了他自己的母親；又放逐了前妻海倫。他和尼古拉斯談不到友愛，也不喜歡妹子伊麗娜（Ileana）。伊麗娜是羅馬尼亞王室中最漂亮的女子，現為安東·哈布斯堡大公的



卡 羅 爾

夫人。

卡羅爾的朋友極少；因為一般國王，多半是不肯和臣民做朋友的。他每表露出粗暴、矜持和尊貴的態度，以此常人覺得很難同他講話。他的性情之中，有一種醜陋的、互相齟齬的不調和的成分，這恐怕是他母親的溺愛所養成的吧。他的最親近的朋友，該推戴夏紐氏（Titian），這個人在歷屆內閣中，皆擔任內務次長的職務。另外一個親近的朋友，則為約爾加教授（Prof. Nicholas Jorga），他是一個非常博學的人，以前曾任卡羅爾的教師；他在二十二歲的時候，就在蒲卡萊斯大學充任歷史教授；他所著作的書籍和小冊子，多至兩百五十七種。

卡羅爾並不是個獨裁者，因為實際上他無需如此。他因為看到了他的皇家表兄弟們的命運，如西班牙的亞爾豐梭，及南斯拉夫的亞歷山大的情形，所以他凡事皆求妥協，以免太明顯的獨裁政治之危險。同時他也無需應用獨裁的權力；這大部分因為羅馬尼亞的選舉法中，規定政黨獲得百分之四十的選票者，其在國會中的議席，可外加百分之三十。並且羅馬尼亞的政治情形很特別，歷任內閣，從無被投票推翻的；國王可以決定更調的時期，監督新開員之委派，而新的全體開員，在參加新的競選時，罔有不勝利的。

在杜嘉被害以後，國王忽然生起政治病來，於是不能親臨被刺的首相之喪禮。因為他怕鐵衛團會向舉行儀式的禮拜堂拋擲炸彈。他的不去出席，是在最後數分鐘內決定的；事先製就的圖表，註明他將站在那裏，而結果他却沒去。一時蒲卡萊斯議論紛紛，說卡羅爾躲在宮內，害怕得癱瘓了。他也許是出於謹慎；然而他失掉了一個機會，不能利用這好機會來證明那些能射殺首相的子彈，並不能驚動一個國王。

五 太后曼麗

關於卡羅爾的母后曼麗，我們還得再談幾句。她至今還是一個很華麗的婦人。她自幼即想表現自我；她寫的一本自傳中，含着許多純粹的「吹牛」；這自傳她根本是不該寫的。她生來沒有猜忌和妬嫉的情感，她沒有絲毫的「自卑錯綜」；她的演劇的才能極佳，她論理可以成爲一個名伶。

她的一生的悲劇，就是她對卡羅爾的個人關係的失敗。卡羅爾幼時她溺愛着；到現在也還非常的愛他，但她不能認真地把他看作國王。在她的眼睛裏，卡羅爾還是一個孩童；當他擺出國王的架子來的時候，她便不能自禁的覺得那是悖理的行爲。這種情形，是卡羅爾所深痛惡疾的。反之，魯貝絲却隨時隨地把「他是羅馬尼亞的國王」這件事放在心上；這也是她能抓住卡羅爾的一部分原因。

曼麗也很喜歡年青的米開爾，她十分希望他成長之後，能夠具有她那樣的性格，希望他能跳過他那父親的一代。她望他能受良好的教育，娶一個公主爲妻，做一個賢君。她知道他爲着雙親的原故而處境不幸，所以用盡種種法子去撫慰他。魯貝絲也還喜歡米開爾，每隔若干時日總要會他一次。

曼麗曾爲一個頭等的具有政治手腕的王后，這件事也許易被大家忘卻。現代的王室，也得「自食其力」。她不但爲羅馬尼亞生了六個孩子，還將該國的人口與領土擴張了一倍以上。她是英國產的婦人，而其丈夫斐迪南則爲德國的霍亨索倫皇族中人；她在歐戰中竟能勸使斐迪南不去參加同盟國，而參加協約國；卒使羅馬尼亞從

一個可笑的半自主的地位，一躍而為歐陸第七大國。

曼麗現在已經脫離政治舞臺了。可是據她講來，羅馬尼亞的人民都知道：如果他們「需要」她，她還是在那裏的。

六 法西斯的活動

和卡羅爾的宮殿隔開兩條街的距離，有一個旅館；那裏在戀愛上，在政治上，以及在貪污上，皆很能夠表現卡萊斯的精神。在這個旅館內，差不多每天下午皆有兩三個衣冠整齊言語不一的青年，坐下來啜着土耳其咖啡，並談論革命。他們便是鐵衛團的團員。

這個團體創立於一九二七年，係狂熱青年科特勒亞紐（Corneliu Codreanu）所組織。他本為波蘭人，並非羅馬尼亞產，真名叫做齊林斯基（Zelinski）。他為這個團體最初所起的名稱，為「天使長米開爾的衛隊。」（Legion of the Archangel Michael）牠的政綱為一種狂暴的喧擾的半法西斯的性質，而以強烈的國家主義及反猶太主義為基礎。牠的會員往常結隊遊行鄉野，身著白衣，手持火紅的十字架，去觸發那些無知的鄉民，喚起城鎮中的學生。全國各地團員，現達二十萬人。

科特勒亞紐相信公開的暴動，他曾槍擊嘉息的市長，認為他是親近猶太人的。當德國希特勒掌政以前，科特勒亞紐在羅馬尼亞的運動，僅像一種蔓延表面的不愉快的黃水瘡罷了。及至希特勒上臺以後，牠的勢力忽然膨

眼起來，而在政治上也非常重要了。因為鐵衛團如果執政，則不免使羅馬尼亞脫離去國而去聯絡德國。鐵衛團的一班人，一向仇視魯貝絲叩的羽黨。後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首相杜嘉，終給鐵衛團的亡命分子所刺殺了。

鐵衛團於暗殺杜嘉以後，內部旋告分裂，而領導權落於一個更重要的人物之手，他便是尼古拉·司徒來斯叩（Nicolai Staleou）。他不相信恐怖主義，所以和科特勒亞紐正式脫離了。他想使鐵衛團受人們敬愛；政府雖不承認鐵衛團為合法的政黨，但他卻想用合法的手段去奮鬥。他是方纔三十歲的青年，他富於熱情，為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有一個咨議會，那些議員皆很崇拜他。差不多每天下午，他都要坐在雅典大旅社的休息室中，舉行一種會議。他是一個出色的煽動家和演說家。（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司徒來斯叩在蒲卡萊斯的醫院中，被暴徒刺死於病榻上；據測行刺者為鐵衛團中之另一派人物。）

鐵衛團中的人物，表示希望經由全國普遍鼓動的途徑，以取得政權；而各地之鼓動，則以各該地之「尊崇祖國」（Culte de Patrie）俱樂部為中心。他們主張在掌政之後，當即消除其他一切政黨；至於國王卡羅爾，如願放棄魯貝絲叩，則絲毫不生問題。他們談起國王來，態度皆很恭敬。他們否認他們的組織現今還受希特勒的津貼。他們說，當他們的團員到柏林去會見羅森培（Rosenberg）的時候，羅森培見他們不開口要錢，非常覺得驚奇，並且稱讚道：「準希特勒」團體，來到柏林而不求乞的，就祇有他們了。

到了最近，鐵衛團已和國內最大的政黨攜手了，（即馬尼伍所組織的全國農民黨）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

馬尼伍以爲他在利用鐵衛團；他們是他的挺進隊。而鐵衛團則覺得自己是在利用馬尼伍；他是他們的政治戰略家。其他領袖及政黨，也有參加這個非正式的聯合陣線的；其中有喬治·白拉夏紐的自由黨之脫黨分子，有亞維來斯叩將軍（General Averescu）的黨徒。亞維來斯叩爲歐戰時羅馬尼亞最大的英雄。大家之所以能夠聯合起來，是爲着一致厭惡魯貝絲叩的原故。

七 馬尼伍的自述

朱里歐·馬尼伍（Juliu Mauriu），是巴爾幹各邦中一個最優秀的人物，也可說是全歐洲一個最優秀的人物；至於他爲羅馬尼亞之最傑出的公民，那更不用說了。他出生於外西爾瓦尼亞省，爲農家子弟。他爲人寡慾，廉正莊嚴而虔誠；至今還是獨身。他和克羅特的馬介克（Matichels），彼此的事業既相仿，而且同是羅馬天主教徒；他幼時所受的是耶穌會教徒的教育。他對於女人，金錢，及個人的權力，都不發生興味。他是罕見的人物，他是「爲愛國而愛國」的羅馬尼亞人。

馬尼伍生於一八七三年。歐戰以前，他是匈牙利國會中的一個議員，代表羅馬尼亞少數民族。現在他的身體不很康健。他做政客的缺點，就是異常的堅執，沒有妥協的餘地；他的心地堅韌，而轉動遲緩。他是毫不貪戀權利的。他因爲覺得卡羅爾的對待海倫不合公道，便辭去了首相之職。他本爲全國農民黨的總裁，因爲覺得卡羅爾既不滿意他，難免要影響到全黨在政治上的成功，便毅然辭去總裁的職務。

馬尼伍之最成功的事業，爲其在歐戰之後，能將在野的反對黨兩翼聯合爲一，而組成一個強大的政黨。他的政黨之「農民的」(Peasants)半部，產自原有的王國，而其「國民的」半部，則產自戰後取得的外西爾瓦尼亞及其他區域。自羅馬尼亞有史以來，直到馬尼伍擔任首相的時候，纔第一次見到良善的政府。他設法促進重要的政府財政及其他改革，着手改組農業及鐵路；更重要的，(雖是消極的然而卻是有價值的成就)是他結束了那可惡的白拉夏紐氏之虐政。

此外馬尼伍還做了一件不得好報的事——就是他設法使卡羅爾回國。

世界人士，但知道一九三〇年六月間，卡羅爾在那輝煌奪目的飛機政變(Dazzling Aeroplane Coup)之後，重新獲得了王位；至於該項事變的真相，則至今沒有人加以披露。有人以爲是卡羅爾藉了二三勇敢的亡命之徒的助力，親自完成復辟工作的。並且把他描寫成爲一個健於飛行的王子，一個近代的加泰梅恩(Allen Quarraine)，一個英雄。這和事實相差，簡直不止十萬八千里。其實卡羅爾的回國，除了舉步跨進飛機以外，自己並沒做過些什麼。一切必要的手續，皆是馬尼伍在羅馬尼亞境內佈置妥當的。

馬尼伍的動機很明白。他曉得卡羅爾停留在國外，難免永久成爲紛擾與陰謀的焦點。他知道攝政團(Royalty)的微弱無力，並且深信「穩固，連續，權威」是君主制度的三個重要條件。他又覺得自由黨(即白拉夏紐黨)既然反對卡羅爾，則他自己的全國農民黨，在現實主義的立場上，就該擁護他。他的接回那誤入歧途的王子，乃是論理上的必然。但他並不要卡羅爾帶着魯員絲叩一同回來。

馬尼伍在多年後的失意中，已把這件事的真相親自寫出來，準備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向羅馬尼亞國會宣讀，可是沒有獲得准許。這篇東西詳述斐迪南還在世的時候，他即已不斷的爲着卡羅爾而活動了。及至斐迪南逝世，馬尼伍更是加倍努力，他勸令全國農民黨贊成卡羅爾之復位，向攝政團探詢意見，並且很謹慎的試測全國的輿論。以下是他演說底稿的一部分，這演說稿至今尚未發表。

「卡羅爾殿下想回羅馬尼亞的心情，越來越急切了；然而他絲毫沒有表示願與魯貝絲叩分手……在每次與國母海倫談話的時候，我總設法消除她對於卡羅爾殿下的惡感；希望將來卡羅爾殿下回國之際，在精神方面能有和解的餘地……而卡羅爾殿下，則認我之遠慮爲寡斷。

我依據我所接到的各種消息，以決定我的態度；我並非是猶疑不決，實在因爲有兩件重大的事，在我是不能忽視的。第一，我需要卡羅爾殿下給我保證……他願意依據憲法治國，並不任用私人的朋友以治國。第二，他願意脫離魯貝絲叩女士；她對於卡羅爾殿下的影響，實在是有損他的令名的……」

馬尼伍接着敘述他怎樣委派一個密使，到巴黎去探詢卡羅爾的意見。使者不但見到了卡氏，同時也會到了魯貝絲叩本人；她表示決不隨他回羅馬尼亞，以免推翻種種的計劃。據稱她會這樣說道：「卡羅爾殿下一朝爲着國家的幸福而復位，我將永久避開，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從那時以後，再沒有一個人會談到我。」馬尼伍作事謹慎，希望從卡羅爾那裏得到相當的聲明，以保證這宣言的履行。他便決定再派尼古拉斯去見他。他接着寫道：

「在這種情形之下，一九三〇年五月底有一天，普里克勃少校 (Major Picoupe) 忽來見我。他是我所熟

悉的人，並且是竭誠擁護卡羅爾殿下的。他報告我，他已去會過卡羅爾殿下；而殿下曾請他確切向我詢問他一朝決定回國，我的最後的態度究竟怎樣。於是我託付普里克勃少校轉達卡羅爾殿下，說明這個步驟是不必要的，因為尼古拉斯殿下已擇於七月十八日前往巴黎，會晤卡羅爾殿下討論一切；往後我也許要親自到場的。

我向普里克勃少校詢及魯貝絲叩女士；他回答道：「她是不回國的。」我便對他說道，既然如此，……倘若卡羅爾殿下獨自決定回國，則我非但不會反對他，而且要贊助他。」

馬尼伍接着詳敘他盡心竭力的籌備與佈置。他各方面皆注意到了；他召見（是王子尼古拉斯的副官）馬諾來斯叩上校（Colonel Marolsson），並與尼古拉斯交換意見。他囑託軍政部長康德斯叩將軍（General Condessou）派遣軍隊至克魯什（Cluj）及嘉息地方去迎接卡羅爾；並令蒲卡萊斯的駐軍，至飛機場一帶守衛。他通知了內閣及攝政團，並商請一個攝政官沙拉蒂紐（Saraiteanu）辭職，以便卡羅爾補他的缺位。他甚至於在王宮之內，為卡羅爾備妥了臥室。

卡羅爾回來了；而在次晨五時，馬尼伍便接到了報告，說他希望立刻自立為王。馬尼伍原來的主意不是這樣的；他以為卡羅爾應該先加入攝政團，待將婚姻問題調整妥貼，並使國人習慣於新的局面以後，再行自立為王。然而卡羅爾卻堅持着自己的主張。馬尼伍祇好勉強商得攝政團的同意，接着又舉行開議：

「五個部長投票主張卡羅爾殿下加入攝政團，而六個人贊成他自立為王。我的意見是在少數方面；但有幾位開員曾說願意無條件服從我的主張，……在開議進行之際，吾黨國會議員派遣代表多人來見我，我便接

見他們。他們主張立時宣佈卡羅爾殿下爲國王，並且請我不要妨害他們的願望。此時我覺得不先處理海倫皇后與魯貝絲女士的問題，而立即宣佈卡羅爾殿下爲國王，顯然免不了要發生不幸的後果；然而事態已經轉變了，我個人的力量是挽回不了的。我不能違拗公意而一意孤行……並且要想獲得我所希望的結果，這時已是大晚了。於是我採用了唯一合理而且光明的辦法；我……辭職了。」

過了沒幾天之後，卡羅爾迫於情勢，再任馬尼伍爲首相。馬尼伍接着寫道：

「在遵照國王的意見，組成政府之後，我立即提議從速舉行加冕典禮。我定期於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五至二十日之間，並商定國王當與皇后海倫一同加冕。我提出了加冕的秩序單，並在亞爾巴·朱利亞（Alba Julia）預作相當的準備。我得到了這樣的結果，雖感疲乏，而心中卻很愉快，因而請假兩星期，離開京都到他處去休養一下。」

「當我回京時，情形卻完全起了變化。國王到了此刻，已不願再聽加冕的話。那使我非常高興的，逐漸好轉而趨於正軌的情勢，現在竟已惡化了。我不知道如何會發生這種變化……」

「接着我聽說魯貝絲女士已經回國了；我是不願相信的。我詢問公安機關的監督加德爾及比亞紐（Cadere and Bianu）兩位，他們否認有這回事；我詢問韋達君（M. Yada），他也毫不知情。既而又有人報告我，說魯貝絲女士已經轉來了。我再向比亞紐君詢問，他回答我道，那該是另外一位魯貝絲女士。但我不久就知道，她是一九三〇年八月四日轉來的，住在福易受大旅社中。」

不久馬尼伍又辭職了；因為他「極度疲乏」並且覺得「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是不能有什麼成就的。」據他說來，國王「很高興的」接受了他的辭呈。馬尼伍於此得了一個教訓，原來君王們是不願多受其臣民的恩德的。卡羅爾本來也想拋開魯貝絲，然而和她分離剛滿兩個月，便覺得再也忍受不住了。

八 漂亮的外交官

羅馬尼亞其他的政客，還值得我們提到的，要算是那怪誕的前任外長鐵杜來斯古。他看起來像個蒙古種的猴子，他是巴爾幹最優秀的演說家，他統制着蒲卡萊斯所有的新聞記者，他是法國參謀本部信任的唯一羅馬尼亞人，他能很流利的講五六種語言，他的機智與不可磨滅的靈活著名於整個歐洲。他就在極熱的天氣，在屋內也穿着大衣；他在「鐵衛團」的該死名單上是第二號。他曾兩次擔任國聯大會的主席；而在一九三五年，曾兼任「小協約」及「巴爾幹協約」的主席，其中所包括的人口，共達七千萬左右。

卡羅爾很忌妬鐵杜來斯古的才能，當他因病請假而在法國休養的時候，便一脚把他踢下了外相的椅子。

繼承他的職務的，為青年「自由黨人」達太來斯古（George Tatarasou），這人自一九三五年以來，一直充任着卡羅爾的首相。

九 親德還是親蘇

羅馬尼亞在「小協約」的鐵環中，算是第二個國家。牠的陸軍雖不甚好，但石油藏量頗豐（三分之一為英商所有），並且在法國的歐洲聯盟體系中，軍事上的地位極為重要。法國人是不願意失掉羅馬尼亞的；他們沒有這樣幹的心意。

可是羅馬尼亞間或也有親德的傾向；這是有幾種原因的。

(一)羅馬尼亞的主要物產為穀類，而德國則可作牠最好的市場。法國及羅馬尼亞在小協約及巴爾幹協約中的友邦（南斯拉夫、土耳其、希臘），祇能購買少量的羅馬尼亞穀物；而德國則能收買其全部——作為一種政治上的交換。

(二)羅馬尼亞境內，不但反猶太主義非常盛行，並且還有八十萬薩克遜人，是所謂日爾曼少數民族；這些人當然景仰着那卍字旗。羅馬尼亞的法西斯黨，除了鐵衛團以外，至少還有三個。

(三)羅馬尼亞的敵人為匈牙利；一旦牠和匈國開戰，即令法國願意幫助牠，也有遠水不救近火的缺陷；而德國卻是近隣。這樣講來也許是看得太遠了；不過羅馬尼亞之需要一個友邦以抵制匈國收回外西爾瓦尼亞的企圖，卻在羅馬尼亞的外交政策上，起着相當的作用。

(四)卡羅爾有一半是屬日爾曼的霍亨曹倫族的；而且一般有權力的人，每希望更大的權力，他也許在暗中欽佩哈特勒哩。

在另一方面，法蘇協定則有挽住羅馬尼亞的效用。羅馬尼亞的比沙拉比亞（Bessarabia）省，為沿着德尼斯

特河(Dniester)之沃土，是在戰後由蘇聯方面奪來的；過去多少年內，羅馬尼亞很怕他們要收回這塊地方。後來布爾雪維克黨人爲要實現西境的和平，已經拋棄了侵略比沙拉比亞的意思。這自然可以消除羅馬尼亞人的憂慮；而且打開了成立羅馬尼亞——蘇維埃互不侵犯條約，以推廣法國的聯盟範圍之門路。然而直到現在，鐵衛團卻堵塞着這扇門。

第二十九章 亞歷山大被刺後的南斯拉夫

一 幼主彼得

南斯拉夫王國，包含強有力的民族一千三百五十萬人，其中有塞爾維人 (Serbs)，克羅特人 (Croats)，斯洛文人 (Slovenses)，斯拉馮人 (Slovones)，馬其頓人 (Macedonians)，黑山國羅人 (Montenegrins)，波斯尼亞人 (Bosnians)，及達爾馬西亞人 (Dalmatians)。自國王亞歷山大遇刺殞命後，其子彼得二世 (Peter II.) 即繼登王位。彼得現年十四歲，爲歐洲最年青的國君；他羞怯而且笨拙，怕是沒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原故。他的父母，由於疏忽或缺乏教育子女的智識，以致教養的方法非常失當。他在十歲以前的唯一教師，爲一個英國籍的保姆。固然她的人格很高尚，而且教養這個遲鈍的孤寂的孩子也很熱心；然而在他達到入學年齡之後，她的教育任務只得終止了。

國王亞歷山大，在遇刺前不久，纔認清了這件事；還是那孩子的外祖母，羅馬尼亞王后曼麗，出來參加意見，主張給與王子以適當的教育。於是他被送到英國去。進學校讀書。及至他的父親被刺，彼得遂回國繼位；他現在是不能再進學校了，因爲南斯拉夫的憲法，規定國王不得長期居留於國外。彼得不能在英國受完學校教育，是很可憐

的；爲要彌補這種缺陷，緣聘英人巴勞特（Parrot），爲他的私人教師。

彼得是從曼麗王后那裏，知道他父親逝世底消息的。她最初不知道怎樣把這可怕的消息告訴他纔好；後來她說道：「彼得，你該曉得人民現在要稱你爲陛下了。」孩子聽了急得眼淚直流，嘴裏喊道：「外祖母，我的年紀太小，不能做國王呀。」

彼得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他的表兄弟羅馬尼亞的米開爾，所受的教育和他適成一對比。米開爾的父親卡羅爾，對於他的教育方針是非常合理的。他的十二個同學，是從全國各地選來，而彼此相處，完全以德謨克拉西爲原則。這班孩子既從羅馬尼亞各地（如外西爾瓦尼亞、比沙拉比亞等處）選來，因此米開爾可以吸收各種羅馬尼亞人的性質。同時各個學童的家庭職業，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一個學童的父親，是鐵路上的轉轍手，另外一個學童，則是小官員的兒子。學校是設在王宮以內，各項教職員應有盡有；而每經一個星期左右，卡羅爾即召各兒童茶會一次。因此米開爾被養成了一個平衡的有信心的少年，當他和彼得相會的時候，他的精神的煥發，和彼得那種羞澀畏縮的樣子，恰成一個顯著的對照。

在年齡相似的全歐兒童之間，彼得要算最富的兒童之一，也許是最富的。關於他的父親的財產情況，至今沒有公布；但據我們知道，彼得是個獨生子，而亞歷山大的財產，估計約達二、〇〇〇、〇〇〇鎊（美金一千萬元）其中大部分存放於國外銀行中，或購置了外國債票；這從正統的國家主義上看來，不能算是愛國的行爲。亞歷山大非常愛財，這是他和其他獨裁者（如希特勒及墨索里尼）不同的地方。

南斯拉夫的皇室俸給，是先交給國王，再由國王決定怎樣分配給家屬的。一個十四歲的孩子，顯然不能做這種事體，於是他的堂兄攝政王保羅（Regent Prince Paul）與母后作爲他的代理人，負責管理收入。公俸的數量很大，計每年爲五五、〇〇〇、〇〇〇汀那（dinar），按目前匯價計算，約合二五〇、〇〇〇英鎊。（美金一百二十五萬元）其中半數以汀那在南斯拉夫國內支付，另外半數則以瑞士法郎存儲國外。攝政王保羅所獲得的津貼爲七二〇、〇〇〇汀那，而每年作攝政王薪金的則爲五四〇、〇〇〇汀那，合計約等於五、七六〇鎊。（美金二萬八千八百元）這個數目，和那孩子在名義上有支配權的款項比較起來，要算是很小的了。

彼得貴爲國王，但他沒有遊伴。他有兩百萬鎊（美金一千萬元）的資財，但沒有使用牠的地方。他每天的收入約有六百鎊；（美金三千元）他是做巴爾幹各國中最擾攘的國家之王，親受磨難而賺得的。這個不幸孩子的青春時代，既免不了受可怕的磨折；就是帝王的尊榮具有若何顯赫，恐怕也難以補償這種缺陷。他本該頑足球的時候，卻由侍臣陪着坐在宮中。不但如此，他的前程是很可怕的；他永不能更換他的職務，他須終身做國王，他永不能逃避他前途的峭壁。

二 殉難的國王

亞歷山大死了，他那被子彈洞穿的屍體，躺在首都附近與白來尼芝（Obolenski）地方之加拉喬治維支（Kragujevitch）陵墓中。這個建築物裝飾得十分華麗，牠上面那種光彩耀目的鑲嵌細工，在一兩世紀之後，將顯

得更優雅而美觀。我們要想了解南斯拉夫，要約略預測其前途，那末，對於亞歷山大之一生與事業，就先研究一番不可。

據時事雜誌 (Time) 累次說，亞歷山大在像片上看來，很像一個小城鎮中的牙醫。實際上他卻像他的本色——像一個國王。他爲人勤奮，可愛，能夠飛快的改變喜怒的表情，但同時卻又方正而狡黠；性格是很複雜的。他的心地堅強執拗，而又是明明聰慧。他死時爲四十六歲。他死後比活着還強，因爲他的被刺，一時倒使他那分崩離析的國家團結起來了。

亞歷山大自始至終是個軍人，歐戰時他始終在前線作戰。一九一五年戰敗而由塞爾維亞總退卻的時候，他和普通的兵士一同步行。他在私人生活方面的道德，幾近乎嚴肅，所以他鄙夷其妻兄卡羅爾的放蕩不羈。他喜歡保加利亞的鮑里斯 (Boris) 但懷疑其羞澀長縮與多愁善感的性質。要他像鮑里斯那樣，不加戒備而在首都的街道上步行，在亞歷山大簡直是想像不到的事。他幼時在彼得格拉的俄皇宮廷中爲侍童，歷有年所；那裏的光華燦爛，和專制主義的威嚴顯赫，深印在他的腦海中，影響着他的一生。他並不喜歡浮華，但極愛顯示威權。他的俸給雖極豐厚，然而消費卻頗節儉；他僅有的奢侈品，爲書籍和汽車。他在德丁基 (Dordiche) 圖書館內，藏有書籍兩萬冊。自備汽車二十三輛，皆爲派克牌 (Packard)。在全世界自備派克汽車的人士中，他要算爲數最多的一個了。

除希特勒以外，像一切獨裁者一樣，他也是勤奮的工作者。亞歷山大每日起身很早，在上午八時即開始辦公，

他的祕書，須將他當日的通訊及文件等物，於八時以前完全準備好。至於每日朝會，皆在十時舉行。每逢星期一，必先接見參謀總長，首都衛戍司令，以及警察署長。他每日必至深晚纔停止工作，爲要恢復身心的疲勞，或與皇后及少數密友玩紙牌，或像希特勒一樣聽音樂。他時常自奏鋼琴，而手法也很佳妙。他從來不穿便服，永遠穿着軍裝。在他的會客室內，唯一的裝飾品是些陳列軍器模型的櫃子，裏面放着大砲及砲彈的模型，這些都會加工磨光，像珠寶一般發亮。

亞歷山大及少年彼得之先世，乃是巴爾幹半島上最暴亂的一個家系，這一個家族，即加拉喬治維支王朝（Karageorgevitch Dynasty），乃是純粹的塞爾維人，牠不像其他王朝一樣，牠只在逼不得已的時候，纔肯和其他王族聯姻，而且就在這樣的時候，也只肯和毗鄰的巴爾幹國家締親。亞歷山大的父親彼得一世，娶了黑山國的公主爲妻；而他自已則赴蒲卡萊斯，與羅馬尼亞王后曼麗之女曼麗公主結了婚。

加拉喬治維支（意思爲「黑喬治」）家族，爲一土匪魁首海都克（Haiduk）的後裔；他在一八一〇年，使塞爾維亞脫離了土耳其人的統治。這個原來的黑喬治，性格有點特別；他固然在愛國事業上頗有成績，但他既殺了父親（爲着免被土耳其人所俘獲）又殺死其兄弟；最後他自己也遭了暗殺。在十九世紀中間，這個家族在塞爾維亞的歷史上是飄搖不定的；有時握到政權，有時又失勢。

南斯拉夫的近代歷史，始於一九〇三年，當時統治塞爾維亞者，爲國王亞歷山大·奧白勒諾維支（King Alexander Obrenovitch），他屬於一敵對的王朝，而其王后德拉加（Draga）則爲一名譽不佳的平民。此時加

拉喬治維支一家，都逃亡在國外；但經與朝臣合謀，刺殺國王及王后，遂得重登塞爾維亞的王座。登位的「黑喬治」爲彼得一世，即後來在馬賽遇刺的亞歷山大之父。他統治到一九一四年爲止，這時就由亞歷山大開始攝政。彼得一世也爲祖傳的毛病所苦。傳說他曾殺死他的王后，黑山國的曹嘉（Nalja）公主；這件事始終未經證實，也許是無稽之談。不過他的性格，確是非常不穩的。等到後來他的精神失了常態，那真正統治着塞爾維亞的官僚集團，便逼他退位了。

本來該由長子喬治攝政，不該由亞歷山大攝政的；可是儲君喬治，神經也不健全。他在暴怒的時候，常常鞭打他的侍從，此外還做了若干不入正軌的行動；於是朝臣判定他是瘋人，將他送至尼喜（Nis）地方一個堡壘中禁錮起來。直至一九三七年，他還在那裏。（據一個意大利新聞記者記述，喬治曾用手槍射擊其不幸的侍從口中啣着的香煙，作爲打靶練習。）

至於亞歷山大，讓我們趕緊說一句吧，他並沒有承襲黑喬治族的這些遺傳性。他既不具殺人犯，也不是瘋人。他是神志很清爽的國王，清爽到了剛毅的程度；他完全是個愛國者，他所做的一切，皆是他認爲最有益於國家的事。然而如後所述，國內有一大部分人，卻需要另一種東西；亞歷山大性情執拗，自然難得用調協的方法來解決了。亞歷山大的唯我主義，也許受他家族史上之不良的影響，但他的熱誠爲國，畢竟是不可否認的不幸，他設法去統一他的國家，結果卻使國家瀕於混亂的狀態。

以上所說，都是關於彼得的家族和彼得的父親的話。他們並不是完全出於遺傳。

三 幾位攝政王

保羅親王，爲南斯拉夫之首席攝政；他是亞歷山大的堂弟，也是跟他血統最近的有攝政資格的成年人。據傳兩人間之友誼並不十分濃厚，然而國王爲要保全其王朝，祇能選他充任。保羅曾肄業於英國的牛津大學，其實該校對於訓練實際的行動家，可說是最不適當了他的夫人奧爾加公主（Princess Olga），爲英國肯德公爵夫人（Duchess of Kent）之姊妹。他愛好書籍，音樂及繪畫；以及鄉間紳士的生活。他希望能老死在牀上；因爲黑喬治家的統治者，能夠死在牀上的還祇有一人。（並且這個人，即彼得一世，又是個瘋狂病患者。）誠如塞爾維人所說，他「太英國化了」，他和外國人相處，比和本國人相處更覺得自然。

保羅始終並不怎樣想做攝政王。那種帝王的戎裝，也許能打動他的內心，使他珍視牠的顯赫與威武。但他一定願意少一些顯赫的，假如同時能夠少負一些責任的話。做南斯拉夫那般的國家的統治者，並不是玩意兒；據一般人閑談起來，說保羅在就任攝政王的最初數月中，非靠安眠藥的幫助，是不能夠入睡的。

保羅爲人相當可愛，所以人們並不畏懼他，敢和他說老實話；並不像從前對亞歷山大那樣害怕。最初他頗易於接近，但近來他的約會也有謹密的戒備了。因爲有一種巴爾幹政治上的災禍，（軍部的陰謀）是降到他的身上了。保羅有時爲着運動身體而去散步，那種情形簡直是可悲又可笑的。在通過樹林中的道路上，他前面有一輛滿載軍隊的汽車開路，身後也緊跟着一輛汽車，而路旁則滿列着士兵；他和其伴侶在路上緩步，嗅着汽油的烟味，

無論要欣賞一隻鳥或一顆樹，都有一個哨兵跳起來行敬禮。這皆是軍部使他就範的圈套。

環境雖然如此，而保羅的行政卻已有良好的表現。當若干塞爾維的元老，冀圖隱沒亞歷山大遺書的時候，他竭力加以反對。他對於國內的裂痕，盡力設法調和；他明達地勸導他的第一任首相葉夫體支（Bogolub Yev-tich），釋放克羅的反對派領袖馬介克（Markak）出獄。他的第二任首相斯都雅底諾維支（Mitar Stoyadinovitch）頗有刷新政治之望。保羅是個沒有野心的人，他的攝政時期還有七年，在期滿的時候，他將不勝愉快。

另外還有兩位攝政者，一個是斯坦可維支（Radolno Stankevitch），以前爲亞歷山大的私人醫師；一個是皮羅維支（Ivan Perovitch），爲前任克羅特省長。斯坦可維支與皮羅維支兩人，皆不是正統的塞爾維人，所以他倆被委任爲攝政者時，首都人士很爲驚訝。其實國王選派他們兩人攝政，顯然是具有「巴爾幹式」的理由。他們兩人爲人皆很忠實，性格相當高尚；思想既無色彩，也無變爲偉大的民衆英雄之望。並且兩人的意氣彼此不相投合；國王曉得他們彼此會互相爭吵，因而兩人中必有一個站在保羅一方面；這樣，保羅在決定任何事件時，皆能得到多數。

斯坦可維支爲一良醫；亞歷山大初患胃疾，經了五六個外國專家治療，都未見效。而斯坦可維支祇說道：「陛下，除了神經方面稍有不調以外，你的器官是沒有什麼疾病的。你心裏不要去想牠，你便會全愈了。」憑着這簡單的法子，亞歷山大的疾苦果然治好了。他便詢問斯坦可維支，需要何種酬報。斯坦可維支用一個東方的寓言來回答，他說道：「以前土耳其的蘇丹，曾因一低微的侍臣之勸告，而獲到龐大的利益，便問他要什麼報酬。侍臣答道：『請

你在下次接見羣臣的時候，很公開的對我談話。」蘇丹照樣做了，朝臣看了皆感到驚異和嫉妬，於是大家紛紛談論那一個侍臣，認為他是國王的寵愛者。而國務總理大臣便給他一個職務，接着又給他一個職務。到了最後那個不出名的侍臣，竟升為國務總理了。

這個故事也許是偽造出來的，但事實是：斯坦維支在政治上本來毫無聲名，在國王恢復康健之後，竟一躍而為教育部長。於是他就飛黃騰達了。現在已做到攝政官。可是一般人皆不喜歡他，照大家說起來，凡是在他沒有顯貴以前曾經輕蔑他的人，他是決不肯忘懷，或饒恕的。

第三個攝政者，皮羅維支，性格要好得多了。路易·亞丹米克（Louis Adamic）曾以尊敬的筆調描寫他，而我知道南斯拉夫的其他政客，是沒有誰能得到更高的頌讚的。一般人以為他是克羅特人，其實他乃是達爾馬西亞人（Dalmatian），他做克羅地省長的時候，雖然因為首都方面的壓力，使他不能真正的溫和行事，但他比較以前的歷任省長卻賢明得多了。他當然也熱烈的反對聯邦主義者，而深信「塞爾維人、克羅特人及斯洛文人在本質上是同族的人。」

四 暗殺的心理

這裏應該提到另外的一個人了，那就是刺死國王的喬治甫（Vlada Georgiev）國王亞歷山大，和刺客喬治甫，是憑着怎樣神祕的偶發機緣，彼此會在馬賽的鋪石街道上相遇的呢？那張有名的行刺的新聞照片，差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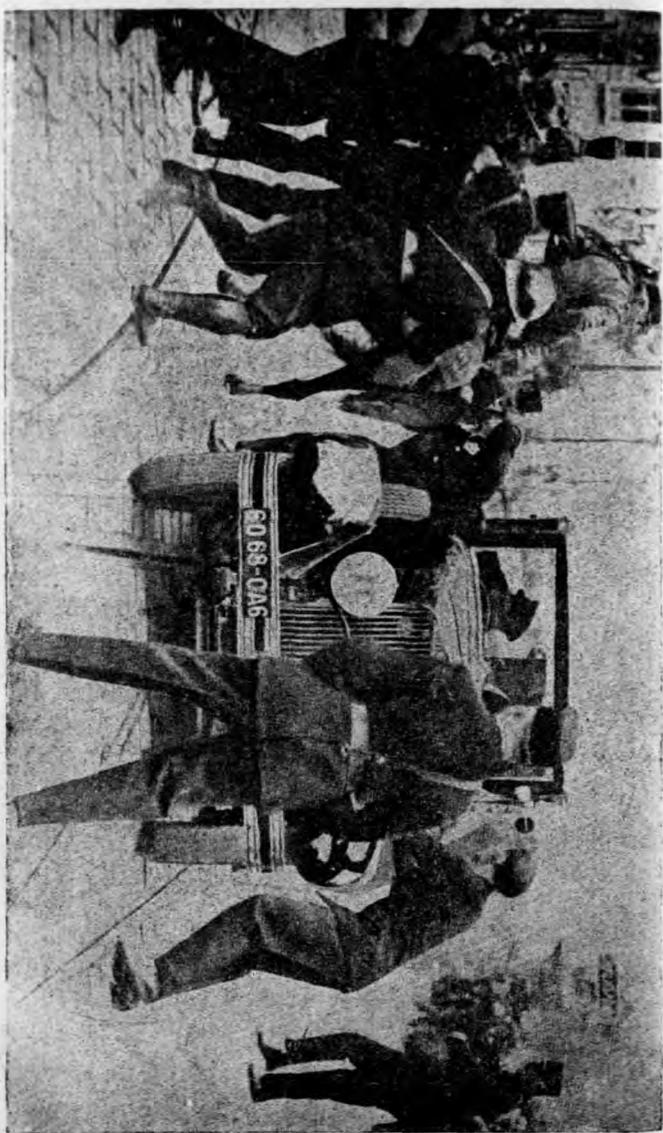
人都已見過。其中最動人的地方，就是當國王跨出小艇之後，觀衆皆知他將在九十秒鐘之內身亡，而國王自己卻不知道。

喬治甫是馬其頓的一個「恐怖主義者」。這個名辭在巴爾幹半島上，意思就是「愛國者」及「理想主義者」。他信仰着馬其頓的解放；換言之，他的團體之目的，是要馬其頓的塞爾維亞部分，脫離南斯拉夫政府，而與該省的保加利亞之一部分相聯合。馬其頓人爲着這個目的而發起的運動，至今已有了四十年的歷史。他們最後的希望，爲謀馬其頓的獨立或自治；但是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們只好先求馬其頓與保加利亞相聯合。

馬其頓人的組織（T. M. R. O.）係由米哈洛夫（Ivan Mihailov）所領導，他是一個勇猛駭人的首領。他是一個俠盜羅賓漢式的暗殺黨，除了塞爾維亞人以外，向來不會攻擊一個良民。米哈洛夫和他的黨徒，組成一個政府裏面的政府，牠有自己的陸軍與警察，自己的信差，自己的稅則，自己的法律及司法標準。這個組織的手臂很長，而是毫不容情的。凡是民族的叛徒，永遠莫想逃生。例如米哈洛夫的女人，曾經追蹤一個敵人直到維也納，終於在那裏的堡壘戲院（Burg theatre）中將他擊斃了。至於暗殺亞歷山大的喬治甫，則爲米哈洛夫的汽車夫。

馬其頓人分裂爲兩派，喬治甫因爲殺了幾個反米哈洛夫派的人員，便有了聲名。他最初所刺殺的兩個名人，一是共產黨員哈齊狄莫夫（Hadjidimov），另一個爲溫和派托馬來夫斯基（Tomalevsky）。於是，當時的保加利亞政府雖然袒護馬其頓人，也祇好逼他逃走了。他樹立了兩個計劃，並以全部能力與才智去進行他的事業。他變成了一個危險的狂人，帶着一顆冷酷的心。他的陰謀之一，是想炸毀日內瓦國際聯盟大廈；爲着這件事，他費了

刺遇賽馬大王在山大歷亞



多年的心力。另外一種陰謀，即為刺殺亞歷山大·喬治甫始終沒有得到炸毀國聯的機會……

一九三四年這一年，簡直產生了一個政治暗殺的狂歡節。被暗殺的人物，有奧總理陶爾斐斯，德挺進隊領袖羅姆，德陸長施萊轍，羅馬尼亞總理杜嘉，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法外長巴爾都，波蘭內務部長派拉克基，和蘇聯第二要人基洛夫。這許多暗殺事件之中，有幾件的意義是完全相同的；即行刺的暴客目的，在於推翻或削弱那當權的政府，打開一條途徑，以便產生一更能代表民意的政府。刺殺杜嘉的君士坦丁尼斯古，暗殺陶爾斐斯的普拉奈泰，擊斃亞歷山大的喬治甫，以及暗殺派拉克基的烏克蘭人，他們雖然自稱為鐵衛團、國社黨等等，其實皆是良善的民主主義者。

決意殺人的心理基礎是什麼呢？維也納的史丹克爾博士（Dr. Wilhelm Stekel）研究這個問題時曾對我說道：大多數政治暗殺者，皆是父傳不良的畸形產物（Offshoots of distorted father fixation）。思想乖僻者和安那其分子，他們尋求並殺害政治家，藉以滿足某種神祕的個人的怨恨；這些人常是因為兒時曾有不愉快的遭遇，以致變成了精神病者。他們往往是私生子，如刺殺奧匈帝國皇后伊麗沙白的無政府主義者，便是一例。暗殺者的生活，是要解除兒時的某種衝突。他們的暗殺行為，乃是實行自我辯解的最大努力，藉以彌補幼年之不幸遭遇。史丹克爾博士在一篇著名的論文中說道：一個人倘非有意要去殺害他人，他決不會自殺；反之，一個人倘非也想自殺，他決不會去刺殺他人的。大多數殺人犯，皆是因為感到生活不滿意，所以不願死活的去殺害他人。他們

自己都是自殺的候補者，所以敢把自己的生命爲孤注，去幹殺害他人的冒險行爲。實際上，他們的殺人意向，也許起於想把生命做個不平凡的結果；他們心裏想道：「我將要死了，但在未死之前，我要拉一個陪客同去。」

照這種理論而言，在大多數政治暗殺案件的後面，皆有一段結黨爲非的歷史。祕密的恐怖主義的集團，常是在那裏研究如何去害人。結黨爲非之心理的基礎，爲不喜歡做一個平庸的人。結黨爲非者與潛在的暗殺者，輕蔑那有組織的多數黨；他覺得做那被壓迫的少數人（這少數人皆具有一種政治上的冤屈，不管是真實的或幻想的）中之一員，是件可慶幸的事。許多人生來都自以爲負着重大的歷史使命；而全體暗殺者，皆爲揚名於世的動機所驅使。（墨索里尼會對名記者羅惠說，「每個無政府主義者都是走入歧途的獨裁者。」）

暗殺黨之刺殺一個政治家，常是由於把他看作父親的肖像（Father-Image）。他因爲自己一生處在俯仰由人營養不良的地位，（暗殺黨類皆貧苦，）便詛咒他的父親。他所刺殺的那個顯貴的人物，在心理上卽是他的父親，是他認爲應對他的命運負責的。那顯貴的人物，最初也許會被看作父親的替身而受崇拜，繼而被仇恨，終乃被殺戮。史丹克爾博士接着說道：暗殺黨也許因爲過度愛他的父親替身，所以纔去殺他；因爲愛與恨這兩極，是相反而又相成的。例如白魯士斯（Brutus），竟會刺死了凱撒大帝。他本是凱撒之精神上兒子，他希望能做凱撒最親信的人；然而自己竟爲馬克·安東尼（Mark Antony）所替代了。他所以刺死凱撒，並非由於憎恨，乃是由於忌妬。

兒童時代所遭遇之心理上的創傷，如不明生身之父爲誰，或是遇了其他不幸，皆會永久的刻在一個人的精

神上。牠們形成了對於生活永遠感覺不滿的隱在內部的核心；照史丹克爾說來，到了極端的場合，就會釀成暗殺。「被殺的國王，實是彌補了刺客的隱秘生命史之某種缺陷。」一種謀害的行爲，可說是將個人之內在的衝突，轉送到國際生活中去；暗殺者是將他的不幸的源泉，輸送到世界問題的領域中去。也許布斯(Booth)少時曾受他酗酒的父親毆打，因而(或許)林肯就被刺死了。也許普林西勃(Princep)兒時環境不佳，因而世界大戰就發生。

五 南斯拉夫的內部衝突

照哲克孫(J. Hampden Jackson)在他的「戰後世界」(The Post-War World)一書中講來，塞爾維人、克羅特人及斯洛文人所組成的王國，乃是「各種動機的一個不自然的聯合」所造成的。美國威爾遜總統，要想應用民族自決的原則，解放並聯合南斯拉夫各民族，而將保加利亞除外。法總理克勒索梭和他的現實主義的信徒，則希圖設置一個緩衝國，以達到這兩個目的：(一)將舊日奧匈帝國的領土割去一部分，以削弱新的奧地利和新的匈牙利；(二)使意大利不能接近達爾馬西亞(Dalmatia)海岸，這一帶地方，就是英法引誘她參戰時訂立的秘密條款中，應允割讓給她的。

南斯拉夫這個名辭，在許多美國人聽來，也許會覺得祇是那模糊的巴爾幹之一部分，無關什麼重要的。其實南斯拉夫在歐洲方面，也是一個極重要而且強大的國家。論他的領土，則由匈牙利平原起，一直伸展到愛琴海的

附近；又由奧地利的門口起，伸展到亞得里亞海的瓶頸上。人口一千三百五十萬，所佔面積等於英格蘭全島。其人民大部分爲農民及山居民，文化落後而生活貧苦，然體格強壯，且善於作戰。

南斯拉夫內部的主要問題，該爲政治上的緊密團結，並出售其穀產；因爲她像羅馬尼亞一樣，也是以土地爲生活主要資源的。然而差不多自立國以來，即因爲內部的爭吵，而呈分裂的狀態。歐戰以後之主要的政治現象，當推塞爾維人及克羅特人之憤怒的口角。一九一九至二九年間，南斯拉夫曾經有過十年之久的議會政治，然而在這個時期內塞爾維人和克羅特人的關係，是絕對的失敗了，亞歷山大之所以必須實行獨裁，這是個基本的原因。

塞爾維人爲巴爾幹人種，集中於首都貝爾格拉(Belgrade)一帶；信仰希臘正教，而具有半土耳其的文化，和尚武的精神。至於克羅特人，則集中於查格來白(Zagreb)一帶，數百年來歷受維也納的統制，具有更多的歐洲文化與習俗，而信仰羅馬天主教。在歐戰期間，塞爾維人站在協約國方面作戰，而克羅特人則（違反自己的願望）爲同盟國作戰。克羅特族的人口，共計三百三十萬，約占全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北方的斯洛文人，亦和他們聯絡一氣。克羅特人使用拉丁字母，而塞爾維人則使用舊式的西里爾字母（Cyrillic Script——現在的俄文字母亦源出於此。）

歐戰告終之後，南斯拉夫得了一種美妙的民主主義的新憲法，世人希望其國內的不和睦的各部分，以後能夠愉快的共處下去；然而他們卻不能夠。由亞歷山大領導而站在統治地位的塞爾維人，他們有些策略是錯誤了。

例如查格來白爲該國的第二國都，而亞歷山大竟因深信克羅特人的執拗不馴，十年間不曾一履該城；這猶如英國的國王，絕不肯到蘇格蘭去一樣。因而克羅特人感到自身被當作次等國民看待，就益發不肯妥協。怒火終於爆發開來，造成了國會內的屠殺事件，以致克羅特人的領袖拉迪支（Radtich）也被殺死了。

爭吵的心理核心，也許是因爲塞爾維人，憎恨自身之不及查格來白人，因而就去懲罰查格來白。往日德國人及奧國人屢次侵略塞爾維亞；而他們是代表着歐洲的文明，以此塞爾維人下意識的厭惡「歐洲的」文明。至於克羅特人，雖爲斯拉夫種，而且講着斯拉夫的語言，然而已經澈底條頓化了。他們比塞爾維人富足，國內的工業多半握在他們手中。塞爾維人在歐戰時首當其衝，生命財產損失極巨，眼見目前的情形當然不免要發生嫉妬的心情了。

克羅特人稱呼塞爾維人爲「墨西哥人」，爲「土匪」，而塞爾維人則反稱克羅特人爲「懶惰的搗亂分子」。克羅特人說，與其受着貝爾格拉方面亞歷山大之獨裁的虐政，還不如處於往昔的君主政體之下。塞爾維人引用一句成語譏笑道：假如還有三個克羅特人未死，就會有四個克羅特的政黨。克羅特人對於其被刺的領袖拉迪支，追崇他爲殉道的先烈。而塞爾維人卻答覆道：克羅特人以種種手段謀獨立，已有一千年之久，但從未爲獨立而作戰。最後塞爾維人使用武力壓服了克羅特人。

雙方錯誤所造成的這種情形，是很可惜的。南斯拉夫所真正需要的，是四十年的長期和平；她需要時間以開發其礦產與農業，以及其他各種天然的富源。該國的架子已經建立起來了，但還需要將各部分裝修完好，我們試

以貝爾格拉爲例，那裏主要各街道上的店鋪，大多數還是經售着最原始的生活必需品，最簡單的工業製品，如扣針、鈕扣及棉布之類。貝爾格拉是一個具有自然美的城市，位於多瑙河及齊瓦（*Donau*）河的匯流之處，可是好像一個美麗的鄉下姑娘，乘着皇后的馬車，而身上卻穿着污穢的乞丐的衣服。

在亞歷山大逝世之後，世間多利亞人將發動革命，然而並未成爲事實。這是因爲那班主張分離的人，像塞爾維人所講的一樣，是些沒有流血或革命勇氣的軟弱者；他們沒有軍器；陸軍中的克羅特部隊，被有計劃的分遣在遼遠的邊境；兇悍的塞爾維警察，監視得很嚴厲；還有最重要的，是沒有得到意大利的援助。於是在爲亞歷山大服喪的期間，開始了政治上的休戰。可是這種休戰，並沒有持續多久。

六 巴爾幹何以不發生革命

時常有人疑問道：那些可憐的多瑙河流域與巴爾幹半島上的羣衆，何以不從他們的貧乏與污垢中跳起來，作一次徹底的社會革命呢？這一部分是由於在警力統治下的國度內，無產階級要實行反叛顯然很困難；而此外還有好幾種理由：

(一) 大多數巴爾幹人的基本熱情，是用在民族主義方面。他們的原始的和好動的精力，並不用在社會革命上，而是用在保全他們自己的政治上少數民族或國家上；他們的精力，皆從民族主義的汽筒裏面放散出去了。

(二) 多瑙河流域至少有五分之三爲農業區域，大多數農民雖然很窮，但自己皆有田地。產業勞動者，爲數是

很少的，中等階級之興起，爲期不過五十年，尙屬幼稚與虛弱；且在南斯拉夫與匈牙利等國，很少中等階級之可言。巴爾幹諸國社會組織之極度原始性，使革命的宣傳頗難進行。

(三) 社會民主主義，久已成爲一種相當大的勢力，牠已在這些國家中，產生了一種相當有力的父道主義。例如何匈牙利就有一種諺語，說國家照顧你從出生到十五歲，又從六十歲到死。人民既能得到政府的幫助，無論其方式多麼粗陋，叛變就不易發生了。

(四) 介紹共產主義到多瑙河流域的企圖，過去曾有兩次：一次出於匈牙利的培拉昆 (Bella Kun) 一次由於保加利亞的斯坦包利斯基 (Stamboliski)。自此而後，「白色恐怖」就發出了可怕的兇鋒。「白黨」爲要使他們的大批屠殺名正言順，於是繼續宣傳，說共產黨如何野蠻，並且潛勢力如何強大。「白黨」已經嘗過了血味，再多嘗一些當然毫不在乎。因此任何共產主義的萌芽，總被很毒辣的撲滅了。

(五) 爲了飢餓，長期磨難多瑙河流域人民的貧乏與災禍，所要產生的，恐怕不是叛亂，而是冷淡與消沈，甚至近於病理性質的癡瘡。民衆在飢餓的時候，不會立刻革命的，因爲飢餓使他們衰弱無力。

七 黑手與白手

彼得·齊夫可維支將軍 (General Peter Zirkovitch)，在一九〇三年間，爲禁衛軍中之青年少尉。按前會述及，該邦國王與白勒諾維支及其后德拉加，於一九〇三年爲其臣下所害，而彼等旋擁彼得·加拉喬治維支登

位。當時彼得少尉之特殊任務，爲衝破宮門；因此後來他的親近的友朋，皆稱他爲「開門彼得」。而他的真姓名，則至今仍爲彼得·齊夫可維支。

齊夫可維支爲鐵匠的兒子，在南斯拉夫軍界中，曾操了好多年的大權。他的官階，在一個長久的期間，雖然昇高得不多，然而因爲他是刺殺前王的遺臣，所以在幕後很占勢力。一九二一年，加拉喬治維支任命他爲宮廷警衛司令，統兵一萬八千餘人，以保衛首都貝爾格。此項軍隊，可視爲一種陸軍中的陸軍。以一個參加刺殺前一個國王的人，竟會被委任去保護另一個國王的安全，這種情形，真令人覺得有點奇異。一九二九年國王廢棄民主制度後，即任命齊夫可維支爲首相。這個差使，他一直擔任到一九三二年爲止，以後便做了軍政部長。

自一九〇三年弑君以後，當時參加政變的主要文武官員，就組成了一個秘密團體的核心。該團體稱「黑手」(Black Hand) 其正式名稱爲(Ujedinjenje ili Smrt)，義爲「不聯合即死團」。牠的愛國暗殺及恐怖主義之冒險行爲，產生了種種後果，其中之一卽爲世界大戰。因爲薩弱伏(Sarajewo)的刺客普林西勃，便是「黑手」所訓練出來的。今日薩弱伏地方，還矗立着一座紀念普林西勃的紀念碑；因爲他雖然間接犧牲了兩千萬人命，但卻是塞爾維亞的民族英雄啊。

齊夫可維支爲了種種政治上的原因，也是一個重要的黑手團團員。因爲「黑手」是提倡大塞爾維亞主義的；牠設法提高塞爾維亞人的本來已很熱烈的愛國心；他是擁護國王的軍人黨團。黑手團的組織，可算是真正秘密了；會員之間，彼此祇能知道號數，而且誰也不能斷定誰不是會員。該社領袖爲提米特里介維支上校。(Colonel

Drangutin Dimitrojevitch) 係一參謀本部軍官，爲人異常辣手與熱心。假如提米特里介維支沒有組織這個黑手團，則世界大戰之來臨，多半會取另一種姿態。

在大戰期中，黑手團分裂了。這是因爲一部分會員變成了共和黨；他們不信任年青的亞歷山大。然而齊夫可維支仍舊矢忠於亞歷山大，並且組織一個「白手團」，以爲對抗黑手團的運動。白手團的團員，皆是願意依附亞歷山大以創立功業的。

提米特里介維支與其他若干黑手團員，後來俱被反對派設計消滅了；在這計謀中，齊夫可維支是參加的一分子，或許亞歷山大也知情。在一九一七年，塞爾維亞好像要滅亡了，塞爾維人爲要獲得較好的條件，乃將與黑手團及薩弱伏的暗殺案有關的文件完全消毀。進而更想除掉提米特里介維支，（他是刺殺斐迪南的各種準備工作之直接見證人，）以滅其口。不久提米特里介維支及黨羽四人，被控有謀刺國王亞歷山大的陰謀，解至沙羅尼加受審。證據雖然不甚充分，但經過一翻聳人聽聞的審訊之後，這幾個「黑手」團員都被定了罪，提米特里介維支則被處了死刑。

這一來，就爲齊夫可維支廓清了園地，而「白手」對於「黑手」實行取而代之了。

他忘記了一切政治上的恐怖主義與陰謀事項，祇爲亞歷山大的權益效着勞。

亞歷山大遇刺以後，齊夫可維支的勢力顯然衰退了；及至一九三七年，他便脫離了政界，同時又領了養老金，退出了軍界。

八 克羅特人的救主

在反對派的領袖人物中，最值得提述的爲佛拉提米·馬介克（Vladimir Malchev）。他和羅馬尼亞的馬尼伍，是非常相似的。他爲理想主義者，性情剛直，信仰羅馬天主教，喜愛鄉民，人格高尚，絕對不貪污。他堅執的相信民衆具有善良的天性，主張正義應該施用在政治上，纔算合理。他的職業爲律師，他不像巴爾幹的多數政客一樣，以做官爲智識分子謀生的唯一途徑。像多數克羅特人一樣，他的標異立新的主義，是非常強烈的。

馬介克在克羅特和馬尼伍在外西瓦尼亞一樣，深受羣衆的景仰，就像對待救世主一般。他曾被誣控而下獄。他的最親密的朋友，多爲警探所暗殺；他的助手們遭受殘酷的毒刑，那是希特勒在德國登台以前，爲近代歐洲所僅見的。他確是一位救世主，但他很少握權的希望。他的地位非常不合邏輯，以致敗退了；他現在並不主張克羅特的完全分離，因爲完全分離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他既不想澈底解決，所以他的反對是永恆的，也是不會發生效果的。

九 外交問題

在下一次歐戰中，南斯拉夫將採取如何的地位，可說是極端重要的問題。她的陸軍之龐大，在歐洲列居第六位，計有常備軍一八七、〇〇〇人，另有受過訓練的後備兵一、二〇〇、〇〇〇人。其軍事顧問，皆是法國參謀

本部派來的；而武裝則由法國及捷克的軍火公司所供給，尤以比爾生（Billings）地方之斯可達廠出品爲最多。且其兵士之作戰能力，也非常強大。以一個對一個而言，南斯拉夫的陸軍，在歐洲也許可算是最厲害的。

南斯拉夫爲「小協約」中之第三個國家，她的主要敵人爲匈牙利及意大利。假如哈布斯堡皇室的奧都回到奧地利或匈牙利時，則南斯拉夫將首當其衝，以軍事行動，把他趕出去；因爲捷克即令也願這樣做去，但其北部深受德國及波蘭的壓迫，恐無這種餘力。至於南斯拉夫，則當此意大利有事於阿比西尼亞之時，她在中歐方面的行動是毫無牽掣的。意大利在商業方面，雖爲南斯拉夫之最大顧客，然而她仍舊不惜參加對意的經濟制裁；這就可以表明巴爾幹諸國，其重視國際間的積怨，竟甚於貿易上的出超。

在過去若干年間，意大利久懷侵略南斯拉夫的意向。墨索里尼所以貪望南斯拉夫的領土，實因他奪到達爾馬西亞以後，就可將亞德里亞海變成意大利的內湖。所以意國的負責人員，便鼓勵（甚或津貼）克羅特人，斯洛文人，及馬其頓人中間之不穩分子，使其反對貝爾格的政府。意大利過去既與奧地利及匈牙利締盟，更欲進一步與保加利亞聯盟，以造成包圍南斯拉夫的形勢。但近來意大利既以全力應付西班牙問題，於是放鬆了南斯拉夫。且意大利與法蘭西，因彼此同樣畏懼德意志，故互謀協作；這種情形，也足以消解意南兩國間之緊張。一九三五年三月間，意大利的新任駐南公使到任之初，即由本國政府方面帶來了修好的消息。（反觀一九二七年，南斯拉夫派駐羅馬的公使，在等了七個月之後，纔得音見墨索里尼。）同時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的邦交，也有了相當的改進；因爲馬其頓人的運動，爲南保兩國磨擦之主要源泉，而現在保加利亞的新政府，已認真着手抑制那種運動。

了。

南斯拉夫雖爲法蘭西的盟友，但也具有若干親德的情緒。其原因有五：（一）德國對於南斯拉夫的穀物（像對羅馬尼亞的一樣）可作最好的顧客。（二）在和平時期，優良的陸軍往往彼此互相敬重；齊夫可維支將軍，也非常敬崇德國的國防軍。（三）法國的貸款，向爲南斯拉夫之財政上的支柱，但近年有了收縮信用的傾向。（四）德國對奧之目的，足以剋制哈布斯堡皇室的復辟，而消解南斯拉夫的外來巨禍。（五）還有更重要的，是德國如併吞了奧地利，對於意大利爲一沈重的打擊。那時守住伯倫尼要隘上的，不復是微弱的奧地利兵，而將爲強大的德國國防軍；這樣一來，便可解決南斯拉夫之最緊急的軍事問題了。「和你敵人的敵人做朋友」，乃是巴爾幹政治上的主要原則。意、南雙方近來雖然大談親善，然而南斯拉夫之「永久」的仇敵，畢竟還是意大利啊。

德國人看清楚了這一點。於是熱烈的拉攏南斯拉夫。一九三四年初春，作者在貝爾格拉的臥車上，遇見德國外交部派來的一位親善使者，他並不否認他的職務，是來送錢給巴爾幹各國的德文報紙。戈林將軍會數度走訪南斯拉夫，並以一套小火車，致送幼王，作爲其誕辰的禮品，而取得了他的歡心。戈林——賈博斯——波蘭人合組的遊獵大會，有一次會請南斯拉夫首相斯都雅底諾維支博士（Dr. Stoyadinovich）去參加；但他因爲聽了法國顧問的勸告沒有應邀。

南斯拉夫今日的地位，好像是一個向來忠實於妻子的丈夫，（同時也是個強健的青年）他往日很快活的娶了一位美麗的法國女郎；現在他卻眼望着北方的那位肉體豐美的德國小姐，心裏在打算着，假如他的妻子在

國際戀愛方面，堅意要向那個污黑的肆無忌憚的意大利冒險家暗送秋波，則自己的離婚與再娶，是否算得一個好主意。不幸的是，你不能同時娶兩個女人。

第三十章 巴爾幹諸王

「每一個少數民族必須自成一國國家麼？」

——富耶克 (Jerome Frank)。

一 阿爾巴尼亞的曹格

阿爾巴尼亞爲歐洲最小的國家，統治牠的「次等」君主名叫曹格 (Zog)，現年四十二歲；他自一九二八年九月間起，就做着該國的國王。

他的名字的正寫應爲「Zogu」，Zog 乃是簡寫。在阿爾巴尼亞文字中（這種文字發源於伊利里文 Illyrian，頗複雜難解），「曹格」的意思爲飛鳥，所以世人常稱曹格爲「鳥」或「大鳥」。他是一個回教徒，出生於望族，他的父親爲上阿爾巴尼亞的強大的馬提族 (Mati) 之世襲酋長。他曾在君士坦丁堡求學，除了能講阿爾巴尼亞語之外，還會講土耳其語和不很完善的德語。曹格的故鄉偏僻而野蠻；那裏沒有正式的法律，祇有冤冤相報的血仇。你如果殺了一個人，他的親族便要殺死你；就這樣一代一代的報復下去。據說站在這種血仇的原則上而要謀害曹格的人，約有六百戶之多。

他的置身政界，好像是一種定命。他的叔父愛沙特將軍（Ersad Pascha）是爲亞爾巴尼亞求得獨立的一個。一九一二年，曹格在土耳其受完了教育，回到阿爾巴尼亞來，便參加巴爾幹戰役中之遊擊戰爭。當地人關於他的生平，有許多有趣的傳說：例如說他最初作事毫無經驗，連自己的鞋帶都扎不妥貼；一次有七匹馬向他的部隊方面跑來，完全被他殺掉了；他曾很勇敢的以強刀奪取了一區的指揮權；他曾領導着一隊人馬，突破了兩枝大軍的包圍，在黑山國各處逆擊等等。關於巴爾幹的王侯們，每多這一類的傳說，上面這些故事，說不定皆是真實的。

關於曹格還有一個故事，就是他和一位叫做若格娣娣（Miriana Zougidi）的女郎，發生了戀愛。但是女郎的父親不贊成他們的婚姻，於是曹格發誓將來必定變爲阿爾巴尼亞的國王，以表明他不是沒出息的人物。後來曹格鑒於若格娣娣的父親異常執拗，始終不肯應允，便派人實行搶婚。女父隨即追趕搶婚的人們，並親自戮斃了女兒，以免她落到曹格的手中。於是他將女兒的屍體送給曹格，作爲結婚的禮品。曹格遂發誓必報此仇，而且永不娶妻。後來他果然殺了女父和他的全家，並且始終沒有結婚。此外，他也居然做了國王。（可是這位國王終於在一九三八年四月間豪華地結了婚。——譯者。）

在歐戰初結束的一個時期中，阿爾巴尼亞政界的流血案件，簡直層出不窮。曹格的叔父愛沙特，在巴黎被同國人勞斯德米（Avani Roustemi）所刺殺；稍後勞斯德米在阿爾巴尼亞的首都地拉那（Tirana）又被他人所擊斃。曹格的姊丈崔那貝（Tzana Bey）在普拉格被一學生貝第（Alchades Bedi）所殺；而貝第則在法庭上被其同黨槍殺，因爲他們恐怕他據實供認出來。曹格本人亦曾兩次遭遇狙擊，但皆免於難。

要在阿爾巴尼亞作政治活動，其法祇有革命；曹格曾經製造了好幾次革命。一九二四年頃，他在當時的內閣中擔任內務部長；不久便有急進派的教士范諾里（Mon Signor Fan Noli），以暴動推翻了政府，並將開員驅逐出國。曹格逃到南斯拉夫的首都住了一年，便再發動革命；他趕走了范諾里，自己做阿爾巴尼亞的總統；這是一九二五年的事。三年之後，曹格憑藉意大利的幫助，更自立為國王。

曹格做了國王之後，經濟狀況是非常寬裕的。一九三四至三五年份，他的王室俸祿有如下表。

國王俸祿	三〇〇,〇〇〇金法郎
房租津貼	二〇,〇〇〇
太后俸祿	八八,〇〇〇
典禮大臣薪金	四,七五二
王室侍從薪金	一四,九〇〇
旅行費用	二,〇〇〇
辦公費用及雜用	二,五〇〇
監察院薪金	二二,二八二
旅行供應費	九,〇〇〇

合計為四六三、四三四金法郎，占全國總稅收的百分之二·六三。

上面這個俸祿表，祇能代表國王的總收入之一部分；因為他在國外的投資，每年尚可得到大量的息金。依據

阿爾巴尼亞之比較保守的報告，他個人的資本總額，約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金法郎，大部分皆存在法國及瑞士的銀行內。據傳國王所以能有這樣多的財產，大半是由於意大利的餽贈呢。

關於阿爾巴尼亞的情形，撮要講來，就是曹格最初算是南斯拉夫方面的人，後來卻出賣給意大利了。

因爲阿爾巴尼亞的領土，處在亞德里亞海之瓶頸地位，所以南斯拉夫及意大利兩國對她都很關心。當曹格逃至貝爾格拉避難的時候，南斯拉夫夫人由於不喜歡范諾里，便決定幫助他。曹格從南斯拉夫方面，不但得到了精神上及政治上的援助，且還有軍隊哩。南斯拉夫既使曹格回國執政，而立刻就眼見他將其國家送給意大利；這時貝爾格拉方面是如何憤慨，你大概可以想像得到吧。至於曹格亦有他的藉口，他說他需要金錢來建設他的國家，並鞏固自己的地位，而南斯拉夫並不能供給他錢。所以他就變爲意大利的傀儡了。

意大利人很敏捷地利用他們的機會。首先爲一連串的借款，以此意大利的公司「阿爾巴尼亞經濟開發會社」就對修路、築港、及舉辦其他各種公共事業，得到了獨占權。石油的讓子權也給了意大利；而意大利的軍官，又去改組阿爾巴尼亞的陸軍。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間，墨索里尼與曹格簽立第一次體拉那條約 (Tirana Treaty) 使阿爾巴尼亞實際上成了意大利的被保護國。一年之後，雙方鑒於南斯拉夫將探報復的行動，就又增強這種條約，成立了軍事同盟，以遏制該項陰謀。

意大利的貨幣送到阿爾巴尼亞去的，已滿千百萬里拉。實際上這一個小國，已經變成吸收意大利黃金之無底深淵了。當世界經濟恐慌襲擊着意大利的時候，牠對於阿爾巴尼亞之金融放蕩，其步調固然不能不放鬆一些，可

是就在一九三一年，意大利還應許在十年之內，每年以一千萬金法郎（約合四十萬金鎊）借與阿爾巴尼亞，並且免收利息，「以鞏固該國之財政地位，並促進其國民經濟之發展。」到了一九三四年，又有一筆新借款，一九三五年也有一筆。

可是阿爾巴尼亞境內之經濟開發，近年卻漸使意大利的企業組織感到失望了。那些意大利人已以中止投資相要挾。原來那位慣於賣弄風情的曹格又和南斯拉夫親善起來了。留在阿爾巴尼亞境內的意大利人，如醫生、士兵、工程師、印刷家，及道路修築師，都逐漸失掉了該國的好感。而曹格本人，且與他的意籍顧問發生爭執。同時另一方面，墨索里尼也把注意集中到更大的獵物——阿比西尼亞——身上去了。

以言目前的情形，阿爾巴尼亞和意大利的關係，可說是非常緊張的。意大利雖還繼續付款，但僅以足使阿爾巴尼亞就範為止，並不肯多付一文。完全不付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曹格便要撲到南斯拉夫的懷中去了。同時卻又不能沒收抵押品，強迫阿爾巴尼亞償還那些「貸款」，因為能夠實行這種沒收的唯一辦法，是出兵占領阿爾巴尼亞，而這種冒險行爲，或將引起對南斯拉夫之戰爭。加以意大利在該國的支配地位，是依附在曹格身上；曹格去了，意大利也就去了。所以意大利就是心裏厭恨曹格，卻不能不維持他的地位。

曹格雖然有反復無常的傾向，可是也不能算是完全可惡的人。假如他前此背叛了南斯拉夫，將來再背叛意大利，他也許會因此而遭遇不幸的結果；可是他的動機卻是好的，即和巴爾幹民族主義者的理想完全相合。他拿「以夷制夷」的方法去對付意大利與南斯拉夫，遂保全了他所關心的一件事——他的國家的獨立。他是一個

愛國志士，他是力謀阿爾巴尼亞之自由獨立的。據阿爾巴尼亞人講來，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乃是第一個阿爾巴尼亞人。他們並不因其國家弱小而不敢高談其民族主義。

二 保加利亞的鮑利斯

保加利亞的鮑利斯三世 (Boris III)，現年四十二歲，爲人溫文畏意，是一個多疑的人，算不得一位實行家。他喜歡思考，性格誠實，偏於理論而忽於實踐，他樂於信仰最優秀的人們。他的相貌很堂皇，待人也極懇摯。據首都蘇斐亞 (Sofia) 人士談述，有一天上午，他在御花園中用網捕捉蝴蝶，——原來當日他已約定了一位昆蟲學家來吃午飯。

他的王后爲意大利籍，即薩伏亞的喬娃娜公主 (Princess Geovanna of Savoy)，夫妻相處，生活頗爲恬靜。他們於一九三〇年十月間結婚，婚後之最初數年，他們不曾一同外出，因爲鮑利斯要他的新娘先熟習了保加利亞的生活，並學習一些保加利亞語言文字之後，纔在蘇斐亞的社交界露面。就是現在，他們也還很少請客或赴宴。這種情形，第一是因爲保加利亞之儉樸的性格，足以抑制這種應酬的虛文；第二是國王恐怕受了別人盛大的款待之後，沒有回敬的力量（雖然這似乎令人難以相信）。固然他不是一貧如洗，連幾十打的香檳酒都買不起，可是他以爲國家既然如此貧窮，凡是窮奢極侈的行爲，都是不應該的。

鮑利斯對於國內的臣民，能夠認清他們的面貌和姓名的，爲數很多；下至勃羅夫提夫 (Plovdiv) 附近生長

玫瑰花山谷中之鄉農，上至政府各部的官吏，當不下數千人。他很喜歡機械，他唯一的嗜好，便是開駛火車頭。有一次他曾跳下瓦爾那（Varna）附近的海中，去拯救一個落水的鄉民。他時常在他那簡樸的御花園中，親自推挽他的幼女坐着的小兒車。據傳他結婚之後，和王后一同在街上散步的時候，假如遇見了老朋友，他的介紹用語，祇是「會會我的女人吧。」

歐洲諸王的衣服，要算鮑利斯穿的最劣。他一定要穿蘇斐亞的土布；而蘇斐亞並不一定等於（Savile Row）。他平日不甚飲酒。他知道法文、德文、保加利亞文、意大利文及英文等五種歐洲語文，而每晨躺在牀上，要遍讀這五種文字的報紙。他的書齋裏掛滿了親屬的像片，如堂表兄弟、叔伯父、叔伯母、姨姑母，以及若干散處於歐洲各王室中的親戚。他在習慣上及思想上，可說是個留戀過去的人。

鮑利斯每年所得的俸給，約合一二、〇〇〇鎊（美金六萬元）。這個數目對於一位國王，當然不算很多；可是他有許多開銷，皆是由保加利亞政府支付的。他不像曹格那樣的貪財，也不像南斯拉夫前王亞歷山大那樣善於理財。王后喬娃娜在出嫁的時候，從她的父親意大利王那裏，得到奩資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里拉；她由這宗款項上所得的利息，大致也足以使她和鮑利斯等富了。此外她每年還可從保加利亞政府方面，得到津貼九五〇、〇〇〇里瓦，約合二、二〇〇英鎊。鮑利斯本人，在他的父親廢王斐迪南「老狐狸」逝世之後，是可以變成鉅富的。

一九三四年間，羅馬尼亞國王卡羅爾，與鮑利斯會於多瑙河上之勞斯巧克城（town of Rousschuk），卡羅

爾受到了平生最大的驚嚇。原來鮑利斯去迎接他，勸他下車來，和他手挽手的在大街上行走。像這樣在一個羅馬尼亞的城市中冒險步行，可說是卡羅爾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他最初因為不慣如此接近羣衆，覺得非常驚訝，後來看到羣衆很親熱的歡迎鮑利斯，又不免深受感動。南斯拉夫前王亞歷山大來訪晤保加利亞國王的時候，也發生了同樣的事。鮑利斯爲他駕車，駛到勃羅夫提夫去看玫瑰花；他們單獨前進，也不將來遊的消息通知該市市長。那裏人羣中夾着許多馬其頓人，亞歷山大不喜歡這種情形，可是鮑利斯堅意要他陪着在街上行走。亞歷山大因為有鮑利斯同行，所以沒有遇險。

* * * * *

保加利亞的一般鄉民，在出門遠行的時候，常把鞋子脫下來提在手中，以免把鞋子磨壞；因此世人知道保加利亞是個儉約的國家。該邦人口共計六百萬，而曾經離婚的人，總共不及六千人，以此世人知道保加利亞人在道德上是守舊的。保加利亞人雖則貧窮，但卻清白而且誠實，可說是巴爾幹半島上最良善的民族。

且來看一看保加利亞人的官俸罷。內閣中的大臣，每月薪金四十鎊（美金二百元），在全國要算極大的薪金了。蘇斐亞大學校長，每月拿到十七鎊，普通教授爲十六鎊。法官每月由六鎊至十鎊不等；將軍每月得十五鎊，警察二鎊十五仙令，大主教每月二十鎊，中學教師每月七鎊，火車司機每月三鎊。而且保加利亞境內，絕無賄賂之事發生。

在一九二九年以後世界經濟恐慌最嚴重的數年間，保加利亞得了一種不幸的聲名，就是牠具有着全歐最

悽慘的極端統計。例如一九三〇年保加利亞出口貨的重量，較上一年激增百分之八十，而其價值卻反減少了百分之三。一九三一年份，出口數量再增百分之四十，而價值又減少了百分之四。

這種不景氣加強了經濟上的不滿，遂致政治上的不安定趨於嚴重。鮑里斯固是一個可喜的人物，可是他的處境也危險起來了。他的優柔寡斷，使他陷於一種迷誤的狀態中；在一九三四年，他有一個很久的時期，不敢離開宮門一步。當時民衆也許還是喜歡他，可是陸軍中一部分有權力的軍官卻不然。保加利亞政界中的三個真正有力人物，爲柴可夫教授（Professor Tzankov）、喬治夫上校（Colonel Kimon Gheorgiev）及韋特齊夫上校（Colonel Damian Veltchev），他們皆是他的敵人。

柴可夫是一個反動分子，在一九二三年，他打倒了斯坦包利斯基（Stamboliski）的農民黨政府；接着便由自己擔任首相，到一九二六年爲止。他執政之初的一個時期，「白色恐怖」（對此他是應負一部分責任的）籠罩了保加利亞全土。柴可夫現已樹立了一種有力的法西斯運動，並積極企圖再掌政權。

喬治夫是個勇悍的獨隻眼的武人，現爲後備軍上校。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九日，他發動政變，強迫國王廢除議會政治，並應允建立一個獨裁的政府。可是喬治夫政府，使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的關係好轉起來；不能不算成就了一樁有用的任務。牠宣告馬其頓人運動的某一派爲非法，並將馬其頓人的領袖米哈洛夫驅出境外。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喬治夫被迫下臺，同情於王室的「軍人協會」中的軍官，攻擊他懷抱共和主義，並有圖使國王退位的陰謀。繼承喬治夫的政府，是所謂「國王的政府」，乃由國王指派的。這種情形，會使鮑里斯

這國人攻擊，說他在政界中具有偏見，所以是很危險的。

第三個重要人物，是一個顯明的共和黨員；這便是韋特齊夫上校。他是喬治夫的後臺，喬治夫的行爲皆受他的指使。他在蘇斐亞的士官學校中，曾經長期擔任校長，所以陸軍中的多數年青官佐，皆算是「他的」私人。他爲人幹練，肆無忌憚，熱中於國家主義，是個典型的巴爾幹冒險家。韋特齊夫之作亂的活動，歷史是很久遠的，他在一九二三年組織暴動團體，刺殺斯坦包里斯基，而使柴可夫登臺。

喬治夫與韋特齊夫兩人，皆於一九三五年冬季被捕；韋特齊夫當時被判死刑，但至一九三六年三月，經減爲無期徒刑。

* * * * *

保加利亞在歐戰中是個戰敗國，（不幸的小國在戰爭中常常走錯了路，）於是像匈牙利一樣，被和平條約無情地瓜分了。羅馬尼亞得了道白魯加（Dobruja），土耳其拿去塞雷斯（Thrace），希臘得到塞雷斯及馬其頓的各一部分，南斯拉夫則拿去馬其頓之其餘的部分。

保加利亞民性溫和，兼以國土狹小，處境偏遠，在國際政治上不足刺激世界之視聽；而且牠的要求恢復失地，也不像匈牙利人那般的怒吼與囂張。然而該國在名義上終主張是「修改條約」的列國之一，因而有與意、德、聯結的傾向。

一九三四年初，處在保加利亞周圍的諸國，決意要遏止牠的這種傾向，於是組成了「巴爾幹協約」簽約國。

家爲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希臘及土耳其四國；而外交家之負擔折衝責任最大者，則推當時的羅馬尼亞外長鐵杜來斯古。匈牙利被「小協約」所包圍，而保加利亞則受「巴爾幹協約」的包圍。

弱小而且清白的保加利亞，牠的運道是很不幸的。單獨與南斯拉夫修好，似乎是牠唯一的出路。

* * * * *

國王可以做一個獨裁者嗎？南斯拉夫的亞歷山大，是唯一嘗試這件事的人；請看他的結果罷。拿破利斯來講，我們如說王位與獨裁不易並行，也許是個較妥當的判斷。這是有種種理由的；因爲現在是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冒險者的時代，是希特勒及墨索里尼一類人物的時代；換言之，是有鐵腕的強者之時代。國王們皆沒有充分的受教育的自由，以便養成一個良好的獨裁者。他們習染了國際性，因而不能像畢蘇斯基或凱末爾那樣，具有深刻的排他的國民性。他們和普通人民，缺乏真正的接觸。而且現代科學，現代經濟，又衝擊着民衆的意識，使他們不復相信帝王乃是「天子」。

三 希臘與米他沙斯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希臘國王喬治，重行登了王位。他是一個可親的複雜的青年；一九二二年他承繼父親君士坦丁的王位，祇做了短期的君主，就被流放出來，而長期住在倫敦道佛街的白朝旅館中。過去二十年間的希臘政治，可說是一部保皇黨與共和黨的爭鬪史。該國共和黨之偉大領袖，向爲年老力衰的韋尼瑞洛斯 (Venizelos)；

一九三五年三月間，他的起義的最後努力失敗以後，便被迫逃往國外，旋即歿於巴黎。於是保皇派的康狄里斯將軍 (General Kondylis)，一位希臘政界中的長期搗亂家，就着手準備復辟的政變。(他不久也死了，所以國王喬治的第一任首相，爲查爾達里斯 (Charaldis)，喬治之能夠回國，很受查氏在經濟上的援助。)

喬治是個謹慎的人，他很記得他的家族之佔據王位，是怎樣的滄桑多變——例如他的父親曾兩次逃亡——所以並不十分急於回國。他和其前妻之兄卡羅爾 (喬治已與羅馬尼亞的伊麗沙白公主離婚) 完全不同，他是不愛重戴王冠的。理由很簡單，即他不願因此而被逐出。喬治曾經對他的依附者講過，除非有一種相當誠實的公民投票表決要他回去，他是不願回到希臘去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希臘在國王的同意之下，由米他沙斯將軍 (General Metaxas) 實行軍人獨裁了。米他沙斯爲一保皇黨將領，具有長期的搗亂歷史。原來一九三六年正月間，希臘依照國王的約言，實行全國改選，結果保皇黨與共和黨所得票數，實際上可算相等，而屬於共產集團的十五位議員，卻處在舉足重輕的地位。於是議會政治的進行，比尋常更其困難了。米他沙斯將軍藉口共產黨正在計劃總罷工，忽而宣布了戒嚴，就開始以命令來統治國家了。

米他沙斯在一八七一年，生於優仿西斯 (Uyfasos) 的故國綺色佳 (Thaco) 島上，所以他在各位獨裁者當中，年紀算是最老了。他曾肄業於柏林 (記住是柏林)，自一八九〇年以來，歷任陸軍官佐。在巴爾幹戰爭期間，他擔任參謀本部的作戰課長。就在這時前後，他的效忠於君士坦丁王朝，就開始顯露出來了；而自一九一七年起，他

更變成了韋尼瑞洛斯派之頑強的敵人。他曾一度被判死刑；而且數次遭受放逐，但他總是跑回來。人民遂稱他爲「小毛奇」(Little Moltke)。按毛奇爲德國屢屢屢起的名將。一九三四年他自己創立一個政黨，叫做法西斯君主黨，在競選時遭了慘敗。於是發生了一九三五年韋尼瑞洛斯派的暴動，由米他沙斯協助將牠平定了。

他並不諱言自己的目的。在一九三六年九月間，他說道：「希臘的議會民主政治，從此永遠取消了。」

他的統治的專制，似乎非常明顯；而國王喬治的行動，很像他的傀儡。

希臘雖然參加了「巴爾幹協約」，實際還是立於歐洲政治的大圈以外的。粗略的講起來，保皇黨傾向協約國方面，並贊成維持現狀；而韋尼瑞洛斯等共和黨，則主張修改現狀，而且親近意大利。例如韋尼瑞洛斯，會猛烈的反對「巴爾幹協約」。英國的外交部，鑒於喬治或者可認爲反對墨索里尼的分子，所以對於他的回國問題，所取的態度是：祇要進行得法，不至引起內戰，牠是非常贊成的。喬治爲瑪麗娜公主 (Princess Marina) 的堂兄弟，瑪麗娜則嫁於英國肯特公爵，以此喬治對於溫特莎王室亦有親戚關係。大英帝國如對意作戰時，是有利用希臘海軍根據地之可能性的。過去曾有一個時期，世人推測肯特公爵 (Duke of Kent) 或將代喬治而爲希臘國君。

喬治的復位，隣近的其他各國君主，皆很表示歡迎。帝王們總喜歡有更多的帝王，這真像我的朋友福度 (M. W. Fodor) 所說，世界上還有一「第四國際」哩。

第三十一章 土耳其的巨人

一 凱末爾的姓名

土耳其的白膚金髮藍眼的獨裁者，乃是一個愛國而且多感的人物；他曾七次改換他的名字。最初他那住在沙羅尼加 (Salonika) 的父母，爲他起的名字爲麥斯他發 (Mustafa)。進校讀書之後，校方給他的名號爲麥斯他發·凱末爾。「凱末爾」(Kemal) 在土耳其文中，意思爲「完美」；校方給他這樣的名稱，一則欲以別於其他叫做麥斯他發的兒童，二則由於一位教師讚賞他精於數學的原故。在達達尼爾海峽之戰以後，他變爲麥斯他發·凱末爾·巴沙；巴沙 (Pasha) 爲一種軍官頭銜，意思與將軍略等。一九二一年他擊敗希臘人之後，自稱爲賈西·麥斯他發·凱末爾·巴沙；賈西 (Ghazi) 的意思爲「消滅叛徒者」。在土耳其的歷史上，他自己實在是最大的叛徒，所以他用「賈西」這個名號，是有點古怪的。十年之後，他廢除了軍銜，遂簡稱爲賈西·麥斯他發·凱末爾。一九三四年，他命令每個土耳其人依照西洋人士的方式，沿用祖先的姓氏；同時自選「亞泰士克」爲姓氏，亞泰士克 (Ataturk) 的意思，爲「土耳其人之父」。於是即簡稱爲凱末爾·亞泰士克。

最後，他更將他這名字中的亞拉伯字母，依照土耳其文的形式而加以修正，由 (Kemal Atatürk) 改爲

(Karnal Atahunk)

不過他所更改的，不止是自己的名字。我離開君士坦丁堡數年之後，最近再到那裏去，感到非常驚奇，原來貼在街道上的若干名稱，皆已改形換相了。凱末爾之把土耳其字母「西洋化」，是做得很澈底的。目今土耳其的文字，是一種很嚴格的拼音語文。我所看到的許多強制修正的名稱，有一部分如下：

修正文體

原來文體

意義

Kahve

Coffee

咖啡

Tabldot

Table d' Hots

公司大菜

Amerikan Ekspres Ko, Inkr.

American Express Co. Inc.

美國捷運公司

. Jorj

George

喬治

Morris Sovaliye

Maurice Chevalier

美國電影明星西佛萊

La Jones

La. Jounesse

青年(店名)

Dizl Enjin

Diesel Engine

柴油引擎

Star Su Sop

Star Shoe Shop

明星鞋店

Yagoni-Kook

Wagon-Lit-Cook

臥車上的廚子

Enstitiu do Botó

Institute de Beauté

美容院

Or Duvr	Hors-d'oeuvres	贈品或附刊
Foks Film Korporasyon	Fox Film Corporation	福斯影片公司
aytanus	White House	白宮(店名)
Lozan Palas Oteli	Lausanne Palace Hotel	洛桑大旅社

二 倒戈將軍

凱末爾·亞泰土克像巨人般的睥睨着土耳其的全景——人家爲他塑一尊身穿短褂，褲管翻捲的銅像，面臨着黃金角(Golden Horn)。他所處的地位，好像是一個沒有更多的世界以供他征服的人。他的改革異常之徹底；至少在文化及社會方面，已沒有多少事可做了。他廢除了那紅氈帽，將回教廟堂改充穀倉，使文字拉丁化。他取消了一夫多妻制，制定新法典，並在蘇丹的故宮中試辦一個遊戲場(收入很不錯)。他強令伊斯坦堡(Istanbul)即君士坦丁堡的一切房屋消毒，採用陽曆及米達制，舉行土耳其歷史上之第一次戶口調查。他將政治上的紀念日減少爲三個，強迫行將結婚的人受體格檢查；並在安那托里亞(Anatolian)高原上建立新都安加拉(Angara)，以代替那宏壯的君士坦丁堡。他規定多種工商業，只有土耳其人民及土耳其公司可以經營，廢除巫術的書籍，給與每個土耳其人以新的姓氏。他(相當的)解放了婦女，取消僧侶們之固有地位，並編纂新的世界史綱，以證明土耳其爲一切文明之淵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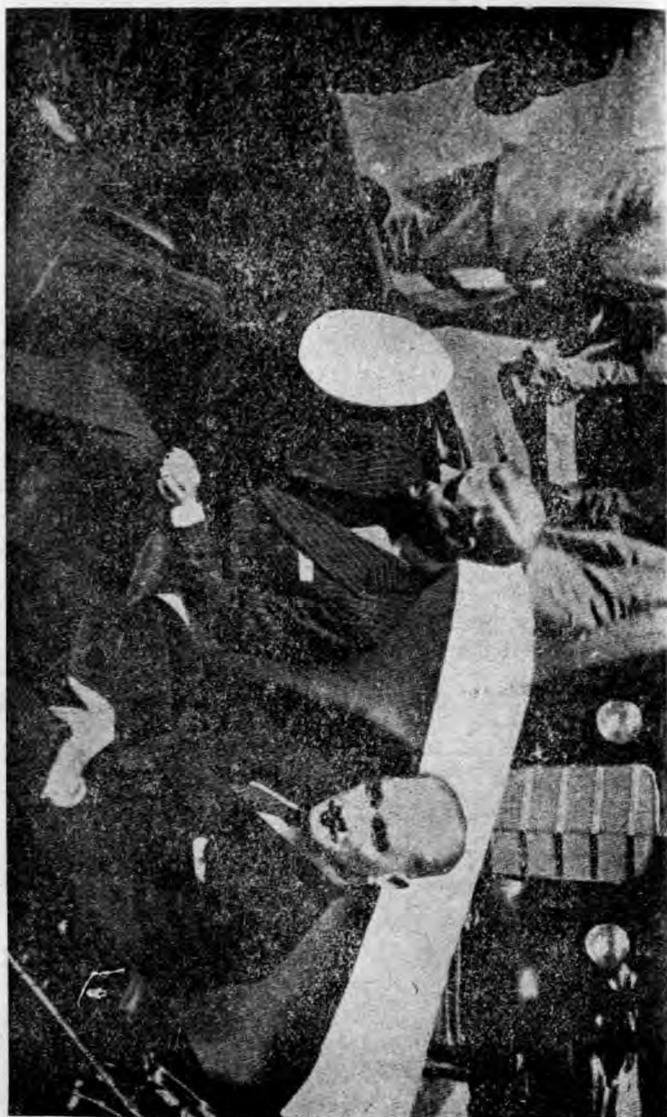
凱末爾多少有些喧嚷的性格，他個人的全部傳記，簡直足以使你眼花撩亂；他是走到極端的獨裁者之典型，是全體主義的人格統治之具體表現。他在人格和事業兩方面，都像俄國的彼得大帝（彼得也曾盡力將他的國家西洋化。）在一般獨裁者當中，凱末爾是個粗暴的人，希特勒比他柔弱，墨索里尼酷愛打扮，而賈博斯（Gom-bos）熟習禮節。凱末爾有一次招待賓客，心情不甚愉快，忽見埃及公使戴着那被禁的紅氈帽，便舉手當衆將那不幸的外交官打了一掌。

凱末爾倒戈主上的次數，比較任何人爲多；然他每次的倒戈，皆是以他自己的愛國觀爲動機的。一九一八年間，他以參謀本部的將校資格，被派隨同太子華都定（Valydu' d-Din）赴柏林，協助儲君與登保、魯登道夫及其他德國高級長官隨時商議。然而三年之後，他卻將華都定——時已變爲蘇丹謨默德六世（Sultan Mahmud VI）——逐出了土耳其。

歐戰休止之後，當局委派凱末爾爲東部諸省的總監督，去調查庫狄斯坦（Kurdistan）方面國民黨的叛亂。他原是奉命去考察並加以壓制的，但他考查的結果，認爲他們很對。於是他非但不去撲滅這種運動，反去主持該項叛亂了。不出兩年，他就使其上峯叫他去壓制的團體，在國內得到了普遍的勝利。

一九二六年間，他在遭人謀刺（是不很專門的）而脫險之後，便把反對派的全體領袖人物完全絞殺了。他准許判處死罪並經正法的人物中，有亞里夫上校（Colonel Arif），這是在希臘戰役中的同袍；還有土耳其之頭等財政家賈維德（David Bey），當時凱末爾爲着紀念這件「壯舉」，特在安加拉附近張加亞（Chankaya）

愛德華第八與凱末爾·亞泰士克



的冷靜的別墅中，設酒招待外國全體使領。他們於天明時回館，便看見市內廣場上掛着許多屍體。

（一九三〇年，凱末爾覺得自己這樣極端的實行全體主義的統治，未免有些乏味，便獨出心裁，着手創設一反對派，指定若干人物，作為這一派的領袖。他們畏畏縮縮的接受了這種指派。凱末爾意欲看看，西方的德謨克拉西方法，是否能夠活用；他要國會中有反對派的議席和他辯論。結果這種制度沒有發生什麼作用；因為，心裏還記着一九二六年慘案的土耳其人，好像不很能了解。……）

他的心理上的演變，是非常有趣的。支配着他的祕密的生活泉源的，凡有兩件事，這便是他的母親和他的疾病。他對於母親，懷着愛與恨所交織成的情緒。早年他時常要他的母親與他同居，卻又時常遺棄她。最後他將她帶到張加亞的別墅中，她便是死在那裏的。凱末爾生平不會背叛的婦女，祇有她一個人。在巴爾幹戰爭期間，他的母親在沙羅尼加的難民所中，慵慵了辛苦，這是使他印象很深的；日後他所以毫不容情的攻擊希臘人，也許由於這種下意識的作用。當時凱末爾抽暇渡過愛琴海（他原在北非的黎波里抵抗意大利人）去看他的母親，發現她被希臘人當做俘虜，受盡各種難以形容的磨難。

一九一七年，凱末爾離開戰線，到卡爾斯巴（Carlsbad）去治病。一位有名的維也納教授，楚克堪德爾博士（Dr. Zuckerkandl）將他的身體檢查一過之後，告訴他說他如果不能戒酒，將死於一年之內。疾病雖很使他痛苦，但他又到敘利亞的前線去服務了；（他原為在達達尼爾海峽擊退英軍之最重要的土耳其軍官，）同時還是任性飲酒。然而他的健康並未衰退，至今也還一樣。至於那位預言凱末爾將不久於人世的維也納老教授，卻在兩

年後病死了。

世間有許多人，以為凱末爾之改革的精力，所以特別豐富與強烈，乃是他的宿疾所使然。那種使他痛苦的病症一發，看罷！這位獨裁者就廢棄了土耳其原有的字母，或是下令組織十多個新的調查委員會。假如這是實情，則精神病學者之所謂「轉換」便得到了一個有趣的例證。凱末爾因為自身早年的罪惡，而去懲罰他人；他肅清一個國家，以代替肅清他自己的痛苦的血液。

三 家世與政績

凱末爾生於一八八一年，像希特勒一樣，為一下級稅吏之子。他的父親亞里·立沙 (Ali Riza)，祇不過是一位心地狹隘的小官僚；至於母親楚貝達 (Zubaida)，則像畢蘇斯基、墨索里尼、馬薩里克 (Masaryk) 諸人的母親一樣，是十分超越其同等地位的婦女所有之常態的。她要他的兒子去求學，並變為一個僧侶；——這很像史丹林的母親，她將那未來的全俄羅斯的獨裁者，送到底弗利斯的神學院去讀書。世界上大多數偉人，皆有出色的母親；而其兒子們的「愛迪勃斯錯綜」(Oedipus Complex) 之發展，在他們的性格與事業上極關重要，這已可不言而喻。還有一件重要的事體，就是凱末爾的母親，在第一個丈夫死去之後，又嫁了一個人；年青的麥斯他法對於這個侵入他的家庭中之繼父，是極端痛恨的。

凱末爾的生父亞里·立沙，顯然為亞爾巴尼亞人的後裔。母親楚貝達，為土耳其農民之女，但她的母親，則為

馬其頓人，因此凱末爾·亞泰士克，絕對算不上是純粹的土耳其人。而著名史學家湯祕 (Toynbee) 在其所著「當代偉人」(Great Contemporaries p. 291) 中且說他的家庭中也許有猶太人的血液。固然自從猶太人被逐出故土以後，沙羅尼加會為猶太族的堡壘，而且有許多叫做「道梅」(Domme) 的人，變成了回教信徒。可是凱末爾的無可否認的白膚金髮，和冷冷的藍眼，皆能證明他的祖先不是猶太人，也非土耳其人。

凱末爾之早年生活，可說是叛徒的，或竟是憎恨者的生活；他寫了許多革命的小冊和詩歌。他在君士坦丁堡曾被判處徒刑，但因他的治軍的才能過人，遂獲釋放。他雖然也是土耳其青年黨 (Young Turk) 中的一人，然而是在被壓迫的反對派地位；他厭恨青年黨中的三巨頭，即達拉特 (Talât)、昂維爾 (Enver) 和耶麥爾 (Djavid) 三人；而他們也很厭惡他。可是他從那些遼遠、危險而無望的前線回來以後，他的軍人名聲就傳遍全國，而其事業的前途，也就展開在他面前了。

他的功業在當代可說是無匹的。凱末爾發起了愛爾西倫 (Erzurum) 及西瓦斯 (Sivas) 兩次代表大會，組織國民黨的運動，並領導牠達到勝利。別人會創造了一些國家，可是凱末爾的任務比這更為困難。他拿着一個腐朽了幾世紀的國家，扶牠站起來，為牠揩清面孔，為牠換了衣服，改變牠的形狀，使牠能夠活動。一九一九年頃，土耳其的國勢，極端分崩離析，到了願意放棄主權，而變為英國的代管地的程度。可是到了一九二二年，牠已變為一個強盛的交戰國，能夠取得其所提出的議和條件了。

在那三年之中，凱末爾完成了七件大事：(一) 逐出蘇丹，(二) 廢除回教教主，(三) 抵抗並戰勝希臘人，趕他們

入海；(四)威脅英國人，使其止於加那克(Chanak)地方；(五)由伊斯美將軍(Ismet Pasha)出面，議定洛桑條約，取消了領事裁判權，並出乎土耳其大多數國民黨人的意外，劃定了極有利的新疆界；(六)制定共和國憲法，並在他那無法攻取的新都中設置一個議會；(七)變成土耳其之第一任而且唯一的總統。

不過我們可以說，這許多功業，並非凱末爾一個人完成的。例如西洋化的一般綱領，乃是土耳其青年黨所設計，他僅加以利用罷了。希臘人的敗北，乃由於聯軍的背信和他們自身的無能，不是凱末爾的陸軍所消滅的。蘇丹及回教教主，本已無法立足，他們的下臺，實也算不了凱末爾的勳勞。洛桑條約之得到勝利，乃因西方列強互相嫉忌與爭吵的結果，並非伊斯美將軍之力……

凱末爾近來住在張加亞的鄉間，完全像一個隱士。他那模範農場，便是他的副業；他依照馬爾摩拉海(Sea of Marmora)的形狀，設計了一個蓄水池，這真是「妄自尊大」了。一九二三年頃，他娶拉娣斐女士(Latifé Hanım)爲妻，但數年後即行離婚，現時他過着獨身生活。他在歐洲的政治家中，要算最難接近的了；就是英王喬治五世，也不會比他更難謁見。他和其他一般獨裁者不同，很不喜歡露面；土耳其的報紙，每月提到他的名字，至多不過五六次。他有一羣軍人部屬與密友，時常和他玩紙牌。他間或與外國使領賭博，而每賭多勝，但他一定要將贏得之款退還。現在他仍舊喜歡飲酒。

土耳其的獨裁者，和其他的多數獨裁者，還有一個很大的差異；就是他在青年時期，沒有做過社會主義者，而壯年之後，也沒有對於社會上經濟上的爭鬭表示絲毫關切。他的唯一的政策，是建立一個爲土耳其人謀幸福的

土耳其。他自然是個革命者，惟就經濟方面而言，他竟可做瑞士的總統哩。世間向有一種理論，以為一切國家主義的獨裁者，不是極端右傾，就是極端左傾；這種主張，碰到了往日的畢蘇斯基，和今日的凱末爾，便皆不攻自破了。

凱末爾所最關懷的兩個列強，（他所憎恨的大不列顛除外）是蘇聯和意大利。在世界經濟衰落的一九三二年，他從這兩個國家（牠們在好年頭都是不肯放款的）都借到了款項，這在他的事業上，真算是錦上添花了。凱末爾對於牠們，當然是採用以夷制夷的手段。意大利在地中海東部，需要土耳其的援助；而達達尼爾海峽為蘇聯通到暖海去的唯一出路，所以土耳其在蘇聯的外交政策上，常為一個重要的因素。凱末爾不滿意於阿比西尼亞的冒險，所以他的政策，便帶着很強的俄國色彩。過去若干年來，蘇聯與土耳其在日內瓦方面一直密切地攜着手；而土耳其外長亞拉斯博士（Dr. Tvedik Aras），——在多年前，他在沙羅尼加省，曾任凱末爾的私人醫師——常被人家看作帶着土耳其手套的李維諾夫助手。現在，凱末爾已開始在達達尼爾海峽設防了。一九三六年六月，歐洲列強在蒙德婁舉行會議，給了他一種他並不怎樣需要的東西——正式的允許。

第三十二章 畢蘇斯基逝世後的波蘭

一 波蘭的要人

世間有人以爲國家主義，是政治經濟勢力中之最強烈的；而牠在政治方面，又爲大人物的權力所最適宜的表現。波蘭的情形，很能代表這種理論。波蘭在今日的歐洲，像是一個不易判斷的謎；創建波蘭的兩種因素，便是國家主義與畢蘇斯基（Pilsudski）。獨裁者畢蘇斯基雖已於一九三五年逝世，然而今日波蘭政府的組織，還是以他那不死的精神與特性爲基礎的。

一九一四年八月六日，波蘭愛國者兼革命者約瑟夫·畢蘇斯基，領着僅有三百人的一枝軍隊，出發進攻俄；這便是那著名的「義勇團」（Katynia），由畢蘇斯基帶領着越過邊境，一直侵入帝俄之廣大領土。這三百個人逐漸擴充爲一旅，再由一旅變爲三旅。後來「義勇團」易名爲「波蘭民軍」（Polish Legion）實力有萬四千人；牠是一種革命軍，其目的在解放波蘭，使她脫離瓜分她的仇敵們的統治。可是在大戰初期，世界上大多數人（乃至於波蘭人）總以爲畢蘇斯基不過是一個吉訶德式的狂徒而已。

一九一六年德人佔領了華沙，表示願以「波蘭民軍」作爲附屬的軍隊，而准其繼續對俄作戰；但畢蘇斯基

則堅決主張波蘭之獨立，於是遂被德人囚禁於馬格得堡(Magdeburg)。唯他在入獄之前，已將其軍隊改爲一種祕密組織「波蘭軍團」(Polska organizacja Wojskowa)繼續進行其工作。一九一八年中歐列強戰敗，畢蘇斯基凱旋地回到華沙，做了波蘭政府的領袖；而「波蘭民軍」及「波蘭軍團」遂爲波蘭國最初的武裝軍隊。這些「民軍」是完全由畢蘇斯基一手創造的，而在十九年後的一九三七年，波蘭還是他這組織底工具。「民軍」中的人們，現在和以前一樣，仍然統治着波蘭。畢蘇斯基元帥部下的軍官結成一個集團，他們當他在世時在熱地皈依他，現在這「粗暴的老海象」雖然已死了，他們仍舊崇敬地追念着他，一邊包羅萬象地統治着波蘭國民生活的各方面。

這裏請把軍官團中的重要人物列舉於次；他們的名字都很難讀，可是每個人皆很重要呢。

加斯勃息基將軍(General Thaddeus Kasprzycki)現任軍政部長。他本來做的是什麼呢？畢蘇斯基最初三百人的前敵指揮。

松科斯基將軍(General Jan Sznkowiak)現爲陸軍中的一位師長，也許要變爲波蘭的下一屆總統。以前他在畢蘇斯基手下做什麼呢？「波蘭民軍」的參謀長。

李滋·斯密格立將軍(General Edward Rydz-Smigly)畢蘇斯基將軍死後，他立即繼任陸軍總監的要職。以前他在「波蘭民軍」中擔任第一旅旅長。

斯拉維克上校(Colonel Valerian Slavak)在畢蘇斯基逝世時，曾任內閣總理；而今日在波蘭國內，仍爲

三四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最初的三百人中，他任情報部軍官。

普里斯托上校 (Colonel Blazej Pystor)，曾經數度擔任內閣總理，為有名的「上校團」的小組織中的一員。以前在「波蘭民軍」中，為政治部的特務副官。

貝克上校 (Joseph Beck)，他好像將要永久擔任波蘭的外長。在「波蘭民軍」的後期及「波蘭軍團」中，他是畢蘇斯基的副官長。

辛德蘭·科夏爾可夫斯基少校 (Marjan Zydran-Kosciolkowski)，現為社會福利部部長。前為畢蘇斯基之副官，而在進攻維爾那 (Vilna) 時期，會擔任情報部部長。

此外如亞丹·考克上校 (Adam Koo)，係新興的波蘭政府黨「國家統一陣營」(Camp of National Unity) 的領袖，曾為幫助畢蘇斯基組織「波蘭軍團」的主要人物。梅清斯基 (Bozislav Miedzinski)，現為波蘭半官報「波蘭公報」(Gazeta Polska) 的主筆，以前曾任「波蘭民軍」及「波蘭軍團」情報部軍官。弗羅亞·拉其曼 (Henri Ployar-Rajchmann)，往昔亦為「波蘭民軍」情報部的工作人員，現任工商部長。高爾克將軍 (General Roman Gorecki)，現任波蘭國家銀行總裁，昔充「義勇團」的第二旅旅長。耶特雷基維克 (Wacław Jedrejewicz)，昔在「波蘭軍團」中，擔任駐立陶宛的情報機關主任，現任教育及宗教部長。最後，波蘭唯一重要的反對派領袖，為西柯爾斯基將軍 (General Sikorski) 曾於一九二六年抵抗畢蘇斯基的「暴動」，也出身於「波蘭民軍」。

貝克，莫錫基與賴伐爾



這些人便是今日波蘭統治者的中樞；而畢蘇斯基則爲他們的始末與一切。今日波蘭有勢力的官佐，皆是曾經參加最初三百人的義勇團，或是不久就參加進去的；他們皆曾受畢蘇斯基的親自訓練。這個奇異的教育機關，其地位很像英國的埃東（Eton）與牛津（Oxford）。畢蘇斯基的龐大權力即由此而來。他像一個父親，將波蘭養育成長，而由他的孩子們繼續管理着牠。

二 全國的祖父

不過在實際上，因爲畢蘇斯基的年齡太高了，所以人們並不稱他爲父親，而常稱他爲祖父（Dziadek）。他對於他的部屬，一律以「爾」「汝」稱呼；而他們並不用爾汝反稱他以表親切，而尊稱他爲「總司令」或「領袖」。這位年老的獨裁者，當初曾經做過變節者，是一個惡漢，一個喜歡使用下流語言的人，一個土匪，一個糊塗而怪癖的嚴厲軍官；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但另一方面，他的忠實，能夠使人敬愛，並且爲一個不妥協的愛國志士，也是不可否認的。

這位「祖父」的畢生功業，在當代要算是最爲奇特的了。在戰後革命的獨裁者當中，他很像生物學家之所謂「變種」（Sport）。例如他並不像墨索里尼、陶爾斐斯或是凱末爾那般，出生於平民家庭；而是出生於立陶宛的貴族家庭，他以一八六七年，誕生於維爾那附近的一個田莊上。然而爲着熱愛波蘭，他遂去作革命的活動。站在國家主義立場上而發生的厭恨帝俄情緒，主宰着他的一生。

他的母親，因為異常愛護波蘭而憎恨帝俄，所以讓他放棄了家族的傳統，而變為馬克斯主義者；原來當時唯一有效的革命組織，便是社會黨。他在醫科大學讀書的時候，使開始叛亂的活動了。（畢蘇斯基在卡科夫大學（University of Kharkov）的醫學院中，已達最高年級，但未得畢業）一八八七年，他因參加謀刺俄皇亞歷山大三世的計劃，被當局逮捕，判決流放於西伯利亞的鉛礦中；而列寧的長兄，則因該案而被絞殺。此外畢蘇斯基亦有兄弟一人，因推進革命事業，致受絞刑。

一八九三年他從西伯利亞回來，變為社會黨喉舌「勞工報」（Рабочник）的主筆，他的地點隨時遷移，警察無法破獲，所以主持該報共達七年之久。但至一九〇〇年終遭逮捕，再度入獄。他所住的爲華沙城中第十號監獄，是監禁重罪的政治犯的地牢。可是他佯裝瘋狂，被他逃走了。原來監獄的醫師受了騙，把他送到聖彼得堡的瘋人院中去。在那裏他得到一個波蘭醫生的縱容，遂得逃回波蘭。

他曾做了好幾年愛國土匪，一九〇八年間有一次，他擱劫郵政火車，搶去了兩百萬盧布。而在差不多相同的時間，另外一位社會主義的革命者約瑟夫·史丹林，在喬治亞省的底弗利斯，也做了一樁類似的劫掠。（幾年以後，波蘭與蘇聯的邦交好轉時，史丹林特將帝俄時代畢蘇斯基犯案的警務卷宗送給他，作爲他們曾是同志的紀念。）及至歐戰發生，畢蘇斯基覺得復與波蘭之最佳的途徑，莫如先與奧軍合作攻擊俄人，然後再以波蘭軍反擊奧國。因此放下了社會主義，而去組織「波蘭民軍。」奧國人沒有先見之明，竟准許他去組織了。幾年以後，畢蘇斯基對往日的一位同志說道：「朋友，你我一同乘上社會主義的火車；我到「波蘭獨立」一站就下車了。我希望你

能一路平安的駛到……烏托邦。」——見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的英國觀察報。

在歐戰行將爆發之際，畢蘇斯基簡直變成了一個勇猛的怪誕不經的人物了。他有一個爲許多人所相信的故事，說是他化裝爲一個俄國騎兵軍官，乘馬馳抵華沙的監獄，下令把波蘭籍的政治犯完全釋放出來，他藉口奉命要領他們到一所新監獄中去，於是這批人便重獲自由了。

他在一九一二年離棄了第一個夫人；他的第二個夫人，爲其社會主義的同志。當畢蘇斯基被德人囚禁之際，她便跑到華沙郊外，在格羅朝區域（Grochow）的工廠中作工。一九一八年他重回波蘭；他就任國家元首後之第一道命令，便是着人備好了總統的馬車，以白馬爲前驅，扈從成隊，到格羅朝去尋到了她，並陪她同回總統府。他和他共生兩女，一爲王達（Wanda），現十九歲，次爲耶德維加（Jadwiga），年十六歲。他生前是非常愛他們的。

波蘭從立陶宛奪得維爾那的事變，原是畢蘇斯基主動的。當協約國的公使們在華沙詢問他的時候，他矢口否認自己對於這件事負有責任。七天之後，（時在一九二〇年）他辭去了國家元首的職位。於是召集各公使於一堂，向他們說道：「各位先生，前天我欺騙了你們。當時我因爲是公務員，所以不能不說謊。現在我是一個私人，我可以把真相告訴你們。維爾那事變，確乎是我計劃的。各位先生，早安。」

他爲人魯莽粗暴，而愛好神祕。當他年高之後，面貌與尼采非常相像。有很多人說他的精神是不健全的，且謂當他裝作發瘋而逃出俄國人的手中的時候，所以能夠成功，並非完全靠着假裝。他時常講述使人誤入歧途的話，以致他的部屬無所適從。他命令貝克和普里斯托負責執行若干種政策，然而始終不向他們宣示關於這些政策

的意見，以致兩人愁悶得瀕於發瘋。

歐戰之後，這位年老的元帥退出了政治舞臺；一九二六年他再度登臺，以「恢復秩序」——一時在華沙的街道上，殺死了六百人；——此後即任軍政部長，處在政府的後臺地位。他很輕視國會中的議員；他對他們所發表的激烈語言，已爲舉世所知。畢蘇斯基的講演，在西洋報紙上，很少可以逐字刊印出來。他臨終的時候，想念着他的誕生地立陶宛，又低聲將遺言吩咐他的女兒們。他的最後的舉措是很特別的，他命令將他的腦子交給華沙大學去研究；心臟保存在維爾那的墓穴中，和他母親的屍灰放在一起；而屍體則送至第三個地方，即波蘭古代帝王的墓地克拉科（Cracow）。

三 上校團

上校團中的多數人物，其實並非上校。他們有的已超過上校階級而晉級爲將——例如軍政部長加斯勃息基將軍，他在成年之後，還在巴黎當過數學教員。或者是偶然變爲軍人的，他們從各種職業界出來，參加畢蘇斯基的「波蘭民軍」——這也可以拿加斯勃息基來爲例。

李滋·斯密格立將軍，最近新任爲「波蘭大元帥」，爲該國之當權人物，他本來非職業軍人，而爲一個民軍。然他在一九二一年波蘭人猛攻蘇聯之際，曾建攻克埃及夫的大功。李滋·斯密格立青年時期所習者爲肖像畫師。據稱波蘭陸軍很信仰他，因此畢蘇斯基有意使他變爲陸軍領袖，以便陸軍能始終效忠於政府。他生於一八八

六年，爲人文雅沈靜，是個學者式的軍官。一九三六年六月，他被正式推爲波蘭之「第一位公民。」他實際上已成爲波蘭的獨裁者；因爲是陸軍的首領，所以有決定一切的發言權。

在全體「民軍」之中，畢蘇斯基所最喜愛的，爲松科斯基將軍。他曾陪着畢蘇斯基同營馬格得堡的鐵窗風味。而十年之後，他又完成了一種極其「吉訶德式」的效忠波蘭的事蹟。即當他的舊時領袖畢蘇斯基進軍華沙之際，他爲駐在波斯南地方的師團司令官；他得訊之後，既不響應畢蘇斯基，同時也不加入政府的軍隊。

他怎樣做呢？——他舉槍自殺了。他以爲波蘭發生了內戰，難免分化陸軍，羞憤之餘，遂向胸部自開一槍，而實行自殺。——但經施用手術，並縫合他胸側的創口，竟得慶更生。畢蘇斯基鑒於他這種反對分化之激烈的表示，頗思有以酬報。於是暗示松科斯基應爲波蘭下屆總統。當內幕中的人物，知道畢蘇斯基將死之際，一種大大地擴張行政領袖權力的新憲法，在加緊工作之下，就提前完成了。

斯拉維克上校，昔日爲一社會主義的陰謀家；他在最早的革命時期，即爲畢蘇斯基的同伴。一九〇三年他爲畢蘇斯基製造炸彈，在一次炸藥爆發時失去了半只面孔。他的出身是很神祕的，據說除了畢蘇斯基以外，無人知道他生於何處，或真姓名爲何。或謂他本爲齊特維丁斯基伯爵（Count Czetywinski）爲一個最大的波蘭貴族的後裔；而當他三十五年前響應畢蘇斯基的時候，卻把這些關係隱瞞得一點痕跡。今日波蘭的貴族，如拉齊維爾（Radziwills）及波多克基（Potockis）等族，都把斯拉維克當作寵物，看做自己的人。而在波蘭復國的初期，斯拉維克則爲溝通畢蘇斯基與貴族間的橋梁。

貝克上校，他比較其他同儕，不甚使人愛好。惟在後一個時期中，很受畢蘇斯基的青睞，那個老人異常喜歡他。他爲人複雜難解，有些像法國泰狄那樣的紊亂，面貌秀麗，而帶些沈鬱。貝克出身於奧屬波蘭的下級貴族家庭，早年在維也納大學攻習經濟，嗣即棄學而參加民軍。歐戰以後，畢蘇斯基設立軍官學校於華沙，又使貝克就學，俾獲正規的軍官教育。他曾一度擔任波蘭駐法使館的武官，但一九二三年被法國一脚踢出。他之所以被逐，理由並未公布，大概因爲法國參謀本部覺得他濫用外交官的特權所致。法國外交部料不到他後來會成爲波蘭的外長。貝克任外長後的反法政策，可算是被法國驅逐的直接結果。波蘭與德國買賣風情，便是出於他的主持。

現任波蘭總統，爲伊格內西·莫錫基 (Ignacy Mościcki)，綽號爲「服從的伊格內西」。他是一個著名的電學家，在未入政界以前，任雷俄 (Lwow) 大學的教授，且爲華沙化學研究所所長。他在電氣物理及化學方面，有五百種左右的新發明，且握有五十三種專利權。他像前總統鋼琴家派特莫斯基 (Paderewski) 一樣；其有裨於波蘭的政治者，主因爲他的生活完全不像政客。

曾任內閣總理的科夏爾可夫斯基，雖然也是「民軍」之一，但因爲他有左派及自由主義者的聲名，所以斯拉維克、普里斯托、貝克等的集團，曾經對他表示不滿。他在野的時期很久，直至一九三四年內務部長派拉克基遇刺殞命時，始得重入政界。當時那些上校以繼任人選問題徵求畢蘇斯基的意見，年老的大元帥回答道：「何以每件事都要我來決定呢？你們青年人還不能治理這個國家麼？」

上校們退去之後，旋以候選人名單一張呈交畢蘇斯基。他瞥了一眼，便擲進廢紙簍中去；拾起電話聽筒，接通

了科夏爾可夫斯基，說一句「你是新任內務部長」，便把電話掛斷了。因為他也是個出生於立陶宛的波蘭人，所以得到畢蘇斯基的喜愛。科夏爾可夫斯基就任內務部長以後，企圖改善對於少數民族的待遇；年老的大元帥也贊成這件事，因為他知道自己逝世之後，政府的基礎，是有稍加推廣之必要的。（但在一九三七年間，報載波蘭各地皆有激烈的反猶太人運動。）

四 波蘭的復國

波蘭的國家主義，像匈牙利的一樣，也是熱烈而強韌的。這種情形，一部分自然由於該國會受無匹的可怕的瓜分痛苦。惟波蘭國在世界地圖上消滅之時，人口僅達八百萬，而當威爾遜把牠重新放上世界地圖時，其人口竟增加至兩千萬。足見該邦雖因土地遭受瓜分，感受極大的磨難，但依然生存着——而且滋長着。波蘭於復國以後，具有一種會上十字架的特殊心理；而這種心理，便是牠的若干困難之起因。牠由死裏回生，遂難免覺得自己的復蘇，乃是由於某種神異所使然；於是想完成一種超渡他人的功業。換言之，牠的苦惱，就在於具有一種謬見，認為自己不僅是個新興國家，而是一個大國。

有一篇象的故事，很可拿來說明波蘭的國家主義；據說這是波蘭人派特婁斯基以客觀的眼光寫成的。

五個國籍不同的人，每人要寫一本關於象的書籍。英國人便到印度去，實行一次狩獵，然後寫了一厚冊有插圖的旅行記：「我如何射殺我的第一隻象。」法國人隨便到動物園中去走走，迅速地寫成了一本黃面書：「象及

牠們的戀愛。」德國人開始埋頭研究，在幾年之後，才辛辛苦苦的寫成一部五大冊的巨著：「象之研究導言。」俄國人吃醉了麥酒，回到閣樓裏面去，寫了一篇虛浮的哲學小品：「象——牠存在嗎？」波蘭人卻坐到國立圖書館中，寫出了一本熱情的小冊子來：「象與波蘭問題。」

波蘭也許算不了一個大國，但牠的體積相當大，卻是不容忽視的。牠的人口現達三千二百萬，而增加率極高，每年約達五十萬。以言地面之廣，則除蘇聯外，佔歐洲之第五位。牠前此第一步的巨大工作，即爲團結德、奧所瓜分的各部分，使之成爲調和的有生機的一體。自是之後，內部兩個主要問題，第一爲解決少數民族問題；因爲以飢餓的波蘭人所取得的土地，較波蘭民族所住居的面積爲廣，在其三千二百萬人口中，有八百至一千萬並非波蘭人，而爲烏克蘭人，日爾曼人，白俄羅斯人，加里西人，魯西尼亞人，及立陶宛人。第二，爲祈求上帝，提高農產品的價格。波蘭每年的預算，有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皆用於軍備方面；這種情形，是和大多數中歐及巴爾幹國家一樣的。波蘭爲一工業資源不甚豐富的農業國，而其所負擔之軍事機構的龐大，則可列於全世界第一等中。查其常備軍爲三十五萬人，受過訓練的後備兵一百六十四萬五千人；而在緊急時期，可動員三百萬人之衆。據波蘭人講來，該國邊界既無天險可守，而又位於德、蘇兩大強國之間，所以這些都是必要的。

自歐戰以來，波蘭的外交政策即爲一個悶葫蘆。如吾人所知，其最初的方向，爲與法國及「小協約」聯盟。其後貝克更改之，惟與法國所締條約仍然有效。貝克鑒於德意志國勢之日強，且欲收回波蘭走廊，於是利用希特勒所提議，即與德人訂定爲期十年的和平條約；德人爲報答波蘭的友誼，一時遂不復再求收回「走廊」。德國與波

蘭的連合，隱然已成爲一反蘇聯的集團，然而貝克到柏林去，同樣也到莫斯科去，而波、蘇的不侵犯條約，也尙未生效。俄人欲得永久的和平，願將這種不侵犯條約轉變爲「東方洛加諾條約」，在現行的基礎上固定各國邊界，但波蘭則不肯應允。牠在騎牆——兩條腿伸在兩方面。

五 北方的小國

波蘭的北部，是四個波羅的海國家；牠們各有各的問題，但因地理環境的關係，遂能連成一氣。牠們以前爲帝俄的省分，現時則爲介於德國、波蘭及蘇聯間之緩衝國。這四國由北方迤邐南下，在過去若干年中，牠們的反俄親德的程度，也是依着這種順序而遞減的。芬蘭最恨俄國人，而列在最後的立陶宛，則最不惧俄國人。立陶宛畏懼德國與波蘭，牠的國策卽以此爲出發點。

芬蘭很像下章所要討論的各中立國；牠具有合理的社會理想，前進的民主主義制度，以及較高的生活程度，皆很像北歐諸邦。芬蘭是個堅強的國家，牠以木材爲生活資源，並從事償債，不會抵賴美國之戰債者，歐洲各國中祇有牠一國。牠自紀元後一一五四年直到拿破崙時代，向爲瑞典的一部分，其後爲俄國所攫去。牠和瑞典的聯絡雖很密切，但仍堅意維持着自己的語言與民族的風俗習慣。芬蘭人民不承認自己是「北歐人」，於是境內的「真正的」芬蘭人，和參有瑞典血液的芬蘭人，在政見上時常互相衝突。

芬蘭的新任總理加里俄 (Kyösti Kallio)，爲該國第一個出生於農家的總理，他是一個均田主義者；他的

執政係以社會民主黨爲支柱。他的前任總理爲年壽七十五歲的斯文胡夫得 (Pehr Evind Svinhufvud) 是個具有反動色彩的人。加里俄的政府，是非常民主化的，牠好像已經改換了芬蘭的仇視蘇聯態度。其外長豪斯提博士 (Dr. Rudolf Holsti) 曾有莫斯科之行，在那裏受到熱烈的歡迎；後來蘇聯且遣參謀總長雅哥洛夫大將 (Marshal Yegoroff) 赴芬報聘。

至於稍南的愛沙尼亞，則差不多顯然是個法西新國家，而且親德的色彩很濃。牠是一個共和國，面積約與美國的新海普夏及維爾蒙兩州 (New Hampshire and Vermont) 相等。牠在芬蘭海峽上，處於重要的軍事形勝之地；而其首都塔林 (Talin) 港，且可作優良的海軍根據地。愛沙尼亞現由代理總統兼內閣總理巴茲 (Konstantin Paas) 所統治，他實際上可說是個獨裁者。該國會經長期戒嚴，壓制一切政黨的活動。一九三六年公民投票的結果，雖然主張恢復議會制的政府，但一種職團主義的新憲法，卻正在制定中。

更南的一個國家爲拉的維亞，牠的居民要算歐洲一種最強悍的民族；現由一個公開的獨裁者統治着。一九三四年間，總理烏爾梅尼斯博士 (Dr. Kaaris Uimants) 解散議會，取消政黨，並改組內閣；稍後更由內閣總理而兼任總統。牠的憲法，像愛沙尼亞的一樣，也正在「修正」中。拉的維亞時常想做波羅的海諸國的領袖；牠的面積僅亞於芬蘭，而且是牠們中之最好戰的。德國（及國社黨）的勢力，在拉的維亞境內很強大，而蘇聯則頗遭白眼。

第四個國家爲立陶宛，牠的歷史在這幾國中要算最爲生動的了。就理想上說來，今日牠和波蘭還是處在交

戰狀態中；因為邊界自一九二〇年以來，一直封鎖着。前任內閣總理瓦爾特馬拉斯（Valdemaras）（凡是記得一九二五年左右國際情形的人，聽到他的名字，總會回憶到當年的往事的，）曾於一九三四年企圖政變，但未能成功。立陶宛畏懼德人，差不多和畏懼波蘭人一般厲害；一九三四年間，國社黨的煽動者有一二六人被捕，且受轟動一時的審判。立陶宛很坦白的求助於蘇聯；在一九三七年，希特勒的機關報「人民觀察報」（Volksische Beobachter），曾經很猛烈的攻擊該國，說牠是莫斯科的前哨。立陶宛的總統現為斯米托那（Antanas Smetona），其治國方式，至少可說是準民主主義的。他的夫人，在這小國的政界中，是個異常活動而且頗有權力的婦女。

六 兩個危險地點

歐洲北部之兩個特別危險地點，為但澤（Danzig）及默麥爾（Memel）。這兩處都是日爾曼人居多數的城市，而是凡爾賽條約使牠們脫離了德國的。兩者皆在國聯的監護之下發達起來，而今日德國人則想收回牠們。在理論上，但澤是個自由市；至於默麥爾則在立陶宛的境內。

「波蘭走廊」（Polish corridor）為一條狹長的土地，是為要給與波蘭人以通海的道路，而犧牲了德國，使東普魯士與德國其餘的部分分而為兩的。在不久以前，這個地方，曾為歐洲之最危險的領土爭點。波德協約之訂立，使這個問題暫告解決；並且但澤既為這個走廊的自然港口，所以牠的危險性也減去了許多。雖然，國社黨在但澤方面，今日依然是一個強大的潛在的禍源。波蘭人雖然深信國社黨假如欲藉暴動以收回但澤，未必即能成功，

惟爲安全之計，已費二千萬鎊巨款，在走廊內的革底尼亞（Gdynia）建立了一個與但澤競爭的新港。革底尼亞的這筆投資，其意義即爲勿論但澤如何，波蘭除非敗於戰事，是永不會放棄那「走廊」的了。

至於默麥爾之割離德國，其用意可謂在於給立陶宛一出海之路；正如但澤之於波蘭一樣。當協約國正在研討怎樣劃界之際，畢蘇斯基領導之下的波蘭，竟毫無理由的搶去了立陶宛的領土維爾那，於是立陶宛就轉過來攫取了默麥爾。德國的國社黨，發起很激烈的騷動，以使默麥爾歸還德國，而立陶宛人則壓制境內的日爾曼少數民族，以爲報復。同時，波蘭與立陶宛的關係，自攫奪維爾那以後即告破裂；在十五年以後，邊境猶未開放。立陶宛人本身原爲強悍的民族，更希望蘇聯在發生事變時能夠援助牠。不過在實際上，只要波蘭與德國的邦交尙未破裂，立陶宛是不至遭受侵襲的。因爲希特勒如果攻擊立陶宛，便要失掉波蘭的友誼。萬一德國與波蘭商妥，由雙方瓜分立陶宛，則煙火戲就要開幕了。這便是那種醜惡的國家主義的糾紛，要爲牠求得一個合理的領土問題之解決，怕是辦不到的。

第三十三章 卓越的中立國

一 斯堪迭納維亞諸國

談到瑞典，那裏有一件優美的光榮的事件；就是牠自從一八一四年以來，沒有發生過戰爭。這是一種獨特的記錄，爲全世界其他各國所無。同樣，瑞典又以沒有任何對外的同盟協約見稱於世；瑞典人孤獨的生活着，而且喜歡如此。可是他們的嚴守中立，及謀安適的自保政策，卻並沒有使他們與歐洲各國毫不往來。他們具有偉大的歷史，與健全的國家主義，實可視爲最優秀的歐洲民族。他們自始就提倡着國際聯盟與國際合作。

瑞典人沒有需其憂慮的殖民地，沒有需其支持的龐大陸軍，沒有需要調解的國際糾紛；一部分爲着這個原故（同時也是由於他們先天的堅強特性），他們遂能像丹麥一樣，使自己的國家和平而且繁榮。瑞典與丹麥，乃是歐洲今日兩個最健全的國家。我們從多愁多難的歐洲來到這一帶地方，去考察斯堪迭納維亞諸邦，看看那些恬靜的島嶼，合於理性的行爲，及廉潔的政府，是會覺得非常心曠神怡的。

瑞典和丹麥兩國，可算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國家父道主義（State paternalism）的形態。當一個瑞典人（或丹麥人）出生時，他立刻就變成了國家的財產。每個城市與鄉村，皆有一個兒童福利局。兒童之進校讀書及

日後之升入大學，費用概由國家供給。他們成年以後，無不參加一種組織極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及至暮年，則由在歐洲最進步的老年及殘廢保險機關，爲之照顧一切。瑞典人所乘的火車，是由國營的；所用的電話也是國營的；占着出口貨大宗的礦產，是由國家統制的；就連他們所飲的酒，也由一種優良的統制制度管理着。

瑞典還有許多合作社，很值得開一專章加以討論。誠如基爾芝 (Marquis Childs) 在「瑞典中庸之道」 (Sweden: The Midway Way) 一書中所說，「約有三分之一的零售交易，百分之十以上的批發交易及專供國內消費的生產事業，都是由不取利潤之合作社所經營的。」由於合作社之存在，遂使房價低廉，並能切實提高生活程度，（在瑞典或丹麥，既無年老的窮人，也沒有污穢的陋巷。）瑞典及丹麥，可說是全歐生活程度最高的國家。惟資本主義的重要特權，並未廢除。那裏的人民可以擁有私產，可以經商牟利，可以私營生產事業。基爾芝說來，瑞典是個資本主義受着統制，而個人仍有自由的國家。

二 瑞典挪威丹麥三國王

斯堪迭納維亞的三國，算是兄弟國；可是像普通兄弟間慣見的情形一樣，牠們的性格是各不相同的。丹麥爲羣島所構成的國家，時常颺着清新而急速的風，牠的境內已沒有一塊荒地了。牠的農場都很小，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爲自耕農所有。廣泛地說，丹麥人比較瑞典和挪威人，具有着較多的大陸性；他們更接近歐陸和德國的壓力。至於瑞典，則面積廣大得多（假如你把牠的領土以其南端爲支點旋一轉，則差不多可與非洲相銜接，）而開發的

程度還不很深；這裏可利用的水力極多，國民生活一部分依靠農業，同時也靠着礦產及工業品之輸出貿易。牠的北境廣漠而荒蕪，使人看了要聯想到俄國乃至亞洲的情形。瑞典的大多數人民，比較丹麥人更爲拘禮，同時也許更爲強壯；牠的首部較少國際性，但其美觀則並無遜色，而國家主義的色彩，也許稍爲濃厚些。至於挪威人民，仍舊廣泛地說，他們像丹麥人的地方，比較像瑞典人的地方要多些。他們的國家獨立尚不久，所以把國家主義看得很認真，有時且恐其隣國對此不十分認真；他們把首都的名稱，由克里斯蒂尼亞（Kristiania）改爲奧斯洛（Oslo）；並且使挪威的土語復活。（在過去若干世代中，所謂「丹麥挪威語」幾乎已通行各地。）我有一位斯堪迭納維亞的朋友說過：「挪威人像他們國內的山水一樣，是頗垂直的。」該國不及瑞典或丹麥之富庶，人口以業農者占泰半；主要的輸出品爲木材，紙及紙漿。

同時牠們又有很相似的地方。三國的王室，皆是互有親戚關係的，而今日的丹麥國王及挪威國王，且爲同胞兄弟。三國的內政，皆是循着大體上一樣的途徑，而且皆由社會民主黨執政。郵費的高低相等，通貨直到最近爲止，一向可以互換，而語言則更十分相像。牠們三國現爲友邦，互相密切合作；三位首相常作定期的會晤。牠們代表着相同的社會觀念——如兒童福利，社會改良，提高生活程度，削減資本主義的特權，教育及文化之發展，與夫循序的進步等等。斯堪迭納維亞半島上沒有文盲，其嬰兒死亡率，在全世界爲最低。牠們三國在國際方面，都沒有超出國界以外的野心；這裏沒有侵略的本能，沒有「爲國增光」的妄想。

說也有趣，牠們三國間之和平，比較也算是最近的發展。在十九世紀以前，丹麥與瑞典曾屢次爭戰；雙方皆對

挪威抱有野心。挪威脫離了丹麥，投到瑞典的懷抱中去；及至厭倦了瑞典，便自行建立一個王國，而以一位丹麥的王子爲君。近年來牠們的唯一國際爭議，卽爲一九三一年間，挪威忽向丹麥索取丹屬格林蘭島（Greenland）的東部海岸。但他們並未開戰，而是到海牙國際法庭去訴訟的。挪威失敗了，很像一個紳士，自後便不再提起這件事。牠們三國的王室，都是誠意而且成功的民主主義者。在過去兩三代中，他們都生長於民主主義的牢籠中，所以任何傾向專制主義的性質，都早已離開了他們的血液。他們是些愉快的人物，非常受人歡迎。而在政治方面，其費用也較一般總統爲廉。現今他們和他們的社會黨首相，都是能夠和諧地合作的。

這三個國王，可以形成一幅美麗悅目的寫照。他們都是消瘦而清瘦，身長各在六呎以上。丹麥國王克里西安（Christian），身長達六呎六吋，爲世界上最長的國王，並且據傳爲其全國最長的人。他們在位的時期都已很久，挪威的哈昆（Haakon），登極於一九〇五年，瑞典的古斯他夫（Gusta），登極於一九〇七年，丹麥的克里西安（爲哈昆的兄弟）登極於一九一二年。古斯他夫年已七十九歲，仍爲一個活潑的網球家，他嘗以G君的假名，去參加里維拉（Riviera）的網球錦標賽。三個人中之最能幹的，恐怕要算克里西安了。去年爲他的登極二十五週紀念，典禮極其隆重。他每晨七時，總是隻身騎馬經過哥本哈寧的街道，當他遇到交通信號燈而停止的時候，路人向他致敬，並不帶着矯飾的表情。他喜歡航行於丹麥諸島之間，路經任何村鎮，並不預先通告。就進去遊玩。他對於許多臣民，皆知道姓名，並能認清面貌。

他們三家很有規律的互通婚姻。丹麥王太子弗蘭特立克（丹麥王室不用克里西安而用弗蘭特立克（Frederik）

(Dagmar) 爲名號，已歷四百年之久，娶瑞典王太子之女英格麗德 (Ingrid) 爲妻。挪威王太子奧拉夫 (Olaf) 則與瑞典另一位公主結婚。他們於一九三六年慶得一子，——是一三七〇年以來，在挪威出生的第一位王子。三家之中，以丹麥王室之歷史爲最久。瑞典王朝，自拿破崙時代的培那多德大將 (Marshal Bernadotte) 肇始，而挪威王朝之歷史尤淺，始於一九〇五年。

這三個家族，除了做國王之外，都會在他方面著有名聲。例如丹麥王太子，爲一個優秀的音樂家及樂隊領班。國王的叔父華爾德馬親王 (Prince Waldemar) 有子四人，其中一個在法國客籍軍中任職，一營商業。瑞典國王的兄弟歐遜納親王 (Prince Eugène) 爲一著名的畫家；古斯他夫的次子威廉王子，是周遊各地的演說家及詩人；瑞典的王太子，則爲一考古學專家。

斯堪迭納維亞諸國外交上的主要問題，當推德國社黨的德國。幾年前我在丹麥及瑞典之際，曾在他們的外交部中徬徨了好幾天，竟找不到一個問題。如在今日，就很容易發現了。德國人心裏打算着斯堪迭納維亞，尤其是丹麥；這是具有種種顯明的緣故的。斯堪迭納維亞人，都是頭等的亞利安人；在交戰時期，丹麥可以作爲食品儲藏所，而瑞典則能供給貴重的軍需原料。至少，德國人希望能夠從他們北方的兄弟國方面，得到外交上的支持。瑞典早有親德的傳統，而丹麥也有若干顯要人物，如外長蒙斯博士等，似乎是有親德色彩的。

國社黨之對外宣傳，除了奧地利以外，向來最注重的地方便是斯堪迭納維亞。德國的密使佈滿了丹麥及瑞典各地；當地生長的日耳曼人，都經組成國社黨或準國社黨的團體；與國社黨極相近似的政黨侵入了瑞典，丹麥、

及挪威的政界中。在某一時期，國社黨支部在瑞典者有三個，在挪威有四個，在丹麥則有兩個。舉凡重要的斯堪迭納維亞城市，泰半皆設有德國的國社黨支部。

德人之侵入的企圖，因為狂熱過度，乃有欲速則不達的現象。我們很可以說：國社黨的煽動，祇能減少而不能增加那正常的親德情緒。德國在國際事件上，既變得更有力量，且更不安分，而丹麥及瑞典人，也便愈覺驚惶。英德海軍協定，好像以波羅的海的控制權給予了德國的海軍。試觀德國的軍艦，駛到挪威幾個無名的港灣時，（瑞典的礦產，是由這些地方運到德國港口去的，）常有「發動機損壞」的事發生。德國的領袖人物，近年巡遊斯堪迭納維亞海面的次數，比往常是加多了，他們時常在旅行季節以外去巡遊。而且德人在西爾特島（Sylt）近丹麥海岸）設防，已成了一種公開的祕密。

這樣所產生的結果有二：（一）為斯堪迭納維亞三國的社會黨及工黨所得選票都增加了；（二）為斯堪迭納維亞的重整軍備。這三國國家，多年來久處於大陸政治及軍備競爭的範圍之外，至此亦迫不得已，在免強與抱憾的心情中，去修正他們的軍事綱領。丹麥在沒有幾年之前，曾企圖完全廢除陸軍，而現已通過了一件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克羅納（Kroner）的國防法案。挪威的軍事預算，由九百萬左右，提高至一千三百萬美金以上；而瑞典的國防經費，亦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

三 瑞典首相韓森

瑞典首相潘·亞爾賓·韓森 (Per Albin Hansson) 一八八五年生於馬爾摩 (Malmö) 附近，他的父親爲一泥水匠，他幼時曾在鄉間一家商店內做當差。十二歲時，進一家雜貨舖作工，每星期工資僅四仙令（合美金一元），每日工作時間，由上午六時起，直至下午九時始止。他由一個合作機關，進而參加工會運動及工黨政治。至十九歲時，他爲一家社會黨報紙的主筆。他是一向喜歡新聞事業的；在他的第一屆內閣中，除他自己以外，還有五個新聞記者出身的閣員。

據傳韓森少時，爲圖逃避軍役，曾飲用大量的濃咖啡，抽了十二支雪茄，然後跑去受體格檢查。結果仍被錄取，而後來他在二聯隊之內，變成了最嚴厲的班長。他早就是一個禁酒主義者；並且引用亞里士多德的話來反對喝酒：「凡是醉酒而就寢的人，祇能生女。」

瑞典一般民衆，皆稱韓森爲潘·亞爾賓。該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向爲年高德劭的加爾馬·白拉亭 (Gjalmar Brauning)，白拉亭與國王古斯他夫，昔在厄勃沙拉 (Uppsala) 大學爲同班學友，且交誼頗厚，迨白拉亭逝世，韓森即繼承其職務。他於一九三二年初次組閣，而成爲瑞典歷史上之第一個勞工首相。當時的自由黨內閣，因受火柴大王克魯格 (Kroeger) 破產之影響，遂致失去國會的信任。一九三六年亞爾賓再度組閣，瑞典的農民黨議員，也是擁護他的。

農民黨之領袖人物，爲白郎斯桃勃的亞克遜·貝爾孫 (Axel Ponnson, Brannstorp)——瑞典人之姓貝爾孫者極多，故每以其村名加於其姓名之前以資區別。他是一個富農，生於斯加內 (Skåne) 的沃士區域，與韓森

的誕生地相近；現年五十五歲，爲人頗具威力，且懷有野心。他喜歡擔任任何的職業。據傳他有一個朋友，在翻閱了當地的報紙之後說道：「這裏有人招請產婆一名，貝爾孫竟尚未去應徵，真是怪事。」

四 丹麥首相斯陶寧

丹麥爲世界上歷史最久的王國；雖然以牛油、鹹肉與雞蛋，爲生活資料，但畢竟是個瘦長的小邦。牠的國土雖小，不及美國維爾蒙州的兩倍，但其蜿蜒的海岸線，則長度可與歐俄的海岸相埒。丹麥人的性情並不憂鬱，人口總數不過三、五五〇、〇〇〇名，但世界上出口的牛油有百分之三十，鹹肉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由他們供給的。他們所辦的合作社，比瑞典的還要進步些。丹麥的牛奶業有百分之九十，皆係合作社所經營；牠們每年出口的雞蛋都蓋有印章且標明生產的日期，單是運到英國去的，即達五六、〇〇〇、〇〇〇枚之譜。

現在最有勢力的丹麥人，爲首相斯陶寧（Thorvald Stauning），他同時也是當代歐洲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斯陶寧是一個現代的魏金海盜（Viking，按第八至十世紀劫掠歐洲西岸的海盜）——戴着工人帽子的魏金人。他身高六呎三吋，體重二五〇磅，他的鬚鬚濃而且紅，惟現已漸變灰白了。他的面貌像法國羅丹所雕刻的人物，聲調很像號角，他的樂天的能力過人一等，就在愛好生活的丹麥人中，也是很著名的。可是這位果敢的活潑的人物，現今雖然流露着勇猛精壯之氣，往日原爲一個虛弱而且貧困的兒童。他在幼年時代，便進一家煙廠去做工了；他的奮鬥史，是極悠久而艱苦的。

斯陶寧現年六十四歲，生於哥本哈琴，爲一車匠之子。他初作捲煙工人（和龔貝斯一樣），並領導其同業工會。繼至一家社會民主黨的報館中擔任記者，而在一九〇六年，被選爲國會議員。他的升騰是很快的，他早就顯露了成功的主要原因——即是勇敢活潑，再加上豐富的常識，與對其理想的切實信心。早在一九一六年，他即已入閣，而爲斯塔迭納維亞之第一個工人閣員。迨至一九二四年，復行躡居首相之位。一九二七年，他提議徵收資本稅，以作發展社會事業之用，因國會中未能通過而去職；一九二九年重掌政權，爲工黨聯合內閣之領袖，以迄於今。

一九三〇年間，他竟提議廢除丹麥的軍隊。這種明達的（就當時的環境而言）動人的議案，一時震動了全歐。斯陶寧說道：丹麥如果遭受一個大國的侵略，則一定不免戰敗，因此抵抗毫無意義，而丹麥所採的政策，應爲避免戰爭，不是準備戰爭。他提議將陸軍減少爲一三、〇〇〇人的警備隊，嚴格的限制海軍，並將國防預算，由每年五六、〇〇〇、〇〇〇克羅納，減爲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克羅納。惟此項議案，未經通過成立。不久國社黨就在德國登臺了，現在斯陶寧也許不會再提出那件議案了罷？

一九三四年間，他以爲上議院阻礙社會主義的改革，提議予以廢除。惟像大多數斯塔迭納維亞的社會黨員一樣，斯陶寧也是一個穩健派，對於社會進步，抱着實事求是的態度。

瑞典外交部長桑德勒（Dr. Sandler）博士，曾建議組織一斯塔迭納維亞防守同盟；斯陶寧卻激烈反對，他說：「丹麥不願做斯塔迭納維亞的警犬。」他很清楚，在三國之中，丹麥與德國最爲接近，遭受侵略的危險性亦最大；但他恐怕大家在一種共同的政策下聯結之後，則丹麥或將因瑞典或挪威而被牽入漩渦。

斯陶寧博學而有文才，曾著有劇本多種，其中「人生之謎」一劇，在哥本哈琴上演時得到了極好的成績。

五 挪威首相尼加得斯弗德

挪威的現在首相爲尼加得斯弗德 (John Nygaardstovd)。他是一個貧農之子，自十二歲起，即入一鋸木廠工作。他曾移居美國，在西部各鐵路，擔任築隄創土等工作，前後歷六年之久。復回挪威之後，在工會中得一職務，遂開始其政治生活。他自一九一五年起，歷任國會議員；而自一九三二年以來，更爲工黨領袖。他是一個非常澈底的社會主義者；他每遇困難便要說道：「這是因爲我不能閉口的原故。」

一九三五年間，尼加得斯弗德獲得了農民黨之助，遂變爲挪威之第一個工人首相。

六 齊蘭與比利時

比利時爲歐洲人口最稠密的國家；自一八三〇年脫離荷蘭，遂成爲一個獨立的王國。其領土位於法國及荷蘭之間，爲一大三角形；而國民的性質，則兼具兩隣邦的色彩。比利時爲一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其工廠之製品，運銷世界各地。內政方面的主要問題，（惟很難得達到尖銳化的階段）爲弗蘭明人 (Flemish) 聚居的各省，（那裏的人民使用弗蘭明語，而不用法語）爭求一種以語言爲單位的自治。比利時的憲法，規定該國爲「立憲及代議制的」君主國家；其中有一特殊的條文，即國王如無男性後嗣，可經議會之同意，而指定其繼承人。

比利時最著名的政治家自社會黨領袖樊迪文 (Emile Vandervelde) 消沈以來，當推保羅·齊蘭 (Paul Van zeland)。他在歐洲政治家的星座中，爲一輝煌的新星。齊蘭現年四十四歲，具有過人的才能。

他因爲與美國的普林斯頓 (Princeton) 大學具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很引起美國人士的注意。歐戰以後，他在普林斯頓從事大學畢業後的研究工作，而至一九三七年，復往該校領受名譽學位。最近他曾向紐約時報的貝卡爾君 (Beckhall) 表示：他常常把自己看做一個普林斯頓學生，他的弟弟曾隨他之後肄業於該校，他們姪兒現時正在那裏讀書，而他可以預定，他的兒子將來也要進普林斯頓大學的。

據時事雜誌載述，一九三四年某日，齊蘭於一銀行界會議中，與耶魯大學 (Yale) 畢業的友人某君同席，該友忽以一字條示彼，內稱耶魯足球隊適戰普林斯頓，結果爲七對零。齊蘭當即回覆一字條，內書：「比利時內閣中，普林斯頓二，耶魯零。」因爲在他的內閣中，有一瓦那夫子爵 (Viscount de Warinfae)，亦係普林斯頓出身。

齊蘭以一八九三年生於索格尼 (Soignies)，在同胞八人中行列第七。其家族昔爲荷蘭人（但堅信羅馬天主教），於數代以前，遷居於使用法語的比利時境內。齊蘭爲一嚴格的天主教徒；往昔曾在魯文 (Louvain) 大學就學；歐戰爆發後，變爲俘虜，處於德國俘虜營中，歷時數年。休戰之後，他曾隨同「比利時救濟委員會」所派的代表團，前往美國工作。

齊蘭爲一遊踪頗廣的遊歷家，亦爲熱心於智識的學子；他曾數度赴美，至蘇聯一次，至近東一次。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時所提出的畢業論文，是聯邦準備制度論；他寫了一本關於蘇俄的書；一九三三年間，他曾在美國 霍布金

(Johns Hopkins) 大學的佩治 (Walter Hines Page) 國際關係學院講學呢。

齊蘭爲最有價值的歐洲政治家之一，而他的加入政界，卻幾乎是違反本意的。一九二二至三五年間，他本來忙着另外兩件事業。其一爲比利時國家銀行，他於一九二六年任該行的副總裁，時年僅三十三歲。其二爲魯文大學，他自一九二八年起，擔任該校的經濟學教授。旋參加組閣，任無名的不管部閣員，以監察經濟事項。一九三五年齊蘭被任爲首相，其第一件重大工作，即爲貶低比國貨幣的價值。他自此即連任首相職務，僅於一九三六年中曾停歇一月。他所施行的一般政策，與美國羅斯福總統之「新政」頗有類似之處。（按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六日，社會黨溫和派前任外長斯巴克組閣，仍自兼外長。）

在過去一年中，足以在比利時的歷史上及齊蘭的生命史中劃一階段者，凡有兩件重要的事。其一爲法西斯黨的興起與沒落；該黨名爲「保王黨」(Rexists)，係由一年青的小型希特勒，戴格雷 (Leon Degrelle) 所領導。他的相貌很漂亮，既相信法西斯主義，同時具有優秀的性格。據傳他是藉「保王口號」而獲得選票的。此項運動，對於比利時的民主主義，一時已成爲嚴重的威脅。齊蘭從來不會爲着做官而參加競選，這時終於接受了戴格雷的挑戰，而作對抗的競選。結果齊蘭大獲全勝。

其二爲在國際上頗具重要性的事件；即比國王李奧波德三世 (King Leopold III) 於一九三六年十月間直接發表宣言，謂比利時行將放棄其對法聯盟，而恢復其戰前的中立狀態。此項宣言之發表，使法國及英國的政治家惶慮不安，達數月之久。比利時的這種舉動，原因是很簡單的，即比國人士不願捲入下次大戰的漩渦中，而

洛加諾條約及嗣後的英、法、比三國臨時協定，卻規定法國如遭德國攻擊，比利時應幫助法國防禦。迨至一九三七年四月間，英、法、比三國會聯名發表宣言，承認比利時可以不受洛加諾條約的拘束，同時再度聲明，英、法兩國，願確保比利時的獨立。

換言之，比利時對於其強大的朋友，已不復負有援助的義務，但其強大的朋友，則仍舊願意援助她。

七 荷蘭

荷蘭的近代政治家，最重要者當推郭里琴博士(Dr. Hendrikus Colijn)。他自一九二五年以來，即斷續的常任首相之職。郭里琴和他的友人齊蘭一樣，也是在歷任其他職業之後，才進政界服務的。他以一八六九年生於一信奉加爾文教義的家庭。其父母原意要他業農，然他卻願做軍人。他最初投入荷蘭陸軍，充一普通士卒，繼經調往荷屬東印度服務，居留該處幾達二十年之久。

他於一九〇九年重回荷蘭，並從事經商。他曾擔任荷蘭皇家煤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及其他煤油公司的董事有好幾年。同時他對政治發生了興趣，於是這位軍人行政官郭里琴上校，(他曾一度充任蘇門答臘的副總督)遂一變而為郭里琴博士，且為「反對革命」黨的黨魁。他自任一家報紙的主筆，竭力鼓吹加爾文教義。旋先後擔任陸相、財相及殖民地大臣等職，最後乃升為首相。

郭里琴的主要特性——關於他私人的瑣事，如每日吸二十五支雪茄等不計在內——厥為他的「中庸之

道」的精明。他是一個「非不合理」的頑強的荷蘭人。荷蘭的魁梧女王威海米那（Wilhelmina），素以精明見稱於世，連她也很欽佩郭里琴之超人的識力。郭里琴常係少數黨的領袖，而其能為各小黨的聯合組織的領袖，則多有賴於女王的贊助。他久處殖民地的經驗，使他對於政治能夠具有透視力及世界的眼光。

荷蘭的主要政治問題，無論對內對外，都是畏懼德國這件事。荷蘭有個喧鬧不休的國社黨，係由墨賽特（A. Mussert）所率領；惟在一九三七年的競選中，墨賽特已被郭里琴所壓倒。自從希特勒掌政以後，荷蘭的國防觀念，是不得不激劇改正了。其原因有二：（一）荷蘭傳統的防衛方法（開放水閘），在今日飛機時代已屬無用；（二）法國及比利時，皆已設有堅固的防線，而荷蘭則否，因此一朝戰事爆發，德國恐難免要借道不設防的荷蘭（或瑞士）而進攻。於是一九三七年分，荷蘭的國防預算，突然增加了七、二〇〇、〇〇〇鎊之巨。

郭里琴博士為「奧斯洛集團」（Oslo Group）發起人之一。該團中所包含的國家，除本章所述者以外，尚有芬蘭、盧森堡及冰島諸國。他們的公約中規定，簽字國非經彼此同意，不得擅自提高關稅。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荷蘭王位承嗣人朱麗娜公主（Princess Juliana of Orange-Nassau）與李普·比 斯德斐爾王室（Lippe-Biesterfeld）的青年王子貝因哈德（Barhard）舉行婚禮；當時國社黨曾以非常惡劣的態度與手段出而擾亂。因王子貝因哈德欲於成禮之際奏其原籍的歌曲，以代國社黨製成的德國新國歌（Horst Wessel Lied）。德人因此勃然大怒，竟沒收三位德籍公主的出國護照；她們三人都是新郎的親戚，被邀於行禮時充任女儀相的。

八 瑞士

瑞士爲世界上歷史最久的共和國；她有三種國語（德、法、意）爲不能侵犯的中立國，人民強韌，能維護其獨立。政府組織，爲一包羅七個委員的聯邦行政院。每年由七人中推派一人爲聯邦總統，而其餘六人，則等於內閣閣員。總統任滿之後，非間隔一期，不得連任。實際上總統一職，是由七個委員輪流擔任的。一九三七年的總統爲摩泰博士（Dr. Giuseppe Motta），他曾於一九一五、一九二〇、一九二七及一九三一年歷任總統之職。

摩泰博士虔信天主教，出生於瑞士、意大利人部分的鐵西諾（Ticino），爲一旅館主人之子。他曾在弗里堡（Fribourg）、莫尼哈、海德堡諸地研習法律，於青年時代即加入政界。他充任聯邦行政院委員，已有二十年之久。他有很多的子女；據傳他能背誦但丁的作品，他每年的薪金爲一、四〇〇鎊。他在私生活方面，未嘗沾染惡習；而在公開的政治上，則很有親近教皇（Pope）及親墨索里尼的傾向。

瑞士也感到了國社黨的威脅。當地的國社黨，號稱爲「灰衫團」（Grey Shirts），自一九三三年以降，聲勢即漸龐大。凡是處在德國四周的國家，皆有這種小型希特勒運動發生，是絕無例外的。瑞士近亦着手修改其國防計劃；該國專賴民團，已有六百五十年的歷史，而至一九三六年，則竟通過一種法案，進行設置職業的陸軍。去年國防經費，增至九八、五〇〇、〇〇〇法郎，約等於國家歲入的百分之二十。

第三十四章 半部國聯的動態

「那是一個有氣無力的人物，

他從來不會對自己說過：

這是我的，我自己的祖國。」

一 國聯小史

那個可憐的古老的國聯，是最容易受人譏諷的了。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偶而不很關心美洲的聯邦（即美國）反而去注意世界的聯邦，於是就協約國方面，組成了國際聯盟。誠如彭·海特（Dan Hecht）說，威爾遜好似一個處在妓院中的童貞女，很可憐憫地喊一杯檸檬水，他在凡爾賽的走廊中徘徊了許久，最後造了一個國聯，以作為美國的唯一戰利品。我們今日翻開國聯的盟約來，其第五條第三款仍在說道：「第一次全體大會，及第一次行政院會議，應由美國大總統召集之。」

世人攻擊國聯的批評，是很容易搜集起來的。例如說，大會開會的時候，登台演說的人層出不窮，而他們所講的，卻是世人早已知道的事。行政院會議中的一切議案，都是列強在會外預先而且祕密地決定的。國聯的一切行

動，泰半皆是出事後好久纔想謀補救之方，錯過了適當的時機。國聯除了產生無數虛弱的委員會以外，簡直毫無成績。國聯給與各少數民族以申冤訴苦的機會，因此少數民族之紛擾，就加倍的多了。國聯強迫登記各種條約，因此今日的條約，比已往更多秘密條款。國聯祇是凡爾賽列強的公會。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這一類的批評，有些是確實的。可是我們應該認清，這個日內瓦機關的缺陷，大半該由各個國家負責，而不能由國聯負責。因為國聯本身並無任何主權。牠無權強迫一個國家去依從牠的建議。國聯是各會員國的集團，但牠對於任何一國，皆無行政權。國聯並非一個太上國家，牠祇在各會員國湊巧同意的時候，做他們的代言人而已。國聯本身不能決定任何事件，負責者實為各個國家。

復次，國聯盟約起草時，原是假定美國能夠成爲一簽字國的。及至美國參議員勞奇(Lodge)及其率領的一羣固執的孤立主義者，拒絕批准凡爾賽條約以後，於是國聯盟約，已遭了無可救藥的損傷。美國如果成爲國聯的會員，則制裁之施行易於生效，易於申斥犯規的國家爲非法，並使之陷於孤立。美國不進國聯，遂使制裁成爲不可能。因爲美國堅持其與侵略國貿易的中立國權利，則國聯之任何封鎖，皆將變爲無效。封鎖所用的主要工具，自必爲英國的海軍，而英國海軍，當然不肯冒着與美國發生衝突的危險的。

我們要估計國聯的價值，應該先把他那些非政治上的活動，和那些有關於「國家主義政治」的活動分開來看。國聯在政治以外的領域中，曾堅毅地出過力，這是不可否認的。例如在合理的國際的基礎上去整理統計，對於衛生、農業、毒品貿易、運輸、救濟、編纂法典等項，逐漸形成一個全世界的中樞；都具有不可爭辯的價值，祇有頑固

的標奇立異者，纔會去否定牠。同時我們還不要忘記，國聯在財政及經濟方面的能幹工作，尤其是設法穩定戰後多瑙河流域的諸國，其成績也是值得稱道的。

至於在政治方面，則在各大國同意之際，國聯亦爲解決國際紛爭之可讚美的機構。如果因爲沒有行政的權威，便說牠不能阻止戰爭，乃是愚昧之見。牠在過去至少已經阻止了一個極有危險性的戰爭（如一九二五年保加利亞及希臘的衝突），而且今後英、法、蘇、意諸國，如果有意阻止戰爭而聯合一致，則牠還可阻止其他的戰事。每當艾登與法國外長意態親密，心心相印的時候，則日內瓦的機關，便發生敏捷而且良好的作用了。例如國聯於一九三四年間，緩和南斯拉夫與匈牙利間的衝突，使其不至發展爲戰爭，可說是避免了國際間之一大危機。可是列強一旦意見相左，則國聯就要停滯住了。

國聯之管理有疑問的領土，其成績也是無可非難的。在國聯特派專員愛爾蘭人李士特（Leslie）所管理之下的但澤，便是一個適當的例證。再如前此的薩爾，國聯會任命堅強豪俠的英人諾克斯（Geoffrey Knox）爲該區的總理，其「內閣」中包含法國人薩爾人，南斯拉夫人，及芬蘭人各一名。他們都是中立不倚的，沒有地域的成見，沒有政治的野心；而他們（及他們的前任）曾使薩爾在前後十五年間，獲得了相當高度的繁榮與和平。

假如立陶宛或奧地利一類國家，能夠國際化起來，由一個公正的沒有偏私的太上國家的內閣去管理，而其財政部長爲一個善於理財的瑞典人，交通部長爲一個精選出來的希臘或瑞士人；警察由印度人，意大利人，烏拉圭人所組成，或像薩爾「遠征軍」那樣的組成，而由丹麥人統率之。這該是如何明達而可令人滿意的事，不過

這種辦法，畢竟還是幻想。其所以不能實現，乃是因為牠悖乎國家主義，正刺着一個民族的最「貴重」的自傲之物。惟一反對牠的東西，乃是人類的政治的性質；這使國聯的進化遭遇痛心的困難。

據莫勒（E. Ansel Motier）所說，國聯是數千年來逐漸成長的倫理產物。牠縱然虛弱，但牠「在世界上代其發言的區域，比較其他任何人類組織所代表的範圍要廣大得多了。」牠乃是——我引用倫敦泰晤士報上最近投函欄內的話——「人類之摸索，已開始走近了國際間之適宜的途徑；而這種現象，乃是歐戰的精神上痛苦所孕育出來的。」並且牠的發生作用，至今還僅十有七年；在歷史的過程中，這實在是極短的一段時期。記得在克京城時，馬薩里克總統曾經向我說過：「自大戰以來，纔祇有十五年，這是極短的一瞬間。但願給我們時間——時間——」

國聯之短促的歷史，可以分爲三個時期。在一九二五年簽定洛加諾條約以前，牠大體上是戰勝國的工具，增強和平以抑制戰敗國的復興。由一九二五年至德國脫盟的一九三三年，牠很辛苦的爲着裁軍問題而奮鬥；但協約國不肯履行諾言而去實行裁軍，於是裁軍會議趨於崩潰。自一九三三年起，主要的問題是所謂「集體安全」。這便是企圖在相當平等的基礎上，使德國來參加安全制度。假如這件事失敗了，則國聯即將變爲恢復均勢政策與公開的軍事同盟的工具。

阿比西尼亞事件，給與這個運動以很大的障礙。一九三五年十月六日，在國聯歷史上算是最偉大的一天，當時援用了盟約第十六條，並着手制裁意大利。一個大國正式被判定爲違反盟約，這是第一遭。雖則有若干預言家，

絕沒有夢想到第十六條會置之實施；然而國聯行政院竟一致通過，宣布意大利爲違法的國家，認爲她的行爲，是向國聯全體會員國挑戰。看罷，威爾遜精神不死，國聯是誕生了！

可是後來悲痛的幻滅來了。在一九三六年七月間，墨索里尼不單是戰勝了阿比西尼亞，而且勝過了國聯中一切主張制裁的國家。不過一個人物或機關的聲威，總是時升時降的。國聯在阿比西尼亞陷落之後，算是處在退潮時期；可是這並非國聯本身的過失，乃是那些強大的會員國的過失。而且將來還可以有漲潮的時期的。

二 和平之宮

國聯的祕書廳中，包容男女職員六百三十七人，分隸四十四個國籍；其中且有若干古怪的人物。他們無不矢志於國聯，這個集團可說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近似的一種國際的公務員。

祕書長約瑟夫·愛文諾 (Joseph Avenol) 爲法蘭西人；兩個副祕書長，一爲西班牙人，一爲意大利人。總務祕書爲英國人，法律顧問爲烏拉圭人。至於各組組長，計有兩個英國人，兩個意大利人，法國、希臘、丹麥、瑞典、波蘭、荷蘭、南非及美國各一人；那個美國人，卽伶俐而和悅的斯維塞爾 (Arthur Sweetser)。他們形成了國聯的「內閣」。在各組之中，則蒐羅了更多的國籍不同的人員；例如情報組中，包含了十七國的男女。（卽荷蘭、美國、瑞士、法國、意大利、波蘭、南斯拉夫、比利時、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瑞典、西班牙、中國、匈牙利、印度及智利等。而且有些人，是具有複雜的國籍的。例如在祕書廳中很活躍的齊列克斯君 (M. Zilliacus)，父爲芬蘭人，母爲美國人，生於日本，就學於

瑞典、英國及美國，所娶夫人爲波蘭人；他自己已入了英國籍。他們雖然分子複雜，但並不失去和睦。已故的祕書長德魯蒙爵士（Sir Eric Drummond）曾對一個友人說道：職員中間或發生爭吵，常起於同一國籍人士之間。祕書廳中的職員，其國籍固屬各異，而各人的素養也不相同。其中有曾任軍人、教授、工程師、外交官、新聞記者、醫師、律師及經濟學者等等。他們都是熱心的理想主義者，個個盡忠於國聯。他們當中有一部分，是在青年時期即進國聯服務。（祕書廳中的職員，最初年齡在四十歲以上者僅有兩人。）他們剛離開了戰場，便決意到這裏來發表他們的幻滅與理想主義。還有一部分人，在當時已是根深蒂固的國際和平主義者；例如當了好多年情報組組長的（法人）彼得·高梅（Pierre Comert）曾在一德國大學中充任法文教師。

至於參加國聯組織的主要人物，皆爲列強所派的代表，例如捷克的貝奈斯博士及年青的艾登等是；而艾登在日內瓦好像一個明星，尤能引人注意。現任祕書廳廳長愛文諾，生於一八七九年，他雖是個法國人，而以具有標準的英國人觀念見稱於世。他爲人極羞澀，動作有點迂緩而帶韌性；他從來不曾發怒，愛好英國，並愛獵犬與園藝。愛文諾爲一理財專家，早年曾任法國財部顧問；歐戰期間，曾赴英國處理協約國間的財政問題。法國政府曾昇以法蘭西銀行總裁一職，他辭而不就，寧願居於日內瓦。我們從各方面觀察，他的成績要算是很不錯的。

三 條約該撕毀嗎？

凡爾賽條約，常被指爲我們的一切災禍的源泉，牠是一部宏大的文件；內容共有四百五十三頁，重量約近三

磅。你祇須花費二仙令六便士，便能在倫敦皇家文具店購得一冊以牠這樣的價格而論，實在是值得一讀的。

其中有若干條款，因為係於一九一九年在憤怒中所寫成，所以在今日看來，像是過火而不可辯護；如「絞死凱撒」及戰爭禍首諸節便是如此。還有一大部分，會使你看了有些驚異，原來都已老早過時了。今日要求修改條約的聲浪仍然很高，可是在實際上，這個條約早經剗削殆盡，祇剩下關於領土的條款了。諸如賠款，萊茵非武裝區，以及裁軍各項，今日早已成了廢紙；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各部，實際上亦等於烏有。

這種情形，適足使潛在的修正領土的要求，較前益為急切。協約國曾經懷着不愉快的情緒，對德國一再讓步，最初是關於財政的條款，其後為德國的重整軍備。至於領土，是不能這樣輕易放手的。因而將代管地（即德國戰前的屬地）歸還德國一事，成了問題的癥結。

可是事實俱在，照一般人觀察，條約中關於領土的條文，就連那處分多瑙河流域及巴爾幹區域的部分也在內，除了很少的例外，皆不是絕對不能辯護的。因為其解決的基礎為民族自決，而邊界之劃定，又皆特別顧慮到種族的問題。因為在歐戰以前，處於外國人統制下之人民，約達四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其中包含今日波蘭全部，捷克全部，波羅的海諸邦全部，及南斯拉夫之大部分），而在今日，則真正的少數民族，僅及一六、八〇〇、〇〇〇人。誠如安姆斯創（Hamilton Fish Armstrong）所言：「歐洲大陸的人民，生活於本國國民政府之統治下者，較前已有顯著的增加；」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所惜者即為協約國貪心太甚，攫奪了本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遂致造成了新的少數民族。不過我們還該指出，有一部分邊疆界線，如匈牙利與羅馬尼亞之間的界線，無論你

怎樣劃分，總不免要使若干不幸的人民，留在他國境內的。

我們試再想一想，假如德國當時戰勝了，恐怕凡爾賽條約的內容，比現在的還要不如吧。

四 戰爭抑和平

在一九三七年，西班牙內戰及隨之而來的恐慌，籠罩着整個歐洲；而無論那裏，具有破壞性的武力都受着鼓勵。這裏且丟開西班牙勿論，單從未來戰爭或和平的觀點，來把歐洲觀察一番。

促成戰爭的勢力，亦即一切不當及罪惡的源泉與體現，最要言之，有下列各種：

第一、爲互相敵對的國家主義。關於歐洲多數地方的互相殘殺的仇恨，我們已講得足夠了。「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避難所」而戰爭則爲愛國者的最後收容所。並且在今日的歐洲，還有許多人是利用愛國以謀漁利的。

第二、爲經濟的緊張。最近的一次戰爭，促成了最近的一次經濟恐慌；而最近的一次經濟恐慌，則將促成下一次的戰爭。資本主義的統一性與信心已經搖動了；國民的貧乏，正在解放出那些不可逆料的國際勢力來。

第三、爲德國及意大利等缺乏原料的國家之向外推進；這種推進，和他們政治上的修改現狀主義，及摧毀條約而向外擴張之國家主義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今日世界上有五個國家，佔有全世界重要物產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而德、意及日本三國，則不在其中。

第四、爲內部糾紛之不易局部化。歐洲各部因爲互相連鎖着，所以具有六百五十萬人口的奧地利如果發生

革命，也許會動員一萬萬的人民。邊界爲凡爾賽條約所增加了，歐洲「巴爾幹化」了，整個歐洲都陷入了不穩固的合縱連橫中。

第五、爲有一部分人民，不能依照民主主義的精神而發展。

第六、爲軍備的擴充。千百萬武装的人，是不能看着價值數十萬萬的槍砲軍火，而永遠彈指以消磨其無聊的時間的。

第七、爲美國之不是國聯的會員；美國如能參加，則國聯的效率當可增加十倍。

第八、爲法西主義之蔓延，及希特勒一類人物之爆炸力。

至於促進和平的力量，亦可臚列如下。

第一、戰爭須耗金錢，而今日大家都很貧困。除了已死者不算，誰也沒有償清上次的戰費。（不過另一方面，內部的貧困，每可引起一個國家去挑戰——例如意大利——一來可以掩飾國內的不滿，同時更「合理的」是在國外求得財富。並且我們還要知道，一個國家愈窮，則其在戰爭中的損失也愈少。）

第二、爲經濟恐慌之普遍化，已成了一種消毒劑。差不多一切國家，皆圖避免溺死於貧困的苦海中；這在某種程度上，是足以減少衝突之危險性的。（可是另一方面，例如像奧地利那樣，經濟的困難，卻有增加「內戰」之機會的傾向。）

第三、爲如前所述，戰後的和平條約，曾力求繪出一幅正確的以種族爲標準的歐洲地圖來，因而減少了許多

原有的革命及國際摩擦之根源。今日歐洲人民之急圖推翻現狀者，差不多已減少了三千萬人。

第四、歐洲在一九一四年，有十八個王國或帝國，其中有四個國家，是在專制的及近於專制的君主統治之下，而共和國則祇有兩個。至於今日，則只有十二個王國，而且皆不是專制的；而共和國則已增至十五個。可知像以前各世紀的專制君主的戰爭（其進行於各國的王室之間，差不多像他們的婚姻一樣）現在已成過去了。（不過另一方面，全體主義的法西斯獨裁者，也同樣可以任意把他們的國家投入戰爭之中，而不至遭受懲罰。）

第五、一場普遍的歐戰，難免到處（英國除外）引起革命及共產主義。大家因為知道新的世界大戰，多半會使蘇聯方面坐收其利，所以或許會起而防止戰爭。

第六、在一九三七年間，國聯在西班牙及阿比西尼亞方面之失敗，雖則令人冷齒，然而國際聯盟的體系，還未見得已完全無用。即在列國意見相左之際，國聯的機構也還可以作為情報及談判之有價值的中央交換所。普遍的和平主義輿論（尤其是在英國）已經紛紛起來支持國聯了。我們如果希望有一天國聯能夠強盛起來，有力去制止戰爭，也不一定算是癡人作夢。

五 其他的趨勢

我們在擁擠的西歐，已慢慢地巡遊了一週，現在是走到了終點。然則除了戰爭之外，還有些什麼明顯的傾向？在「戰爭抑和平」的主要八音以外，還有可以聽到些什麼音調？

一、爲列強之維持現狀的集團（其中都是因和約而獲利的國家）已經開始崩潰了。試看意大利毫無忌憚的去標新立異的冒險，波蘭對於法國及德國同時應酬，而南斯拉夫亦已開始動搖。條約國家所得之權力上優勢，適足以引起忌妬，歧異，及分離而已。新的陣線正形成中，這似乎是很明顯的。

二、建在貧乏、仇恨、及經濟的忌妬上之政治的國家主義，今日仍爲決定各國政策之主要力量。

三、凡是一國人民在政治上因爲柔弱或尚未成熟，而不能實行民主主義的地方，都由強有力的人物加以統治；如希特勒、戈林、墨索里尼、凱末爾、舒斯尼格、霍爾修、李滋·斯密格立、曹格王、米他沙斯等是。

四、那些民主主義的小國，處在一九三五年前後的惡劣環境中，仍能應付裕如，優然自得。如前所述，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瑞士及荷蘭各地，生活程度都較其隣邦爲高。這種情形，一部分是由於地理及歷史的關係，牠們得處於「歐洲瘋狂」的潮流之外；而且牠們也樂於如此。

五、世界經濟恐慌，已經好轉了不少。然而中歐及巴爾幹區域的農業國，仍然深蒙農產品暴跌的打擊；而那些工業國家，也依然感覺其市場的縮小。

六、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向爲私人資本主義的侍女；世界經濟恐慌，將私人資本主義打得頭暈目眩，立腳不住，而民主主義卻無辜受累。政黨制度，在大多數國家中皆已失去信用，而在一部分國度內，且爲全權的政府所代替。代替民主主義之全權政府，能夠行仁政麼？西歐方面對於這個問題，已齊聲予以否定的答覆了。

七、在意大利、德意志、奧地利、以及（潛伏地）在西班牙，皆有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南斯拉夫、匈牙利、保加利亞、

波蘭、亞爾巴尼亞、土耳其以及希臘，也皆是獨裁或半獨裁的國家。但就法西斯主義的意義為依照職團主義的原則去改組政治及經濟而言，則牠們皆算不得法西斯主義的。而且在某幾個國家內，法西斯及（或）反動的獨裁，已經與反抗「文明」聯合為一了。誠如莫勒所言：「天命的領袖，政治上的階級組織，以及建在恐怖手段上的大眾服從，便是牠們的特質。」

八、德奧至少已獲得了臨時的諒解。因此德國及意大利的法西斯兩獨裁之間，將來頗有連合之可能；所謂「羅馬柏林」軸心，已預示了一些輪廓。

九、現在很有力的法西斯主義，也許是資本主義制度之臨終的抽搐；倘使果然如此，則法西斯主義，將成了共產主義的前奏。

十、英國以領導對意制裁（由英國海軍，薛西爾爵士，及恐德心理等各種勢力所造成），已代替法國而為國聯之「盟主」。同時英國亦已着手整軍。

十一、居中的自由主義者及民主主義者，已經到處遭遇一種苦痛的壓迫，就是他們必須向右轉或向左轉；往昔那種良好的舒適的中間地位，如今已在逐漸消失了。

十二、左派的團體，雖在種種障礙之前，亦已設法連合；在薩爾，在奧地利（暗中），在西班牙及法國，皆已有一個「左派聯合陣線」組織起來，以對付反動派了。而且差不多在無論那一國，都有一種趨向「人民陣線」的觀念之運動在進行中。

第三十五章 史丹林

「做領袖的技術是很艱難的。你不能落在運動後面，因為落後了就將與大眾隔絕。但你也不能衝得太前，因為衝得太前了將與大眾失去聯絡。你要領導一種運動，必須在兩方面作戰——一面對付那些落後的人，一面對付那些衝得太前的人。」

「革命不是能戴着絲手套來造成的。」

——史丹林。

——史丹林。

一 世界偉人

史丹林大概是現在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唯一人物。即使辯證法唯物論，也得需要人來實現，史丹林便是一個明證。他跟旁的獨裁者不同，因為他不僅是一個無人與之抗衡的民族國家的領袖，而且又是一個普及於各國的運動——「共產國際」——的領袖。他還有一點跟希特勒或墨索里尼不同，就是他是一個第二代的獨裁者；其權威是從一位前任——列寧——那裏得來的。

他的職務並非由列寧所委任。實際上恰恰相反：列寧不願意史丹林做他的繼任者。關於這一點，列寧說得很明白：

「史丹林同志太粗魯了……我向同志們提議，設法解除他這個職位（黨的總祕書），而另行委任一個



史 丹 林

在各方面都比史丹林更好的人——更耐性，更忠，更謙虛，更能尊重同志們的意見，不要像他那樣反覆無常……」

這是一九二四年的話。而十一年以後，史丹林的屬員對他的頌揚，竟與對列寧的頌揚無異。蘇聯的報紙，常稱贊他的「偉大」、「受愛戴」、「勇敢」、「明智」、「激勵」、「天才」等等。有四個城市，史丹林格勒（Stalingrad）、史丹林巴特（Stalinabad）、斯丹林哥耳斯克（Stalinogorsk）、史丹林斯克（Salinsk），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在演說中，他常常被很冷靜的人稱為「我們最好的集體農工」、「我們最最優秀的突擊工人」、「我們的寶貝，我們的南針」。各種慶祝會閉幕時，常常喊着「我們親愛的領袖萬歲，我們熱愛的史丹林萬歲，我們的同志，我們的朋友萬歲！」

二 得權的由來

膽量、能耐、強健的體格——他雖有心臟擴張的毛病，但他的體力和忍耐力卻是很大的。他不是一個暴躁的神經病患者或夢遊病者，如希特勒那樣；他要發揮其體力時，也不像墨索里尼那樣，必須有情感相助。史丹林的情感幾與磐石相似。他如有神經的話，那只好比作岩石中的脈絡。

耐性、堅韌、專心——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杜蘭泰（Walter Duranty）說：他的忍耐能力是超人的。他是一個滯滯的砌磚匠，常常慢得使他的信徒們焦急起來，因為他們看不到他正在建築的工程的完好輪廓。他的路

線毫不動搖；他一直望着「遠處」。他專心一致的能力是極大的。

狡黠、伶俐、乖巧——他當然具有東方民族的特性；就是他自己也承認。當他接見第一個訪問者——一個日本新聞記者——時，他說道：「歡迎！我也是一個亞洲人呵。」

史丹林會竭力設法消滅那毀謗他的列寧遺言。他的力量似乎還不夠。但不久，蘇聯境內就佈滿着五十萬張史丹林與列寧合攝的照相；兩人同坐在一條長檯上，親切地交談着。

史丹林一邊要除去托洛斯基 (Trotsky)、齊諾維夫 (Zinoviev)、加米納夫 (Kamenev) 等左傾的反對派，一邊又要除去布哈林 (Bukharin)、李柯夫 (Rykov)、湯木斯基 (Tomsky) 等右傾的反對派；他這兩重的爭鬪所以能獲得勝利，不僅是由於他冷酷的忍耐工夫，而且也由於他富於想像力的詭譎和狡黠手段。（按：以上兩反對派除托洛斯基出亡外，餘均於一九三八年三月被鎗決。）

當爽直可以達到他的目的時，他能夠爽直得無以復加。他有自己認錯的勇氣，這是沒有幾個獨裁者敢做的事。在其論文「勝利後的昏眩」中，他十分坦白地承認，農民的集體化進行得太快了。他在列寧主義 (Leninism)一書中寫着：

「在這問題中，主要的事是要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錯誤，並有力量在最短期間改正錯誤。陶醉於最近的勝利而不敢承認自己的錯誤，不敢作自我批評，不肯毅然迅速改正自己的錯誤——這是主要的病根所在。」

列寧主義一書乃是古今最坦白的一部政治哲學論著——雖然或許太冗長了一點。在八百二十五頁中間，

你可以看到無數關於蘇聯的事情——好的、壞的、無關緊要的。史丹林自然強調着那些好的事情，但他也並不掩飾那些壞的事情。此書已在蘇聯境內銷售了二百餘萬部。（二十七卷的「列寧全集」自出版以來，已在蘇聯銷售了四百萬部。）

細心、縝密——這在史丹林是很特著的。他的謹慎的目光能洞燭國民生活中最細微的因素，他一般處事的縝密程度，決不是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所夢想得到的。例如希特勒對於贊揚自己的最有精采的函件，也不過目。史丹林卻一切都看，一直看到真理報（*Pravda*）按：此為共產黨機關報）的最後一節。他每天先閱讀各項地方報告，這些是從蘇聯各處的報告中細心地選擇出來的。新聞記者張伯林（*Chamberlin*）雖然常以非友善的態度批評史丹林，但在其所著俄國的鋼鐵時代（*Russia's Iron Age*）第一八七頁上也說到史丹林曾以私人的干涉，平反了許多與他正常職務毫無關係的冤抑。

在一九三三年夏天，史丹林要知道馬格尼托哥爾斯克（*Magnitogorsk*）的建設情形，這是按照「五年計劃」在西伯利亞創造的一個工業都市，報紙上曾為之大吹特吹。他記起了新聞報（*Izvestia*）按：此為政府機關報）的一個高明的特派訪員，名叫茹雷（*Gury*）的，就問到他的近況。他原來在一個集中營裏，史丹林就下令放他出來，派他去寫馬格尼托哥爾斯克的報告。

在一九三四年二月間的共產黨大會中，史丹林傾聽着他的第一個助手嘉加諾維支（*Kaganovich*）的演說。嘉氏正在講到某些不滿意的教科書。史丹林插嘴道，「不是這些教科書，而是那些活葉教本。」當一九三四年

十二月間，他的朋友基洛夫（Kirov）在列寧格勒被刺殺的時候，史丹林就到列寧格勒去，親自審問兇手。

知人善任——他是一個道地的政治策略家，一位出類拔萃的黨魁，及組織家。一九三五年夏天，朋友們在莫斯科告訴我，史丹林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他一走進房間，你就會感到他的電力。他對人和對政治的直覺，非常之大，他曾得罪過不少人，許多共產黨員會否認他對人具有任何情感，然而他的部下卻忠心地爲他工作，而他所選用的人也極得當。

希特勒能得同事的崇拜，墨索里尼能得同事的畏懼，史丹林能得同事的尊敬，這似乎是對他們三人扼要的定評。

缺乏演說天才——他不是演說家。他的演說很簡單，好像辦公事似的，而又極冗長。他的著作，當他推戴馬克思的辯證法，尤其是當他申述在意識形態上與反對派的異點時，是很費累的；他的文章好像是一個不大著名大學的學生所提出的哲學博士論文。當他不作哲學問題的探討時，例如最近對紅軍大學畢業生的演說，那就好多——直捷爽快，而富於意義。他常喜歡用問答式的說明法。他的演說辭就用這種體裁。至於他的作風，卻能力求與大眾接近。

他的理解力與其說是銳敏或聰明的，不如說是精細的、紆徐的、透澈的。然而看他與英儒韋爾斯的談話，他卻能應付那位口若懸河的健談家而綽有餘裕。再看他在一九二七年會見美國工人代表團時的情形吧。

這一次，他足足回答了四小時的問題，而且問題複雜，極難置答。他的談話完全是臨時應他，但答語卻極有系

統和組織，不是胸有成竹的人，就做不到。這篇口頭報告的全文，約有一萬一千八百（英文）字，是陳述蘇維埃政策的一種最透澈最明白的說明，像這樣一種傑構，不是有非常智力的人所能作的。

當代表團已精疲力竭，結束了問話時，史丹林就問他可否問幾個關於美國的問題——於是他又談了兩個鐘頭。他的問題是很深刻的，表示他極爲熟諳美國的情形；史丹林單獨一個人回答代表團的問題，比他們回答他的好得多。在這次談話的整整六小時中，電話鈴一次都沒有響，也不准一個書記插嘴——這又可以表明史丹林對於當前的事務專心一致的習慣。

熱忱——共產主義對於史丹林是一種力量；他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正如教皇對於耶穌基督一樣。

無情——他是鐵面無情的。這一點無庸諱言。赤化的恐怖，只是對一個階級的總討伐。蘇聯跟其他的獨裁政權不同之處，在其自始即認定有消滅階級的敵人的必要。史丹林在危急之際，不惜以飢饉這個武器來消滅反抗的農民。無論那一個政府，分析到最後，都是以武力來統治的。蘇聯直接使用着武力，但其社會目的不僅在爲一萬六千五百萬俄羅斯人謀幸福，而且也在爲全人類謀幸福。在蘇聯的人士看來，只要目的正當，那末無論什麼手段都可以用。對於這一點，史丹林並不諱言。英國保守黨女議員阿斯脫夫人（Lady Astor）曾問他道，「到什麼時候你們才不繼續殺人呢？」史丹林答道：「到不需要的時候纔止。」

有人問一位在國外的蘇聯聞人對史丹林有何意見。他答道，「我覺得此人太嗜殺一點。」——這實在是一句希有的不謹慎話！

早年的經歷——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失敗以後，只有史丹林一人有勇氣繼續在俄國境內幹革命工作。其他的革命家都逃亡於國外，在圖書館（例如列寧）或咖啡店中度日，直到一九一七年。史丹林始終留在國內。他幹着那些棘手的工作；他是「打雜者。」因此他得以認識了無數不露面的革命者，而在他需要的時候能把那秘密的組織改造爲他自己的黨部。

共產黨——共產黨現在不再像托洛斯基在位的時期那樣有原則上的紛爭了；現在已沒有什麼反對派；史丹林是獨一無二的黨魁，黨的首腦。黨內的紀律是非常嚴厲的，而統制紀律的則是史丹林。正如路易·費雪（Louis Fischer）說，黨與國家已合而爲一，而史丹林「統制着黨機關的每一個輪子和每一只螺釘。」

我們得注意：黨祕書這個職位的重要是由史丹林造成的，不是黨祕書造成了史丹林的重要。在史丹林以前，好幾個人做過黨祕書。一個是鮑格達諾夫（Bogdanov），現已成爲一個無足輕重的人；一個是克萊斯丁斯基（Krestinskiy），現在外交部任職。（按：已於一九三八年三月鎗決。）只有史丹林看到了這個職位的重要，知道藉此可以控制黨的機構，他在各機關裏都安插了他的部下——從前作祕密工作時代的友人——於是他的權力就大起來了。

自然，史丹林在黨內的偵探術是極高明的。據說有一個同志害着一種隱病，有一天史丹林問他道：「唔，你的××今天怎樣？」

我已經說過，他不是一個第一代的獨裁者，而是列寧的繼承者。他的策略一直是用列寧來做打擊反對者的

棍棒。在他跟托洛斯基的長期鬭爭中，史丹林始終裝做不是爲自己的緣故而把自己招出來，他不過是「列寧的工具」吧了；他堅決地以「偽列寧主義」斥責托洛斯基（這在蘇聯是最大的罪名），因而使托氏倍覺困惑。從引經據典所收得的效果，從來沒有一個人比史丹林引證列寧的遺言所收得的更大。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只能求助於他們自己；史丹林卻一直有列寧的偉大影子來做幌子。

從這一點就可引申到另外的一點。那就是說：蘇聯之所以要穩固其基礎，因爲其他各國都是牠的敵人。——所以爲自求生存，蘇聯非造成一個團結密切，自給自足的國家不可。牠有自己的完備的意識形態——馬克斯·列寧的教義——決不會誤入歧途的。操着此種教義的真正發言權的史丹林，不僅是俄國大衆的代言人，而是與其他各國對立着的俄國人的代言人。

最後，誠如杜蘭蒂(Durand)所說，史丹林是一位必不可少的人物。「這位領導已與他所領導的運動合而爲一了。」

三 他所充任的職務

史丹林並不掌管什麼官職，不過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以後，他也做了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個常務委員。常務委員共有三十七人，他們可算是蘇聯的「國會」的礎石。在理論上，內閣（人民委員會）是對這常務委員會負責的。但史丹林並不是一個閣員——人民委員。

他現在已不再是共產黨的「總秘書」了，而不過是五個在理論上彼此平等的黨「秘書」之一——其他的四個是嘉加諾維支、柴達諾夫 (Zhdanov)、葉左夫 (Yezhov) 和安德烈耶夫 (Andreyev)。他當然是黨的最高機關——「政治部」(Politburo)——的十委員之一。

黨秘書和「政治部」委員，都係由黨的「中委會」中推選出來，所以在原則上，「中委會」是可以罷免史丹林的。他在理論上須聽命於該會的多數人的決議。但在實際上，他決不會被罷免，因為他操縱着該會委員的選舉。

我已經說過，蘇聯的黨和國家已合而為一，但史丹林卻在理論上把黨的職務與政府的職務劃分得極清楚。列寧不僅做了黨的領袖，而且又做人民委員會的主席（等於內閣總理）。史丹林不贊成這樣的混合，他寧願留在後臺——做黨魁。

四 少年時代

史丹林的眞姓名是約瑟·維沙里奧諾維支·度加西維利 (Yosif [Josef] Vissarionovich Dzhugashvili)，一八七九年生於喬治亞 (Georgia) 底弗利斯 (Tiflis) 附近的哥拉 (Gora) 鎮上。相傳他的綽號史丹林——其俄文原義為「鋼鐵」——是列寧賦予他的，藉以表揚其鋼鐵似的能耐。實則這是一個不知名的同志。在一九一〇年或一九一一年提出來，作為他的「隱名」的，那時列寧還沒有跟他熟識。

史丹林的父親是一個農民出身的補鞋匠。家境貧苦，大概與墨索里尼的不相上下，但約瑟卻受到了教育。自十五歲至十九歲，前後四年，他肄業於底弗利斯的正教神學院，準備將來能做神甫。

他的父親與希特勒的一樣，想像力是很鈍的，所以要他學習自己的職業。但史丹林的母親——顯然與希特勒的母親一樣，是一個非凡的婦人——卻不願意他去做補鞋匠。她堅持要約瑟去求學。一般人都以為史丹林是因為作馬克斯主義的活動而被神學院斥退的。這或許不確。另有一說則稱是他的母親令他退學的，因為四年的困苦傷害了他的康健。

名記者克涅克布克 (H. R. Knickerbocker) 曾經去訪問過史丹林的這位喬治亞老母，她差不多一句俄國話也不能講。她說「索索」(So)。她這樣稱史丹林)是一個「很好的孩子」，她對於他的偉大的成功似乎莫明其妙。幾年前，史丹林會迎接她到莫斯科去。她在克里姆林宮中住了一個 month，據說很不快樂，對於她的兒子的顯貴感到很惶惑，因為她不能夠發見他究竟是一「做」些什麼事來謀生的。後來她就不高興地回到底弗利斯的山中去，滿足地住在那裏了。

喬治亞人並不是俄羅斯人。即在今日，史丹林說俄國話的時候，也還帶着一點喬治亞的口音。喬治亞文與俄文相差的程度，比英文與葡萄牙文相差更遠。就是牠們的字母也是不相似的。喬治亞人是一種複雜的高加索血統的南方民族；他們是山中的居民，具有邊疆人民的原始的自衛本能；他們的面貌上刻着堅韌和沉着氣質；他們與亞美尼亞人一樣，有其足以自傲的民族史；他們的頭髮是棕黑色的，他們的眼睛與午夜一樣烏黑。

史丹林革命的動機，第一得自貧困，第二得自他在神學院中的經驗。他痛恨那些狡猾的、武斷的教士們所申說的權威，這些教士在那鄙塞的正教教會的時代落伍之外，又加上了褻狹的專制。神學院的幾年，在史丹林一生的形成期中是極關重要的。他離開神學院後，遇見了許多信仰馬克斯主義的朋友——於是他那長期的革命事業就開始了。

自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七年，在這不能露面的十九年間，他始終為了一個目的——革命——而不斷地拼命工作着；他耐性地、堅忍地從事組織團體；他受着苦痛、虐待、迫害、逮捕、希特勒與墨索里尼都入過獄。但史丹林更是一個老囚犯。他曾五次為沙皇的警察所捕獲，五次被放逐，四次他都僥倖脫逃；第五次他被囚在北極圈附近，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時纔獲得解放。

史丹林會實際參加恐怖行動。因為黨需要金錢，就採用了「沒收」政策，去劫掠各銀行，這其實是不折不扣的搶劫行爲。在一九〇七年，當他任底弗利斯黨部的委員時，一場暴行殺死了二十個人；他的部下轟炸一船貨幣，搶得了一萬五千鎊。他對此應負一部分的責任。死傷的人數使史丹林的上級委員很不安，由於列寧的主張，他暫時被開除了黨籍。

在下獄判罪與放逐以外的時間，他又做了許多比較不激烈的活動。在裏海之濱的巴庫地方，他曾用喬治亞的文字編輯一種布爾雪維克報紙，名叫 Vremia。他曾到過瑞典 斯篤克霍姆 (Stockholm)，現在波蘭的克拉科 (Krakow)，和現在捷克 巴拉格 (Praque)，參加共產黨代表大會。早在一九一二年，他就在計劃寫一部書，名

叫社會主義與民族問題。這時他是俄國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布爾雪維克派的領袖，又是共黨喉舌真理報的一個編輯。於是在一九一三年，他又被捕，作最後一次的放逐。

這一切都是準備工作。真正的生活於一九一七年纔開始。革命在一夜之間使他的——以及其他成千成萬人的——職務由陰謀變成了組織，由叛亂變成了治理。當「政治部」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創立時，他就是其中的一個委員；其他的委員，除列寧外，就是托洛斯基、齊諾維夫、加米納夫、索柯爾尼柯夫（Sokolnikov）和布勃諾夫（Bubnov）。當政府成立的時候，他又兼任了兩個關員的職位：工農視察人民委員與民族人民委員。

在內戰期間，他並沒有托洛斯基那樣活躍，雖然他也是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一個委員，且曾在烏克蘭與彼得格勒參加過討伐俞特尼支（Yudenitch）之役。在一九二一年，列寧任命他為共產黨總秘書，當時並沒有夢想史丹林會利用這個職位來達到現在的地位。

史丹林的主要工作是在辦理民族問題。因為他不是一個俄羅斯人，所以對於這個工作特別適宜。蘇俄境內至少有一百個不同的民族，「民族人民委員會」的工作是要把牠們結合為一個鞏固的整體，同時給各民族一些自治的權利——至少在精神上。史丹林在列寧的指導之下，發明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主意——這是一個很方便的計劃，可以使那些「獨立的」、「自治的」共和國變成蘇維埃「聯邦」，將中央的權力交與莫斯科，而保留其地方行政上的特權。

史丹林自始就妬忌着托洛斯基，他們很早就發生了衝突。據杜蘭蒂所記述，有一次史丹林為要彌補前線上

的裂痕，以不得力爲名鎗斃了一班軍官；托洛斯基在當時是最高的軍事領袖，就來電抗議，史丹林在電報上批着「不必理會」幾個字，就讓牠在檔卷中去腐朽了。

在這個時期中，還有一件軼事，可以表明他的另一種心情。他正在彼得格勒附近閱軍。一個不高興的兵士不肯向他行敬禮。史丹林質問他，兵士就先指指自己的裹着浸透雪水和污泥的粗麻布的兩足，接着又指指史丹林的堅厚的皮靴。史丹林一句話也不說，就脫下他的靴子來，丟向那個兵士，而且堅持要用那個兵士又溼又臭的破布——以後一直包着破布，直到列寧看見了纔要他重穿靴子。

據杜蘭蒂說，列寧選史丹林爲其繼承者之一，因爲他知道這個喬治亞人能耐勞苦。當時有一句諺語：「列寧信任史丹林；史丹林不信任任何人。」據保羅·謝弗（Paul Scheffer）等權威作家說，列寧在逝世前四個月左右，已與史丹林決裂了，因爲他野心太大，以爲史丹林在當時已想密謀取而代之。列寧的確在遺囑中，對史丹林的某些性格表示不滿。他以爲史丹林的手段過於辛辣。

列寧一死，這個喬治亞人就開始動作了。他與齊諾維夫共昇列寧的靈柩。這是一九二四年的事。不出五年，史丹林就完成了他的組織，用殘忍的手段翦除異己。他攻擊他們違背神聖的「黨的路線」，而所謂黨的路線又只有他一人有資格加以闡明，因此他自已便成爲蘇聯無可爭議的獨裁者了。

五 與托洛斯基的鬪爭

托 洛 斯 基



史丹林否認他與托洛斯基的意見分歧是私人的事（參閱列寧主義第一卷第三七七頁）然而實際上卻有私人間的歧異存在着。這兩位領袖彼此互相厭惡。他們來自不同的世界，就是馬克斯也不能作為橋樑把他們聯絡起來。史丹林稱托洛斯基為貴族，戲子。除了在社會意義上以外，托洛斯基也確是一個貴族；他有思想，有勇氣，有風度。托洛斯基則稱史丹林為粗人，奸詐，野蠻，腐化。

因為二人的感情相水火，而致發生的仇隙，這稱布爾喬亞的「瑣屑」觀念，私人間竟然會在俄國革命史上成了一個重要的因素，說來誠然是件奇事。但事實上確乎如此——雖然這些私人的情感自然還有別的因素支撐着。托洛斯基由衷地痛恨史丹林，時常故意公然侮辱他；例如在委員會會議席上，每當史丹林演說時，他就故意拿起一張報紙來閱讀。

兩人性格的參商，自然是很深刻的。史丹林是一個熱情的政客，尤其是一個委員會中的人物；托洛斯基是一只孤獨的狼，是一個劇烈的個人主義者，二十年來他不願以飯依黨內的布爾雪維克派或孟雪維克派來束縛自己。史丹林耐性得好像一尊神像；托洛斯基活潑得有如一頭小鹿。史丹林性好靜，緘默而謹慎；托洛斯基則是一個活潑，坦白，娓娓不倦的健談家。史丹林好比一個擲炸彈者；托洛斯基則害怕猝發的暴行。史丹林是一個剛愎的，切實的暗中操縱者，並且善於猜忌；托洛斯基則愛抽象，衝動和虛榮。史丹林是一個無上的組織家；托洛斯基則是一個不高明的政客，不會妥協，很難與他共事。就以他們的笑法而論罷，史丹林笑時，好像一只剛吞下金絲雀的老虎；托洛斯基笑得很響亮自然，天真得像是一個小孩子。再看他們如何逃出西伯利亞；史丹林是一聲不響地，有計劃

地、從容不迫地逃走的，托洛斯基卻像一陣清風沒入太虛中那樣逃跑。

除了他們的私人間衝突以外，還有極關重要的政治意見上的不同。他們倆對於蘇聯的施政方針，抱着彼此截然相反的理论。托洛斯基的「左傾反對派」，起源於「不斷革命」的學說。他並不相信——史丹林是相信的——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中能夠成功。他相信，馬克斯主義的政權若要在俄國維持於不墮，就必須在國外進行不斷的、進取的革命。

托洛斯基派看到了列寧死後的情形，都很驚慌。他們以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化進行得太慢。他們恐怕列寧對於資本主義勢力所作的戰略上的暫時讓步——「新經濟政策」——將漫無止境地繼續下去；他們以為共產主義在俄國境內只有這麼貧乏的一點勝利品，如果沒有國外的無產階級革命相助，是要滅亡的。

史丹林抱着相反的意見。他彷彿說：「你們外邊的孩子們，暫且靜待二十年吧，等到那時我們會到你們那裏來了。」托洛斯基卻說：「馬上與你們的俄國同志聯合起來革命，以解除你們的桎梏。」史丹林說：「俄國先幹。等到我們的國家弄好時，纔輪到你們幹。」托洛斯基卻說：「無論你住在哪一個國裏，就在那裏先幹起來。」在史丹林的心目中，俄國正在逐漸安定下來，像落入婚後生活的平凡愛情中。但托洛斯基是一個無法矯正的浪漫派，他要度永久的蜜月——不斷的革命。

史丹林當然是不錯。「五年計劃」的極大成功已證明了這一點。現在大家都明白了。但在七年以前，當托洛斯基尚未被逐出俄國，「五年計劃」尚未開始進行的時候，卻沒有人能把結果看得這樣分明。這應歸功於史丹

林的先見之明，他的「遠見」。

史丹林用以打倒托洛斯基及托派的方法，與他後來用以打倒「右傾反對派」的相同（右傾的反對派以爲俄國的社會主義化進行得太急速了。）第一，他控制着黨部；第二，他根據「列寧主義」把他的反對者解釋成爲異端，因而應受懲罰。

史丹林因爲痛恨托洛斯基，以致採取了不很高尙的報復手段。但是他並沒有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在正式記錄與學校教本上刪去托洛斯基的名字，使後代人完全忘記他。史丹林在其所著的十月革命一書中（該書在俄國是隨處可以買到的，）稱讚着他的敵人——雖然有點勉強。「我們無法否認托洛斯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時戰鬪得很不錯，這一點我們應該承認。」（見第七二頁。）

人情原是極複雜的東西，史丹林之所以憎恨托洛斯基，一部分是因爲史氏叨教於他之處很多；他剽竊了他的一部分政綱。早在一九二一年，托洛斯基就在提倡「五年計劃」式的「超度工業化」；在一九二五年，他又主張放逐那些富農——這件事史丹林直到約莫五年以後纔動手。但癥結就在這兒。性急的托洛斯基在時機尙未成熟的時候主張幹這些事，史丹林則有靜待時機的能力。

托洛斯基似乎始終沒有明白，當史丹林說他能在一國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這一國乃是俄羅斯——俄羅斯決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塊大陸，一個洲。托洛斯基也沒有想到，在日後可以作爲世界共產主義的最好廣告的，乃是一個成功的、穩固的、安全的俄羅斯。

六 鐵一般的意志

一九三三年春，蘇聯發生過一場飢荒。現在已沒有人能否認這事。飢荒發生於蘇聯的最大的產穀區——北高加索和烏克蘭。共產黨人在經過了一番躊躇之後，現在也承認這事實了，雖然用的是婉轉的語調。例如美國著名女作家史屈朗女士（Miss Anna Louise Strong）曾說，（見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的新共和國雜誌）「一九三二年的穀物收穫大感不足，主要的原因是當時農民尚用不慣機器，便把他們推入大規模機械化新農業組織的時代，因此不能充分發揮其效率。農民得不到食物的很多。」

關於這場飢荒的主要點，倒還不在於死亡了幾百萬人民。名記者張伯林估計死亡之數達五六百萬之多。別的權威作家則深信沒有這樣多。不過重要的是，蘇維埃政府為農民謀久遠幸福計，正以大規模的劃時代的努力，把土地社會化；但農民卻加以反抗，因而可怖地吃了苦頭。為要阻礙政府的計劃，他們拒絕收穫穀物。所以他們沒有充分的食物吃。他們只有餓死。

這場飢荒的內幕，簡單地說起來是這樣的：「五年計劃」中含有農民的「集體化」一項。俄國在大體上本是一個農業國家，一九二七年約有二千五百萬塊農場；史丹林的計劃要把牠們聯合起來，成為社會主義化的集體農場。農民應將其農具和牲畜移交給一個農場管理員，而在較大的農場上共同工作，並有國家供給的曳引機相助。這就是「農民集體化」的主意。蘇聯社會主義的前途是依賴在這上面的。

不料農民非常痛恨這種大規模的集體化計劃，竟演出了兩場大規模的反抗活劇。第一，他們屠殺他們的牲畜，因為他們不願移交給集體農場。這是一場非常悲慘的事——雖然還不及後來的人民餓死的事那樣悲慘。那些農民中間並沒有什麼組織，什麼聯絡；但是在相距數百哩的成千成百農村中，同時開始了屠殺牲畜之舉。與其把他們的寶貴的豬、羊、牛移交給集體農場的當局，農民寧願自己殺死牠們。

這次的損失是很可怕的。史丹林在四年後承認了這一點。蘇聯的農業經濟所受的打擊，要到一九四〇年左右纔能完全復元，要到那時纔能補足被殺掉的牲畜。因為屠殺在開始之後，就繼續進行，直到蘇聯的家畜約有一半被殺掉時纔停止。官家的統計承認，全國的馬由一九二八年的三三、五〇〇、〇〇〇匹減到了一九三二年的一九、六〇〇、〇〇〇匹；牛由七〇、五〇〇、〇〇〇頭減至四〇、七〇〇、〇〇〇頭；綿羊和山羊由一四六、七〇〇、〇〇〇頭減至五二、一〇〇、〇〇〇頭；豬由二五、九〇〇、〇〇〇頭減至一一、六〇〇、〇〇〇頭。（見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格托夫在一九三四年黨大會席上的演說辭；參閱勝利的社會主義 [Socialism Victorious] 第三九四頁。）

農民們受了這場大災難的打擊，暫時嚇呆了。政府在最大的損害已造成時，連忙向後退讓。大概史丹林沒有及早明白這場屠殺的可怖程度……（註一）集體化的計劃進行得太操切了。原定十年後完全實現集體化的計劃，但在兩年之內，即一九三〇年，全國的農場已有百分之六十五集體化了。因此步調就放慢下來。

即使如此，農民到一九三二年，還要作一次最後的抗議，又反叛起來，彷彿暗中約定似的，另一場精神上的流

行病傳遍了高加索和烏克蘭的富饒的農業區域。那些尚未加入集體農場的農民，其產品出售時只能換得極可憐的代價；他們有時絕對買不到工業製品，有時只能買到些質料不好的東西。他們想到了一個計劃。農作物已經播種好了，長得很豐盛；但是他們卻決定不把牠全部收割進來。他們估計自己一家人在冬季需用多少，就收割多少；其餘的任其在田裏腐爛。「如果國家要把收穫物完全拿去，我們又何必辛辛苦苦地造成豐盛的收穫呢？」

這當然是叛變。這不僅是向史丹林挑戰，簡直是用飢餓來威脅他，要他屈服。蘇聯政府需要那些穀物來分配給各工業區域，各大城市；牠需要穀物來輸往國外，以購買「五年計劃」所需的種種機械。

就是那些已經加入集體農場的農民也任其穀物在田裏腐爛。集體農場上只有不多幾個共產黨監督，不多幾個受過訓練的忠心的管理員。消息傳到了莫斯科，說本該很豐盛的收穫，大部分已被斷送掉了。史丹林知道這是一個重大的危機。如果放任那些農民這樣幹，革命就失敗了。（他曾對韋爾斯說，「陳腐的階級是不會自動地消滅的。」）他不能不行動，他終於行動了。

政府派來的穀物收取者來到了那些長着雜草的農場上，拿走了農民儲備自己食用的一小部分收穫。他們走遍了所有的農家，拿去了應作爲捐稅付與政府的每一粒穀。如果某人的尋常收穫量是六十英斛，應納的稅或許是二十英斛。本年這農民只收穫了二十五英斛，供自己一家人在冬天和第二年春天食用；現在被政府拿去了二十英斛，就只剩五英斛了。

俄國的經濟狀況還極原始。穀物問題——麵包問題——就是生死攸關的問題。沒有穀物剩餘時，人民就要

餓死了。政府本來或許會從城市方面分一點穀物去救濟農民——雖然這一年到處都在挨餓。但是政府沒有這樣做。史丹林決意要那些農民受反叛的刑罰。他們會盲目地、愚蠢地拒絕收穫穀物；很好，讓他們去餓死吧。於是他們竟餓死了。

同時，政府又用一種更直接的方法來肅清富農。所謂富農，乃是具有常人以上的能力或財富的農民，是資本主義的農人，是「農業戰線上的階級敵人」。在一九二八年，蘇聯有七十五萬人被官方列為富農。現在一個也沒有了。他們好像樹木似的被連根拔起，裝在囚車裏，運送到遠方的勞動營中去，被迫作建築、鐵道、開鑿運河等工作。那場飢荒擊破了蘇聯的農民反抗的背脊。自此以後，集體化就進行得很順利，雖然很紆緩。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五年，又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土地被社會化了。除了很小的一部分外，俄國所有的最好的可耕之地，現在已被組織為二十五萬個左右的農場。農民會企圖反叛。他們的反叛本來或許會使蘇聯坍塌的。但是遇着史丹林的鐵一般的意志，就潰敗了。那些農民先殺死他們的牲畜，後來又殺死了他們自己。

七 史丹林的爲人

大家不要以為史丹林是一個粗漢。我們當然不必恭維他，說他能够擔任哈佛大學的文藝教授；但是他的學識確是淵博精深，尤其是在哲學和歷史方面。有些人以為這位靜默的喬治亞人是個草包，只有本能和肌肉而沒有腦筋。但他在演說時卻會引用柏拉圖和吉訶德；他知道美國寶頓（Dayton）地方的進化論案，勞合·喬治

內閣背後有力人物是誰，以及美國勞動者組織工會的內容。在他與韋爾斯談話時，他表明對於克倫威爾和那些「憲章運動者」知道得跟韋爾斯一樣透澈。

一九三三年有一個左翼作家代表團去謁見他，他告訴他們說，他們的作品全是一堆廢物，因為缺乏廣大的文化基礎。他勸這些作家「還是像我一樣多讀讀莎士比亞、哥德及其他古典作品罷。」

他的禮貌也並不壞。他很少接見賓客，但是見過他的人都異口同聲地稱贊他的莊重，尊敬地注意別人的問話，並且努力使訪問者不致感到拘束。他的言辭中充滿着古怪的諷刺的客氣稱呼：例如他常常稱資本家爲「布爾喬先生」。（他有時偶然會用第三人稱稱他自己。見「列寧主義」第一卷第三〇〇頁及第二卷第二二五頁。）他儘量避免在公共場所露面；有一次，在「五年計劃」的緊急時期，他會有十八個月不作公開的演說或在公眾前露面。

他的說話含有幽默的意味，雖然在西洋人聽來覺得有點刺耳，這是他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同的地方。蕭伯納曾報告過，他對於喜劇具有銳敏的感覺。在一九三〇年的黨大會席上，他譏嘲布哈林、李柯夫等「右傾反對派」說，假使布哈林看到一只螻蛄，他就會以爲大禍將臨，蘇聯將在一個月之內滅亡。史丹林說：「李柯夫雖擁護布哈林的理論，但卻有一項保留：他跟布哈林有一點意見大不相同，就是據他看來，蘇聯政府並不會在一個月之內滅亡，而將延長到一個月零兩天。」

在一九三四年的大會裏，他又抽空論述俄國人好空談的習氣：

「我曾經跟這麼一位同志談過一番話，這是一位很受人尊敬的同志，但他是一只無可藥救的話匣子，會把任何重要的論題沉浸在空談的洪流中。我們的談話如下：

我：你們的播種幹得怎樣了？

他：播種嗎，史丹林同志？我們已全體動員了。

我：唔，後來呢？

他：我們已牽直地討論過這個問題。

我：可是以後呢？

他：事情已告一段落，史丹林同志，不久就可告一段落。

我：可是究竟怎樣了？

他：我們已可看到一些進步。

我：雖然如此，你們的播種究竟幹得怎樣了？

他：播種還沒有什麼成績，史丹林同志。」

有時候，史丹林故意裝得很謙虛。當韋爾斯問他，用什麼方法來改革世界時，他溫和地答道，還說不上這個。在那次談話終了時，他又說道：「如果我們布爾雪維克黨人再聰明一點，成就的事業或許還可以多得些。」

但是史丹林卻准許並且鼓勵人們將他供奉得如神明一樣。他的肖像在各處與列寧同佔着光榮的地位。他的照片在莫斯科的建築物上俯視着行人，在晚上照耀得有如戲院的廣告。人民對於他的崇拜，像正教徒一樣的虔誠。顯然，他要阻止公衆這樣阿諛他，是不容易的。他也沒有這樣做。原因之一或許是他那狡黠的東方人性格。這種諂媚，這些肖像，乃是一種很好的政治上武器；他知道俄國人了解大人物。不然，他或許是喜歡這些的。

八 他的私生活

大家知道，他在莫斯科時，是住在克里姆林宮中的。克里姆林並不是一所房子，而是許多建築物的總名；是一個圍着牆垣的堡壘，內有四五十座房屋、教堂、兵營、花園等。史丹林的住所只有三間房。但他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在克里姆林宮中工作。傳說史丹林始終熟居在克里姆林宮牆之內，活像一個囚人，這完全是無稽之談。他的日常工作大半都在克里姆林以外幹，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辦公處，這辦公處設在莫斯科最熱鬧的普洛仙特 (Staraya Ploshad) 街上。

他有一部份時光，住在鄉間別墅中。這地方離莫斯科約一小時行程，地點是在莫斯科河附近的烏索伐·阿根格爾斯加雅 (Usova-Arkingelskaya) 區內。那座別墅本爲一個開金礦兼營業的豪富所有，四周築有很結實的圍牆，把那十英畝的房地產圍在裏邊。史丹林也沒有把這圍牆拆毀。

真的，在這別墅附近的一帶地方，以及通往莫斯科的路上，都戒備得很森嚴。史丹林到那邊去的時候，常常駕

着三部「派克」牌汽車，行駛得非常快；他照例與汽車夫坐在一起，他的車子在行列中的位置是每天變更的。如有野宴和遊覽的人逗留在附近，就會被衛隊客氣氣的擋駕。

然而史丹林的戒備，並沒有像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那樣的森嚴。他露面的時候，比他們多得多。他好幾次由歌劇院步行回克里姆林，人們看見他和幾個友人一同走着，穿過那擁擠的廣場。每年至少有兩次，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這兩個最大的蘇聯紀念日——史丹林站在列寧的陵墓上，眼看幾百萬人在他面前經過，相距不過三十碼左右。

他對裝束方面，一些也不修邊幅。他不穿制服，只穿一件藏青色的在項下扣住的短大衣，一條騎馬褲，和一雙靴子。他外出時，戴一頂有遮陽的便帽。這樣的服裝雖然並不是正式的制服，但在俄國的大部分地方都有許多人仿效着；黨內的要人，以及一般諂媚阿諛的人們，都依樣葫蘆地穿着，以表示對於黨魁的虔心。

史丹林通常努力工作一星期左右，於是到鄉間別墅去休息兩三天。他的娛樂很少，但是他喜歡歌劇和歌舞，常到波爾旭娃戲院（Bolshoi Theatre）去觀劇；有時他會愛上一種電影，例如描寫內戰的夏伯陽（Charayev）一片，他一共看了四次。他閱讀的書報很多，偶然也與人下棋。他不住地抽煙，抽的總是板煙；莫斯科人傳說他愛吸愛奇華士（Edgeworth）牌煙草，所以在公衆前吸這種非蘇聯國產時有點局促不安。他在進餐時，也點上煙斗，放在盆子旁邊，吃完了一道菜就抽幾口。他很愛喝酒，尤其是白蘭地；他的酒量很不錯。

他對於兩性關係的態度是很正常很健全的。他結過兩次婚。他對性一方面顯然不假裝道學先生的樣子。有

一天晚上，他偶然去看他的朋友拉狄克（Karl Radek），瞥見桌上有一本德文的冒充科學畫冊，描摹着猥褻的行爲，僞稱這也是一種科學。史丹林懶懶地翻閱着，看到了一張說明「姿勢」的插圖。他就回頭問他的朋友道：「告訴我，拉狄克，人們真正做這樣的事嗎？」

關於他的第一個妻子的記錄，已消失在革命以前時代的煙霧中了。她在一九一七年死於肺炎。在那時候，戀愛多少是階級戰爭的一種工具；那些老布爾雪維克黨人對於婚姻的形式是不大注意的。史氏的第一個夫人生了一個兒子，現年約二十五歲。這兒子不大好。他在工業學校裏成績很壞——據說他的大半時間都化在跟一個同級學友打彈子上。這學友是前任政治警察部（G. P. U.）部長曼辛斯基（Menzinsky）的兒子——史丹林惱怒起來，就把他送到底弗利斯的工廠裏去做工了。

一九一九年，史丹林偶然去看列寧格勒的一個革命老友阿利柳夫（Sergei Aliluyev），一個鎖匠。他遇見了他的女兒，十七歲的姑娘娜第雅（Nadyezhda），後來就跟她結了婚。她生了兩個孩子，一個男的，名叫華西里（Vasily），現年十四歲；一個女的，名叫史維拉娜（Svetlana），現年九歲。一九二九年，史丹林夫人進了工業技術學校（Promakademiya），學習人造絲的製造法。關於這件事，並沒有什麼宣傳；她跟其他的人一樣地工作着，每天來往也趁非常擁擠的電車，並不借用克里姆林的「派克」汽車。她的志願是想做人造絲統制局的局長。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八日，史丹林夫人在似乎有點神祕的情形下突然死了。不過幾天之前，人們還在歌劇院裏看到她，似乎跟常人一樣康健。她的死訊毫不鋪張地宣佈了出來，接着就安葬於新處女修道院的墳場中。（奇

怪得很，沒有火葬。）

於是馬上有消息傳佈開來，說預備給史丹林吃的食物，她都要預先嘗過，因而中了毒。但事實似乎是這樣的：她已害了好幾天很厲害的腸胃痛，但並不加以注意。她以為這不過是一點小毛病，不願意拿這件事去打擾她的丈夫。也許她有點怕他……她竭力隱藏着她的病痛，保持着布爾雪維克黨人的刻苦精神。她的毛病其實是盲腸炎，等到她聲明害病時，已不及醫治了，因而死於腹膜炎。

史丹林對於年幼的兒女很盡父道；他盡力使他們在學校裏與其他的兒童受完全一樣的待遇。他從來沒有去參觀他們肄業的學校，那是俄國的三個模範小學之一，名叫第二十五小學，設在庇美諾夫斯基街（Primenovskiy Street）上。在他的兒子的最近成績報告單上，有七個「丙」，五個「乙」；沒有「甲」或「超等」。他最擅長的科目是文學。

九 金錢·態度·朋友

史丹林的薪給每月約一千盧布，這在一九三六年在俄國國外約等於六鎊十五先令。他對於金錢毫無興趣。他跟蘇聯的所有領袖一樣，是一個窮人；他們中間絕沒有一人曾被財政上的不名譽流言沾染到。共產黨員的薪給現在是分類規定的；照以前的規矩，黨內無論什麼人的所得，每月都不能超過二百二十五盧布。現在已沒有最高限度了；平均數為六百盧布。一個共產黨員，無論兼任多少職務，只能支取一個職務的薪給；凡是黨員，不得收取

著作的版稅。

在另一方面，史丹林如果願意，他可以像沙皇似的使用金銀的食器。俄國全國的財富，沒有一種他是不能佔有的，如果他要的話。他的生活方式很簡樸，不過他的別墅在蘇聯卻可與美國百萬富翁的鄉間別業相等。他有僕人，有汽車，有書籍。

他對於因襲的宗教的態度，純然是否定的。他的宗教，如其他的獨裁者一樣，乃是他的事業；在他，只有對於共產主義的信心就够了。史丹林會說：「黨對於宗教不能抱中立態度，因為宗教是與科學相反的東西。」雖然如此，他卻允許給他的亡妻舉行了一種近乎正宗教會的葬禮。他可說是透澈地讀過聖經的唯一獨裁者；這自然是在神學院的時候讀的。

他的朋友很少。跟他最密切的兩個朋友，是伏洛希洛夫（Voroshilov）和嘉加諾維支。他與黨內的老同志間，稱呼是很隨便的。熟識他的人稱他爲「約瑟·維沙里奧諾維支」；一般人就叫他史丹林同志。他沒有什麼頭銜。書記們或通譯者似乎並不怕他。假使他們是初次見他，或許有點興奮，但並不害怕。對於史丹林用不着卑躬屈膝。他而且容許人家的批評。

他難得接見外界人士。美國大使蒲列特（William C. Bullitt）會與他聚餐過一次。在蒲列特來到莫斯科以前，史丹林從來沒有接見過外國的外交官，就是英國大使謙爾斯登爵士（Lord Christon），在一九三五年春天艾登遊俄之前，也沒有跟他會面過。他不喜歡社交，不肯多說話，所以在十八年中，他只正式接見了七個新聞記

者——兩個德國人，兩個日本人，三個美國人。

他「接見」蒲列特時，用的也是獨特的、間接的方式。伏羅希洛夫邀請這位大使聚餐，史丹林臨時走了進來。他的態度愉快而親熱，向在座的人一一祝壽，談話中流露着對於美國的一切都很熟悉；散席之後，他抽着他的煙斗，而那些人民委員有的彈琴，有的唱歌，好像同學會中的弟兄一樣。

最近史丹林已表示了多跟外界接觸的傾向。他去參觀新築成的地下鐵道，事前並不宣佈；他最近初次作無線電廣播演講，他甚至於在文化公園裏吻那些嬰兒——這是對於流行的習俗的最後讓步。當他在一九三五年的春天和夏天接見艾登、賴伐爾和貝奈斯的時候，曾與莫洛托夫聯名簽署官報。

這一切一部分可以拿他的漸得人心來解釋。他並不像列寧那樣爲人們愛戴，但當革命日漸成功，生活標準也日漸提高的時候，就是那些頑固的非共產黨員也逐漸信服他了。莫斯科的新隧道贏得了民間的許多贊美聲；他們的態度彷彿在說，「想不到這傢伙的確有一點本領。」

最近史丹林又採取了一種新的方針，以保障民權，擁護人民——連非黨員在內——的戰士自任。在一九三五年五月間，他曾斥責那「沒心肝的官僚政治」並且說：「第一我們當珍重人民，珍重幹部人員，珍重能爲我們大家謀幸福的一切工作者。現在我們應該明白了，在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可貴的資本中，最可寶貴最有力量的乃是人民。」

爲要說明以前人們如何輕視人，史丹林講了這一個小故事：

「我記起了我被放逐於西伯利亞時的一件意外之事。是在春天，春水大漲的時候。許多木料被泛濫的江水沖走了，約有三十個人就到江邊去撈這些木料。到了薄暮時分，他們回到村子裏來了，但缺少了一個同伴。當我問他們那一個人到那裏去了的時候，他們漠不介意地答道：『他留在那邊。』我問他們：『這是什麼意思——留在那邊？』他們依舊不介意地答道：『問什麼呢——當然溺死了。』於是其中有一個人急急地要走了，說道：『我還要給那匹馬喝水呢。』當我責備他們重視牲畜甚於人命的時候，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在其餘的人們一致附和聲中，說道：『我們爲什麼要重視人呢？我們常常能够製造人的，可是馬呢——你倒試試看，製造一匹馬。』」

但這種尊重人道的表示來得很遲，是經過了許多可怖的爭鬪、可怖的犧牲以後纔有的。如果史丹林現在能放鬆一點，去追求人道的價值，那當然是很好的事。但是他的歷史上使命，跟這卻是完全相異的。史丹林是接管了俄國革命使他繼續進行的人。人道的價值暫時崩潰了。他是「鋼鐵時代」的創造者，「五年計劃」的發明者；他是用工業化的方法，使社會主義能在一個國度裏成功的人。

(註一) 可是他已得到了教訓，並且承認了他的錯誤。一九三四年秋季採用的新法規，准許每一個農民飼養數量有限制的牲畜。

頭牛，兩隻羊，四隻豬，和一羣雞。

第三十六章 史丹林周圍的人物

「在人民大衆中間，我們（共產黨人）不過是海洋中的幾滴水；只有在我們正確地表現着人民所贊識的事物時，我們纔能夠統治。否則，共產黨就不能領導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就不能領導民衆，而全部機構就要瓦解了。」

「我們的革命機關順利地運轉着。」

——列寧。

——史丹林。

一 無名英雄

本章所述史丹林周圍這些人物的名字，讀者也許不大知道。他們並不是嗎啡鬼，歇斯的里患者，匪徒，追求一己權勢者，憤世嫉俗者，或神經錯亂者。但嘉加諾維支（Kaganovitch）之於俄國，其重要正如戈林之於德國一樣；莫洛托夫（Molotov），柴達諾夫（Zhdanov），區巴耳（Chubar），米高揚（Mikoyan），及伏洛希洛夫（Voroshilov）的值得注意，也不下於哥培爾（Goebbels），辛穆勒（Himmler），弗力克（Frick），或奚斯（Hess）。他們沒有表揚自己的才能。他們的個人人格幾乎是不存在的。他們是國家的忠僕，能幹而不自私。他們只爲其工作而存在，他們的工作幹得極不錯。

這些統治着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地面的人們，有許多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前是用手藝工人或體力勞動者。現在「政治部」裏的十個委員，其中四個從來沒有進過學校；受過大學教育的一個也沒有。這或許可以解釋蘇聯辦事上的一部分混亂原因——官僚文章、官僚政治、缺乏技術、缺乏敏捷。雖然如此，莫斯科有一個熟悉內幕的中央外交官曾經告訴我，他認為就人論人，「政治部」的各位委員是和世界上的任何統治團體同樣能幹的。

史丹林部下多數人的經歷，彷彿由一個模型裏出來。他們都是勞動者出身的革命家；除最年青者外，他們都像史丹林一樣，有一段作祕密政治工作的歷史。

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史實，是他們加入共產黨的日期；一般而言，他們在黨內的地位是以此而定的。好幾個曾經入過獄，他們的下獄記錄是引以自傲的榮譽標記。

有一位消息靈通的匿名作者，在其所著的不許重述的話（*Not to be Repeated*）——一九三二年出版於紐約）中寫着：「他們所受的刑罰並不是恥辱的烙印，而是他們為新的貴族的標記。他們以其犯法的記錄自傲，以為這可表明他們新的貴族性。然而布爾雪維克治下的這些領導者，卻是實實在在的『好人』。他們是一門心思的狂熱者……我們禁不住要拿初期基督教的戰鬥分子和耶穌會的教徒來跟他們相比。布爾雪維克黨人是近代的聖徒和十字軍，不過並非屬於心靈上的世界而是屬於物質上的世界罷了；他們是歷史上最澈底的改革家和道德家——就他們自己的標準而言。他們中間有些人喝酒，有些人有情婦，但他們的道德是屬於另一類的。他們是歷史上的第一批專制統治者，不憑藉其權力為自己牟利。他們不敲詐取財，敲詐取財的人都被槍斃了。他

們沒有宮室，沒有頭銜，沒有紫袍；他們住在一兩間房間裏，生活程度比美國的泥水匠更低；他們誓以個人的貧苦和服務終其一生。」

當然，「事業主義」(Careerism)本身也可以成爲一種謀生之道；廢除了財產的社會動機，立刻就會有另一種動機起而代之——權力。一個共產黨員所能得到的最高公衆酬報，乃是一個城市或一個工廠以他的名字爲名，(例如高爾基城、莫洛托夫汽車製造廠、嘉加諾維支軸承廠)。但是權力是爲大家所愛的，即使布爾雪維克黨人也如此。共產黨員常常以職務——權力——來測量人的志願，正如人家以財富來測量一樣。

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有委員七十七人，候補委員六十八人；該黨的最高機關——「政治部」就是從這裏選舉出來的。「政治部」有正式委員十人，候補委員四人。他們都是朋友；他們有共同的背景，共同的目標；他們是蘇聯的中央指導機關。在理論上，史丹林的權力與其他的委員相等。

「政治部」的委員在每屆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中要出一點鋒頭。他們坐在講壇上，在到會的黨員們面前舉行公開的會議。在「黨的路線」的範圍以內，會發生非常熱烈的辯論、反駁和討論。各政治委員彼此搶着說話，會衆也得提出質問，而且時常實行質問的。打一個比喻，好像英國的內閣在下議院中舉行閣議，而坐在台下的議員們都得自由地參加討論。

然而蘇聯的「政治部」並不是內閣。政治部的委員有時兼任着內閣閣員(人民委員會委員長)；但多數的閣員還沒有達到政治部委員的高位。內閣閣員是政府方面的職員；政治部委員則是黨部裏的職員。蘇聯的內

閣閣員只有純粹行政上的職權，對於一般的政策和策略是無權決定的——除非他們同時是「政治部」的委員。

托洛斯基、齊諾維夫、加米納夫 (Kamenev)、布哈林等，從前都做過政治部的委員。但這些輝煌奪目的名字，現在都落在黨的塵土中了。知識分子的時代，漂亮然而空談的幻想家時代，已經過去了。史丹林所需要的人是技術家、組織家、實行家。

政治部的委員，有兩個（史丹林和奧左尼基士 [Orzhonikidze]）是喬治亞人；一個（米高揚）是亞美尼亞人；一個（嘉加諾維支）是猶太人；一個候補委員（盧祖塔克 [Rudzutak]）是拉的維亞人；其餘的都是俄羅斯人。時常有人說，蘇聯正被猶太人統治着：這話跟事實相差之遠無以復加。除比較新進的嘉加諾維支外，所有的猶太人都已下野了：如托洛斯基（本名 Bronstein）、齊諾維夫（本名 Apfelbaum）、加米納夫（本名 Rosenfeld）等。李維諾夫雖是猶太人，但並不是「政治部」的委員。

「政治部」人選的支配，非常審慎精密，他們交織成爲蘇聯各種事業的一張聯絡網，其權力分配的均稱，爲空前所未有。史丹林要把所有的線索都握在自己手中，而這就是他多年努力的一部分成績。政治部的委員全體都是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現在讓我們將政治部的人物逐一分析一下，且看組成的是那些人。

第一是莫洛托夫。他是人民委員會的主席——換言之，就是內閣總理。因此，內閣的職權是由政治部加以集中的。他又是「勞工國防委員會」 (S.T.O.) 的主席，這委員會大概是權力最大的蘇聯政府機關。

其次，是加里寧（Kalinin）。他是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R. S. F. S. R. 即俄國本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及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所以是全國頭銜最大的人。他在政治部裏，是政府對外的代表。

再隨便說下去有等於軍政部長的伏洛希洛夫。他在政治部裏代表「紅軍」。另一個政治部委員，與左尼基士，是重工業人民委員，這也適當地跟政治部配合了。米高揚則是糧食人民委員。嘉加諾維支是運輸人民委員。區巴耳是人民委員會及勞工國防委員會的副主席，人們預料他將來將繼莫洛托夫而任主席。

還有一個政治部委員柯西奧（Kosior），是黨部裏的一個要人，因為他是烏克蘭方面的黨魁。候補委員柴達諾夫則是列寧格勒的黨部領袖，為基洛夫（Kirov）被暗殺後的繼任者。另一個候補委員埃依凱（Eikhel），是西伯利亞東部的黨魁。至於安德烈耶夫（Andreyev），則也是一個黨內要人（雖然有一個時候做過鐵道人民委員），他跟史丹林一樣，也是一個黨祕書，在必要時能夠調整黨部本身的。

細察上列名單，可以發見兩個漏洞。政治部裏既沒有 G. P. U.（政治警察部，即祕密警察局）的代表，也沒有外交方面的代表。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全體委員除六十歲的加里寧外，都相當年青。嘉加諾維支現年四十二，伏洛希洛夫五十四，莫洛托夫四十五，區巴耳四十四，安德烈耶夫和米珂揚都只有四十歲。其平均年齡為四六·七。（英國閣員的平均年齡為五五·五。）在世界各國握有如此大權的人們中間，這實在是最年青的一羣人。

二 嘉加諾維支

在一九三五年行將告終時，蘇聯最爲缺乏的不是麵包，或住宅，或新聞紙，或紡織品——而是火車票。我認識的一個英國外交家攔住在克里米亞半島上，不能回莫斯科來，有好幾天之久，只是爲了買不到火車票。原因是，拉查爾·莫綏維支·嘉加諾維支（Lazar Moiseyevich Kaganovich）已奉了史丹林之命，要改革蘇聯的鐵道制度，以促進穀物及其他貨物的運輸。嘉加諾維支本着他一向透澈的精神辦着這件事。旅客們或許不能不老等，但每天運貨的車輛卻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由二月間的五萬六千輛增至八月末的七萬四千輛。

那時的鐵路是一團糟，因爲車輛陳舊了，長距離的路線不夠，而工作的人員很散漫。在一九三四年，蘇聯鐵路上共有六萬二千次「失事」，其中有多次損失很重大。證明有疎忽之罪的司機和轉轍手都被槍斃了。但這無補於事——這只能使其餘的員工心神不安而造成更多的失事——於是嘉加諾維支來了。

史丹林屢次將最難做的事交給嘉加諾維支去做。他曾被任命爲莫斯科蘇維埃的主席及莫斯科黨部的領袖，去肅清這個最重要的托洛斯基派的巢穴。他的莫斯科黨部變成了蘇聯最強大的黨部。他建築了莫斯科的隧道——這不是一件小事呢。而在悲慘的一九三二年秋季，奉了史丹林之命去強迫徵收穀物的，也是他；他帶了都市工人和紅軍到鄉間去，拿走了應交給政府的每一斤小麥。

嘉加諾維支生着黑頭髮，黑鬍鬚，體格很魁梧，容貌相當動人。他是蘇聯最好的演說家，具有跟托洛斯基相似

的吸引力。在政治部諸委員中間，只有他的演說記錄中夾註着「笑」或「大笑」。

他的確具有相當的幽默天才。他在最近的一次黨大會席上的演說，大部分是攻擊着管理不善、官僚政治、和效率不足。他提出來說，「農業人民委員會」共有二十九個局和二百零二科。（台下的聲音：「哦哦！」）嘉加諾維支繼續說道，「這並沒有什麼。每一科都管理着蘇聯全國。」（笑。）

他大大地嘲笑一個繩索製造廠裏的兩個職員，一個名叫尼奧斯拉勃納（Neoslaby）——這俄國字原義爲「永不知疲乏」，另一個名叫普里萊斯尼珂夫（Prelesnikov）——義爲「可愛的」——一個管理着「打結部」，另一個管理着「解結部」。一個盡力打結，另一個就盡力解結。（笑）……他又說到通稱爲「監察實行決議部」的政府機關，化了五個月的工夫纔完成一件可以在五天內做了的工作。該機關的俄文名稱，縮寫時恰巧等於俄文的 В.Т.Е.Е.Р.（睡覺）一詞。嘉加諾維支將這一點提了出來，就引得闔堂大笑。

嘉加諾維支又說：「紅農針織廠的計劃，先後在五個人民委員會和局裏，以及四十六科裏受審查。該廠收到了十九份不同的訓令，彼此都是互相矛盾的。那些計劃被更改了許多遍。結果該廠只能毫無計劃地工作着。一九三三年的計劃直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纔被批准。還好，總算只遲了一年零四天。」（笑。）

他非常苛刻地譏評不濟事的職員。有一次，他說到一張「雜貨」的配貨單，其中所列的狗項圈的數目竟足以「將該區所有的狗從頭到脚都用項圈包裹着」，還要一大批沒有燈罩的燈台，和一大批沒有燈台的燈罩。——「官樣文章就這樣做成了。」嘉加諾維支加上了這句按語。

這時史丹林插嘴道：「那麼把這公文歸在檔案中好了。」

嘉加諾維支的結論是：「中央委員會，政治部的委員，以及本黨的領袖史丹林同志，所以批評這些事，並不是要這種情形在這次大會以後依然存在。你們如果不真正動員全付的機構來做本黨所定下的工作，那末本黨就要來代你們做了。」

嘉加諾維支的生平事蹟很有趣，儘可以代表許多比較年青的共產黨人的生涯。他於一八九三年生於烏克蘭，只進過兩年小學校，以後就去做工，最初在工廠裏，繼而做馬鞍匠的學徒。他於一九一一年入黨，在內戰時期一直戰鬪着。他曾任職於薩馬拉（Samara）、尼士尼·諾伏哥洛特（Nizhni Novgorod）以及土耳其斯坦（Turkistan）的黨部中，在一九二二年引起了史丹林的注意，就當了烏克蘭的黨部主任。史丹林於一九二八年召了他到莫斯科去。

當他被任為鐵道人民委員時，他就只好放棄其莫斯科蘇維埃主席的職務了。但他還兼任着不少職務。他是共產黨政治部的委員，該黨組織部的委員，及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他是全蘇聯及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常務委員。他又是「赤色工會」的執行委員，及S T O（勞工國防委員會）的執行委員。

他的妹妹是——或曾經做過——史丹林的密友。

三 紅軍總司令

蘇聯最重要的軍人——等於軍政部長——是克萊明蒂·厄弗里莫維支·伏洛希洛夫 (Klimentii Efremovich Voroshilov)。他跟嘉加諾維支一樣，生於一個工人的家庭中，六歲時就到礦裏去做工。他從未進過學校。完全是一個自己造成的人。他生於一八八一年，早在一九〇三年就加入了黨，所以是黨內的一個老前輩。少年時，曾因不肯對一軍官脫帽而被捕。釋放後，他就積極參加革命工作；一九〇五年革命時，他是羅根斯克 (Rogansk) 的工人蘇維埃主席。

他跟史丹林一樣，過着一半祕密的生活，直到一九一七年。於是他組織了第一枝紅軍，參加烏克蘭的內戰。他先任烏克蘭第五軍軍長，繼而改任第十軍軍長，在一九一九年被委為全蘇聯騎兵總司令。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他任莫斯科軍區總司令。他是在史丹林這一邊，不在托洛斯基那邊，所以當軍事人民委員一職出缺時，史丹林就幫伏洛希洛夫取得了這個位置。他的別墅就在史丹林的別墅附近，他們倆是極親密的朋友。

伏洛希洛夫是蘇聯最得人心的領袖。他沒有野心，不是一個政客，他的性格也很可愛。他白膚金髮，腰肢粗壯，幾乎像一位天神。他不是陰謀家，不是暗中操縱者；不是狂熱者，不是知識分子；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是風度最美的人民委員。

據說有這麼一個笑話：當托洛斯基騎着馬在紅場上檢閱軍隊時，觀衆喊道：「好一位漂亮的人啊！」當伏洛希洛夫閱軍時，他們喊道：「好一匹漂亮的馬啊！」但實際上，伏洛希洛夫在軍隊中是很得人心的。他不是一個出名嚴格的紀律家；他的部下尊敬他，是因為他不分黨派，沒有偏見；他是主張「公平交易」的。他又是一個射擊的

名手，他部下的善射者一想到他們的總司令跟他一樣善射，就很高興。

他是太隨便了，所以不能十分機警。在最近一次黨大會席上，他任意地談着，談到了運輸上的困難。「那一種困難較大呢——主觀上的抑客觀上的？」他問道。「當然是主觀上的困難較大。這些是什麼呢？是組織不良和沒有基本的紀律。我不知我是否在洩漏秘密……」（笑聲與掌聲並作。）

快得好像一只蜜蜂，同在講壇上的嘉加諾維支，利用這機會插嘴道：「即使你真的洩漏了什麼，我們也無權禁止你在黨大會席上洩漏……」

伏洛希洛夫的演說或許迂緩一點，但他也很會應用俚語。他稱那些強迫勞動的富農爲「開鑿運河的英雄軍。」

他負着蘇聯的國防重任，他的主要困難在運輸上。所以他能與主持運輸的嘉加諾維支極親熱地合作，是一件很好的事。運輸上的落後，是蘇聯必須擁有巨額陸軍的原因之一；蘇聯的陸軍共有九十四萬人，是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常備軍。蘇聯的陸軍實在有兩枝：一枝在東部（滿洲邊境上），另一枝在西部（波蘭邊境上。）這兩枝軍隊都是必要的，因爲萬一開戰時由於歐俄與東西伯利亞的遙遠距離，以及鐵路系統的不得力和不敷應用，即使要將一師兵從一個前線調到另一個前線上，也是需時很久且很費力的。

「紅軍」是世界上最有力量量的陸軍之一。牠的人力很強，充滿着與致和精神，配備既好，領導又好。牠的機械化程度，比歐洲各國的陸軍都高。在一九二九年，每名兵士平均分得的機械化馬方爲二·六匹；一九三〇年爲

三·七四，至一九三三年已爲七·七四四。這數目勝過英、法兩國的數目，有人相信甚至可勝過德國。而且據伏洛希洛夫說，紅軍中的人員有百分之七十是「技術家」。

四 漂亮的外交家李維諾夫

「嘗李維諾夫來此時，羅斯福必須堅持着一點。在蘇俄沒有依照良好的、健全的、資本主義的方式，承認並清理其債務以前，我們不能夠承認牠。」——霍華特·勃魯培克 (Howard Brubaker)，在美國承認蘇聯之前。

這個西歐各國的肉囊刺，這個在裁軍會議「席上有勇氣提議真正的裁減軍備的人，在最近數年來已變成了這麼安定的一位市民——這麼肥胖，穿著得這麼整潔，這麼知道世故人情而富於外交家的實質——以致人們很易於忘記他的出身和早年的歷史。李維諾夫並不一向名叫馬克沁·馬克西莫維支·李維諾夫 (Maxim Maximovich Litvinov)。在不同的時期，他曾先後擁有下列的這些「革命的名字」——帕帕雅 (Papasha)、費里克 (Felix)、大衛·摩特該·芬克斯丹茵 (David Mordecai Finkelstein)、李維諾夫·海利生 (Litvinov Harrison)、羅維耶 (Lavinye)、海利生 (M. G. Harrison)、古斯太夫·格拉夫 (Gustav Graf)。他的真姓名乃是毛伊希夫·伐拉克 (Moysheev Vallakh)。

李維諾夫，現在世界上最聰明的外交部長。一八七六年生於皮亞里斯托克 (Bialystok)，這地方當時是在

俄國境內，現在則屬於波蘭。他的家族是資產階級的猶太人，他少時曾受正式的中等教育。後來被徵入沙皇的軍隊中，當了五年小兵——這事實很少人知道。他在軍隊中的經歷使他變成了一個革命家，因而在一九〇一年被捕，被判放逐於西伯利亞。他當時行動就很靈活，在充軍的時候，他中途脫逃，逃到了瑞士，他遇見了列寧，就在一九〇三年進了黨。

有一個時期，他的生活跟史丹林的一樣，充滿着革命的冒險事業，僥倖的脫逃，長期而耐性的研究和準備，政治上的陰謀，詭計和反詭計——有聲有色的插話，多得可以製一影片。他祕密地重返俄國，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失敗以後，擔任將違禁的軍火私運至勒佛爾 (Reval) 附近的拿爾根 (Narva) 島上的祕密貯藏所。

一九〇六年，是他生活中比較安定的一個時期，當時他在聖彼得堡編輯合法的報紙新生活。一九〇七年，他又開始冒險了；他被革命黨派往國外，去銷售史丹林爲革命運動而在底弗利斯的銀行裏劫得的鈔票和債票。李維諾夫帶着這些贓物到巴黎去，全部賣掉後來就被法國驅逐出境。他回俄一次，於是就到倫敦去，幾乎過了十年流放生活。在這時期他跟列寧很接近。

他的生活完全是二重的。在白天，他是一個出版社的職員，彷彿很專心地從事於閱讀原稿，改正校樣，記錄賬目等極「布爾喬亞」的日常工作；在晚上，他是一個哲學家，一個革命家，跟那些亡命在外的俄國人在一道。他最初在這出版社裏謀糊口之資，後來則充當德國的西門子·舒葛德電機軍需品公司的購料代理人。他的麵包和奶油是如此得來的。他的精神上糧食則得自列寧。

一九一七年的布爾雪維克革命發生後，李維諾夫立即就被任爲蘇維埃的駐英全權代表。但在一九一八年八月間，他竟被捕下獄，作爲在莫斯科被布爾雪維克黨人拘禁的英國間諜勃魯斯·勞克哈（Bruce Lockhart）的抵制。勞克哈不久被釋放了，李維諾夫就回到蘇聯去，任職於外交人民委員會。最初他在姬采林（Chicherin）手下做副委員，一九三〇年姬采林去職後，他就升任爲正委員了。

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五年，李維諾夫的生活，僕僕於旅行和談判。他的行蹤和締結的條約，真是筆不勝述。一九一八年他遊瑞典京城，一九一九年遊愛沙尼亞京城，一九二〇年遊丹麥京城，一九二一年重遊愛沙尼亞。解決許多戰事善後問題。一九二二年，他隨蘇聯代表團出席於熱諾亞（Genoa）及海牙國際會議，並與「美國救濟委員會」訂立協定。一九二五年，他與德國及挪威訂結了通商條約；一九二六年以後，他每年出席於日內瓦的裁軍會議，其激烈的演說先後引起了西方各國的嘲笑、憤恨、暴怒——而最後是尊敬。一九三三年，他赴華盛頓談判美國與蘇聯的互相承認問題；一九三四年，他將蘇聯送進了國際聯盟。

李維諾夫夫人很胖。他講的英語帶着一種特別重濁的音調。他的主要才能是能頑強地堅持其議論，這是由於他有始終不變的一貫主張，以及現在的歐洲政治家罕有的談判時的風趣和彈性。日內瓦的各種委員會日益需要着他，因爲他的頑強而謹慎的智慧使他在無論什麼糾紛中都有所貢獻。（這裏可以舉一個例子，以見他的小聰明。那是在倫敦正鬧着洛加諾條約問題的時候，國聯對意經濟制裁正大遭失敗，以致無法使德國有所警惕。他在私人談話中說：「我們以爲我們正在預演一齣戲，但是戲既不準備上演，爲什麼要白費功夫去預演呢？」）

在一九一五年，當他逃亡在倫敦時，李維諾夫娶了悉尼·駱爵士（Sydney Low）的姪女，名媛常春小姐（Miss Ivy）。她是蘇聯的第一位貴婦，常常幫助李維諾夫招待外國的貴賓。李夫人雖是一個英國女人，但對於李維諾夫並無什麼利益。有一次，在好幾年前，她為柏林某報寫了一篇雜文，羨慕地描寫着柏林的各種優點，如寬闊而整潔的街道啊，明亮的窗櫺啊……莫斯科的布爾雪維克報紙看到了此文，就羣起攻擊李維諾夫，說他在家裏藏着一個「布爾喬」小女人。

他們的家庭生活很幸福，如果他在美京華盛頓跟在莫斯科的夫人用長途電話交談的記錄可以作證的話。請那些以為布爾雪維克黨人將嬰孩當作早餐吃的人們來聽聽吧。

李氏：喂喂。

李夫人：喂喂，親愛的。你說的話，我聽得清楚極了。

李氏：你可以講得慢一點好嗎？

李夫人：你在那兒？

李氏：在「白宮」中……羅斯福總統叫我問候你。

李夫人：謝謝你，請代我問候他……媚霞要跟你講一句話。

李氏：媚霞跟你在一道嗎？喂喂，媚霞，你的功課怎麼樣？

媚霞：很好。你好嗎，爸爸？

李氏：你們那裏天氣怎麼樣？

李夫人：好極了，正在雪後初霽……代表團的事情怎樣——一切都好嗎？

李氏：好。

李夫人：我們什麼時候能見你……

李氏：愛和吻。再會吧。

李維諾夫在國內，不如在國外那樣重要。他被認為一位技術家，幾與工程師相似；他的外交知識與談判的技巧和經驗，使他成了一個不可或缺의 專家。我已經說過，他並不是「政治部」的委員。實際上，他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間，第十八屆黨大會開會時，纔被選舉為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該會共有委員七十一人。所以嚴格地說起來，在一九三四年以前，李維諾夫並不是真正統治蘇俄的七十二人中的一分子。他方面，當一九三六年七月間適逢六十壽辰時，他得到了「列寧勳章」——蘇聯的最高獎章。

五 女性羣像

李維諾夫的夫人不能作為蘇聯婦女的代表，因為她自己並不擔任什麼職務。史丹林的夫人是工作的。另外還有許多要人的太太和其他婦女，都在事業方面有了很大的成就。在歐洲各國中，有才幹和品格的婦女要在家

庭以外做有用的人，沒有一國是這樣容易的。

國際貿易人民委員長魯森戈次 (Rosengolts)、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教育部長布勃諾夫 (Bubnov) 按：一九三八年三月因涉嫌叛國案被捕，司法部長克里倫科 (Krylenko) 按：現亦被捕——這些人的妻子都擔任着職務。布勃諾夫夫人是一并用外國貨幣作買賣的商店中的售貨員。蘇聯政府的主席加里寧的太太，是諾伏西比斯克 (Novosibirsk) 附近的一個國營農場的管理員。莫洛托夫的太太，則是製造香粉、胭脂、脣膏的托辣斯經理。

列寧夫人依舊住在克里姆林宮中工作着；她是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教育人民副委員。雅各美利伐夫人 (Madame V. N. Yakovleva)，現任俄羅斯共和國財政部長——這恐怕是現在世界上婦女所擔任的最重要而辛苦的工作。伏羅諾伐女士 (Falegeva Yakovlevna Voronova) 本是一個紡織女工，於一九一七年入黨，現任全蘇聯輕工業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還有一個一九〇九年入黨的老黨員，由工廠女工出身的尼古拉伐女士 (Klavdiya Ivanovna Nikolaeva) 則是共黨中央委員會的「民衆工作及宣傳部」部長。至於柯倫泰夫人 (Madame Alexandra Kollontay) 則仍任蘇聯駐瑞典公使（按已於一九三八年春撤回）。

就一般而言，共產黨的要人外出時，除了訪問至友外，並不偕其妻子同行；她們也難得舉行或參加正式的宴會。婦女們除自己已有地位者外，是不參加社交活動的。沒有一個局外人能夠記起來，曾經看見過嘉加諾維支或伏洛希洛夫的太太。沒有人注意這些。只有婚姻上的關係，是不夠資格列入共黨的「名人錄」的。

六 全蘇名義元首加里寧

加里寧 (Michael Ivanovich Kalinin) 一八七五年生於提佛 (Tver) 省內，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在十六歲時爲生活所迫，投奔到附近的一個富豪貴族的莊田上，當一名馬廐小使兼跟班。後來他到聖彼得堡去，變成了一個工廠工人。他於一八九八年入黨。現在他是「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等於是「俄國大總統」。

他的實權並沒有他的頭銜這樣大。但是他的左右手，特別是對於史丹林個人的左右手，往往被人們估計得過低；他的意見是很有斤兩的，尤其是在有關農民的事件上。加里寧自己是農民出身，現在依然穿着農民的服裝，他是農業生活問題的一個權威，而農民們也很信任他。當外國使節呈遞國書的時候，一向由加里寧以蘇聯的正式元首資格，予以接見。

報告列寧的死訊的，也是加里寧。杜蘭蒂曾經描述過他的演說及其所引起的情感，是可以不朽的。

七 內閣總理莫洛托夫

當我在一九二八年第一次居留於莫斯科時，莫洛托夫剛剛新近被選爲「政治部」的委員，還沒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姓名。他本是黨內的要人——「史丹林的心腹」——他在「政治部」內的職務似乎是監察黨務。當時的要人李珂夫、布哈林、湯木斯基，都先後被免職了；彷彿一轉瞬間，那不很著名的莫洛托夫已變成了「全蘇聯

人民委員會」的主席——等於別國的內閣總理——現在他依舊擔任着這個職務。

他前任的人民委員會主席李珂夫，是唯一受過大學教育的重要黨員；莫洛托夫則高級小學都沒有進過。布哈林是一位漂亮的談理論的演說家，很會寫辯論文章。而莫洛托夫則如列寧所說，是「蘇聯的最好的管卷員。」但史丹林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是何等樣的人。他喜歡莫洛托夫，有好幾個原因。其中之一乃是，他跟史丹林自己一樣，在長期的祕密工作時期，始終留在俄國境內，從沒有逃到外國去過輕易的亡命生活。

「莫洛托夫」是一個化名，跟「史丹林」一樣；其原義為「槌子」。他的真姓名是佛拉區斯拉夫·史克利亞平（Vladislav V. Skriabin）。他生於一八九〇年，出身於一工人家庭中，在一九〇六年就入了黨。一九一七年二月間，他是彼得格勒蘇維埃內布爾雪維克黨團的主席。自此以後，他得到了史丹林的充分信任。假使史丹林死了，他大概比嘉加諾維支或伏洛希洛夫更有希望做繼任者，所以人們在背後稱他為「太子」（the Czarevitch）。他的前額很高，他的樣子和行動好像一個法國醫學教授——精細、有秩序、稍有一點學究氣味。他的重要性沒有為人們完全理解；他決不是一個傀儡，他是一個第一等聰明人且有勢力的人。莫洛托夫是一個素食主義者，他絕對不喝酒。史丹林將許多棘手的事交給他去幹。例如在一九三二年的飢荒之前，農民們殺死了多少家畜，便是由他老着臉皮宣布的。（這與希特勒命突斯宣布六卅清黨案第一次向民衆道歉如出一轍。）

八 其他領袖

重工業人民委員與左尼基士 (Grigori (Sergo) Konstantinovich Ordzhonikidze) 也是喬治亞人，跟史丹林很接近。他生於一八八六年，曾在底弗利斯受初等教育；於一九〇三年入黨。他主持的機關，當着「五年計劃」的工業上目標的要衝；也許因此，那個機關內部的傾軋和官僚習氣也比其他機關爲多；而深感缺乏專家和人才不夠之苦。除伏洛希洛夫外，與左尼基士是史丹林部下風度最美的人。他在有一次被放逐於西伯利亞時，遇見了一個愛斯基摩女人，就跟她結了婚，現在依然跟她同居着。他和伏洛希洛夫是非常親密的朋友。他是一個高明的組織家，曾經擔任過無數重要的職務，如工農視察人民委員，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最高經濟委員會主席，共產黨監察委員會主席，等等。（按與左尼基士已於一九三七年二月間突然逝世。——原註。）

蘇聯最著名的國際問題作家，拉狄克 (Karl Bernardovich Radik) 則完全是另一種人。他曾在一九二五年因參加托洛斯基派而被開除黨籍，直到一九三〇年纔被准許恢復黨籍。他不是「政治部」的委員；但他在外交方面的左右力是很大的，史丹林常與他商量外交問題。拉狄克是波蘭人，一八八五年生於加里西亞 (Galicia) 的勒伏 (Lwow) 地方，一九〇一年即參加黨的工作。在俄國經歷了照例的浮沉以後，在一九〇七年就定居於柏林，跟羅沙·魯森堡 (Rosa Luxemburg) 聯合創立了德國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他曾在瑞士、柏林、瑞典等處爲國際共產主義效力。他是全球聞名的一位漂亮的辯論作家和新聞學者。

蘇聯其他領袖的生平，多數與上述諸人大致相同。少年時代，都是貧苦出身，自己研究學問，做體力勞動，從事革命工作，一九一七年以前，備受刑罰之苦，革命以後方纔成功，其間不知吃盡多少辛苦，拚命努力工作，百折不撓。

的獻身於革命，效忠於主義。這些人都應得詳細敘述，不過他們的生平都是大同小異，所以在這裏只好作幾個簡略的介紹。

少壯派安得烈耶夫 (A. A. Andreyev) 是「政治部」的委員和黨祕書之一，他年僅四十。自一九二二年以來，他一直連任共產黨中央委員。他的父親是一個管門人；他只進過兩年學校。

現任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部長的布勃諾夫 (Andrei Sergeievitch Bubnov) 曾經辦理過「紅軍」的教育事業，使其中的文盲人數降到了百分之左右。

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區巴耳 (V. V. Chubar) 本是機匠，在一九〇七年入黨。

「政治部」候補委員埃依凱 (Robert Indrikhovich Eikhe) 曾經做過僱農，輪船上的火伕，礦工，和鎖匠。亞美尼亞人米高揚 (Anastasi Ivanovitch Mikoyan) 現任「政治部」委員兼糧食工業人民委員，則是

底弗利斯的一個勞工的兒子。蘇聯原是一個工人的國家，所以使國家工作的便是工人。

再看一看前任「政治部」正式委員，現任候補委員的盧祖塔克 (Y. B. Rudzutak) ——他是拉的維亞 (Latvia) 的一個農工的兒子，曾在機器廠裏做過工匠。

在一九〇四年就入黨的普斯蒂雪夫 (P. P. Postshayev) 現在也是「政治部」的一個候補委員，其本業則是電氣工匠。

烏克蘭的黨魁柯西奧 (Stanislav Kosior) 本是一個體力勞動者。

現任列寧格勒黨部首領的柴達諾夫 (Andrei Alexandrovich Zhdanov) 是一個小學教員的兒子，生於一八九六年，一九一五年入黨，最近人們說，他將來或許會做史丹林的繼承者。

最後我們還得提到「五年計劃」的幕後主持人，前任「全國設計委員會」主席梅士勞克 (V. I. Mezhlank)，及其第一個助手，漂亮的經濟學者和組織家，與辛斯基 (V. V. Osinski)。他們雖然尚未進入「政治部」，但都是蘇聯極重要的人物——尤其是梅士勞克。在一九三七年二月間，與左尼基士死後，就由梅士勞克擔任了「重工業人民委員」之職。

九 格柏烏——政治警察

關於蘇聯的「格柏烏」(G. P. U. 政治警察部，即密探機關)，已有人寫了大批無聊的東西。當然，在蘇聯的演進中，恐怖行動擔任着重要的職務，而格柏烏是執行的機關。史丹林會以確切的話，對格柏烏的機能下定義說：「格柏烏是蘇維埃政府的懲戒機關；牠跟法國大革命時的『公安委員會』多少有幾分相似。牠首先要懲辦間諜、陰謀作亂者、恐怖分子、匪徒、投機家以及偽造貨幣者。其性質有幾分像一軍事政治裁判所，其宗旨在保護革命的權益，抵禦反革命的『蒲爾喬』及其奸細的攻擊」——見列寧主義第一卷第四一九頁。

請注意，格柏烏不但有逮捕的權力，且如史丹林所承認，也有懲辦的權力。牠一身兼有審判官、陪審官、和行刑吏的職權。且如費雪 (Fischer) 所說，牠擁有的權利和特權，為蘇聯其他機關所不及，有時且濫用其特權。

但在另一方面，格柏烏並非純粹是一種政治警察。人們大多只聽到關於牠那些驚心動魄的行動的故事。其實牠所幹的事，不僅是做暗探和槍斃奸細而已。格柏烏共有二十萬左右幹練的人員，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紅軍」的一種優秀幹部；牠擔任着駐防邊疆，巡邏鐵道等事。真正從事於暗探工作的，大概不到全體人員的百分之五。

俄國的恐怖行動，誠如布爾雪維克黨人所說，是具有社會目的的。與其冒着反革命的危險——這樣的事發生時，將殺死無數萬人，且或將消滅「蘇維埃」的實驗——不如先殺死少數人，即使偶有幾個冤枉的也無妨。俄國人含有不少東方人的氣質；對於個人的生命的價值是不很重視的。而且我們不該忘記，布爾雪維克黨人已由「巴黎公社」得到了一種可怕的教訓：當時有三萬公社中人為反動派所慘殺。

假使你並非一九三二年前的富農或今日的顯著的反革命分子，格柏烏不會來怎樣注意你。在許多場合，共產黨員比非黨員更畏懼格柏烏。牠監察黨內的同志，審核其一切思想和言行，比對於黨外的守法的普通公民更嚴。不過你如果是一個「被判處死刑的階級」中人——那你就該倒霉了。

格柏烏的第一任部長，是列寧的一個好友，名叫詹爾辛斯基（Dzerzhinsky），是一個極有才幹而在熱的波蘭人。他具有神祕的警察天才，可稱為近代一個特出的怪人。他死後，為一比較平凡的人，曼辛斯基（Menzhinsky），所繼任。曼辛斯基死後，繼任者為耶戈達（G. G. Yagoda），這是一個腐化而毫無顧忌的野心家和暗中操縱者。已在一九三七年為史丹林所撤職。（按：已於一九三八年三月鎗斃）他的繼任者葉左夫（Yashov），是史丹林

的一個最親近的同事。

在耶戈達主持的時期，格柏烏使蘇聯的黨政當局很感到一點麻煩。格柏烏愚蠢地逮捕外國工程師，妄殺被控「怠工」的俄國教授和知識分子，使世界輿論大為震驚。格柏烏歷多年之久，沒有發覺一個著名間諜的活動——這間諜名叫郭拿爾（Korner），是波蘭人，他竟做了蘇聯的「農業人民副委員」。因而史丹林決意滅創格柏烏的權力。一九三四年七月十日，牠被改組了，職權上受了許多限制；格柏烏這名字消滅了；牠不能再不經審判手續而執行死刑；牠的名稱改成了「內務人民委員會」。

六個月後，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史丹林最好的朋友基洛夫（Sergei Mironovitch Kirov）「政治部」委員兼列寧格勒黨魁，被一個共產黨刺客行刺射殺了——這是一九一八年解伯蘭（Fanny Kaplan）槍擊列寧以後的第一件行刺或暗殺共產黨要人的案件。此舉給了格柏烏一個重整旗鼓的機會。

史丹林得到了消息，立即就趁火車到列寧格勒去。伏洛希洛夫陪伴着他。莫斯科非常驚恐。蘇聯的神經受着了打擊。不久就發現，暗殺基洛夫的刺客並不是「白黨」，卻是一個年青的共產黨員，名叫尼古拉伊夫（Leonid Ni Kolaiyev）。列寧格勒的格柏烏負責人員，因有疎忽之罪，就被監禁了起來。兇手尼古拉伊夫經審判後，跟十三個同謀犯一同被槍斃了。

暗殺基洛夫的原因很複雜——有私人的，也有政治上的。在共產黨有一次清黨時，尼古拉伊夫被開除了黨籍；經過了不多時候，他又重新入黨。他是一個理論家，急進分子，似乎曾經熱烈地反對那些正在日益發展的「社

會主義的不平等。」而且他跟基洛夫還有私人間的齟齬；後者似乎曾經答應他，替他謀一個較好的差使，但沒有實踐其言。

基洛夫是一個非常人。他在嬰兒時代，就失去了母親，據說是吃母豬的奶養大的。他生於一八八六年，長於一孤兒院中，入黨於一九〇四年，革命後變成了史丹林的一個親信，他受命肅清列寧格勒的齊諾維夫派，正如嘉加諾維支掃除莫斯科的托洛斯基派一樣。他很嚴厲、精悍、莊重、機警、醜陋、勇敢——是一個偉大的領導者，他的死亡使黨內減少了一員大將。

基洛夫被刺後，政治警察又活躍起來了。牠的名義雖已改為「內務人民委員會」，但其精神卻與舊日的格柏烏無異。除了上述尼古拉伊夫的十三個同謀犯之外，又有一百零三人被處了死刑。這一百零三人與基洛夫的被刺並無關係，但也並非如有些人所說，是在街道上隨便捉來的無辜男女。在基洛夫被暗殺時，他們都已被監禁在牢裏，其罪狀不一：自陰謀暗殺史丹林直到為外國政府作偵探為止，總而言之多少都犯了一些刑事罪。

接着，史丹林就解散了「老布爾雪維克黨人協會」，這團體是列寧的朋友們在一九二二年創立的，其中的會員都是黨內的元老，在革命運動中有十八年以上的歷史。這些老布爾雪維克黨人，所謂「急進分子」，使史丹林感到很討厭。基洛夫的被刺是一個極好的口實，史丹林利用國內人心的驚恐，就採用嚴峻的辦法來肅清舊怨。於是跟他意見不合的老共產黨員齊諾維夫（Zinoviev）和加米納夫（Kamenev）就被捕了，理由是基洛夫被刺案中的同謀犯。

十 繼任史丹林問題

基洛夫本來是史丹林正在將他訓練爲自己的繼任者的人。現在他死了，繼任者似乎只好在嘉加諾維支、伏洛希洛夫、和莫洛托夫三人中挑選一人了。這三個候補者都不能使人滿意。嘉加諾維支是猶太人，伏洛希洛夫的事業範圍太狹隘，莫洛托夫的名望還不夠大。

假如史丹林死了，接管他的職務的將是全黨而不是某一個人。像列寧逝世後發生過的那種私人爭鬪，固然極有重行發生的可能，但決不會破壞該黨的統治的。共產黨的紀律很嚴，對於較大的問題全黨是意見一致的。在蘇聯看不到像德國的戈林那樣的一個候補者，原因是一個顯然有野心的人在蘇聯是不能升到非常顯要的地位的。黨使一切趨於平等。史丹林之死對於蘇聯的影響，決不會甚於列寧之死使牠所受的影響。「蘇維埃」政權將繼續存在。

第三十七章 蘇聯叛國案

一 叛國真相

自一九三六年八月起，蘇聯接二連三地開審叛國案，以致西方各國的人士都弄得莫明其妙，甚至於嚇得目瞪口呆。齊諾維夫、加米納夫等老共產黨員都經審判而被鎗決了；還有像批亞太珂夫（Pyatakov）那樣重要的副人民委員長，以及像杜嘉契夫斯基（Tukachevsky）那樣的將軍，也如此——杜嘉契夫斯基一向被認為是蘇聯的第二位重要軍人。難使人相信的，非常驚人的情節傳佈了出來：說托洛斯基正在和希特勒談判；說拉狄克（Radek）和索柯爾尼柯夫（Sokolnikov）等十分著名的領導人物，曾陰謀推翻史丹林的政府；說會將其一生貢獻於「紅軍」的將軍們，竟將自己賣給了德國和日本。證實有罪的陰謀者，都立即被處了死刑。對於這些案件，蘇聯的同情者似乎只能在兩個同等不愉快的解釋中選取其一：（甲）反對史丹林的勢力實際上比人們所想像的厲害得多，已深入軍隊及政府的中心；或（乙）史丹林是一個殘忍的殺人犯，竟用近代最可怖的誣陷手段來除去托洛斯基派或其他的反對者。

讓我們首先將若干「神話」加以攷除。有一種謠言說，史丹林正害着一種無可藥救的重病，他要在未死之

前撲滅殘餘的反對派；另一種「報告」說，他已突然發瘋了。這樣的無稽之談是不值一駁的。又有人說，那些被告受着酷刑，被施着催眠術，被用藥物麻醉着，使他們作虛妄的供認；還有一種更妙的說法，竟說他們是莫斯科藝術劇場的演員假扮的！不過我們知道，這些審判是在預審終結後立即舉行的，而且是在公開的法庭中，當着成千成百的見證——其中有不少經驗豐富的新聞記者——舉行的。那些被告會聲明，在預審期間，他們受得待遇很好。拉狄克甚至說，倒是他虐待了檢察官：一個月又一個月地延宕下去，不肯供認。壓力——全世界的警察機關在預審時普遍使用的那種壓力，當然是用的，但並沒有使用酷刑的證據。

據托洛斯基派說，這些案件是大規模的誣陷行為。他們說，那些被告曾經得到在判決後特赦的諾言——如果他們坦白地陳述的話——因而供認了；不料他們受了欺騙，終於被鎗斃了。我們只要將那些供詞細讀一遍，就很難相信這話。無論如何，在第一案審判時是決不會有這樣的事的，因為這時那些被告一定已知道：第一案的被告們雖然都供認了，但還是被處了死刑的。

我們應得記着，史丹林並不是獸子。他不會歡迎這些案件的。他由這些案件得不到什麼好處；他只由此得到了一種責任——消滅叛國的陰謀。照國外一般人的看法，這些案件對於他的聲威是一種災害，對於他的對外政策是一種嚴重的妨礙。正當蘇聯需要更強的時候，叛國案卻削弱了蘇聯的聲勢。

無論第一案或第二案中的任何被告，如果他是被誣陷或誣告的，儘可以在公開的法庭中將其情節大聲地說出來。有好幾十個新聞記者在旁聽着。這些被告明知道他們的命運已決定了。假使是冤枉的，他們很可以奮鬥

一下。

有一個要點，我們應得記在心中，那就是蘇聯的審判手續上的特異處。蘇聯跟英美的審判手續大不相同，卻與法國的制度有幾分相似：其真正的「審訊」——決定有罪與否——乃在預審時行之，而最後的庭訊則以決定應判處什麼刑罰為主。在蘇聯，一個囚犯在尚未供認犯罪以前，是不解到正式法庭上去「受審」的。在蘇聯的審判手續範圍之內，這些叛國案的審判進行得十分公正。那些被告有法庭的答辯權利；他們有反覆質問各證人的特權；他們以極大的生氣和自由談論着。法庭的態度雖然嚴厲，但並不威壓。起訴的檢察官維辛斯基（A. V. Vyshinsky），在一番審結演詞中雖極猛烈，但在聽取口供之際，他是相當體恤那些被告的。例如：

維辛斯基：被告批亞太珂夫，你或許乏了吧。

批亞太珂夫：不，我還能繼續下去。

庭長：我提議延至三點鐘閉庭。

維辛斯基：我並不反對，但這對於被告或許太吃力了？

批亞太珂夫：延長多少時候？

庭長：五十分鐘。

於是維辛斯基就繼續訊問了。

無論第一案或第二案的被告供詞，都使旁觀者疑惑不解，因為他們覺得有二點似乎是不可思議的：(甲)像拉狄克、索柯爾尼柯夫、史米諾夫 (Sminov)、綏萊勃里亞珂夫 (Serebryakov) 等這樣的人物，怎麼竟會做賣國賊；(乙)他們怎麼毫不掙扎，竟這樣馴順地服了罪。關於第一點，且待以後細說。至於第二點呢，那些被告是曾經掙扎過的。他們在預審期中一直掙扎着。英國的法學家兼國會議員普里德 (Denis Pritt) 曾經指點出來：齊諾維夫和加米納夫如何勉強地，一點一點地屈服，遷延了一年以上，直到最後提出了無可爭辯的證據來，才完全屈服而供認不諱。拉狄克堅持了兩個半月。莫拉洛夫 (Murlov) —— 一個老托洛斯基派 —— 堅持了八個月。拉狄克會這樣說他：「我本來深信他寧願死在獄裏，不願說出一句話來的。」

國外一般的印象，以為那些被告都敘述着同一的故事，以為他們是沮喪而卑躬屈膝的，以為他們在檢察官的筆下馴順得像綿羊——其實這種印象是不十分正確的。他們曾頑強地與檢察官辯論；在大體上，他們所說出來的，都是被逼得不能不說出來的話；他們時常彼此互相爭論。鮑古斯拉夫斯基 (Boguslavsky) 曾說到他如何「畏懼並厭惡」拉狄克。莫拉洛夫則駁斥另一被告的供詞。無論在拉狄克的或莫拉洛夫的最後一番申辯中，都沒有一點沮喪的痕跡。

沒有一個公正的人能夠讀了逐字記錄的第二案審判報告書而仍舊相信那些供詞是捏造出來的。無論什麼技巧，無論什麼機智，都不能根據着一批虛偽的供詞創造出這麼密切地連貫着的一部五百七十九頁的報告書來。其中的情節配合攏來，好像一種顏色鮮明的，錯綜複雜的鑲嵌細工 (Mosaic)；他們可以造成一座跟一道橋

一樣堅實的建築物。將這些供詞從頭至尾讀了一遍，只能得到這一個結論：那些被告所以供認，只是因為他們的確犯了罪。（在供認之際，他們或許也希望藉此減輕其應受的刑罰。）

二 第一案

第一案的被告，以齊諾維夫、加米納夫和史米諾夫三老黨員為主，於一九三六年八月九日開始審判。承審機關為最高法院的軍事法庭，以烏利區（V. V. Ulrich）為首席推事，維辛斯基為檢察官。那些被告被控在列寧格勒組織一恐怖主義的「中心」，受托洛斯基的教唆，致力於反革命和反蘇聯的陰謀，計劃暗殺史丹林及其他領袖，並積極縱容基洛夫的被刺。十六個被告都被證實有罪，被處了死刑。

這番審判的最高點為齊諾維夫的受審：

維辛斯基：統一的中心是什麼時候組織的？

齊諾維夫：一九三二年夏天。

維辛斯基：牠作些什麼活動。

齊諾維夫：其主要活動是為恐怖行動作準備。

維辛斯基：對誰作恐怖行動？

齊諾維夫：對那些領袖。

維辛斯基：這是說，對史丹林、伏洛希洛夫、嘉加諾維支諸同志組織基洛夫同志暗殺事件的，是你們的中心嗎？暗殺基洛夫的密謀，是你們的中心組織的，還是別的什麼團體組織的？

齊諾維夫：是的，是我們的中心。

維辛斯基：在這中心中，有你加米納夫、史米諾夫、毛拉契珂夫斯基（Mirchikovsky）和泰·伐根揚（Tar-Vagan）嗎？

齊諾維夫：是的。

維辛斯基：那末是你們大家組織了暗殺基洛夫的事件？

齊諾維夫：是的。

維辛斯基：那末是你們大家暗殺了基洛夫同志？

齊諾維夫：是的。

維辛斯基：坐下吧。

本案——不是第二案——引起了托洛斯基派的最猛烈的攻擊，說是「誣陷。」就拿其中的一點來說，的確有點奇怪：那個「中心」是在一九三二年組織的，而基洛夫被刺則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而本案的審判則直到一九三六年纔舉行。齊諾維夫和加米納夫曾在暗殺案發生後被捕而判處流刑，後來又被召來，再被捕，再受審。

而那些供詞——這還沒有詳盡的英譯文——也含有若干顯著的矛盾。例如史米諾夫在一九三三年明明被關在監牢裏，而人家卻說他在這一時期參預那個「中心」的陰謀；關於另一被告的偽造的宏都拉斯（Bonduras）護照，似乎也有相當疑問；還有一個被告，霍爾茨曼（Holtmann），供稱曾在一九三二年與托洛斯基的兒子塞度夫（Sedov）在哥本海琴（Copenhagen——丹麥京城）的勃列斯托旅館（Hotel Bristol）中會面，可是事實上哥本海琴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旅館。據塞度夫說，他生平從未到過哥本海琴。

三 第二案

更能使人信服的第二案，乃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三十日開庭審判，承審機關及檢察官與前案同；其詳盡審判記錄，現已譯成多種外國文。本案被告共十七人，其中有重工業副人民委員批亞太珂夫，外交副人民委員索柯爾尼柯夫，鐵道副人民委員李夫雪茨（N. A. Livshits），以及拉狄克、莫拉洛夫、綏茲勃里亞珂夫等著名的「老派」共產黨人（托洛斯基派）。十七個被告，有十三個被判處死刑而鎗斃了；索柯爾尼柯夫和拉狄克得了十年徒刑（拉狄克藉其最後一番異常動人的申辯保全了自己的生命）；還有兩個獸子亞諾爾特（Arnold）——這是一個很古怪的人物，彷彿是美國滑稽明星「馬克斯四弟兄」與高爾基的下層中的人物的混和物）及史屈勞洛夫（Stolov），則得了更輕的刑罰。

本案的起訴範圍比第一案廣泛得多。被告們被控怠工和破壞，將重要軍事情報出售與日本及德國，陰謀暗

殺莫洛托夫及其他政府要員，並與德國及日本共謀推翻史丹林政府，以起事時該兩國不加干涉為條件，尤於奪得蘇聯政權後將烏克蘭割讓給德國而將沿海州割讓給日本。這真是再駭人聽聞也沒有的事了，而且初聽時似乎極難置信的事。

在審判進行之際，真相纔逐漸顯露了出來：最初是批亞太珂夫——曾經度過長期的反對派逃亡生活的一個托洛斯基派——在一九三一年祕密地與托洛斯基的兒子塞度夫在柏林相會見。塞度夫將批亞太珂夫探聽了出來；於是批亞太珂夫回到蘇聯去，以極端迂緩和隱秘，非常謹慎地跟拉狄克、索柯爾尼柯夫等人通信。慢慢地就組成了一個「平行中心」或「後備中心」——其工作最初是陰謀，後來是恐怖行動——以作齊諾維夫的「中心」的後盾，如果齊諾維夫等人被破獲而失敗了，就繼續其工作。

檢察官維辛斯基竭力要探問出來，那些陰謀分子究竟如何對自夥中人揭露其真面目？

維辛斯基：拉泰恰克（Raichak）怎麼會對你揭露他的真面目呢？

批亞太珂夫：曾經有兩個人對我說起過……

維辛斯基：是他對你揭露了真面目呢，還是你對他揭露了真面目？

批亞太珂夫：或許雙方都揭露了真面目。

維辛斯基：是你先揭露了真面目嗎？

批亞太珂夫：誰先揭露，是他還是我——先有母雞還是先有雞蛋——我不知道。

維辛斯基又竭力想強迫拉狄克，將他們一夥中人的相互關係都說出點來。

維辛斯基：你這些行動是經過一番熟慮後而做出來的嗎？

拉狄克：除了睡覺以外，我生平從來沒有做過未經深思熟慮的事。

維辛斯基：而這些，不幸並不是一場夢？

拉狄克：不幸並不是一場夢。

有幾個參加陰謀的人，當陰謀逐漸加緊化而發展起來的時候，似乎對自己所擔任的任務感到非常苦惱。例

如索柯爾尼柯夫：

「想想看！我正在外交人民委員會中進行正式的談判。談判告了一個結束。譯員們都走了某國的正式代表×××先生，突然轉過身來問我：我知不知道托洛斯基向他的政府提出的建議……托洛斯基如何使這具體化？你想，身爲『副人民委員』的我，怎能作這種談判？這是一種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托洛斯基，據那些供詞所說，乃是這種陰謀的心臟和靈魂。他將信札隱藏在書籍或皮鞋裏，寄給拉狄克；有一個居間人是莫斯科新聞報（Izvestia），以前的華盛頓通訊員，魯姆（Vladimir Rumm），這人據說是在巴黎遇見托洛斯基的。批亞太珂夫自稱曾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祕密地由柏林坐飛機往挪威京城，與托洛斯基晤面。

但托洛斯基在墨西哥受「杜威委員會」假審時卻矢口否認會遇見魯姆或會與批亞太珂夫晤面。他堅稱魯姆在巴黎時，他（托洛斯基）並不在那邊。究竟誰是誰非，自然很成問題；不過我們應得注意，托洛斯基在其對「杜威委員會」所作的「供詞」中會說：政治家在現代社會中，有時候不能將全部的事實說出來。「無論什麼人，時常被逼得不能說實話」，他曾經這樣承認過。

批亞太珂夫曾在其供詞中吐露，蘇聯境外的托洛斯基運動如何籌措其經費。例如，批亞太珂夫以重工業副人民委員的資格向德國的廠家定購機器時，故意叫他們把價格開得比尋常高一點，而將此額外貨款交給塞度夫等托洛斯基派。但批亞太珂夫又說，這種計劃並不是「純然爲了托洛斯基的美麗的眼睛」而推行的。

在這次審判中，常常提到托洛斯基跟德國法西斯主義者的密切關係。這似乎是不能置信的事；但在那些供詞中，說起希特勒的第一個助手——奚斯（Rudolf Hess）——做德國的談判代表，竟不下六次之多。法庭方面非常留意，不讓有礙邦交的情節在公開審訊時提出來。那些被告屢次因提及外國人的名字而受斥責。拉狄克有一次會在公開庭中提到某一外人的名字，因而受庭長警告，如果再如此將改開秘密庭審訊他。經拉狄克鄭重謝罪，並應允下次再不提起這人名後，審判纔繼續進行。（在後來發表的審判記錄上，這人名是被刪去的。）

陰謀的計劃逐漸推行起來了——雖然不很得力。忘工事件果然時有發生。火車被破壞了，兵士被殺死了。那些被告供認出來的事，有許多使人聽了毛髮悚然。鐵路上的職員故意延宕裝貨，破壞貨車的行車時刻，讓許多火車停頓着，（主要的火車破壞者克尼亞柴夫（Krygav）供認會由一個日本間諜那裏得到一萬五千盧布）許

多工程師故意燒壞化學品製造廠裏的鍋爐並在礦山中怠工；有一個被告雪斯托夫（Stetsov）述說他如何命人殺死一個忠實的官員，因為這官員疑心到煤業中有怠工的情事。

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夏季以後，那些陰謀分子的熱誠卻逐漸消失了。因為據拉狄克說，托洛斯基自己也發覺了，他們是不能用這些手段來打倒史丹林的。拉狄克以極其動人的言辭，述說他如何逐漸感到自己和他的同事們已幹了一樁可怖的錯事。他細想該怎麼辦。那些陰謀分子要彼此會面是非常困難的；在整個期間，拉狄克、亞太珂夫和索柯爾尼柯夫實際上彼此只晤談了兩三次。最後拉狄克決定了一個辦法。

維辛斯基：你決定怎麼辦呢？

拉狄克：第一步是應該到本黨中央委員會去自首，將事實陳述一遍，把所有的人名都說出來。可是我並沒有這樣做。我沒有到政治警察部去，倒是政治警察部來找我的。

維辛斯基：真是一個漂亮的答案！

拉狄克：一個悲慘的答案！

本案的口供也有其弱點，這是無庸否認或掩飾的。例如檢察官屢次追述基洛夫被刺案，但他始終不能使拉狄克或索柯爾尼柯夫承認他們跟該案有絲毫關係或是知情的。還有，我們很可以問：那些陰謀分子既有好幾年的工夫來幹，怎麼還是這樣的不得力，不中用？——除了終究無關大局的怠工事件以外，他們沒有成就多少事。他

們企圖暗殺莫洛托夫的罪狀，聽起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不過主持這事的人是亞諾爾特，正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物。

而且，真憑實據非常少。最好的證據當然是托洛斯基寄給拉狄克的信。但拉狄克說，他已將這些信焚燬了。（爲謹慎起見，他當然該焚燬牠們的。）

假定那些供詞都是實在話——這是沒有多少可疑的——我們可以製成這樣的一種「學說」來解釋這些叛國案：

（一）第一案和第二案中的重要被告，都是齊諾維夫派或托洛斯基派。拉狄克、批亞太珂夫、索柯爾尼柯夫、萊勃里亞珂夫，都是有多年歷史的托派。拉狄克於一九二三年加入托洛斯基派，後來就逃亡在外，直到一九二九年纔取消其政見，一九三〇年纔得恢復其黨籍。他們對於史丹林的反對，是根深蒂固而無法克服的；他們是徹骨的托洛斯基派；當他們看到情形不佳（照他們的看法而言）的時候，他們自然又回到他們舊日的領袖那裏去了。

（二）還有一層，這些老革命家不但是托洛斯基派，因而跟史丹林意見不合，而且他們都是天生的陰謀家，是在陰謀的環境中生長起來的。他們從小就呼吸着詭計與反詭計的空氣。他們飛黃騰達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史丹林所需要的是工程師和治理人員；他們自然要惹人嫌惡。而在蘇聯境內，我們得記着，不滿意的情緒是只能用陰謀來表現的。因而拉狄克等就不能放棄其陰謀了。

(三) 托洛斯基派——至少在蘇聯境外——絕沒有企圖掩飾其對於史丹林政府的劇烈憎恨。他們是超越於「布爾喬」的愛國思想之上的。俄羅斯已不是「他們的」國家了。他們是世界革命家，他們已不把蘇聯看作一個革命的或共產主義的國家。他們與德國日本抱着同一的目的：推翻史丹林的政權。史丹林是他們的仇敵，正如希特勒一樣。他們甚至於願與希特勒攜手合作，以達其最高的目的——消滅史丹林。

(四) 拉狄克等人在其供詞中屢次說起——這是本案的中心起因——他們覺得一九三三年或一九三四年必然將發生國際戰爭，而蘇聯必然將被擊敗。他們以為形勢非常不利，當危機來到時，蘇聯必然將滅亡。所以，身為世界革命家的他們，認為他們應該著手工作，預先組成一種不會被戰爭消滅的祕密組織，使革命的共產主義不致全盤滅亡。而且當戰爭爆發時，他們自己也有機會可以取得蘇聯的政權，所以他們自然要設法買通德國，買通日本了。

(五) 對於拉狄克及其在國內的朋友們是如此。至於在國外的托洛斯基呢，反對托氏的人大概還可以加上這兩個原因：(甲) 托洛斯基切望德國發動反蘇聯的戰爭，而且他希望蘇聯戰敗，所以他要用心手段來削弱他；(乙) 他的野心極大，希冀執政的慾望非常熱烈，以致他甘心將烏克蘭和沿海州送給別國，作為他取得政權的代價。他們應得記着，托洛斯基在大戰時反對沙皇，正跟他現在反對史丹林一樣猛烈；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回國時，是得了德國人的助力，坐着德國的鐵篷車通過德國的；而簽訂對德和約，將俄國一大塊領土送給德國的，也是托洛斯基。

(六)最後——這一層也非常重要——這些案件或許會被利用來聳動蘇聯民衆的聽聞。這也是很可能的事。政府或許故意誇張那些被告的罪狀，使問題趨於簡單化。如推翻蘇聯的「資本主義」，瓜分蘇聯等罪狀，或許是故意加在起訴書中以加重那些陰謀分子的罪狀的。史丹林渴想一舉肅清那些托洛斯基派，他們既已落在他的手中，他當然要儘量將此事辦得一乾二淨。說到完來，托洛斯基的目的還不是要消滅他嗎？

四 第三案

第三件叛國案，被告是八位將軍，性質與前兩案稍有不同；審判是祕密舉行的，那些口供現在還沒有發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發表的佈告，只說有八個「紅軍」高級軍官，連年青的杜嘉契夫斯基元帥在內，因有叛國行為而被捕，經審判後，立即就槍斃了。這八人中，有前任蘇聯駐德及駐英使館陸軍武官普特拿將軍（General Putna）——此人曾在第二案中，被稱為陰謀分子之一，列寧格勒軍區司令雅基爾將軍（General Yakir），前任白俄羅斯共和國司令烏鮑羅維支將軍（General Ubovitch），奧索亞維亞基（Osotvialkin）的首領歐特曼將軍（General Eitmann），及參謀本部人事課主任費爾特曼將軍（General Feldman）。這些將軍都被控與德國、日本發生賣國的關係，擬在發生戰事時出賣「紅軍」。

這事驚動了全世界的輿論。像杜嘉契夫斯基那樣的人，會將其一生全部貢獻給保衛蘇聯的，竟會犯陰謀使蘇聯敗北的罪——這似乎是難以相信的事。杜嘉契夫斯基年僅四十四，在革命和軍事上有過輝煌的功績；他本

是蘇聯的一位大英雄。齊諾維夫和加米納夫等意見不合的野心家，因為失勢了，也許會幹叛國的勾當；但杜嘉契夫斯基和雅基爾等八個少壯軍人，卻完全是另一回事。許多蘇聯的同情者，即使接受了前兩件叛國案，對於這第三案卻覺得難以囫圇吞下去。

但是在可能範圍內努力調查，卻發現了許多啓迪人的情節。聰明而有大志的杜嘉契夫斯基，想爲自己取得政權；據說他和伏洛希洛夫感情很不好；軍界中的人士都相信，杜嘉契夫斯基預備發動一「逼宮」式的政變，將史丹林除去而自立爲「獨裁者」。可是史丹林卻先發制人……

這八位將軍有一個時期都跟德國的國防軍發生過密切關係。我們得記着，在一九三二年以前，「紅軍」是與德國的陸軍親密地合作的；每年有俄國軍官被派到德國去受訓練並學習；即在希特勒登臺以後，兩國的參謀本部彼此仍舊相當敬愛。考克（Kohl）和費爾特曼兩將軍，是生於波羅的海諸省的德國人，他們的姓氏還是德國人的姓氏；烏鮑羅維支將軍去年曾去參觀國社黨大會後舉行的德軍大演習；考克和普特拿兩人，都做過駐德使館的陸軍武官。普特拿的活動，曾在第二案審判時被人揭破。

很少人相信杜嘉契夫斯基竟會出賣給德國，或應允於發生戰事時使他自己的軍隊敗北；但他或許會撇開了史丹林，跟「國防軍」訂有某種密約；這卻是很可能的事。他要「紅軍」和德國的軍隊合作；政治卻不准他如此。許多人知道他是反對「法蘇互助條約」的人；法國人很不信任他。有一種說法是，「國防軍」打算推倒希特勒，正如杜嘉契夫斯基要推倒史丹林一樣；兩國的陸軍議定在起事時彼此都不加干涉。

五 叛國案的反響

這些案件是很觸目而毫不可喜的「插曲」隨之而來的，是一種普及全國的肅清運動；成千成百的大小官吏，被控犯怠工之罪，被追究到了，就被判處流刑或死刑。許多顯要的人物，例如迦馬尼克元帥（Marshal Gamarnik），都自殺了。彷彿恐怖政策又在俄國流行起來了。這些案件很明白地表示着：蘇聯內部的情形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平靜。

但在另一方面，蘇聯的一萬七千萬人民，大多數卻並沒有爲這些案件所轟動；一般平民並不怎樣注意牠們。紐約時報的通訊員哈洛特·鄧尼（Harold Denny）對這一點提供了有趣的證據。那些被告終究多數是托洛斯基派，並沒有多大勢力的，他們能在蘇聯供職，本是出於寬容。黨的堅實組織並沒有被動搖。例如，描述史丹林周圍的人物，即在蘇聯真正有勢力的人物的上一章，我是在一九三五年寫成的可是在其中，後來受審判的那些人——除拉狄克外——竟一個也沒有提及。還有，喪失了八個將軍固然是可惜的事，但蘇聯一共有四百左右將軍呢。史丹林敢予軍界中人以打擊，這也可見他的難以克服了。沒有其他的獨裁者做過這樣的事。這些案件雖然是一種災難，但牠們並沒有予蘇聯以嚴重的損傷。史丹林雖然受了一些震動，但他立刻就恢復了原狀。

第三十八章 蘇聯現狀

「給我四年的工夫來教導兒童，那末我所播的種子就永不曾給人捉去了。」

——列寧。

一 俄羅斯特徵

人們所最不贊成的蘇聯的事物，大抵是俄國的特色，而並非共產主義的特色——例如殘忍、遲鈍、技術的粗放、祕密偵探、官僚習氣、污穢不潔、文化落後、效能缺乏等。你如拿巴特克 (Brodetsky) 所著一九一四年出版的俄羅斯 (Russia) 一書來讀一下，就覺得很有趣。你在其中可以看到，那時你也得把你的護照留在警察局裏，而當你要離開俄國時就得去領一張出境通行證。共產黨人已盡力將沾污俄國生活的這些可厭的、麻煩的事物消除了一部分。但那些黨國要人即使用盡全身之力，顯然仍不能使莫斯科任何旅館中的茶房——或其電話——很靈活。現已逝世的英國國會議員懷埃斯 (Harold Wilson) 有一次到蘇聯去旅行，他帶回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回來：他去參觀蘇聯最高電氣局的總辦事處，卻發現門口的電鈴旁標着「電鈴已壞」四字。許多共產黨人很失望，因為馬克 斯竟在俄國受其第一次甄別試驗，而資本論第一次譯成具體的文字竟是這麼可怕地艱難的俄文。

我在離別了七年之後，於一九三五年夏天重遊莫斯科。愚蠢的官僚將我的通行證扣留了好些時候。電話似乎全部出了毛病，無論我要打到那裏都打不通。（不過這也許是我的過失，因為我不會說俄國話。）上一節所說的那些壞話，時常在我的心中盤旋。我看到了不少的粗陋不潔和混亂。但這些都是無足輕重的小毛病。無論在一九二八年或一九三五年，莫斯科都是歐洲大陸上最清新的城市。

無論那一個外國人，在離別了若干年以後再到俄國去，一定都可以看到我所注意到的事物。第一，生活程度已提高了不少。不用說，跟西方各國比起來，這種生活程度還是要算很低的，但一九二八年以來的進步卻是很觸目——雖然有「五年計劃」的艱苦會在中間作梗。人們身上穿的衣服更好了；店舖裏的貨色更多了；食品也更好，更豐富了；街道上有許多汽車——而且還有交通燈。在一九二八年，莫斯科街道上難得看見汽車的。自一九二八年以來，高爾基汽車製造廠已製成了十萬輛左右的福特式汽車，在各處行駛着。

第二，不但在人民的外貌上，就是在他們的精神上，也可以看到一種進步。文化公園中充滿着青年男女，身上穿着漂亮的衣服，臉色也比一九二八年時更為快活了，大家都起勁地活潑地在這範圍極大的公園中實驗各種娛樂方法。其中最受人歡迎的三種展覽是：（1）飛行傘跳躍，（2）催淚彈實驗室，（3）硬木板的小跳舞場，在那裏青年團員每人化一個盧布，就可可在其中學習各種「西洋」跳舞。有一次我在文化公園中看他們在露天上演卡門（Carman）一劇，觀衆有二萬人之多，劇中用着十八匹活馬和一頭死牛——這空前的實驗在演員和觀衆之間引起了極愉快的融洽，我生平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情景。

第三，一般人都感覺到，純屬革命方面的蘇聯活動正在鬆弛下去。革命已完畢了。現政權很穩定。我有一個消息靈通的朋友會說，蘇聯已變成了世界上最沉悶的地方；一切都按詳盡地規定，組織好，計劃定當，因而一切都可以預料得到；牠切開、晒乾、包紮整齊，好像一隻布包的火腿。

第四點跟上述的一點密切地關連着就是，蘇聯逐漸在俄國人的心目中變成了一個「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我們應該記着，俄國在革命以後所採取的正式名字是 U. S. S. R.——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這名字含着很深長的「向心力的」意義，意思就是說，將來有擴張至現在領土之外與別國合併的可能性。但目前的勢力日益變成了「離心力的」。蘇聯正在被逼得不能不靠自己。「紅軍」在將來也許會為國際無產階級而戰，但首先須保衛的卻是蘇聯——俄羅斯人的「祖國」。在十年前，「愛國」一詞在蘇聯是沒有立足餘地的。現在，這個名詞也流行起來了。就是共產黨的機關報真理報(Pravda)上，也時常登載着以「俄羅斯母親」(Mother Russia)為主題的社論。

第五，沒有一個人能否認蘇維埃——或俄羅斯——的適存能力。關於蘇聯，我們現在應該認識的最重要的一點，或許是牠乃是唯一已經渡過一個極大的內部危機的現代獨裁國家。無論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都還沒有見過這樣的危機。蘇聯的危機——農民對於集體化的反抗——雖然是自己招致的，但其嚴重性並不因此而減少。蘇聯已渡過了十七年可怖的歲月。雖有內戰，雖有兩場大飢荒，但其人口卻比一九一八年增加了二千三百萬。現在的增加率為每年三百萬左右；換言之，再過十年，蘇聯在其目前的領域內就將有二萬萬人民了。

二 五年計劃

所謂「五年計劃」並不是一個以五年為期的計劃。這是小覷了牠。我在前幾章中屢次提及「五年計劃」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牠究竟含着些什麼意義，牠是怎樣實行的。事實是，蘇聯的全部經濟是用計劃來加以規定的，直到無限之遠；計劃原來只有連續不斷的一個，不過為方便起見，纔分成了若干以五年為期的計劃。

這大計劃並不是某一個人所發明的，雖然史丹林時常說起他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就向列寧提出了一個電氣化的計劃；牠是自然地，必然地由蘇維埃制度的本性中生長出來的；在實施時也是逐漸發動的，即使消息靈通的駐俄通訊員，也直到第一次「五年計劃」已在進行時，纔知道牠已經開始了。對於這計劃的起源最有功勞的理論家——如果要歸功於某一個人的話——大概是奧辛斯基（Ozen）；實際上最負責置之實踐的人則是梅士勞克（Mezhauk）——他被有些人稱為「蘇聯最能幹的人」。

據史丹林宣稱，第一次的「五年計劃」成功了百分之九三·七。他是指工業方面的成績而言，而且或許還有點過甚其辭。但無論如何，這確是一件空前的偉業；只有美國初開國時的發展史，差可與之相比。工業上的產額在四年間增加了三倍，這真是一種「卓越無比的成就」。鋼的產額在四年間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生鐵的產額增加百分之八十四。曳引機、汽車、機械、航空等工業，都憑空創造了出來。全新的都市在西伯利亞草原上或烏拉爾山中建立了起來，例如馬格尼托哥爾斯克（Magnitogorsk）——這巨大的工業都市也許將成為歐洲最大的製鋼

所。從國外輸入的機械已相當多，蘇聯實施其以後的五年計劃時，只要得到極少的一點外來助力就行了。各種礦產都開發了，結果使蘇聯擁有了世界上第三位的鉅額金準備——這不是可以忽視的事。失業問題消滅了。而這時候的資本主義各國，則正被空前嚴重、瀰漫全球的經濟恐慌所蹂躪着。

這計劃還產生了重要的政治上結果，因為牠幫助蘇聯變成了一個強盛的民族國家，並將其重心推到了東方。「五年計劃」的目標本是要使一個農業國家工業化，巧得很，所發現的最大礦藏都在西伯利亞的僻遠地方，以前幾乎沒有人跡的區域中。新俄的心臟在這一帶地方跳動着——這些地方在地理上是很難攻取的。這在軍事的觀點上，也很重要。

「五年計劃」所付的代價，自然很大。好幾千萬人都沒得吃飽，陷入了悲慘的飢餓之境。人的價值完全為工業上的價值所代替了；當人們反抗時，他們就無情地被消滅了。用共產黨人的口頭禪來說，第一次五年計劃乃是一個「延緩消費」的時期。換言之，就是若要豐足，必先犧牲。不過，這一次的五年計劃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牠所產生的物品還不够滿足人民的需要。本國的生產事業雖然擴大了，但蘇聯依舊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

第二次的「五年計劃」現在（一九三五年）尚未全部告成，其進行的步調比第一次的鬆弛得多。其成績也沒有像第一次那樣，儘量公佈出來，加以鼓吹。第二次「五年計劃」的目的，為在一九三七年前後完成農業的集體化，並加緊生產各種日常消費品，如釘子、紙張、繩索、烹飪用具、鉛皮水管、科學及醫藥用品、皮鞋、金屬器皿等等，以緩和國內對於這些物品的亟需。（對於增加重工業的產量，當然仍加以相當注意的。）牠又希望能使都市中

的糧食供給增加一倍，並減低零售物價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此外牠還含着擴充或改良住宅的計劃，因為在莫斯科等大都市中，「住」已成了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

三 矛盾的現象

蘇聯的經濟基礎是為消費而生產——並非為牟利而生產。換言之，即「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共產黨自認為是一個按照這公式分配全國人民的工作和報酬的中央機關。牠毫不容情地在勞工和農民身上抽取利潤——但這些利潤是完全用在事業上的。並沒有任何私人得到什麼利潤。唯一的標準是全國人民的利益，這是由共產黨加以決定的。共產黨員雖擔任着經理似的工作，但僅領取極少的薪金。共產黨員的薪金，大抵比他們所僱用的非黨員技術人員少得多。他們的理論是，所有的生產成果應全部歸公家重行分配，以便為大家謀幸福。在蘇聯，政治上的「民主精神」是不存在的；但經濟上的「民主精神」——至少在理論上——是完全無缺的。

這種綱領在實施時，以及隨機應變時所作的修改，自然造成了不少自相矛盾的事。例如蘇聯的公民也可以承繼私有財產，雖然法律上規定承繼人以死者的直系後嗣或有直接的婚姻關係或領養關係者為限。就是十八歲以下的未成年入，也有繼承權。立遺囑者也可將其財產移贈給國家，不過這樣的事還很少見。

蘇聯的公民也可以擁有房產——雖然定有極嚴的限制。城市中的小房子和鄉間的別墅，都是可以買賣的，

(如果有人買的話)牠們算是購買者的絕對私產,不過每人只能擁有住宅和別墅各一所。土地是不能佔有的。蘇聯的土地已收爲國有,乃是國家的財產。

一個蘇聯的公民也可以購買合作社中的住宅的所有權,不過他如果犯了罪,或經營違法的私人貿易,或變成教士或反革命者的時候,他就將被逐出。在少數場合,蘇聯的公民也可以向地方當局租借土地來建造房屋。

一個蘇聯的公民可以收藏大批圖書或藝術品,不過必須向當局登記。他可以買一輛汽車——如果他買得起的話。他可以擁有一只小帆船、遊艇,或小輪船。在理論上,他也可以擁有一架飛機,但實際上任何私人是無法買到一架飛機的。

蘇聯的公民甚至可以僱用他人。家庭中的僕人是可以僱用的。他可以冒着極大的危險,僱用別人以經營私人的工商業。(例如一個皮匠可以僱用一助手)但在這樣的場合,他將被徵收極重的捐稅,以致很難獲利。醫生、律師等自由職業者,如果沒有被國家僱用,也可以自己開業。

在理論上,一個人可以領受的薪金或積聚的資本,並無限額。但除了公債票以外,卻沒有地方可以投資。這種公債票也有利息,正如資本主義各國的公債票一樣,而且利率相當高——年利八釐。儲蓄銀行很受鼓勵,一九三五年存款於蘇聯全國的儲蓄銀行者不下四千三百萬人。其利率爲八釐至一分。

最後,在賺錢的能力上,可以發生很大的差異。蘇聯影片公司(Borzhig)的管門人,月薪也許只有一百五十盧布;一個明星每月或許可以得到一萬五千盧布。件工制也被許多工廠採用,以鼓勵生產。藝術家和文學家可以

在蘇聯賺到許多的錢，雖然在賺到以後很少用處，因為他們得到的都是紙盧布。有一位劇作家書克伐金（Валентин Шкравин），其所著的「布爾喬」喜劇別人的孩子會哄動全國——在一九三四年獲得了二十萬盧布的上演稅。還有一個吃新聞飯的人，滑稽刊物微光（Огонек）的主筆柯爾左夫（Michael Koltzoff），據說每月有三萬盧布的進益。蘇聯的大報新聞報（Искусство）對於刊登的「報屁股作品」，每篇付稿費五百盧布。

然而，這樣大的收入究竟還極稀少。蘇聯人民的賺錢能力雖隨其藝術上或技術上的造詣而有不同，但最大與最小的兩極端相距並不很遠。像英、美那樣一個工廠主人及其小職員之間的差異程度，在蘇聯是絕對沒有的。在蘇聯所有的一萬六千五百萬人中間，每年賺到五千鎊的恐怕不到十個人。

在這「社會主義的不平等」問題中，還有極重的兩點決不能忘記：

（一）在蘇聯，沒有一個私人能操縱着生產工具。你可以積聚並轉讓財富，但不能積聚或轉讓生產財富的工具。

（二）在蘇聯，沒有一個人可以剝削勞動者以求得私人的利潤。公債票雖然有利息，但此種利息並非代表着從勞動者身上取得的私人的紅利。

這些保障條件，一望而知是極有效力的，所以史丹林並不因那些僅僅影響很小的一部分人民的「矛盾現象」而擔憂——實際上，這些「矛盾現象」還是爲要鼓勵生產而故意造成的哩。

四 向「常情」邁進

或許由於要緩和「五年計劃」的極度緊張吧，蘇維埃原來的若干標準，正在重行估價中。

共產黨的機關報真理報已在發表關於戀愛與母性的社論了。離婚雖然仍舊很容易，但同時也在努力設法以期改進家庭生活的水準。本來受鼓勵的墮胎，現在已被禁止了。兒童們本來受的教育，是要他們完全脫離父母而獨立，現在也受着孝敬父母、盡子女的義務等等的鼓勵了。離婚的父母對其子女所應付的贍養費，都嚴格地令其照付。最近有一條法律規定遺棄子女者應受一年的監禁，而姦淫等案得從嚴處罰。

在教育方面，史丹林自己所領導的一種運動，已恢復了各級學校裏的考試制度（史丹林又力主教科書的標準化），中小學教員和大學教授都奉令實施紀律，不要縱容學生，本已廢除的學位，如哲學博士等，現在又在贈授了。在十年前，要在蘇聯受一種自由主義的教育是不可能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自然科學與純粹馬克斯主義的經濟學上。現在，歷史和地理都在客觀地教學着了，而且有一種有力的運動正在企圖恢復研究古典作品的興趣。莫斯科大學中已設着研究英國詩人雪萊（Shelley）和濟慈（Keats）的學程。

在藝術方面，也似乎已發生了一場反革命。一九三五年六月間，有一個現已被認為舊式的極端派樂隊指揮者，從一支交響樂中刪去了兩節，說牠們具有「布爾喬的風味。」他因此受了嚴厲的斥責。一九三五年的莫斯科，莎士比亞也風行一時。從奧倫堡（Orenburg）而來的一個巴什干（Bashkir）劇團，表演了一場沙翁名劇奧賽



李 維 諾 夫

洛 (Oshalo) 使莫斯科人看得目眩神迷。革命劇場特爲「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上演羅蜜歐與朱麗葉，告訴那些年青的觀衆：真正的愛情該是怎樣的。正文並沒有被刪改。不過在第一幕中，蒙太格和嘉普萊兩家的僕人卻互相結交——以表示無產階級應有的團結。

事實上，一九三五年莫斯科「五花八門」的一年，格柏烏初次逮捕了兩個買賣戲票的投機者。一位從紐約而來的時裝設計師，伊利沙白·侯斯女士主持蘇聯第一次時裝展覽會。文化公園中所舉行的「化裝跳舞會」，又是蘇聯歷史上空前所未有。兒童恩物的製造，可以不受宣傳的限制。一位外國的大使用着一只蘇聯製造的網球拍打網球，且把棒球戲介紹了到蘇聯來。莫斯科一條大街上的一家店舖，名叫 Kuznetsky Most 的，陳列了一件標價一千盧布的袍子——等於一個蘇聯工人的七個月工資。即使在集體工場中，個人的重要性也日益受人重視了。

五 黨魁的見解

史丹林自己對於蘇聯的制度所下的定義，大概值得在此引證一下吧。

在列寧主義第二卷第三〇七頁上，他寫着，「蘇維埃經濟的意義乃是：

[(一) 資產階級的政權已被推翻，代之以勞動階級的政權。

[(二) 生產的工具和手段，如土地、工廠等等，已從資本家手中奪過來，交給了勞動階級和農民。

「(三)生產事業的發展並不願從競爭和保障資本家利潤的原則，而是願從着有計劃地指導和有系統地改進勞動者的物質水準及文化水準的原則。

「(四)全國收入的分配，係按照有系統方法，提高工農的物質地位，並擴充都市和鄉村的社會主義生產事業。

「(五)對於勞動者的物質地位，作有系統的改進，並不斷增加其需要（購買力）——藉以保障勞動階級不致遭遇生產過剩、失業加多等危機。

「(六)勞動階級為國家的主人翁：為自己一階級而工作——不再為資本家而工作。」

史丹林竭力指明，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跟歷史上的其他革命都不相同，因為牠不僅是一種統治權的轉移，不僅是一個政黨代替了另一政黨，而是一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制度代替了原來的經濟制度，且其範圍不限於一國，而是有國際性的。誠如拉斯基（Harold Laski）所說，這是近代的「基本」大事。

史丹林以為共產主義的社會，最後將造成這樣的結果：

「(甲)生產的工具將不為私人所有，而為社會共有；

「(乙)階級和國家都將消滅，而只有工業和農業上的勞動者以自由聯合的方式處理其經濟上事務；

「(丙)國民經濟將按照計劃而加以組織，且將以工業和農業上的最高技術為根據；

「(丁)科學和藝術將享有有利於其最高發展的條件；

「(戊)各個人將不必爲了衣食問題而逢迎有權勢的人，因而變成了真正的自由人。」

——史丹林論工業技術第十三頁。

史丹林認爲工業和農業方面的生產問題都已經解決了現在當前的兩個問題乃是分配和運輸。

六 民主主義

有些急進分子常說蘇聯比美國更接近民主主義，並舉出關於蘇聯的「選舉」的各種統計數字來作證。不過他們忘了兩樁事實：(一)這些選舉並不用祕密投票法，而是用舉手法決定的；(二)選舉出來的人所組成的團體，決不能說具有立法的權力。

但在一九三六年夏天，蘇聯卻向着民主主義邁進了一步。牠公佈了新憲法，規定在一九三七年的「全蘇聯大會」中通過後即行實施。這憲法是一種極重要的文件，係由一九三五年七月間成立的「改革憲法委員會」所擬成。該會的主席是史丹林，十位副主席都是蘇聯的要人，即李維諾夫、拉狄克、維辛斯基、伏洛希洛夫、莫洛托夫、布哈林、亞古洛夫 (Akhlov) ——蘇聯首席檢察官，照新定的辦法，甚至對於格柏烏也可行使其職權，區巴耳、柴達諾夫、嘉加諾維支。委員會工作了一年之久。

新憲法規定創設一兩院制的國會，跟西方各民主國的國會頗相似。下院由全體公民選舉之，上院則爲各少數民族的代表所組成。這國會將照一般立法議會的方式制定法律，下改選令，……總之，將爲政府的權力發源地。

這跟現行的制度大不相同，且可以證明執政者深信其政權已十分穩固，絕對不能加以動搖了。

而且各種民權都得到了空前的保障。「憲法保證全國的人民有職業，有閒暇，有免費受教育的機會」——即使富農或其他的「階級敵人」也沒有被除外。各種自由都經鄭重地加以確認。公民們得到了身體與家宅不受侵犯的保證，格柏烏的權力被削去了不少。最後又允許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公開集會的自由。不用說，最後這幾種規定要完全實行，或許還需要若干時日。

這新憲法可以答覆那些自由主義者的怨言：「民主主義的中庸之道已在法西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極端間消滅了。」如果新憲法能置之實施，那末人們就不能再說，共產主義對於民權和自由是跟法西主義「一樣的壞」了。在兩極端之間，將有一條新的道路可走。

有些人常說，共產黨人只佔俄國全人口百分之二，這話是不很正確的。確數當在百分之十左右。因為在計算總人數時，人們把嬰孩、兒童和婦女都包括在內的，所以在計算共產黨人的數目時，也應當如此。正式的成年共產黨員共有一、八七二、四八八人，候補黨員有八三五、二九八人。但還有「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約四百萬，「少年先鋒隊」隊員約六百萬，以及加入「十月革命團」的幼稚園和初級小學兒童，也是應當算在共產黨人之內的。一般人都深信黨員的數目不久將激增，因為每年有許多「青年團」團員達到了做正式黨員的年齡。

七 外交路線

蘇聯的外交政策，可以一詞蔽之——和平。這可用拉狄克的一段話來加以說明：

「蘇聯政府的目标是要保全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的國土，使其不致遭受另一場罪惡的，愚蠢的大戰之害。向着這個目標，蘇聯已出最大的決心一貫地奮鬥了十六年。保障和平與中立，以防人家用種種方法將蘇聯牽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漩渦中——這是蘇聯外交政策的中心問題。蘇聯所以實行和平政策，是因為和平乃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最好狀態。」——外交雜誌 (Foreign Affairs) 一九三四年一月號。

蘇聯有兩個假想敵——日本和德國；其非常切實的外交政策，用意即在制止這兩方面的危險。她曾作種種讓步以緩和鎮定日本人，例如以僅及八分之一的代價出售中東鐵路。當日本方面的壓力特別加強時，蘇聯就與美國建立了親善關係來抵消牠。當日本方面的威脅退卻時，蘇聯雖然極願跟美國做朋友且以美國的承認為樂事，卻對於跟華盛頓的「和解」不大顧念了，因為這已不像以前那樣有關出入了。

美國，因為對於日本的侵入中國也感到很不安，所以覺得跟蘇聯恢復國交是一種政治上的方便。但在承認蘇聯後幾星期的時候，日蘇的關係顯然改善了不少，於是在莫斯科的美國人就覺得那些俄國人對他們的態度沒有以前那樣親熱了。「日本人放了我們生」有一個美國人說。

在另一方面，蘇聯對於德國，卻有不共戴天之仇。德國的領土雖然並不相連，但介在牠們中間的波蘭，在目前卻是德國的同盟國。波羅的海諸國也是介在蘇聯與德國之間的緩衝。所以蘇聯必須十分注意，使這些小國——

尤其是立陶宛——保持着牠們的獨立。

曾有很長的一個時期，蘇聯的對外政策是以跟德國親善為前提的。蘇聯希望德國境內發生共產主義的革命；德國跟蘇聯一樣，也是一個被擯於化外的國家；俄國人很同情德國企圖解除其凡爾賽和約的束縛的奮鬥；還有最重要的，在本世紀二十年代，法國和波蘭是聯盟國，而其聯盟的對象似乎是德國和蘇聯。橫貫歐洲的四國：法蘭西——德意志——波蘭——蘇聯，合成一連鎖，彼此互相約束着。

這個陣容很整齊真是太整齊了。可惜不長久。打破這陣容的是希特勒。自一九三三年以後，希特勒治下的德國變成了蘇聯的無法和解的死敵；因此，蘇聯不得不立刻完全改變其方向了。她必須澈底改變其方針。她以現實主義的態度，巧妙的策略，好像戰場上的拿破崙似的，立刻完成了這個目的。

第一，渡過了「五年計劃」的難關的蘇聯，已使自己的軍力，強得同盟國一樣。第二，暫時放棄「共產國際」的活動，以增高她在國際間的聲譽。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間，得到了美國的承認，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步驟。其他尚未承認她的各國，都相繼加以承認了。於是李維諾夫設法將蘇聯送入了國際聯盟。接着就跟法國和捷克訂了互助條約。於是艾登遊莫斯科，跟史丹林握手。李維諾夫宣稱，「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而蘇聯的人民委員大家舉觴為英王喬治五世祝壽。「願上帝保佑吾王」——事情已成功了。

這樣，被擯於化外的俄國，被認為無賴的俄國，主張修改和約的諸國的魁首——「世界革命」的主張中當然含着修改和約的意義——在短短的三年間，就變成了主張維持現狀的諸國集團中的一分子。不但如此。牠跟

法國的賴伐爾和捷克的貝奈斯簽訂的條約，實際上等於是軍事同盟條約。沒有人知道這些軍事密約的內容，但其主意無非要在可能範圍內築成一道鐵壁來圍繞着德國。

假如德國攻擊法國時，蘇聯是否將完全表現其同盟關係而侵入德國？不可能的，因為兩國並不接壤。但這正是捷克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巴拉格（Pilsno）捷克首都）很可以用作轟炸柏林和薩克遜（Saxony）德國一省）等工業區域的蘇聯空軍的根據地。又，如果德國借道立陶宛或波蘭而進攻蘇聯時，法國是否將侵入萊茵地帶和魯爾以援助其聯盟的蘇聯？沒有人知道。但俄國人希望能如此。在目前，更值得憂慮的，是英國跟德國的眉來眼去，這事如果實現了，蘇聯的政策就糟糕了。

在史丹林——艾登——賴伐爾——貝奈斯會談以後，英國的共產黨人都有幾分憂慮和驚惶——法國的則更甚。史丹林吩咐法國的共產黨人停止攻擊法國的政府機關——甚至擁護法國的陸軍。這在目前，等於法國的共產主義崩潰了，不再成爲一種戰鬥的反對派。史丹林認爲這代價是值得付的。照他的理論，無論何處的共產黨人，其第一種責任是防禦「法西斯主義」。希特勒是對於共產主義的最大威脅。共產主義的最重要堡壘是蘇聯。所以，法國的共產黨人應犧牲其本地的陣地，以及在法國革命的希望，以求法國和法國的陸軍反對希特勒而保護蘇聯。

因爲全世界的共產黨人都對這些策略感到近視的驚惶和失望，史丹林就決定在一九三五年夏天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共際」大會。這是「共產國際」在一九二八年以後的第一次大會。史丹林此舉的意向，是在安

繼主張世界革命的極端分子。這次大會並沒有做多少事，除了委任德國國會縱火案中的主角第米洛夫（Georgi Dimitroff）為總秘書，並勸告英國的共產黨人與「布爾喬」的工黨聯合起來，美國的共產黨人投票選舉羅斯福（以避免法西斯主義）。

羅素（Bertrand Russell）說，梅特涅（Metternich）曾遊說亞歷山大一世，說是合法主義是比俄國的國家利益更重要。如今希特勒卻間接遊說史丹林，說是俄國的國家利益是比共產國際更重要。

可是你切勿以為史丹林及其部下已永遠放棄了世界革命的主張。這恐怕仍在他們的心靈深處盤繞着。你不要因了蘇聯跟「布爾喬」各國訂結的條約而忘記世界革命乃是蘇聯的基本哲學的基礎。同樣，你也不要因其「向常情邁進」而忘記蘇聯政府的主要的社會主義性質。俄國還沒有成爲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她距離真正社會主義的或沒有階級的社會還很遠。即使最熱情的共產黨人，也不能說列寧的綱領已在蘇聯實現了。但她確已向着社會主義跨了一大步。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初版

◆(8734.1)

復旦大學
文摘社叢書
歐洲內幕二冊

Inside Europe

每部實價國幣貳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
所必
有究

原著者 蔣學楷
譯述者 王雲五

發行人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金華、梧州、昆明、貴陽、香港、福州

(本書校對者 王家超)

*G三六〇四

港

477330

(27)

